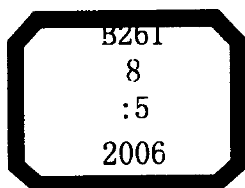
第五卷

艾思奇全書

人民出版社

第五卷

(1952—1955)



艾思奇全書



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科学方法
（1952.4）…………………………………………………… 1
从《矛盾论》看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1952.6） …………… 13
一、学习《矛盾论》的意义 ……………………………… 13
二、辩证法的核心是关于对立的统一的学说 ……………… 16
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一些基本原则 ……………………… 18
四、正确掌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解决矛盾的主要关键 ………………………………………… 30
五、结论 …………………………………………………… 34
关于《矛盾论》几个问题的解答（1952.9） ………………… 36
逻辑学（1952.9） ……………………………………………… 47
一、逻辑学研究什么？ …………………………………… 47
二、思维是认识的高级阶段 ………………………………… 52
三、关于概念与定义 ……………………………………… 60
四、判断 …………………………………………………… 63
五、逻辑的基本规律 ……………………………………… 70
六、推理 …………………………………………………… 74
七、若干问题的解答 ……………………………………… 77
“机关青年应怎样对待工作和学习来适应国家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的讨论总结（1953.9） ………………… 94
辩证法讲课提纲（1953） ……………………………………… 110

一、引言…… 110
二、辩证法的第一个基本特征：事物的普遍联系和
相互依赖…… 119
三、辩证法的第二个基本特征：从运动、变化和
发展中看事物…… 126
四、辩证法的第三个基本特征：发展是由量变进到
根本的质变…… 134
五、辩证法的第四个基本特征：发展是事物内部
对立面的斗争…… 141
西洋哲学史（1953.9）…… 154
第一次讲课…… 154
一、怎样学习西洋哲学史…… 154
二、古代哲学…… 163
第二次讲课…… 172
三、中世纪哲学…… 189
四、十七八世纪的经验派和理性派哲学…… 192
第三次讲课…… 195
五、18 世纪法国唯物论哲学 …… 209
六、德国古典哲学…… 214
辩证法引言（1953.10） …… 219
一、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者用来研究自然界
和社会生活、历史的方法…… 219
二、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想的
最普遍规律的科学…… 225
三、辩证法是怎样产生的…… 227
四、马、恩、列、斯如何规定辩证法的特点…… 234

五、学习辩证法应该采用什么方法……………………… 239
普遍联系的辩证法（1953.10） ……………………… 246
一、辩证法特征的定义…………………………………… 248
二、自然界的普遍联系…………………………………… 250
三、人类社会的相互联系………………………………… 251
四、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观点的批判…………………… 263
五、学习辩证法普遍联系原则的方法…………………… 266
运动发展的辩证法（1953.10） ……………………… 273
一、世界是运动发展的…………………………………… 273
二、运动发展特征在自然科学上的表现………………… 278
三、运动发展特征在社会历史上的应用………………… 281
四、学习经典作家对运动发展原则的运用……………… 295
五、学习方法应注意的要点……………………………… 299
量变质变的辩证法（1953.10） ……………………… 304
一、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的关系……………………… 305
二、量变质变特征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的结论………… 309
三、量变质变规律在社会科学上的应用………………… 313
四、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 321
五、学习方法要注意的问题……………………………… 327
对立统一的辩证法（1953.10） ……………………… 331
一、事物发展的源泉……………………………………… 331
二、自然科学中对立统一法则的表现和运用…………… 338
三、马克思主义如何把辩证法运用到社会中…………… 344
四、对形而上学的批判…………………………………… 349
五、学习方法上的要点…………………………………… 353
关于辩证法学习小结的几个问题（1953.11） ……… 359

一、学习方针的问题……………………………………… 359
二、学习方法的问题……………………………………… 363
三、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 368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1953.11） ……………… 378
第一次讲课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意义
及其特点……………………………………… 378
一、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意义及其特点………… 379
二、关于阶级的定义……………………………………… 384
三、阶级是如何产生的？………………………………… 388
四、阶级与阶级斗争是怎样发展的？…………………… 396
第二次讲课 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403
一、无产阶级的特点……………………………………… 403
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形式…………………………… 412
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组织…………………………… 421
四、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后目标……………………… 427
马克思列宁学院哲学教研室1953年下学期工作总结
（1953底） ……………………………………………… 430
第一部分 二部七、八、九班教学总结…………………… 431
第二部分 二部六班的教学工作总结……………………… 442
第三部分 哲学专业第一、二两班的学习和助教工作
概况与关于向苏联专家学习及如何做好
助教工作的专题总结……………………… 451
一、两个专业班的学习和助教工作概况………………… 451
二、如何向苏联专家学习及如何做好助教工作？……… 454
马克思列宁学院二部对党内中级干部进行哲学
教学的经验（1953底） …………………………………… 463

一、参加学习的学员的基本情况……………………………… 464
二、哲学教学的任务、方针、方法和步骤…………………… 467
三、哲学教学的收获和缺点………………………………… 472
四、教学经验的几点主要的体会…………………………… 475
学习斯大林的学说，为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1954.3）…………………… 479
不能忽视政治（1954.4）……………………………………… 488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引言报告（1954.9）………………… 495
一、辩证法唯物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
又是马克思主义者用以认识世界和革命地改造
世界的方法论……………………………………………… 497
二、学习辩证法唯物论哲学就是要克服思想方法上的
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性，力求用辩证法唯物论
的方法和观点研究理论、领会政策和处理工作……… 511
三、贯彻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改造思想
的教学方针，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惟一
正确的方法和目的………………………………………… 517
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职能是组织社会主义经济
（1954.10）…………………………………………………… 521
学习历史唯物论，反对历史唯心论（1954.10）………… 533
一、历史唯物论的最根本的原理…………………………… 533
二、反对历史唯心论………………………………………… 535
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546
四、正确理解什么是社会存在……………………………… 550
五、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552
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活（1954.11）…………………………… 559

哲学问题解答（1954.11） …………………………………… 564
一、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 564
二、关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 576
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 580
四、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 582
五、其他一些哲学问题…………………………………… 591
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原理的讲授
（1954.12、1955.1） ………………………………………… 597
第一次讲课（1954.12.29） ………………………………… 597
一、什么是经济基础？ ………………………………… 602
二、什么是上层建筑？ ………………………………… 613
第二次讲课（1955.1.5） …………………………………… 627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 650
第三次讲课（1955.1.8） …………………………………… 655
四、若干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解答……………………… 674
胡适实用主义批判（1955.1） …………………………… 685
一、实用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 685
二、实用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一派…………………… 688
三、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认识论……………… 699
四、抹煞真伪标准的真理观……………………………… 709
五、实用主义的庸俗进化论……………………………… 723
六、反科学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论…………………… 737
胡适实用主义哲学的反革命性和反科学性（1955.1） ……… 764
一、实用主义就是主观唯心论…………………………… 765
二、主观唯心论的——不可知论的认识论……………… 768
三、抹煞真伪标准的"真理"观………………………… 770

四、不是科学的进化论，是庸俗的进化论…………………… 773
五、不是科学方法，是主观唯心论者“应付环境”
的方法………………………………………………… 777
《胡适实用主义批判》一文的修改说明（1955.3）………… 783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历史形式
（1955.2）…………………………………………… 787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对象……………………………… 788
二、古代唯物论形态………………………………………… 790
三、近代唯物论形态………………………………………… 799
什么是我们的远大前途（1955.2）…………………………… 809
一、问题是这样的…………………………………………… 809
二、前提和原因……………………………………………… 813
三、什么是我们真正的远大前途？………………………… 817
四、个人的前途和社会的前途有矛盾吗？………………… 826
五、把我们的一切献给最伟大的事业……………………… 837
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1955.4）………………… 841
一、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和唯物论唯心论的
两军对战…………………………………………… 842
二、关于唯物论……………………………………………… 846
三、关于唯心论……………………………………………… 853
四、学习辩证唯物论哲学，为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
思想和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斗争……………… 858

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科学方法

(1952.4)

一

继去年的《实践论》之后，毛泽东同志今年又公开发表了他的《矛盾论》。

这两篇著作，都是结合着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深刻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唯物论。

列宁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列宁选集》第2卷，第711页)又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0页)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辉煌地实现了列宁的这个遗示。它具体而详明地指出我们应如何来正确认识事物的矛盾的各部分，它抓着了辩证法的这个核心问题给予了充分的解释和发挥。诚如毛泽东同志自己说的："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7页)

《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长期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而达到的理论总结。它把十分复杂的中国革命经验中所表现的一切现实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内容作了哲学上的概括。学习《矛盾论》不能忘记联系毛泽东同志的关于中

国革命的其他著作,这些著作就是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分析作为基础的。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每一个重要转变关节上,毛泽东同志都抓着了国内外各方面的阶级矛盾和现实矛盾的具体变化,给予深刻的分析,并由此做出理论上和策略上的正确结论。中国社会的各阶级的矛盾是那么复杂,长期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变化过程是那么曲折,如果不是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科学分析,要想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各种复杂的规律,并对革命运动给予正确的指导,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斗争中积累了无比丰富的正确应用唯物辩证法的经验,他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就是他的宝贵经验的总结。

与革命的实践密切联系着的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中国革命运动中所经历过的思想斗争,也必然要做出哲学的结论。和《实践论》同样,《矛盾论》在指明什么是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的时候,同时就揭露了一切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思想的哲学根源,并由此指出克服错误思想的根本道路。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党内一切错误思想都根源于两种思想方法上的偏向: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不论《实践论》和《矛盾论》都把批判的主要锋芒针对着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在革命工作中常常(特别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成为产生错误思想的主要因素。但同时毛泽东同志也不放松于对经验主义的批判。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告诉我们:依据唯物论的原理,我们的认识必须从实践中丰富的感性认识出发,再把它提高到有综合性条理性的理性认识,然后又把这理性认识拿到实践中去加以检验和发展,才有可能获得符合于客观真理的正确认识。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不承认从感性认识出发的必要,也不承认理性认识有拿到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的必要。经验主义

的错误在于虽然有着相当丰富的感性认识，但不善于或者拒绝使它提高到理性认识。两种错误的思想都是违背了唯物论的认识原理。要纠正这些错误，就是要使我们的思想方法正确地依循着《实践论》所阐述的唯物论的认识规律，就是要通过实践使我们的认识循环往复地不断由感性阶段提高到理性阶段。如何才能使我们的认识由感性阶段提高到理性阶段？《实践论》的回答是：“……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0页）如何来正确地发挥我们的思考作用？如何才善于进行对感觉材料的改造制作工夫？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给予了详细回答的问题。《矛盾论》告诉我们，要善于使我们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其根本方法，就是要从丰富的感性的事实材料中，详细揭发客观事物的各方面的矛盾。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错误，不但是由于违背了唯物论的原理，同时也由于违背了辩证法的原理，不“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研究《矛盾论》，在《实践论》所指示的唯物论认识原理的基础上来应用辩证法的方法，那“我们就能够击破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不利于我们的革命事业的那些教条主义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经验的同志们整理自己的经验，使之带上原则性，而避免重复经验主义的错误。”（同上书，第325页）

二

为什么学会了用唯物辩证法来具体分析事物各方面的矛盾，就使我们有可能善于把感性的认识提高到理性的认识呢？因为只有唯物辩证法，才能帮助我们揭发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并

由此获得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知识;而理性认识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的认识。列宁曾指出只有把发展看做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的运动观,“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362 页)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里也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89—290 页)在《矛盾的普遍性》一章里,他又指出矛盾不但普遍地存在于一切事物中,而且普遍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因此,分析事物的矛盾,并根据这种分析来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就应该是科学研究的普遍方法,是应该贯彻在一切科学研究部门,应该贯彻在任何一个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研究方法。毛泽东同志自己的全部著作,就是在各方面应用这个方法的范例。他不但在革命运动的各方面,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等的问题中正确地应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矛盾的方法,而且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全过程的研究中,在革命形势变化的各个阶段和一切关节上,自始至终,都紧紧地掌握着分析各方面的阶级矛盾和现实矛盾的变化这一个基本的科学方法。

既然承认分析事物各方面的矛盾是普遍的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那么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同时需要解决,那就是:如何来分析事物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所给予的回答,和教条主义的回答是不同的。教条主义一般地也承认矛盾,但它用公式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事物的矛盾法则,即随便抓着几个抽

象的矛盾原则来套在一切事物上头，而不问时间、地点等等的具体条件。他们把唯物辩证法简单化、庸俗化，用这种方法来研究革命问题和指导革命运动，就常常把革命当成儿戏，这在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者身上是表现得最为突出的。真正的唯物辩证法方法与此相反，它要求对于每一具体事物的具体矛盾加以具体的分析研究。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真髓和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144 页）又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列宁全集》第 7 卷，第 363 页）毛泽东同志特别重视列宁上述的遗示，他的《矛盾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论述事物的矛盾法则中间，充分发展了列宁的这个遗示。他用最多的篇幅详尽地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并在这个问题上，突出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的特殊性的研究是一切科学研究的根本条件，因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97 页）"……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同上）

毛泽东同志根据唯物论的认识论原理，指出必须联系着对矛盾的普遍性的认识，着重地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才符合于人类认识的自然规律，才不至于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

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同上书，第 298 页）毛泽东同志的关于人类认识的具体和普遍、特殊和一般的相互联结的思想，是辩证法唯物论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中不论理论方面或实践方面都有着重大贡献的发展。这个思想告诉我们：一切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都是具体实际的研究的成果，都是工人阶级的具体的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当我们应用这些普遍真理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时候，我们又必须再一次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必须特别注意研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的特殊问题，研究许多在普遍真理中尚未涉及过的或未完全涉及过的新的事物，这样才不至于像教条主义者那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变成枯槁的僵死的东西，才能够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运动。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经常为我们指出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的原理。就事物的矛盾法则来说，也是同样，马克思主义者所承认的矛盾的普遍性以及作为科学研究的普遍的根本方法的矛盾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者从事物的各种特殊矛盾的研究中概括出来的关于矛盾的一些共同本质的认识。当我们把这矛盾的普遍法则作为方法，拿来研究一定的具体事物对象，例如说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时，我们又必须对于这具体事物对象的矛盾的特殊性，例如说对于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特殊性着重加以研究，才不至于像教条主义者那样“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98 页），才能够对于所研究的

事物对象，对于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获得正确的科学的认识。

强调要着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并不是要排除普遍性的研究。问题是“……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同上书，第292页），因此，着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是为着要从其中概括出一定的普遍真理，以便用它来指导我们进一步研究新的矛盾的特殊性。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去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各种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有不同的特殊的矛盾，自然界的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和人类社会的运动形式中的矛盾是不相同的。同一物质运动形式的不同的发展过程也有不同的特殊矛盾。同是近代人类的革命运动，俄国革命的过程不同于中国革命的过程，因为沙俄原来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而中国则原来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俄国革命中的阶级矛盾和中国革命中的阶级矛盾各有其不同的特殊性（当然也不能忽视两者中间也有其共同性、普遍性）。同一运动形式的发展过程，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矛盾特殊性，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已经过了四个阶段，在四个阶段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矛盾都曾经发生过许多变化（虽然也不能忽视其中的某些没有变的基本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要求我们具体研究这些阶级矛盾的特殊性及其变化，不能希望设想一个永久不变的原理来说明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只有教条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唯心论者才会这样胡作乱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不仅是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这也就是说，科学是要指导实践，要解决客观存在的现实矛盾。要解决矛盾，就不能不依据矛盾的特殊性质来规定与此相适合的解决方法，就不能不重视矛盾的特殊性。“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9页）“俄国的

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决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决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同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阶段，在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这个根本矛盾的基础上，各阶段之间的矛盾关系有着许多具体的变化，因此用以解决矛盾的指导策略上也有许多具体的差异。“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同上)

要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其最主要的关键在哪里？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最主要的关键就在于研究那互相矛盾的各对立方面的具体特点。只有认清了各对立方面的具体特点，才能认清事物矛盾的总的特点。例如像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中那样一方面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许多特点，另一方面又认清了中国抗日人民自己的许多特点，总合起来才确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一个特点。毛泽东同志说：“为要暴露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在其总体上、在其相互联结上的特殊性，就是说暴露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质，就必须暴露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9页)“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同上书，第300页)矛盾的各个方面的这些特点，是常常在变化中的，即使是同一类的矛盾，其各个对立方面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之下都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同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其中两阶级在矛盾内

各自所处的地位以及两者相互的关系，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一个样子（在这里资产阶级居于革命的领导地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又是一个样子（在这里工人阶级居于革命的领导地位），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是一个样子（这里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表现着革命与妥协的两面性），在帝国主义国家又是一个样子（这里资产阶级完全是反革命的、反动的）。这些对立的各方面的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的特点，就构成同类矛盾的总体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的特点。所以，分析事物的矛盾，决不是只就矛盾总体笼笼统统地作一个估计就能完成任务的。不能暴露事物矛盾的各方面的特点，就不可能暴露矛盾的总的特点，就不能理解发展过程的特殊本质。毛泽东同志在说明这个问题的时候，更把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特点作了一个简单明了而又十分深刻的概括。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在研究问题的时候要避免“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反过来说，就是要对于事物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的、全面的、深刻的研究。要避免片面性的错误，就必须研究矛盾的各个方面或各个部分的特点而不是只去研究它的一方面或一部分。要避免表面性的错误，就必须承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1页），而不是“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同上）“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同上），因此，能够避免片面性和表面性的错误，也就可以保证避免主观性的错误了。“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同上）所以，必须在应用矛盾的普遍性作为方法去研究具体事物的时候又着重研究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必须深入到客观事物里面去精细地研究其矛盾的各方面的特点，以便进

一步就其总体上和互相联结上来把握具体矛盾的具体特点，这样才能够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才能把我们对于事物的研究和认识提高到科学的水平。

三

为要使我们对于《矛盾论》中所包含的最主要、最精深的思想获得一个扼要的理解，最好是温习一下毛泽东同志自己在1942年《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论到如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段话：

“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那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那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面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0页）

我们知道，毛泽东同志就是正确地应用他所论到的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方法，来在中国革命的各方面斗争中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这样他就创造了一系列的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使中国革命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30年来的革命斗争中，尤其是整风运动以来的十多年斗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干部，跟随着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学到了他所指示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这些方法，在广大的国土上有力地担当了各个方面的工作，使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获得今天的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方法的指导，要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得到这样伟大的革命胜利，是不可想象的。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上划时期的整风运动前夜写成的，它为我们党的一切伟大胜利事业奠定了理论的基础，正如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给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理论基础一样。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与我们实践方面的伟大胜利相适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的一个伟大的胜利，是科学的思想方法辩证法唯物论的伟大胜利。

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的胜利，现在还只是开始，前面还有无数艰巨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与我国的国土的广大和革命任务的繁重要求比较起来，我们现有的具备着足够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的干部还是太少了。广大的革命工作干部必须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同志用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唯物辩证法，才有可能更好地担负起我们应做的工作。

特别是在一般的理论研究工作方面，更显得落后于现实的需

要。虽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代表着我们党的最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就，并解决了中国革命运动的主要问题。但我们一般的理论研究工作者很少能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实事求是地从许多客观存在的问题中去研究它的具体矛盾，很少能够通过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来精密地分析和解决各种矛盾，因此直到现在，我们学术界的一般的理论工作还仍然停顿在一种十分空疏的状态上面。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就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对于这种空疏的状态发出警告，并向全党提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的任务，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2页）的任务。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完成了这些任务没有呢？没有人敢作完全肯定的答复！这就足以说明问题是如何严重。这种情况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对于全党、对于全国革命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和辩证唯物论的学习，是一个伟大的推动力。我们应该借此学习的机会，进一步努力来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进一步锻炼我们应用唯物辩证法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我们在今后的革命的实际工作中和理论工作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原载《人民日报》1952年4月19日；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从《矛盾论》看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

（1952.6）

一、学习《矛盾论》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原理，做了全面的具体分析，并在许多方面给予了新的发挥。列宁说："辩证法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发展学说。"对这句话的无限丰富的内容，我们可以从《矛盾论》里获得深刻的领会。《矛盾论》教导我们如何正确地理解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如何系统周密地去把握事物的联系及其内在矛盾的运动。它使我们了解：为什么建立在这个科学方法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能够在理论上具有最高度的客观真理性，而在实践上能够启发劳动人民的无穷无尽的革命的创造力量；为什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能够准确地解决像中国革命这样非常复杂、非常曲折的问题，并引导中国人民通过险恶万端的航道，达到胜利的境地。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指出苏联哲学界在1931年以后数年间批判德波林学派的重大意义。德波林的哲学是孟什维克派的唯心论哲学，这个哲学由于在表面上打着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伪装旗帜，曾经在一个时期里有着相当大的影响，特别对于一些具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与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精神保持着一定

距离的知识分子尤其如此。这派哲学的主要特点是：第一，它故意抹煞列宁对于唯物辩证法哲学所做出的新的贡献，否认列宁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说，它从哲学上，从理论基础上来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也即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第二，它仅仅在词句上，在抽象的理论形式上表示拥护唯物论，拥护辩证法，它散布着一种为学术而研究学术，使理论脱离实际的坏风气。它从来不曾运用唯物辩证法去认真地研究和解决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以及苏联工人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划时代斗争中所提出的任何具体问题；它采用黑格尔的唯心论方式，从单纯的概念上，从名词的穿凿上来研究辩证法，把辩证法曲解成一些片面的、悬在云雾中的、与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漠不相关的死的公式结构，使它失去了任何能够把握事物发展和革命发展规律的生动力量。德波林学派的这种错误思想，正适合着那些曾受过资产阶级教育而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包括科学技术人员等等的趣味，它吸引着他们，使他们拒绝和工人农民群众结合，拒绝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结合。这样，德波林学派就成为苏联社会进步的阻碍力量，如果不加以粉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就要受到极大的损害。这就是苏联哲学界所以要批判德波林派唯心论的主要原因。

毛泽东同志指出德波林的唯心论曾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中期，在我们党内占据了领导的地位的一些教条主义者，就是原来既没有革命实际经验而又受了德波林派坏作风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轻视中国工人农民的实际革命斗争经验，从不肯认真研究一下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和中国革命的具体规律，仅凭书本上引用的片断词句和自以为是的主观臆想，就对革命运动发号施令。这个时期革命人民所遭受

的极大的挫折，就是这些教条主义者“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所造成的恶果。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是联系着对这些教条主义者的政治斗争而进一步给予哲学批判的革命文献，它充分地应用了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派的斗争的积极成果，而在丰富的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来系统地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它特别着重地论证了和发展了列宁关于唯物论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许多思想，而把批判的主要锋芒针对着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同时也批评经验主义），揭露了它的理论与实践脱离的、反辩证法的、片面性和形式主义的错误，揭露了它与德波林派的假马克思主义的联系。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这一个十多年以前的指示，在今天仍然是有实际意义的。这是由于：一方面我们党内一部分从事理论工作的人们中间，还没有把教条主义思想残余完全肃清，还没有在工作上认真建立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的作风，还不善于在研究中运用全面分析事物矛盾运动的辩证法方法，还往往要发出许多夸夸其谈抽象空洞的调头，这样就不可能很好地推动党内外干部正确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按照中国革命胜利的需要及时地提高他们的认识水平。另一方面，革命胜利以来许多在旧社会里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包括科学技术人员等等，大批地参加到国家的政权工作、文化教育工作以及其他各项建设工作中来，他们的脱离实际的旧教条主义的坏习惯，他们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和形式主义，使他们在各方面工作中不能够发挥足够的积极力量。这是在最近全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学习《矛盾论》，就是要学会正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并针对着中国目前的这些具体情况，来扫除各种各

样的教条主义思想。

二、辩证法的核心是关于对立的统一的学说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着重地发展了列宁的“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的统一的学说”这一个天才思想，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如果我们学习唯物辩证法的原理而能够做到这样善于运用它，我们就是掌握了正确的科学的研究方法。

唯物辩证法之所以成为正确的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因为这方法的本身与客观事物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是因为它所根据的根本原理即矛盾法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的反映，是因为“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实践论》），是因为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泉源。《矛盾论》里的《矛盾的普遍性》一章，证明不但“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而且“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因此，如果我们能运用辩证法的原理，善于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例如说善于观察和分析社会的阶级矛盾运动，我们就能够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及其运动发展的规律，就能够正确地认识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规律。如果我们不善于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矛盾运动，甚至于拒绝或不承认应该如此做，那我们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事物及其发展规律，就必然要犯错误。就为着这样的原因，所以，自始至终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矛盾的毛泽东思想能够时时刻刻都保持着最高度的科学性，能够在中国革命的一切问题上都比别人看得更高更远，而我们党内

那些不善于或不肯认真分析中国社会阶级的矛盾的教条主义者，在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作中总是失足，总是要犯“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就为着这样的原因，所以那些硬要否认中国有阶级存在或否认中国有阶级斗争，并企图以此来反对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潮流的人终于遭到了失败，那些反对严格地划清敌我的阶级界限而主张阶级调和和点滴改良的思想，那些反对“一边倒”的道路而主张走“第三条路线”的思想，那些否认主观努力和思想斗争的“客观主义”的思想，那些认为科学技术人员到处都可以一样吃饭而用不着阶级立场的“超阶级”的思想等等，都不能不接二连三地宣告了破产。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辩证法把事物的发展看做事物本身内部矛盾的运动，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将眼光局限于事物内部，只孤立地去看事物本身发展的原因，而丝毫也不必注意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不必注意事物发展的外部的原因，唯物辩证法的主张决不如此，“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列宁论辩证法的诸要素时，把“这一事物中的内在矛盾的诸倾向”和“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同时列举出来。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正是发挥了列宁的这些思想。毛泽东同志并进一步规定了内部矛盾和外部原因在事物发展中的正确关系，指出“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所以，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观察事物的发展，并不要排除外部的原因，相反地一定要估计到外部的原因，但重要的是必须认识到：“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研究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时期进入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发展，决不能撇

开俄国十月革命对于全世界各国给予的巨大影响，然而俄国革命的影响不在英美帝国主义国家促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而却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引起了这样的结果，这就说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并不是直接决定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而是通过中国社会内部各阶级的矛盾运动发生作用。所以，不认真分析中国社会内各阶级的矛盾运动，而单凭俄国十月革命一方面的原因是不可能完全理解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不是输入的，而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意思。只有那些丧心病狂的帝国主义者和世界各国反动派，当他们破坏各国人民自由幸福的可耻的企图遭受失败时，才穷极无聊地污蔑人民的革命斗争，说那完全是依靠外力支持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妄想单纯依靠暴力从外部来压杀革命，这些狂妄行为到处遭到破产的结局，也可以作为上述真理的一个反证。

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一些基本原则

列宁"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的统一的学说"，但事物的矛盾并不是简单的、具体的事物，都具有着相当复杂的矛盾和联系。"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各个矛盾在发展过程中，在互相联系中，其地位、性质、作用是互有差别的，并且是不断变化的。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主要的与次要的，互相交错而构成有机联系的总体。因此，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对立的统一的学说，是为我们指出了科学方法的一个总的方向；这就是：要想获得与客观真理一致的正确认识，必须善于去分析和解决各种事物本身的矛盾运动，而由于事物的矛盾运动都是复杂的，因此在我们进行研究的时候，就必须进行全面的具体的观察和分析，任何片面的公式主义的方法，在事物的

真理面前都是要宣告破产的。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充分发挥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许多基本思想。从《矛盾论》的学习中间，我们可以领会到如何运用辩证法去全面地、具体地观察和分析事物矛盾运动的一些主要原则。这些原则，据我个人的认识，可以分为如下几点来加以说明：

第一，在普遍真理的指导之下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

毛泽东同志论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时，指出“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联结的”，“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所以，当着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就应当去发现这两方面及其互相联结。”根据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这个原理，首先我们就可以掌握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这样一个原则，即在我们研究一定事物的时候，可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既已确定的一些有关的普遍性的矛盾原理，作为我们研究的指导方针，来研究这些矛盾在这一事物中所表现的特殊性。例如论到现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时，列宁在他的著作里已确定了这样一个普遍性的原理，即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斗争，夺取民主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以便准备条件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的，因此，我们就可以用列宁规定的这些普遍真理作为指导，来研究中国现阶段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时我们就要像毛泽东同志那样，着重把这个具有普遍性的矛盾原理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特殊表现加以揭发。就这矛盾的普遍性方面来说，中国无产阶级在现阶段革命运动中必须依照列宁指出的方向，和资产阶级斗争，把革命的领导权紧紧掌握在

自己手中，以便创设条件使中国的民主革命向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发展，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根据中国的特殊条件，认清这个普遍性的矛盾原理在中国有其特殊的表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它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新民主主义论》）这样，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革命现阶段所表现的矛盾运动，就具有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不同的特殊性。“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联合它。”（同上）而在中国却不同，中国无产阶级一方面必须和资产阶级斗争，以便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并便于创设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条件，另一方面又必须与资产阶级联合，共同反对革命的敌人。因此，中国无产阶级也不是要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立即打倒资产阶级，使革命向社会主义的性质转变，而是要继续与资产阶级联合（同时也要斗争），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时期再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要正确认识中国革命运动的客观发展规律，必须在上述列宁规定的阶级矛盾的普遍真理指导之下来研究中国阶级矛盾的特殊性。如果忽视了列宁的普遍真理，在民主革命运动中不知道无产阶级应该为着争取领导权和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而与资产阶级斗争，那就要陷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或投降主义的错误。如果把列宁的普遍真理曲解成死的公式教条硬套到中国革命上来，而不同时注意到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特殊性，不注意到两个阶

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联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那就会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这就是根据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互相联结而必须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第一个原则。

第二，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不断地循环往复地进行观察研究。

毛泽东同志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科学研究的过程，是要按照这个人类认识的规律性，把个别的特殊的事物的研究作为最初的出发点，把矛盾的特殊性的观察分析作为最初的出发点。我们经常把已被认识的普遍真理作为我们研究特殊事物的向导，但却不能把它当做客观事物认识的最初的出发点。如果我们仅仅从书本上记诵了一些矛盾运动的普遍原则，而从来也没有研究过一下与这些原则有关的客观存在的具体的矛盾运动，那么，我们脑子里所有的只是一些抽象的主观的公式，并没有真正开始认识了关于这些矛盾运动的客观真理；因为普遍原则本身也只是诸种个别的特殊的事物中概括出来的共同的本质。没有研究过个别的特殊的事物，也就不可能真正领会有关的普遍的原理。因此，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事物的人，是要遵守着这样的秩序：首先着重地注意观察和分析当前事物的矛盾运动的特殊性（在已被认识的有关的普遍原理的指导之下），再通过这些特殊性的研究过程，就能够概括出一些新的矛盾运动的普遍原则，或把已被认识的普遍原则更加深化，然后再以这些普遍原则（以及其他已被认识的普遍原则）为指导，进一步去研究矛盾运动中的新冒出来的

或尚未深入研究过的特殊性。这样就把两个研究的过程结合起来，“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由于事物的矛盾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而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决不可能一次就把事物矛盾运动的全部内容揭发净尽，而相反地必须不断地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循环往复地进行研究，使我们对矛盾运动的认识一步步更加提高，一步步更加深入，并能够跟着事物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这是运用辩证法研究事物矛盾的又一个重要原则。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最早期的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依据历史唯物论的阶级斗争的普遍原理，以及列宁斯大林所确定的关于帝国主义及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阶级矛盾运动的普遍原理，首先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矛盾的特殊性。他把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各个不同的特点，按照他们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和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各自所表现的情形，具体地逐一描绘出来，由此概括出一些适用于中国革命现阶段阶级矛盾运动的一般原理，即：“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些从矛盾特殊性的分析中概括出来的普遍的原理，反过来又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特殊矛盾的总的研究指导。它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中，是自始至终起着贯串作用的普遍原理。然而这些最初规定了的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的普遍原理，并不是作为死的公式原封不动地简单地用来说明各个革命阶段的阶级矛盾，而是通过各个阶段的阶级

矛盾的特殊性的分析，使这些普遍原理不断获得新的内容，而愈更深入地，愈更具体地丰富。例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就对于敌人的认识来说，把帝国主义、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等等作为革命的敌人这一个普遍原理并没有改变，然而毛泽东同志研究了当时处于困难条件下的革命的特殊情况以及各阶级矛盾在这时期的特殊表现，揭发了敌人内部的不可解决的矛盾，指出："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分析，一方面认清了当时敌我矛盾的特殊性，指出敌人虽然暂时强大，而由于其自身矛盾的发展，必然要逐渐削弱；而革命人民虽然遭受困难，却可以在敌人的矛盾中找到向前发展和争取胜利的一个条件。而另一方面，由于揭示了敌人内部矛盾的必然发展和革命人民可以利用这个矛盾的原理，也就是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更深刻的普遍原理，来充实以前认识了的那些普遍原理，使我们在往后研究中国革命的阶级矛盾的特殊性时，有了更为丰富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同志后来对于抗日战争时期敌我矛盾的分析，以及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敌我矛盾的分析，都是依循着这些关于阶级矛盾的普遍原理进行研究而使之一步步更加深入更加发展的。这只要仔细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就可以得到更具体的了解。

第三，事物矛盾的各个侧面的不断揭露和展开，部分和总体，分析和综合的联结。

根据《矛盾论》中关于《矛盾的特殊性》一章中所论到的一

些原理，当我们运用普遍原理作为指导来研究一定事物的矛盾运动时，为了不致把普遍原理变成僵死的公式来曲解事物，而要正确抓着这一事物的矛盾运动的特殊性，最主要的关键，就在于把这一事物的矛盾的各个侧面的特殊性加以揭露，然后把各个矛盾侧面的特殊性综合起来，才可以把握矛盾总体的特殊性。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把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即中国社会矛盾的各个侧面——的特点逐一加以揭露，然后在末了就给我们一个关于中国社会阶级矛盾运动的总体的特殊性的结论:这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联合一切半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并联合中产阶级的左翼(同时要加以提防)，共同反对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等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由于革命失败不久，工人农民的斗争都遭受极大困难，一部分同志甚至于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来时，毛泽东同志揭露敌人方面内部矛盾的特点，也分析了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的“拼命压榨”，农民对地主更加仇恨，“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反革命军队的“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中”，“学生有失学之忧”，“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等等。毛泽东同志分析了中国阶级矛盾的各个侧面的这些特点之后，就把这些特点加以综合，指出这些矛盾的总体，是具有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特殊性，犹如“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一般，革命的高潮是不可避免地就要到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了东北全部及华北一部分，威胁了全国，中国国内矛盾运动就起了新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又把这些矛盾变化的各个侧面作了详细的分析，首

先指出在敌人这一个侧面的特点是:“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此外，毛泽东同志更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的动摇和改变，指出革命营垒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红军长征的胜利完成，在西北奠立了一个巩固的推动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南方红军的继续存在，工人的经济政治斗争以及反日反卖国贼斗争的开展，农民的斗争及包括东北冀东的各地农民游击战争的开展,学生运动的极大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和小地主们的动摇以至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等等，根据这些矛盾的各个侧面的特殊性变化的分析，毛泽东同志再加以综合,指出那时中国阶级矛盾运动的总体的特殊性，说:“所有这些都指明，革命的阵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

列宁在论到“辩证法的诸要素”时，举出了以下各条:“事物作为对立的总和与统一”;“这些对立的斗争及展开”;“新的诸方面、诸关系等等的揭露之无限过程”。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所展开的唯物辩证法的许多原理，以及上举毛泽东同志在自己的著作中所做出的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天才范例，都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这些基本思想。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发展过程中，事物的矛盾的各个侧面的特点不断发生变化，而矛盾的总体也就因此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就使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各个时期具

有不同的特点。要正确把握客观事物的这些辩证法运动，就必须使我们的主观的思想方法也形成相应的辩证法运动。这就是说，要随着事物的发展变化不断地去揭露其中矛盾的各个侧面的变化，并据此以确定其矛盾的总体的变化以便掌握这些变化的特点来正确规定我们实践行动的方针。毛泽东同志说：

“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

“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须在其联结上、在其总体上去看，而且必须从各个阶段中矛盾的各个方面去看。”

所以，必须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去揭发矛盾的各个侧面的变化以及由此形成的矛盾总体在各个阶段上的变化，必须不断地就各个部分加以详尽的具体分析，又把部分综合起来作为一个总体来认识，只有在思想方法上也通过这样的矛盾运动，才有可能使我们的思想随着过程的发展正确的反映客观的矛盾运动，如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所辉煌地显示着的那样。这样才不至于使我们的认识凝固僵化而落后于或不符合于客观真理的实际，才可能避免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错误。

第四，密切注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之交错和推移。

当我们分析了事物矛盾的各个侧面各个部分，而要在这分析的基础上来综合地认识那些矛盾在其总体上的特殊性时，在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上就又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必须注意，否则就会在复杂的事物矛盾的前面弄得茫无头绪，不知道从那里综合起。这个原则就是："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找出了主要矛盾，就找出了各个的矛盾的相互联系的主要关键，就容易掌握全部矛盾联系的总的特点，因为主要矛盾是具有这样的性质：即"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入，使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形成了主要矛盾，毛泽东同志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并由此出发，指明其他的阶级矛盾如何在这个主要矛盾的影响之下产生了新的特点，这样也就把握住了当时的阶级矛盾运动即革命形势的总的特点，也即是使党有可能"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这一个特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者不能够捉住那主要的矛盾，因此也就不能够认识到革命形势的这些新的特点。

毛泽东同志说："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这就是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条件之下，主要矛盾会要发生变化，由一种主要矛盾推移到另一种主要矛盾。毛泽东同志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所经历过的复杂的推移变化归纳为三类情形：由于帝国主义直接向我们进行侵略

战争而使帝国主义与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这是第一类的情形；帝国主义不采用直接行动而用间接的方式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这时就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这是第二种情形；“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完全公开地站在一个极端，人民大众则站在另一个极端，成为一个主要矛盾”，这是第三种情形。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是由第二种情形推移到第一种情形，由抗日战争到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是由第一种情形推移到第三种情形——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政府公然站在一边来反对广大人民。密切注意这些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之推移变化，以便及时地认清革命运动的总的形势变化并据此来适当地改变我们指导革命运动的各项政策，这是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观察和分析像中国这样复杂和曲折的矛盾运动时所必须注意的原则。

然而中国的阶级矛盾运动是如此复杂，其主要矛盾不仅是会推移变化的，而且往往是同时交错存在的。人民解放战争获得胜利，打垮了蒋介石政府的反动统治，美帝国主义者失去了它在国内共同压迫人民的工具，于是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就起了主要的规定作用，但同时在国内各阶级的矛盾运动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又具有了主要的性质。正如毛泽东同志很早就预见到的那样，工人阶级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必须和资产阶级斗争，以便保持国家政权始终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并始终保持其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以便继续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以便在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原则上来团结资产阶级，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建设新民主主义。

就多数矛盾同时存在的情形下来研究其总体的特点，必须着

重找出其主要的矛盾，就一种矛盾来研究其矛盾的特点，就必须在矛盾的两个对立方面中着重去认清哪一方面是主要的方面。因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而“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就是引起事物的性质变化的内在原因，就是事物的“新陈代谢”，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的内在原因。事物矛盾的新的方面代替旧的方面取得了支配地位，这事物就由旧的性质变为新的性质。所以，密切注意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变化推移，研究如何创造条件以便争取使原来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矛盾的新生的方面转到支配的、主导的地位，而把原来起主导作用的居于支配地位的旧的腐朽的方面打到被支配的地位去，这是运用革命的辩证法来研究事物时所必须遵守的原则。

复杂如中国社会的矛盾，其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常常是交错地联结着的。这个特点在毛泽东同志分析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现实矛盾的全部著作中，是非常巧妙地被掌握着。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广大人民与蒋介石反动政权之间的矛盾，其主要方面——处于支配地位的方面几乎完全在于后者，革命的困难情形甚至于使一些同志发生悲观情绪，然而毛泽东同志经过周密的分析研究，肯定地指出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中，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可以发生、发展起来，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反动政权处于支配地位的情形之下，在某些小块地区却交错地存在着工农人民的支配权。在战争的指导上，毛泽东同志对于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交错特点的掌握，更可以说是准确到臻于神妙的境地。在敌人军力强大的情形下（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第一阶段），毛泽东同志一方面适应着敌人在战略上的相对优势和主动地位而采

取了战略的内线作战的防御的方针，另一方面却又利用和创造各种于我有利的条件争取我方在战役和战斗上的优势和主动地位，争取在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和进攻作战的方针。这样巧妙地把敌我矛盾的主要方面交错地加以安排——不是依据主观愿望来安排，而是依据客观存在的现实条件来安排——的战争领导，就使革命人民的武装力量能够在战役和战斗中一步步地消灭和削弱反革命的武装，使后者由最初强大的优势力量渐渐向劣势方面转化，而革命人民的军队就终于会发展为强大的优势力量，在战略上也向着外线和进攻作战的方面转化，最后就能够完全打败敌人。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样交错地掌握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辩证法：他们或者只看见敌人的强大和优势的一方面，因此就不管是在战略上，或是在战役、战斗上，都采取单纯防御的挨打方针；或者他们又只注意到革命人民的军队在某些战役、战斗上获得了歼灭敌人的胜利，就不顾整个自己的军力还居于劣势，就以为在战略上也应该采取外线的进攻方针了，这种对于辩证法的无知，就使他们终于把自己陷于被动和失败的境地。所以，细心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如何交错地联结着，是研究复杂矛盾时不可不注意的原则。

以上就是我们从《矛盾论》的学习中所看到的一些运用辩证法的主要原则，要善于运用辩证法来观察和分析事物的矛盾和解决矛盾，就必须学会活用这些原则。

四、正确掌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解决矛盾的主要关键

事物的内在矛盾使事物分裂为两个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对立方面，这些对立方面又互相联结而不可分，也就是又具有着同一性、统一性或一致性。研究事物的矛盾运动，就是一方面要研

究矛盾基础上的那对立方面具有着什么样的同一性，另一方面而又要研究那对立方面互相间如何进行斗争，以及斗争性和同一性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具体地认识清了矛盾的对立方面的这些特点，就能正确掌握矛盾的运动和解决矛盾。

就对立的同一性来说，毛泽东同志依据列宁的思想，把同一性分为两种情形，即："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列宁指出对立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因此，要认识事物的对立一方面的同一性，就必须研究这种同一性所依据的必要的条件，研究对立的两方面要在什么条件之下才能互为存在的前提而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或在什么条件之下才互相转化。例如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对立的阶级，又共处于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统一体中，然而两个阶级之具有能共处于新中国的统一体中这个同一性，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许多原则。破坏了这些原则，两个阶级在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统一体中的共处关系也就成为不可能。所以工人阶级在"五反"运动中反击违法资本家对共同纲领的进攻，正是为了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也包含资产阶级在内的新中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如果以为不必坚持共同纲领的原则也可以求得与资产阶级建立共处于统一体中的关系，那么，这样的统一体就不能再是新民主主义的统一体，而是旧民主主义的统一体，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条件下归根结底仍是要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一体。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想法。再就对立的互相转化这一个同一性来说，例如要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入社会主义阶段，就必须具备生产力发展到相当水平以及广大人民认识到有

此必要等等的主客观条件，在必要条件还未具备的时候就要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阶段，就要犯“左”的冒险主义的错误。所以，不依据一定的必要条件来恰当地掌握对立的同一性，是不可能正确解决事物的矛盾的。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解释和发挥了列宁关于对立斗争的绝对性的思想，说：“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一定条件下的对立的同一性，是在对立的斗争的基础上存在着。不论是对立双方互为条件地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的情况也好，或是对立的一方向他方转化的情形也好，都是通过对立的斗争的。“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统一体中共处的关系，存在于工人阶级为坚持共同纲领的原则而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之上，由新民主主义阶段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也不可免地要经过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一定的斗争。事物的矛盾通过斗争而得到暴露，又通过斗争而得到解决。“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斗争是事物运动的绝对的规律，所以，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要面对斗争，正确地贯彻斗争，而决不回避斗争。

说对立的斗争在事物的运动中具有绝对性，这并不是说斗争的形式可以任意造作而不必依事物的性质和条件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对立的斗争的形式是

多种多样的，单就社会的矛盾运动来说，有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思想斗争、军事斗争等等的形式。对武装的反革命敌人，革命人民采取武装斗争或军事斗争的形式，对于资产阶级的投机活动，人民国家采取经济斗争的形式，情节严重的采取法律惩办的形式，情节轻微的也可以采用思想斗争的形式，即教育改造的形式。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一律采取思想斗争的形式。在反动统治下革命的斗争有公开的和秘密的形式，有合法的与非法的形式。事物是多种多样的，其矛盾运动的斗争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决不是一说到斗争，就全包含着杀人流血或暴力冲突的意思。所以，“当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的时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区别”。要依据客观的条件掌握适当的斗争形式，才不至于犯错误，才不至于造成混乱。

在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中，毛泽东同志依据列宁的一些基本思想，把对抗形式的斗争和非对抗形式的斗争加以区别，指出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斗争的一切形式。只有当某种矛盾发展到必须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来解决矛盾时，才成为对抗性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指出，“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革命人民与反动统治者的矛盾，是具有对抗性质的，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没有革命和革命战争，就不能推翻反动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但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所表现的矛盾，一般的就没有这种对抗性。因此，我们必须依据矛盾本身之是否具有对抗性，来掌握适当的——对抗或非对抗的斗争形式，掌握适当的解决矛盾的方法。然而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矛盾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也应该看做是具有同一性而可以互相转化的。“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

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学习了这些辩证法的原理，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掌握斗争形式来解决矛盾的时候，应该如何注意到高度的灵活性。这些创造性的原理，是毛泽东同志依据丰富的革命经验做出来的哲学的结论，反转来，又能够对革命起着指导的作用。

五、结　　论

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在我们面前展开了唯物辩证法——对事物矛盾运动给予正确的观察、分析和解决的科学方法——的全部丰富内容。很明白，如果我们的确学会对于这个科学方法的理解并运用它来研究一定的事物，就有可能正确地认识这些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就有能力预见有关事变发展的趋势，并依据这样的预见来正确指导我们的实践行动，正确指导我们的科学实验、生产运动或革命斗争。然而，科学的研究，必须以充分的大量的事实材料为基础，然后才有可能进行事物矛盾的全面的分析，而研究才不会落空，才不会带片面性的错误。如果以为只要记熟了《矛盾论》所阐述的那许多原理，不必首先就研究范围内的事实材料进行辛勤搜集的工作，就可以从事真正科学的研究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这是错误的。这样做的人要不成为教条主义者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要想学会真正理解《矛盾论》所阐述的那些原理，要想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正确地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就必须首先创设这样的条件：对于必要的事实材料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工作，密切地注意有关的一切实践经验——群众的和个人的，生产方面的或阶级斗争方面的。有了大量的事实材料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作基础，也就是有了充分的感性知识做基础，才可能就这上面来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

造制作工夫，才可能运用唯物辩证法来从事科学的分析研究，才能够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才能避免教条主义的空洞抽象的毛病。这是学习《矛盾论》不可不注意的一个根本点。

（注）文中的引文，凡未注明出处的，都引自《矛盾论》。

（原载《新建设》1952 年 6 月第 6 期；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关于《矛盾论》几个问题的解答

(1952.9)

问：为什么说“对立的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它与辩证法的其他法则的关系是怎样的?

答：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里，指出了唯物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征，或唯物辩证法的四个基本法则；即：一、一切事物都存在于相互联系中；二、一切事物都是发生、发展和没落的过程；三、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由量的变化进到质的变化；四、一切事物的发展、一切事物之所以由量变进到质变，都是由于事物本身的矛盾，都是由于事物本身内部存在着的对立势力的斗争。斯大林的这个分析，就足以说明在四条法则中，对立统一的法则是最根本的法则，因为这里指明了：事物本身的矛盾，事物内部存在着的对立势力的斗争，是事物的发展、事物由量变进到质变的根本原因。只要我们认识了事物本身的矛盾，认识了事物内部存在着一些什么样的对立势力，以及它们中间进行着怎样斗争，那也就可以认识这种事物是如何发展，如何由量变进到质变；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了解事物本身的矛盾，不了解它的内部的对立势力和它们中间的斗争，那也就无从了解这个事物怎样会发展，怎样由量变进到质变。所以列宁说：辩证法的发展观，是把“发展看做对立的统一”，只有这样的运动观，“才能提供理解一切存在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只有它才提供理解‘飞跃’、

‘连续性的中断’、‘向对立的转化’、旧的东西的消灭与新的东西的发生的钥匙”（列宁：《关于辩证法问题》）。所以，要想深刻了解事物发生、发展和消灭的法则以及事物由量变进到质变的法则，必须着重事物本身的矛盾的分析，必须着重掌握对立的统一的法则。例如要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法则，要了解半殖民半封建中国如何消灭和新民主主义中国如何产生和发展，必须首先了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矛盾和这些阶级势力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主题，这就是应用唯物辩证法的最好的范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切事物的矛盾是现实的、具体的，都是在各种事物的复杂联系当中存在的，不同的地点、时间和条件之下有不同的矛盾。矛盾是普遍的，但在具体事物的具体联系之中它又必然表现着一定的特殊性。所以，要善于分析事物的矛盾，又必须根据具体的现实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必须着重研究普遍的矛盾在具体条件下所表现的特殊性。这就是对立统一这一个唯物辩证的根本法则和其他法则之间的关系。

问：为什么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为什么说：“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答：列宁在《关于辩证法问题》里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详细发挥了列宁的这个原理，并且作了如下的解释说：“两个相反的东西中间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又能够互相转化，这是说的条件性，即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无此

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由于一定的条件才构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这里我们又说，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论》）

为什么对立的同一性一定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呢？因为“我们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矛盾论》），不是头脑中空想的，或神话中的矛盾。空想中的、神话中的矛盾，可以任意虚构，不必设想一定的条件，如《西游记》描写孙悟空可以任意作 72 种变化，《聊斋志异》可以随便描写狐鬼变人。但在现实的、具体的矛盾当中，对立的同一性，二者在统一体中的共存以及二者的互相转化，都必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表现为一定的特殊的同一性。例如在现实的、具体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中所表现的同一性，就是有条件的，并且因一定的条件而具备一定的具体特点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在资产阶级独占国家政权的条件之下，使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个统一体中，如果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这个条件消灭了（例如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把资产阶级的统治打垮了），那么，两阶级之间的那样一种同一性——共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同一性就不能存在了。又如在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也具有同一性，但这样的同一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就显然不同。在中国，在革命胜利以前，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共存于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中，在革命得到全国胜利以后，两个阶级是共处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虽然共存于同一个社会，却是势不两立的两个互相敌对的阶级（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遭受美帝国主义压

迫沦为附属国或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日本，又有另外的特殊情形），在中国，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虽然不断的要有许多斗争，但却是在反帝反封建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目标之下互相联合着。所以，对立的同一性，总是在一定的现实的、具体条件之下才能存在，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同一性，只有在某种现实的、具体的条件之下，才会具有某种现实的、具体的同一性，一定的条件消灭了，那么，这种同一性也就不存在了。列宁的关于对立的同一性的相对性的原理就是要告诉我们在研究事物的对立的同一性的时候，一定要着重根据它的那些现实的、具体的条件，去把握它的现实的、具体的特点，这样我们的认识才能符合客观的事实，才能够正确的把握现实的对立的同一性，才不至于成为脱离现实的空想，才不至于陷于认识的错误。所以他说："辩证法是这样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怎样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样成为同一的（怎样变成同一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它们互相转化，成为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当把这些对立看做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

至于对立的斗争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这就说明了对立的斗争之无条件的、绝对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共存于一个统一体内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自始至终互相斗争着的，不到资本主义制度完全消灭的一天，这个斗争决不会完结，这是不论在任何条件之下都要贯彻到底的规律。在中国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共同目标之下有着互相联合的同一性，这里是不是就没有斗争，或不需要斗争了呢？决不是的，这里仍然有着斗争，而

且需要斗争，为着保证两个阶级之间的有原则的联合，为着反对资产阶级的某些反动的东西，使资产阶级能够保持它的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性，为着保证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在共同纲领的原则之下建设新民主主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就要有斗争，虽然斗争也正是为了团结。这就说明，对立的斗争性，是不论在什么条件之下都存在的，是绝对的；这也就说明，甚至对立的同一性的存在，也是要通过斗争的，对立的斗争性是对立的同一性的基础，对立的同一性，是对立的斗争在一定条件之下所产生的结果。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这一个原理，也说明了对立的斗争性是具有无条件的、绝对的性质。

问："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本质？"

答：当我们注意地来研究和认识客观世界存在着的各种事物的时候，我们首先就会看到，每一件事物都具有它自己的特点，都和另外任何一件事物多少有些不同。要在现实世界里找到完全相同而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各自的特点的两件以上的事物，是不可能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要在各个事物之间找到完全相同的情形虽然是绝不可能，但在许多同类的事物中间，要发现某些共同之点，却又是可能的。假定这里有张三、李四、王五等人，他们的面貌和思想生活情况等等虽然是各有不同，但我们仍然可以找出他们的共同点：例如他们都是中国人，而且都是工人等等。各个事物自己的特点——使各个事物与其他事物有所

区别的地方，就是事物的个性和特殊性。许多事物之间的共同之点——使许多个别事物归入同一种类的那些相同的地方，就是这些事物之间的共性或普遍性。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件现实存在的事物，都必然是具有一定的个性而与其他任何一个事物相区别的特殊事物，我们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找不到一种没有任何自己的个性、特殊性，而只具有单纯的共性、普遍性的东西，我们只能找到名叫张三或李四或其他名字的有具体个性的中国人和工人，我们决不可能找到没有任何名字、没有任何个性而只有纯粹抽象的普遍性的工人。共性、普遍性，只是在许多现实的具有个性、特殊性的个别事物之中，作为同类的共同点或共同的特征而存在，而不能在这些具有个性、特殊性的个别事物之外单独存在。我们一般地说到中国人和工人，只是指张三、李四或其他名字的许多各自具有不同个性、特殊性的具体中国人和工人的共同点，而不是说在张三、李四以及许多具体的具有个性、特殊性的中国人和工人之外，另外还能找到任何单独的只有普遍性的中国人和工人。所以，一切事物都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这两个方面。特殊性是各个事物互相区别的特点，普遍性是许多事物作为同类而共有的共同点，事物的普遍性或共性，是作为共同点而存在于同类的许多各自具有特殊性或个性的个别事物中，这就可以叫做“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

说到事物的矛盾法则，也是一样，这里也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一切现实的事物的矛盾，首先都具有各种各样的特殊性。例如现实的阶级社会的矛盾，总是具有着一定的特点：或者是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或者是农民与封建地主的矛盾，或者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各有各的特点，决不能看做完全一样的东西。但另一方面，这些矛盾又都有着共同

的性质，有着相互一致的普遍性，即它们都是阶级矛盾，都是被剥削者与剥削者的矛盾。但当我们说到阶级矛盾的这个普遍性时，当我们说到一般的被剥削者与剥削者的矛盾时，我们所指的乃是在各种现实的特殊的阶级矛盾——即奴隶和奴隶主、农民和地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等——中间存在着的共同点，而不是说在这些各自具有特殊性的现实的阶级矛盾之外，另外还单独有一个抽象的普遍的阶级矛盾在客观世界里存在着。所以，阶级矛盾的普遍性，只是作为共同点而存在于各种具有自己的特殊性的现实的阶级矛盾——即奴隶与奴隶主，农民与地主，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中。毛泽东同志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其意义即在此。

既然现实存在的矛盾，都只是具有一定特殊性的具体的矛盾，既然矛盾的普遍性只是“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只是作为一种共同点而在许多具有特殊性的具体矛盾之中存在着，而不是在这些具有特殊性的具体矛盾之外单独存在，因此，当我们研究事物的矛盾时，最初只能认识到各种具有特殊性的矛盾，即只能认识到矛盾的特殊性，而不能一开始就直接认识到事物矛盾的普遍性。要认识到矛盾的普遍性，必须先把许多具有特殊性的矛盾都研究过，然后对这各种不同的矛盾的特殊性，进一步地加以比较研究，撇开它们的各不相同的特点，找出它们之间互相一致的共同点，这样才能达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的目的。所以，毛泽东同志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矛盾论》）这就是说，要认识矛盾的普遍性质，必须从矛盾的特殊性的研究开始，然后从许多具有特殊性

的矛盾中概括出它们的共同点，概括出矛盾的普遍性。我们决不能离开矛盾的特殊性的研究，直接就认识到矛盾的普遍性。自然，也许有人要说，我们读理论书籍，就可以从书本上直接认识到某些矛盾（例如阶级矛盾）的普遍原理。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其实并不对。因为我们要认识到以下两点：第一，理论书本上所阐明的某些矛盾的普遍原理，是著书的人研究的结果，而著书的人之所以能发现这些原理，也是首先经过了一番矛盾的特殊性的研究，然后才能从许多特殊的矛盾原理中概括出那些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决不是凭空地直接就能把那些矛盾的普遍性发现出来。第二，读了理论书，我们虽然可以比较容易地认识到某些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而不必自己从新做一番辛苦的研究去发现它们。但是，从书本上读到了这些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并不一定就等于充分地了解了这些原理。如我们自己对于有关的矛盾的特殊性的知识一点也不具备，那么，要想真正理解或充分理解书本上的那些矛盾的普遍性的原理，是不可能的。例如如果我们从来也不知道任何具体的特殊的阶级斗争，那么，我们就不可理解，为什么历史唯物论的理论要指出一切阶级社会的发展都要通过阶级斗争这个阶级矛盾的普遍原理，如果我们根本没有研究过人类过去的历史，根本不知道人类过去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有些什么不同的具体特点，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充分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话就说：“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底历史”。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从书本上获得的矛盾普遍性的知识，在我们的头脑中只是一些空洞的、模糊的、“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我们并没有确确实实地懂得这些普遍性原理的全部内容。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我们能够把“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底历史”这一句话背诵得非常

熟，我们仍然不能完全了解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义，不能了解所谓阶级斗争的历史究竟是什么一回事，阶级斗争究竟是怎样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矛盾论》要这样说："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

问：德波林学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的错误在哪里？

答：德波林学派的特点，按照苏联当时对它进行批判时所给予的定义，就是孟什维克的唯心论。德波林原是孟什维克党员，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几年，虽然又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但是他在政治上、思想上，保持着孟什维克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许多错误见解。德波林的唯心论是用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的言辞精巧地伪装着的唯心论，所以他的思想，在一个时期（1930年以前）曾在苏联的一些没有很好受过布尔什维克的锻炼的人们中间有很大影响。这一个唯心论学派的主要思想内容及其错误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是理论和实际脱离、哲学和政治脱离。德波林学派把哲学看做是一种研究"纯粹方法论"的学问，看做是一种可以离开具体的知识，可以脱离具体科学和具体实践的纯粹的理论。德波林的许多哲学研究的著作，从来没有认真联系过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他把辩证法理论看做单单是处理概念、范畴的一般理论，他纯粹从概念与概念的抽象关系上来空谈辩证法，而不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间来研究辩证法，因此他就使辩证法离开了唯物论的基础，而成为一些空洞的教条。

第二，与第一点联系着的，就是德波林学派拒绝了和曲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哲学上的党派性的原理。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

哲学党派性的原理，必须把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看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看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这就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人必须自觉地坚持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而与一切形而上学的、唯心论的思想倾向作毫不妥协的斗争，并且所以要进行这样的斗争，也不是仅仅抱着为哲学而进行哲学斗争的目的，而是要从世界观的基础上来巩固党的正确的政策路线和反对一切离开党的正确政策的错误倾向。因为只有把辩证法唯物论这个正确的世界观贯彻在我们的一切观察研究和实践行动中，我们才有可能在实际工作中经常掌握住正确的政策路线，而一切离开党的政策路线的错误倾向之发生，就思想根源来说，也必然是离开了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而陷入了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泥淖。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人在进行坚持唯物论和反对唯心论的斗争的时候，必然要同时与拥护党的正确政策路线和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相结合。德波林学派根本不懂得这一个哲学的党派性原理，并且在事实上拒绝了这个原理，这就使它不能不成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实际的，也就是教条主义的唯心论的学派。

第三，德波林不了解和不承认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上的贡献，特别是不了解和不承认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贡献。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的条件和新的科学成就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不但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的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把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德波林学派不但不承认列宁对辩证法唯物论哲学的这个伟大的新的贡献，甚至也不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论辩证法有什么不同，他们不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把马克思、恩格斯

所创造的唯物辩证法说成好像仅仅是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原封原样地接受过来，并把它机械地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结合起来的结果。对于辩证法唯物论哲学的这些曲解也说明了德波林学派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反列宁主义的、也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原载《学习》杂志1951年第16期）

逻辑学*

(1952.9)

一、逻辑学研究什么？

逻辑学是研究正确思维的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逻辑学主要研究的“形式”就是思维形式，还有思维规律，也可以说正确的思维所应该遵守的规则。

逻辑学的对象，与唯物辩证法有些不同。唯物论辩证法也是研究正确思维规律的科学，可是辩证法所研究的更高级一些，而前者所研究的是初级的规律。辩证法和逻辑学的区别，我们现在不讲。因为如果不把逻辑学学完之后，先来讲这个问题，可能有很多不好理解的地方。如果将辩证法和逻辑学来比较，那么不学习逻辑学是不行的，我们学完逻辑学再来比较，就可以明确一些，现在仅仅指出这一点。这两者（辩证法和逻辑学）都是研究思维的规律，但是，辩证法是高级的，逻辑学是初级的。逻辑学是帮助我们掌握辩证法——即正确的思想方法的一种科学。

形式逻辑所讲的正确的思维形式、正确的思维规律，我们了解、熟悉了，就有可能有意识的、自觉的运用于我们的思想，使

---

* 当时在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学习的学员，提出希望学习逻辑学。艾思奇按照教学计划的安排，于1952年9月8日，比较系统地讲授了形式逻辑学的基本知识。这里是按速记稿整理。

我们的思维遵守正确的规律。就是不学形式逻辑，我们的思维也有可能是正确的，但却是自发的，不知道对在什么地方，有了错误也不知道错在哪里。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往往我们感觉到错误，但是不知其所以然，这就是缺少自觉性。

我们学逻辑学的目的，就是使我们能够正确地思维，区分正确的思维和错误的思维。我们懂得唯物论原则，可以找出思想错误的原因，学逻辑学也是这样，使我们了解什么是正确的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所谓形式，就是结构。思维是有一定形式的，一定结构的。思想是由概念、判断、推理所组织起来的，形式逻辑就是研究这些思维形式的结构。

我们的思维是用什么形式来思考的？什么是正确的结构？什么是错误的结构？概念怎样使用才是正确的？判断、推理要怎样的才是正确的？这中间是有一定结构的。我们学了逻辑学就可以将错误的思维形式结构进行分析。可以知道为什么对、为什么错。

思维本身有一定的规律，判断有一定的规则，推理本身也是有一定的结构。推理有两种：一种是有了原则来说明事实；一种是由事实总结出原则来。我们说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原则，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由原则推断事实。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有的碰了钉子，我们研究了一下，都是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这就是由许多事实总结出原则，这些推理都是有一定规律、规则的，这就是逻辑学要研究的。

如果我们熟悉了这些形式逻辑的规则，我们就懂得如何运用于思想，使思想成为正确的，使它符合逻辑的规律。我们学逻辑只要能够辨别正确的思维形式和错误的思维形式就可以了，弄得很熟练需要长期的努力学习。两个礼拜的时间要熟练的掌握逻辑

学是不可能的，但是初步了解还是可以的。

为了了解逻辑学要学习什么，先要把什么是思维说明一下。逻辑学不是研究感觉，不是研究感性认识，而是研究思维的形式。什么叫思维？思维就是思想的活动，把思想的活动当做对象来研究，就是研究思维，也就是理性认识。思想、思维、思考、理性认识都是一个东西，意思稍微有点不同，思想就是思想；思维、思考就是思想的活动；理性认识，就是这思想是理性的认识。所以都是一个东西。都是我们人类主观反映客观的形式。或者可以说，是人类认识的高级阶段，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人类认识的第一步是感性认识，第二步才进入理性认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分不开的，不经过感性认识就不能有理性认识，但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形式上、内容上是有分别的。内容上的分别，就是《实践论》所讲的感性认识只是认识片面的、表面的东西，和直接感觉到的东西。你做领导工作听汇报所得到的感性认识是间接的，但如果你原来没有很多直接经验，是听不懂汇报的。所以归根结底，感性认识总是直接的。

理性认识就不同，它是全面的、深刻的，不一定是直接看到的。如帝国主义，从理论上来讲是不能直接看到的，直接看到的东西是一些具体的行为，如过去美国兵在中国城市横冲直撞，这些东西是感觉上的印象。理性认识主要的不是这些东西，是要理解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这句话我们直接看不到。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也不是直接看到的。

在形式上的区别，就是感性认识是依靠感官来认识，在形式上包括三种，就是感觉、知觉、表象这几种形式来认识客观事实。感觉、知觉、表象都是感性认识，本质上都是感觉，可是有区别。所谓感觉从心理学来讲，就是用感觉器官接触到的一个事物的个

别属性。知觉是感觉的进一步，比如我看见杯子，不但感觉到它是白色的，而且知道它的里面是热的，里面有茶，杯子里的茶水不看见不能知道，热不用手摸不能知道，这些一联起来就知道了，这就是知觉。所谓表象，就是离开直接的东西从脑子里回想出一个印象来，稍微有点能动性。如一个朋友离开你的面前，你闭住眼睛可以把他的面貌、声音想象出来。表象就是离开直接的对象，凭自己的想象来想出一个具体的形象。人的感觉到表象就算是很高的，比较能够独立的想象出一个对象来。表象也是不超出感觉的范围的一种生动的认识，虽然没有直接的认识对象摆在前面，但还是一种感觉的东西。

理性认识形式不同，不是靠感觉、知觉、表象来认识世界，是用概念、判断、推理这些形式来认识世界。概念、判断、推理和感觉、知觉，表象不同，不是那样直接的东西，没有那样生动，可是比较深刻。比如帝国主义这个概念，要想以感觉来描写是不可能的，如果说美国兵在街上横冲直撞，就是帝国主义，这就错了，不是这样简单。所以要了解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就不能是依靠这些表面现象，一定要依靠理性认识，抓住事物的本质。

逻辑学就是研究概念、判断、推理这些思维形式。什么是概念、判断、推理？概念怎样来的？人怎样用概念认识事物？怎样下判断？怎样推理？这些问题就是逻辑学专门研究的对象。形式逻辑要研究思维的形式，就是要研究概念、判断、推理这些形式。研究思维的规律、规则，就是研究如何使用概念，如何下判断，如何推理。

概念、判断、推理也是客观事物本质的一种反映形式。所以，逻辑学实际上也不是简单的研究形式，不过它的直接对象是这些形式。我们说，逻辑学要研究正确思维和它的规律。正确思维的

最根本的标志，正确思维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一定要有确定性，不能有矛盾，要首尾一贯，一定要有根据。反动派的思维经常是混乱的，因为他所希望的和客观不一致，和人民要求不一致，反动派发表言论常常不是确定的。帝国主义想战争，可是又怕人民知道它要战争，又要讲和平，帝国主义发表的言论可以看出是非常不确定的。我们革命者如果思想没有锻炼，也容易有这问题，就是思想不确定，最常有的一种情形，就是敌我不分。一个做革命工作的人如果这点不确定，就会常犯错误，没有很好思维锻炼的人往往也有这种情形。有一篇文章讲朝鲜战争问题，说“朝鲜战争现在变成消耗战了，长期的消耗战和目前形势不相称”。他前面说“朝鲜战争已经变成长期消耗战”，意思是说今天的形势是长期消耗战了，可是又说和目前形势不相称，这句话很不确定。逻辑学就是要你肯定什么就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就否定什么，要是非分明，肯定与否定分明。

思想的确定性，是正确思维的第一条原则，是起码的特征。要确定就不能有矛盾，你既然说命令主义要反对，但又说靠命令主义完成了任务，就自相矛盾了。两个相反的东西都要肯定，你的思想就自己打架了。说朝鲜战争形势上是长期消耗战，又说和形势不一致，这就有矛盾。这篇文章里还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如说美国要战争，又说它要和平。

要首尾一贯，不能前半句话是这样，后半句话是那样，首尾一贯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世界政治上的言论，有时一次的言论看不出来，如果把两次发表的言论拿出来一看就清楚了。我们反对帝国主义，要找它前后不一贯的材料。这种材料多得很，如美国发表白皮书，说中国人口多，不能解决粮食问题，人口多不好；朝鲜战争爆发后，又说中国人口多有无限的人力，人口多又好了。

确定，没有矛盾，首尾一贯不一定就是对的，因为也许他确定的东西就是错的，是没有根据的。“有根据的”，这是正确思想的根本条件之一。没有这个条件就是为唯心论辩论了。因为唯心论也可以确定，如果说确定的就是正确的，这就不对了。必须加上有根据的，这才完全。毛主席在反对党内不正确的思想中说：“主观主义就是无根据的乱说”，有根据才能不是主观主义。这一条很重要，最初的逻辑学还没有这一条，亚里士多德说逻辑学应该是确定的、无矛盾的，首尾一贯的，后来被教会利用来解释圣经。近代科学发展了以后，德国哲学家提出“充足理由原理”的思想，认为“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有其存在的充足理由”，也可以讲是“有根据”。

“确定的、无矛盾的、首尾一贯的、有根据的”，这四个原则是分不开的，违背了这原则就都是错误的思想。有些思想是错误的，他的主张是确定的，无矛盾的，首尾一贯的，那你就追究根据，那就是根据错了。

逻辑学就是要研究如何才能使得我们的思想保持确定性，使我们没有矛盾、首尾一贯，并且有根据。要符合这原则一定要解决许多具体问题，要了解思想的形式，要了解各种形式的正确关系，各种形式变化的规律、规则，要了解这些东西才能使我们的思想和正确思维规律一致。所以，我们研究逻辑学的目的就是研究正确思维形式和规律，就是要研究如何运用概念、判断、推理，如何正确处理概念、判断、推理各种关系，使我们思想能有确定性、无矛盾，首尾一贯和有根据。

二、思维是认识的高级阶段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说明思维如何产生，概念如何来的，为

什么要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为什么能产生概念？

思维是理性认识，形式上与感性认识有分别，内容上、实质上也有分别，是一种高级的认识。

感性认识只能反映感官直接接触到的东西，知觉、表象虽然可以得到相对完整的感觉，但是，总的说来，其性质还是感性的阶段。所以，感性认识只能帮助我们认识比较表面、比较局部的东西，不可能使我们对事物认识很深刻、很全面。

理性认识就不同，理性认识所以是高级阶段，就因为这种认识不仅是表面的、局部的东西，而且还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质。所谓本质，就是事物的规律、内部的关系。表面上不能很容易看到，不能直接由感官看到的。在中国的反动阶级统治下美国军队可以在马路上横冲直撞。若只是这样表面的、感觉的认识，就不可能再深刻地提出问题。我们要提出，为什么他们敢于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的马路上横冲直撞？这就涉及比较深刻的问题，同样是人，同样是国家，为什么他们可以在这里横冲直撞，而我们不能在他们那里横冲直撞？这里就有一个关系问题，内部关系的问题。这种关系不是把眼睛睁开就可以看到的，我们要想，要理解，用许多事实来认识，要研究到蒋介石政府和人民的关系，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美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等各方面的关系，都要想到。然后，才能充分地认识到为什么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可以由他们随便横冲直撞，如果不了解这关系，只懂得表面的情形，只觉得美帝国主义无礼、没有纪律，这样看是表面的。过去任何时代都有无纪律的军队，究竟它们为什么这样作就不懂，“横冲直撞就是无纪律、无纪律是横冲直撞”。这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证明问题。所以要认识内部的规律，才能真正说明一件事情。在帝国主义还没有垮台的时候，还不曾有此表现，你怎么

知道呢？如果你从感觉来看，就不可能知道，但是如果凭理性认识，凭理解去想象其规律，从整个美帝国主义各方面的关系来了解，就会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要垮台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件事在美帝还没垮台前，他们还在横冲直撞、耀武扬威的时候，感性认识是看不到的，所以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有这分别，依靠感觉器官直接接触即可认识到的是感性认识，表象虽可脱离直觉对象，但是它的性质还是直接来的，一切事情的内部关系就不是直接来的，认识就不是直接的，不是由感觉器官的接触所认识的。

理性认识一定要把许多感性认识的材料经过精心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把许多感性材料加以整理、比较，把其中的关系掌握起来，这样才能认识到更深刻的东西。这认识是间接的，是经过一个感性认识的发展阶段得到的。这里要用很多的材料（这些材料不能是零碎的，而是要找出其基本关系的），没有材料是不行的，所以没有感性认识，就没有理性认识。

材料很多的人，经验很多的人，世界上是不少的。我们有很多的人，可以把革命故事讲几天几夜也讲不完。可是如果要叫他根据他经历的事情，提出几条最根本的经验教训来，他却不一定做得到。有经验主义毛病的人更是如此，他们可以讲很多具体材料，很形象，很动人，这是好处。但是经验主义者，就停止在讲故事的阶段，停止在直接材料上，不能通过材料掌握里面最根本的几条规律及教训，不能简单扼要地说出一个道理来。这是因为经验主义者的思想，没有提高到理性认识，或理性认识很少。理性认识不是依靠直接材料得到的，要通过材料，把最根本的东西抽出来，才能得到理性认识。所以思维是比较间接的认识，不是直接的，是要在感觉的基础上进一步找出其基本关系来。因此，间

接认识有一个过渡，要经过感性认识而后找到其中内部的关系。

这种感性认识要提高到理性认识，首先就是要从许多感性材料中造成概念，然后由判断的活动把材料综合研究整理，即加工改造，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得到理性认识。

改造的方法，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讲到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些方法在逻辑学上就是比较法、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逻辑的方法，也是理性认识的一般方法。例如：我们有一个帝国主义的概念，这概念就与我们对帝国主义者的行为等感性认识不同。帝国主义的行为，感性认识就是那些暴行，以战争侵略我们，在政治上统治，在经济上使我们吃亏等等。要讲帝国主义的各种表现是讲不完的，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对我们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剥削和压迫，以及帝国主义之间打仗等等方面都有很多感性材料。可是如果我们要找出帝国主义的一个概念，就不能简单地积累这一堆材料，而是要按照列宁的讲法，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金融、寡头、资本输出、国际垄断完成和瓜分殖民地完毕等五条。列宁讲的话，是帝国主义概念中最基本的东西。这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把许多感性材料加以分析得出的，把各种材料分成许多方面，把不重要的材料去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作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综合，看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有什么表现，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怎样表现，在国内有什么情况，帝国主义之间有什么材料，分成几方面，然后研究其各方面最根本的东西，最普遍的东西。例如，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好像在帮助我们，借给我们钱，开医院，办学校；但另一方面，它在中国推销商品，垄断海关，使我们吃亏，我们的货物到他们那里要加税，它们的货物到这里却

不加税。将这些材料研究一下，就可看出，我们吃亏，它们是在经济上要剥削我们，在政治上也可以和另一部分反动统治者客气，也可以同意一个反动者作领袖，但是总的对中国人民就是要压迫，这即是一个由此及彼的关系问题。我们总是吃亏，它们总要占便宜。帝国主义之间，有时讲和，有时开会，有时订条约，但仔细研究一下，还是有根本矛盾的。其最根本的矛盾即是经济上的矛盾不能解决。帝国主义对我们好像有时也给一些小便宜，但根本上说，我们吃亏。帝国主义有时与我们联合，但根本上有矛盾。所以要丢掉一些东西，抓住最根本的关系，把这些关系概括起来，作为我们认识的内容，这就是概念。

概念，在字面上讲是概括的观念，外国语里是掌握起来，抓住的意思。概括不是堆积许多材料，而是把最根本的东西抓住。对一件事，不能只讲一方面的材料及各种形象，而是要讲内部的各种关系，这叫做概括。对帝国主义也是这样看，帝国主义不靠战争就不能解决问题，总要依靠战争才能解决其内部矛盾。抓住这深刻的关系，深入理解，认识就由感性进到理性。因此，概念虽然比感性认识的生动性差一些，因为取消了一些直接的感性材料，但是比较深刻，找出了根本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全面的，它包括了应反映对象的各个方面的内容。

我们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没落的阶段，这是对一切帝国主义而言的，所以叫做概括的认识。除“概括”之外，形成概念的方法，还有比较法、抽象法、分析与综合等。

比较，就是集中各种东西，找出其共同点和差别点。这种方法是改造感性认识的最初的方法，例如，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许多材料收集起来，比较一下，以美帝国主义与苏联比较一下，两者大不相同，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作计划总是要考虑怎样对

美国有利，在他们计划的工程中，所用材料总是想办法要使我们买美国的，而苏联的情形就不一样，一比较就可以找出两个国家的不同。因此，可以初步的概括这许多感性认识，使感性认识接近概念，初步认识到一些根本的东西，美帝国主义与苏联有根本不同的地方。但是比较法是比较简单，单用比较法是不能认识得更深刻。所以，还要有其他的方法，即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的方法。

分析与综合，就是把一件事的各部分分开来研究，经过各部分研究后，再总的研究，分开研究各部分叫做分析，各部分研究好合起来叫综合。这种分析与综合里面，也是有比较的。因为，高级的方法总是包含了低级的方法。分析与综合是我们经常要用的，经常可以看到的，要举例子也有很多。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中，就是有分析又有综合。前半部大部分是分析，根据当时革命运动中各阶级的表现将每一个阶级加以分析。确定了地主与买办阶级是与帝国主义勾结的，是我们的敌人；中产阶级分析了它的两面性，这些分析是根据事实材料概括起来的。讲两面性时，特别用戴季陶的话来说明，即“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中产阶级在当时革命运动中有很多表现，这许多表现比较一下，有共同点，就是两面性，见共产党害怕，见帝国主义也要反对，戴季陶的一句话就代表了。对小资产阶级也有分析，其内部有三种。最后还有半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根据事实材料，概括起来，确定每一个阶级有什么根本特点，最后再把前面分析的结果综合起来，下了一个结论：目前革命运动中买办、地主是我们的敌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中产阶级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这综合就将

分析的方面，各部分的相互关系全面地掌握与了解了。在毛主席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又如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根据当时情况，分析各阶级：敌人虽然力量大，但内部有矛盾；我们自己方面，虽然资产阶级消极，不参加革命，但是资产阶级还是不得势，工商业还是不大发展；又分析了农民与工人阶级的势力，虽然力量弱小，但是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得到了锻炼，锻炼得很坚强。在将当时政治斗争中各阶级的具体情况分门别类研究之后，得到一个结论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是会发展的。因此，可以形成当时革命形势的概念。表面上当时革命势力小，但是经过各部分的分析、综合起来，抓住其基本关系，就可以理解革命势力是可以发展的，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毛主席在1935年《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文章中，也是运用这个方法很好的典型。里面开始分析各阶级，首先是分析了敌人的矛盾变化；资产阶级更加动摇，可能趋向革命；小资产阶级的言论与运动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红军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分析了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是由不平衡发展到平衡，革命要由局部到全部，可以组织抗日统一战线。这就是由感性材料，经过分析与综合，造成概念的主要方法。我们平时常讲，看问题要分析，其实是着重要分析，但又要综合。有了材料，首先要分门别类，然后把一种材料内有什么根本特点弄清楚，联系起来，找出其中的关系。帝国主义打进来后，敌人的矛盾更扩大，资产阶级更倾向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更明显，加上工人，农民的特点，这些综合起来研究，就得出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清楚了，当时统一战线虽没有形成，但是其力量已经可以理解到了。

抽象与概括的方法是与分析和综合分不开的。什么叫抽象？抽

象就是把不重要的东西，不是本质的东西撇开，抽出其最根本的本质的东西并掌握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用的抽象法。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很复杂的阶级社会，并没有什么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带有若干旧社会（封建社会）的残余，就是老牌的比较成熟的英国，也是有的。在分析、抽象的时候，就要把不纯粹的东西丢开，而掌握其最根本的东西。在争论问题时，有些同志喜欢提一些琐碎的、枝枝节节、鸡毛蒜皮的东西，这样不利于讨论问题，我们要反对。我们主张抓住最根本的问题来讨论。在研究一个党员的品质是好、还是坏，也要抓住最根本的东西来考察。绝不应该看他每天起床是否很早，喜欢吃什么菜，或者他穿得讲究一些，或不整齐一些，就认为不好，来作考察的根据。一个党员最根本的问题是：对党的事业是否忠诚，对党的政策的认识与执行情况，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等，应该把这些东西来作为考察该党员品质的根据。这种方法就是由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时必须要做的。经济主义者不能提高到理性认识，因为他喜欢停留在琐碎的表面的事情上。事务主义者在工作中，也是抓不住最根本的东西，纠缠在繁琐的事务中。在分析过程中，同时也是进行抽象的过程。在分析一个反动阶级时，也要抓住最本质的东西，如它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如何？跟帝国主义关系如何？如果你丢弃了最根本的东西，而去抓他们的无关紧要的日常生活事情，那你就对这个反动阶级不可能有本质上的了解。阶级立场不明确的人，在分析阶级情况时，就会纠缠在繁琐的，无意义的小事情上，光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就会模糊自己的阶级立场。要善于使用抽象方法，才能使感性材料形成概念。

概括是什么意思呢？在一些感性材料中，找出了最根本的东

西后，就要看这些根本东西适用哪些范围。在分析与抽象的时候，不可能把某类认识对象的全部都实行分析与抽象，而是要找一些典型，找出有代表性的，又是本质的东西来作典型。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在分析中产阶级时就抓住了“戴季陶”这件事情，也就把中产阶级的本质东西抓着了。可是抓住了这一件事情，是不是够呢？当然不够。那就一定要考虑到，这些中产阶级是不是都和戴季陶一样？戴季陶的思想适用于哪些范围呢？毛主席说：像戴季陶这样的思想是整个中产阶级都有的。这个方法就是概括，这就是从典型的、本质的东西概括到一般。因为戴季陶的思想，不仅戴季陶自己有，而且整个中产阶级都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概念：“中产阶级的两面性”。这个概念的实际内容是：中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反对共产党。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就可以简单明了地把大量现象的特点抓住了。如果单凭感性认识来把握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分子说这个话，那个资产阶级分子说那个话，那就把握不住本质。在解放后，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拥护共产党，来建设新中国，但另一方面又搞“五毒”。感性认识不容易而且不可能掌握其精神实质。如果你用概念、判断来认识，就是一句话“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简单明了地把握着其本质。中国过去有一句话叫“提纲挈领”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理性认识的好处。在思想方法中，感性提高到理性的过程，关键是将感觉材料进行加工改造。

三、关于概念与定义

概念是在实践中，把许多感性认识，经过比较分析、抽象和概括等方法，加工改造，抓住其一般本质、特点。一般就是指概括整个对象的本质。概念能够把握其一般的本质。资产阶级有两

面性，是资产阶级一般的特点与本质。具体地看各个资本家可能在两面性的程度上有差别，有的资本家反动一面已经没有了，有的还是很反动的，光搞“五毒”。但两面性是资产阶级最本质的最一般的表现。他们有些人可能在表面上是很进步的，但在本质上则有反动性的一面，总的说来，资产阶级是两面性的。概念一定是概括的，综合起来的。概念是有普遍性与根本性二种属性，所以概念是对事物最根本的本质的认识。思维是通过概念认识事物的。

概念与表象不同。表象就是在脑子中想象某种具体的形象的过程。领导者听汇报后，想一想汇报中的具体情况，这就是表象。表象可以依靠感觉，但概念是抓住本质的，是依靠理性来认识。帝国主义是要垮台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等概念，你要想象是很难的。纸老虎不过是以一个表象来形容其脆弱。事实上，帝国主义还有“铁老虎，会吃人一面”，但它的本质是“纸老虎”。所以，具体情况比较复杂。概念所反映的，用感觉来描写是不行的，只能是理解。

要掌握概念，就要有名词，有语言来代表。“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就是一个语句，如果没有这句话，就很难抓住或理解它。所以，人的思维是不能离开语言的。斯大林说：“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没有语言，就不可能进行思考。没有语言，对简单明了的本质也很难抓住。概念的表达形式就是语词或词组，其内容是反映对象本质的。我们讲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就是讲帝国主义这个名词所包含的内容，也就是列宁讲的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

所谓概念的内涵，就是其所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的内涵，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而对革命抱两面态度的资产阶级。“品质好的党员”这

一概念的内涵，就是指一个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个人利益服从人民利益，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等等。每一个概念都有它的内涵。

外延就是把它的适用范围，即具有所反映本质属性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的外延，就是指一切受帝国主义压迫，跟帝国主义有矛盾，又有两面性的资产阶级。这种民族资产阶级不仅中国有，就是在印度、日本也有。

外延与内涵的关系。内涵缩小（少），它的外延就扩大；外延缩小，内涵也就大（多）了。外延与内涵的关系是成反比（反变）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外延比资产阶级的外延要小，他只限于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他除了有资产阶级一般特点外，还有其特殊的特点。“资产阶级”包括所有的资产阶级，他的特点就没有“民族资产阶级”那样多，“民族资产阶级”除上述的特点外，它还有反对帝国主义的特点，但外延却比前者小了。从这里也就可以了解“概念的限定”与“概念的概括”。概念的限定就是把概念的外延缩小。如“民族资产阶级”，那就是把资产阶级的外延限定到民族资产阶级，这是外延缩小，但是内涵增加了。相反，一个概念的外延扩大了，那它的内涵就缩小了。正确地使用概念，要遵守思维的根本原则、规律，也就是确定性与无矛盾性。讲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时，要肯定的内容，是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同时有两面性的。但是，一般说是知道其两面性的，在具体议论时又忘记了，这就把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忘记未使其确定了。因此就犯了逻辑上的错误。资产阶级的进步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发展生产，反对反动派等，过去我们在说明资产阶级进步性的内涵时，就发生过混乱，也就是把进步性与领导性相混起来了。进步性并不等于领导性。有些文章讲进步性，就是指领导性，如说

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在辛亥革命时就定了，这显然是指领导性，但指“进步性”就错了。这就是在使用“进步性”的这一概念时，与“领导性”这一概念的内涵相混淆了，就是内涵不确定而犯了逻辑错误。

给概念下定义，就是指出这个概念（语词）包括哪些内容，以确定概念所反映对象的本质。所谓给概念下定义，就是确定其内涵。如果不这样，那么在进行判断与推理时要发生逻辑错误。

四、判 断

判断是什么东西？判断是对某一对象，某一种属性加以肯定或者否定，这种思维形式叫判断。如说这是桌子，就是对对象肯定；如果说这人是一个共产党员，那就是对属性有所肯定。

判断使我们能够认识到一定的事物内部联系及外部联系。譬如说，资本主义社会中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就是对一件事物的内部关系加以肯定。凡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这就是否定一种内部联系、外部联系。我们国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产生的，这是一个外部联系。所以，判断总是断定。

我们可以对每一个概念下种种判断。概念的对象是客观事物，对每一种事物我们都可以下种种的判断，原因就是因为每一种事物都是有它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资本主义社会，是从封建社会中产生，这是从历史上知道它的内部联系；而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上，也可知道它的内部联系。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判断？其目的就是如何来做出正确的判断。做出正确的判断有一些什么规律？正确的判断有什么标准？总的

标准就是判断与我们认识的事物情况是一致的。如果我们判断合乎这原则，那就是正确的判断；不合乎这原则，那就是错误的判断。判断可以分成好几种，逻辑学上首先分为肯定判断与否定判断；还分为直言判断、假言判断和选言判断。我们研究各种判断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判断，从而做到判断正确。

全称的判断，是对我们所认识的对象全部下了断定。举一个例子，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应该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特称的判断，就是不包括对象的全部，只是注意对象的某一部分，如有些共产党员犯主观主义错误。这两种判断，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要正确使用，现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解放以来，我们领导同志是经常注意情况的变化并加以归纳。几年来常说“物价基本上稳定”，意思是说并不是全部稳定。今年说“物价稳定”，没有“基本”两字。不研究逻辑学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区别。陈云同志断定说：物价稳定，不是物价基本稳定。学逻辑学后，就可以知道这两个判断不同。把情况、关系研究认识以后，只要比较两个判断，就会感觉到两者不相同。研究逻辑学要找不同的种类，分别表现不同的事物，这是正确的判断。使用判断种类不同，可以发现事物联系情况不同。所以，如果今天有人写文章，说物价基本稳定，我们就要想今年是否可以这样写，与事物情况是否相符合，我们应该用全称的判断，而不应该用特称的判断。

直言判断和假言判断。直言判断就是直接断定一件事情，如中国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假言判断是指断定要有条件，要有一个假定条件。假如日本是殖民地，他们的资产阶级也就有两面性。这两种判断要在不同事物情况下来使用，不能混用。我们讲中国新民主主义发展的时候，往往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将来新民主主义

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要不要冲突流血？对这问题我们怎样回答？能不能用直言判断来回答？如果回答说“用不着流血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那他就很满意。我们能不能这样说呢？不能，因为事情没有到来，会不会流血是要有条件的，不分条件直说不流血不冲突，这断定是错误的。将来是不能用直言判断表达的，一般对假定的事情不能用直言判断。如果事物的情形很清楚、明显，我们就可以用直言判断。如资本主义是腐朽的。直言判断是直接的断定，因此，要假定一件具体事情，就不好用直言判断。如何使用判断就要根据情况分别对待。我们学习判断，就要学会这点，要检查一下我们使用的判断使用错了没有。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碰到一些没很好了解共产党的人，有这样思想，他看到一两个共产党员有缺点，就对共产党不相信。在东北，对苏联军队及个别不能很好守纪律的人，行动上有某些不好的地方，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人就说苏联也是帝国主义。相反的，这些人认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办学校，办医院是好的。这些人的思想，是下判断下错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办学校、办慈善的事也是个别的，大多数人的目的就是更加剥削压迫中国人，进行残酷剥削的是多数。这就是说，应该下特称的判断，他下了一个全称判断。经验主义也有这样情况，他们用一点经验当做真理，下全称的判断。命令主义者用命令完成任务，把用命令来完成任务者说成全称判断，不知道靠命令有时可以完成任务，是在特殊情况下；以为命令可以完成一切任务，这种判断是错误的。下判断要有分寸，才能是正确的判断。

判断的结构分为三部分。判断也称为命题，一个命题有三个部分：

①下判断的对象；

②用来下判断的某些事物的特征、属性；

③要把判断的对象与事物的属性、特征联结起来。

下判断的对象在命题中叫主词；表达特征、属性概念的叫宾词；判断的对象与下判断的属性、特征联系起来叫系词，这就是结构中的三部分。以上讲的是直言判断的结构，而假言判断就不同了，它的结构由前件和后件，还有联结词组成。如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可以和平转变的，但是有一条件，即假如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教育做的好，资产阶级没有反抗的企图；如果有这种情况，那么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就可以和平转变。在这例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教育做的好”、“资产阶级没有反抗的企图”就是前件；“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就可以和平转变”就是后件；“假如……，那么……”是联结词。前件是表示条件的，后件是表示在某种条件下的结果。

文法与逻辑有分别。文法是研究语言形式的规律、规则的。逻辑也同研究语言有关，但是，主要的是研究思维的结构、思维的规律。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形式，但是与思维还有区别，不完全一样。如果用文法来研究这词句，就要把一句话分得很小。譬如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按照逻辑的研究就是一个判断，分三部分“帝国主义”是主词；“是”是系词；“资本主义最后阶段”是宾词。可是用文法来研究，“帝国主义”是名词的所有格。如果讲文法，就要把词句、语汇等都弄清楚。研究逻辑学就不管这些，一句话表达的直言判断就分三部分，不管它怎样复杂。逻辑虽然与语言关系密切，但是逻辑不研究语言的具体表达形式规则，如语词、语句构成规则，逻辑所研究的是用语句（词组）所表达的概念，用语句所表达的判断，用复句或句群（有逻辑联系的）所构成的推理等思维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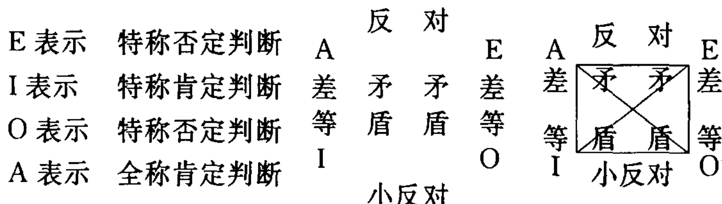
判断的周延性问题。周延性是什么？所谓周延，意思就是不管主词、宾词，它所反映的对象是否都包括在内。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这判断中，“帝国主义”是主词。是否可以全部概括在判断中？是否“帝国主义”全部都可以叫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很清楚，全部帝国主义都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在逻辑学上把它画了一个图，如小圆圈是指“帝国主义”，大圆圈是指“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这里所指的对象是全部的。在这判断中，宾词是否是周延？“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全都是“帝国主义”的属性，所以宾词也是周延的。如，共产党员是应该为人民服务的。这一判断的主词周延不周延呢？共产党员应该说是周延的。因为为人民服务是一切共产党员都应该有的。宾词是否周延？为人民服务这一事情，是否只共产党员具有？不只是说共产党员要为人民服务，非共产党员的人也要为人民服务。所以，宾词在判断中是不是周延，就要看概念的外延能否全部包括了。“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外延在判断中只是一部分，所以，是不周延的。

一般来讲，全称判断主词都是周延的，为什么呢？因为全称判断的性质就是要使主词周延。如所有的人都是应该为人民服务。全称判断主词都是周延的，宾词可以周延，也可以不周延。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宾词是周延的。特称判断主词是不周延的，因为它里面所讲的没有包括全部对象，只是一部分，所以不能是周延的。否定判断宾词都是周延的，因为它讲的是全部外延，如“所有的地主都不是靠勤劳发家的”，宾词“靠勤劳发家的”全部外延都排斥在“地主”之外。

判断的相互关系。各种判断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指全称肯定判断、全称否定判断、特称肯定判断、特称否定判断之间的关系。关系，逻辑学上用得比较多，所以我们把它提出来说明一下。

所谓全称肯定判断就是全部对象都具有某种性质，如所有共产党员都是应该为人民服务的；全称否定判断就是所有的对象都不具有某种特殊性质，如一切共产党员都不应该违背党章；特称肯定判断就是对一部分对象肯定它有某种性质，如有些共产党员犯有错误；特称否定判断就是否定一部分对象有某种性质，如有些共产党员不学习马列主义。

这四种判断有什么关系？这里有一个图（维诺格拉多夫、库兹明编著的《逻辑学》第 86 页上的“逻辑方阵”图）：



这些判断画成一个方阵图，用几条线联系起来，每一条线表示两种判断的关系。AI 是全称肯定判断与特称肯定判断的关系，这两个判断是差等关系，即是判断主词的数量有差别，A 是全部对象，I 是一部分对象。一切共产党员都应该为人民服务，与有的共产党员应该为人民服务，这就是两者的差等关系。这种关系要是 A 判断真，I 判断也真。了解这关系，就有一种好处：如果我们对一类对象全面加以肯定，以后我们对一部分肯定就不用怀疑了，就可以放心的使用特称判断。

反过来看，如果要对一个特称判断加以肯定，如在座的（“有些”之意）同志应该为人民服务。最好的方法就是首先想一下，是否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为人民服务？如果是的，那么就可以肯定在座的都应该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议论中常有一种混乱，如肯定了一种东西全部是这样，但对其中一部分又不敢肯定，如

有人说：帝国主义欢迎战争，但又说：帝国主义要和平，这是对差等关系没有掌握好。既然全部帝国主义都欢迎战争，那么任何一部分帝国主义也都可以说是欢迎战争，而不能怀疑那一部分帝国主义不欢迎战争，要和平。美帝国主义被迫停战谈判，是否它欢迎和平？不是的，它害怕和平，也害怕打仗，但比较起来，还是打仗更赔钱。帝国主义本质上要战争，并不是要和平。人民是要和平的，中朝人民要和平，但是中国人民为什么要派志愿军去打仗？是否中国人民好战？中国人民志愿军也是被迫的，不是它本来就不要和平。所以差等关系是这样的，肯定其全部后，就可以放心肯定其一部分。全称肯定判断如果真，特称肯定判断也就真。命令主义是不好的，即使命令主义完成了任务也不见得对，因为完成任务的后果是不好的，所以一切命令主义都是不好的。

反对的关系是说两个判断完全相反，如A与E（全称肯定与全称否定）是完全相反的。如“一切共产党员都应该为人民服务”，“一切共产党员都不应该为人民服务”，这两个判断就不能并用。如果说，一切共产党员都应该为人民服务是对的、真的，那就不应该说，一切共产党员都不应该为人民服务。这种反对的判断在人的言论中存在比较少。但是，也可以当做一种关系来了解。小反对就容易了解了，如有些共产党员有命令主义的错误，有些共产党员没有命令主义的错误。小反对与大反对不同，有时是可以并存的、同真的。大反对是两个关系不能并存，我们说了一切人都应该这样，就不能又说：一切人都不应该这样。但是“有些人为人民服务”，“有些人不为人民服务”，这是可以说得通的、并存的。如果有人同时用这两个判断，你说他错了，那是不一定他错了。

矛盾的关系就是内部打架、内部冲突。如全称肯定与特称否

定（A、O）的关系。一切共产党员都应该为人民服务（全称肯定），有些共产党员不应该为人民服务（特称否定），这就是矛盾，为什么？因为部分与全体冲突，即是矛盾、打架。矛盾是自己内部对立，所以研究判断的关系，就是如果对一个对象全部肯定，就不要否定它的一部分。肯定帝国主义喜欢战争，又说有的帝国主义喜欢和平，这就是自相矛盾，就是部分与全体的对立，两种判断是不能同时并存的。如果犯了这种毛病，那就是自相矛盾。

五、逻辑的基本规律

思维一定要有规律，这些规律是根据正确思维的要求而形成。正确的思维应该是确定的，首尾一贯的，有根据的，把标准变成公式。有以下几种基本的公式：同一律（A 是 A）；矛盾律（A 不是非 A）；排中律（或者 A，或者非 A，二者必居其一）；充足理由律。

同一律是普遍的，各方面都贯彻的，不是特殊的。在概念中要应用这规律；在推理中，也要应用这个规律。

上面所讲应用判断的错误，归根结底就是违反这些规律。应用概念的最大错误是概念不确定。思维还有各种规律，判断间的关系也是它的规律。有些判断可以同时应用，有些就不能同时应用，这些也有规律。推理规则就是具体的规律。但多种规律只有一种根本的，即凡是错误的思想追究其原因都是违反“规律”的。

同一律的意义，即是思维必须要有确定性。你的思维对象必须是确定的，它的特点、内涵必须确定，不确定就是错误。你要反驳一种错误的思想，用同一律，就可以要对方确定一点，由这一点，即可以暴露它的错误。我们在国际问题上，常看到这种例子。例如美帝国主义打细菌战的问题。帝国主义总是否认细菌战，

有些人也说他们不赞成细菌战，但是他们又不敢提出反对细菌战。这就是在美帝国主义面前要它确定下来，不要模棱两可。这问题提出来，美帝国主义就没有办法了，它不敢公开地表示反对细菌战，只是消极地否认细菌战。因此，这就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荒谬和错误。这种例子不止一个，而是很多的。原子弹的问题也是这样，苏联提出要通过无条件禁止原子弹，美国就不敢确定这一点。美国只提出要管制、调查等，这都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就是它的思想毛病。

正确的思想一定是确定的，是非分明的。现在我们是新民主主义，我们的目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能不能含糊？不能！如果有含糊，那就是错误。要为人民服务，这也是确定的。

为什么一定要确定才是合理的？因为客观世界是确定的，客观世界在一定条件下，总是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在目前中国条件下，总是新民主主义。事实本身是不含糊的，所以合理的思想也不应该是含糊的，应该是确定的。我们有许多人发表言论，常常找不到一个确定的东西，这就是错误的。斯大林在列宁逝世时的讲演，称赞列宁说：我们要学习他那样确定的人格，一切事情都是很明确的，是非分明的。正确的思维是需要这样的，科学是需要这样的，马列主义是需要这样的。

同一律的公式，我们参考的书上没有。在一般的逻辑学上有公式：甲是甲，A是A，这公式的意思就是肯定什么，就是什么。这种公式用不着多研究，只要懂得意思就行了。从逻辑术语来讲，这个公式的意思就是在一个论断、争论、讨论中，每个概念都应该在同样的意思上使用，每一个概念都要反映一个对象。所以概念要确定。概念是一个名词，你使用时一定要给他一定的内容。帝国主义这名词，从表面上看，是想作皇帝的意思，但是从概念上

看，就不能是这样，实际上，它的内容的意思是讲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

又有一种论断，野兽都不会说话，希特勒是野兽，希特勒就不会说话。这样讲是否对？不对的。这个问题上的推理形式没有错，它与下面这个推理：共产党员都应该为人民服务，某人是一个共产党员，所以某人应该为人民服务。这两个推理形式上是一样的。但是，说希特勒是野兽，不会说话，就不对了，为什么呢？仔细研究，就是在使用概念上不一致，说希特勒是野兽，是行动像野兽，而肉体不是野兽，是一个人，概念不一致，结论就不同，就很容易发生错误。但是，有一些复杂的推论，犯了这种错误，就不能一下子看出来。如果要发现这种错误，就可以检查一下，使用概念是否有错误的地方。古代有一种“白马非马”诡辩，这是把马的概念没有搞清楚，白马与马的概念不一致，前面的“白马”是具体的，后面的“马”是抽象的。如果概念相同，就没有问题了。

矛盾律是正确的思维应该确定对象，不能同时肯定两个不同的对象。就是说对一个对象这样认识，就不能同时有相反或相矛盾的认识。矛盾律认为，如果你对一个对象同时有两个了解，两种肯定，那就错了。这种情况很容易碰到，如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俘虏的看法，一方面它们说俘虏不愿意到共产党那边去，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俘虏调皮捣蛋（意即他们要回国）。同时这两种言论在眼前出现，我们的南日将军就很有理由地反对它，抓住它的这点短处，使它不能逃走。有人说，这是美帝国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思想，那末为什么它们对俘虏人道，可是对国内人民却不人道，为了几个俘虏，宁可牺牲自己的人，自己的青年去换俘虏，这就是人道吗？这就揭露了它的矛盾。日本独立了，但是日本对外贸易

却又不能自由，而一定要听美国的话。所以，这就是矛盾。

我们说矛盾律应该遵守，即是说，思想本身不要相互矛盾。你主张肯定一件事，就不能同时又去肯定与它相矛盾的事。否则，就自相矛盾。客观事实是可以有矛盾的，而且到处矛盾，但思想本身却不能互相矛盾。逻辑学主要是着重研究思想的规律，思维本身要遵守矛盾律，不应该有矛盾；但事实本身是有矛盾的，这一点是确定的。我们的思想在认识事物的时候可以肯定一切事物都有矛盾，我们肯定事物都有矛盾这思想本身是没有矛盾的。这是不能混起来的，不能把人的思想的逻辑矛盾与客观事物的矛盾，看做一件事。肯定了客观事物有矛盾，并非是肯定思想上可以有逻辑矛盾。所以对客观事物一定要分析其各种矛盾，但自己思想则不能自相矛盾。

现在讲排中律。排中律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同一律，矛盾律所保证的确定性的进一步展开。既然思想要确定，对象要确定，对于一个对象不能同时有两种相反的认识，不能同时肯定它们。排中律意思是说，如果对某个对象有两种矛盾的认识，两种矛盾的理解，那么它们当中总有一种是对的、真的，要加以肯定的。不能同时都不对，或认为还有第三种。比如说，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是不要战争的，这是个判断，另外的判断是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要战争，这是互相矛盾的认识。如果这两种认识你暂时不知道哪个对，那你首先说总有一个对，不能同时都不对，也不能有第三种说法。

排中律也常有人违反。昨天报上有篇文章有些地方就违背排中律，里面有很多话很含混，究竟苏联是不是备战，文章里不是二者取其一，而是含混。有些话说苏联不准备战争，可是又说现在英、美、法和苏联之间的对立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形，就是谁在欧洲准备得好，谁就决定了在欧洲的命运。因为欧洲是世界的战

略中心，所以英、美、法和苏联哪个准备得好，谁就决定了欧洲的命运。这句话又有苏联准备战争的意思了。文章里就没有排中，而是两者兼而有之。

排中律同矛盾律的区别是这样的：矛盾律说，你肯定了一个判断是真的，就不能认为相反或相矛盾的判断也是真的。排中律说，两个相矛盾的判断不能都是假的，你必须选择一个，肯定它是真的，也就是说另外一个必是假的。既然确定了“所有共产党员都应该为人民服务”，再说“有些共产党员不应该为人民服务”，这两个相矛盾的判断一定有一个为真，一个为假。

充足理由律。这个规律是说，一个论断要有充足的理由。美帝对我们的俘虏总认为不应该遣返，它也是有它的理由，它要讲人道，说俘虏不愿意回来。可是它的理由不充足，有事实反驳它的理由。还有日内瓦的公约反驳它的理由。它不能正面反对日内瓦公约，我们要俘虏回来，是根据日内瓦公约来的，那是法律要遵守的。如说，马列学院的领导不一致，又如说，某人破坏党章，这都是没有充分的理由。充分的理由所以必要，是因为事物本身不是偶然的。充分理由就是要我们把来源搞清楚，把你主张的来源搞清楚，这条是唯物论的原则。如果你没理由就叫无稽之谈。没有根据的乱说，就是主观主义，这种思想使人不能信服。

六、推　　理

所谓推理，是由两个以上已知的判断，推出一个新判断的一种思想活动。在形式上来讲，由判断构成推理，但要由相互间有逻辑联系的判断才能构成。推理，虽然是由已经知道的东西，推出不知道的东西。或是由已经知道的事情，来推出不知道的事情（或者是由已经知道的道理来推出不知道的道理）。之所以有推理，

推理所以能够起作用，能够反映事实，就是因为事实本身是互相联系的，事实的联系是推理的基础。正确的推理，首先就应该有一个原则，就是推理的结构、构成和事实的关系是一致的。推理正确与否，最后决定于事实本身。一种推理如果与事实的本身不合，就是错误的推理。所以说，推理必须和事实一致，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推理有两种,即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演绎推理,就是根据一种已经知道的普遍的原理,推出特殊的结论,就是由一般到特殊。一切共产党员都应该为人民服务,由此可以推论出某个共产党员也应该为人民服务。归纳推理,就是根据许多典型事实,推出一般原理。根据戴季陶所说的一句话“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又根据一个事实,资产阶级在蒋介石统治下,又想联合共产党,又对蒋介石存在着幻想。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从事正常工商活动,同时又犯了“五毒”。根据这种事实就可以推出一个一般的原理,即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就是由许多事实中捉住典型,从典型中可以研究出一般的原则来。恩格斯讲这个问题作了一个比方,火柴擦一下,按一般道理是应该燃起来的,但是却没有燃,这就是一个典型事实。那就应该分析一下,为什么不燃？分析的结果,是火柴潮湿。根据这个就可以作结论,凡是火柴潮湿就擦不着。这是科学归纳的一种,这种方法一定要结合观察或实验,必须由它来证明,才能够得出普遍性的结论,没有观察或实验是不能够了解的。火柴擦不着不一定都是潮湿,也许没有用力。所以说,必须考察清楚,从典型里概括出一般的东西。

演绎推理，是由普遍原则推出具体事物的情况。这种推理有一特点，在形式上基本上分为三段。不管怎样复杂的推理，都可以分为三个判断。就是说由两个判断推出一个结论，为什么要由

两个判断推出一个结论呢？要推出一个结论，首先要有一个已经知道的原理，这是一个判断；其次，要对你做出结论的对象的情况要有一点了解，这个对象与原理是什么关系，然后才可以推出结论。首先一个原理，共产党员都应该为人民服务，这是已经知道了的普遍的，然后再把对象研究一下，它与原理是不是有联系？这个人是不是共产党员，如果不是共产党员就不好推了，肯定了他是共产党员，第二个判断也有了，第三个判断结论就出来了，即这个人应该为人民服务。推理的形式所以是三段，就是我们推理本身需要三个判断，这是推理的基本规律。三段论法，从形式上来讲，就有三个判断，前二个判断叫前提，后一个判断叫结论。前提有两部分，一个是有关已经知道的，普遍原理的判断，叫大前提；第二个前提是指明当前要推测的具体事物的情况叫小前提，第三个判断是结论。演绎推理一般都是这样的，具体的推理内容可能复杂程度不同，但仔细分析都可以分成三段，我们可以在讨论的时候试一试看，或把教科书中讲的理论翻一翻，或把《毛泽东选集》里的一些问题研究一下。

在文章里不一定把三个判断都写出来，是可以省略的。如果有些判断都知道了，不讲也可以。对某个同志说你应该为人民服务，大小前提都可以不讲，听的人一听就知道为什么这样讲。所以我们研究具体的思想，具体的原理时，有时要还原一下，把省略的东西摆出来，就可以了解究竟推得对不对，如果觉得结论错了，把大前提小前提还原，也许在大小前提里发现错误。比如，新闻记者被香港政府赶出来，警察到记者房里说："走！"我们的同志就要问为什么走？你讲理由。那人说这（拳头）就是理由。这是很省略的一种推理。你要了解它对不对，就要把它还原。凡是在这个（拳头）下面的就要走；你在这下面；所以你要走。但是

用这个逼迫人走是没有充分根据的。英国说是民主国家，要讲民主，不能讲强权，到法庭打官司就有理由了，可以责问英国法律有没有这一条？推理不仅有三个判断，里面还包括三个“名词”即概念，表达原理的判断是两个“名词”，即主词和宾词这两个“名词”中要有一个“名词”和要下结论的具体事物有联系；另外就是你要下结论的具体事物要有个“名词”。一切共产党员都要为人民服务。这原理有两个“名词”：“共产党员”和“为人民服务”；“你”是“共产党员”；推出的结论中“你”和“为人民服务”联系起来了。名词有三个，大前提里有一个叫大名词，就是有关原理的一个主要名词；另外一个叫中名词，就是联系原理和具体事物的。“为人民服务”是大名词；“共产党员”是中名词；“你”是小名词。大名词通过中名词和小名词联系起来，就是结论。由“共产党员”到“为人民服务”和“你”联系起来，就得出结论：“你要为人民服务”。

为保证这种推理能合乎逻辑地推出结论，根据“公理”又制订了几条规则，这就是书上第125页讲的“三段论法的规则”（维诺格拉多夫、库兹明合著的《逻辑学》）。

七、若干问题的解答

今天要解答的问题很多，各方面都有，讲过的也不少，只好选一些主要的讲一讲。有些认为不需要答复，有些不可能答复。不需要答复的就是已经讲过了，个别的人不能了解，可以在小组中讨论解决，如判断关系已讲过。有些问题不太能解答，如关于人的思维发展历史，这问题是专门问题，不能解答，我们现在学习只能了解到有这回事就可以了。又如，形式逻辑是怎样来的，形式逻辑的发展过程，像这类问题都不能也不需要答复。

我把问题归纳成六部分来讲。

①关于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②概念的问题；③判断；④演绎与推理的问题；⑤关于归纳推理问题；⑥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

关于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

有些同志不了解，首先就是形式与规律有什么关系，这问题不需要多讲，形式就是思维表现的形式，判断、概念的形式，三段论法、归纳推理的形式。这些形式的变化有一定规则，这些规则就是它的规律，形式逻辑三段论法有五条规则，违背了就是错误的。

判断间关系的规则，就是它归纳各种判断形式相互之间发生关系的一些具体规则，就是规律中的具体规则，是在思想各部分、各方面，都有支配作用的。不管判断、概念或推理，凡是错误的，总可知道它是违背基本规律的。

首先，就是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三条规律实质上是一回事，就是正确的思维的初步规律。有人不了解一回事为什么要分成三部分，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譬如，对某一个共产党员讲，你应该为人民服务。我们确定这一点，首先就要反复说明，为了了解的更深刻，可以从反面来讲，你应该为人民服务是对的，假如你不为人民服务就不对，你要为人民服务是确定的、同一的，“你不为人民服务”就是与“你要为人民服务”相矛盾。如果坚持这两种说法都对，那就违反了矛盾律。在“你要为人民服务”与“你不为人民服务”两者之中，必须二者择一，否则，就是违反了排中律。

我们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人心里在想这是社会主义革命，那就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肯定了的革命性质，我们现

阶段必须要实行新民主主义，不实行非新民主主义。只有两条道路，新民主主义或者旧民主主义，二者必居其一。这样从正反方面来说，才能一步一步地深入。

简单的讲，同一律是肯定一件事，就不能又去否定它。矛盾律是指我们已经肯定了的事，就不能说肯定的一方面是对的，而否定它的一方面也是对的。排中律就是进一步讲，我们只有从已经肯定了的事以及对它否定了的这二者中间来选择，没有第三者。

排中律有一些人觉得很难理解，我们可以举一例子说明，杯子是黑的还是非黑的，这两个判断之间没有居中的，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黑的，要么是非黑的。逻辑矛盾的意思就是对一件事情，肯定或者是否定；如果你肯定了这件事情是对的，同时又肯定了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即否定它），那就是自相矛盾，也即逻辑矛盾。例如，你肯定了中国是新民主主义，那么就不能否定它。你说现在朝鲜战争已经是长期消耗战争了，但是你又说与目前形势不合，这就是自相矛盾。

再讲充足理由律，事实的根据与逻辑的根据不一样，逻辑的理由不应当跟现实的理由混淆，逻辑的理由是可以与现实原因分开的。举一个例子，今天很热，寒暑表到37℃，这理由是很充分的。但是天气热并不是因为寒暑表升到37℃；相反的，正是因为天气热，所以寒暑表才升到37℃，理由并不是事实发生的原因。这种情况是会有的，为什么呢？原因就是我们在讲的逻辑理由并不都是直接的原因。只要理由的确是理由，不一定要是事实的原因。事实上发生某种现象，有一定的根本原因，这原因可以引起很多现象。夏天的确热，引起寒暑表上升，这是一种现象。我们在逻辑学上，可用这些引起的现象作为理由。逻辑的理由可以看情况变化，我们一般讲天气热，寒暑表上升就可以证明。有的同志进

一步要问，为什么寒暑表上升到摄氏 37 度，天气就热？我们可以把事实理由讲出来，现实理由如果能够说服对方，只要理由充足就够了。

关于逻辑基本规律，还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解答。

的里亚斯特是南斯拉夫的，最初这个港是一个自由港，不收关税，各个国家共用的，后来被意大利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败了，南斯拉夫要了回去。南斯拉夫要是应该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的里亚斯特是个自由港，南斯拉夫要驻军队，这就引起巴黎和会讨论。要维持自由港，但是，美国在里面耍手段，英国还没有注意这个问题。美国想提议为自由港，实际上为美国统治，为自己的军事基地。因此，在和会上他这样提议，他说这港不许驻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英国提议不许驻任何陆、海、空军；两句话用意不同。苏联莫洛托夫用同一律说明这两句话不同的意思。莫洛托夫说，请你们把区别点说清楚，以及你们赞成哪一方面。莫洛托夫从中指出了美国的阴谋，你美国说不许任何国家的任何军队，当然不能是任何国的军队，但可以是公共的军队，就是联合国的军队。这样一来，就推翻了美国的提议，的亚斯特才能真正成为自由港。当时苏联外交上就善于运用同一律。原子弹，细菌战都是这样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美国对德国独立问题，苏联外交部门一次再一次地召开会议，要他决定，这就是同一律的运用。不仅在外交上是这样，平常在争论问题的时候，也是可以这样的。有人在检讨的时候，马马虎虎，我们就必须抓住一点，要肯定下来，揭露他的错误思想。

关于概念的问题

概念如何形成？如何由感性认识上升到概念？由感性认识加

工改造成概念是应用思维方法的，毛主席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方法，也即逻辑的方法，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的方法，如何经过这些方法来找准思想中本质的、比较普遍的内容。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问题。一个人从参加革命，到反封建的概念形成的过程是怎样的？农村出身的人最初参加革命，脑子里是否有这种概念，说：“我是进行反封建的革命”呢？我相信最初参加革命的农民，不是这样的想法，他们的动机是感性的，“地主压迫我，我要报仇。”革命要翻身的想法也不一定是反封建。所以，革命在最初只是感性的。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实践了，但是还没有认识，感性是直觉的，是由于直接的仇恨。以后进了一步，作一些工作，经过一些斗争，就开始把地主比较一下，知道地主有共同的地方，就是压迫剥削人。有的地方，地主压迫得重一点，有的地方轻一些，但是都是压迫。经过比较，思想就逐渐有了概念，其共同的本质的东西逐渐地显露出来，慢慢地概括起来，你的斗争与我的斗争，没有多大的分别，都有共同的地方。但这并不是完整的概念，概念是要把本质的东西、基本关系弄清楚，则认识就可以进一步。表面现象有时是不可靠的，虽然接近概念，但不是概念，没有抓住本质，所以就要分析。作了一个时期工作，就会慢慢地比较，把各方面都加以认识，弄清楚地主为什么都要剥削农民？地主的特点在哪里？我们的特点在哪里？地主压迫我们有什么原因？我们要反对是什么原因？这些原因也要分析。地主霸占了土地，就可以来剥削农民；有的地主还放高利贷；有的地主耀武扬威地欺侮人；也有的地主看见有的妇女漂亮，就想抢夺奸淫，原因很多。又有的农民，只有一条牛，偶然跑进地主的地里，把地踏坏了；又有的农民小孩和地主的小孩打架，地主就有

了理由来压迫农民……。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可以碰到很多的感性材料，我们先把材料分开，加以分析。分析以后，就可以综合，得出一个关系：地主总是要压迫农民，农民总是要反抗。

经过分析，就可以了解事物各方面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好人、坏人之别，而是把内容分析清楚。有了分析，又进一步地接近概念，可是还不一定抓住基本的关系。如：地主因为小孩打架，因为妇女漂亮，而欺侮农民，这都不是普遍的，不是基本原因。因此，在分析中要比较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基本的、普遍的，要分清楚。只有土地、高利贷、剥削农民，有权势，有政治势力，压迫农民。这些是基本的东西。这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分析，就可以把重要与不重要的分清楚，着重抓住其重要的，这即是抽象。

经过抽象，就正式造成概念，把最根本的东西概括起来。要想一下，地主是否普遍地都是以土地，高利贷剥削压迫农民？这是否能运用于一切地主？这就是概括从这些方面的了解，就是概念的了解。这概念是抽掉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及一些零碎的感性认识，单单抓住最重要的东西作中心，这即是基本概念。

关于地主这方面有了概念，农民这方面也要有概念。农民是否因为地主的小孩打了我们的小孩而报复他？有一个农民偶然把地主的鹰弄死了，地主要农民披麻带孝给鹰送葬，并给鹰做了一个坟。那么，我们革命是否单纯为了平鹰坟？也不是的。农民有的时候把马粪放在地主的嘴里，但这都不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根本概念，为什么要反对地主？就是要废除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平分土地，打倒高利贷。给地主吃马粪、平鹰坟是可以理解的，但斗争的中心不是这个，因为这是个人的，偶然的事情。

把地主的概念弄清楚，把农民反抗的概念弄清楚，知道斗争是反封建的，概念也就形成了，有了这概念，农民斗争的实质就

清楚了。

什么叫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就是地主占有土地，欺侮农民。这个概念的造成，如果不是经过一段革命斗争的过程，不经过分析、综合、抽象、概括，也得不出来。要真正的了解一件事，必须要经过这些步骤，掌握其本质的东西，才能了解其概念，有许多东西，我们能讲出名词来，但说不出概念来。说“帝国主义”这名词听听是可以的，但是要了解什么是帝国主义？就懵了。要了解帝国主义就要对帝国主义有一点感性材料，然后，逐步造成概念。知识分子读书有一个方便，名词可以很快的知道，但是意思却不一定能了解，这就要有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

附带的讲一下，比较、分析、综合，这些方法是逻辑的普遍方法，但不仅是由感性到理性的方法，推理、判断也都要用这方法。有比较就要有分析，这几种方法是分不开的。共同点、不同点，主要的、次要的；基本的、非基本的，仍然都是要比较、分析，抓住重要的，经过分析，得出本质的东西，这就叫概括。推理也是这样，归纳推理是把许多基本的东西总起来，做出结论。

关于概念种类的问题，有些人分析得很多，具体概念、抽象概念、相关概念等等，大致研究一下就够了。如果一下子弄不清楚，慢慢的就可以清楚了。这里我不准备解答。

概念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单称的、普遍的概念，类概念和种概念在逻辑学中用途较多。首先要把种概念、类概念弄清楚，外延大一些的叫做类概念，外延小一些的叫做种概念。（目前的逻辑著作中，又把类概念称为属概念。）

种概念、类概念的关系，与全体、部分的关系不一样。全体、部分是大小的关系、量的关系，质是一样的。如全体学生和几个学生，只是数的大小，性质没有分别。种概念、类概念的关系就

不同，如类概念是“人”，种概念是“中国人”，而不是“几个人”或“部分人”。又如，“猫”与“动物”，猫是种概念，“动物”是类概念，“种”和“类”有部分和全体的关系，但不是简单的部分和全体的关系，从逻辑上讲，种和类是从属关系。（详见维诺格拉多夫、库兹明合著《逻辑学》第39页）

概念的定义问题。概念的定义，就是要把一个代表概念的名词，它的内涵规定出来，把本质的东西抓住。如要把帝国主义的概念给以定义的时候，就要把它的本质、内涵规定出来，因此，概念的定义与纯粹的文字的含义解释是有分别的。文字的定义、解释是从字面上下定义，是语言学上的问题。语言学是研究语言本身的规律，不是研究语言所代表的思想内容，思想是要由语言来表示，没有语言就不能表示思想，可是思想并不是简单的语言。所以，语言与逻辑学有分别。

所以在下定义的时候，在逻辑上一定要指明这名词所代表的思维内容，而不是语言上的字面解释。如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这就是帝国主义概念的定义。下定义一定要用这办法，先指出它属于哪一类，然后抓住内部的特点，这叫“类加种差”。（详见维诺格拉多夫、库兹明合著《逻辑学》第45页）先指出它是属于哪一个大类，然后再说明总的特点，给帝国主义下定义，就是先要把帝国主义是属于资本主义的这一大类，但又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不是简单的部分和全体的关系，它本身的类别都是有特点的。所以，定义就是要指出一件事的本质的特点。

关于判断方面的问题

逻辑学与文法的区别问题。有人问：逻辑判断的形式为什么

一定是S（主词）是或不是P（宾词）的公式？一切判断是否都应该按照这个公式？有人怀疑，有些判断不是这形式，譬如，“茶杯在桌子上”。“中直机关干部学习毛泽东思想”。这里面是否有主词、系词、宾词，而前一句话系词是“在”，后一句话系词是“学习”，而不是“是”。提出这问题的人，就是把文法的形式与逻辑的判断形式看成是一样的东西，在文法上不会是每一个系词都是“是”。“我讲课”，“我”是主词；“讲”是系词，“课”是宾词。在文法上，“我”是代名词，“讲”是动词，“课”是名词。判断不是这样的，判断是你肯定或否定什么东西，用什么肯定或用什么否定。所以，“是”、“不是”，在句子里，不是每一句话都有的，但是在一个判断中，你必须要肯定或否定。

第二句话：“中直机关干部学习毛泽东思想”，判断是要肯定中直机关的干部是否学习毛泽东思想，其中系词“是”本是有的，但省略了。你的思想是要肯定“中直机关干部”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联系，肯定二者是分不开的。所以，就可以说“中直机关干部是在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两字在逻辑学上，不是系词。“学习”，与“毛泽东思想”合起来，是一件事。

茶杯肯定在桌子上，“在桌子上”，是一件事；“茶杯”是一个东西，这东西与这件事有关系，我们可以肯定它。“茶杯”是主词，“在桌子上”是宾词，我们在思想上的认识，却不一定要写出来，写出来的东西要求更简明扼要。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判断中主词和宾词的外延，判断中的主词、宾词外延之间的关系。主词、宾词外延与判断的周延（不周延）有很大的关系。有时宾词的外延比主词大；有时主词的外延比宾词的外延大。外延大的就可以包括外延小的，两者的关系就是这样。如果主词的外延比宾词的小，则主词全部就可以包括在

宾词内，这主词就是周延的，例如，“共产党员都应该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这主词外延就比较小，因此，“共产党员”都可以全部包括在“为人民服务”的宾词中。这种情况，就是说主词周延，因为它全部包括在宾词中，可以用(共)为人民表示。如果主词没有完全包括在宾词中，则是不周延。

主词或宾词周延还是不周延？能够全部包括在对方中的是周延，否则就是不周延。例如：“有些共产党员犯了命令主义的错误”，“共产党员”就不能全包括在宾词中，因为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犯命令主义的错误，所以在这个判断中“共产党员”的概念就不周延。如(共)(命)“命令主义”也不是全部包括在“共产党员”里面，所以“命令主义”这宾词也不周延。因此，在这判断中主词、宾词都不周延，这即是特称肯定判断。

周延与否，是从主、宾词外延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看互相间是否全部包括对方，全部包括即是周延的，否则就不周延。这一问题是逻辑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因为，第八章讲的演绎推理，其中三段论法的规则，几乎每条规则都涉及到周延与否的问题。（详见维诺格拉多夫、库兹明合著《逻辑学》第 125—152 页）

关于演绎推理的问题

推理和判断有点不同，推理是比判断进一步反映客观事物的形式。判断是可以使我们确定二件事物中的关系，而推理就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确定三件事物中的关系。

演绎推理，特别是三段论的演绎推理，一般说是要我们确定三件事物的关系，由甲、乙、丙三件事物之间来推测关系的形式就是由二件东西对于第三件东西都有关系，因此，也就可以知道

这两件东西中间也有关系。原来知道甲、乙这两个有某种关系，就可以推测到甲、丙也有关系。三段论式基本上是这种情形。首先知道在座的人和共产党员有关系，又知道为人民服务和共产党员有关系，因此，可以推测到在座的人都和为人民服务有关系。

因为推理是这样的一种基本结构，因此它就要有三个名词，三个判断。三个名词，就是因为有三个对象；三个判断，就是先要知道两个对象都和某个对象有关系，这就要有两个判断；然后推出结论，又要有一个判断。所以，自然就是三个判断。三个判断表明断定三种关系，三个名词表明三个对象，这是三段论法的基本结构。这些关系要推得正确，一定要遵守逻辑的基本规律，就是同一律、矛盾律，违背这些规律推理就不正确。三段论有五条规则，就是保证三段论正确的规则，违背这些规则一定就违背同一律以及其他规律。

第一条：三段论中应该有三个判断，三个名词，不能多也不能少；如果多了一个或少了一个名词，就不能进行推理。少了一个名词只有两个对象，只能做出判断，不能做出推理。“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这有二个名词，可以判断：“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但不好推什么东西，再推就滑稽了。还只能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多了一个名词也不好推理，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是青年团员，这是四个名词，做出两个判断来，但是联系不起来。三段论中如果前提里有四个名词就不能产生结论，二个前提只能有三个名词，如果有四个不同的名词，就等于没有“中名词”，中间发生不了关系。三个名词就能发生关系了，三个名词中一定要有一个中名词，就是起联系其他两个名词的作用。判断也应该有三个，是不能多也不能少的，只有二个判断就不能推理了，就没有结论了。

多了一个判断也不必要。如果违背这个规则与同一律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违背这个规则,要下结论就是违背同一律,“我们是共产党员,他们是青年团员,因此青年团员就是共产党员”。这就违背同一律了,因为青年团员不是共产党员。遵守这个规则就不能违背同一律。“我们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要为人民服务”,“我们”和“为人民服务”就有了联系,就能确定这种联系。如果说“我们是共产党员”,“他们是青年团员”,因此,“青年团员就是共产党员”,这就是四个名词了,“青年团员”与“共产党员”之间的关系无法确定了。从根本上说,就是违反了同一律。

第二条:中名词至少要周延一次。这也和同一律有关系,意思就是说中名词要能够把大名词、小名词真正联系起来。如果不周延就不能真正联系起来。“我们是共产党员;有些共产党员发生命令主义的错误”。这两个前提里中名词不周延。“我们”是大名词这是周延的,其中“共产党员”不周延。第二个前提“有些共产党员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并不是全部共产党员犯命令主义的错误,所以“共产党员”不周延,因为并不是全部共产党员包括在犯命令主义的错误里。我共命虽然“我们”和“共产党员”有联系,“命令主义”也和“共产党员”有联系,可是“共产党员”并没有把我们和“命令主义”确定地联系起来。因为,中词“共产党员”不周延,可能有这种情形,即“我们犯了命令主义”,但也是一部分。不是“我们”的全部,不能得出结论说我们都犯了命令主义的错误。

如果周延一次就不同,“共产党员都要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这中名词全部包含在“为人民服务里”,然后说“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就全部包括在“共产党员”里,“共产党员”周延了一次。结论就对了,即“我们要为人民服务”。因为“共产党

员”都在“为人民服务”里，而“我们”又都在“共产党员”里；所有共产党员都应该为人民服务，部分当然也应该为人民服务。这样就不违背同一律，因为全体确定了，部分也可以确定。“我们是共产党员”，“有些共产党员犯命令主义的错误”，这就不能确定哪一部分共产党员犯命令主义的错误，所以这是违背同一律的。以上两条是三段论最基本最主要的规则。

第三条：断案中名词的外延应该和前提中一样。前提里大、小名词，如果是特称不周延，在断案里也应该不周延。“我们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都应该为人民服务”，其中，“我们”是周延的，“为人民服务”是不周延的，结论是“我们都应该为人民服务”，结论中的“为人民服务”不周延，“我们”周延。这里遵守了同一律。在前提里周延的，结论里也应该周延，前提中不周延的，结论里也不应该周延。如果违背这规律，就违背了同一律，就错了。北极圈内都有白夜，列宁格勒不在北极圈内，所以列宁格勒没有白夜，这个推理错了，因为列宁格勒有白夜。“白夜”在前提中不周延，因为北极圈以外还有白夜，可是结论“列宁格勒没有白夜”这个否定判断主词周延，宾词“白夜”也是周延的，所以它就错了。列宁格勒和北极圈没有关系，可是和白夜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大前提中“白夜”并不是周延的，即白夜也可以不在北极圈，结论中好像是“白夜”完全在北极圈，所以违背了同一律。共产党员都应该为人民服务，某些人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某些人不应该为人民服务。这是大名词外延过分扩大了，原来在大前提里没有周延，到了结论中周延了，违犯了同一律。

第四条：如果两个判断都是否定就不能产生结论。“某些人不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不应该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因此某些人不应该犯命令主义的错误”。“有些共产党员不犯命令主义的错误；有

些人不是共产党员；有些人不犯命令主义的错误”，两个否定的前提推出的结论不可靠，这也是违背同一律的。“有些共产党员不犯命令主义的错误，某些人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某些人犯命令主义的错误。”这个推论可以对，也可以不对。中名词“共产党员”没有确定地起到联系作用，也就违背了同一律。因为共产党员并没有全部犯命令主义错误，因此共产党员里的一部分也不一定犯命令主义的错误，也不一定不犯命令主义的错误。

第五条：两个前提是特称，也不能产生断案。两个前提都是特称，中名词也不能周延。“有些共产党员犯命令主义的错误，有些人是共产党员；因此有些人犯命令主义的错误”，中名词是“共产党员”，一部分共产党员犯了命令主义的错误，一部分人是共产党员，能不能确定地得出这部分共产党员就是犯命令主义错误的共产党员。不能确定，结论是不确定的，就是违背同一律的。

关于推理的格式问题。研究格式是要我们记住有些格式对，有些格式不对。用五条规则检查一下，就知道对不对。

第一格有些基本特征，合乎这特征才是正确的，第一格 $\frac{\begin{array}{l}M-P\\S-M\end{array}}{S-P}$，这格式用得最多。“共产党员都要为人民服务，我们是共产党员；所以我要为人民服务。”这格的特征是大前提必须是全称，小前提必须肯定。“一切共产党员都要为人民服务”，是全称判断；“我们是共产党员”，是肯定的，符合这两个特征、规则，如果破坏了这规则就是错的。有人提出了例子，说破坏了这规则也好像是正确的。“有些脊椎动物是人，有些动物是脊椎动物，所以有些动物是人”。就是违背了大前提必须是全称的规则。

第二格 $\frac{\begin{array}{l}P-M\\S-M\end{array}}{S-P}$，大前提中词是宾词，小前提中词也是宾词。这

个格的特征是大前提必须是全称，前提中必须有一个是否定的。违背了这规则就要犯错误。“有些人是作家，凡诗人都是作家；故凡诗人都是人”，究竟这推理对不对呢？实际上也是不对的。因为，这个推论违反三段论法的规则第二条：中名词至少要周延一次。在这个推论中，“作家”这个中名词一次也不周延。为什么会看起来对呢？那是偶然性，碰巧得出的结论，不是从前提必然推出的。若从事实上讲，前提中的“人”是确定的，就是指的“作家”，结论中的“人”是一般的人，所以有了四个名词，它是错的。

这些格式的特征都是根据逻辑的规律来的，只要懂得逻辑的规律，就可以知道哪些格式可以用了。

第三格$\dfrac{\begin{array}{c}M-P\\ M-S\end{array}}{S-P}$，小前提应该是肯定的，断案一定是特称的。“有些中国人是汉人，凡中国人不是印第安人，所以印第安人不是汉人，”这个推理是错的，从事实上看好像也是对了，但是不可靠，如果把名词更动一下就成了问题了，比如“有些中国人是哈萨克族人，凡中国人不是苏联人，”但结论不能说“凡苏联人都不是哈萨克族人”，因为它有个加盟共和国是由哈萨克族人组成的。所以，上面那个推论虽然对，但不一定可靠，原因就是名词的周延性前后不一致。有些中国人是汉人，大名词“汉人”是不周延的，汉人只有一部分是中国人，可是结论“汉人”是周延的，违背第三条规则，违背这规则就不可靠了。

归纳推理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举例说明求异法、求同法。“三反”中为什么会得到资产阶级进攻的结论？这是用求同法。机关干部贪污腐化，都和资产阶级有联系，归纳起来得出这个结论。究竟贪污是不是资产阶级进攻的结果？要确定这问题，用求异法设想一下，倘若没有资产阶级进攻的条件，是不是可能没有贪污腐

化，如果是这样那就反证了这事情，所以我们就研究一下，在乡下的时候没有和资产阶级打交道有没有贪污，结果是当时没有大的贪污。这就是求异法，从不同的条件找不同的结果。还有求同求异并用法。我们研究资产阶级进攻有求同法、有求异法，这样一比较，在乡下没有大的贪污，在城市里有。因为城市里有资产阶级进攻的条件。所以这两种办法并用起来，正面反面肯定资产阶级进攻是贪污的主要原因。

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的问题

这问题比较复杂，以后还要再讲一次。逻辑学应该肯定是哲学的一部分，因为哲学主要是研究思想方法的学问，当然它研究的不止是思想方法，目的是为了求得正确的思想方法。辩证法唯物论也是这样的。所以，逻辑学是哲学的一部分，是初级的哲学，在这点上逻辑和辩证法是一致的。思维有没有阶级性？思维是没有阶级性的。思维是讲思想的活动，思想活动各阶级都是一样，它没有阶级性，因此逻辑也没有阶级性。逻辑学研究思维活动的规律，它之所以没有阶级性的，因为逻辑学无产阶级还没有产生以前早已经有了，奴隶时代已经有了，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照样可以用。不过，资本主义时代，因为科学发展，补充了充足理由律，本质上没有变。无产阶级研究的逻辑，还是古典逻辑和近代逻辑，并没有无产阶级的逻辑。辩证法有阶级性，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彻底掌握，因为辩证法和阶级有关系，其他阶级有保守性，不可能掌握革命的辩证法。辩证法不承认有永久的东西，保守者就要求有永久的东西。

辩证法和形式逻辑有什么关系呢？形式逻辑是初级的，认识世界第一步的思想规律。不管什么人，你要想使你的思想是正确

的，首先就要遵守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否则，根本不能认识。要认识一件事，首先要确定你要认识什么对象，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先要确定这是正确思想的原则，而逻辑学就是发挥这种原则的。但是，逻辑学它只能确定什么，不能研究客观如何变化，如何发展，所以，客观事物如何变化、发展，就要进一步掌握辩证法。所以，辩证法是进一步的思想方法，不但确定研究的东西，而且还要进一步研究变化、发展，所以说辩证法是更高级的。问题就是我们讲辩证法，是不是要丢掉形式逻辑？也不是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是研究变化的必要特征，因为研究变化首先要了解什么变成什么。所以，研究辩证法，不能排斥形式逻辑的原理，而且当做辩证法思想的必要条件，不然变化就不可能研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变，怎么能研究变化。研究我们的社会要变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研究我们是什么社会变为社会主义，要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确定。所以形式逻辑仅有它是不够的。可是，形式逻辑是不可少的。这样是不是认为形式逻辑是辩证法的基础，这要看对基础两字怎样了解。不能说辩证法是形式逻辑的反映，这样了解就错了，可以说形式逻辑是辩证思维的必要特征。

“机关青年应怎样对待工作和学习来适应国家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的讨论总结*

(1953.9)

关于“机关青年应怎样对待工作和学习来适应国家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的讨论会进行了两个多月，前后收到参加讨论的来稿将近两千件。这些稿件大部是来自机关工作青年的，也有很多是来自其他工作岗位的青年们的。这种情形说明我们的讨论引起了相当广泛的青年同志们的注意，不仅仅机关工作的青年们把我们提出的问题当做与自己有切身利害关系的问题，就是在其他工作岗位上的青年们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与他们自己的工作和前途的密切关系。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在我们的讨论中所涉及到的一些青年们的情况，虽然是在机关工作中间表现得比较突出的，然而在其他各种工作岗位上的青年中间，也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

在机关工作的一些青年说：“我之所以不安心工作，是因这些平凡的技术工作或日常的行政事务工作，妨碍我给国家做出有重大意义的贡献，妨碍我发挥自己的创造能力，妨碍我的学习和进步。”然而，无论到什么工作岗位去，都不可免地要担任许多平凡的技术工作或日常行政事务工作，因此在各种工作岗位上，我们

---

* 这篇文章是应《中国青年报》所约，为那场讨论所作的总结。

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听到一些青年们的这一类的说法。

从这次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并不是所有在机关工作的青年同志们都抱着这样一种见解。相反地，很多青年同志的认识都是与这些见解正相反对的。我们发表了许多稿件，写稿的人都是最平凡的行政事务工作者，他们是收发员、油印员、管理员、采购员、科员、文书工作者、小学课本的编辑员等等。他们以自己的实际生活经验作为例证，来说明这些最平凡的日常工作对于整个国家事业的重要意义。由于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工作的重要意义，他们就能够热爱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中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创造性，做出了许多有重要意义的新的贡献。他们也能结合着工作适当地进行学习，使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日益增进。

这些都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在我们讨论中呈现出来的活的事实。这些事实说明：几年来伟大祖国的各方面的变革实践，深刻地教育了大批的青年们，使他们获得新的人生观和新的工作态度，这些新的人生观和新的工作态度鼓舞着他们的劳动热忱，使他们在自己的任何平凡的工作中也能表现出先进的作用。

我们的讨论会的重要成绩之一，就是在讨论的过程中逐渐集中了这些新鲜的事实，这些事实最有力地反驳了各种不正确的见解，指明前面所讲到的一些青年们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这些新鲜的事实已在实际上解决了我们所讨论的问题，青年同志们应该把它们作为教育自己的榜样。

为要使大家对于所讨论的问题获得比较明确的、系统的了解，我们会在讨论过程中配合讨论的需要发表了四篇专文，这些文章解决了一系列的思想问题。现在，我们还想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补充的解释。

首先我们要谈一下：什么是对祖国建设事业具有重大意义的

工作。所有参加讨论的同志，尽管意见不同，但是大家的言论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热望对祖国的建设事业做出有重大意义的贡献，这一个共同的爱国情绪，是很可贵的，是应该发扬的。但是仅仅有好的情绪，并不就等于对事情获得了正确的认识。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于要弄清楚，怎样才能够真正为国家做出重大意义的贡献。什么是有重大意义的工作？一般地说，工作的意义，是决定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凡是为国家和人民所愈更需要的工作，就愈更有重大的意义。在这一点上，大家是没有什么争论的。问题是在于如何了解国家和人民的需要，问题是在于有些青年同志对于这个需要的了解是片面的狭隘的，因此也就得不到正确的结论。有些同志们的头脑里，或多或少地有着这样一种想法，似乎只有工业建设的工作，特别是像鞍钢那样的大规模的重工业建设工作，才是国家和人民所最需要的，而其他各种工作，好像是可有可无的，至少也好像是不重要的。这种想法对不对呢？重视工业建设，这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对。尤其是我们的国家现在已进入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时期，工业建设是我们国家建设的中心任务，而重工业是建设的重点。每一个青年，每一个人民，都应该热烈关心我们的工业建设发展。但是，我们说应该重视和关心工业建设，并不等于说因此就可以轻视和放松其他各方面的工作。相反地，正是为着工业建设的需要，就应该也抓紧其他各方面的工作来给予有力的支持与保证，使我们国家的这个中心任务能够更顺利地完成。不要把工业建设看成一种可以在什么孤岛上单独完成的事业，它需要各方面的革命建设事业的配合。它需要农业配合，因为工人需要粮食和原料才能进行工作；它需要文教事业的配合，因为工业的发展需要不断地补充大批的干部；它也需要有商业贸易工作的配合，因为没有城

乡交流就不可能使工业获得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机关工作对于工业建设就更不能说不重要了，大规模的、组织严密的工业建设需要有计划的领导，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同样需要有计划的领导，没有“有效地领导各方面建设事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新型机关”，没有这样的经济机关、文化机关以及政治的国家的机关，我们的工业建设和各方面的建设事业怎能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呢？

斯大林同志曾经指出国家机关的问题是整个建设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他说：“……国家机关问题是我们全部建设事业的极端重要的问题之一。国家机关诚实地进行工作，或收受贿赂；它节省地支出经费，或滥用人民财产；它在工作中采用欺骗手段，或忠诚而正直地为国家服务；它是劳动者的累赘，或是帮助劳动者的组织；它培植无产阶级法律观念，或是用否认这一观念的思想去腐坏人们的意识；它是向着过渡到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向发展，或是退向普通资产阶级国家的腐败的官僚主义——所有这些问题的正确的解决，对党和社会主义不能不有决定的意义。”（《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 6 卷，第 249 页）

为了使我们的国家机关能真正成为新型的领导机关，每一个机关工作人员，不论他所担任的工作是大的或小的，都负有保卫人民利益的责任，都应该具有高度的觉悟，都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政策和文化修养，以便能够及时地发现和正确地认识问题。一个人可能只担任机关中的一部分较小的工作，例如文书或打字工作，但他仍有责任在自己工作机关中经常注意揭露和反对可能存在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以及其他危害人民利益的坏现象，使自己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机关的领导，使自己配称为新型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

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认识整个国家的各方面建设事业的互相联系，在机关里工作决不会“嗅不到经济建设的气息”，而是相反地与经济建设“息息相关”的。胡耀邦同志在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祖国的建设事业是需要多方面的工作和多方面的知识，所以各个部分的工作，都是我们整个事业所不可缺少的，都是互相依赖的。我们的社会不能够没有农业而只有工业，也不能够只有经济建设而没有政治工作和文化建设。凡是有益的劳动都是光荣的事业，我们应当热爱自己的岗位。只要对于自己的工作专心致志，精益求精，那么，在任何岗位上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都可以达到前人所没有达到过的成就，因而造福于社会。”各项建设工作都为国家和人民所需要，每一项工作做好了，都是对于我们建设事业有重大意义的贡献；每一项工作做坏了，都有可能在整个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中造成相当重大的损失。因此，决不能认为只有在工业建设工作中才有可能做出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贡献，而在其他工作岗位上特别是在机关工作的岗位上工作，只有很小的意义。

或者有人说，上述的一般原则，对于机关里的普通技术工作和日常的行政事务工作并不适用，因为这些工作本身是细微的，不能产生什么重大意义。对于这样的看法，我们所发表的一些稿件就提出了许多反面的证明。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稿件的作者就在普通的日常工作中看到了重大的意义。为什么有些青年同志就不能够和他们一样地来认识问题呢？这不外是由于以下的一些原因：

1. 他们误认为普通的技术工作和日常行政事务工作似乎就不是重要的工作，就不是国家和人民很需要的工作。有些同志甚至在旧社会落后思想的影响之下，用一种腐朽的剥削阶级的观点来看今天的工作，似乎我们的工作中还有什么“尊贵的”与“卑

贱的"、"吃得开的"与"吃不开的"、"有出息的"与"没有出息的"等等的区别。这样的观点显然不是合乎事实的，它不是新中国青年应有的观点，这些错误的见解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没有看见这样一个明白的事实：即是任何一项国家建设事业都包含着大量的普通技术工作和日常行政事务工作，任何一个参加工作的人，不论到什么岗位上，都必须准备接受各种细微平凡的工作，即使在工业建设岗位上，即使是做一个工程师，也有着工程师所必须要做的很多平凡细微的日常工作。所以，那种以为世界上似乎会有什么完全和平凡细微的日常工作脱离了的应在空中的轰轰烈烈的工作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青年们应该认识到，整个国家的轰轰烈烈的事业正是建筑在巨大数量的平凡细微的日常工作的基础上的，这些日常工作都是有重大意义的、光荣的、尊贵的。新中国的青年决不应该让旧社会的腐朽思想来损伤自己的工作的荣誉。应该向这些坏思想进行坚决的战斗，而不应该在它面前气馁。

2. 他们误认为一种工作的意义就仅只在于这种工作本身，而不注意每种工作和国家事业的联系。仅就工作本身来说，收发、油印、会计等等工作似乎是平凡而细微的，但如果就它们和整个国家事业的联系来说，那么，就像我们在已发表的稿件中所看到的，一个收发员就能看出他的工作是机关的要口，工作的好坏影响到整个机关的工作；一个油印员能够关心到自己的油印如果有错误，就使下面的同志对领导意图不能获得正确的理解，……即使是最平凡的工作，其中如有差错，往往就会使国家事业遭受损失。因此，如果在这些工作上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使国家能够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损失，就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贡献。

3. 有些人并不是依据国家和人民需要来考虑工作的意义，而主要地在想着个人的眼前利益。当他们在口头上埋怨某种工作不

能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时，实际上他们心里的不满，却在于当前的工作需要埋头苦干，或者是包含着许多困难和危险，不能很容易地为个人获得名利。有这样想法的人显然也是受到了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他把个人的眼前利益放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根本不能够理解今天的工作。他们在工作中所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自己所做的事情更为“显眼”，更对自己个人有利。他们在工作中总是这山望那山高，在许多岗位上调来调去也还是不能如意，因为所有的工作都不是那样能够便宜地达到那种个人的企图。新中国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做切切实实的工作，在任何岗位上都必须有高度的责任心。企图投机取巧、侥幸获致名利的人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它非常关心如何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随着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个人的福利是能够逐步提高的。凡是认真地埋头工作的人，不怕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一定的照顾，但如果妄想不花辛勤的劳动，而要取得国家的生产事业所不能容许的个人的利益，那就是罪恶。新中国的青年必须了解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要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完成国家所分配给自己的任何工作而努力。青年们是爱祖国的，但如果不愿意使我们爱祖国的思想仅仅落为一句空话，那就必须把它表现在自己的行动里，那就是要在实际上爱护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热爱祖国分配给我们当前的任何一项工作，不管它是多么平凡细微的工作，不管它是需要埋头苦干的，或是充满了困难和危险的。

其次，我们要谈到青年们应该怎样来看待自己的理想问题。机关工作青年们不安心的另一个理由，是说这些普通技术工作和行政事务工作违背了他们的理想。这样的理由能不能成立呢？要答复这个问题，首先应该问一问：什么是自己的理想？新中国青年

应该有什么样的理想的？很容易明白，新中国青年应该把我们国家所要争取达到的未来的前途——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总的理想。如果青年们不否认这应该是我们自己的理想的话，那么，能不能说我们现在的工作是违背了这个理想的呢？显然是不能这样说的。因为我们的机关工作以及我们国家的其他各项工作，正是安排在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条总的路线上的。我们参加这些工作，正是在把我们的力量贡献给那一个最崇高最美妙的理想目标，我们的平凡的工作，正是为着实现那不平凡的理想目标所不可缺少的工作。任何过去的历史时代的青年，都没有过像我们今天的青年们这样幸福的际遇，能够把自己的力量切实而有效地贡献给这样伟大的理想。对于这种幸福的际遇，我们还要表示动摇和不安，那不论对自己和对国家都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因此，在机关工作的青年就不应该说国家所分配给我们的这个工作是违背我们的远大理想的。但是，青年同志们也许要从另外一方面提出问题，当他们说到自己的理想的时候，他们仅是指个人的志愿，或者是愿意将来做文学家、科学家等等。于是他们说："我同意我们应该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作为我们总的理想，这是不能动摇的。但是我仍有权利考虑我的个人的工作志愿，考虑为着实现这个远大理想我所愿意担任的工作职务。而现在的工作职务是违背了我个人的志愿的，因为我愿意做文艺工作者，而我现在却担任着收发、油印或保管之类的工作。"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呢？

的确，每个人都有权利考虑自己的工作志愿，作为个人努力的目标。新中国解除了旧社会的各种压迫制度，造成了能够发展人们的良好的个性的广阔的园地，一个人的志愿只要是合理的，只

要不是缺乏任何现实基础的空想，那么，经过他的坚毅而持久的努力，和周围人的帮助，一般都可能实现的，这是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的。新社会不能埋没人们辛勤努力的成果，不会无理地摧残人们的才能，像在旧社会里常见的情形那样。事实上今天我们的国家机关干部所担负的工作一般的是和他的能力和条件相称的。但这里必须注意：我们说容许一个人考虑将来的工作志愿，并不等于说可以把这一点作借口，来随便放松甚至做坏当前的工作。今天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像共产主义社会那样使人人有可能随时自由选择职业，我们不能设想自己一旦决定了某个志愿，就很快可以实现。同时，我们的国家又有许多迫切需要我们做的工作，这些工作往往和个人的志愿是不一致的。因此，每个人有选择志愿和努力求其实现的权利，但是更有保证完成当前国家所交付下来的工作的义务。新中国的青年在自己所担负的当前工作中应该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用自己的主要力量来把它做好。因为当前的工作都是国家的现实的迫切需要，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比尚未实现的个人志愿还是更重要一些。

或者有人又说：当前的工作和我个人特点不相适合，只有到另外的工作岗位，才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才能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们必须加以分析。有些人对于自己的所谓个人特点的说法，往往是夸大的，或者是不真实的。例如往往有人仅仅才学了一些初步的物理化学知识，就以为自己具有做工程师、科学家的特点；仅仅粗通文理，就自以为有了文艺的才能；仅仅认识几个名词概念，就自以为是具备了从事哲学的专门研究的条件。正是这一种对于自己的夸大的想法，使得有一些青年在当前工作岗位上总是抱着“大材小用”的委屈情绪。在这种情形之下，问题就不是什么工作与个人特点不适合的问题，而

只是个人对于自己"特点"没有真正的自知之明。在这种情形下，所需要的只是批判这种人的妄想，而并不需要改变工作来迁就个人的要求。当然也还有一种相反的情形：有些青年在某一工作岗位上，觉得自己的文化和政治水平不高，工作经验不够，难于完成任务，因而感到不安，并希望调到较为容易和较为熟悉的岗位上。对于这种情形我们应怎样来看呢？工作与能力不相称，是的确存在的事实，承认这个事实的虚心态度是好的，但因此而的失去了积极前进、克服困难的勇气，却是错误的。我们国家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工作内容日新月异，我们常常要遇到许多自己很生疏的工作，是很自然的。因此我们的任务，一般地仍在于要努力从工作中学习，逐步提高自己的能力，坚决设法把工作做好，而不应该在困难面前丧失斗争的信心。

一般来说，作为一个青年，各方面的知识能力都是正在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中，应该能适应于各种各样的工作（特别是机关的普通技术工作和日常行政事务工作)。特别是对很多没有固定特长的青年同志来说，当前的工作既是国家的需要，他也具有做这一工作的条件，他就更不必强调志愿和现实工作的矛盾，而应该在努力做好工作中去培养自己对当前工作的兴趣，并且不断地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只要他能专心一致地努力工作和学习，那么，不论他今天是在什么岗位上，担任着什么工作，他的发展前途都是不可限量的。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应该承认，一个人的工作如果分配得太不适当，也的确会使工作受到妨碍，有些人如果给以适当的工作，就能够贡献出更大的能力。因此，一个人如果提出要求调到更适合的工作岗位，我们的领导机关，是会加以认真考虑的。然而就提出要求的青年同志自己这方面的来说，他就应该更多考虑一下自己对于个人特点

的看法是否符合事实。如果不符合事实，就应该准备放弃自己的意见。如果自己的看法是对的，领导机关对这样的看法也予以同意，那么他的要求是可以而且应该有实现的机会的，但即使如此，有时由于种种条件的困难，一时还不可能分配到更适合的工作岗位，那么，他仍然应该坚持当前的工作，努力完成任务，任何时候也不应该在工作中表现不安，对工作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

再次，我们要谈一谈什么是创造性的劳动的问题。青年同志们都希望在工作中发挥创造能力，这是很好的，这说明青年中间有着反对保守思想的强大的动力，是青年的特点和优点。但是，有些青年同志把创造性的意义看得很狭隘，或者也可以说是很空洞，他们以为创造性的劳动只能在某些工作中存在，例如只能在某些“显眼的”“惊人的”伟大工作——鞍钢的建设、朝鲜战争等中才能存在，而在机关的日常行政事务中就不可能存在。创造性的劳动在一定情形下，自然会产生“惊人”的成果，但创造的真正意义并不在“惊人”，而在于能够使各种有益于人民的工作获得不断的改进。一个仓储员能够想出办法来使库存的轮胎避免发生事故，使国家少受很多损失；一个普通会计员能够把死会计变成活会计，能够根据账目上所看见的生产上的需要来对材料供应部门提出适当的意见，使资金的积压得以避免，这些并不一定“惊人”的例子，对于人民的利益来说，我们没有理由不承认它们都是具有巨大价值的创造性的劳动。所以，在广大的工农群众中间，在埋头苦干的担负着最平凡的日常事务的工作人员中间，具有着最大量的，最根本的创造劳动的泉源，有些引人注目的巨大的创造，都是以这些大量的日常的创造劳动作为基础，并且是后者的积累的结果。没有后者就不可能有前者。青年们希望在自己的工作中获得巨大的创造成果，这种志愿本身并不算错，错的是有些人以为

似乎并不需要经过日常工作的辛勤努力，不需要长期地积累大量的平凡细微的创造劳动，就可以侥幸在某一天早晨突然获得一个巨大的创造成果。这当然是一种空想。所以，对于新中国青年来说，最重要的还是首先在日常的平凡细微的工作中发挥自己的劳动创造性。一个人如果在平凡细微的工作里不能表现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那么他也就没有理由可以使别人相信他在巨大的工作中还能够有什么真正的创造能力。

在讨论过程中，许多人都承认，创造性的问题，和劳动的自觉性分不开。这是很对的，“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如果有的人认为某些工作竟会妨碍着自己的创造能力的发挥，那么，这并不是，或主要的并不是由于工作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于在工作中缺乏一个发挥创造力的泉源，即劳动的自觉性。所谓劳动的自觉性，就是对于工作的主人翁的态度，就是对于国家和人民所交付我们的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就是热爱自己的工作，用最大的积极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工作，就是“要对自己的工作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有着这样一种自觉性的人，不论在任何工作中，不论在“显眼的”和不“显眼的”工作中，都一定能够发挥劳动的创造性，“一定可以达到前人所没有达到的成就，因而造福于社会”。

新中国是人民的国家，也是我们青年自己的国家，在新中国参加工作的青年们，决不像在旧社会那样受雇于人并为剥削者所奴役，而是为广大人民服务，为自己的远大利益和目前利益从事光荣的劳动。所以，新中国青年都应该以自觉的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工作，也只有具备着这样的工作态度的青年，才够得上一个名副其实的新中国青年。在工作中缺乏自觉的积极性，这就是没有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看做自己的利益，就是用旧社会剥

削者的观点来看待新国家的工作，这种腐朽的态度是新中国青年应该坚决反对、坚决克服的。

最后，再谈一谈学习问题。胡耀邦同志的报告里在论到学习问题的时候，首先就指出："任何团员都应该学习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共产主义的道德观。这种人生观和道德观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并且引列宁的话说："做一个青年团员，就是要把自己的工作和能力用去为公共事业服务，这就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实质"。"应当这样定下自己学习的全部任务，使青年每天在任何乡村，任何城市里，都能实际解决公共劳动中的某种任务，哪怕是最微小、最平常的任务"。我们首先应该学习的，就是这种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在本文前面，我们曾说新中国有大批的青年在祖国几年来各方面的变革实践中受到了深刻教育，获得了新的人生观和新的工作态度。这里所说的新的人生观和新的工作态度，也正是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共产主义的工作态度。我们说青年们应该以他们的行动作为教育自己的榜样，主要的也是指这种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工作态度。

为什么要首先学习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因为这是使青年们脱离旧社会的坏习惯坏思想影响的最根本的方法。旧社会遗留给人们的最顽固最恶劣的思想影响，就是剥削阶级的个人主义。这是与共产主义的人生观正相反对的自私自利的人生观。它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完全相反，是以"我的目的只在谋利，其他一切与我无关"(列宁:《论青年团的任务》)的心理和习惯作为基本内容的。这种个人主义的坏心理和坏习惯在青年中间也有着相当强烈的影响，它是许多错误认识的思想根源。前面所批评到的在机关工作的一些青年们的错误看法，或多或少，都可归结为个人主义人生观的表现，都是缺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缺乏对公共事业

的高度责任感的表现。而在讨论过程中所看到的许多青年工作者对于劳动的那种自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是共产主义人生观和这种人生观在工作态度上的表现。所以，青年们的学习，首先就是要获得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反对个人主义。应该指出：我们的这次讨论会，也可以说是一次重要的学习，也具有着学习共产主义人生观、道德观和反对个人主义的意义。

劳动的创造性的发挥，是和学习分不开的。仅仅奉行故事，敷衍塞责，而不积极学习，力求进步的人，决不可能在工作中有任何新的贡献。学习的目的正是为了工作，而不是为其他的任何目的。学习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道德观，是为了提高工作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因为它"将能够促进专门知识和专门业务的学习的进步。而在专门知识和专门业务上成为内行，成为能手，也就能够在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中做出一定的、真正的贡献。"

"既要有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道德观，又要有精通业务的知识，这就是我们对全体青年和青年团员关于学习问题的要求"；这就是说，在学习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道德观的同时，青年们还必须为精通业务而学习有关的专门知识。首先应该是"做什么，学什么"。而为着更有效地完成"做什么，学什么"的学习任务，必须配合必不可少的文化学习以及时事政策、革命理论的学习。

参加讨论的许多同志都正确地认识到，在机关工作（也不仅只机关工作，其他各种工作也一样）的青年，就应该决心在自己的工作中学习，而不应该片面地认为只有学校中的学习，才算真正的学习，并以这种想法做为借口，而放弃工作中的学习。"在学校和训练班中的学习，对于我们学习的整个过程来说，这只是一种方式，一个方面，一个阶段，而某种知识的成熟，是必须依靠

于在长期的生产中、工作中和斗争中培养和积累起来的”。所以，学习是一个人终生的事情，而工作中的学习，是我们的全部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不抓紧这个方面，就不可能有所成就。

有些人认为在机关工作中学不到什么东西，说：“做什么，学什么，太简单了。”这是由于把自己的工作孤立起来看待，而没有注意到每一个人的工作与整个的机关的工作以及其他各部门工作的联系，不能够从这些联系中看到工作的丰富内容。如果我们不用这种孤立的看法来限制自己的眼光，那么，即使担负着最简单的工作，也可以学习到许多内容丰富的业务知识。诚如一位参加讨论的同志所说的：“一个打字员和档案员把目光放大一点的话，就可以看到整个机关的工作中的问题，也可以对领导上提出改进的意见。”在讨论中许多同志所谈到的若干具体事实，也证明了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问题是在于我们要以主人翁的自学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工作和整个机关的工作，问题是在于要克服那种“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们瓦上霜”的个人主义态度。能够这样，我们就不至于误认为工作中的学习就只限于个人所做的一些简单事物，对于这个问题，曾习三同志的《谈谈在工作中学习的问题》一文解决得很好，这里就不多谈了。

不了解应该根据机关工作中学习的特点来采取适当的学习方法，也是使一些同志认为在工作中学不到东西的原因。机关工作中的学习，在领导方面自然是有一定的安排的，但究竟与学校和训练班不同，“我们在生产中、工作中、斗争中只要能够经常留神，便能够得到许多的学问。”这就是说，个人的自己努力在这里占着更重要的地位。第一，必须认识到工作本身也就包含着学习的意义，要在工作中经常留神，注意自己所不曾知道过的新经验新事物，使新知识不断地积累起来。第二，在工作之余所留下的专门

学习时间不多，必须努力抓紧，不容许随便浪费。第三，没有一定的专门教师，主要的教师就是四周围一起工作的人们，这样的教师是很多的，但必须主动地去找寻，才能够找到，不应该消极地“等待”别人来给与帮助。这样的教师多半每人只有一方面的经验和一方面的长处，而又有某些短处。要紧的是善于向别人的经验和长处学习。有些人喜欢强调别人的短处，而不重视别人的有益经验和他们的长处，不改变这种态度，是很难在周围的人们中间找到帮助自己的有益的教师的。第四，在工作中不能像学校中那样可以集中力量在较短时间之内学完某一项系统的知识，但如果有长期坚持的毅力，还是可以学到某些必要的系统知识的。对这个学习的规律和学习的困难是应该认识到的。所以，青年要以充分的积极热情来对待学习，但又要避免学习上的急性病，避免青年同志们比较容易犯“好高骛远，急于求成”的毛病。要能够坚持不懈，循序渐进，长期地学、耐心地学、日积月累，是一定可以获得显著的成就的。

（原载《中国青年报》1953年9月11日）

辩证法讲课提纲*

（1953）

一、引　言

1.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用以研究和认识自然界现象和社会生活，社会历史的方法。

认识的任务，是要把我们从实践中获得的经验知识——感性认识提高到理论知识——理性认识的阶段，使我们的认识由事物的片面的、表现的现象进一步深入到事物本质，使我们获得关于事物的全面性的内部联系认识，也就是事物的客观规律性的知识，使我们有可能依据这些正确的客观规律知识，来指导我们的实践。

要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需要对丰富的感性材料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改造，也就是把经验知识加以分析、总结。我们用来分析材料，总结经验的方法，就是辩证法。

学习辩证法，才能贯彻唯物论的世界观。因为：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过是对于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而并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而只有学会应用辩证法方法，才能保证我们正确地认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一切事物的客观规律，才能正确地认识和

---

* 这个提纲，系铅印稿，是给当时学员讲课前发的学习材料。未注明时间，我们分析大致是 1953 年。

解决我们在革命斗争中和国家建设事业中所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所以辩证法是惟一正确的科学方法，是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和争取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必不可少的思想武器。

学习辩证法必须反对形而上学，因为形而上学的方法是与辩证法正相反对的。形而上学使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停止在片面的、表面的境界上，而不能进一步获得全面的内部联系的知识，不能保证我们的主观思想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所以，反对形而上学，是反对唯心论、反对主观主义和贯彻唯物论所不可少的环节。

因此，学习辩证法就是要掌握这一个科学的革命的方法，就是要反对思想上的片面性和表面性，一切主观主义和错误的来源，就是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反对片面性和表面性，认识事物的全部联系和内部规律，就是我们学习辩证法的总目的。

2. 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类思维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

辩证法之所以能成为惟一最正确的科学方法，因为它本身并不是由任何人主观制定的一套公式，而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最普遍的规律。恩格斯说："辩证法的法则，是从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抽象出来的。因为辩证法的法则并不是别的东西，只是历史发展这两个方面以及思维本身发展的最普遍的法则。"（《自然辩证法》）它的规律，不论对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运动，或对于思想的运动都是应该一律有效的。（《反杜林论》）列宁也说辩证逻辑是"关于……世界全部具体内容及其认识之发展规律的学问，即是对于世界的认识的历史之总计、总和、结论。"（《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所以，辩证法方法在本质上就是唯物论的，和唯物论的认识论分不开的。因为它要求我们用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作为研究一

切事物的方法。或者如斯大林所说的：辩证法是要“按照生活的实际情形那样来加以考察。”(《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例如说，因为事物的相互联系是客观事物的最普遍的规律，所以辩证法就要求我们在联系中来研究事物。因为生活在实际上是不断运动变化着的，所以辩证法就要求我们在运动中来考察生活，而不要把它当做静止不变的东西来考察。

辩证法既是客观事物的最普遍的规律，所以它只能是从人类对于“世界历史之总计、总和、结论”中得来，而不能从任何人的偶然的主观构想中得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人类对于自然界和社会的认识发展的最高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辩证法的时候，一方面总结了全部人类认识的历史，同时又综合了当时自然科学的一切新的成果和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列宁和斯大林又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用自然科学的更高的成果和工人阶级斗争的新的经验来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辩证法学说。斯大林的关于语言学著作和关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就是综合了最近的科学成果和革命经验而使辩证法提高到更新的阶段。所以，不结合着自然科学的成果，特别是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不结合实际工作和自己的实际思想来研究，是不可能彻底了解唯物辩证法的。

3. 要了解唯物辩证法怎样是人类全部认识发展的最高成果，应该先研究恩格斯所提出的关于人类认识世界的历史的总的图画。

恩格斯指出在古代人类中间，由于对自然科学和历史材料的研究还不发展，就产生一种朴素的辩证法的世界观，它的特点，是在于“正确地抓住了现象的整个图画的一般性质，可是要解释整个现象所由构成的个别部分，则它实是不够的”，以后经过了中世

纪，特别是15世纪以后，自然科学以较大的速度前进，“自然界中个别部分的分析，各种自然现象和自然物品之分成一定门类，有机体内部的各种部分的解剖的研究”发展起来，“可是这种研究，同时也传给我们一种习惯，把自然物及自然现象，各别观察，把它们置于一般的大联系之外——不是从运动状态中去观察，而是从静止状态中去观察”，“这样的事物的见解，造成了数世纪来特殊的狭隘观点——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恩格斯指出，这种形而上学的狭隘的观点，到了19世纪，到了近代自然科学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成果之后，到了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局面之后就不能不被打破，而建立在人类认识的更高的发展基础上的新的辩证法的世界观就出现了。新的辩证法的世界观，最初是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发展起来。德国古典哲学由康德、经过费希特、谢林，到黑格尔而发展到它的顶点。

但黑格尔虽然提出了建立科学的辩证法世界观的任务，究竟没有解决这个任务。其原因，首先是由于他的阶级性——它是为德国当时的贵族统治者服务的——的限制，同时也因为他受到他的时代的知识水平的限制，除此以外，还因为他是唯心论者，他把辩证法曲解作供他用来创立绝对的唯心论体系的公式，而不能正确地把它看做是永远不断地推动着人类的认识向前进步的科学研究的武器。按照辩证法的法则来看，一切事物都是不断向前发展没有止境的，而人类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也当然是不断向前发展没有止境的，但依黑格尔的唯心论体系的要求，那么，似乎人类认识和世界的历史到了黑格尔的身上，就发展到顶点不能再进步了。黑格尔的体系，说明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反动性，说明这一派哲学的政治结论，为什么会为当时德国封建贵族统治的现状提供理论上

的辩解。黑格尔哲学的体系与辩证法的方法是根本矛盾的。

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解决了这个矛盾，他们打破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论体系，救出了辩证法的“合理的核心”，并赋予以真正科学的形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的，并且是根本相反的，因为黑格尔把思维过程看做现实的创造者，而马克思主义则把思维正确地看做现实的反映，这样，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才是惟一的真正科学的研究工具和工人阶级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4.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指出辩证法作为科学方法而又同时具有革命性的特点。说辩证法“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它的否定的理解；它对于每一个生成了的形态，都是在运动的流中，就它的暂时经过的方面去理解；它不由任何物受到威胁，就它的本质来说，便是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的这种革命的性质，在实践上“引起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代言人的烦恼与恐怖”，所以，辩证法不仅仅是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且是为工人阶级提供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的革命行动方法，是广大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的方法。学习辩证法，不仅只是为了要正确地认识世界，而且是为了改造世界。没有辩证法的方法，就很难保证革命实际行动的胜利。所以，辩证法只能为工人阶级服务，而不能为资产阶级服务，只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才能掌握唯物辩证法。一个人如果不克服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要想正确地掌握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因为个人主义和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是分不开的。

恩格斯在阐述辩证法的时候，具体地把它归结为三个基本法则：1. 从量到质从质到量的转化法则；2. 对立物互相渗透的法则；3. 否定之否定的法则。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的唯心论的错误，就在于“他不从自然和历史中把这些法则发现出来，而把这些法则当

做思维法则，安插在自然和历史上面”（《自然辩证法》）。恩格斯揭露了黑格尔对辩证法所给予的唯心论曲解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把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当做“他整个体系构成中的根本法则”（同上）。恩格斯指出辩证法思维方法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和形而上学的“是——是，否——否”的公式相反，而采取了“是——否，否——是”的方式来研究事物。

列宁在他的《哲学笔记》里进一步发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具体地揭示了辩证法的16个要素，并且着重指出对立统一法则的辩证法的核心，指出辩证法就是把运动看做对立的统一，“就是研究对象本身内部的矛盾的”。列宁辉煌地揭示了对立统一法则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理，即对立的同一性是相对的，而对立的斗争性则是绝对的。列宁的这些原理都是综合了自然科学的新的成就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更丰富的经验，而使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辩证法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斯大林的哲学著作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了一个系统严整的深刻的阐述，他指出辩证法唯物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他具体地阐明由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如何自然而然地要引导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他指明了辩证法唯物论哲学的每一个特征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斯大林把辩证法归结为四个基本特征：即1. 承认事物的互相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2. 承认一切事物是处在不断运动，不断变化，不断革新，不断发展的状态中；3. 承认发展是由量变进到质变；由简单进到复杂，由低级进到高级的过程；4. 承认发展过程的实在内容是对立面的斗争，发展过程是矛盾的揭露和经过对立面斗争的矛盾的解决过程。斯大林把否定之否定法则归结到辩证法的第三个特征里，这样就使我们更明确地认识到，黑

格尔之把这个法则作为创造唯心论体系的根本杠杆，是如何的荒谬。斯大林还把由量变到质变的特征中由旧质态到新质态转变的“爆发”的形式和逐渐过渡的形式加以区别。……正像列宁一样，斯大林在阐述辩证法时，是把自己时代的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和工人阶级的新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而使之进一步发展了。

5. 学习辩证法应该采用什么方法？总的来说，仍然是要依据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方针：必须结合着我们的思想和工作，结合着党的各种政策，来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归根结底，也就是要进一步贯彻反对主观主义。

斯大林的著作给我们做出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好的范例，他在阐述辩证法的每一特征时都指出了它对于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的重大意义，并且对形而上学给以针锋相对的批判。在阐述第一特征时，他指出要在实际斗争中不犯错误，就必须依据“一切都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这一个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就要反对非历史观点。在阐述第二个特征时，他就指出必须经常注意新生的东西和在实际行动中依据新生的力量，“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在阐述第三个特征的时候，就指出“为要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做革命家，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阐述第四个特征的时候，特别指出“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执行不调和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而不要执行调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政策，不要执行使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妥协主义政策。”

如果把学习辩证法和反对形而上学的任务归结为一个中心点，作为我们学习中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那就是如我们在前面一开始就提到的，要学会对于事物的矛盾运动进行具体的全面的分析，反对观察问题的片面性和表面性。毛泽东同志说：“研究问

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论的观点去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本质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片面性和表面性，是形而上学错误思想方法的病根。不反对思想的片面性和表面性，是不可能学会辩证法的。

辩证法要求我们观察事物必须注意到它与周围事物的联系，形而上学却使我们片面地把事物看做孤立的东西；辩证法要求我们在运动状态中来考察事物，形而上学却使我们片面地也是表面地在观察事物的现状时忘记了它们运动变化，不知道区别新生的东西和衰亡的东西。辩证法要求我们认识事物的量变和质变的有规律的联系，形而上学却使我们只注意到其中的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辩证法要求我们具体地揭发事物的内在矛盾，形而上学却使我们的认识停顿在事物的表面关系上。

毛泽东同志说：“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一切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都可以从片面性、表面性找到它的思想方法的最后根源。片面地强调必须满足工人的福利要求，不注意在人民政权的条件下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就是工会工作中经济主义的主观主义错误的来源，片面地看待新民主主义时期保护工商业的政策，而看不见我们将通过这个过渡时期，对资本主义施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最后把它消灭，这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观主义错误。在争取实现农业集体化这一个正确的目标时，如果不注意必须启发农民的自愿这一个原则，如果不注意对农民要进行逐步的耐心的教育工作这一个方面，就要犯急躁冒

进的主观主义错误。只注意到国际间的一些表面现象，不能具体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在实践中往往比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矛盾更为激烈，就要在国际问题的认识上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列宁说："哲学唯心论是把认识底诸特点、诸方面、诸限界之一片面地、夸大地、过度地发展（吹肿、胀大）为与物质和自然分离的、神化了的绝对"（《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正是这样的意思。

我们反对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因为它片面地夸大了书本知识的意义，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脱离；我们反对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因它是片面地夸大了局部经验的有效性，把它误认为普遍真理，不知道这种经验只在相关的局部条件之下才是妥当的。

在我们今天各方面的国家建设事业中，主观主义有两种主要的表现形式：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或者是片面地满足于现有的成绩，或者是过分夸大了客观的困难，这就产生保守主义的主观主义形式，片面地强调实现任务的必要，而不注意为着实现任务必须遵守一定的步骤和创设一定的条件，这就要犯急躁冒进的错误。我们今天必须用很大力量来反对这两种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为此目的，就必须克服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的片面性。

学习辩证法，首先就要结合着自己的工作和思想，结合着自己对于党的政策的认识，来具体地批判我们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的片面性、表面性，以便学会掌握辩证法的方法，克服主观主义，贯彻唯物主义。在联系实际联系自己的时候，又要注意到辩证法是普遍的规律，这种普遍规律在具体的事物，具体的工作和思想中有其具体的表现。应用辩证法，就是要以我们所学到的许多原理作为一般的指南，然后依据具体材料，对我们所联系的事

物、工作和思想进行具体的分析，弄清楚辩证法的原则是如何具体地在这里表现出来的。要反对不依据任何实际材料的具体分析，一般原则简单地套用到具体问题上，这是公式主义，这也是形而上学的片面性的表现，也是应该反对的。

二、辩证法的第一个基本特征：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依赖

1. 斯大林指出辩证法的第一个特征是把自然界看做统一的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各个现象是互相密切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而不是相反地如形而上学那样，把自然界看做彼此隔离，彼此孤立，彼此不相依赖的事物的偶然的堆积。

不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屡次指出辩证法必须研究事物的联系。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一书里把辩证法称做"当做联系的科学而和形而上学对立着展开来的辩证法"。斯大林的论述是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个思想，用最完整的形式把它表述出来。

2. 自然界的现象既然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那么，正如斯大林所说的那样，要了解任何现象，只有在它与周围事物的联系之中来加以考察才是可能的。只有把一种现象看做是受周围其他的事物所制约着的现象，才有可能看出它的意义，才可以看出它是有规律地而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否则，对于任何现象，如果形而上学地把它孤立起来观察，不把它看做与周围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那它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东西，就会成为没有意义的，好像是毫无规律地偶然出现的东西。有自然科学知识的人知道某些自然现象所因以产生和联系着的条件，就能够对这些现象有合理的理解，迷信的群众不懂得这些条件，见到某些自然界的特异的

变化，如日蚀、雷电等，就要大惊小怪。米丘林学派把生物的个体的变化发展看做是和它们的周围环境密切联系着的，因此就能发现控制生物变化的规律。摩尔根、魏斯曼等把生物的遗传性质看做是完全孤立的，是与生物的生存环境以至于生物个体没有什么有机联系的东西，因此错误地把物种的变化看做是永远不能理解的偶然现象。科学愈向前发展，愈更暴露形而上学的破产和辩证法的正确性，甚至自然科学本身，也在它的发展的较高的阶段，在十九世纪，成为“整理材料的科学，即研究这些事物发生和发展的过程，研究那把自然界这些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科学了”(恩格斯《费尔巴哈论》)。

3. 辩证法普遍适用于自然界，也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是互相密切地联系着而形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斯大林指出人类社会的生产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精神生活的物质生活条件，而社会的精神生活又反过来给社会物质生活的一定的影响。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里更阐明社会经济基础产生自己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反过来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基础这一种相互作用。因此，研究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方法，就是要努力揭发它的这些客观的内部联系。这就正如斯大林所说的：“在估计历史上每一个社会制度和每一个社会运动时，当然也不可如历史家常作的那样从‘永恒的正义’或其他某种成见出发，而是要从这个制度和这个社会运动所由产生并与其相联系的那些条件出发。”任何社会现象，不管是一种社会制度也好，或者是工人阶级的一种实际革命行动也好，都是与一定的条件联系着有规律地产生的现象，而决不会是毫无缘由地偶然产生的现象。认识了这些条件，就能理解这现象是为什么出现的。离开这些条件，就不可能理解它所以产生的真正意义。有些同志不

了解为什么我们既要反对宗教，又要承认信仰自由，既要消灭资产阶级，为什么又要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不了解为什么组织农民发展生产既是正确的政策，而在具体进行某些措施的时候又往往遭到农民的反对。这都是由于不了解这些政策和行动中联系着的条件的缘故。

斯大林曾用奴隶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作为例子,来说明辩证法第一个特征在人类社会生活上的应用的意义。指出奴隶制度的出现或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在过去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和合乎规律的现象,而就现代的条件来看,奴隶制度就是荒谬的现象，就苏联的条件来看，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反革命的要求。斯大林的这些指示，是需要我们结合实际工作来认真加以领会的。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在实际革命行动中能够无往而不胜利，其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它能够揭发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客观的联系，找出决定社会面貌的物质生活条件，能够依据每一种社会现象所由产生和与它联系着的条件来正确地理解它的意义和认识它的客观规律，同时也就能够发扬工人阶级的实际行动并给予正确的指导。毛泽东同志就是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阶级对立的具体情况等等条件出发,指出了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意义,指出了中国革命是广大人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指出革命胜利后即开始向社会主义逐渐过渡的规律，这样就为中国革命人民指示出一条正确的总路线，引导着人民由胜利走向胜利。机会主义者离开了中国的具体条件孤立地来考虑中国革命问题，因此就不能理解中国革命的意义，或者把中国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混同起来,放弃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走

进右倾投降主义的泥坑；或者是企图过早地实现社会主义，而采取“左”的冒险行动。

不仅仅对于革命的总的路线问题是依据革命的具体条件来解决，对于与总路线分不开的革命的每一个时间的问题和每一个具体政策问题，也是要依据辩证法这个事物互相联系的观点来考察，也即是要依据全局的观点，而不要仅仅就事论事的、片面孤立的观点来考察的。1927 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工农革命势力只在乡村中还保持着一些微小的根据地，如果只看到这些根据地的微小这一个片面的现象，而不会把这个现象与全国阶级斗争的总的形势联系起来加以观察，那么，对于这些微小根据地的重大意义，就不可能得到任何正确的理解。毛泽东分析了当时与中国革命相联系的各种条件，就正确地指出这些红色小点具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作用。在革命的各个时期里，党的政策有许多变化，例如土地政策，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土地革命政策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而到人民解放战争以后又转为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允许农民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而在全国胜利以后又改为暂时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变化，如果不联系着当时的条件来加以研究，那也是不能理解的。许多人在政策上犯错误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注意依据具体的条件来观察和处理问题。

斯大林把辩证法的第一个特征归结为这样一个原则：“一切都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辩证法要求我们依这个原则来对任何问题做具体的分析研究，反对孤立地、抽象地研究问题。不能离开一定的具体条件来判断下雨对于农业究竟好不好，不能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来抽象地断定某种社会制度，某种实际行动和某种政策是不是正确的。依据辩证法的这个原则来观察社会现象，斯

大林称之为历史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问题必须遵守的第一个观点。

4. 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者从来也没有把社会现象的研究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因为他们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方法，始终是形而上学的，他们不知道社会现象的客观的有机联系，不能揭发每一社会现象所由产生和与其联系着的条件，他们是从斯大林所指摘的什么“永恒的正义”或某种成见出发，把社会的变化归结为这种唯心论原则的偶然的发见，归结为偶然出现的某种人物的作用。按照这样的错误观点来看，那么，人类社会中就不可能找到任何规律，人类历史是完全由盲目的意志支配着的一篇不可理解的糊涂账。这样一种错误的看法，使有些资产阶级学者公开否认社会科学的存在的可能性。在现在，一切崇拜历史的偶然性和崇拜个人的非历史的观点，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反科学的唯心论体系的。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资产阶级学者就是不断地企图用这种形而上学的荒谬观点来与马克思主义斗争并向旧中国反动统治者效劳。就是在人民得到全国胜利以后，这种反动思想也是不断地用种种形式表现出来，力图造成思想上的混乱，阻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自然，资产阶级的非历史观点，归根结底还是要在历史规律面前碰得粉碎。一切违背着新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规律而想要把历史拉到旧民主主义道路上的企图，想要阻碍中国走向工业化的反动派的企图，终归是徒劳无益的。美帝国主义者不懂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亚洲民族已不再是可以随便欺侮的民族，结果是碰得头破血流。

5. 学习辩证法的第一个特征时，必须把它里面所包含的“一切都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原则作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领会党的政策和处理实际问题的指导方法，必须依据这原则

来检查自己的思想，反对自己思想方法中的形而上学倾向。要反对一种错误的了解：即一切事物普遍联系的规律，认为世界上任何两件事物之间都可以找到联系，因此荒谬地把不相干的事物也任意拉在一起。事物普遍联系的规律，是要求我们对于所要研究的对象，要找出与它有关的主要条件，作为我们理解它的根据。

正确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要单纯地从书本上死记住许多原理原则，而是要在学习每一个原理原则的时候，同时注意到这些原理原则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这样才能够领会这些原理原则的真正的意义，才能够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实质。当我们想要把某些原理原则应用到中国的实际革命行动中来时，就应该先问一问实际环境里是否具备着与这相当的条件，是否在具体条件上有什么区别。这就是说，不能够用公式主义的方法硬搬那些原理原则，而是应该依据具体条件使原理原则具体化，同时由于条件发生变化，甚至于要考虑用新的原理原则来代替旧的个别原理原则。斯大林曾指出恩格斯依据他的时代条件规定了一国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胜利和无产阶级应该要求民主共和国的个别原理，这些原理到了列宁的时代就为列宁所提出的新的原理所代替。在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下要使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与资产阶级进行生死的斗争，这一个原理在中国的条件下就由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对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而具体化了。所以必须学会把普遍的原理原则在具体条件下变为具体政策，才符合马克思辩证法的方法。

教条主义的错误，就是由于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孤立看待，把个别的原理原则当做无条件地可以到处硬搬的普遍原则。其实即使是最普遍的原则，它的实际表现也会依条件而变化的。由量变到质变是最普遍的哲学原则，但正如斯

大林所指出的，在不同的条件下，由旧质态和新质态的转化可以表现为爆发形式，也可以表现为逐渐过渡的形式。注意各种原理原则所依赖着的各种具体条件，这是反对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列主义的方法之一。

经验主义也是由于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无条件地普遍有效的真理，也是由于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孤立地看待经验的缘故。反对经验主义的方法，也是要注意到与每种经验联系着的条件。

党的各种政策，是依据一定的实际条件制定的，条件发生变化，政策也会随着变化，所以，要领会党的政策，必须同时注意与它联系着的条件。有些人对于某些政策的变化不能理解，例如说不能区别革命胜利前和革命胜利后的某些政策(如工会政策，农村政策等的不同）就是由于形而上学思想作怪的缘故。

在实际工作中来掌握政策的时候，更需要就有关的条件来作全盘的考虑。党的政策，包括总政策和各项具体政策，是依据一定时期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发展中比较一般的条件规定的，这就是说，党的政策是我们工作干部在解决实际工作任务时必须遵循和必须加以贯彻的原则，不能因为局部工作环境中某些一时的特殊情况或困难条件而有所动摇。但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如果不注意这些特殊情况和局部困难条件，不独立地进行一些具体工作来创造必要的条件和克服困难条件，也是不可能真正贯彻党的政策的，帮助农民改良农作法和改良工具以提高生产，是我们党的不可动摇的政策，在实际工作中不能以任何理由来对这样的政策表示消极。但如果在推行新农作法和新工具的时候不考虑如何使农民能够自愿地接受的条件，想用简单命令的方法来完成任务，那么，在实际上这样的任务还是完不成的。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掌握政策是需要与具体环境工作中的具体条件结合的。毛主席指

示我们要“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就包含着按照具体条件来贯彻政策的意思。

三、辩证法的第二个基本特征：从运动、变化和发展中看事物

1. 当我们把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作深入一步的研究时，就会发现事物的联系决不是存在于静止状态中，而是存在于不断地运动变化之中；事物相互联系的一种状态，不断地推移到另一种状态，没有任何停顿不变的时候。恩格斯说：“如果我们留意考察自然，人类社会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那么我们首先见到种种联系及交互作用之无限错综的图画，在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保持原来的性质、场所及状态，万物皆动皆变，皆生皆灭。”（《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斯大林说：“条件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是变化着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看见了辩证法的第二个特征。

斯大林把辩证法的第二个特征作了一个最完整的规定，并且深刻地指出了它对于无产阶级的实际行动的意义。他说：“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看做静止不动的状态，停顿不变的状态，而是看做不断运动，不断变化的状态，不断革新，不断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有某种东西在产生着和发展着，始终都有某种东西在败坏着和衰颓着。”又说：“在辩证法看来，最重要的并不是现时似乎坚固，但已开始衰亡的东西，而为那些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哪怕它现时还似乎是不坚固的东西，因为在辩证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

2. 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是辩证法——包括它的第二个特征，在自然研究方面不断战胜形而上学的历史。形而上学者把自

然界的事物看做一成不变的，而把变动看做只是表面的现象。过去的自然科学学者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把研究自然看做是为了要寻找自然界的各种永久不变的原素。这种看法在自然科学的各部门一步一步地破了产。康德、拉不勒斯的太阳系演化的思想打破了天体运动永远不变的神话，达尔文的进化论粉碎了物种一成不变的错误思想。形而上学一直到最近还挣扎着在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家中间寻找自己藏身的阵地，维尔和的细胞学说把细胞看成生物的一成不变的单位，摩尔根派的生物学把遗传的因素看做永久固定的东西，由于苏联的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形而上学的这些阵地也被摧毁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证明列宁所指出来的一个原理：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

3. 在社会的研究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形而上学否认变化发展的观点始终占着支配的地位。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者把资产阶级眼中的所谓“永恒的正义”看做是建立人类社会的根本原则，把资本看做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始终存在着的东西。中国过去有“天不变，道亦不变”，“天经地义”等等的形而上学思想。就是对辩证法的一般原理有突出贡献的古代哲学家，如中国的老子和西洋的赫拉克里泰，对于社会的看法也是把希望寄托在已经没落了的旧制度上。就现代来说，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把民族之间的对立看做好像是永远不变的，这也是用形而上学方法来看人类社会的一种表现，最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是法西斯的种族主义，把某些种族荒谬地看做天生的，永久应该支配其他民族的“优等种族”。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研究中贯彻了辩证法的方法，把社会看做不断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指出社会并不是依什么“永恒的正义”或永久不变的“天经地义”建立起来的，而是一个有规律的不断地产生新制度来代

替衰亡的旧制度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照耀之下，形而上学的荒诞无稽是原形毕露了；民族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社会共同体，民族与民族之间并没有存在着一个永久不变的界限。法西斯主义所依靠的不是什么天生的“优越种族”，恰恰相反地，它是表现着在腐朽没落过程中的帝国主义者垂死挣扎的最反动的制度。

斯大林说：“社会生活处在不间断的运动与发展的状态中。这是正确的：不能认为生活是什么不变的凝固的东西，它决不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它处在永久的运动中，永久的破坏与创造过程中。因此，生活中总是存在着新东西与旧东西，正在生长着的东西与正在死亡着的东西、革命的东西与反革命的东西。”（《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所指出来的人类生活的这个辩证法规律，是全部人类历史所证明了的，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全部阶级斗争经验，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经验所证明了的。

4. 既然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一切事物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发展变化过程之中，因此我们在研究任何事物的时候，就不应该把它当做一成不变的、静止的东西来考察，而应该从它的运动中来考察，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曾引用了一个俄国人的话，来证明他自己的辩证法。这个俄国人讲到马克思的方法的时候，说：对于马克思，“更重要的，是现象之变化的法则，发展的法则，由一形态到另一形态，由一种联系的次序，到另一种联系的次序的推移法则。”斯大林把辩证法方法的这个特征作了进一步具体的发挥，说：“我们已经看到生活处在不间断的运动中，因此我们应该从其运动中考察生活，并且提出问题：生活走向那里？我们已经看到生活是不断破坏与创造的图画，因而我们的义务是从其破坏与创造中来考察生活。并且提出问题：生活中什么破坏着与什么

创造着呢？”

把事物的现状当做一成不变的、静止的东西来考察，这是形而上学的方法；从事物的运动中来加以考察，从其破坏与创造中来加以考察，这是辩证法的方法。两种方法是完全相反的。由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看，一切事物似乎永远都是为它的现状所表现的那样，由辩证法的方法来看，事物的现状将要改变为另外的状态。这样由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看现在似乎还强大而实际上走向衰亡的东西，将被看成永远都会是这样强大的，现在似乎很软弱的新生的东西，好像永远都会是这样微弱的；由辩证法的方法来看，走向衰亡的东西，不管现在看起来多么强大，由于它自身已走向灭亡终归是要失败的，新生的东西，不管现在怎样软弱，由于它自己包含着强大生长力量，它终归是不可战胜的。

两种相反的方法得到的两种不同的结果。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与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一致的呢？当然，形而上学的看法是错误的，辩证法的看法是正确的。为什么？因为生活的实践证明前者是错误的，后者是正确的。资产阶级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最理想的、符合“永恒的正义”的制度，但实际生活驳倒了这个形而上学的看法，资本主义制度到现在已走向死亡；有些人曾经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看朝鲜战争，以为美帝国主义会要得到胜利，中朝人民的军队很难在战争中取胜，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免不了要灭亡，实际的斗争粉碎了这个形而上学的看法，外表很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竟在朝鲜战争中碰得头破血流，而新生的中朝人民军队得到了胜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经过这次战争反而更有光辉地屹立在世界上。所以，只有辩证法，只有从运动中，从其破坏与创造的过程中来观察事物的方法，才是惟一正确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者要用辩证法方法来观察事物，不仅仅因为它是惟一正确的科学方法，也因为它对于工人阶级的实际行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从运动中来观察事物的方法，使我们有可能在实际行动中找到正确的方向。辩证法认为最重要的是新生的东西。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用客观主义的态度来观察生活中什么在破坏着和什么在创造着。马克思对生活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着重地要找出新生的力量，并在实际行动中指靠着这个力量。因为新生的东西是不可战胜的，指靠着新生的力量，才可以得到胜利。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这个特点，使它自然而然地和无产阶级的立场结合起来，因为在现代社会上惟一具有无限的新生力量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辩证法指示我们只有指靠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彻底改造旧世界。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里这样讲：辩证法说“能够彻底进步的只有这个阶级……因此，我们应当服务于无产阶级，把自己的希望寄放在它身上”。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是最善于从运动中来观察事物的最高的模范，善于观察“生活走向那里”和“生活中什么破坏着什么创造着”的最高的模范，善于在事物中发现新生的东西和重视新生的东西的最高模范。1871 年巴黎公社在很短的时期内便失败了，尽管如此，马克思仍在公社的组织中看出这是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夜解决国家问题时就表现了它的重大作用，列宁决定以当时工农兵中间自发出现的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和这个思想不是没有关系的。而列宁的决定，正说明列宁也是善于从新生事物的萌芽中看出它的强大发展的力量。列宁在 1919 年看到后方工人自己首倡组织“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时，立即在他的《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指出：“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彻

底，更有决定意义的革命的开端，因为这是对自身的因循守旧，放荡行为，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对万恶资本主义所遗留给工农的这些积习的胜利。”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期间看见斯达哈诺夫运动刚刚开始，就指出“它是现代最有生命力而不可遏止的运动”。这种列宁对于“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的看法同样是应用辩证法方法的辉煌范例。斯大林从苏联最近出现的“换货”形式的农产品产品交换的萌芽中，看出这是为了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所应该采取的实际而有决定意义的办法。

毛泽东同志也是善于应用辩证法的方法从事物中发现新生力量的能手。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他根据当时中国阶级斗争的具体实际材料，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应用辩证法的光辉灿烂的文件。“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期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好得很”！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新生的农民运动热情的赞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对当时微小的农村根据地做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论断。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估计到我在第一个阶段将处于劣势，然而同时更注意到劣势中的变化，其中又包含向下的和向上的两种变化，“原来的劣势，经过第一阶段的消耗将更为严重”，这是向下的变化。“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这是向上的变化。“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

要表现在质上”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就指出我们可以指靠向上的新的量和质，说“它给了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

5. 学习辩证法的第二个特征，就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榜样，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榜样，在研究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必须认真地区别什么是新生的东西，什么是走向衰亡的东西，必须弄清楚某种研究对象是处在发展的什么阶段上，是有着向上的趋势，或者是正在走下坡路？在这样来看问题的时候，要同时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发现新生事物方面，一旦发现了新生的事物，就要把主要注意力用来考虑如何培植新生的事物，如何创造条件来促进它的向上发展。斯大林教导我们要对于新鲜事物经常保持敏锐的感觉，认为“丧失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这是个很严重而危险的缺点”。

不但要学会认识新生事物，而且要对于新生事物的力量具有信心。新生的事物一般地都有一种自发的信心。例如在朝鲜的我们的军队，就是如此。长期参加过革命工作的人，回想一下自己的过去，可以发现我们曾经在实际行动中不自觉地坚持了辩证法的原则，因为我们曾经在最困难的时候，在革命势力还微弱的时候仍然保持坚强的信心，相信自己是新生的力量，相信自己必然胜利。但是在革命胜利后有些人反而会失去了对新事物的敏锐感觉，这就是由于没有把辩证法作为自己看问题的自觉的方法，不能自始至终加以贯彻的缘故。学习辩证法，就要把这种观点自觉地运用到一切问题的研究中来。

如果不反对形而上学的把事物的现状看做静止不变的观点，就表面现象来看事物的片面观点，要想学会应用辩证法的运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看事物，是不可能的。因为，事物的表面现状，和它的内部的运动规律，看起来常常是不一致的，甚至于是相反

的，衰亡的东西就其表面现状看来往往似乎是强大的，而幼弱的新生力量在表面上很难看出它所蕴藏着的强大生长力量。生产运动中的先进工作方法，往往是从一些看起来不重要的零碎建设开始的，所以看问题决不应停止于表面现状，看见一种现象之后，要立即进一步思索它的更深的意义，这样才能够发现我们所要指靠的新生力量。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说："我们看事情必须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作为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这些话，是值得我们深刻地来加以吟味的。

但也有另一种情形：有时候新生事物的力量已经有了表现，而人们还是不加以注意。就过去革命时期的事例来说，湖南农民运动中已经出现了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许多奇事"，并且表现得"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社会上许多人却不了解它的新生的意义，或者说是"过分"，甚至于说"糟得很"！就新中国建设事业中的事例来说，有些先进经验，已经表现了它的优越性，甚至于已经由领导方面加以肯定，并决定加以推广了，仍往往有个别生产部门不肯接受这些经验，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看问题的表面性的问题，而是保守主义思想作怪的问题了。

所以，保守主义思想，也是阻碍我们认识新鲜事物的一种反动的力量，保守主义思想也是一种形而上学思想，它把某些过去的旧的成就看做不可动摇的。不反对保守主义，也不可能学会掌握辩证法的第二个特征。有教条主义的保守主义，革命工作者拘守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个别原理原则，在新事物已出现的情况下也不敢用新的原理原则来代替旧的原理原则。旧技术人员拘守着欧美学来的一套原理，拒绝接受苏联先进经验，就是教条主义的保守主义。有经验主义的保守主义，拘于自己的旧的经验，满足于

现有的成就，因此也就看不见新鲜事物的生长，这是经验主义的保守主义。要学会掌握辩证法的第二个特征，必须有反对保守主义的勇气。保守主义往往会形成一种阻碍进步的环境势力，我们必须有打破这种势力的勇气，否则是不能反对保守主义的。

为着要学会善于发现新生的事物，就必须有向群众学习的精神，必须用很大的注意力来注视群众中的任何微小的新的经验和新的创造。新生事物的萌芽，都是首先在群众中自发地产生的，领导者艺术是否高妙，就在于是否会发见这些萌芽，然后自觉地有系统地加以培育，使它顺利地发展和推广开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是这样做的。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做领导工作必须懂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原则，这些原则正是符合于辩证法的第二个特征的。在今天的国家建设事业中推广先进经验，就需要这些原则。

自然，也有一种情形，即是新生事物的发现，是由于学习别的国家的先进经验而得到启发的。十月革命使我们中国人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苏联先进经验对我们国家事业给予强大帮助，就是明证。但是，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终归是要与本国实际条件结合的，而结合的步骤，仍然是依据这些经验的指导，首先在群众中创造出个别的典型，然后加以推广。不注意这个原则，是难免要犯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或急躁冒进的错误的。

四、辩证法的第三个基本特征：发展是由量变进到根本的质变

1. 如果我们把辩证法的第二个特征作更深一步研究，我们就会注意到：虽然事物的发展中不断地有破坏和创造，不断地有着衰亡的东西或新生的东西，那么不论逻辑上事实上都要得到一个

结论，即事物发展决不会是经过一个时期又回到原来的地位，决不会是循环式的，决不会是过去事物的简单的重复，而是由旧的质态到新的质态，由简单到复杂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的运动，上升的运动。由此，我们就看到了辩证法的第三个特征。斯大林说："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发展过程看做什么简单增长的过程，而是看做由不显露的细小的数变进到显露的变，进到根本的变，进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质变并不是逐渐发生，而是迅速发生，即表现为由一个状态突变为另一个状态；并不是偶然发生，而是规律式地发生的，即是由许多不明显的逐渐的数变积累而引起的结果。"

辩证法的这个特征告诉我们：事物的运动变化有着两种最基本的形式，量变的形式和质变的形式。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把这两种形式看做绝对对立而没有任何联系的。不能把量变看做与质完全无关的永远只是数量的增减，不会到一定程度引起突然的质变，还不应该把质变看做与量变毫无关系的偶然的变化，相反地，量变和质变是有机地联系着的，事物的量变在一定的程度内可以不引起质的显著的变化，这时它的质是相对地安定的，这种质的相对安定性说明为什么运动中有相对的静止。但是，质的安定性究竟是相对的，因此在量的变化中，已在准备着质的变化的条件，所以到一定的程度，量变终归在引起质的根本变化，这时相对的静止就被破坏，而发生突然的根本的变革。同时，质变对量变也有密切关系。因为在新的质发生之后，这新的质又为量变开辟更进一步的发展的广阔园地。

2. 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中，曾有关于由量变进到质变规律的认识的萌芽。中国有"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穷则变，变则通"等说法，虽然很不完全，但多少反映了辩证法的这一个特

征。西洋古代也有类似的思想，西洋古代原子论者认为原子的不同大小和重量规定着事物的质，也多少包含着辩证法的这个因素。近代科学的发展日愈证明这个规律的普遍性，黑格尔在唯心论的神秘形式之下叙述辩证法时，已经引用了很多自然界中的由量变到质变的例子。恩格斯综合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果，在他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里，以巨量科学材料——物理化学的材料——证明了辩证法的这一个特征正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他说："自然中只有由物质或运动（即能）的数量上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引起质量上的变化——这对于任何个别场合都是正确的。"（《自然辩证法》）

3. 马克思、恩格斯把唯物辩证法应用来观察人类社会生活，使人类社会的研究第一次进入科学的领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指明社会不但也是运动变化的过程，由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过程，而且新制度的产生，也是经过旧制度中的量的变化有规律地实现的。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的研究中，也是证明了这个规律的。"整个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一章，说到协作，分工及手工工厂，机器生产及大工业等等领域上的无数场合，在这些场合上，量的变化，变更事物的质，反过来质的变化，也变更它们的量。"（《反杜林论》）

斯大林以无比的明确性指出了这个法则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行动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指出了这个法则在社会运动中的具体表现也就是指出了社会运动中的"双重形式：进化的与革命的。""当进步分子自发地继续着自己的日常工作并且把小的量的变化输入旧秩序的时候，运动就是进化的""当同样的分子联合起来，渗透着统一的思想并且冲向敌人的营垒，以便根本消灭旧秩序并且把质的变化输入生活中间，建立新秩序的时候，运动就是革命的。"

"进化准备革命并给革命造成基地,而革命完成进化并促进它的进一步工作。"(《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斯大林对于辩证法的这个法则的一个新的、极重大的、极有实际意义的贡献，就是他把根据语言学的科学研究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指出由旧质态到新质态的转变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形式。爆发式的和逐渐过渡式的。在社会分裂为敌对阶级而反动阶级又居于统治的地位的时候，质的变化就必然是爆发式。社会并未分裂为敌对的阶级，而工人阶级又掌握国家的领导权，可以从上而下地推动变革的时候,社会的质变就可能是逐渐过渡式的。

毛泽东同志也是最善于应用由量变到质变的这个法则来研究中国社会生活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运动变化过程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所指示的各阶级的政治上的质的不同，是以他们的经济地位上的量的不同作为一定的条件的。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里论到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如何由退却、相持阶段进到反攻阶段的分析中，表现着最辉煌的辩证法的范例。在指出经过相持阶段"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那时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国大体上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而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阶段。应该重复地指出，所谓变劣势为优势和完成反攻准备，是包括中国自己力量的增长，日本困难的增长和国际援助的增长在内的，总合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国的优势，完成反攻的准备"。毛泽东同志在1938 年的这些预言，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得到了证实，这也就是说明了辩证法方法是具有着多么坚强的科学的和革命的力量。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刚才接近胜利时，就曾指出在解决新中国的各项问题的时候，必须从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情况出发，也

就是必须注意到当时中国工业生产只占百分之十的比重而小生产则占百分之九十的情况。毛泽东同志根据这种情况，就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逐步实现工业化和社会的根本改造，达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由量变到质变的法则在实际革命行动中的应用的范例。

在实际工作中，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也到处有着它的表现。例如我们的税收政策，可以因数量控制的不同而表现不同的性质，对私人资本征税过重，可以失去利用资本主义的作用，如果征税过轻，又可能失去限制资本主义的作用，两种情况都和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原则有出入，只有控制在一定数量的限界内，才符合限制、利用和改造资本主义的精神。在农村征粮，在一定限度内可以起鼓励生产的作用，超过一定限度又可能起阻碍生产情绪的作用。在土地改革中限制打击面在百分之十的人口数以内，超过了这个控制数字就可能超出反封建的意义了。

4. 资产阶级学者在量变和质变的关系的问题上，采取种种的形式来坚持形而上学的谬误观点，反对辩证法。资产阶级哲学的最进步唯物论时期，基本上也是用形而上学观点来看物质的运动，即认为只有数量的增减和位置的移动是真实的运动，而不承认物质有真正的质变。

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出现以后，不论自然科学的成果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情况都使得资产阶级学者无法正面否认事物的运动变化，这时形而上学者就采取另外的两种形式来反对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或者是采取庸俗进化论的形式，即认为事物的变化只应看做是连续不断的细微的变化，而不承认事物的突变，不承认有迅速发生的激烈变化，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有着这种因素，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思想就是庸俗进化论思想方法在政治上的表现。

或者是把突变归结为偶然的现象，否认质的变化是有规律地由量变准备起来的，否认这种规律是可以认识的，生物学上的摩尔根学派就是这样来解释物种的变化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必做政治上的各种具体的“细小工作”，也可以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就是这一种形而上学的表现。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推翻了资产阶级科学家的形而上学谬说，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粉碎了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反辩证法的反动思想。列宁曾驳斥过这样两种形而上学的反动思想，说：“修正主义者认为所有一切说明‘突变’，说明工人运动与旧社会根本对立的议论，都是一种空话。他们认为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排斥‘细小工作’，特别是反对利用国会讲台。其实，后一策略就是等候‘伟大日子’到来，而不善于收集那些造成这种伟大事变的力量。前后两者都阻碍着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即阻碍着把工人团结成为一个规模巨大，力量坚强，动作灵活，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好好动作的组织，团结成为充满阶级斗争精神，明白认识本身目标，受着真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的组织。”

割断量变和质变的联系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在工人阶级革命队伍内部也常常表现着它的影响，并造成各种“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左”的冒险主义的思想方法，就在于只看见工作中的质变的任务之一面，而忽视要达到根本的质变，必须在许多日常的具体工作中进行一定的量的积累，因此在自己的力量准备尚未成熟时，就想要举行进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左”的领导的错误，就是这种形而上学思想的典型。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就在于忽视质的根本变化之必要，在工作的准备已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仍没有决心和勇气举行进攻。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就属于这种性质。新中国建设工作中的急躁冒

进和保守主义的两种偏向，也有着同样性质的形而上学的根源。

5. 学习辩证法的第三个特征，必须根据它所包含的方法原理，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改造我们的思想方法，辩证法的这个特征首先教导我们：要以革命的精神来对待我们的工作，对事物要有根本改造的勇气，要能够在找到适当时机的时候就敢于向旧事物进行突击。反对安于现状，反对改良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态度，反对在需要突击的时候迟疑不前。因为事物的前进运动，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是经过由量的积累达到质的根本改变，达到突变来实现的。斯大林说：

"既然由缓慢的量变进到迅速的突然的质变是发展的规律，那末由被压迫阶级所实行的革命的变革，当然也就是完全自然而必不可免的现象了。"

"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做革命家，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

因此，学习辩证法的第三个特征，首先就要依据斯大林所指示的这些原则，来检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检查我们在解决各项实际问题的时候，是否具有了一个革命家所应该具有的根本改造事物的精神了——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注意到"质变……并不是偶然发生，而是规律式地发生的，即由许多不明显的逐渐的数的积累而引起的结果。"我们也应该检查一下我们对待实际工作，处理实际问题的方法，是否符合了这个"规律"。我们是否在工作中能够具体地考虑到，要根本改造一种事物，要完成一件任务，需要事先作许多能够"数变"的准备工作，需要事先搜集力量，积蓄力量，然后依照力量准备的程度，有规律式地引导到事情的质的变化？我们的工作如果符合这个规律，那我们就是掌握了科学的方法。我们

的工作如果违背了这个规律，就难免要犯急躁冒进的错误。

反对割断量变和质变的两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错误：或者是安于工作中的数量的缓慢变化而没有根本改造和突击旧事物的勇气；或者空谈革命的根本改造，不耐烦做数量积累的细小工作。把量变进到质变的科学规律具体地实现为我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一切问题上要学会掌握两种变化形式的联系。

当我们在工作中需要解决质变的任务时，就必须联系着考虑如何进行量的准备的任务，以免犯急躁冒进、命令主义的错误，例如说要实现组织农村合作互助的任务，就必须考虑如何调查情况，确定计划，团结积极分子，创造典型，通过典型来教育农民等一系列的量的准备工作。

当我们在工作需要实现某种量变的任务时，必须联系着考虑它的质的基础。例如说在考虑工业生产中增产节约的量的任务时，必须根据改善经营管理，改进技术，提高产品的质量水平，保证原材料及销售市场等等质的条件来规定恰当的数字，反对以保守的态度作过低的估计，也反对用冒进的态度提出过高的任务，数字的控制既要做到尽可能挖掘新的潜力，又要保证质量避免粗制滥造。考虑数量的任务必须以质量作基础，同时正确地控制数量又是保证质量的必要条件。前举的税收以及土改的例子，就是证明。学习辩证法的第三特征，也要就我们的工作和思想来检查一下，我们的过去的工作和思想，是否符合这一个原则？

五、辩证法的第四个基本特征：发展是事物内部对立面的斗争

1. 当我们看到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过程，而一

切发展都是由量变进到质变，由低级进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不断前进和上升的运动时，如果我们还要对事情作更深入一步的理解，就一定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它们的泉源是什么？辩证法的第四个特征，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发展就是事物自身的矛盾运动，发展就是互相对立方面的斗争。

恩格斯说："我们如果把事物看做静止状态，看做没有生命的，各自孤立的，互相并立或前后相继的东西，那么我们在其中就遇不到什么矛盾……当我们在其运动中、变化中、生命中、交互作用中来观察事物时……我们立刻陷于矛盾的领域中。运动本身就是矛盾；就是单纯的机械的移动，也只能进行得这样，使各该物体于同一瞬间，处在一个地方，又处在别个地方，它是在这个地方，又不是在这个地方。这种矛盾的经常产生及其同时的解决，正形成了运动。"

所以，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根本相反的。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内部的矛盾，而形而上学则不承认事物内部矛盾的存在。只有承认事物具有内部矛盾的辩证法，才能说明事物运动、发展和变化的泉源。由量变进到质变的泉源。

列宁说："两种基本的（或者两种可能的？或者两种在历史上看到的？）发展（进化）观乃是：发展被看做减少和增加，被看做重复，以及发展被看做对立的统一（统一物之分解为两种互相排斥的对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第一种运动观中，自己运动，它的动力，它的源泉，它的动因，被漠视了（或者这个源泉被移置到外部——神、主体等等）。在第二种运动观中，主要的注意，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源泉上，第一种运动观是死的、无生气的、干枯的。第二种运动观是活生生的。只有第二种运动

观才提供理解一切存在物底‘自己运动’的钥匙，只有它才提供理解‘飞跃’、‘连续性中断’、‘向对立的转化’、旧的东西的消灭与新的东西的发生的钥匙。”列宁的这段话，深刻地指明了：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是从事物的内部矛盾中找到运动、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的。

当马克思讲到辩证法是要“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着它的否定的理解，它的必然消灭的理解”的时候，也是指的同样的意思。

所以，照辩证法看来，事物的运动，乃是事物的“自己运动”，而事物自己运动的根源，是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所以认识了事物的内部矛盾，就找到了理解事物的发生与消灭的钥匙，理解由量变进到质变的钥匙，因此，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对立统一法则，就是辩证法的核心。辩证法的第四个特征，也是它的最根本的特征。

斯大林给辩证法的第四个特征下了一个最简明最完整的定义：

“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所持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对象或自然界的现象，是含有内在的矛盾的，因为所有这些对象或现象，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其过去和将来，都有其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而这些对立方面的斗争，旧东西与新东西间的斗争，衰亡着的东西和产生着的东西间的斗争，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间的斗争，便是发展过程底实在内容，由量变进到质变这一过程底内容。

“因此，辩证法认为，低级发展到高级的过程，并不是经过各现象协和的开展，而是经过各现象或各对象所固有矛盾底揭露，经过在这些矛盾基础上动作的互相对立趋势的斗争。”

斯大林的定义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对立统一法则的思想，指出发展的过程，由量变进到质变的过程，在实质上就是事物内部矛盾的揭露和在这矛盾基础上作用着的对立趋势的斗争的过程。

2. 对立统一法则既是辩证法的核心，所以，辩证法的最根本方法，就是要研究事物的矛盾，就是要分析事物的矛盾，研究如何通过对立趋势的斗争来解决矛盾。列宁说："辩证法按其本义来说，便是研究对象自身内部矛盾的。"又说："统一物分解为二及对其各矛盾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本质"（《哲学笔记》）。恩格斯指出如果我们一旦在运动中、变化中、生命中、交互作用中来观察事物时，就要遇到矛盾，要理解单纯的机械运动，就需要了解它的矛盾，而"物质的更高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更甚地包含着这种矛盾。……生命首先就在于：该一物体在每一瞬间是这样，同时又是别样。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及现象本身中的不绝由自己提出并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停止之时，生命亦归于停止，于是死就到来。……"（《反杜林论》）

在分析矛盾时要注意的是：矛盾是统一的事物自身内部的矛盾，因此事物的矛盾所包含的对立方面，是有机地联系着的，不是偶然地从外部拼凑在一起的。磁石的南北两极是对立的，但这两极又是互相依赖着，离开了一方面，另一方面就不存在。从外部偶然拼凑在一起的两件事物，就不可能成为矛盾，所以，任意拉扯来两件事物，说它们中间有矛盾，是不对的。

在以搜集材料为主要任务的时期，自然科学受到形而上学的影响，不注意把研究自然界的矛盾作为自己的任务，反而以为是应该研究某些自然界的没有矛盾的原素。但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史证明这种观点的错误，自然科学的每一部门都是要研究它的对

象的一定的特殊矛盾的。列宁曾举了如下的一些简单的例子：

"在数学中：十与一。微分与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与反作用。

在物理学中：阳电与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与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列宁从这些例子做出结论，说："对立的同一（它们的统一……）乃是确认（发现）自然（精神与社会两者也在内）的一切现象与过程的矛盾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倾向。"自然科学的每一步的向前发展都证明列宁的结论的正确性。生物学的新成就证明真理不在摩尔根学派——把研究的中心任务看做是要找出那没有矛盾的永远不变的遗传基因上的学派——方面，而是在米丘林、李森科派——把研究重心放在生物在与其环境的相互联系中所表现的遗传与变异这两个对立方面的有规律的矛盾运动上的学派。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科学，正是分析脑神经的条件反射作用中所包含着的兴奋与制止这两种对立倾向的矛盾运动的科学。

3. 马克思主义者把唯物辩证法应用来研究人类的社会生活、社会历史，就是通过社会各方面现象的自身矛盾的揭露，来理解社会是如何自己发展，如何由于内部对立势力（新的与旧的，正在生长的和走向衰亡的等等）的斗争而由一个制度过渡到另一个新的制度。由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决定社会面貌的条件，所以马克思主义者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社会历史的方法，是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矛盾分析出发，进而分析社会的精神生活、社会的思想、理论及政治制度等等的矛盾，以及社会的物质生活与社会的思想、理论等等的矛盾。研究这些矛盾的运动，研究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社会的各种对立势力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应用，把全部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原因、动力，用科学的精密性揭发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指出原始公社以后直到现代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由旧社会向新社会的过渡是进步阶级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结果。马克思的《资本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的生产与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的矛盾以及由这基本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各方面的矛盾，如个别企业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商品生产过多，而千百万劳动者却挨饿失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自己内部产生出来的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推动力。

斯大林把辩证法第四个特征在社会上的应用，归结为以下的一些原则：

“既然发展过程是经过内在矛盾的揭露，是经过基于这些矛盾的循此对立势力冲突来克服这些矛盾而进行的，那么无产阶级底阶级斗争，当然也就是完全自然而然不可免的现象了。

“由此可见，不要掩饰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各种矛盾，而是要暴露和揭开这些矛盾，不是要熄灭阶级斗争，而是要把斗争进行到底。

“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进行不调和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而不要进行调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政策，不要进行使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妥协政策。”

斯大林所规定的这些原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斗争经验，反对修正主义、改良主义的斗争经验的总结，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与资本主义的

斗争经验的总结。它是工人阶级在各个国家进行革命运动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南针。

列宁论到矛盾的对立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时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斯大林在上面所规定的一些原则，就是列宁所说的这些一般原理的具体应用。

斯大林对于辩证法第四个特征的重大贡献，是指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以及阶级社会的矛盾的原则区别。他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是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但是，"在领导机关的正确政策下，这些矛盾就不会变成对立，而这样也就不会弄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斯大林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对于新旧事物的矛盾，可以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斗争形式，来加以揭露和克服，借此来推动社会的进步。

毛泽东同志依据列宁的思想，指出对立统一法则作为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认为唯物辩证法主要地就是要揭露和克服事物的矛盾。他说："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的方法。"毛泽东同志把这个方法贯彻在他的一切著作和他的领导工作中。《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具体揭露中国社会矛盾，并指出如何"分清敌友"，如何进行斗争克服矛盾的方法的范例之一。在这篇文章里，他分析了各阶级在不同革命运动中的不同的地位和表现，指出应该在无产阶级领

导下联合"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阶级。他并根据中产阶级对革命的两面态度指出了应该对它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斗争方法。由于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阶级矛盾作了这样深刻而具体的分析，所以就能够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奠定了党的长时期一般的斗争策略。

4. 形而上学否认事物的内部矛盾，否认事物自己运动的内在源泉，因此就把事物运动发展的源泉归诸于外部力量的作用。例如机械唯物论就是这样解释运动的原因的。这种错误思想叫做"外因论"。有这种思想的人，尽管他承认客观世界的物质性，尽管他有要做一个唯物者的愿望，但他的思想的逻辑的结论是要走向唯心论和宗教世界观的方向去的。因为如果认为物体自己本身没有内在的运动的源泉那就必然要把这个最后的运动源泉归到物质以外的精神力量——也就是列宁说的"神、变体"——上面去了。牛顿是一代的科学家，由于形而上学思想的限制，不能不把神的"最新的冲击"看做一切天体运动的力的根源。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者都用外部力量的作用来说明社会历史变化的原因。有从地理条件中找原因的，有从生物条件中（人口、种族等）找原因的，有把原因归诸于偶然出现的英雄伟人或天才思想的力量的，中国曾有过一种"外铄论"的思想，把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切变化原因单纯归之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特别是把中国的进步也看做是帝国主义之赐，这是一种买办阶级的反动思想。总之，形而上学都不能从社会的内在矛盾中找出有规律的社会历史发展的源泉。

辩证法并不忽视外部原因对于事物的运动、发展、变化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外部原因即便起着很大的作用，也始终不能成为运动的源泉，它必须通过内部的矛盾运动，才能发生它的作用。地

大物博的地理条件对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是具有非常良好的作用的，但只有在新中国才能发挥它的良好作用，而在旧中国则不能，所以，新中国建设事业发展的源泉，归根结底是存在于新中国的新的社会阶级关系——人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成了国家主人这一种关系中。

在社会阶级矛盾已不容掩饰的情形下，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思想又以另外的形式出现，不是公开地根本否认社会的阶级矛盾，而是极力把矛盾的意义减低，强调对立的同一性，抹煞对立的斗争性，为阶级协调的思想奠立方法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死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许多机会主义“理论”，都是以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来为资产阶级效劳的，英国工党分子在目前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已在苏联、中国、及其他各人民民主国家中成为具体的胜利的事实的条件下，还硬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即阶级社会发展的内在源泉的学说是已经陈旧了，不能接受了，这一类谬论，列宁早已从哲学上提出斗争的绝对性的原理来加以驳斥了。

这一类阶级协调思想，在中国的资产阶级中也是经常散布着的，中国没有阶级，只有大贫小贫的说法就是一种。1920 年，当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夜，中国的资产阶级学术界曾经把英国的罗素请到中国来，宣传阶级协调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在长沙演讲中他提出“反对劳农专政，采用教育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致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的主张，曾遭到毛泽东同志的驳斥，说这是“事实上办不到”。因为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而这些都在统治者手中，不在工人手中。所以，形而上学是与生活的事实相抵触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协调的形而上学观点，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从陈独秀的

机会主义起，党内的右倾的错误一般都可以从在统一中忘了斗这一个形而上学思想方法中找到根源，这种右倾的错误思想在中国人民胜利后，还不断地有所显露。有些干部在工作中忘记分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武训传中所表现的阶级投降义思想等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5. 学习辩证法的第四个特征，就是要学会善于揭露事物的矛盾，善于根据分析的结果采取一定的斗争方法来解决矛盾。这个原则应用到我们的学习当中，主要地就是要善于揭露我们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中所表现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矛盾，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主观主义与唯物主义、历史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上的矛盾，以及分散主义与集体领导的矛盾等等，并善于通过思想斗争、即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矛盾。为此目的，就要结合着自己的工作、思想，从两个方面反对形而上学的倾向：（1）要学会善于分析矛盾，就要反对忽视矛盾、掩盖矛盾或不能认真分析矛盾，反对把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推到事物外部的倾向。（2）要学会善于采取一定的方法来解决矛盾，就要一方面反对阶级协调的倾向，反对轻视斗争或没有决心和勇气坚持斗争到底的倾向，另一方面又反对在斗争中的主观主义，即不考虑按照具体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方法和步骤。

（1）忽视矛盾和掩盖矛盾的情形，在我们观察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大的形势的时候，一般说来，是比较少的。没有人会忽视或掩盖我们和帝国主义者及其他反动派的矛盾，但在具体工作中，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就常有忽视矛盾，有意无意地掩盖矛盾的情况。例如说在具体工作中的右倾思想，在全国胜利后对敌人的阴谋活动没有警惕心，与资产阶级合作中不注意“糖衣炮弹”的

生攻等。对于自己工作中的成绩与缺点的矛盾，最容易发生掩盖的情形，甚至于由于骄傲自满而故意加以掩盖的情形，这就是说，故意夸大成绩和掩盖缺点，拒绝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克服缺点、解决矛盾。苏联文学界曾批评过一种只许描写成绩，不许反映缺点的错误，这种错误的文艺观点的来源，正是在于否认矛盾，正是由于这一个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片面性。有些人当自己的错误受到批评的时候，就强调客观困难是发生错误的主要原因，而不肯承认主要原因是由于自己的工作错误，是由于自己不善于克服各种困难，这也是一种外因论，一种反辩证法的掩饰矛盾的思想。以上错误思想，都是违背了辩证法的“是—否”的原则的。

不能认真分析矛盾因而不能如实地认识矛盾、也不能正确地解决矛盾的情形，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实际思想中比较多。这种情形下，人们好像也承认辩证法的，但在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应用唯物辩证法。具体事物中的矛盾是很复杂的，只粗粗一望而不加以认真分析，那么最多只能看见矛盾的大体的形相，而且常常是错误的印象而不能深刻地确切地了解矛盾的内容，因此也不可能解决矛盾，毛主席指出观察问题忌带表面性。他所说的表面性，就是指观察矛盾的这种粗枝大叶的态度。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里说，“什么是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那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那里就有问题。……大略的调查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这也是说必须深入分析矛盾，才能掌握辩证法。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批评某些同志对于国际间的矛盾的表面的看法，那些同志以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更激烈，因此结论说，资本

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已不再是不可避免了。斯大林说“他们只看见在表面上闪现着的外表现象，而没有看见那些暂时虽还未明显地发生作用，但终究会决定事变进程的潜在力量。”斯大林指出了一些理论上的根据和事实上的证据，指出他们的错误，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更为激烈。从理论上说来，这当然是对的。”可是，“资本主义国家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间的矛盾更为激烈。”斯大林所批评的，正是一种不能认真地分析矛盾因而不能深刻地确切地认识矛盾的例子。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不能认真分析矛盾的例子可以找到很多，如在土地改革中因为不能正确分析阶级而发生工作上的偏差，对资产阶级的关系或“左”或右，不能正确掌握又斗争又团结的政策，抗日战争前在民族危机前面不知道应该用主要力量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经济建设中不知道应该把重工业建设作为重点，在各种工作中不知道抓一个时期的主要矛盾所在作为工作的主要环节等等，都是和对矛盾认识的表面性分不开的。在改正这个缺点，必须对矛盾作全面的、深刻的分析。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有详细的阐述，我们在这里不讲了。

(2) 要学会通过一定的斗争方法来解决矛盾。首先是要领会对立斗争的绝对性的原则；即是说：要认识到只有通过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斗争才能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才能推动事物的向前发展，才能保证由量变进到质变的上升运动。因此要在事物的矛盾中依靠新的东西，反对旧的东西。要反对那种对旧事物没有斗争勇气甚至于留恋旧事物的落后思想和行为。对旧事物没有斗争勇气的错误思想，在政治上表现为阶级协调主义，在实际工作中表现为尾巴主义保守主义等等，在国家建设事业中树立新的共产主

义的劳动态度，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的态度，反对破坏劳动纪律，反对偷懒取巧等等，也是符合于辩证法的原则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坚持斗争的原则之下，又要注意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依据矛盾的不同的性质，依据同一矛盾的所处的不同的条件，可以采取、而且也应该采取不同的斗争方法。矛盾的性质有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的区别，因而斗争的形式也有冲突的形式与非冲突的形式的区别。对抗性的矛盾的斗争，在不同条件下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不能够依据矛盾的性质和所处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也不可能得到斗争的胜利和矛盾的解决，这在实际工作中已是有许多例子可以举出来的。但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的了解，也仍然需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这里就不再讲下去了。

西洋哲学史*

(1953.9)

第一次讲课

今天讲哲学史。我们原准备讲一次，有些同志希望多讲一点，现在准备讲三次，内容多一些，但再不能多讲了，因为我们学习哲学史不是主课，讲多了反而不好。哲学史上人名、地名非常多，很容易忘记，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正式的参考书，眼前所有的书，一般都是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所写的旧书。没有一本比较好的书，有一本苏联的《西洋哲学史简编》，以前还觉得这是一本好书，后来苏联专家说，这本书也不好，所以就不指定参考书了。我今天讲了以后，希望大家提出一些意见。

一、怎样学习西洋哲学史

我主要是讲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西洋哲学发展史，附带涉及到一些中国哲学问题。原因就是西洋哲学史现在对我们有用处，对

---

* 1953年9月，艾思奇应学员的请求，按照哲学教学计划，为马列学院七、八、九班讲授了西洋哲学史。据我们所知，艾思奇讲哲学史只讲过这一次，在其他班次均未讲过。这里是按速记稿整理，只作了一些文字加工、引文核对，几乎没有什么删节，没有增添任何内容。

我们的实际意义比较大一点。

有人说，中国人要学中国哲学史，这个道理一般是对的，但也要看具体情况，就是今天我们的学习更需要哪一样知识。今天我们的学习要看一些马、恩、列、斯的书，里面涉及到很多问题，多半都是西洋的，因此，为了帮助大家学习经典著作，现在讲一讲西洋哲学史比较好，对我们帮助比较大。有许多在马、恩、列、斯著作中提到的问题，人名、学派，我们过去不了解，学一点西洋哲学史，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疑难问题。我们今天学西洋哲学史，并不是像一些人“言必称希腊”，还是为了能够解决我们今天学习上的问题。

其次，关于中国哲学史，我也没系统地研究过，我也不能多讲。中国哲学史本来也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我是没有什么研究，就是有研究的人，也是有很多问题讲不清楚，因此就不容易讲。我们在讲的过程中，只是简单地提一提中国哲学史。

我们讲哲学史，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讲西洋哲学史是为了了解哲学史的规律是怎样的。关于哲学史发展的总的规律，日丹诺夫在西欧哲学史讨论会上的发言，他讲的很清楚。他说，哲学史是科学唯物论及其规律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唯物论是与唯心论进行斗争的历史。不管是西方，或者是中国，哲学史发展总的规律都是这样。

我们现在讲西洋哲学史，先把哲学史总的规律指出来，使得大家首先有一个总的印象。我讲下去的时候，希望大家注意这一点。我所讲的内容，主要是讲唯物论是怎样发生、发展的，唯物论怎样与唯心论进行斗争中发展的。关于总的规律的问题，大家除了参考日丹诺夫的文章以外，还可以参考《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关于党性的那一部分。列宁指出，两千年中，在哲学上唯

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是不会陈腐的。我们学习西洋哲学史，就需要了解这一点。

所谓科学的唯物论，就是唯物论的基础是科学的，唯物论是跟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进步，唯物论的内容就更丰富，它的质量也就愈提高。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经说过：自然科学上每一种新的发现，都使得唯物论达到一个新的面貌。自然科学每提高一步，唯物论也就提高一步，从哲学史中也可以看出来，唯物论所以能够发展，就是由于科学的进步。科学的成就证明唯物论是正确的，并且丰富了唯物论的内容，使唯物论更站得住脚，使唯物论更能够有力量克服唯心论。所以，要了解唯物论发展的历史，同时也要注意到科学发展的历史。整个唯物论的哲学与科学发展的历史关系，应当有一个了解。我们现在讲一讲这个联系。

最初的唯物论与科学是没有多大分别的，是结合在一起的。最早的哲学家与科学家是没有分工的，哲学家也是科学家。后来科学发展了，科学与哲学就分开了，哲学成了一种专门独立的学问。现在辩证唯物论本身就是一种科学，与其他的科学有一点不同，就是辩证唯物论是各种科学的总结。辩证唯物论本身是一种科学，从前它不成为科学，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就不成为科学。为什么不成为科学呢？因为它与别的科学混淆起来了，有许多科学问题直接由哲学来提出解决，比如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应该由经济学来研究，要是用哲学来讲经济学，那是不大好讲的，是有困难的。但是，以前的哲学家，就喜欢根据几个简单的哲学公式，用一些主观的道理来说明这些问题。比如世界怎样发展的，自然界怎样发展的，应该是由自然科学来说明，地球怎样形成的，应该是由天文学来说明。可是从前的哲学家，他就直接用哲学来解

决这些问题。比如中国有阴阳二气，金、木、水、火、土等等说法。用一些哲学的公式来说明世界上的具体问题，这样说明就没有什么结果，或者有结果，但是错误的。从前的哲学就是这样，与其他混淆在一起，也就使哲学不成为科学了，因为它的内容常常是荒谬的。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就是真正的科学唯物论。这个哲学，照日丹诺夫的说法，就是我们做科学研究的方法。我们学哲学，就是学思想方法。我们掌握了这种思想方法，就能够正确地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研究哲学史，要注意一点。就整个哲学史的发展，最初唯物论还不是科学的，一直到最后，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才真正是完全的、科学的哲学。这种科学的哲学，它的特点，就是能够给予我们一套科学思维的方法，从前的哲学，是直接说明科学上的具体问题，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从前根本不同，就是要研究一套科学思维方法。

哲学史，就是这种科学的唯物论如何发生、发展起来的历史、如何经过几千年的发生发展，最后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

唯物论哲学的发展，为什么一定要通过一种斗争，为什么说哲学的发展是唯物论与唯心论作斗争的历史呢？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哲学不仅是科学发展的一种总结，不仅是自然科学和各种科学的总结，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实践斗争的总结，它包括阶级斗争。所以，哲学不仅仅是对自然斗争的总结，而且是阶级斗争的总结。每一个时代的哲学，都是这一个时代社会的阶级斗争总结。哲学是在阶级社会中产生的。原始社会里没有哲学，最初的哲学是在奴隶社会发生的，原始社会里只有一种原始的宗教。因为当时生产力低，文化低，不可能根据科学来解释世界，而是根据一种宗

教的，迷信的形式来解释世界。所以，原始社会里没有哲学，而是在奴隶社会，有了阶级斗争之后，才有了哲学。西方哲学开始于奴隶社会。我们中国开始有哲学是周朝，如果周朝已经是封建社会，那么中国哲学是在封建社会开始的。究竟周朝是不是封建社会，还是奴隶社会，现在还没有肯定下来，但西方哲学是从奴隶社会开始的，这是肯定的。

哲学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的世界观，是人对于世界的一种看法。在阶级社会里，各阶级有它自己的世界观，对世界都有自己的一种看法，不同的阶级就有不同的世界观。唯物论的世界观，一般地来讲，都是进步阶级的世界观。唯物论的世界观，是为进步的阶级服务的。唯物论哲学家的出身是另外一件事，他可能是在反动的家庭里出身的，但他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那么，他的哲学就是为进步阶级服务的。哲学史上有很多哲学家，他们的出身是反动统治阶级，但他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因此他的学说是为进步阶级服务的。关于这一点，以后再具体地讲。

唯心论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为少数阶级服务的。阶级斗争在各个时代虽有不同，但总不外是革命的与反革命的斗争，反动统治阶级总是用唯心论来为自己服务，革命阶级一般都是用唯物论来为自己服务。

因为唯物论与唯心论是各个不同阶级的世界观，所以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的时候，也就一定有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我们的社会是有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哲学上也就有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反对资产阶级的唯心论，不但在党外反对，而且在我们党内也要反对资产阶级的影响。我们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盲目冒进等等，这都是唯心论的影响，这就是唯心论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党

内的思想斗争问题，也应该看成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问题。特别在今天，中央早已指明这一点，我们以前在乡下的时候，周围是小资产阶级，当时在党内反映的是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而当革命胜利后，我们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矛盾，因此党内发生矛盾，也要看成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我们在世界观方面，在党外要公开地反对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像有些大学教授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就要给以批评。我们的主观主义也有很大的害处，如在工作中的盲目冒进，冒险主义，这种主观主义，也要看成是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在我们党内的反映。所以，有阶级的地方就有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

哲学史为什么是唯物论与唯心论作斗争的历史呢？因为哲学史也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人类世界观上的反映。在社会上有阶级斗争，在经济上、政治上有阶级斗争，在世界观方面也就有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因为不同的阶级，它要利用不同的世界观来作为自己思想的武器。所以，我们今天研究哲学史，就要注意到哲学史也是在世界观上的一种阶级斗争反映。这种反映就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这种斗争就说明哲学上的党性，哲学的党性就是它的阶级性，就是反映了阶级斗争，一定的阶级都是站在一定哲学方面的。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研究唯物论，主要就是能够了解到唯物论如何为进步阶级服务，唯心论如何为反动阶级服务。因此也就应该了解到，我们要坚决反对唯心论，对唯心论绝不能采取任何调和态度，不能够仅仅把它当做一种哲学来看待，而要把它看成是一种阶级、党派的武器。如果什么地方出现了唯心论，就要注意这是反动统治阶级武器。我们工作中发现了主观主义，也不要简单地看成是一种普通的错误，而要看成

主观主义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尽管犯错误的人，他自己是革命内部的人，但只要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实际上就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了。我们研究哲学史，目的就是要加深我们哲学党性的观念，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唯心论怎样有害，它怎样为反动阶级服务。从而也就使我们了解到坚持唯物论是很重要的。

研究哲学史要了解唯物论是进步的，唯心论是反动的。了解了这个原则以后，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过去的唯物论加以区别。过去的唯物论是进步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也是进步的，这是共同的，以前的唯物论，一般是为进步阶级服务的，但是要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要有所区别，不要以为过去的唯物论是进步的，在今天还是好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以前的唯物论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点，过去的唯物论不是辩证的。它只能够形而上学地解释世界，用唯物论的观点来说明一下，它不能够给予我们一套很有力的方法，帮助我们在实践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帮助我们解决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过去的唯物论没有这个力量。因此，它本身不能够成为科学的方法。

第二点，过去的唯物论是少数人的哲学。过去的唯物论本来还是少数哲学家创造的一种思想体系，与广大的人民没有关系，不关心广大人民，同时也不向广大人民作宣传。它只是关心某一个进步阶级的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带有人民的性质，它关心人民的问题，同时也向广大人民作宣传，不但在我们学校里面学习唯物论，在任何地方都要宣传唯物论，因为学好唯物论可以把工作做好，可以解决问题。

以上，就是我们学西洋哲学史需要了解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更要了解到哲学史是辩证法思想发展的历史。我们研究哲学史也就是研究辩证法，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如何发生与发展的。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参考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一般认为，整个哲学史上人类思想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朴素的辩证法的时期，也就是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开始被人类所认识的时期。这一个时期，相当于古代的时期。当时许多哲学家开始认识了辩证法，但是认识很模糊，只是认识一个轮廓，具体内容还搞不清楚，只知道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发展变化着的，甚至于了解到矛盾，但是就是不了解什么东西在矛盾，或者他自己以为搞清楚了，但实际上是错误的。朴素的辩证法究竟是怎样模糊的，我们以后讲的时候就可以搞清楚。

这个时期为什么对辩证法认识不清楚呢？为什么说是朴素的呢？就是因为自然科学和哲学混淆在一起了，不像现在有物理学、化学以及其他科学等等。古代的哲学家他就研究自然界的学问，里面也包括哲学，理论科学是不完整的，对社会的认识当然更粗糙了，对自然界的认识还多多少少有一些进步的科学，对社会的认识就更缺乏了。因此，古代的人，对世界各个部门具体的规定不能搞清楚。当时绝不能够像现在我们对自然界搞的那样清楚，如有生物学、心理学等等，古代科学不发展，对世界的具体内容了解的不清楚，因此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认识上的模糊。眼睛一看，整个世界是变化发展的，但变化的具体内容搞不清楚，这就是古代的朴素辩证法的一个特点。所以当时辩证法不能成为科学的方法，只是对世界的一种估计，一种比较粗糙的方法，大体上猜测世界是在变化着的。这就是哲学史上人类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就是经过了一个朴素辩证法时期，以后就进入了形而上学的时期，也就是我们所要讲的十七八世纪哲学。

这个时期的哲学，主要是受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支配的。整个十七八世纪的哲学，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就是把世界上的东西看成是孤立的、不会变化的，不能够从矛盾中去看世界。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时期呢？为什么人类的思想方法发展到十七八世纪就进入了形而上学的时期呢？就是因为当时自然科学有了初步的发展，不是很高的发展，我们说它不是很高的发展，因为它只是在某些简单的部门完成了比较科学的系统。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主要是数学、力学。这个时期研究社会，研究自然，开始注意研究世界各个部门的具体规律。古代的哲学家只看到了世界的一个简单轮廓，而对具体内容的研究没有做到。在形而上学时期，有些科学家就具体的研究了自然界的各个学科，把各个部门从全体中分裂出来，单独地来研究，譬如把数学离开其他方面单独地来研究，把力学拿出来单独地来研究，这种单独研究各别部门的现象，这种研究的方法，就养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习惯。习惯于部分的研究问题，不与各方面联系起来研究，把自己研究的东西当做是不会变化的。在科学开始发展的时候，对这种情况也不了解，因为科学研究就是分门别类地去研究，因为要分门别类地去研究，就养成了形而上学的、孤立地研究问题的习惯，养成了片面看问题的习惯。所以，在哲学上就出现了形而上学的时期。

这个时期在我们中国是没有的，我们在十七八世纪还是封建社会，自然科学还没有发展，还没有这种哲学。中国的哲学可以说是在“五四”以前，辛亥革命时期，基本上是停留在古代状态，基本上没有超出朴素辩证法时代。

第三个时期：就是进入了更高的时期，也就是唯物辩证法产生的时期。

我们讲西洋哲学史，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三个阶段来讲。一个是古代哲学，就是朴素的辩证法时期，一个是十七八世纪的哲学主要是形而上学时期的哲学。讲古代哲学，主要就是讲辩证法的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我们不讲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书基本上是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产生，所以我们不讲了。最后一个问题也不需要多讲。大体上就分这样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是西洋哲学史发展的历史过程。

关于中国的哲学，大体上从“戊戌政变”起，一直到“五四”止，自然科学已被中国人民所注意了，这个时期可以勉强相当于形而上学时期。在“五四”以前，有一些人是把机械唯物论搬到了中国来，在辛亥革命以前有一些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把形而上学搬到中国来了，吴稚辉就是这样一个代表。

在西洋，十七八世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哲学上是形而上学发展时期。在中国，我们很多人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进入了唯物辩证法的时期。所以，不能够把我们中国与西方简单地加以类比，因为中国形而上学不完整，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行，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这个根底，在学问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可是西洋哲学史，在十七八世纪中，有很突出的进步，这就是我们所要讲的中心问题。

二、古代哲学

现在我们就开始讲古代哲学。

古代哲学是指奴隶社会的哲学，更清楚一点说，就是奴隶主的哲学。在奴隶社会，奴隶所处的悲惨地位，是不能够在自己的

阶级里产生哲学的，有个别的哲学家反对奴隶制度，同情奴隶，这些是有的，但真正的奴隶哲学是没有的。奴隶只有他自己的宗教，在暴动的时候，代表他的思想，奴隶要自由，要回到原始公社去，但系统的哲学思想是没有的。那个时候系统的哲学是奴隶主阶级不同派别的思想、是进步的奴隶主阶级和反动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有些哲学代表反动的奴隶主阶级。

希腊奴隶社会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按照阶级的划分来看，希腊奴隶社会首先是分为奴隶和自由民两个阶级，凡是不叫奴隶的就是自由民。自由民里面又有阶级，有富的自由民和穷的自由民。富的自由民就是真正的奴隶主，他们是使用奴隶的；穷的自由民就不一定是奴隶主，他们有许多是从事手工业，但他们也不是奴隶，身份是自由的，他们也使用不起奴隶。富的自由民与穷的自由民之间有斗争。奴隶主主要压迫奴隶，同时也压迫穷的自由民。在希腊的统治阶级里，就是富有的自由民。

但是，在富有的自由民中间，又有不同的集团，有贵族的奴隶主集团，他们是接近原始公社没落的时候发生的。他们在原始公社里面地位就很高，当原始公社解体以后，他们就变成奴隶主。他们的财产主要是土地，大批的土地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怎样掌握了土地呢？原始公社土地是公有的，但原始公社垮台以后，有些酋长富起来了，一般社员贫穷了，他们要向这些酋长借债，以后还不起，就把自己的土地让给人家，本人也做了他们的奴隶，就这样逐渐地把氏族成员变为自己的奴隶。这就是希腊社会最初产生的奴隶主，也是带有反动性质的奴隶主，主张专制制度的奴隶主。

后来，希腊社会里又产生了第二个奴隶主的集团。这个集团是工商业奴隶主集团，他们的财产主要不是土地，他们主要是做

生意，最初是从事商业，发财以后，又组织了一些奴隶从事工业（手工业），通过工商业发财了，这些奴隶主是后来出现的。他们与贵族奴隶主有矛盾。贵族奴隶主用特权来限制工商业奴隶主的发展，不让工商业奴隶主有平等的地位，因此工商业奴隶主就起来反对贵族，他们反对贵族奴隶主的时候，是利用受贵族压迫的自由民。他向奴隶们号召，反对奴隶主，收回土地，反对奴隶制度，这样，他们就有了群众，工商业奴隶主把贵族奴隶主打倒以后，他们就变成统治者，建立了一种民主制度。为什么他们搞民主制度呢，因为他们原来依靠受压迫的自由民得到了胜利，所以他们不能不用民主制度来团结一部分自由民，希腊奴隶社会就是这样曾经出现过民主制度。这种民主制度是奴隶主的民主制度，当时也有议会，参加议会的主要是奴隶主，有一小部分是自由民，所以民主制度主要是有限的民主，时间也不长，以后贵族奴隶主又起来复辟。希腊的奴隶社会大体上就是这样。这就是希腊产生哲学的背景，我们了解了这些背景以后，就可以了解哲学的派别。

最初出现的唯物论哲学，叫米利都学派。时间大致是在纪元前六世纪。米利都是在希腊以外的地方，大约是在巴勒斯坦、叙利亚这些地方，它是希腊做生意的地方，当时希腊还是贵族奴隶主统治，因为工商业已经发展了，工商业奴隶主集中在这一带，因此也就产生了唯物论的哲学，最早的哲学就是唯物论。我们中国也是一样，一开始也是唯物论，当然中国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有人说，老子的思想就是最早的唯物论思想。他是孔子的老师，孔子还拜访他。

希腊最早的哲学派别——米利都学派，它的代表人物有三个人：

第一个人，就是泰利斯。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科学

家，不是政治家，也是一个大商人，他是当时最有学问、最有科学知识的人。他的科学知识高深到什么程度呢？在当时（2500年以前），他就能够预见日蚀，能够提出某月某天某时，太阳要被月亮遮住，而且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的思想大体上是这样的，在哲学上主张世界万物的根源是水，一切都是从水产生的。他这个主张，我们现在看起来是荒谬的，但在当时来讲，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因为他这个思想，跟宗教的世界观表现了尖锐的对立，宗教世界观的根源是神，而泰利斯认为世界是水，这就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当然他认识上还是模糊的，可是在当时来说是唯物的、革命的，同时也是辩证法的，因为他把水看成是能变为一切，把世界看成是变化的。

第二个人，就是阿那克西曼德。他的哲学观点基本上与泰利斯是一样的，不过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些分歧。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世界的根源不是水，他认为世界的根源是一种无定型的物质，由这种无定型的物质，变为世界上的一切。无定型变为有定型的世界万物。为什么无定型的物质会变为世界万物呢？他认为无定型的物质里面产生一种冷与热的矛盾，有一部分冷了，有一部分热了，这样就出现了空气、水、土。世界的矛盾就是冷热的矛盾。这就是他的认识。

第三个人，阿那克西米尼。这个人又有另外一种看法，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东西的根源是气。他为什么这样主张呢？因为他反对阿那克西曼德的说法，他说无定型的东西太抽象了，这种说法不能使人信服，所以，他讲的比较具体一点，他说气虽然也是无定型的，可是气能够说明问题。

以上这几个哲学家，就是米利都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哲学是大同小异，性质是唯物论，也有辩证法的因素。他们反对原

始宗教，阿那克西米尼认为空气是万物的根源，因此他认为神也是空气变成的，他并不否认神的存在，但他是用唯物论来解释它，因此也就反对了有神论。

这些人在政治上都是反对贵族奴隶主的，主张民主制度，主张国家应该有议会，由多数人来发表意见。这就是希腊最早的哲学派别——米利都派。

除了米利都派以外，在希腊哲学史上，产生了一个朴素辩证法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列宁、斯大林的书上引过他的名字，这个人可以说是希腊最大的辩证法哲学家，他的出身是贵族，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拥护贵族的，他自己就是被工商业奴隶主打倒了的，他失掉了特权。他认为世界的一切是变化的，他就根据这个道理创造了一套辩证法。所以他的思想与他的政治立场是矛盾的，实际上他的哲学是为进步阶级服务的。他的出身和他的政治立场与他的思想是矛盾的。他的哲学与民主派是一致的，与贵族派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后来贵族的哲学家就起来反对他。在他的哲学里面有很多精彩的话，他把辩证法公式化了。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曾经引用过他的话。他说："万物统一的世界，不是神创造的，也不是人所创造的。"他认为世界永远是活生生的火，是有规律地燃烧着、有规律地熄灭。这些话除了火是荒谬的以外，其他都是很好的辩证法思想，承认世界不是神创造的，也不是人创造的，它本身就是统一，它永远是按着规律燃烧，按着规律熄灭，列宁对这样的话很赞成。他还有一些有名的话，如"一切皆流，一切皆变"。这样的话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在古代来讲，这是第一次提出的。他为了说明一切都是变化与流动的原理，他曾经说过一个比喻，他说：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第二次走的时候，河里的水

已经流过去了。我们平常过黄河，总认为黄河的水是一样的，其实今年的黄河水与去年的黄河水已经不同了，因为黄河里的水是永远流着的。他还有一个学生，把这句话讲的更清楚了，他说：人不能一次走到同一条河里去，因为你在河里走的时候，水已经流过去了。这种说法是太极端了。赫拉克利特对矛盾也是很看重的，认为矛盾是一切变化的根源。他也有一些很有名的话，他说：我们是活的，同时也是死的，我们是强壮的，同时又是衰老的。这个道理有点像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讲的，恩格斯说生与死是分不开的，生的过程同时也是死的过程。因为生命有细胞，是新陈代谢的过程无时不在毁灭着，又在不断生长着。他很强调对立是发展的原因，不仅提出对立，而且提出斗争是发展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也有一句话，他说：万物都是经过斗争产生的。他把战争的意义看得很重要，斗争最高的表现就是战争，他说：战争是万物之父和万物之王。因为战争使某人变成神，使另一个人变成人，它使某个人成为奴隶，又使另个人成为自由民。这些话都是很好的，说明了他的思想正确地反映了阶级斗争。这一些就是赫拉克利特哲学思想最精彩的表现。这些话在今天的许多著作里还常常碰到。

我们中国的古代哲学，老子的哲学，可以说辩证法是最多的，他也主张一切都是变化的。他有这样的话："动而愈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愈动愈产生新的东西。老子的思想主要表现在"自然"、"变化"的思想上，这是中国唯物论的名词。老子认为一切东西都是自然的，他有这样的话，"道法自然"。所谓道，就是规律的意思，这就说明自然的发展规律是自然而然的，"道法自然"就是物质本身的规律。"无为"就不是神与人创造了自然。老子的哲学也非常重视矛盾的重要性，他有这样的一句话，"反者道之

动”这就是说反面的东西是推动规律发展的一种动力，反对的力量可以使事物发展。

在外国的哲学里面，古代辩证法思想最多的就是赫拉克利特，在中国就是老子了，因为他们规定了很多原则与公式，这些都是很对的。尽管他们有些原则规定的很好，但一些具体内容还是模糊的，如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火在变，所以他的唯物论还是朴素的。

以上所讲的古代朴素唯物辩证法的代表人物，这一些思想的发生，并不是和平发生的，是与宗教唯心论进行斗争发生的。社会上发生了唯物论以后，跟着唯心论就来了。进步阶级打着唯物论的旗帜，所以唯物论在希腊产生不久，就产生了唯心论的派别。

最初唯心论派的代表人物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和爱利亚学派。虽然他们时间上比较晚，但他是反对唯物论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一个什么派别呢？毕达哥拉斯是一个贵族集团的领袖，他在意大利曾经组织过“毕达哥拉斯联盟”，他有很多学生。这一学派是与宗教相结合的。这个联盟的人都参加过宗教，都要敬神。他的哲学是为宗教服务的，在政治上是为贵族服务的。

这一学派的特点，主张把抽象的数目当成世界的本源，认为世界的起源不是物质，他是历史上第一次用抽象原则来说明世界，他把精神摆在第一位，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数学观念创造的。他用一些牵强附会的办法，认为一、二、三、四这四个数目是最重要的数目，同时认为世界万物都是这四个数目创造的，也就是认为一、二、三、四是世界的根源。他怎样来讲这个道理呢？他说世界上的万物无非就是：点、线、面、体的组成。譬如这一根粉笔，就是一条线，板子就是面，人体就是体。一切东西不超出点、线、面、体的范围。世界上的一切万物就是点、线的联系，随便

找一些东西，不是点，就是线，或者是面或体，点、线、面、体，就是由一、二、三、四来决定的。因此一切都是一、二、三、四创造的。他把任何东西都抽象化了，是最明显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很荒谬，但古代的人看起来还很相信。

这个学派因为要与唯物论作斗争。它也研究了一些学问，它集中地研究了数学，所以它也不是对科学一点贡献没有。我们现在学的数学，有一些定理还是毕达哥拉斯发明的。大家都知道，直角三角形、有勾、股、弦，勾的平方加股的平方，恰恰等于弦的平方，这就是毕达哥拉斯的定理。这个例子只是说明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它总是要利用一个武器。所以列宁反对的马赫经验批判论，它也是利用了自然科学，不然它就站不住脚。马赫本人是物理学家，他的物理学著作，是很有价值的，这一部分很有创造，他在自然科学方面很有成就。但是马赫主义就利用了这一点为资产阶级服务。所以我们要注意一点，我们和唯心论作斗争的时候，不能够太轻视它，因为唯心论还有一些科学的东西，我们就不能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如果这样，那我们就会吃亏，承认它科学的一方面，就要证明它对科学的曲解。譬如对毕达哥拉斯的数学，承认他有一些贡献，并不等于高抬他，相反地更证明他的哲学是唯心论的。承认马赫对物理学有研究，正说明他的哲学与科学是矛盾的。任何一种唯心论，差不多都要利用当时科学上的成就。否则就站不住脚。

现在再讲一讲爱利亚学派。它的代表人物有三个人，有色诺芬尼、巴门尼德、芝诺，后面两个人原来是“毕达哥拉斯联盟”的参加者，他们在政治上都是拥护贵族反对民主的，特别是芝诺曾经组织过反对民主制度的暴动，后来被判处了死刑。这一些在政治上是反动派，在哲学上也发展了唯心论的理论，他们的思想是

怎样的呢?

第一个人，色诺芬尼。他的著作留下来的太少，他认为世界就是神，神是惟一的，是不动不变的，他这个思想叫“泛神论”，不是认为神在世界以外，世界本身就是神，而且是永久不变的，这就是否认变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

第二个人，巴门尼德。他也有一套理论证明世界是不变的。这一套理论也很特别，就是一套在文字上钻牛角尖的怪论。他怎样证明世界是不变的呢?他用一个概念来说明，用“存在”或者叫“有”来兜圈子。他说世界就是“存在”，既然承认存在，就要承认它是不变的，而且是惟一的，是不可分的。我们既然承认它是存在，就不能又说它不存在。因此存在是惟一的，除存在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存在绝不会变为非存在，如果不是这样，逻辑上就自相矛盾。他就是在这样的空洞概念里兜圈子。

第三个人，芝诺。他进一步证明世界不变的道理，他有许多有名的辩论，他的辩论就是反驳运动的思想。比如说:“飞矢不动”，先假定有运动，后证明这个运动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这个箭从这个地方射到另外一个地方，任何一瞬间箭都是停留在每一点上，无数瞬间的总和证明这个箭还是没有动。这就是希腊唯心论者反驳运动的一种逻辑。这种逻辑是怎样产生的呢?他想要指出运动是矛盾的，因此他就不承认运动，这就是形而上学形态的一种逻辑。他这个辩论在哲学史上是很有名的，后来讲辩证法的人反对他，认为运动能够成立，运动就是矛盾，所以，矛盾是事实，矛盾能够成立。运动是什么呢?就是箭从这里到那里，在每一点上停留，同时又不停留。恩格斯讲运动就是矛盾，斯大林引过恩格斯运动就是矛盾的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运动在某一点停留，同时又不在某一点上停留，运动是事实，所以矛盾也就是

事实。

以上所讲的爱利亚学派形而上学唯心论，他们用一些钻牛角尖的道理说明问题，企图用唯心论形而上学的理论来证明世界的变化是假的，使贵族奴隶主成为世界上永久的统治者。这就是唯心论学派的政治企图。

这是最早的唯心论形而上学的倾向，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唯心论的体系。

以上所讲的，就是希腊最初的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哲学斗争。

第二次讲课

昨天所讲的，可以说是古代时期最早的哲学。这个时候辩证唯物论思想开始出现了，同时形而上学的唯心论倾向也开始出现了，并且开始与唯物辩证法作斗争。但是这一些哲学派别都是比较幼稚的。恩格斯所指的古代哲学家，主要是指的这一时期有辩证法思想的一些人，并不是说古代的哲学都是辩证法。

我们昨天所讲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倾向，不是很显著的，不是很有系统的，比如爱利亚学派反对运动，他们想指出矛盾来否认运动，但恰恰矛盾就是运动。运动由第一点到第二点，只是在每一点上停留一下，他们想用这种理由来反对运动，但恰恰证明了这个运动，在每一点上停留，同时又不在某一点上停留。所以是合乎事实的，这种倾向都是自己有矛盾的，自己是站不住脚跟的。在爱利亚学派以及其他学派以后，又产生了比较新的学派，今天主要就讲以后唯物论进一步发展的情况。

古代唯物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派人有三个代表：阿那

萨戈拉、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最后一个是古代最大的唯物论者，昨天讲的赫拉克利特，他是古代最大的辩证法哲学家。

这一派哲学，代表当时希腊民主派的哲学。这一派哲学是纪元前四五世纪产生的，当时正是希腊民主制度发展到繁荣的时期。如果有人读过西洋哲学史，就可以知道希腊有一个伯里克利时代，当时是这个人当政，他是希腊民主政府的执政官。在他执政的时候，希腊的自由思想很开展，在议会里面可以自由展开争论，甚至于在街道上可以大骂伯里克利，当他由办公地点回家的时候，后边就有一些人跟着骂他，他自己也不在乎，他的政权也是很稳定的。当时是希腊的“黄金”时代，正是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这些哲学家。这些哲学家——阿那萨戈拉、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都是伯里克利很好的朋友。这些人的哲学比较最初泰勒斯的哲学更精密一些。这一派唯物论，是与爱利亚学派作斗争中产生的，批评爱利亚学派的形而上学倾向。爱利亚学派有一个弱点，就是它把世界看成不变的、惟一的。因此一切变动的现象都是虚伪的，只是感觉上欺骗人的结果，实际上用思维研究一下是没有变动的。这种主张与事实发生了矛盾，这一派唯物论哲学家就抓住了这个弱点，批评他们说：你说世界是不能运动的，这是不对的，世界上的物质都是运动的。在这一方面他是反驳了爱利亚学派。但在另一方面，这些人又受到爱利亚学派的影响，爱利亚学派认为整个世界是不动的，这一派反对这种说法，但他们认为构成世界物质的原子是不变的。在这一点来说，这一派唯物论，又比最早的唯物论退了一步。他们认为世界是由各种原子构成的，他们认为最小的部分是不变的。世界上一切变动现象，都是由基本不变的各种元素组成的，承认世界不变的基本元素，就是这一派离开了辩证法，而倾向了机械唯物论，这就是它的弱点，这一派的三个人，

所讲的具体内容不同，但基本方向是一样的。

第一个人，阿那萨戈拉。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东西，是由无数性质上互不相同的种子组成的，比如动物，是由带有动物性质，很微小的种子组成的。他认为种子是各种各样的，他承认物质的微小部分——分子，有所不同。阿那萨戈拉根据这种说法，他认为世界都是物质构成的，认为太阳是石头构成的，因为他讲了这一条道理，就引起了所有迷信思想的人都坚决地反对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使他不得不跑到别的地方去。

第二个人，恩培多克勒。他对物质的元素——分子，又有一种看法，他认为世界上的物质、分子的性质，是多种多样的，是分散的。所以，他规定了物质的元素只有四种，就是：气、水、火、土。这四项有点接近我们中国的五行：金、木、水、火、土。我们讲五行，他讲四大元素，他说世界的一切东西都是这四种元素构成的骨头。人生气就是火。这是恩培多克勒唯物论的思想。他认为四大元素是不会变的，一切物质都是四大元素构成的。这种说法，现在看来当然是不对的，但是不管怎样，他是唯物论，他是反对唯心论的。

第三个人，德谟克利特。他的学说就是原子论，是哲学上的原子论，不是科学上的原子论。因为科学上的原子论，是经过科学证明的。他认为世界上的物质是由无限多的原子构成的，这种原子当然是一种空想。德谟克利特是当时最大的学者，所谓最大，就是因为他懂得当时一切知识。大家也都非常称赞他，说这个人研究了一切（这个话是亚里士多德讲的。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后来最有名的哲学家）。他的著作很多，他的家庭是一个工商业者。他父亲死了以后，他得了一笔很大的遗产，他就拿着这笔遗产到处游历，到过巴比伦，也到过伊朗，他去过很多的地方，他到每一

个地方都进行调查研究，因此他的著作很多，从哲学到天文学、政治学、数学都有。但是，他的著作只是在记载上有，原作都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呢？就是因为他是当时最彻底的唯物论者，他的著作都被反动统治阶级烧毁了。如当时的柏拉图，用很多的钱把他的书籍买来，买来以后就把它烧掉。柏拉图说：我做梦也要烧毁他的书籍。这说明唯心论是特别仇恨唯物论的，把唯物论当成死敌。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一点，认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不过是思想上的一种斗争。这是不对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实际上是很残酷的。除了把书籍烧毁以外，本人还要受压迫。在蒋介石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就受迫害。比如从前一个大学里聘用一个人，那就首先考虑他是不是会讲唯物论。如果会讲唯物论，那就要考虑这个问题，就会不让他留下来。这是讲的国立大学。当然，私立大学还是有进步的教授的。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什么呢？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由无数原子构成的，这种原子是很微小的，但性质都是一样的。他不是像阿那萨戈拉所讲的，物质的性质是各种各样的，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的性质是一样的，只是体积上与形状上有所不同，有圆的、有方的。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就是由这些性质相同和形状、体积有所不同的原子构成的。他的哲学与十七八世纪的唯物论有相同之点。十七八世纪的哲学认为物质的根本性质就是一样的，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就是这样。

但是尽管他是唯物论，他的唯物论还是有很多虚构的地方，是科学之上的另外一种科学，实际上不是科学。所以，我们对这些哲学还要承认它的历史意义，主要还是看它的思想本质是唯物论的。他反对神创造世界，反对精神第一，他承认世界上只有原子，而没有其他。原子的运动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永远是下落的，空

间是一个无底洞，永远下落。由于原子的不同，重的落得快些，轻的落得慢一点。当时不知道在真空里面，不管物体的轻重，它的下落速度都是一样的。当时德谟克利特不懂得这个道理。因为重量不同，落得快慢不同，就产生了旋转互相结合起来，因而就产生了世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原子落下来的时候互相旋转引起结合的结果而产生的。这就是原子论的基本思想。

这种原子论的唯物本质在什么地方呢？他的唯物论本质，就在于他用物质的本质说明了世界的发生与发展。他抛开了神与精神创造世界的说法。德谟克利特认为物质和运动分不开，他认为运动是物质的属性。原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直向下落，他向下落就引起了结合，就产生了世界。所以原子论的内容虽然有些机械唯物论的性质，但他把运动看成与物质是不可分的，这一点又有点辩证法的意思，不能够说他是纯粹的形而上学。当然他所讲的物质运动还是机械的，因为他只注重了位置的变化，而没有认识到物质会发生质的变化。所以他的思想实质只有一点，就是用物质的运动说明了世界，他把运动与物质看成是不可分的，这是合理的。其他部分都是虚构的。

德谟克利特也用唯物论的原则来解释精神。人为什么会有感觉呢？他认为精神也是一种原子，是一种最轻，最精细，形状是圆形的原子，因为原子是圆的，所以人的精神是很灵活的。这种看法是一个缺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庸俗唯物论的。庸俗的唯物论就是把精神也看成是物质的，实际上精神是物质的一种作用，精神是物质的一种属性，这个属性发生一种作用，高级物质就有一种精神属性，所以精神就是高级物质的反映作用，但决不能说精神就是物质。庸俗唯物论说我们脑子产生思想，好像我们的嘴里产生唾沫一样。《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一书中也批判了

这一点。我们决不能简单地把精神看成就是物质，只能把它看成是物质的一种属性。德谟克利特就是把精神看成是物质，所以他是接近了庸俗唯物论。

但是，在古代来说，就不能批评德谟克利特是庸俗唯物论。我们现在所以反对庸俗唯物论，就是因为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他再宣传庸俗唯物论，那我们当然就要反对。德谟克利特的某种思想，究竟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就要看他的历史时代。在十九世纪里宣传庸俗唯物论，那就是倒退，但在当时的希腊，被德谟克利特提出来，那就是一种创造。

德谟克利特在哲学认识论上，也是唯物论的。他很注重感觉，认为感觉是可靠的，把感觉当成是物质的反映。他对感觉的解释，带有一些虚构的成分，但也有一些合理的因素。他认为感觉是我们观察的对象里面散发出来的很多原子，它引起我们感官的刺激，比如我们看到这个杯子，是由于杯子散发了很多的原子，这才使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所看到的对象是因为我们原子的接触，这种说法是荒谬的。但它的本质还是唯物论的，因为他认为人的认识是客观的反映。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性质，但他对社会发展的认识有些辩证法的因素。他对社会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的，这个发展当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观点。他认为人类最初是非常野蛮的，后来人类在自己的生活里努力模仿自然界，结果就使得我们人类进步了。人为什么能够穿衣服呢？就是因为模仿了蚕用丝把自己缠起来，人为什么能够住房子呢？就是因为学了鸟筑巢，这种说法当然也是荒谬的。但它也有唯物论的意思，因为他把生产看成是人类进步的东西，把生产看成是历史发展的条件。

德谟克利特的哲学是与唯心论宗教不妥协的。他的哲学有一个结论，就是世界不是任何人创造的，是自然发展的，精神也是物质的一种作用，如果有神，神也是要死的。所以，宗教派特别仇恨他。他的哲学思想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少，因为他的原著没有保留下来，只有少量残篇。有的是他的朋友给他保存下来的，有的是他的敌人为了反对他而留下来的。

古代唯物论的哲学，我们昨天讲爱利亚学派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唯心论的倾向，还没有成为完整的体系，只是开始发生。

今天要讲的，是古代正式形成了唯心论的体系的代表人物，就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是古代最大的唯心论哲学家，在哲学史上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就特别提到他，如果我们读过资产阶级的哲学史，就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著作，占着很大的篇幅。资产阶级讲到苏格拉底的时候，如果对中国人讲起来，都把他与中国的孔子来比较。这个比较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对的地方。不对的地方就是孔子是代表封建思想，是一种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而苏格拉底是奴隶主贵族的哲学，这是不同的。在两千年以前，孔子的思想还是进步的，而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思想，当时都是反动的。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就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唯心论，孔子的主要思想也是唯心论。他与老子的思想相对立，老子主张“无为”，不要“人为”，要顺着自然提倡无为，反对造作，孔子就专门讲这一套造作，孔子要“制礼”作为人的行动的标准。孔子有正名思想，名就是名分。在旧社会里，你如果是一个主人，那你就像一个主人的样子；你如果要是一个仆人，你就要像一个仆人的样子。仆人与主人决不能混淆起来。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里面，一个皇帝，一个臣子，都有一定的规矩，他不能够乱做。不能够违反这种规矩，就是人为制造的一套规矩，人

为地要求各个阶级遵守。

孔子的这一套大道理，是到处碰钉子，他说我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已经看到自然法则与他的思想有冲突，而自己还要干下去。他与老子的思想相反，老子是根据自然法则来行动。当然，老子的学说也有消极的一方面。我们说要认识自然法则，利用自然法则为人类谋福利，就是认识世界还要改造世界，但老子有认识世界的这一方面，改造世界这一方面是没有的。他讲的“清静无为”，就是马马虎虎地过下去。就是尽可能少做事情。

中国过去的皇帝，在最初每一个朝代统治的时候，一般都是用老子的思想来统治。比如两千二百年前的汉朝，汉高祖的一个大臣叫萧何，当萧何死了以后，继承他的人叫曹参。曹参上任以后怎样办呢？他做了宰相以后，不是天天办公；而是天天在后花园里请客、喝酒，办公室里找不到他。后来汉高祖的儿子看到他这个样子很不高兴，责备他说，你是一个大臣，每天不做事，每天在后花园里请客喝酒，这成什么样子。他说，我这就是“清静无为”。他并且说：天下打下来以后，萧何丞相把许多问题都解决了，请问是我的才能大，还是萧丞相的才能大？是萧丞相办事办得好，还是我办事办得好？那当然是萧何丞相办得好。既然萧丞相办得好，那我还去做什么呢，所以我只按照萧丞相的规矩去做就行了。“萧规曹随”，这就是老子的哲学。

老子承认世界是自然的，但他对自然界的态度是消极的。我们讲古代哲学称赞唯物论，但我们不能够说老子的唯物论和我们今天的唯物论一样，老子与孔子比较起来，就是比孔子高明一点。孔子的正名思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就是不好的。在唯心论的色彩方面，与孔子有些共同点。孔子主要是讲道德问题，苏格拉

底也是这样，他主要讲人的问题，研究人的行动怎样才是正确的，他不研究自然科学，而且是公开地反对自然科学。孔子也是这样。他有一个学生请教他，如何种地，孔子说你去请教农民，不要问我。这个学生又说，你不会种庄稼，就教我种菜吧，孔子生气了，他说我不知道，你还是去找种菜的吧。孔子说，我们是君子，为什么老讲种菜呢？这些地方都是与苏格拉底的思想相类似的。

在古代希腊的哲学里，苏格拉底的思想是代表贵族利益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出生的时候，希腊发生一些变化，就是民主制度没落了，伯里克利死了以后贵族又重新抬起头来。原来希腊贵族虽然被打倒了，但并没有被消灭，而且还有势力。希腊有个城邦叫斯巴达，这个地方完全是贵族统治，当希腊建立民主制度的时候，斯巴达还是贵族统治，雅典是民主制度，当时斯巴达贵族们没有办法。当伯里克利死了以后，贵族们就起来与雅典打仗，结果雅典打败了，因此就又恢复了专制制度。这是伯里克利死了以后希腊的变化。当时苏格拉底与柏拉图都是站在奴隶主贵族这一方面，苏格拉底本人甚至参加这次战争。这就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哲学的背景，他这个阶级使得他对一些唯物论的思想采取了非常仇视的态度。

直接与苏格拉底对立的，不是德谟克利特而是德谟克利特一派的唯物论者，他们是民主派的思想集团，也是哲学集团，有人翻译成“智者派”。这个集团有一个特点，就是专门用自己的教育来维持生活，教的东西一般都是科学、政治方面的知识。在民主制度比较繁荣的时期，他们主要是讲政治斗争的知识。这一个集团的人，思想上不是完全一致的，最初他们是唯物论者，是德谟克利特一派的人，以后因为专以传授知识为职业，有的逐渐变为诡辩论者，就是专门教别人去打倒别人。这一些人的思想，后来

有的人变为相对论者，只承认相对真理，不承认绝对真理，就是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这就是智者派的一个弱点。因为这个集团是倾向民主斗争的，这种民主不是人民的民主，而是贵族的民主。所以他一方面是民主，一方面是教人如何争权夺利，个人主义的色彩很浓厚，这就是他们的弱点。

苏格拉底就利用这个弱点反对智者派。他怎样反对智者派呢？就是抓住他这个个人主义的弱点，他说个别的不是真理，真理是一般的，整个社会一般地认为是真理才是真理，个人认为真理不是真理，所以当时就发生了一般与个别的争论，或者是特殊与一般的争论。有的哲学家说个别就是真理，有的哲学家说一般才是真理，认为个别的东西都是不可靠的，一般的东西才是永久的。也有一些人采取折衷的办法，认为个别的是真理，一般的也是真理。

我们中国也有这种争论，把一般和个别，用形而上学的说法割裂开来。中国古代有两个人：惠施和公孙龙。惠施是主张一般真理，认为一切都是共同的，个别的现象都是假的，他有一种说法，就是“天和地一样低，山和海一样平”。他有一个道理，就是天高和山高都是个别的现象，因此没有高低之分。公孙龙正相反，他把个别的东西看成都是隔离的，他说“白马非马”。白马就是白马，马不是白马，也不是黑马，就是一个马。他把个别的马与一般的马割裂开来。这个问题的解决，跟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也有关系。

一般地讲，“智者派”的哲学一般承认唯物论的。苏格拉底说一般的东西才是真理，他把个别的东西完全看成是虚伪的，个人的意见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按照辩证法的看法，个别与一般是要结合起来的。唯心论者把个别与一般用形而上学的割裂开来。因此就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抽象的真理，抽象的真理是世界的根源，个别的东西不过是根据一般的东西创造出来的。这样一

种唯心论就便利贵族来利用作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因为贵族是反对民主的，反对个人意见的自由争论，而主张专制制度，主张有一个普遍的权利来镇压整个社会。苏格拉底所讲的原则，就是贵族的原则，社会需要一个一般的原则，不能够让大家发表意见，这就是唯心论反动的实质。苏格拉底这一套学说，从一般到个别问题的结论，把一般当成一切事物的根源，而且推到政治上，就是拥护贵族的统治，这是反动的。他本人的实际行动是反动的，他参加了许多反动的活动。他后来的死，也是被民主政权判罪，在狱服毒而死的。

苏格拉底本人是不写著作的，他的行动与活动的方法，是采用智者派的方法，就是用嘴讲，这一点与中国的孔子不同，他是“述而不作”。

柏拉图可以说是苏格拉底思想体系的完成者；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他本人是贵族，是古代最大唯心论者，也可以说是唯物论的极端仇恨者，同时他的唯心论是古代最系统的。他的思想是根据苏格拉底的原理，认为一般的东西是真实的，抽象的概念是真实的，它是世界的创造主。说一个比方：譬如一个人，是抽象的人是真实的，还是张三、李四是真实的呢？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张三、李四都不是真实的人，只有抽象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而且这个抽象的人是个别人的创造主。按照唯物论的讲法，人都是个别的人，然后我们把这些人的特点综合起来，才有一个人的一般概念，所以人的概念是在个别人中产生的，然后才有抽象的人。柏拉图认为是先有一般的人，先有一个人的概念。柏拉图认为个别的人都是抽象概念的模本。这个概念有一个总的名字，叫做“理念”，或者叫“观念”。他认为理念或观念是世界上最根本的东西。他有什么理由说抽象的概念才是真理呢？他认为个别的东西

都是要消减的，一个人总是要死的，张三、李四都是要死的，而就是这个抽象的人始终是不会死的。

柏拉图就是用这样的一套怪道理来讲他的唯心论。根据这一套理论，就认为宗教是对的，上帝创造世界是对的。理念就是上帝，同时他也主张人是不会死的，因为人死了还有灵魂存在，灵魂与理念是有关系的，因此也就利用唯心论来替宗教做了辩护工作，唯心论很精巧地来为宗教作辩护，他使人相信上帝，信仰宗教，这种思想与唯物论的根本相反。柏拉图认为：精神是不可能死的，因为精神是理念的一部分。

柏拉图的社会思想，更明显地表现出他的贵族倾向。他的社会思想就是一种理念的表现，他的唯心论的表现。他的社会思想认为：合理的社会应该有三个阶层：

第一个阶层，就是管理国家的阶层，这个阶层主要应该由哲学家组成，因为哲学家懂得理念，哲学家根据理念的原则来管理国家，就一定能够管理得好。

第二个阶层，就是保卫社会的阶层，这个阶层就是武士，也就是将军们，这些人专管打仗，来保卫国家。

第三个阶层，就是生产物质财富的阶层，也就是劳动阶层，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他所讲的工人、农民，是指的自由民，不是指奴隶，因为奴隶在他看来，不在人的范围内，都是一种会说话的工具。

人类的社会只能够由这样三个阶层构成，这是贵族社会的具体表现。他所讲的这三个阶层，管理国家的阶层与将军们，他们是世世代代传下去，永远是哲学家，永远是武士，劳动人民永远是劳动人民。

现在讲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是古代最有学问的哲学家，研

究的问题很多，他称赞德谟克利特的哲学。他自己研究过当时知识的一切领域。他的哲学是二元论，所谓二元论，就是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摇摆，在政治上有保守的因素，也有进步的因素。他的政治主张认为：社会应该有一个很有力量的阶层来统治，所谓最有力量，就是最有财产，最有社会地位，这也是贵族了。但他同时又认为：要把社会管理好，单靠最有地位的阶级也不行，还要靠一些中等富裕的人，这就是工商奴隶主。他一方面希望贵族统治，一方面又照顾到工商业者，他认为这样能够把社会管理得好，这就是他的政治思想。

这种政治思想与他的哲学上的二元论有一种有机的联系。他的政治思想，在他的生活中由争论变成了事实。亚里士多德的活动时代，希腊已经开始没落了，希腊的北方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马其顿，这个马其顿的位置相当于现代南斯拉夫。马其顿国兴盛起来，占领了希腊。亚里士多德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先生，亚历山大当国王的时候，就帮助他搜集人才，帮助他建立学院，所以他当时在希腊建立了学术机关，研究了各种各样的学问，不管是天文、地理、生物都研究过了，所以他的知识是很广博的，当时的人不可能得到的知识，他却得到了，就是亚历山大对他的帮助。

他的二元论的内容是怎样的呢？他就是用二元论的观点、方法来看待个别的事物与一般原理的关系。个别的事物他就叫质料，一般的原理他叫形式，他认为：世界的发展是个别事物与一般形式结合起来的，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有了世界的发展。

亚里士多德当时反对柏拉图，因为柏拉图认为个别的物质是阴影，是不真实的。亚里士多德坚决反对这种说法，他本来是他的学生，他当学生的时候就经常与柏拉图抬杠，柏拉图说：这个学生要用马鞭子抽。其实是在这个问题上抬杠，柏拉图说：个别

的物质是假的，他偏说是真的。他说世界的存在，根本就用不着怀疑，甚至不需要证明，一看就知道是实在的。他有这样一句话：如果有人企图证明自然界是自己存在的话，那就是糊涂。所以这一点就完全与柏拉图的唯心论相反。他不怀疑自然界是自己存在的，物质绝不是理念的幻影，而是客观存在。在这一点上来讲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就是唯物论的。

那么，为什么又说他是二元论的呢？所谓二元论，就是除了唯物论以外，还有一些唯心论的倾向。他的唯心论的倾向，主要认为形式是物质发展的动力，物质当然不是创造的，但他是靠形式来推动发展。人为什么生出来又死了呢？就是因为有人这样一个形式推动了他，人的一生就是为了完成人的形式。所以他这种思想又像目的论，就是物质是自然发展的，他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原来就规定好了。譬如一个人一生，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一个人，从生到死就是要完成一个人的过程，一个人只有儿童一段，还不能算一个完整的人，一定要经过青年、壮年、老年，一直到死，这才算完整的人。这种思想本来可以用唯物论来解释，譬如我们说，物质概念不过是物质发展的一种概括，一个人发展的一生，到后来总结一下，说这个人是一个好人，或者是一个坏人，总的形式是后来产生的，这样说就是唯物论。可是他不这样了解，他认为一个人的发展，首先就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推动他发展，完成他的历史。比如孔子是封建思想的代表者，按照唯物论来讲，孔子生下来，经过他所受的教育以及自己的努力，后来成为封建思想的代表人物，这是由于一生的结果，然后完成这个概念。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来说，孔子生下来就抱定了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完成封建思想的代表人物。这样一来就把形式概念摆在第一位，把物质运动摆在第二位，这就是他唯心论的倾向。

亚里士多德不是完全的唯心论，因为他没有怀疑自然界的客观存在，认为世界不是精神造出来的，所以他是唯物论。但他认为自然界发展的动力是形式，虽然这个形式不是创造者，但它是推动的力量。所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认为世界有两个根源，一个根源就是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从来不是任何人创造的；另外还有一个根源，就是形式。没有形式，物质就不会发展，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把形式看做推动着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这就是亚里士多德二元论大致的内容。

这种二元论也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这些辩证法的因素在什么地方呢？亚里士多德首先认为：世界上的物质永远是发展的，形式也不是完全固定的，完成一个形式，还可以完成另外一个更高的形式，它不是永远固定的。基本上他认为发展是不间断的，世界是永远发展的。问题就在于他还有一个最高的形式，就是上帝，这一点是形而上学的因素。他说泥土到人的手里做了一块砖，这个泥土就完成了砖的形式，砖一块一块地再垒起来，就完成了房子的形式。这些都是粗糙的发展观点。他承认发展，这是辩证法的因素。他虽然说世界有两个根源，但认为这两个根源分不开，个别的东西与一般的东西是分不开的，这也是辩证法的因素。我们辩证唯物论主张一般和个别是分不开的，一切东西有一般的内容，也有个别的东西。我们的工作，有一般的号召，也有个别的指导。只有一般的号召，没有个别的指导，那就不能够切实地解决问题。

恩格斯曾经说过，亚里士多德研究过辩证法的一般形式。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亚里士多德是彻底地主张辩证法，只是说他研究过辩证法的形式。研究过辩证法的形式，并不等于辩证法。他研究过物质的现象，研究过物质的运动，发展是由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这种说法是有辩证法的内容。由比较低的形式，变为比较高的

形式，这种说法是很粗糙的。如人做砖，然后垒起房子，这是人为发展的，但是这里面，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形式，这些说法比德谟克利特又有一些进步，因为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是不变的。

亚里士多德承认发展，当时没有认识到发展的动力是矛盾，这方面证明他的辩证法是不够的。在矛盾这方面，他与德谟克利特是有矛盾的，德谟克利特认为斗争是万物之父，他的思想只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而不是一个真正辩证法的哲学家。

在认识论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接近唯物论的，主要就是他认为人的认识首先要依靠感觉来供给材料的。他说：如果没有感觉，思维、理性就等于一张白纸。这种说法是接近唯物论的认识论的。这种认识与苏格拉底、柏拉图是相反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认为，人的知识不需要依靠感觉供给材料，因为他认为理性是一切的根源，所以认识真理，就是认识理性。怎样认识理性呢？就是把眼睛闭上，自己去思考，也就是回忆。他认为人最主要的认识方法是回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活在世界上被个别的幻影蒙蔽住了，所以只好闭上眼睛回想一下。苏格拉底每当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就闭上眼睛去问一问上帝，而不依靠观察，只是依靠自己的思想来认识世界，所以这种思想与亚里士多德就完全相反。亚里士多德主张感觉是依靠搜集材料，他搜集的材料，差不多都搜集到寒带地方的东西。所以他认识上是唯物论的，他的研究工作已经带有科学的性质。

亚里士多德在科学研究方面，在哲学上第一次有系统地建立了逻辑学。我们讲的形式逻辑，古代逻辑，判断，概念，推理，还有逻辑思维的三大定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都是他提出来的。他第一次地把逻辑形成一个科学的系统，有些基本原理一直到今天还是对的。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我们就讲到这里。

以后希腊又被罗马灭亡了，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人民的生活很苦，研究学问的条件没有了，社会走向没落，所以后来就没有很出色的哲学家了。但最后还有一个唯物主义者，这就是伊壁鸠鲁。他的唯物论是怎样的呢？是进步的呢，还是反动的呢？这个问题，马克思有一个很正确的结论，就是："他是古代真正激进的启蒙者，他公开地攻击古代的宗教，如果说罗马人有过无神论，那么这种无神论就是由伊壁鸠鲁奠定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恩全集》第3卷，第147页）在亚里士多德以后，古代哲学就是走向唯心论，最后变成宗教哲学。亚里士多德本人已经是二元论。基本方向已经趋于没落，但后来又出现了一个伊壁鸠鲁，他发出了一点光彩，这就等于太阳快落了，又有一点耀眼的光芒。当时虽然希腊很混乱，将近没落的时代，但还是有一些人赞成科学，当时就是伊壁鸠鲁总结了这些科学，创造了唯物论，所以这个唯物论不能不说是进步的。当时希腊革命的力量是没有的，奴隶暴动是有的，但还没有推翻奴隶社会。伊壁鸠鲁的哲学还是有价值的，虽然有价值，但其内容没有以前的唯物论丰富，哲学的目的不是想保护贵族制度，也不是想赞成民主制度，这一哲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人民能够在混乱的社会中精神上得到一些安定。因为一个人认为世界上都是物质，死了就消灭了，因此人对一切就不怕了，反正是物质的，人是物质变的，也要归于物质。有了这种思想以后，失败了也不在乎，成功了也不是了不起的高兴，因此生活就是安定的。所以这个哲学的目的就很难说是革命的，或者是很进步的。当时没有民主的基础，这个哲学使人相信世界是物质的，这就与唯心论对立起来。所以，这个哲学还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这个唯物论的内容也是原子论，他继承了德谟克利特的学说，

德谟克利特认为世界的变化是由于不少的原子不断下落互相结合，最后产生了世界。伊壁鸠鲁也是这样一种看法。但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有点不同，伊壁鸠鲁认为原子落下来的速度是一样的，因原子有轻重之分而产生偏离，它包含着伊壁鸠鲁使人避免宿命论，生活更为安全的一种企图。这一点又说明与德谟克利特不同。伊壁鸠鲁认为原子落下来是可以偏离直线的，并认为原子有自由意志，这一点说明伊壁鸠鲁比德谟克利特有些进步，不是像德谟克利特那样机械。他认为原子下落有时可以偏一偏，这样一偏，彼此就发生了冲突，因此就互相结合起来了。

伊壁鸠鲁为什么说原子下落有偏离，有自由意志呢？这就是说社会虽然这样混乱，但人还是可以克服混乱的影响的，可以在不安全的社会里面找到一种安全的办法。他对人民的生活也有一些看法，他有一个目的，就是使人民的生活得到安定，因此他有一套理论，他认为人也是物质的，所以人在世界上应该设法满足物质的欲望，应该得到物质的享受，人的生活就是需要享受的。怎样得到享受呢？是不是花天酒地，乱喝乱吃呢？不是的。过度的享受会变成痛苦。所以乱吃乱喝反而得不到安定，享受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要造成痛苦，应该有节制，他提倡一种有节制的享受生活。所以他的哲学还不是一种劳动人民的哲学，还是一种奴隶主的哲学。

三、中世纪哲学

古代以后，就到了中世纪，这一时期的哲学，变成了一种解释宗教的工具，成了宗教哲学。

在中世纪，有经院哲学，我们中国也叫烦琐哲学，经院哲学没有讲的价值，我们只是稍微地提一下。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完全

是为教会服务的。所谓中世纪，就是指的封建时代。现在按照苏联历史学家划分历史时代的方法，是应该按照社会发展的阶段来分的。凡是奴隶社会就叫古代，凡是封建社会就叫中世纪，凡是资本主义社会就叫近代，讲现代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中国古代可能是殷朝，而中世纪可能是从周朝到鸦片战争。这个意思就是说，中世纪就是指的封建社会。

经院哲学是为封建教会服务的，也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西方的中世纪哲学就比较简单，我们中国就不同，中国封建社会如果是从周朝起，一直到鸦片战争，那我们中世纪的哲学就很多了。就拿我们的封建哲学来说，就不像欧洲那么简单。我们有孔子的儒家哲学，有老子的“清静无为”的哲学，有“礼教”、有“道德”。我们中国封建社会是最复杂的。我们提到这一点，就是希望大家看历史，不要用类比的方法来看，不是凡是封建社会都是一样的，具体内容是各有不同的。

欧洲中世纪的哲学就是经院哲学，经院哲学的内容总起来讲很简单，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中世纪的哲学，不能超出一个范围，哲学只能够解释圣经，哲学必须与神学一致，而不能够反对圣经，证明圣经是对的，这就是经院哲学的基本特点。

经院哲学的任务，就是要用一套逻辑的方法证明圣经中许多神话是对的，他们所利用的逻辑，主要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机械地利用了逻辑学的规律，譬如有一个很有名的逻辑，在经院哲学里面，就是关于“神”存在的逻辑。中世纪有一个经院哲学家，他第一个这样说：凡是最完整的概念，一定包含存在的概念，如果不包括存在，就不完整。怎样算是完整呢？“神”就是最完整的概念，“上帝”也是最完整的概念，“神”是最完全的，是至善至美的，因此，“神”的概念里面，必定包含“存在”。这样就得出

一个结论：上帝、神是存在的。

当时就发生了很大的争论，就是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他们主观上也是想证明主观的道理，但是结果变成了唯心论与唯物论的争论。唯名论就有一点唯物论的性质，实在论就有一点唯心论的性质。什么叫实在论呢？所谓实在论就是认为普遍概念是实在的，认为上帝与神是最普遍的概念，神是最高存在的。这种实在论既认为普遍的东西是实在的，愈普遍就愈实在，反过来说，就是愈不普遍，就越不实在，个别的人就不是实在的，这个说法是想证明上帝、神是存在的，所以它是一种唯心论的倾向。

但是，这种理论虽然一方面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出了毛病。唯名论起来反驳它说，你说只有上帝是存在的，个别的人是不存在的，那么个别人犯了罪，是不是就没有罪过呢？如果个别的人不是真实的，那么只有上帝与神才有缺点，个别的人就不会有缺点。所以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就在于唯名论认为真实的概念是真实存在的，实在论则不同意这种说法。

这个争论带有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性质。实在论与柏拉图是接近的，而唯名论就与德谟克利特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在经院哲学里面，正统派基本上是赞成实在论的，而反对唯名论，虽然唯名论证明上帝的存在，可是它的借口就有否认上帝的危险。所以在经院哲学里面，当唯名论出现以后，就受到了很大的攻击。唯名论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逻辑上的原因，逻辑上是表面的原因。实际上唯名论是代表自然科学发展的情况，代表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代表个人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权威，重视个人的存在，而对普遍的东西采取否定的态度。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都是用个人的权力来反对封建的统治，因此个人的权力就是真实存在的。

唯名论主要是在英国产生，因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较早。

四、十七八世纪的经验派和理性派哲学

下面，就可以讲一讲17世纪到18世纪的哲学，它们分为两大派。

英国的一派是经验派。欧洲大陆上的法国、德国、荷兰，它们是理性派。理性派主张知识的来源是理性，经验派则认为经验是知识主要的来源。毛主席在《实践论》里所指的经验派与唯理派，那些名词都是来源欧洲哲学的这两派。这两派中间都有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这两派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都是反对的，都是反对烦琐哲学的，我们讲教条主义也很烦琐，就是因为它只有一个空洞公式。不管是经验派的哲学，或者是大陆理性派的哲学，对中世纪的哲学都是采取根本的否认态度，中世纪的哲学，不管唯名论或是实在论，他们主观的企图，就是为圣经辩护，为宗教服务，而十七八世纪的哲学，就努力地脱离了圣经的限制，因此它是近代的哲学。

这种哲学是依靠自然科学的，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能有近代哲学的。所以要了解近代哲学，同时也就要注意到一些近代的自然科学。英国的经验派哲学，它带有更多的唯物论的性质，它比理性派哲学出现得稍微早一些。经验派的哲学是在英国产生的。唯名论的哲学也是在英国产生的。英国是资本主义的比较早地得到胜利的国家。17世纪英国的情况，如1640年有克伦威尔革命，1668年贵族复辟，到了1689年又发生了革命，这次革命贵族与资产阶级达成了妥协，所以17世纪就是英国革命的时期。英国在革命以前，也还是有很多农民，在15世纪中有农民战争。德国在当时还没建立起资本主义的社会，所以真正资产阶级革命得到胜利的只有英国，在这个社会里，产生了英国的经验派

哲学。

英国经验派哲学第一人就是弗朗西斯·培根。他在16世纪末期就开始活动，他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他的哲学思想是直接与经院哲学对立的。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是要利用一套抽象的逻辑公式，企图证明上帝的存在，不研究自然科学，只是凭一些宗教的公式来证明圣经里面的许多教义。培根就坚决反对这种方法，他反对逻辑，凭理性来认识世界，而主张根据经验来认识世界，他反对夸大理性的作用。他有一些有名的话，他说：人的理性是非常狭小的，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好像一个人关在自己的房子里，好像关在修养院里面。他说一个人如果凭理性来认识世界，这就根本不能认识、根本不能懂得自然。所以他说，人认识世界不能单靠理性，主要是要靠研究具体的事物。培根是很重视科学的，根据科学研究的方法，他总结出来了一套认识真理的方法，就叫做归纳法，它是与演绎法对立的。培根认为演绎法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它只是根据一个教条做出一个具体的结论，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就是演绎法。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就是依靠演绎法，它把圣经看成教条，因此人们的思想就超不出圣经的范围。培根就坚决反对这种演绎法。演绎法用一般的道理推论事物，这并不是完全没有用途的，用一般的原理指导我们研究具体事物，这还是可以的。譬如我们研究阶级斗争的时候，我们更要注意中国的阶级斗争。演绎法可以指导我们研究新的事物，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只是不要把它当成死的公式。培根提出归纳法，他先研究具体的事物，然后从具体事物中找出共同的根本特点，这就是归纳法。

培根第一次把自然科学的方法总结为归纳的方法，这是培根对自然科学的贡献，在当时来讲，提出归纳法是一个创造，因为他把科学的方法提高到原则的高度，这也是一些唯物论的倾向。培

根的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恩格斯就讲过，培根的形而上学思想是很厉害的，他受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支配。为什么他受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的支配呢？因为他根据他的归纳法所得出的结论是形而上学的，他说根据研究可以找出一般的规律，因此就可以证明，世界上的许多东西是由许多的基本因素构成的，这些基本因素的性质混合起来就产生了世界的物质。他认为物质的基本性质包括，重量、颜色、冷热、声音，这就是世界物质的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是永远不变的，而且是彼此孤立的，它们只能够混合起来产生世界上的一切东西。科学的研究就是把这些基本原则找出来，用自己的基本原理来说明一切的现象。所以，培根的机械唯物论，就是认为世界的物质都是机械地混合起来，这是它形而上学思想的主要特点。

但是，培根的形而上学思想也并不是很纯粹的，多少还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这种因素就表现在他认为物质自己是能够运动的。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序言中说过，培根是承认物质是有一点冲突的，这一点还不是机械的。机械唯物论认为物质是完全不会动的。培根在这一点不完全是机械的，因为他还承认物质的因素是各种各样的，还不是像后来机械唯物论认为物质的根本性质只有两三种，培根不是这样。所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序言中说，唯物论在它的第一个创始者培根那里，本身还包含着多方面发展的萌芽。一方面，被赏心悦目的、诗意的魅力环绕着的物质似乎以迷人的微笑吸引着人的整个身心。另一方面，以格言形式表述出来的学说却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

培根的政治思想是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哲学上是经验唯物论，学术上是重视自然科学。他说要把社会搞好，一定要开放商

业和航路，鼓励工商业者，并主张调剂平衡工商业，也就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另外他还主张驱逐偷懒的人，反对浪费的人，反对奢侈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当时偷懒，浪费，奢侈的人都是一些封建地主阶级，这就带有反封建的性质。培根认为资本家是勤勤恳恳的人，资本家是不懒的。所以培根是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

第三次讲课

今天继续讲。

培根以后的经验派哲学家，就是霍布斯，他比培根稍为晚一点。培根在17世纪初期，霍布斯在17世纪中期。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论思想进一步地发展了。在当时的英国来说，也是比较彻底的唯物论者，所以比培根更彻底一些，同时形而上学这方面也发展了。总的来说，霍布斯的哲学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霍布斯和培根都是贵族出身，但思想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在政治上，最初一个时期，霍布斯是拥护君主专政的。后来（1651年）克伦威尔革命的时候，因为他的主张与民主政治有矛盾，就逃到欧洲去了，但当克伦威尔执政以后，他又回到英国来了。所以他的思想是很顽固的，他坚持专制制度。克伦威尔以后，经过二十多年，君主专制又复辟了。当君主专制制度复辟的时候，他就与君主专制妥协。所以，他的思想和政治方面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他的哲学也就与资产阶级的倾向分不开。

霍布斯怎样发展了培根学说呢？主要是把一些自然科学的原理进一步地应用到哲学上来；在认识论上都是一致的，也是认为

感觉经验是知识的主要来源。霍布斯只是用一些数学来解释感觉。他认为我们的知识首先是从感觉来的，我们从外界接触许多感觉，各种感觉就像数字似地加起来，就成为我们的认识，思想认识是各种感觉的结合，人的思想是感觉的结合，这一些结合，我们看起来当然是不合理了。我们对思想感觉有很高的科学根据的，巴甫洛夫学说就告诉我们感觉是怎样来的，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当时的人们是没有这些知识的，他们只有数学和医学的知识。机械唯物论的特点就是喜欢用机械学和数学来解释一切，那些人的思想都是机械唯物论，他们认为感觉就是物质来的，真正的知识是对客观物质的一种观察的结果，这种思想是合理的，基本精神是对的，但他的解释是很机械的。承认物质的存在是他唯物论的原则，但怎样看物质，他与培根就有些不同。培根承认物质有各种各样的性质，物质有许多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的性质是各种各样的，颜色、大小都是物质基本的要素。霍布斯就把物质的概念更简单化了，不把物质的根本性质看成是各种各样的，认为物质的根本性质只有重量，能够占据空间，在哲学上就是延长性，还有一种讲法就是广袤性，能够在空间占据位置。这些都是机械力学的性质，认为物质的基本要素只有两种，认为颜色、重量等等都是表面的现象，不是客观物质的基本性质，只是人的感觉，实际上物质不一定是那样的。机械唯物论把物质简单地看成物体，这种物体就是物质的性质。所以这是进一步地机械化了。

培根的思想基本上是唯物论，霍布斯就更进一步地把物质的性质看成是更简单的东西。所以马克思有句话，就是说，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论系统了。这种唯物论对世界上的形形色色各种很生动的感觉没有兴趣了，霍布斯的哲学有这个特点，他反对精神的独立存在。我们了解了这一点，也就大体上可以了解了霍布斯

的哲学。霍布斯对宗教、上帝是坚决反对的，这与培根不同，培根虽然一方面讲唯物论，但他另一方面还是承认上帝存在的；霍布斯则否认上帝的存在，认为世界就是物质的，我们所认识的东西都是从物质来的感觉，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就没有别的东西，所以上帝与神都是空想。这种思想是唯物论。

霍布斯的社会思想，认为人类是希望幸福的，他有这样一句话，"哲学的目的在于使人永享无上的幸福"。他说人的行动就是有一种物质的行动，这就是用力学来解释人的行动，好像人的行动就是一种机械运动，人之所以有冲动就是为了幸福。所以要想把社会搞好，就要调和各种人的行动，使得人都能够得到幸福。用什么办法使千千万万的人都能够得到幸福呢?他认为有两种办法：一种就是社会契约，这种思想把唯物论发展了。千千万万的人订一个契约，规定出大家的权利，这就与封建专制思想相反。他的思想就是使大家福利得以调和，能够使战争避免。除了契约之外，还要有权力，就是要有一个人在上面统治。所以他的思想是矛盾的，一方面提倡有契约，一方面又提倡君主专制，因此他后来就站在拥护专制政府的一方面。当专制政府有权力以后，他又与专制政府妥协。英国资产阶级就是有这种特点——善于妥协。

霍布斯是英国唯物论经验派最彻底的一个哲学家，在霍布斯以后，英国哲学家就向唯心论方面发展。英国在17世纪大体上是革命的，到18世纪革命就完结了，资产阶级当权以后，它逐渐就变成了保守的阶级。19世纪末又有了第二次革命，这是一种妥协性质的革命。资产阶级起来把复辟的专制制度打倒，但打倒以后仍然维持着君主制度，不过设立了议会，资产阶级与贵族妥协了。这种结果为什么会产生呢？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有妥协性，另一方面也是贵族的利益与资产阶级能够结合起来。

英国在十七八世纪的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

第三个经验派哲学家——洛克就变成了二元论。他一方面承认物质存在，另一方面又承认上帝和神。他说，物质所以能够存在，还是由于上帝的力量。亚里士多德也是这讲法，物质是存在的，但物质的运动要靠精神来推动。英国的二元论就是形而上学的，它认为精神与物质是互相分离的，这就是洛克二元论的特点。

但是，洛克的哲学，在认识论上还是培根、霍布斯的思想，认为知识的来源是感觉，如果离开感觉，人就不可能有任何知识，这一点是唯物论。洛克有一句话，心灵是一张白纸，要这张白纸有字，就要靠人的感觉，这一句话是唯物论，主张认识的惟一来源是感觉。但另一方面他又有唯心论的倾向，他说，人的感觉所认识到的东西不一定都能够认识到物质的根本性质。我们有一些感觉只能够认识到物质的第一性性质，有一些只能够认识到物质的第二性性质。哪一些感觉只能够认识到第一性性质呢？比如我们的触觉，只能够接触到物质的延长性。延长性，这就是物质的第一性性质，另外一些感觉，如眼睛的感觉，耳的感觉，看到颜色，听到声音，这就是物质第二性性质。物质的第一性性质与第二性性质有所不同，第一性性质是物质本身客观存在的，是物质真正的本质，而第二性性质就不一定是物质本身的性质，只是我们主观的感觉，所以第二性性质，并不是物质的性质。他把感觉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划分成为根本不同的两种，一种感觉能够反映客观物质的本质，另一种就不能反映客观物质的本质。对某些感觉就相信，对某些感觉就不相信，这就是二元论，又是唯心论的倾向。我们知道唯心论——马赫主义的特点，就是把感觉看成是主观的，相信自己的感觉，自己做事做坏了，大家都反对，自己一看人们的眼睛都在反对，他说这是我主观的感觉。洛克就是系统地证明

有些感觉根本是不可靠的，所以是唯心论的倾向，这就是洛克二元论的认识论特点。他一方面主张认识的来源是物质的，另外又表示是不相信感觉的，这就成为后来英国经验派发展到唯心论的一种因素。

洛克的哲学向两种方向发展，一是在英国发展了唯心论，另一方向就是发展了唯物论。当洛克死了以后，又出现了一些有名的思想家，这个集团把洛克的唯物论彻底发展了，坚决承认物质是由感觉来的，不分第一性与第二性。这个集团最主要的人就是托兰德，也可以说是自由思想家的领袖。还有一些自然科学家，也是坚持唯物论的，17 世纪大的自然科学家，都是自由思想家，唯物论者，发现氧气的，就是自由思想家发现的。后来这部分人就发展到法国唯物论的一派，另外一部分就在英国发展了唯心论。

发展唯心论的是一些什么人呢？主要有两个人，就是巴克莱和休谟。

关于巴克莱这个人，因为大家都学过《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大概都比较熟悉。列宁一开始就揭露他的主观唯心论观点，是 18 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反动倾向的代表，在哲学上是公开地、明确地把自己的目的指明出来，坚决反对唯物论。巴克莱比马赫主义还稍微老实一点。经验批判论这些人，他们的哲学也是主观唯心论，但他们不公开地反对唯物论，而是偷偷摸摸、躲躲藏藏地反对唯物论。巴克莱则是公开地表明自己主观唯心论的立场，公开地反对唯物论，如果说有不同，巴克莱与后来的经验批判论就是这一点不同。这是因为当时资产阶级有力量，他敢于公开地反对唯物论；而马赫主义的时代，资产阶级已经走向下坡路，所以他不敢公开地反对唯物论。马赫主义在中国很有影响，在“五四”时代与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在中国基本上就是马赫主义，包

括胡适在内。胡适的实用主义，好像有些科学的味道，实际上就是主观唯心论，不仅实用主义这样作，马赫主义也是如此，它也是不敢公开表明自己的反动立场，这并不是说巴克莱比马赫更好一点，或比较老实一点，而是由于当时的英国资产阶级是向上的，它还有胆量来反对唯物论。反对唯物论的办法就是把洛克的二元论变为主观唯心论。他认为洛克承认物质是不对的，承认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是不对的，他认为一切感觉都是主观的，感觉以外没有客观的物质。巴克莱的主观唯心论，大体上就是这样。

巴克莱反对洛克的二元论，主要认为把物质分为第一性和第二性是不对的，他认为一切感觉都是主观的，不仅颜色、声音这些是主观的，就是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如大小、重量也只是我们主观的，它们不是物质本身的性质。所以在巴克莱看来没有客观物质的性质，更没有客观物质。为什么没有客观物质呢？他认为我们所感觉到的东西都是主观的，既然我们只能够认识我们的主观的东西，我们就没有权力再去断定我们的感觉以外还有一些客观的物质，所以物质是不存在的。他认为物质是纯粹抽象的概念，所以唯名论最初虽然有唯物论的倾向，但也可以被唯心论利用，也可以变成唯心论，原因就是唯名论不承认概念也是反映物质的内容，不承认概念是物质的反映，他认为一般的人都是一个空名字，概念都是空名字，这就是主观唯心论的倾向。他不承认思想是客观物质的反映，而认为概念就是主观的概念。

英国的唯物论是继承了唯名论的传统，所以霍布斯也有唯名论的弱点，洛克也是同样。巴克莱就利用唯名论这个弱点提出了唯心论的看法。认为：抽象的概念都是一个空名字，我们真正认识到的东西是感觉。在巴克莱看来，物质就是把我们的这种感觉综合起来，给它一个物质名字，所以物质是不存在的。这样就达

到了唯心论的目的。

巴克莱不仅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他个人还是一个主教，所以他的哲学是为宗教来服务的。

在巴克莱以后，就是休谟。他活动的年代也是18世纪。18世纪在法国是唯物论时代，而在英国已经是唯心论的时代了。休谟的思想，是以不可知论为特征，这种思想基本上还是唯心论，但他企图遮盖巴克莱的主观唯心论太荒谬的地方，他创造了不可知论的哲学。“不可知论”也叫“怀疑论”。他赞成巴克莱的一个原则，就是认为客观物质不存在，在这一点上，他与巴克莱是一致的，是主观唯心论。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巴克莱，因为巴克莱是主教，相信上帝，他否认了物质，坚持上帝是存在的，没有物质以前世界上就有了精神，物质不是客观存在的，精神与上帝是存在的，这是巴克莱的思想。休谟则认为：物质固然不能说是存在的，上帝与神也不一定是存在的，理由还是巴克莱自己的理由，就是我们的认识不能超出自己的感觉，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权力说在我们的感觉以外还有上帝与神的存在呢？这一点就与巴克莱不一致了，一方面他反对了唯物论，不相信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另一方面他又反对有神论。他认为究竟有没有神，我们不能知道，我们只能够承认自己的感觉，感觉以外可能有什么东西，我们是不能知道的，这就是“怀疑论”。它不是主观唯心论里面的“唯我论”。“唯我论”是认为世界上只有我，这样说怀疑论也是不承认的。世界上有没有我，有没有上帝，都不能断定，这实际上还是唯我论，只是他自己不承认，所以叫怀疑论。

休谟对科学也表示了一些意见。科学的特点就是能够认识规律，科学知识就是客观规律的知识。当时认为客观规律就是因果规律。因果规律怎样理解呢？按照唯物论来讲，因果规律是客观

物质的反映，它是经过科学证明的。但当时的科学家不懂实践，他们认为科学的规律，就是两种现象经常结合在一起，认为就是因果的关系，究竟这个关系是不是那样密切呢？那很难讲。比如天气冷了不穿衣服就伤风，按照休谟的看法，这个关系并不是客观的关系。我们有两种感觉，前年发生这种感觉，去年又有这种感觉，今年两种感觉又结合在一起，因此就觉得在两种感觉中间有些联系。究竟这个联系是不是那样密切呢？那不能断定，仅仅是因为这两种感觉重复了几次，所以我们觉得有这个关系，以后是不是有，那不能保证，所以他对因果规律的可靠性也是怀疑的，好像是两种感觉偶然结合在一起，因此因果规律也只是主观的联想。是否真正有客观的必然性，那也不能够断定。因为他认为感觉重复一千遍，一万遍，可能在一万零一次就不能结合了，事实上是不可能如此的。所以休谟的哲学是反科学的，马赫主义就继承了这种传统，实际上也是反科学的。

在休谟以后，还有一种哲学带有一点唯物论，就是一种羞羞答答的唯物论。它承认科学的因果规律是普遍的，但这种规律是不是物质的规律，还是抱怀疑的。他相信科学规律的可靠性，但还不敢承认是客观物质运动的反映，因为怕承认了以后，会引起社会的太大的波动，因此就避免提出这个问题，仅仅提出的规律是真实的。猴子变人是真理，但是否是客观的规律，它避免提起，这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上所讲的——羞羞答答的唯物论。

休谟本人的怀疑论、不可知论，还具有一种主观唯心论的倾向，是英国资产阶级保守性的反映。这种倾向也不能完全说它是“有神论”。他与巴克莱还有所区别。所以在这方面也可以说对科学的发展还没有太坚决地反对，因为尽管资产阶级是保守的，但它还是要科学的，因为当时的资产阶级还有发展的余地。所以巴

克莱的唯心论是反动的，休谟的思想也可以说是英国资产阶级两面性在哲学上的表现。

现在讲理性派。

理性派与经验派就不同了，在认识论上，经验派认为认识的来源是感觉，至少是认识的主要来源，认识真理要从感觉开始。所以在认识论上，经验派是接近唯物论的，理性派离开唯物论则远一些。

理性派又叫大陆理性派，就是反映了欧洲大陆一般比英国落后一点，封建势力比较大一点。英国比较先进一点，对科学知识更注重一些，因此，英国资产阶级就能够开始建立经验派的哲学。欧洲大陆是比较落后的，在十七八世纪中，只有荷兰的资产阶级发展早一点，但他是一个小国，英国起来以后，荷兰就逐渐衰落下去，除了荷兰以外，法国就比较落后了，所谓落后就是资本主义不太发展。德国资产阶级在 16 世纪曾参加过农民暴动，但很快就失败了。法国在 17 世纪的时候也是落后的。法国在 18 世纪才起来革命。所以理性派哲学的产生，也反映了欧洲大陆的比较落后，虽然落后，但还是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理性派哲学还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新时代，还是与中世纪有根本的分别，主要是超出了经院哲学的范围，脱离了圣经的限制，而成了独立的科学。

第一个理性派哲学家就是法国的笛卡尔，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里提到，笛卡尔的哲学是二元论。他主张世界上有物质与精神这两种东西的并存，并且是毫无关系地并存着。如一个人有肉体，同时也有自己的精神，虽然是在一个身体内，但两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他认为不可能有直接的关系。物质就是一种物质，完全是一种死的物体，不会动，没有什么感觉，像一块铁一样。精神与物质则是完全不同的，它能够思

维，这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种东西，所以不可能有直接的关系，只能够并存。那它们怎样发生关系呢？他认为这个关系是一种间接的。讲到这里他与宗教就妥协了，他说物质与精神所以能够发生关系，是靠上帝的力量。人的身体与精神发生关系是靠脑子里有一个“松果腺”，上帝就掌握着这个东西，靠这个“松果腺”，上帝在哪里指挥，如果没有这个东西，身体与精神是不会发生关系的。

笛卡尔讲到物质性质的时候。他有许多唯物论的思想，他认为一切东西都可用机械因果规律来解释，他认为感觉外物就是机械作用。但当他解释精神的时候，他又倾向于唯心论，与宗教妥协，这方面就表现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因此他有机械唯物论的一方面，又有唯心论的一方面。他基本上是与封建思想做斗争的，尽管他是二元论。在当时的欧洲教会已经不能允许他，所以他还是受迫害的。

他的认识论基本上是唯心论的倾向，他认为认识真理要靠理性，他认为感觉是不可靠的。他认为研究问题的方法，第一就是怀疑，一切都怀疑，连我们自己也要怀疑，这一点也有二元论的性质。凡是我们所看到的东西都要怀疑。因为他对宗教和一切都怀疑，也有进步的因素。那么怀疑到最后，是不是什么都不相信了呢？到最后碰到有些问题不能怀疑了，根据理性来看，那就一定是真理了。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我思故我在”。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首先怀疑一切物质不存在，什么都不存在，可是怀疑到最后，有一件事情不能再怀疑了，“我”最后在想问题，我在思索这一件事情是存在的，因此我是存在的。这个“我”就不能再怀疑了，在理性认识上觉得是清晰明了的，用不着凭经验去研究，用不着搜集材料，只要闭起眼睛来一想，这件事情就很

清晰明了，这就是真理。所以他的认识方法就是依靠理性直观，不是靠调查研究，只是闭上眼睛想，这种方法当然是唯心论的认识方法。可是这种方法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与中世纪来比，中世纪的人认为研究真理的方法，首先是研究圣经。笛卡尔就不是这样，他对圣经是半怀疑的态度，他研究问题首先是依靠自己的理性，所以他是向中世纪的人宣布人的理性的力量，现在来说，当然是唯心论。但我们用马列主义的历史观来看，他是起到了进步的作用，因为他对教会的教条迷信宣布了人的理性的权威。他之所以是进步的，就是因为有这些原因。但这种方法是唯心论的，所以他得到的结论，也就不是彻底的唯物论了。他为什么得到二元论的结论呢？就是因为他这样了解：不仅是我的感觉是清晰明了的，就是物质存在也是清晰明了的，我存在有一个身体也是不能怀疑的，再一想上帝也是存在的，因为世界上有这些现象，没有上帝哪能够行呢？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肯定：笛卡尔有许多辩证法的思想，但 17 世纪未能摆脱形而上学的局限，例如把理性与感性分开，否认感性，孤立地提高理性，这都是形而上学。他说物质与精神根本没有关系，这也是形而上学。但他也有一些辩证法，这是个别的，他讲物质问题的时候，有时也承认世界的发展，承认世界的联系。他对世界发展的思想，多多少少还是一种“原子论”的思想，认为世界上的物质是由许多细微的原子或灰尘构成的，这样就产生了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承认了这种变化。对物质世界，对某些东西承认变化的，这当然是不多的。

笛卡尔以后，就是斯宾诺莎。他是理性派里面相当彻底的唯物论者。他是荷兰人，一生住在荷兰，是当时欧洲进步的地方，他本人是犹太人，他的思想是唯物论的思想，认识论基本上与笛卡

尔一样，不太重视感觉的作用，认为真理就是依靠理性来发现，所以他在认识论上是理性派，可是他的整个世界观是唯物论的。他的唯物论主要表现这样一点，就是他反对笛卡尔的二元论，反对笛卡尔把物质与精神机械的分开，看成两种没有关系的东西，他认为物质与精神是整个客观自然界的两个方面。整个世界是一个实体，实体有两方面的性质，即有两重性，一方面它能够占据空间，有广延性，另外一方面，实体又具有思维的性质，所以他认为物质的性质与精神的性质，都是同一个实体的两种属性。当时的人很重视数学，他用曲线来解释实体，他说实体就等于一个曲线——“⌒”，你看它上面是凸出去的，下面是凹下去的，一个实体有两方面，你看起来以为物质与思维是根本不同的两个东西，可是仔细地想一想，它就与这曲线一样，正是一件东西的两个方面。他用这一套理由，来证明世界上只有一个实体，并不是有物质与精神两个实体并存。

斯宾诺莎这种思想就符合了唯物论的原则，把精神看做是物质实体的一种属性，并且把精神与物质看成互相适应，因为它是物质的另一方面。好比一条曲线一样，物质是曲线的这一方面，精神则是曲线的那一方面，这里面就包含了精神反映物质的意思。他认为反映不一定通过感觉，理性可以直接反映物质，因为精神与物质是直接结合着的，因此不经过感觉也可以认识真理，这种思想是根据数学来的。理性派对数学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数学上的定理，不需要感觉就能够认识的，如数学上有：“两点中间直线最短”。这是几何上的定理，这是自明之理。资产阶级讲数学时，就常讲这句话。他认为数学的真理是最高的真理，因为它不需要经验，这是理性派的曲解。实际上数学上的一些定理，也是从经验中来的。“两点中间直线最短”，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实际上还

是经过经验来的，如初生的小孩子走直路就不一定会。当然，这是很简单的道理，理性派就依靠这些来叙述他们的认识，这是唯心论。

斯宾诺莎就认为理性是直接反映物质的，他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其他的方面。斯宾诺莎坚决相信世界上的物质是依照因果规律变化的，相信因果规律是可靠的，他认为客观的规律是必然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必然的。因此也有他形而上学的性质，因为他坚决相信世界物质的必然性，所以他否认有偶然性，认为所谓偶然就是主观的。按照辩证法来看，偶然与必然是有区别的，必然是客观的，偶然也是客观的。形而上学认为只有必然，而没有偶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原因，有原因就是必然。但辩证法不是这样认识，辩证法唯物论承认一切事物都有原因，这一点是肯定的，但原因中间有能够引起必然性的原因，有一些是偶然的原因。原因是各种各样的，可以变成必然的，也可以变成偶然的。辩证法是怎样分别的呢？有些原因是重大的原因，能够使得事情变化一定产生那一种结果，没有那个原因就不能产生那一种结果，这种原因是必然的。如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社会就要产生一定的变化，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一定发生战争，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战争的关系是必然的，但战争的爆发，有时候常常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引起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怎样爆发的呢？就是奥国皇太子到塞尔维亚（南斯拉夫）去，在路上被一个人打死了，这样就使得奥国皇帝进攻塞尔维亚，英国，法国都加入了，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打起来了。这是不是说打死奥国皇太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必然原因呢？不打死这个人，是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没有呢？不能够这样说。没有这件事情，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会

发生的。辩证法唯物论把这点看得非常重要，因为要分清偶然与必然，然后才知道哪些事情的发展是重要的，哪些事情是不重要的，这才能分别出轻重。

所以，机械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论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同的。斯宾诺莎承认科学规律是可靠的，是必然性的，这一点是唯物论。斯宾诺莎有一句话："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句话是斯宾诺莎自己讲的。他认为认识了必然就有自由。他的认识当然和辩证法唯物论还有不同，辩证唯物论认为：认识了世界再来改造世界。他的认识还是机械的，他说人只要认识了必然，就顺着必然发展的情况过下去，那就是自由，所以他的理解程度还是很低的。他有一个比方也是机械的，他说，一块石头从山上滚下来是必然的，倘若石头能够像我们人一样知道自己会滚，它就觉得自己很自由。这句话是他讲出来的，在哲学史上是一种创造。

斯宾诺莎的唯物论，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但又有辩证法的因素，就是自由是必然的认识，把必然和自由的对立统一关系认识到了，他不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机械地分开；他把精神与物质看成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这都是他的辩证法的因素。

现在讲莱布尼兹。他是德国人。十七八世纪中，德国比法国落后。德国那样一个小的国家，是二三百个诸侯统治的国家。像汉堡是一个城市，但它又是一个国家，像我们的一个县一样大，也是一个国家。像德国一个有名的人叫歌德，他就做了魏马国家的宰相。魏马也不过几万人口，像我们中国的一个小县那样大，实际上等于县里的一个秘书长。16世纪农民暴动失败以后。德国就分裂成为很零散的许多小国家，慢慢地资本主义发展了，中部莱茵河地区有些资本主义，也就有了要求科学的倾向，但也有落后的方面，因此就有了唯心论的倾向。

莱布尼兹的哲学就是“单子论”，认为世界是无数的精神的单子组成的。单子不是原子，原子是物质的东西。按照莱布尼兹的理解，整个世界充满着无数的单子，这是反映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倾向。单子会发展，就是由感觉到理性，没有什么物质的，物质是什么东西呢？物质是单子自己主观上产生的一种幻想。人是怎样来的呢？就是我们的感觉变成了理性，是不是有我们的肉体呢？就是单子一点一点地发展的。他也没有道理，他就是这样认为。这种思想一方面是唯心论，认为单子是惟一的东西，因此最后就承认了上帝；另外一方面他也有发展的观点，这是辩证法的因素。主要还是形而上学的因素，因为单子是一个一个的，是彼此孤立的，但单子本身是发展的。莱布尼兹在科学上是有贡献的，这种发展的思想与科学发展有联系。他在科学上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创造了高等数学，就是微积分。主要是研究变量的数学，低等数学是研究固定数字的，如 2＋2＝4，高等数学是研究数量变化的结果怎样，把一个数字缩小会发生什么结果，把数字扩大发生什么样的结果。积分就是把数字扩大，比如一个多边性的形体，我们把每一个边都缩小，这样边的数目就增大。缩小到最后，边就没有长短了，而变成圆形的了。微分就是研究这些问题，边的数目增大就是积分。整个微积分大体上就是研究这一数的问题，这是一个常识，实际上研究起来是很麻烦的，初等数学不研究这些东西，高等数学是研究数量变化的，它是莱布尼兹的发明。

关于十七八世纪的经验派和理性派哲学就讲到这里。下面开始讲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论哲学。

五、18 世纪法国唯物论哲学

18 世纪的唯物论，又称战斗的唯物论，这与 18 世纪的阶级斗

争有关系的。我们学过近代史，大家都了解，18 世纪法国大革命，这是资产阶级革命中最彻底的，在世界上还是没有的，它接近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性质。这个革命证明了法国当时阶级斗争的尖锐性。一方面法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很顽固，不像英国的封建贵族富于妥协，它是凭借武装反对革命运动。路易十六本人就非常愚蠢，他的领导人，就是他的老婆，他老婆很落后，所以最后把他送上了断头台。基本问题是法国封建阶级的顽固性，它除了坚决反对资产阶级以外，再没有办法。英国的贵族自己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他把土地变为牧场，用来放羊，生产羊毛，由资产阶级收买，这样两个阶级就妥协起来了，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并不是英国资产阶级会妥协。法国资产阶级有力量，它不能够忍受封建阶级再统治下去了，再加上广大的人民的力量，因为法国封建阶级的顽固性还不仅表现在对资产阶级的问题上，这还是第二位的问题，第一位的问题是非常残酷地剥削了广大的人民，所以当广大人民起来的时候，就成了一次很大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也就利用这一形势进行了一次非常彻底的革命运动。

18 世纪的唯物论就是反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阶级斗争的尖锐情况。资产阶级是代表人民向封建阶级进行斗争的。整个 18 世纪从最初到最后就贯串着这样一种思想。最初的思想代表者是伏尔泰和卢梭。

我们提纲上讲伏尔泰是反教会的思想先锋，他在 18 世纪前期，还不是唯物论的思想，只是伏尔泰思想。他的思想是接近唯物论的“自然神论”。就是披着神的外衣，实际上是唯物论，这个唯物论还不太勇敢，还承认有神，但这个神有一个限制，他认为这个神不在世界之外来管理世界，而是在世界之中，依靠自然科学的规律，来管理世界。所谓神，应该是想怎样就怎样，他这样

一说，神的作用就减弱了，认为神也是反映因果规律的，所以这种思想实际上就是承认客观事物是存在的，因此实际上是唯物论。他为了避免引起旧势力的过分反对，还是承认有神，但伏尔泰对教会已经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他写了很多文章，全部是揭露封建统治阶级贪污腐化的。他提倡科学，认为科学的规律是真理，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对人民的影响很大。

卢梭这个人最有名的就是写了一个《社会契论》，讲的是社会契约思想。他的基本思想认为：人生下来就是平等的，各人有个人的利益，后来因为个人利益有冲突，大家订立契约，订立了契约，然后才有社会。社会为什么变坏呢？坏的原因就是由于私有财产，各种制度发生变化，使得有些人违背了平等契约，封建制度就是最明显地违背了平等契约，因此，要反对封建制度，恢复到平等契约的时代。所以他的平等思想，在法国革命中影响很大。法国雅各宾派的政治理论就是从卢梭那里来的。资产阶级曾经夸大这件事情，说雅各宾专政取决于卢梭这一本书的作用。它的确对封建阶级起了一种毁灭性的作用。

法国的唯物论主要是以下四个人：狄德罗、拉梅特里、霍尔巴赫、爱尔维修。他们是法国唯物论的总代表，他们是百科全书派重要人物。这几个人有的是继承了英国经验论哲学，有的是继承了法国笛卡尔的唯物论。狄德罗与爱尔维修是从英国来的，他们的哲学在认识论上注重感觉，认为感觉是认识的主要来源。爱尔维修还有一个特点，他把感觉论运用到人的教育上，人的发展是感觉发展的结果，因此人是受环境的影响的。马克思曾经说过，法国唯物论这种感觉论是可以引出社会主义的结论来的。他主要就是根据爱尔维修的学说，既然认为人性的好坏是环境造成的，因此要想改造人，就必须改造环境，环境改造好，人性才能够改造

好。这种思想就可以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因为社会主义就是要使人改造得好一点。

狄德罗是法国唯物论的领袖。拉梅特里和霍尔巴赫主要是继承了笛卡尔的唯物论。他们主要是机械唯物论。拉梅特里写了一本书《人是机械》。霍尔巴赫主要写了一些有关自然发展的书，他是直接反对宗教。

法国唯物论总的来讲，这些人思想的共同点，基本上是机械唯物论。认为物质最主要的性质是机械的性质，与以前的机械唯物论是一样的，物质就是广延性，有重量，有大小这一类的性质。但法国的唯物论比以前的唯物论，比笛卡尔，霍布斯有一些进步的地方，就是认为物质的属性还不仅是延长性，可以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当然他还没有认识到如色彩、声音都是物质自己的性质，但他们认为延长性是物质的一种属性，同时还有其他的一些属性。所以，物质与运动发展还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运动是物质的一种属性。因为以前的机械唯物论认为物质根本不变，这种唯物论是承认了变化的。当时他所了解的变化是有一种限制的，就是把变化看成是一种循环绕圈子，所以基本上是承认数量与位置的变化，变来变去还是回到原来的状态。

卢梭的民约论思想，解释社会就是一种循环的看法，人是自然的，各人有各人的利益，根据个人的利益大家订立契约来组成社会。以后社会的财产私有了，就产生了坏的现象，最后又经过革命，又重新订立契约，又回到原来平等契约的方面去，这种看法对社会就是循环的，不是像马克思主义把社会看成是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这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种局限，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不会把发展看成是不断的——由低级到高级。如果那样看，就是现在的社会将来还要垮台。它所想的现在的社会就是最合理的

社会，因此它虽然承认物质和运动是分不开的，但只承认数量、位置的变化，所以还是机械唯物论。这种机械唯物论的性质也表现在对精神发展的认识上。

法兰西唯物论在解释精神发展的这种现象上，它的见解也是机械的，它认为精神的发展就是数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比如拉梅特里说：石头和人的认识只有量的差别，他认为石头也有感觉，与人所差的只是量的差别，没有质的差别。只承认数量的变化，不承认质的区别，不承认低级和高级的区别，这就是机械唯物论的特点。

十七八世纪的唯物论就是机械唯物论，就是因为它用机械力学的原理来解释世界，只承认量变。所以这种唯物论的看法，也可以叫“物活论”。“物活”就是物质都是活的，生命的多少而已。不过法国唯物论的哲学家里面，狄德罗思想是比较接近辩证法的，虽然不是那样明确。狄德罗认为感觉至少可以分两种：一种是迟钝的感觉，一种是活跃的感觉。无生物也有感觉，但它的感觉是不活跃的，动物和人的感觉是非常活跃的。他认为鸡蛋与鸡是不同的，鸡蛋没有活泼的感觉，鸡有活泼的感觉，这就是辩证法的因素。辩证唯物论也承认这一点，承认鸡蛋是无生物，但它也有反映的作用，它的反映作用与感觉不同。人有理性，无生物是没有理性的，但无生物也有反映，它能够根据外界的影响发生变化，这就是一种反映。

法国唯物论坚持因果规律是真实的，是必然的，同时也同斯宾诺莎一样把因果规律看得很机械，走到形而上学方面去了。因此它否认自由，认为自由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实际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在根本上来说都是必然的，所以，他们的唯物论有点接近“宿命论”的思想。对自由没有看成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这与辩证

唯物论不同。辩证唯物论一方面承认客观规律的必然性，一方面又可以认识客观规律，是能够进行创造的，即能够有自由，能够根据规律来创造，能够不受规律的奴役。但法国唯物论看来，人好像没有自由，它认为人的意志实际上是和机器一模一样的。法国唯物论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品质好坏受环境的决定，这也是机械唯物论的倾向，它没有认识到人可以在改造环境中来发展自己的品质。它对可以把坏的社会改造成为好的社会，没有正确的解释。按照辩证法的解释，我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了真理，然后根据我们的实践来改造世界。法国唯物论就不是这样，他们认为改造世界应该靠偶然出现一个有理性的人，社会就可以得到改造。它不了解人的思想是在实践中逐渐锻炼起来的，认为一般人都是受环境决定的，只有偶然出现的伟大人物才可以改造环境。

法国唯物论的思想大体上就是这样。

六、德国古典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有：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他们之中一般都是唯心论，只有康德是二元论。唯心论是主要的，同时发展了辩证法。唯心论是反动的，但辩证法是进步的。这是反映了当时德国的情况。当时德国周围是革命的环境。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革命正在顺利地进行着。国际上是革命的环境，但德国本身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资产阶级在德国是比较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很同情周围国家的革命，很羡慕这些国家的革命，很愿意跟着这一条道路前进。但实际上看一看本国的状态又没有办法进行革命，只有向贵族低头。在政治上，资产阶级虽然向往革命，但又对封建势力保持着很大的妥协性。这种情况反映在哲学上，就是仅仅在精神上讲一讲辩证法，概念方面的辩

证法，辩证法不是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因此就只有宣扬唯心论。恩格斯总结德国古典哲学情况，恰当地指出德国哲学是在观念上伴随了法国革命。

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是康德，他的哲学是二元论。康德在他的整个哲学活动时期，前批判时期的唯物论比较多一点，批判时期唯心论成分比较多一点。第一阶段是他年青的时代，他主要研究自然科学，他的著作也都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他有一本名著：《宇宙发展史概论》是讲宇宙天体怎样形成的。康德汲取了笛卡尔天体演化思想，提出了天体形成的“星云假说”——按照这一假说，宇宙原是一团云雾状的、炽热的、旋转的物质粒子，即“原始星云”，由自身引力与斥力相互作用而发生旋涡运动，逐渐形成太阳、行星、卫星。康德认为天体形成经历了时间的过程，推翻了牛顿以上帝为宇宙形成的第一推动力，动摇了天体是亘古不变的形而上学自然观，预示了近代科学革命的新起点。所以，这个学说提出以后，引起了宗教家们疯狂的反对。这是康德年青时代的情况。

后来，康德就倾向了唯心论，当然还是二元论，晚年他写了《纯粹理性批判》，这是他哲学观点的代表著作。他在认识论上是二元论的，他承认有物质和精神两个本源。他想调和英国的经验派和大陆的理性派，认为感觉是我们从外面物质得到一些印象，没有感觉不可能有知识，知识的第一个来源是感觉，但这个感觉是混乱的，不能够成为科学的知识，要使感觉变成科学的知识，就要靠理性。理性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叫悟性，再一个叫理性，当中主要还是悟性，它能够帮助我们把混乱的感觉整理出秩序来。悟性又是靠什么把混乱的感觉整理出秩序来呢？就要靠它有些范畴，这是先天的，不是客观的反映。我们人的脑子里天生就有一

些范畴，就是时间，空间，实体关系、因果关系、可能性、现实性、偶然性、必然性等等。这些范畴是我们理性所固有的，我们认识世界的时候，首先从感觉得到一些印象，然后就把它整理出来，某些归到时间一类，某些归到空间一类等等。

康德有一句话："我们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就是像法律使社会有秩序一样。康德认为科学并不是客观的规律，而是我们主观的理性对感觉排列成的秩序，这就成了科学的知识。所以，科学的规律都是主观的东西，不是客观的反映。康德的二元论就在这个地方：他一方面认为感觉是物质的反映，另一方面认为感觉反映的东西，并不是物质本身的东西。物体的本身就是物自体，他认为物自体本身是不可知的，我们只能够在物质本身得到一些表面的印象，而且是杂乱无章的。这一点与巴克莱的唯心论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巴克莱否认物质，他还承认物质。

休谟的不可知论，与康德有不同的地方，休谟是根本不承认客观存在的。康德是相信客观存在的，但认为感觉是不能认识物质本身的，科学的规律知识是主观给定的，我们的认识都是一些主观的东西，而不是客观的东西，客观的物质是不可知的，在这一点上来讲，康德与休谟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不能够认识客观物质是不是存在，认为我们只能够认识感觉，我们的认识仅仅是感觉的关系。康德加了一些东西就是理性范畴，认为理性是总的东西，悟性是比较分散的。所以康德的哲学是：我们以为有物质，实际上并不是客观物质本身的概念，物质概念只是我们主观的范畴，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

康德的二元论有一个矛盾，一方面承认物质的客观存在，一方面又否认能够认识物质。因此他的哲学被引向不同的发展方向。

康德想解决这个矛盾，他后来又写了《实践理性批判》。他说

我们在世界上虽然看不到物质，但还有危险，因此我们有一个上帝命令我们，我们天生好像就有这样一个命令，你的利益不要与全体最高的利益发生冲突，由于我们有这样一个命令，所以我们就不发生危险。康德这样的唯心论就被费希特发展了。

费希特根本上就不承认物自体，只承认有一种精神，我们每一个人就按照自己实践的精神来行动，这就完全变成了唯心论。但他这个唯心论开始有了辩证法。我们的实践首先是由自我出发，因此必须有一个对象，就是需要有一个对立的东西，这样就把非我克服了。费希特的哲学就是这样。这就是主观唯心论。

后来，谢林就变成了客观唯心论，他认为费希特有些太荒谬了。他认为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精神，这个客观精神，它的性质是辩证的。谢林是第一次公开地把客观世界肯定成是辩证法的过程。这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有些联系，当时开始发现电子，他就用这个作比方，他说磁石是一块东西，这样一看是北极，那样一看是南极，这两极是存在的，两者是对立的统一，对对立的斗争不大注意，所以谢林在政治上是倾向妥协的，还没有费希特革命。

黑格尔就是这个唯心论体系集大成。他与谢林不同，不同的地方就是不像谢林那样认为矛盾的对立是同一事物的两极，他强调对立的斗争性，经过斗争引起事物的发展。根据他的辩证法，叙述了一套唯心论哲学的体系。他的哲学里面，特别注重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把否定之否定当成他整个哲学体系的架子，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特点。

斯大林讲辩证法，根本就不提否定之否定，就溶化到质量变化的规律里面。黑格尔他很强调这一点。

黑格尔认为宇宙的内在本质为“绝对精神”，它既为本质，又是一能动的主体，不断辩证地展现自己、认识自己。“绝对精神”

的发展，首先表现为逻辑阶段，其后为自然阶段，最后为精神阶段，因而，黑格尔哲学体系为“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三个组成部分。黑格尔认为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三个阶段，最初是绝对精神，为了表现自己就用物质来表现，物质是死的东西，所以绝对精神要进一步地发展历史，经过人类的历史反过来再认识自己，认识经过精神来实现。人认识的特点，就是最后要回到绝对精神。等到绝对精神都回忆清楚了，就是到了最高阶段。黑格尔认为他自己的哲学就是最高阶段，所以世界的发展到了这里就不再发展了。

黑格尔的一切都是用这三段发展来谈的，他写文章也是这样。他一生的著作都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逻辑的著作，第二部分是关于自然哲学的著作，第三部分是关于历史哲学的著作。他的逻辑学的著作也是分三部分：每部分又分三章，三章里每章又分三节，都是这样。

因此，这就与他的根本原则发生冲突，因为辩证法不能归结为三段论。辩证法的根本精神是事物通过矛盾而永远不断地发展；发展是没有止境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黑格尔，主要也是批判这一点。

费尔巴哈是唯物论哲学家，关于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已经没有时间讲了，大家可以看看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

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总结了哲学史，特别是批判地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又从根本上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吸取了他的合理内核，从而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实现了哲学上的伟大革命，使哲学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上卷）

辩证法引言*

(1953.10)

我们今天开始讲辩证法，我们准备讲五次。今天讲引言，休息一天继续讲四个特征，再讲矛盾论。

本来想给大家发提纲，一写就写多了，就来不及印发了。讲完以后把提纲修改修改，可能发给大家。苏联专家不主张先发提纲，他总是希望先讲再发，听的时候效果大一些。这不是为我自己辩解，主要是因为来不及。

引言分五点：第一，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者用来研究自然界，研究社会的方法；第二，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关于人类社会，人类思想的最普遍规律的科学；第三，唯物辩证法是怎样产生的；第四，马、恩、列、斯如何规定辩证法的特点；第五，我们学习辩证法的方法。

一、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者用来研究自然界和社会生活、历史的方法

简单地说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如果我们的思想方

* 1953年10月4日，艾思奇给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央党校前身）七、八、九班作了关于学习唯物辩证法的讲授，讲课共分5次，第1次为学习辩证法的引言，其他4次按当时教学计划规定，依斯大林所讲的辩证法的四个特征讲解，每次讲一个特征。我们按当时速记稿整理，略有删节，每讲独立成篇。本讲标题是原有的。

法不是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那末就做不成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采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自然，研究社会，如果采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看问题，我们就不算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不是说，我们在没学马克思主义以前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没学辩证法，但我们是共产党员，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我们的工作是遵守中央的计划、指示，而中央的计划、指示是用辩证法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在实际行动里是遵守了中央辩证法的指示，同时我们个人做工作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在处理问题时运用了辩证法。所以不能因为过去没有学辩证法就说从前是假的马克思主义者，假的共产党员，不能这样说。

但问题是过去没有很好的学唯物辩证法，不能很自觉地，有系统地运用辩证法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不能独立地运用辩证法来解决一切问题，研究一切问题。因此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很自觉的。还不是高明的，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一些同志常常犯错误，犯错误就证明许多地方还不能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许多问题上不像马克思主义者，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教条主义、急躁冒进、保守主义。这些问题从思想方法上来看，都可以找出反辩证法的因素，都可以找出形而上学的因素。因为有这种反辩证法的思想方法，就使我们做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很不完全的，当然也有可能个别的人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是个共产党员，但思想上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一般地讲，没有学过辩证法，不能自觉地系统地运用辩证法来观察问题，不是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要学习并尽可能地学会在一切问题上都要贯彻辩证法的方法。要学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但我们要尽可能地学到这一点，作

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有这个任务学会用辩证法来观察问题，用唯物论的观点来看问题。

我们的党章规定共产党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唯物论，把这当做义务。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辩证法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从理论上讲就是因为只有采用辩证法，才能贯彻唯物论的观点，但唯物论的观点如果不同辩证法结合起来就不彻底，不能贯彻。过去历史上有许多唯物论思想，有形而上学唯物论，机械唯物论，因为它是形而上学的，所以唯物论就不能贯彻，终归在某些问题上要变成唯心论。唯物论和辩证法是分不开的，彻底的唯物论也就是辩证法的。为什么彻底的唯物论一定是辩证法的呢？把唯物论的内容了解一下就可以懂得了。

唯物论的观点是什么观点？唯物论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哪个同志能够比较简单地讲唯物论的观点最主要的要求是什么？（座中无人回答）不讲也没有关系。

唯物论的要求主要的就是这样，用恩格斯的话就可以说明了，他说：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过是对自然界的本来面目的了解，并不附加任何外来的成分。再简单一些就是要求思想能够反映现实。反映现实这句话说得很简单，但要实地做起来并不容易，不是说，随便看见什么东西，就说它是什么东西，就算反映了。反映现实不能只反映表面的现象，而要反映本质，反映内部规律。有些事情的表面现象不一定是真实的，如果看见表面现象以为就是本来面目，就会犯错误。因为现实是有内部规律的，如果表面地看问题，只看到问题的一方面，就不能真正地反映现实。平常我们的认识常常是表面的，比如碰到困难，有时觉得没有办法完成了，事情做得顺利了，就高兴极了，忘记了还有困难。同志中接触，有

些人喜欢看到别人的缺点，到处不顺眼。据说有的人做工作，调来调去，关系总是搞不好。也有人在党内做工作，觉得党到处都是不好的。这样看就会片面，不是把事情的本质看清楚，平常偶然看到一件事，以为认识了，懂得了，常常是不可靠的。我们读毛主席的著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这个革命失败了，革命的势力很小，那时候有人就怀疑革命能不能坚持。这个怀疑对不对呢？好像是对的，因为革命势力很小，可是这是不是客观事情的真实面目呢？不是的，因为这种看法是表面的。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里指出，这是只看现象，没有看到事情的本质，因为事情的本质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不是革命不能坚持。所以要贯彻唯物论观点，就要善于从事情的表面看到事情的本质，不是只看表面的某些方面片面的情况，而要看到内部的发展规律。一个根据地很小，这是表面的，但它有很大的发展力量，反动派尽管很大，但只是表面的强大，反动派的实质是要垮台，本质上它是腐朽的，要垮台的。“美国是纸老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表面看起来是老虎，我们有许多人看了它表面上是老虎，就吓坏了，但实质上它是纸的老虎，要垮台的。

我们唯物论的反映论给我们一个任务，要我们透过表面的感性认识深入到理性认识。认识事物的规律性要经过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从现象看到本质。怎样从现象看到本质，怎样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毛主席在《实践论》上讲了，毛主席说，要使我们的认识由感性提到理性，首先要把丰富的感性材料掌握起来，然后把这些材料加以分析。怎样分析呢？就是《实践论》上所说的十六个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我们学唯物论以后，杨献珍同志告诉我们要学习用唯物论来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联系实际先摆材料，然后“去粗取精”，就

是找典型材料研究，“去伪存真”就是把假的材料撇开。比如说我过去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成绩如何如何，我们就要考虑，如果有成绩的话，是不是你一个人做的，你占多少成分。粗精分开了，真假分开了，然后再进一步分析。“由此及彼”就是把各种材料中的关系研究一下，他的思想和行动的关系，过去思想和现在思想的关系，他的工作和工作效果的关系，对于老百姓的影响。“由表及里”就是把表面情形和实际规律研究一下，现在是“星星之火”但实际上可以“燎原”。

经过这样的分析，（这叫做“加工改造”）就可以提高到理性认识，把事情的联系规律弄清楚。所以整理感性材料，取得理性认识的方法在毛主席的《实践论》上已经简要地讲了，那些方法就是辩证法。我们学辩证法就是要进一步把毛主席提到的方法更具体的研究，没有这些方法，就不可能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就不能认识事情的客观规律，也就是不能贯彻唯物论。这些方法就是辩证法，只有运用辩证法才能使我们的认识符合客观情况，认识客观规律。所以我们如果不愿意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要使自己在任何问题上都像马克思主义者，都能符合客观情况，正确地解决问题，就应该学习辩证法，就应该努力掌握辩证法的武器。所以辩证法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可少的方法。也可以这样说，辩证法是工人阶级手中掌握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是我们进行革命事业、革命行动的方法。

辩证法就是包含这两种性质，又是科学的，又是革命的。它是科学的，就是保证我们正确的认识客观规律；它是革命的，就是因为它可以被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所掌握，解决革命斗争的问题、国家建设问题，都能正确地有效地使我们的革命行动得到胜利。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掌握这个方法，不掌握这个方法

就会犯错误，就会失败。

在学习辩证法的时候一定要反对形而上学，这是不能分开的，是一件事的两面。一方面学辩证法，一方面要反对形而上学，这样我们的学习才能有结果。因为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和辩证法相反的。同时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对我们影响很深，它是多少年来所习惯用的方法，特别是剥削阶级习惯用的方法，在旧社会里成为支配的思想方法。所以我们从旧社会里来的人，不知不觉的受形而上学的影响，而且是长期受影响的。这种思想方法是不知不觉的存在我们的头脑里，如果不反对形而上学就不可能接受辩证法，如果让形而上学占据了我们的脑子，要想把辩证法学进去是不可能的。就像学唯物论的时候要反对唯心论一样，学辩证法也要反对形而上学，把形而上学从脑子里挤出去。如果说学习要联系实际，反对形而上学就是一种实际，当然实际不仅是这一点，但这一点也是基本的。

什么是形而上学的方法？这在以后讲辩证法的时候才能详细地讲，现在把它的特点简单地指出来。它的特点就是看问题的表面性和片面性，碰到任何问题随便看一看就要下结论，不研究它的规律、它的联系，这就是表面性；片面性就是不去研究事情的各方面，而把某一方面孤立起来看，脱离了联系。比如看一个人有缺点有优点，如只看缺点或只看优点都是片面的。我们党的工作中都会有缺点的，但如果只看缺点不和优点联系起来看就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看缺点的时候同时要看到优点、批评党的工作中缺点的时候，要估计我们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我们国家的干部有些是违法乱纪的，但如果忘记了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对于我们干部的情形就不能有正确的了解。有许多人喜欢片面的看问题，看到有些干部违法乱纪，就以为干部是一塌糊涂了。

片面和表面是分不开的。凡是能够联系起来看就不会表面、孤立的，孤立来看一件事就常常是表面的。比如在革命势力很小的时候，如果把世界与中国联系地来看，发展前途是了不起的。

片面性和表面性是形而上学的主要特点，这种思想方法不能保证我们正确地认识客观规律。所以学习辩证法一定要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我们学习辩证法就是解决思想里的片面性的问题。哪个人都不能说我的思想很全面，每个人多少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做些自我批评的工作。用这样的精神来学习才能掌握辩证法。

二、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想的最普遍规律的科学

辩证法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客观规律。辩证法被我们运用的时候成为我们的方法。我们从哪里找到这个方法？我们是根据客观规律找到这个方法的。辩证法之所以能成为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客观规律，它本身就是和客观事实一致的。我们是把一种世界上最普遍的规律当做我们研究的方法，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书里说，辩证法就是要按照生活的实际情形来加以考察，实际情形怎样，我们就用怎样的方法研究。这句话就说明辩证法本身就是客观规律，辩证法不是主观想出来的。比如客观世界是有联系的，缺点和优点有联系，现在和过去、将来有联系，因为客观世界的一切东西都有联系，因此研究问题的方法也要从联系中来研究问题。所以我们的方法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经过几千年人类研究的结果，发现了一种世界上最普遍的客观规律，把这种客观规律当做方法来研究问题。所以我们学习辩证法的时候，除了了解它是一种方法之外，还要注意到它本身也是世界上事物的最普遍的客观规律。

关于这一点从马克思起到斯大林，不断反复的讲。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都有这类的话，恩格斯说辩证法则是从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抽象出来，因为辩证法法则不是别的东西，就是这两种历史发展以及思维本身发展的最普遍的规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讲到辩证法的时候，他说它的规律对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运动，或者对于思想的运动，都是应该一律有效的。列宁也讲到这个问题，并特别提到辩证法是人类认识历史的整个总结。所以我们讲到辩证法的时候常常要加上“唯物论”几个字，因为辩证法本身带有唯物论的性质，它本身就是客观的反映。我们研究辩证法一定要认识这一点，就是辩证法不是随便想出来的，是客观的反映，是人类认识历史的总结，也可以说是自然科学的总结，是革命斗争的总结，最高的总结。

一切自然界的变化都是遵守辩证法的规律，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运动得到一个总结，就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符合辩证法的。我们学习辩证法要经常记住这一点，这是有很大好处的，记住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懂得辩证法本身也是要经常发展的，不能当做死的公式来用。运用辩证法的时候，我们的方法本身也要发展的，怎样发展？就是根据新的自然科学的结果，根据革命斗争的新的经验，然后加以发展。自然科学的新的成就和革命斗争新的经验往往能够提出新的辩证法原则，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一点，又把旧原则运用上去，就会犯错误。最好的例子就是斯大林最近的著作语言学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著作里告诉我们辩证法是怎样发展的。辩证法法则由量变到质变要经过突变，过去总认为量变到质变的关键要经过爆发。斯大林根据新的科学的研究，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消灭富农的经验。把经验总结以后，提出了新的原则，以后考虑旧质变新质的时候，不能运用旧的公式了。在工

人阶级领导的政权下面，考虑旧质到新质的时候，不能照搬爆发的旧公式。这就是斯大林给我们的很好的例子。我们一般的同志还没有这样高的水准，能够发展辩证法，我们就觉得“辩证法是客观规律”的意义不大。我们懂得这一点至少我们才能理解列宁、斯大林为何能发展辩证法。

辩证法的方法是这样来的，是首先研究客观事物找出它的规律，然后又用这规律当做方法，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我们一般人学辩证法，做不到总结经验发展辩证法，但我们根据辩证法的特点就要注意到，了解辩证法结合自然科学、革命经验来了解。根据我们的斗争经验、工作经验、党的历史经验，我们研究一下为什么辩证法是客观规律。以后我们讲课也准备这样讲，每讲到辩证法原则的时候，总是联系到自然科学的历史，同时主要的把革命历史、革命经验以及我们个人的思想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研究。就是说首先了解到辩证法对于自然科学、对于社会、对于革命经验、对于个人的思想都是通用的，然后对于辩证法的科学性才能有深刻的印象。

三、辩证法是怎样产生的

这和第二个问题有联系，因为刚才讲过辩证法是整个人类认识历史的总结，是人类研究自然界、研究社会历史的几千年来的知识的总结，不是偶然产生的，人类能够认识辩证法是经过长期的过程。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简单地从历史上了解一下，我们人类是怎样经过长期的研究、讨论，认识了辩证法，掌握了辩证法的？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总结人类历史，确定辩证法方法的？马克思、恩格斯发现辩证法不是偶然的，是他们辛辛苦苦研究历史，总结科学的经验，总结人类历史斗争，也总结了当时无产阶级斗争

的经验，经过了辛苦的研究才确定了唯物辩证法是正确的科学的方法，也是革命行动的方法。

要了解人类认识辩证法的历史，就应该很好地了解一下恩格斯对这问题的概括的说明，在《反杜林论》上也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二章就是讲这个问题，把辩证法发展的历史，人类认识辩证法的历史画了一个简单的素描，他指出人类掌握这种科学的方法经过三种认识阶段，就是在古代哲学家有一种朴素的辩证法的世界观，这种朴素的辩证法的世界观大体上正确地抓住了现象的整个图画的一般性质，大体上了解整个世界是变化的、是发展的，所以大体上是正确的。但为什么叫朴素的辩证法呢？这是因为他有一个缺点，要解释整个现象的个别部分是不够的，中国的老子说：道在变，道是什么东西？道是看不见、听不见、莫名其妙的，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以朴素的辩证法是大体上正确的，但很不完全，因此，他不能成为科学的方法，他的内容太模糊了，他只能成为猜测整个世界的一种方法。

为什么古代辩证法只能停在这个阶段？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科学不发展，没有科学家来帮助哲学家研究世界的各个部分的现象，只有发展科学才能对于世界的各个部门弄清楚，古代没有很好的科学，科学很不发展，科学知识很贫乏，有了科学，人类才有勇气和宗教做斗争，就能用科学的方法解释世界，所以发展唯物论辩证法必须有科学的条件。中国古代也有科学，不过不发展，所以不能帮助哲学家认识世界的内部。所以古代哲学家总结当时知识的结果只能得到朴素的辩证法，因为他没有材料可以做更进一步地总结，能够把世界的具体内容搞清楚。我们不要因为哲学史上以前的哲学家对世界的解释有许多推测的东西，就说他们都是唯心论，这样看不符合历史观点，如果那些哲学家生在现

在，宣传那一套他就是唯心论了，因为现在已经有充分的科学材料，但过去哲学家没有多少科学知识，他尽可能地按照当时的科学水平做总结，能够得出朴素的辩证法、朴素的唯物论世界观，那末在本质上就是唯物论的。基本上承认物质第一、精神第二，我们就要承认他是唯物的，至于具体解释有许多虚构这也是没有办法。所以古代哲学家是总结了当时的知识，然后按照当时可能的条件，得到了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恩格斯指出，以后人类的认识进入第二个阶段——形而上学的阶段。在欧洲来讲这时期很长，从中世纪经一千多年，直到18世纪，这中间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15世纪以后，资本主义慢慢生长起来，科学比古代发展得更快了，这时进入了一个形而上学阶段。这时的哲学家主要是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放弃了辩证法，而把形而上学当做主要的方法，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是当时科学发展的情况规定了的，因为当时的科学比古代有进一步的发展，但发展还是有限的。按照恩格斯的讲法就是基本上那个时期的自然科学是在搜集材料的阶段，比较有系统的科学只是数学和力学，其他各个部门多半是在搜集材料的阶段。越是高级的科学搜集的特点就更多，生物学在当时主要是分类，至于各种各样的生物中的联系变化的关系还没有人研究，所以那个时候的自然科学停顿在简单的发展上面。把一种现象和别的现象加以区别，把一种动物和另一种动物分开，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经阶段。要想精密地研究自然界，首先要分析，要懂得人的整个思想，要把思想的各种因素分析一下。十七八世纪以前的自然科学就是这个阶段，这种分门别类简单的分析，就养成了当时科学界一种习惯，总是把现象孤立起来研究，总是割断联系，而不是掌握联系。孤立研究问题的习惯又被哲学家总结了，从英国的培根起总结出经验

派的归纳方法，培根第一个把自然界分成各种各样的因素，不变的因素。以后所有的哲学家认为科学的方法就是找出不变的东西，研究物质是什么，他就要找出物质的最根本的不变的性质。物质不变的性质就是机械的性质。

这样就产生了当时哲学上以及一般的科学研究上这种形而上学的习惯，所以形而上学是当时科学进步中消极的结果。这种错误的方法对于科学的发展当然会有阻碍。照恩格斯的说法就是要整理材料，科学要求这样做，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就成为障碍了。这种情形到19世纪就开始了，19世纪科学进一步发展，恩格斯说，19世纪科学进入整理材料的阶段。到这时就需要辩证法了，因此就自然而然的在哲学上不能不发展辩证法思想，所以辩证法就是从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开始发展起来。德国古典哲学发展辩证法不是偶然的，是因为当时的科学发展规定了的，也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规定了的。当时是在革命的暴风雨下面，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下面，当时有个法国革命，是过去历史上最激烈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样就不能不感觉世界的变化，感觉到社会是要变化的。德国古典哲学受到法国革命的影响，恩格斯说德国古典哲学是法国革命在德国的表现。这种资产阶级大革命使得哲学家不能不加以总结，结果，就产生了辩证法的世界观。

现在简单地补充一下关于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过程。

德国古典哲学是从康德开始，康德的思想开始有了辩证法的因素，表现在两点上。首先表现在他早期的著作，就是关于太阳系的发展理论。康德第一次提出太阳系是由星云变成的，原先太阳、地球都是气体，后来发生了旋转，转得太快又分出去了，地球和各种行星就是分出去凝固成的。这种学说现在看起来不一定对，因为这学说是认为自然界由热变成冷的，以后就要灭亡。现在苏联的天

文学说不是这样看的，认为太阳最初是由黑暗的石块“宇宙尘”集合起来的。因为冲突就是由冷的变热的，然后产生太阳。

康德这个思想是第一次认为宇宙是发展的，以前认为太阳系从来就是这样的，从来没有变过的。这个思想就在客观上提出了辩证法的方法，并不是主观的用辩证法看问题。他在这个问题的说明上不自觉的提出了辩证法宇宙观。

另外，康德在认识论上提出了辩证法的因素，他的认识论本来是反辩证法的，他认为物质是存在的，但我们的感觉不能反映物质，我们的感觉只认识现象，主观的现象，把感觉和物质对立起来。另外又把感性和理性对立起来，他认为理性知识是人类天生的。康德把人的认识分作三个部分，一是感性，一是悟性。他说人生来是有悟性的，人的理性就是把许多材料归到理性的范畴里。比如物质的概念，康德认为是主观的，并不是真正客观存在的。他认为物质就是我们看见的颜色。声音归入“质”的范围里面。比如看到两件事连续出现，白天运动得很疲乏，晚上就睡觉了，两种现象连在一起；做工作犯了错误，引起混乱，两件事连在一起。康德认为这种联系没有客观的必然性，但我们主观上有个因果性的范畴，就把两种现象归入因果性的范畴里。所以我们的知识都是主观的，人的悟性就是有一种作用，就是把感性材料分类，把感性材料整理一下就成为我们的知识。他不承认知识有客观性，人的真正知识就是一类一类的，归类在一定范畴上的主观知识。这种思想完全是形而上学的。

那么，为什么又说康德的认识论有辩证法的因素？就是他讲到理性的时候有辩证法的因素。他说人的理性是包括悟性，但理性有个更进一步的要求。他说理性有一种妄想，想认识世界的最根本的东西。为什么他认为理性的要求是妄想，因为他的哲学是

不可知论。但我们的理性有这种企图，我们的理性本来只能做到悟性的程度，只能把一些现象归类，只能认识表面的东西，主观的东西，不能认识根本的世界的性质。他认为认识能力是有限制的，所以他的著作叫《纯粹理性批判》，就是说理性不能认识世界的最根本的东西。可是理性又有这种企图，企图认识最根本的东西，可是这种企图一产生就要碰钉子，就是说完成不了这个任务。

理性怎样碰钉子呢？人想要认识世界的根本问题的时候，他说人的理性想要这样做的时候立刻就自己和自己发生矛盾。有四种理性矛盾，就是人要想认识世界有没有最初开始的时候，也可以把世界看做有开始的时候，也可以看做是无始无终的。他说世界好像有些可以说是必然的，有些可以说是自由的。石头从山上滚下来是必然的也好，是自由的也好。

理性想要研究根本问题的时候，就要碰钉子，就走了绝路。这种矛盾，康德叫做“二律背反”，就是两条规律互相反对。他举出四条“二律背反”，他提出这种思想本来是想反对辩证法的，认为辩证法是不合规律的思想。可是提出理性矛盾的时候，结果就肯定了辩证法，为什么会提出这问题？因为他第一次提出人的理性要碰到矛盾是件必然的事情。矛盾是必然的，不是偶然发生的。理性想要深刻研究问题的时候就要发生矛盾。康德认为发生矛盾是不对的，可是事实和主观的想法相反。后来的人就要想发现矛盾是必然的，所以他主观上想反对辩证法，客观上却提出了辩证法，所以，后来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就在康德所提出来的问题上发展了辩证法，因为康德已经把辩证法看做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后来的继承者认为要看做是必然的东西，不能反对他。他的学生菲希特第一个开始发展辩证法。他的辩证法当然是唯心论的，菲希特认为我们要想深刻研究世界的事情，就发现世界上最基本的矛

盾，就是自我与非我的矛盾。他认为我是主要的，我产生非我，然后产生斗争，才有发展。这就是菲希特和康德逻辑上的联系。

由于菲希特是主观唯心论的辩证法，有很多道理解释不通，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不能说自然界有我与非我的矛盾。后来就把主观唯心论变成客观唯心论，认为世界的根本矛盾是一种客观精神的矛盾的表现。客观精神到任何地方都有两极性，一个东西两头是对立的。客观精神的两极性是世界一切事物的根本原因。菲希特的哲学里没有斗争的思想，而是一种调和的思想。

黑格尔对菲希特的两极性的说法不满意，他认为太抽象。黑格尔挖苦菲希特，说他是一种糊涂账，等于说晚上的牛都是黑的。黑格尔想具体地说明一下客观精神是什么，他就说世界的客观精神就是理性发展的结果。最初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个绝对理性，为了要表现自己就产生自然界，所以他认为物质是理性的一种表现，他把物质叫做理性的外化。照唯物论来讲，精神是物质以外的现象，而他是相反的，先有精神，要使自己具体化一点，于是就表现为物质，因此就有了自然界。由精神变为物质，黑格尔认为是一种理性的逻辑结果。意思好像神秘，实际上是一种片面化的结果。我们人有个问题要实现，就要在物质里实现出来，人先认识，认识产生思想，想实现自己的思想本来是物质在先，两个阶段黑格尔把前面的切掉了。

可是，自然界和理性是矛盾的，所以理性还要进一步实现自己，就在自然界中产生人类历史，人类回过来认识理性，这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是把辩证法曲解了，而且和辩证法根本矛盾，因为他把世界看做是经过三个阶段，最后到了顶点，发展停止了。这种体系和辩证法的根本性质矛盾，因为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不断的，发展是不断的，因此就使辩证法成为一种公式，辩证法被曲解了。

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真正的辩证法，不是正确的科学的方法，而是一种创造主观哲学体系的一个公式的架子。架子的主要特点就是把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看做是主要的规律。这种哲学虽然提出了辩证法,比较自觉地认为辩证法是一种正确的方法,可是并没有能真正表现了辩证法的科学性质。

恩格斯说黑格尔没有完成任务，黑格尔的哲学是流产了，本来可以产生辩证法,但他是唯心论的,辩证法没有真正产生出来,因为辩证法本身是唯物论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就必须批判黑格尔的哲学，救出辩证法，改造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不但不同,而且是根本相反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上已经讲过,他特别着重地讲，我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但不同，而且是相反的。黑格尔是一种公式，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研究客观规律的科学方法。所以，斯大林讲马克思辩证法的产生是哲学上的真正的革命。因为自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唯物辩证法思想以来，哲学辩证法就成为一种科学。从来的哲学方法都被哲学家看做是创造体系的公式，而体系又是主观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把哲学当做科学研究的工具。这种工具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就变成革命的思想武器，变成帮助工人阶级改造世界的武器。过去有很多研究哲学的人，有错误的思想，以为黑格尔辩证法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一样。这是不对的，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是人类历史或千年来认识自然，认识社会的总结，辩证法是一种高度的科学的方法。

四、马、恩、列、斯如何规定辩证法的特点

斯大林把辩证法规定了四个特点，斯大林所规定的特点可以说是概括的、完全的。这些基本思想在马、恩、列都有的，但以

前没有这样全面的规定。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比较简单地讲到辩证法的特点。他指出辩证法，是科学的方法，同时又是革命性的方法。为什么带有革命性呢？马克思说辩证法就是在现存的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着否定的理解。肯定帝国主义存在，但同时又看出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因素；肯定社会主义制度在现在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但同时又看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应该进入共产主义。这两件事不要划等号，这是因为，对于现存事态，它固然包含着肯定的理解，但在这种肯定的理解中，它还包含着它的否定的理解，即现存事态必然归于消灭的理解。这是因为，它认为每一生长的形态是在运动的流中，是暂时经过的；因为，它不甘受任何物的威严，在本质上它便是批判的、革命的。这要具体的看，对于反动派肯定缺点就是肯定缺点，没有什么成绩。但无论怎样，总是按发展去看。现在存在，但终归要变化的。

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人类社会里起很大的作用，对于革命的阶级有很大的意义，对于反动派有很大的恐怖。马克思说辩证法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恐怖，因为这个方法要指出它的灭亡，而工人阶级就欢迎辩证法。所以辩证法是工人阶级革命的方法。

学习辩证法不仅要学习认识世界的方法，而且要学习改造世界的方法。辩证法能够保证工人阶级改造世界的任务的实现。辩证法是有阶级性的，唯物辩证法只能为工人阶级服务，不能为资产阶级服务。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掌握辩证法，剥削阶级不能掌握辩证法。因为剥削阶级总希望他的制度永远不变，总愿意是在肯定中间，不愿意有否定的理解。因此，根据马克思这个规律，就要注意学习辩证法必须考虑立场问题。我们可以肯定地讲，一个人有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意识，就不可能学好辩证法。在任何

一个问题上，如果表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意识，要想在这个问题上掌握辩证法是困难的。一个人有了个人主义思想，总喜欢夸耀自己的功劳，要显示个人的了不起，有了这种包袱就不能用辩证法看问题，不能认识自己的缺点。一个人到处考虑自己的利益，研究问题的时候就是肯定个人利益，因此到处不满意。所以学习辩证法的时候，同时要注意到克服个人主义，不注意这一点，也不可能学好辩证法。改造思想与学习是分不开的。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里也讲到辩证法是研究联系，研究运动的，但恩格斯特别把辩证法归结为三个基本法则，《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都是这样规定的。恩格斯指出，辩证法第一个法则是由量变到质变的法则；第二是对立统一的法则；最后就是否定之否定的法则。

恩格斯这样规定有什么理由呢？这是和批判黑格尔哲学分不开的，从黑格尔哲学里找出辩证法的因素，主要得到这三个基本法则。所以恩格斯的这种说明，是有一定的时间条件联系着的，因为黑格尔的哲学就是着重这三个基本法则，其中特别着重否定之否定的法则。恩格斯在讲这三个法则的时候，特别指出否定之否定的法则是黑格尔整个体系构成的根本法则。恩格斯也指出，辩证法有个总的特点，这是和形而上学的特点根本对立的。他把这些特点归结为一个公式，就是“是—是，否—否”，形而上学看问题的方法主要遵守这个公式，这公式的意思就是：是就是是，否就是否，肯定就只能肯定，否定就只能否定，就是说只看一方面。某种事情是好的，就只能是好的。比如下雨好不好？他说好。不管什么条件，不考虑下得多也好，下得少也好。形而上学只看一方面就是片面性的公式。农村里做工作，发展生产，帮助农民改良技术好不好？当然是好的，推销新式农具好不好？当然是好的。

但是不是仅仅是好的，形而上学不考虑。推销农具就不管条件，到处推销，不管农民能不能掌握，结果新式步犁变成了挂犁，他不考虑新式农具也可以不好的。我们同志中间也有人很好心地帮助农民解决生产问题挖蓄水池，到处挖，有些农村不需要修水池，他也要挖，把人家的地挖得一塌糊涂。资本主义好不好？当然不好，可是形而上学就只看到否，资本主义不合理，应该明天就消灭，不考虑在一定时期还要利用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限制资本主义，逐渐地消灭资本主义。

恩格斯把辩证法的总的特点规定为和形而上学相反的公式，就是“是—否，否—是”。考虑是的一方面还要注意否的方面，看到否的方面，还要注意有没有是的方面。这是辩证法的，从这公式里也看得出来形而上学是片面的，辩证法是全面的。

列宁是把辩证法发展了，是根据帝国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根据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的条件，新的成就，把唯物论辩证法发展了。

列宁发展唯物论辩证法有许多方面，最主要的就是列宁特别着重指出对立统一的法则。矛盾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核心，指出辩证法的特点就是把运动看做矛盾，当做对立的统一。列宁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本身内部的矛盾。

把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法则当做根本法则，这种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也有的，但列宁特别着重地提出来，并且把辩证法看做是主要的是分析矛盾，研究矛盾的方法。所以毛主席讲辩证法用“矛盾”做题目，特别着重矛盾的法则，就是根据列宁的思想。

列宁对于对立统一法则的特殊贡献，就是强调对立斗争性是绝对的，对立的统一性是相对的。列宁强调这点不是偶然的，这是根据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出来的。

列宁和斯大林一直在和机会主义做斗争，机会主义思想在哲学上的根据，就是认为对立的斗争是可以调和的、阶级调和主义就是机会主义思想最主要的特点。所以列宁讲这样一句话是和工人阶级革命实际密切联系着。我们学辩证法也是要把这句话很好的记住，结合着我们工作的实际记住。很可能有很多同志在实际斗争中把对立的斗争看成是相对的，对反动派、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斗争不看做是绝对的。土改中有人有和平土改的思想，就是没有看到对立斗争的绝对性。这当然不能理解为一天之内消灭资产阶级，但要了解为现在和资产阶级有生死的斗争，斗争的形式是和平的，不是武装的，而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利用、改造、限制的政策。但斗争还是绝对的，是生死的斗争。尽管是统一战线，但我们的目的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这两个阶级因为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斗争，所以是对抗的，形式上是一种和平的斗争。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多注意结合自己的思想，工作来分析，很好地利用这个原则。

斯大林是继承了马、恩、列把辩证法唯物论各种原则进一步发展了。斯大林的著作可以说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了一个很系统的、完整的、深刻的提纲。斯大林以前还没有人这样完整地叙述过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虽然简单，但非常完整。

在斯大林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实际行动是怎样分不开的。

斯大林的著作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由辩证法自然而然地引导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来，有了辩证法唯物论思想自然而然要赞成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讲到辩证法的每个特征的时候，总是很清楚地指出这个特征对于无产阶级的行动有什么意义。这些都是斯大林在辩证法上的贡献，他使我们更清

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的行动是怎样密切地联系着。

我们都知道斯大林把辩证法归结为四个特征：首先是认为辩证法是把事物看做相互联系的；其次就是认为要在运动、变化中来观察、研究事物；第三，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最后就是对立统一的法则。斯大林规定这四个特征的时候注意到四个特征的密切联系，特别指出对立统一的特征是最根本的特征，他讲到发展的内在内容——由量变到质变的内容就是对立的斗争，具体讲每个特征的时候，还要说明这些联系。

斯大林讲辩证法特征的时候,特别删掉了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他把这个规律规定在辩证法的第三个特征里。他说发展不是循环的，而是由低级到高级。恩格斯讲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时候，实际上也仅仅是讲这个意思，否认循环论的看法。按照循环理论的看法，发展是老样子，世界上就没有进步。这样来讲辩证法的特征很必要，有很大好处。他不把否定之否定当做独立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很难说。斯大林这样规定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就可以说是使我们能够正确地了解到黑格尔的荒谬。黑格尔特别把这个规律看做独立的规律，而且看做是重要的规律。

除了关于辩证法特征的很特殊的说明以外，斯大林还有许多新的贡献，只要举语言学的例子就够了。把质变爆发的形式和逐渐过渡的形式加以区别，如果不是很好地总结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结果，不是总结革命经验，就不能提出新的原则来的。斯大林在辩证法上是进一步有了发展。

五、学习辩证法应该采用什么方法

学习辩证法应该采用的方法，总的来说还是联系实际，改造

思想的方针，因为是总的学习方针，所以要反复地讲。

联系实际工作，联系自己的思想，在学习辩证法的时候，一定要和这些实际联系起来，我们的工作和思想，并不是简单的个人的东西，在做工作的时候是接触社会的，接触社会各阶级，我们的思想表示我们对于社会斗争各方面的认识，所包括的范围是丰富的。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具体工作的认识，对于国家大事的认识，世界形势的认识，都和我们自己有关系。

过去我们的工作有成绩，但也有缺点，思想有正确的方面，但也有许多的毛病，这些毛病归根结底在思想方法上是和形而上学联系的。对于错误，我们追究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根源；对于正确的东西，我们研究在哪点上符合辩证法。比如从前在农村工作，土改以后实行集体化，于是有人用急躁过左的办法，一下子就想把农民组织成最高的合作社形式，甚至集体农场的形式，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从思想方法上讲要和形而上学联系起来，因为在这种工作中，我们看到了集体化是我们的方针，没有看到集体化要经过一定的步骤才能实行。我们看到了集体化对于农民有利，没有看到集体化这种有利的组织方式，倘若没有得到农民的自愿，是没有好的结果的。

看到了是的方面，没有看到否的方面，因此就要考虑怎样看才是正确的，就要用辩证法看。不要看到方针时忘记了实现这种方针的条件，如果不看条件就要出毛病。生产资料应该归公，但必须要有条件，就是生产资料要很发展，要机械化或接近机械化，工具应该是大规模的工具。把零碎的工具集中起来，就得到否定的意义。强迫命令都和形而上学有关系，推销农具为什么会出毛病？就是只看见农具肯定的方面，没有看见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有否定的方面。推销的实质本是好的，可是强迫推销就是不好的。

因此，我们学习辩证法总的方针，要结合工作的正确与错误，结合在工作中表现的各种思想，来研究辩证法，也就是反对主观主义，因为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分不开。主观主义只有表面的根据，犯了错误的人，你说他一点理由也没有，也不是的。他如果自己觉得没有理由就不会犯错误，他觉得那样做是对的。唯心论并不是一点道理讲不出，问题是道理是歪道理，片面的道理。所以反对形而上学，反对主观主义，是我们联系实际研究辩证法的一个方面。

用联系实际的方法来学习辩证法，最好是按照斯大林的办法来学习，斯大林的著作就是我们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好的模范。斯大林讲每一个辩证法特征的时候，都指出归结到实际行动里有什么意义。第二个特征是从运动中看问题，要看到世界是发展的，经常有新生的东西，衰亡的东西。根据这个特征，我们在实际生活里，要很好地注意新生的东西，注意新鲜事物，依靠新鲜事物。这样我们的方法才会是正确的，我们的行动才有胜利的保证。学到这些特征的时候，就要根据斯大林所指示的这些原则，同时和我们自己的思想比一比，我们是不是也能这样做。学到某个特征的时候，自己按照特征表现在行动里、思想里。比如讲第一个特征的时候，他立刻指出要在实际行动里不犯错误怎么办？就在我们观察问题、研究问题的时候注意到依条件、地点、时间为转移这个原则。辩证法的第一个特征说明一切都有联系，我们在工作中就要经常注意依条件地点时间为转移。我们自己能不能这样做呢？我们过去有时这样做，有时不能这样做，或常常不能这样做，不然为什么推销农具会发生毛病？有些地方推销的结果很好，有些地方推销的结果很不好，这就是没有注意到以条件地点时间为转移。把我们的材料摆出来看，根据斯大林的原则分析一下，就会

发现错误和正确的根本原因。

分析是困难的，把辩证法认真研究一下，困难就少些。

“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就是由这个时间到那个时间，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地方不同事情的意义也就不同，所以有些事情做对了，有些事情做错了。

斯大林在每个特征里都指出意义来，可以供我们参考。讲量变到质变规律的时候，说要做革命者不要做改良主义者，要斗争到底，跟列宁一样，把斗争看做是绝对的，反对阶级妥协政策。

这就是学习斯大林所讲的辩证法四个特征的时候，我们要怎样联系。

现在总起来讲一下，学习辩证法，联系实际改造思想，我们的中心任务应该是什么呢？辩证法每个特征都规定一个任务，主要就是要学会对事物矛盾运动进行具体的全面的分析，反对观察问题的片面性和表面性，这两句话就是中心任务。积极的任务要学会对于事物的矛盾运动进行具体的全面的分析，消极的任务就是反对观察问题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关于这一点可以翻一翻矛盾论，讲到矛盾的特殊性的时候，讲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的看问题，所谓片面就是不知道全面的看问题，表现性就是对于矛盾的总体，矛盾的各方面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的特点，仅仅站在那里远远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象，就想动手解决矛盾。

形而上学是片面性、表面性，主观主义的病根，不反对形而上学要想把辩证法学好是不可能的。片面性和表面性跟辩证法的每个特征都是针锋相对的。辩证法要求我们联系，不要孤立地看问题；而形而上学把联系方面割断了。某种工作任务是好的，推

销农具是好的，可是好是和条件有联系的，形而上学把条件割断了，所以变成片面的东西。辩证法要求我们注意事物的变化发展，什么是没落的，什么是新生的。形而上学就要我们注意表面的东西，有些东西要没落，但表面上很强大；形而上学要我们看表面的东西，把新生的东西看做没有价值，星星之火力量薄弱，结果犯了错误。辩证法要我们看到量变与质量的联系，量变发展的结果要引起质变，又看到质变必须由量变作准备；形而上学只看到量变，没有注意要引起质变，就产生了改良主义。比如思想改造，好像和平的，慢慢地读几本书就是改造，不知道要在一定的时候引起根本的变化。只看到质变，没有看到质变要有量变做准备，这种形而上学的错误，容易引起急躁冒进的毛病，一个工作任务来了，没有注意准备条件，先要做量变工作才能实现任务。农业集体化，需要逐步教育农民，使他渐渐习惯于集体的劳动，还要加上生产工具，要变成大规模的工具。生产力的量变是实行由个体农民到集体化根本改变的量的条件。

任何一件新的事情实行起来都要有准备，推销新农具，农民不熟悉就要想办法教育农民，使他们能掌握，才能推销得好。急躁冒进就是忽视量的准备。实际生活里，形而上学使我们只看一方面，或者只看到统一的方面忘记了斗争，结果变成了投降主义者。新税制要使国营工商业和合作社与私人企业一样地收税，国营工商业、合作社都叫苦，资本家很高兴，在讲统一的时候，忘记了斗争，就伤害了自己，犯了右倾的错误，使我们有许多困难。我们也有只看见斗争没有注意到统一的方面，过去机会主义者有这种情形，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有这种情形，斗争多了一点，私人的积极性受了损害，因此我们才要调整工商业，可是形而上学又对它太厉害了，发生另外的毛病，如果不反对形而上学，总是过

左、过右掌握不住，学习辩证法的四个特征，要经常注意解决片面性、表面性的问题。

片面性、表面性产生了主观主义，所以所有主观主义都可以归结为思想方法上的错误，比如我们革命胜利以后，工会工作中强调了工人的福利，忘记了发展生产，这是主观主义，因为这种思想不适合今天的需要，工人福利应该照顾，可是不能只看一方面，是要把发展生产作为基础的。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也是主观主义，这种主观主义也是从思想的片面性产生的。注意书本知识而不注意联系实际，注意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忘记了普遍真理应该和具体实践结合。经验主义就是只看见自己局部经验的效果，没有注意这种效果和局部的条件联系。因此以为这种效果到处可以产生，所以到处搬经验。

关于联系实际的问题，要注意中国过去的主观主义主要表现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今天我们建设新中国，主观主义比较大量的主要的表现是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这两种主观主义是新中国建设事业里的两种主要形式，今天的建设不管乡村城市，工农业都有这样的情形。工业里有保守主义，不愿学习先进经验，不愿推广先进经验，片面地看到有困难，不注意有克服困难的力量。另外有急躁冒进，基本建设条件没有就想一下子实现。要搞基本建设有很多条件要准备，他一切都不管就干起来，结果很快垮台。片面地看到新事物好，而没有看到需要量的准备。思想改造也有这种情形，大学里旧知识分子说，我过去就是这样生活，我就是这样的思想，拒绝改造。“三反”、“五反”以后改变了，又有些急躁冒进，想在几个礼拜变成苏联式的大学。这些都是片面性、形而上学，使得在工作中犯主观主义。

我们结合实际学辩证法，可以从这方面多注意，多注意当前

实际，比较和工作关系多的实际。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两种形式，特别注意它的形而上学根源。

这就是主要的方法，要注意辩证法是普遍的规律，不是直接每个具体问题的方法。我们学辩证法，首先学这个规律，还要设法掌握这规律，要结合具体工作具体辩证法的表现来进行研究。我们联系实际来学辩证法，要注意不犯公式主义的毛病。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根据一般原则作为总的指导，对具体问题做独立的具体分析，如果不注意这点，我们的辩证法就变成黑格尔的辩证法，把总原则变成公式，这样研究也要犯错误。

普遍联系的辩证法*

(1953.10)

今天我们就来讲辩证法的四个特征。前天讲引言时简单地说了一下，因为时间很短，所以说得很简单，有一些问题讲得不很清楚。有的同志提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要求解答，我前天都没有解释。如何结合实际工作来了解这些问题，我们以后就要解释；在讲否定之否定，质变量变的关系时有些问题也可以讲清楚。大家提问题考虑是应该的，不要因为前一次没有讲，就不应该提问题。问题很快地提出，我就可以了解我讲课有什么毛病。

"是否、否是"的公式不要看得太神秘了，这公式的意思是我们看问题时总要考虑一下反面的东西。我们觉得它是这样，但是还要想想，警惕可能的另一方面。我们说它是好的、坏的，也要从它的相反的一面去考虑，事实上也一定有相反的情况，因为客观事物是多方面的，要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就一定要经常注意另一方面，否则就会犯错误。但是多方面考虑或从相反的一面考虑还要看具体问题具体解决，按照具体的情况作具体的考虑、具体的分析。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反面，反面又有不同的表现，在不同的情况下，正反的关系是不同的。

我们学辩证法只是学一个总的方向，总要考虑一些不同的方

---

* 见《辩证法引言》一讲题注。1953年10月6日讲。例举略有删节。本讲标题是我们整理时加的。

面，相反的方面，在具体问题上要作具体了解。所以对社会主义用的公式和帝国主义用的公式就应该有不同的看法。同一件东西情况不同，就有不同的反面可以考虑。

我前一次说的意思就是用很典型的例子来说明，用科学的语言来说明，今天再补充一下。对社会主义怎样考虑它的正面反面、是或否的方面呢？最好是按照斯大林的讲法，不要自己去猜测。斯大林一方面肯定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完全适合的，在他以前的著作《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就是这样肯定的。但他没有指出另外一方面。以后许多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根据这种讲法，就说社会主义没有矛盾，就是没有考虑其反面。结果斯大林最近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又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肯定它们完全适合，另外又指出它们之间有矛盾。问题是怎样的矛盾，在旧社会矛盾是带有冲突敌对的性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没有冲突的，只有一点，生产关系的发展总是比生产力落后一点，慢一点，因为生产力是革命的最活泼最前进的因素，快慢之间就有矛盾。这样就很科学地解决了这问题。另一方面，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还要前进，生产关系还要被否定，还要改进。①

帝国主义问题就是说现在它还有没有力量。说它完全没有力量，它还是有力量的，不然就垮了，可是，它是不是了不起呢？也不是。它力量是有一点的，但愈来愈小，终归要垮台的，毛主席说它是纸老虎就正指出它的两方面。

---

① 关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艾思奇这里没有讲得很清楚，请参见他在1964年7月所做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辅导》等——编者。

有的同志提出下雨好不好？下雨下得适当是好的，久旱逢甘霖，下雨当然是好的，但是雨下得太大变成了水灾就不好了。这样了解是否清楚大家可以考虑，听说有争论，怎样的争论我就不清楚了，我就是这样解释。

这些问题我们尽可能根据经典著作，有一些是经典著作没有的，自己发现，那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学习尽可能按照经典著作来了解问题。

其他的问题我们以后再继续讲。

现在就讲四个基本特征。四个特征的排列有没有道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还要讲。

第一个特征就是认为自然界社会之间一切事物是普遍联系着，相互依赖着的。下面分五个问题来讲：

第一，就是斯大林对特征所下的定义。

第二，自然界的相互联系，就是对自然界的了解。

第三，社会的相互联系，马恩列斯怎样了解社会的相互联系。

第四，资产阶级学者的错误。

最后，我们的学习方法，在我们的学习中应该怎样学。

一、辩证法特征的定义

首先讲一下斯大林对辩证法特征所下的定义。

这问题不多讲了，大家看书就可以知道。斯大林认为辩证法就是把自然界看做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各种各样现象的一个统一的总体。这些看法是和形而上学相反的，形而上学认为自然界各种现象是互相孤立、隔离、不是互相依赖的。按照辩证法的看法，各种现象都是有一种必然的联系，有一种有机的联系，毛主席讲的“由此及彼”就是讲的事物的内部联系。人的物质生活

和人的思想有联系，我们的阶级地位决定我们的思想意识，我们的思想意识又指导我们的行动，这是相互联系的。自然界中，地球和太阳有联系，地球绕太阳走，又受太阳的影响。联系有一种必然的关系，不是随便堆在一起的，而是中间有一定的规律，有规律的联系，地球总是绕太阳走，是很有规律的联系。按照形而上学的看法，各种现象之间即使有联系也是偶然的，不是有规律的，事物彼此之间没有一种有规律的联系。

形而上学的哲学认为思想和环境没有什么关系，生在这个环境，思想是另外一种，偶然的可以碰到一块，人的思想可以自由自在的（完全是绝对的自由），没有必然在一起。辩证法则认为有必然性，思想受环境的影响，但环境也受思想的影响，进步的思想能够推动进步的力量，改造环境。辩证法就是要研究事物的有机联系，无论观察任何现象总要研究一下这种现象与什么条件联系着。有辩证法的思想，才能碰到问题时，正确地解决问题。详细的内容那次我们已经讲了。

斯大林所下的定义是最完全的。是马恩列以来最完整的，把辩证法的特征指明出来，不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没有指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经常讲到辩证法是研究事物的联系，这种思想在马恩列的著作里到处有的，我们只要翻一下参考书就找到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都讲到了，在《自然辩证法》里他一开始就这样讲，他说辩证法就是当做联系的科学而和形而上学对立展开的。马克思《资本论》序也有这样的话。马克思、恩格斯讲的很简单，斯大林讲得很详细，完整地把联系科学的内容加以说明，这可以说是斯大林对辩证法的发挥，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发展，因为他讲得更完整更具体化，他把马克思、恩格斯原有的思想更具体更明了地表达出来。

二、自然界的普遍联系

对自然界的表象，按斯大林的定义就可以知道。辩证法首先是研究自然界的方法，然后又概括到社会里。马克思把它当做研究自然界的方法，同时又是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然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所以要了解自然界的任何现象必须对每一种现象和它周围的联系提出考察，加以研究。恩格斯的定义表示：我们对任何一种现象倘若不在联系中了解，则是不能了解它的意义的。因为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东西、研究任何一种现象，我们都要问为什么，怎样产生的，要了解为什么，就要研究它有什么联系，什么条件决定他这样作。自然界下雨，我们要问好不好，要了解下雨的意义，就要研究下雨是在什么条件下下雨的，把条件弄清楚后，下雨的意义就懂得了。下雨是水分在空中遇冷凝结而成，我们知道天气有一点冷，就是要下雨了。如果不了解自然界现象的条件，许多事情都是莫名其妙，就会大惊小怪。懂得自然科学和不懂得自然科学的对自然界的看法有两种：不懂得自然科学的人对自然界的现象常常会大惊小怪，莫名其妙，甚至会用迷信的方法来解释。天上打雷、日食月食的现象我们看起来很平常，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们理解它，了解其条件的联系及它们的规律，日食就是因为月亮绕地球走，遮住太阳，但是不懂得的就大惊小怪。今年元旦日食，有些资产阶级就很恐慌，认为大年初一日食是一件很不好的事，遇到一些问题、一些困难就说这是日食的结果，倘若其中有些坏人就会借此造谣，对一些老百姓有影响，因为他们不懂得这条件。所以，要理解一事物的意义，就一定要懂得它的条件，自然科学的发展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唯心论是带有宗教的意义的，因为宗教唯心论的出发点首先就是崇拜偶然，一切事情都是偶然的，最后得出结论这种偶然的原因就是因为有鬼神在支配。所以崇拜偶然性是损害科学，为宗教迷信而服务的。

马克思主义者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都要注意必然的联系，一定要把规律找出来，撇开偶然性就会找到必然的联系，所以主要的方法是研究事物的联系，研究某一种现象为什么会产生的条件。

米丘林学派就是能够以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界，来看事物的变化。米丘林把人的生殖细胞活动和周围环境、和整个生物的整体联系起来看，认为生物的遗传因素是和环境有关系的，环境影响整个生物的整体，整体又影响生物的细胞，最后就发生变化。米丘林生物学坚决地相信这一点，因此他的实验成功了，苹果本来只能在温暖的地方生长，他用种种方法处理它，结果就能够在很远很冷的地方生长。苏联比较北部的地方终年吃不到苹果，现在到处都有苹果了。方法是可以改变的，用很精密的方法改变环境的条件，就使得总的发生变化。

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一步一步地打破形而上学的学说。在19世纪以前，科学都是分门别类地收集材料；19世纪以后，就要联系到对各方面的联系。恩格斯有一句话：19世纪的科学是整理材料的科学，以后是研究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研究把自然界的过程结合成为一个伟大的整体。我们现在的科学就是这样的，我们是否了解自然界，就在于是否各方面都能够联系，是否能联系成为一个整体。

三、人类社会的相互联系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

辩证法的第一个特征，它在自然界普遍地使用，在人类社会也是普遍真理，可以使用。人类社会也可以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和自然界一样，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所谓统一的整体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它里面许多现象是互相联系的，互相依赖的。人的思想和人的生活，政治、经济、文化都是互相联系的，各方面都是互相联系的。因此，整个地说，它是统一的，社会的各种现象都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必要的部分。我们社会没有文化行不行？没有文化不行。没有政治、经济也不行。每一种都是少不了的。当然经济是最根本的东西，可是我们说经济是最根本的，并不等于说文化、政治都可有可无，经济虽然是根本的，但是经济产生政治、文化，也是经济本身所需要的，是为经济服务的。没有政治就不能保证经济建设，没有文化经济建设也不能顺利开展。没有自然科学能不能把经济建设发展起来？没有社会科学，没有马克思主义能不能保证我们经济建设能够很好地发展？这是很清楚的。我们国家的建设虽然是必需着重经济建设，首先着重工业、重工业，可是为了重工业、工业的发展，就必需要有物质的保证，要有国家的统一，要有思想动员工作，要有思想指导，要有科学的指导，少一个都不行。我只是埋头做经济工作，不管政治，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的。从前有一种人有这种想法，现在也可能有这种想法。做经济工作的人往往轻视政治，只管经济不管政治。苏联五年计划以后，号召大家搞经济工作，经济建设方面有了发展，斯大林说，有成绩，但是有黑暗的一面，就是大家不注意政治，不注意思想工作。如果只管经济、不管政治，是很危险的，如果没有政治思想保证，如果经济工作人员中间政治上腐化，思想蜕化，那就使反动分子找到了破坏的空子。所以经济是政治、文化的基础，经济的发展还要依靠政治、文化，就是说要政治的保证，文化的推

动。所以说整个社会各方面的现象是有机地联系着，是缺一不可的。我们有一些同志做工作，选择工作时，往往忘记了这种联系，在国家强调工业建设的时候，有一些人就喜欢搞工业，不搞工业就有一点不愿意，叫他搞文化工作，就不高兴，好像受委屈。政治学校的干部就了解到经济建设没有法律保证是不行的，为了很好地建设我们的经济，所以要进一步地训练一些做法律工作的。有破坏分子，有破坏劳动纪律的人，就要用法律来保证。了解了法律工作的重要，因此就安心了。文化工作、教育工作也是这样，有很多的人不愿意干，原因之一就是以为经济是可以脱离文化的，虽然不一定很明显地讲出来，但多多少少有一种想法，以为经济重要，文化可有可无，因此好像做这工作很受委屈。不懂得各方面是有联系的，所以各方面都是重要的，懂得了这一点，就不会在这问题上影响自己选择工作方面的情绪。

所以，我们学习辩证法的特征联系到社会的时候，就应该很好地、很仔细地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很强调这一点，他一方面讲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的精神生活，另一方面又讲社会的精神生活对社会的物质生活有很大的作用。旧的思想、旧的理论是会阻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斯大林关于语言学一书中也讲到这问题，讲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所产生的，但是经济基础所以要产生上层建筑，是为了为自己服务的，因为经济基础需要上层建筑，需要政治文化的保证，所以才要上层建筑，所以上层建筑就要为经济基础服务。这些理论都不要把它抽象来了解，都要结合我们的工作生活来了解。斯大林及马克思主义者这样讲社会各方面的联系，是为什么，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既然各方面是有联系的，因此就可以知道我们国家各方

面的工作都是重要的。当然有某一些是重点，某一些实际不是重点，但不是重点并不等于不重要。工业是建设的中心，重工业是工业的中心，并不等于轻工业不重要或文化不重要，重点就是说我们要用多一点的力量去作，力量更集中一点。同时别的方面也要造成一种条件，有利于中心工作。要建设重工业，就要政治上、思想上保证重工业能够发展，也要适当地发展轻工业，因为如果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太高，工人的生活就感到困难。匈牙利、东德有一时期把发展重工业的中心抓住了，但把轻工业看得太轻，太放松了，结果物价高涨，生活水平降低。所以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一方面发展生产，同时又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在这基础上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福利。可是在匈牙利、东德，有一个时期就没有按照社会主义的规律去发展。高度的技术装备是装备了，但是怎样逐渐提高人民的生活，满足人民的文化需要，这一点就没有做到。不但没有提高，而且某些方面还降低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现在匈牙利党的书记写了一篇文章批评了这种做法。德国在朝鲜停战前几天就发生了一件事，西德、美帝国主义特务混到东德去鼓动一些落后的工人示威，并且丢了一些炸弹，这种捣乱当然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帝国主义想继续暴动没有成功。这件事情虽然被镇压下去，但是暴动能被鼓动起来，力量虽然不大，但说明了工人有不满的情绪，强调重工业，轻视轻工业，生活水平没有适当提高。农业也是这样，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很好地提高，有一些人不满意，东德的党很快地作了检讨。所以社会主义建设把重工业作重心，并不等于放松轻工业，相反地，为了完成总的任务，就要把不是重点的各方面的工作很正确地布置起来。配合重点，为重点服务。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世界观与实际工作密切地联系着。所以，如果我们的国家把某些任务当做重点，

因此以为只有做这工作才有重要的意义，只有这工作光荣，搞别的就不光荣，那就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不懂得社会是统一的有机体，不懂得各方面的工作都是不可少的。所以辩证法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社会是统一的整体，各方面的现象相互依赖，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可少的，任何一方面都和其他方面有关，都要依赖其他方面。政治、文化要依赖经济，但经济也要依赖政治、文化。所以我们用辩证法来研究社会问题时，就要先看各方面整个的联系，要重视社会的整个的客观联系。

按照斯大林的讲法就是这样，他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估计历史上每一个社会制度和每一个社会运动时，指出："当然，也就不可如历史家常做的那样，从'永恒正义'或其他某种成见出发，而是要从这个制度和这个社会运动所由产生并与其相联结的那些条件出发。"譬如奴隶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都要估计当时的条件。为什么要有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或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就不能像一些历史家的说法，他们说，这运动所以产生是因为某些伟大的人物脑子里想到的永恒的道理，他认为按这道理做就是最合理的，把这作为一个观念来推动运动，这样的估计是错误的。我们在估计社会制度、社会运动时，就要估计到当时的政治条件，首先要研究这种运动在什么条件下产生，为什么现在没有奴隶制度？为什么几千年以前中国外国都有奴隶制度？为什么以后有封建制度？是因为孔子想起来的吗？不是，因为那时有那种经济条件使它必然会产生。为什么1949年中国革命运动是新民主主义运动，而不是社会主义运动？是不是因为我们的领袖偶然想起来写了《新民主主义论》，因此就成了新民主主义呢？当然不是。因为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个最基本的条件决定这运动远不能是社会主义运动。因

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问题是要使广大人民推翻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势力，如果不解决这问题，我们就不能成功。中国现在还不需要马上消灭资本主义，过去压迫人民的远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因此就联系到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正如农民想要土地，想要私有财产，但是你恰恰要消灭私有财产，那是不对的，那样农民就会起来反对你。

我们的制度所以叫做新民主主义制度，是有其必然条件联系着的，不能不叫新民主主义。我们革命胜利后，现在的制度是什么？是过渡期的制度，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为什么会有这种制度？从毛主席著作里就可以找到根据。我们所以今天还要这种制度，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胜利的时候，我们的生产力很小，决定我们这样做。革命胜利时，我们工业的力量很弱，小生产占百分之九十。毛主席说，我们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就是百分之九十的小生产及百分之十的大工业，百分之九十的小生产怎么能够达到社会主义呢？如果大工业不能成为一种决定的优势，那就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所以说我们就要“过渡”而不是保持这种新民主主义制度。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或社会革命运动，都是和一定的客观条件联系着的，所以只有找出这条件，你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要有这制度，这制度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条件你就不可能了解。我们共产党反对宗教，但要规定信仰自由，共产党在自己的纲领里承认信仰自由，尊重某些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我们有些同志很难理解，因此有时在这问题上出错误，西北、新疆的工作错误最多的，就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我们要反对宗教，但不一定很快就要消灭宗教，否则就很容易脱离群众。譬如对回民不尊重的事情，我们的文件上曾经进行过批评。所以发生这种错误，就是

因为这些同志把共产党反对宗教抽象化了，脱离实际条件来了解共产党反对宗教的要求。我们是要反对宗教的，这是方向，但要注意方式。主观上反对是一个问题，要实际做又是一个问题。反对就要创造条件，最主要的是要创造工农生活的条件，使工农生活大大地提高，老百姓没有困难了，旧社会的困苦生活都消灭了。在旧社会老百姓生活困难没办法解决，自己把命运归之于鬼神，所以生活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宗教信仰就不能完全铲除。要消灭宗教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首先要使我们的生活得到大大的发展，要经过社会主义，甚至要经过共产主义才能完全消灭。过去苏联也有一些问题，少数的还相信宗教，有一些是老头子，很顽固，他活了八九十年，信了五六十年宗教，不叫他相信是不行的；还有他的父母儿女死了，精神很痛苦，找不到地方发泄，就是周围的人慰问他也不行，于是就有少数的人往宗教钻，所以一时要消灭宗教是不可能的。特别有些事情并不是宗教问题，有的是习惯，不能说他们落后。

所以，不根据条件看问题，对我们的一些政策也就不能理解了，或者对政策能够理解了，实行政策的时候碰到具体事实就莫名其妙了。我们前天讲推行农具的问题，就是好事情，但是干的时候又碰了钉子，农民不能接受，所以必须首先创造条件，创造客观条件，客观条件使某种地形对某种农具不能使用，在贫瘠的农村应该用什么工具，在较好的农村应该用什么农具。另外要有主观的条件，老百姓不懂得，就要教给他，使他主观上能接受新的技术。如果不注意主客观条件就容易犯错误，碰钉子。

所以说，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社会主义，研究革命工作问题时，第一件事情就是研究条件，这是第一个特征，斯大林把它摆在第一点，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无论碰到什么问题，其研究的方法

就是先要研究条件。我们只要查一下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就可以看出这特点。在许多文章中，他们处理问题，分析问题时，第一件事就是把条件弄清楚，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那时白色地区有红色政权，这的确是奇怪的，有些同志对这些现象不了解，不了解的原因就是不了解这问题中的条件。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一开始就分析条件，这文章虽然不是指定的参考书，但是可以看一下。毛主席写的时候首先把红色政权能够在白色地区出现的好几个条件讲出来，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有一个特点，是许多帝国主义在争夺一个中国，它们的走狗反动统治者也不能联合在一起，封建割据的形势不能消灭，由于反动统治者有这种尖锐的矛盾，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它们的矛盾。另外还有其他的矛盾，如江西、湖南等地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战争，农民经过锻炼，政治觉悟提高了，对共产党有了认识。所以群众有了锻炼，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有了相当的武装，这种条件摆着，就必然有红色政权的存在。不但可以存在，而且可以有发展，群众不断受到锻炼，共产党有坚强的领导，可以发展。所以虽然小小的红色政权，但是联系到条件来看，政权虽小，但作用很大，克服了许多困难，耸动世界。这就是毛主席用辩证法来研究问题，从小的事情里估计到重大的意义。这种例子是很多的，我们可以自己去找。

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问题的方法，第一步就是在研究对象时把它的联系的条件弄清楚。我们还可以举一些例子。譬如《论持久战》的著作中很明显地看出来是用这种方法。《论持久战》一开始把问题提出来以后，就研究敌人和我们的条件，首先把敌我条件弄清楚，敌人有一个有利的条件，是强国，这是有利的。但是它的战争是侵略的、反动的，它的国家是小的国家，它的战争得不

到别的国家的同情，这是三个困难，三个不利的条件。反过来看我们中国方面，恰恰相反，一个条件是我们的困难条件，我们是比较弱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有三个有利的条件：我们的战争是进步的战争，人民拥护，可能越打越强；我们是大国家，打起仗来，就是败了，也有地方跑，有回旋余地；再有，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得到人家的同情。所以把条件弄清楚了，战争的意义、战争的前途也就清楚了。

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很多人苦闷得很，结果是怎样呢？是亡国呢，还是速胜呢？速胜又不像，已经打了一年了。可是抗日战争时速胜的思想是有一些人经常想像的，蒋介石吹了一番，他以为在上海打一仗，最后在南京打一仗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结果没有成功。也还有原因，有一种错觉，就是我们平型关打了胜仗，振奋人心，全国人民对八路军的威望大大提高了，但是因此有人就认为可以速胜，可以打阵地战、运动战，不要游击战。我们党内有人说四年可以打败日本。还有台儿庄又打了胜仗，都是前后不久的事情。所以把一两个胜仗孤立起来看，就造成一种幻想，速胜论的幻想。所以当时议论纷纷，究竟怎样，就搞不清楚。只有毛主席解决了这问题，把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长期能够起支配作用的条件找出来，根据这些条件，而不根据表面现象来推测这事情。因为表面现象往往只是局部的一件两件事，不根据这些，而根据整个战争有关的最根本的条件，找出这些条件的相互关系，来推测这事情的发展规律，发展前途。这样推测是有根据的。斯大林在唯物论中讲思维的相互联系，辩证的相互联系便是它的规律。所以把联系弄清楚，把一件事的有机联系的条件弄清楚，这件事的发展规律，它的本质也就清楚了，而且又可以正确地推测这前途。毛主席就是根据这样的方法来解决持久战的。毛

主席写持久战的时候抗日战争才开始一年，我们把《论持久战》翻一下，八年的事情大体上都清楚地指出来了。要经过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特点如何，都指出来了。不懂得辩证法的人就以为毛主席好像刘伯温的神机妙算一样，有什么天书，实际上科学的方法就有预算的能力，可以预算发展的前途。我们再想一下就可以明白，敌人强，我们弱，只要长时期就能打胜，这就可以驳倒速胜论。另外亡国论对不对？根据条件也可以驳倒，我们是进步的战争，正义的战争，人民拥护，有可能越战越强，人民越来越团结；而敌人是反动的战争，敌人越打仗，人民越反对，因为战争使人民吃亏，而资本家、地主得到利益，所以越打越困难。这种条件的对比很可以看出，我们有战胜的可能。最根本的条件是我们进步，他们反动。抓住这两个条件，就可以驳倒速胜、亡国的理论。我们的胜利是因为：一个是大国，一个是有世界人民的同情及帮助。如果我们是小国，战争也不一定能打胜，如阿比西尼亚、西班牙那样就要战败。有的国家虽然进步，但是因为小，所以失败了。我们是大国家，华北支持不了，就退到华南，正面支持不了，就跑到后面，钻小空子，麻雀满天飞，到处可以立足。我们的抗战最后决定于苏联的出兵，许多条件凑起来，把关系结合起来就会清楚了，这并没有什么神秘，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我们不是马德里、西班牙，我们是中国，我们可以胜利，但是不能速胜，而是持久。我们可以退却，在退却到乡村阶段，就可以准备力量反攻。根据这条件，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推出这几点，这是一点儿也没有什么神秘的。

我们是不是能做到这样呢？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首先的问题就是我们不会辩证法，不会找条件，如果我们会辩证法，懂得辩证法，那也是可以认识的，问题是像毛主席这样很快就可以把

问题弄清楚，则是需要思想锻炼的，不是我们想一套就可以把问题一下子解决了，没有这样方便。不过将来大家有了思想基础，那就是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思想中真正因素的有机联系。有了这种基础在实际问题上就能一步步地运用，将来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研究事物的联系，用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问题就是这样的，碰到一个对象先把它的联系作用、根本条件弄清楚，如果要弄清楚那就要研究，把材料摆出来仔细地研究。

联系的观点就是这样。

有一些人对辩证法有一些错误的了解，以为任何一个事物都可以联系，可以乱联系，我们讲辩证法的时候，往往有人问，你说一切事物都有普遍的联系，你的讲课和艾森豪威尔有没有联系呢？如果这样讲那就错误了。某一些事情和某一些事物有联系，而不是每一件事物都和其他千千万万件事物都有联系。如果一定要把全世界的一切事物都联系一下，不联系就好像不能理解，那就错了，研究事物的联系是不能这样乱联系的，首先就要有一个研究对象，一个问题摆在面前，你先要看一看和它联系着的条件是什么，无论碰到什么事情，或者做一些什么工作，都要经常注意这件事或这件工作有什么条件。特别是条件，它是会变化的，我们党的政策、工作方法要因条件变化而变化，因此研究它的同时也要注意条件的变化，为什么变化，就要看条件。

碰到一个问题，第一就要看它有什么条件，第二就要注意条件的变化。我们党有一些政策也是变化的，有一些政策基本不变，但是情况一变，就有了若干变化，有一些还会有根本的变化。譬如土地革命政策，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是土地革命政策，抗日战争是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是土地改革。为什么要改革，大家

都了解，因为我们国家的斗争条件变了，如果我们了解了斗争条件变化了，就能解释这变革。有些同志因为不懂得条件的变化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抗日战争的减租减息，有些同志就不愿意，觉得不如土地革命政策痛快一些，为什么不理解我们政策的转变？就是因为它不懂得条件变化了。有些同志在抗战时和地主搞统一战线搞惯了，因此就不愿意执行土地改革的政策。对富农的政策也是这样，在抗战时期我们允许征收富农的剩余土地，在全国胜利后又改变成暂时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这个改变在实际工作中也有许多同志不了解，因为当时不征收富农的财产就很难满足农民的要求，就不能保证战争的需要，但是在全国胜利后，没有战争的负担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不保持富农的经济，中农的积极性就会冷下去。我们胜利后，经过土地改革，我们主要是发展生产，鼓励农民的生产情绪，如果不鼓励富农，中农就感到不安，在这种条件下，就实行了新的政策。就是说，全国的根本条件改变了，政策也就有改变，不管是根本的还是一些的改变，总是要根据不同的条件来决定政策，在实行政策时，有些同志还感觉困难，为什么？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还要从全局的观点出发，不能从局部的困难出发，有的时候局部条件和全局的根本条件不同，那么我们考虑问题，考虑党的政策时就要经常从全面考虑。而当全国的条件变了的时候，整个的政策就要有根本的改变，要根据具体的条件采取具体的办法，但是还要贯彻整个的政策，因为全局的利益是更重要的，看具体的条件也是要看全面的条件，小的利益应该服从大的利益，所以具体的工作碰到困难就是对整个党的政策不大了解，有的时候不注意条件，或者研究条件时候比较狭隘，我们要防止这种毛病。

这一些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把辩证法的第一个条件运用到社

会上的一个主要的要点，这个要点斯大林归结为一个原则，就是“一切都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这是我们研究革命实际工作的要点。这方法也是要我们对革命的具体问题作具体的研究，所谓具体的研究就是要根据条件来研究，抽象的研究就是脱离条件的研究，新式的农具是好的，但是要具体的研究，不要抽象研究。反对宗教也不能抽象地反对，要看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消灭宗教。

这种一切依条件、地点、时间为转移的原则，也叫历史观点，历史发展的情况不同，条件不同，对历史也有不同的理解。非历史观点是不注意时间、地点、条件。它的特点它的错误就是这点：过去的事情，你要估计他的意义时，就要根据过去的实践条件；现在的事情，就要根据现在实践的条件来估计。斯大林说，奴隶制度好不好，可不可以理解，要看当时条件如何，封建制度也是这样。斯大林还举了这例子，说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好不好，在沙皇政府下要求民主共和国是好的；革命胜利了，还要建立民主共和国，那就不好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研究问题时，一定要遵守的历史观点。

四、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观点的批判

第四个问题就是批评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观点。

资产阶级在研究社会问题时，从来没有把它提到科学的水平，资产阶级中间没有社会科学。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有社会科学，这一点是我们要注意的。资产阶级虽然发展过自然科学，但是从来没有过社会科学。有一些资产阶级的学者公开地讲：“社会的研究不成其为科学”。我们解放后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和大学中社会系的教授争论这问题，我们说这是社会科学，他们一定说，世界上没有社会科学。所以，不相信有社会科学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

观点。

为什么资产阶级没有社会科学，就是因为资产阶级从来也没有运用科学唯物论辩证法来研究社会，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者从来也没有认识到社会发展的根本条件，没有发现过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社会怎样发展？决定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条件是什么？这问题资产阶级从来没有解决过，甚至从来没人提起过。资产阶级的学者从来都是把社会的变化，看做是一种偶然的发展。社会怎样才能改好，怎样才能由万恶的社会改成好的社会？要依靠什么？资产阶级的学者一般地认为，要把社会改好，主要的是依靠世界上偶然出现的一个伟大的公平的人物，他的脑子里能够想到一种符合永恒正义的社会理想，他能想出一套最好的社会理想，如果世界上偶然出现这种人物，世界就有希望改好。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也是根据这种观点来看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思想是倾向于无产阶级的，但是他们受了资产阶级旧的思想影响，因此常常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方面，他们的思想没有和资产阶级割断联系，这种思想是把新思想、合理思想的产生，看做是孤立的、偶然的东西，是脱离客观条件产生的。所以，按照资产阶级学者的看法，历史就是一篇糊涂账，偶然出了一些好人，历史就变了一下，偶然出了一些坏人，历史就变坏了，所以历史就是搞不清楚，没有规律可以寻找。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更是把这些东西极端地发展起来，认为社会就是由自由意志支配的，那么历史就更是糊涂账。

我们可以这样说，凡是我们在看社会问题时，凡是有崇拜偶然性，崇拜个人力量的观点都可以说是资产阶级体系的思想。我们党员当然不是资产阶级分子，但是如果个人思想中有崇拜个人、崇拜偶像的因素，就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批判资产阶

级形而上学，同时批判个人主义，批判崇拜偶像的观点，把个人的偶然出现当做历史的决定因素，把个人英雄看得很高，看得绝对化了。英雄伟人当然有很大的意义，但是脱离了物质条件来看，就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崇拜个人，忽视集体的力量，这都是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把个人与历史条件孤立起来。

刚才我们讲了，资产阶级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把人的思想孤立起来看社会问题，所以资产阶级没有社会科学。资产阶级的这种思想，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就和马克思主义经常斗争，马克思主义也经常批判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五四”运动以来，资产阶级就用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被许多青年拥护以后，资产阶级中间就提出了一个争论，就是关于人生观的论战，那是在1922年的时候，共产党已经有了，主要就是张君劢，他现在在台湾给蒋介石作走狗，他主张人生就是受自由意志支配，是不能以科学来研究人生、研究社会的；另一派是还想利用科学的旗帜，但实际上还是唯心论。这一派的人认为社会也可以用科学来研究，但科学研究的结果是否可靠却不一定，他们是实验主义者，他们的哲学完全是经验批判论的，就是认为科学研究社会也就是一些感觉，科学不过是研究这些感觉。资产阶级中间就有这两派争论，一派公开反对哲学，一派还想冒牌科学，利用这招牌。马克思主义后来传播到中国，以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了他们，这是哲学上一个很大的争论。这例子就说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在与形而上学不断斗争中发展的。

资产阶级的非历史观点是经常起作用的，我们学马克思主义、学辩证法的人就要经常警惕这种影响，当然资产阶级非历史观点总是要失败的，因为它违背历史总是要失败的，譬如有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希望把中国拉回到旧民主主义的道路上去，希望实行旧

民主主义，就是现在也有这种想法，我们要搞工业化，但是我们的工业化是社会主义的。有的人认为既然要搞工业化，就要放手叫资本家发展私营工业，当然我们要帮助资本家适当的发展，但是也要有限制，社会主义工业要把重工业作重点，资产阶级的工业化就希望把轻工业作重点，这是脱离了现在的历史条件的，现在的历史条件不允许我们搞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有人就有发展轻工业的理想，以为那样可以赚钱，可以把我们人民生活提高得更快一些，所以他说他的理想也是为人民服务，可是实际上是违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因为只有发展重工业，才能使中国成为独立的工业国家，所以我们要批判这种脱离现在条件的资产阶级的思想。

美帝国主义也没有历史观点，我们一再告诉它，在今天的条件下，亚洲人民已经不是可随便欺侮的了。毛主席这样讲过，苏联在最近的社论里也说了这样的话，“中国人民今天不是可以任人摆布的”。甚至印度尼赫鲁也提出了这警告，引起美帝国主义的不高兴，尼赫鲁倒很愿意参加朝鲜的政治会议，美帝国主义就坚决地反对，他也讲亚洲不能任人摆布，历史条件很清楚地摆着，美帝国主义就不肯承认，这种反历史的观点总是要失败的。研究问题如果不根据辩证法，不看条件，随便乱估计，一定要失败。

五、学习辩证法普遍联系原则的方法

现在讲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学习辩证法的特征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原则。

应该注意的原则，刚才已经讲了，总的来说，我们应该把辩证法的几个特征所包含的主要原则，拿来作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党的政策，处理实际工作问题的一种指导方法，一切依条件地

点时间为转移，用这个原则作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领会党的政策，处理实际工作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学习辩证法的几个特征时，我们就应该根据这一特征来联系我们的学习，联系我们对党的政策的了解，联系我们的具体工作，要联系许多方面来学习，才能学习好。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时候，就要注意如何运用辩证法来解决问题，要有意识地根据辩证法的特征来读这些著作，在学习党的政策时，也要根据条件研究一下党的政策在什么条件下提出来的，在解决我们自己的工作问题时，也要研究一下我们是否注意到工作条件，总的来讲，也还是要根据辩证法，根据条件、原则，来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同时反对思想方法里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影响。我现在把这问题分开来讲一下。

学习马克思主义，读马、恩、列、斯的书，我们应该怎样地读？学了辩证法的第一个特征就应该领会如何读马恩列斯著作的方法，有两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一种方法就是记住书上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的结论、一些原则，不研究这原则、这结论是怎么来的，在什么条件下，马恩列斯要怎样来解决问题，要怎样来作结论，单纯地记住原则，不研究提出这些结论的条件，这是一种学习方法。这种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是我们要反对的教条主义的方法，就是把原则结论和它所联系的条件脱离了，割断原则和它的条件的联系只是抽象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结果就没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就是形而上学的学习方法。这种方法我们要反对，反对死记原则结论，忘记了学习中是如何得到这结论的。

正确的学习方法是另外一种。正确的学习方法不是单纯地记原则结论，虽然原则结论也要记，但是重要的不是记原则结论。马

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不一定就在结论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就在于如何得到这结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提出什么原则。为什么恩格斯在从前要说一个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不能成功，要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看就是抽象化了，用辩证法来学，就可以看出，恩格斯所以这样主张是和当时的条件有关系的，在当时条件下，单靠资本主义一个国家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当时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有矛盾，但是还不像帝国主义这样厉害，不会引起世界大战。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中还不会一个国家革命胜利了，别的国家就不来帮助它。巴黎公社胜利了，法国、德国就立刻联合起来，征服巴黎公社。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就不同了，帝国主义的矛盾很厉害，世界大战打得头破血流，所以虽然一个国家革命胜利了，邱吉尔组织了十四个国家干涉俄国革命，但后来失败了，因为帝国主义自己狗咬狗，受伤了，没有力量来镇压一个国家的革命。所以我们不能用书呆子的方法来记结论，碰到每一个结论时，更要注意条件的来源，这就是用一种联系实际的方法学马克思主义。这也是一种方法。

学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以后，如何运用到中国实际上来，也是要比较一下马恩列斯那时的条件与中国当前的条件。一方面，在书上学原则的时候就要注意到当时的情况；另一方面，把原则运用到中国来的时候又要考虑与中国的情况是否完全一样，如果条件不一样，运用原则时就要根据条件有所不同，有所改进，要把它具体化。这就是学习辩证法第一特征的要注意的地方。学这特征不是孤立地，而是要把它与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学了以后，把它当做武器来读马列主义的书，我们学了以后阅读毛主席的书就可以更深入一些。以前我们一些同志可能不知道毛主席写文章都是根据辩证法写的，以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地用这种方

法来学习《毛泽东选集》，这就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领会毛主席的著作，就可以领会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及实质。

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一开始建立时，总要经过过渡时期然后达到社会主义，苏联也是这样，中国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也是要经过过渡时期。这一点，苏联与中国是相同的，斯大林讲过：每一个国家革命胜利后都要有一个过渡时期，没有这时期，想在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就成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要过渡这一点是个普遍的道理，但是运用这原则时，又可以根据自己国家的具体条件，使原则适当地具体化，使之变为具体的行动。

又譬如对资产阶级的政策，苏联十月革命就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原来就反对资产阶级，所以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虽然也让他存在，但是基本政策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经过过渡时期消灭资本主义。在我们中国就有些不同，中国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政治上有统一战线，在经济上是利用、限制和改造。在苏联过渡时期就没有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在经济上苏联没有我们这一套利用限制改造，没有把它当做主要的消灭资产阶级的办法。我们有可能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来改造资产阶级，我们有一些政策是苏联新经济政策中有的，但我们更发展。因为我们条件和苏联不同，基本上是一个过渡时期，但具体政策有若干不同，这不能说是根本不同，不能说苏联一点没有利用限制资本主义，但我们这是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主要方法。

反对教条主义，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时就要注意条件。无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都是因为不注意条件。教条主义是学习运用原则时不注意条件，经验主义是不注意这些经验受一定条件的限制，条件变化了，经验就不适合了。

另外讲到党的政策，我们学习辩证法的第一个特征时，就要

联系到党的政策来讲，我们学习这特征要注意讲一讲党的具体政策，如何根据具体情况来制定我们党的许多政策，又怎样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这些道理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我这里就不去详细重复。总之，提起大家的注意，就是要经常联系到我们党的政策，根据我们学习的原则，进一步地了解党的原则；同时也可以检查一下我们对党的政策如何了解，我们过去是不是曾经有过对党的政策不能领会，对党的某些新的政策不能接受的情况，是什么原因，按照辩证法的原则来解决一下，把过去的材料摆一摆，我们对党的政策不了解，甚至对抗，是否违反了辩证法的这一特征，在那一点上忘记了当时的条件，或者根本不考虑当时的条件，不考虑条件的变化，或者因为我们有局部观点，没有全局观点。根据这种原则分析材料，就可能对材料有所领会，认识就可以提高一步。

我们工会也有这种情况，存在经济主义、无政府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是认为工会工作主要是为工人阶级谋福利，工团主义主要是脱离党的领导。李富春同志批评李立三同志的错误就说，李立三是忘记了革命胜利以前和胜利以后工会工作的条件不同了，革命胜利以前我们向资本家斗争，争取福利，提高福利，争取提高工资，以前这样做是应该的；可是在革命胜利后就不同了，统治者不是反动派而是工人阶级，要把工厂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工厂不是剥削工人的武器，而是工人自己的武器，这时候就要着重发展生产，工会工作要为发展生产服务。当然也要谋福利，但是发展生产是主要的，因为条件不同。我们的工会领导者忘记了这一点，就犯了很原则的错误。过分地强调福利，在工人阶级中造成了经济主义的思想，这后果一直到最近还有。我们要纠正这种错误，就要发展生产，强调劳动纪律，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建设

是很有损害的。

还有，可以联系实际工作来学习辩证法的特征，也可以检查一下，联系实际工作，如何在实际工作中掌握政策的问题。掌握政策，在我们实际工作中必须注意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要注意党的政策是全局性的，所以我们就应该坚决地执行，不管环境怎样，我们要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要注意全局性的条件，不注意这一点我们对于实际政策就可能动摇。我们在检查自己的思想时，就可以检查到这一点，看对党的政策有没有动摇；另外一方面，在具体环境中也可能有一些具体条件要注意，我们虽然要坚持党的一般政策，但是在具体工作中有许多困难，因此要注意在具体工作中坚持党的政策时，就要根据具体的条件，采取一些适当的方法来贯彻这一政策。所以一方面要从全局的条件，来使我们对政策坚决地服从执行；一方面还要注意具体的条件，采取具体的办法来贯彻政策。从具体条件考虑并不是要我们对具体的政策动摇，而是要把政策在执行中具体化，不能用具体条件作为藉口反对党的政策，而只能更具体地执行党的政策。我们一些同志往往不能这样做，往往有两种偏向，一种是强调局部的困难，因此对执行党的政策有动摇，刚才讲的保存富农等就可能有这种问题。经验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强调特殊，把特殊条件片面化，特殊条件和一般条件有联系，但是不能强调特殊条件，和一般条件孤立开来，这也是形而上学。因为特殊条件困难就对政策动摇，这就是经验主义作怪。保守主义也是这样，当新的任务提出来时，可以强调困难条件，不能积极执行党的任务。改造思想强调旧人员太顽固，就不积极地做，这就是保守主义。另外一种偏向，是有时只注意了一般问题，忘记了特殊条件，拥护政策，但是忘记了执行政策时使之具体化，需要采取适合条件的办法和具体的步骤，这样就

往往犯急躁冒进、命令主义的错误。组织合作社这是党的政策，但是执行的时候不管农民能不能接受，想一两天都变成生产合作社，这就是急躁冒进。抗美援朝捐飞机大炮，到农村去不管有没有条件，每人捐十万。坚持任务是对的，但是不考虑具体条件，农民只能卖房子卖地才能拿出这些钱来。不注意具体条件也会犯错误，不估计具体的主客观条件也是错误的。

大体上方法就是这样。

运动发展的辩证法*

(1953.10)

今天讲辩证法第二个基本特征。

四个特征都是基本的特征，并不是说只有这几个特征，列宁讲辩证法有十六个要素，辩证法要详细来讲，要素有很多。斯大林讲的是四个基本特征，我们了解辩证法能够把四个基本特征了解清楚也就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所以这里不讲列宁讲的十六个要素。

现在讲辩证法第二个基本特征，讲五点。

首先讲辩证法第二个特征的定义或意义；

第二点，辩证法第二个基本特征在自然科学上的表现；

第三点，辩证法第二个基本特征在人类社会研究方面的应用；

第四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中以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怎么样应用辩证法的第二个基本特征，简单地举一些经典著作中如何应用辩证法的具体例子；

第五点，学习方法上关于学习第二个特征所应该注意的要点。

一、世界是运动发展的

首先我们要讲第二个特征与第一个特征有什么联系，这是列

---

* 见《辩证法引言》一讲题注。1953年10月7日讲。例举略有删节。本讲标题是我们整理时加的。

宁提出来的所谓排列问题。为什么第一个特征研究后接着就是研究第二个特征呢？这样一个次序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是有道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都是很有道理的，有一定逻辑上的联系。我们研究第一个特征接着研究第二个特征，就是表现我们对事情的认识更深入一步。

我们碰到一件事情，首先看到联系。研究问题的第一步就是研究条件，研究联系。我们把联系弄清楚了，然后进一步去考虑，我们就会感觉到联系并不是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联系。只要我们谈到联系以后，再进一步考虑问题，我们就会感觉到应该研究问题的运动和变化。联系并不是老是这样联系，永远是如此的。联系总是由一种联系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一种联系变为另一种联系。斯大林在讲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时，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条件是和其他事物一样，也是在变化着"。

我们中国在十月革命以前和十月革命以后，中国跟苏联的联系是由沙皇俄国变成苏联，这是一个变化，国家性质变化了，就是中国革命的外部条件也变化了。所以条件是变化的，联系也继续不断地变化。我们看到了事物的条件，事物的联系，再进一步去研究，如果我们的研究并不是停止在眼前的情况，把过去想一想，把将来想一想，我们就会感觉到还有一个运动问题、变化问题。所以辩证法不仅仅看到联系，就是不仅仅看到现状，还要进一步认识变化，跟现状是不同的，过去情况怎么样，将来情况又会怎么样。我们的认识如果考虑这个问题，接触这个问题，就开始接近到辩证法第二个特征，所以辩证法四个特征这样的排列，表示着我们的认识一步一步地深入。

以后讲第三个、第四个特征时我们还要解释，为什么第三个特征表示比第二个特征更深入；为什么第四个特征表示我们的认

识最深刻的地方。因为四个特征是按照人类的认识的深刻程度来排列的。我们开始看到联系只是表面的，需要进一步了解，第二个特征就是更深刻。当然第一个特征比形而上学是更深刻的，因为形而上学只看到孤立的事物。如果仅仅看到联系，这也是不够的。譬如讲一个人在这里学习，因为有这个环境，有了学习条件，总有一些进步，有些人积极，每一个人都积极，是看到了联系。是不是能够更深刻地看到每个人的学习情况，那还不一定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学习情况。要了解过去学得怎样，过去工作得怎样，联系到过去和现在，结合起来才能够了解得更深刻，对学习的可能性才能了解。一般地讲在这个环境中学习，学习的时候应该有这样的环境，大家都能够多读一些书，了解一些新问题，我们看到这些联系，同时也看到这个运动。因为我们一学习，就表示我们的思想在运动，在发展。学习不仅仅跟具体的条件联系，而且在学习中有新的东西，我们的思想中有新的东西出现，我们的旧东西逐渐被克服，被消灭。如果只从联系来看，只是看到联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书，如果更深刻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就要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来了解马克思主义，就有新的思想发展，旧思想就被克服。所以认识了我们新思想的发展，旧思想被克服，对于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才有进一步的认识。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得深刻，也只有这样才能学习得深刻。如果只是跟书本联系一下，读了，就完了，读了书以后还要发生一种思想变化，才能更深刻。所以，这两个特征的关系是人类认识程度的关系。第一步跟书本联系，第二步因为跟书本的联系就发生新旧的变化，这是第二个特征摆在第一个特征后面的原因及其意义。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在第二讲时也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

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地观察自然、人类的历史或我们自己

的精神活动时，那么在我们面前首先出现的是种种联系及交互作用底无限错综的图画，其中没有任何是不动的和不变的，一切都运动着、变化着、产生着和消失着。”在这中间没有任何东西保持原来形式的，保持旧的状态的。万物存在着，同时又不存在着，因为万物流动着，万物经常地变化着，万物皆在不断存在与消灭的过程中。这样的话在《反杜林论》中也有。就是我们要注意考察，不注意就往往把事情看成孤立的。

首先看到的是事物的联系、相互作用，从相互的作用中又看到没有一件事情是保持不动的状态，这说明我们的认识过程，凡是注意研究一个问题时，说是首先看到这个问题。所以研究第一个特征以后，就要进一步地研究辩证法的第二个特征。斯大林是把第二个特征讲得很完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都反复地讲到辩证法的具体联系和变化运动。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是很完整地把辩证法第二个特征加以说明了，这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讲定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辩证法总是与形而上学对立起来的，总是要反对形而上学的，总是要和形而上学对照起来研究的。我们想研究变化、运动，一定要与不注意时间、地点、条件的观点对立起来，将变化运动与静止的观点对立起来。

斯大林说：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做静止不动的状态，停顿不变的状态，而是看做不断运动、不断变化的状态。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状态，其中都是有某些东西在产生着和发展着，始终都有某种东西在败坏着和衰颓着。运动并不是简单的动一动，而是新的和旧的相互交替的过程，是新的产生和旧的衰亡的过程。

这样了解运动，与机械唯物论是有区别的。机械唯物论不承

认有新的产生和旧的灭亡。机械唯物论就是把运动了解成为数量的增加或减少，东西的性质是永远不变的，没有任何新东西在产生，也没有任何旧东西在灭亡，永远是原来的东西反复地出现。这种机械唯物论观点，事实上并没有承认运动与变化。形式上是承认运动、变化，实质上是否承认运动和变化，因为它并不承认新东西在出现，它把世界看成为是老样子。

如果要把运动的观点看成为是一种哲学观点，那一定要承认世界上有新的东西在产生，旧的东西在衰亡。不承认这一点那么我们运动的观点，我们对运动的看法是形式的、是表面的。

斯大林对这一特征还有进一步的解释。除了我刚才讲的，新生的东西和衰亡的东西不断交替，新生的东西不断产生与旧的东西不断地灭亡，还有更重要的是：在辩证法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现时似乎巩固，但已经衰亡的东西，而是正在产生的，正在发展东西，哪怕它现时似乎还不巩固。因为在辩证法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所以辩证法不仅仅承认简单的运动，而且要注意运动的内容，新的东西在产生与旧东西在衰亡的过程。

不仅仅要承认新东西的产生和旧东西的衰亡，而且要决定我们的态度，我们要特别重视新东西。

所以，总括起来讲，辩证法第二个特征的第一点：一切事物都是变化、运动的过程；第二：运动变化的内容是新东西在产生和旧东西在衰亡的过程；第三：就是要认识新生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三点总合起来，就是很完整的辩证法第二个特征的意义。

只是讲中国在运动变化是不够的，只讲新中国代替旧中国，这就是中国在运动在变化，是不够的；我们要强调新中国比旧中国更重要，我们要站在新中国方面，我们是坚决地不能站在旧中国

方面。

在斯大林以前并没有完整地指出这第二个特征。只有斯大林才综合了辩证法第二个特征的内容。斯大林发展了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辩证法第二个特征内容是有的，但没有综合过，而且对这个特征也没有明确地提出过。这是关于第二个特征的一般内容。

二、运动发展特征在自然科学上的表现

第二点讲：辩证法第二个特征在自然科学上的表现。

根据第二个特征来看，我们可以这样说：整个自然界发展的历史，就是辩证法在自然界不断战胜形而上学的历史。

形而上学是曾经影响过自然科学，使自然科学把自然界的各种事物看成一成不变的。很早就有这样的情况，一直到最近还有这样的情况。譬如在天文学上，17 世纪在英国有一位大科学家，叫牛顿，但他对天文学的看法是形而上学的。哪些地方表现得形而上学呢？譬如说，地球绕太阳运动，按照牛顿的理论来看，地球绕太阳运动是从来都是这样的，永远如此的，从来没有改变的，如果地球有开始的那一天，地球就是绕太阳走的。他的思想还有更荒谬的东西，牛顿认为地球为什么开头就绕太阳走呢？地球本来是不会动的，它怎样会绕太阳走呢，他有一个理论，所谓最初的冲击，他讲：上帝把太阳碰了一下，世界就开始运动了。力量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上帝的“最初冲击”，以后世界就永远这样运动，永远不变。这是形而上学跟宗教联系起来的结果。这个问题不跟我们有什么直接的联系，现在我们不去多讲他了。

形而上学认为世界老是这样，不会变化的。形而上学一直到最近，就是像资产阶级的生物学，所谓新达尔文主义认为：遗传

是不变的。自然科学愈早影响愈大。在15、16、17世纪力学把物体看成完全不动的东西。力学是研究物体之间的关系，两个物体碰在一起就要发生机械运动，力学把物体看成是完全不变的，至少它的分子是固定的，完全不变的。他们说：桌子它会腐朽，但至少它的分子是不变的。他们认为，在各个科学的领域中，应把事物看成为不变的，它是研究不变的孤立的东西，把各种事物归结为各种不同的种类。他们还认为：动植物也是不变的。

然而，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步一步地把形而上学打垮了。从19世纪开始，每一种新的自然界科学上的发现，都夺回了形而上学所占领的阵地。达尔文学说的出现把生物学的形而上学的阵地打垮了。最早是康德，他是一个唯心论者，他早期的科学著作也还是接近唯物论的，像太阳系是怎么样形成的。它的星云说第一次把形而上学打垮了，把牛顿的思想打垮了。至于康德的哲学思想还是不够正确的。后来天文学对他的太阳系形成说思想给了一个证明，他的这个学说基本上是对的，但究竟如何发生还是不太对的，没有解释清楚。康德和他以后的科学把天文学上的形而上学打垮了。

电子学说出现以后，把物质最小的元素不变的学说打垮了。电子学说说明物质最小的单位还是变化的，这个学说认为物质最小的单位是阴电子和阳电子组成的。

形而上学的思想总想恢复它的地位。达尔文以后，特别是生物学上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者，摩尔根学派还有魏斯曼学派，他们自称新达尔文主义。达尔文认为：物种是变化的，但他们认为遗传性是不变的，他们说打破了达尔文的教条，实质上他们是反对达尔文的道理的。他们这个学派在一个时期是起着支配作用，有一个时期达尔文主义是被新达尔文主义打垮了。特别是在美国讲

达尔文主义是犯罪的，要受到拘禁。新达尔文主义是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

苏联的自然科学是有意识地运用辩证法。苏联每一个自然科学上的发现，对于形而上学在科学上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的胜利使形而上学在生物学上的最后的阵地都打垮了。所以，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证明辩证法的观点是正确的。

辩证法的第二个特征认为，一切都在改变。自然界证明有新东西在产生，旧东西在衰亡。这种观点是对的，形而上学是不对的。

形而上学认为自然界根本上是不变的，但它又并不是简单地否认运动变化的现象。形而上学不能不承认在自然界中一切事物和现象是在变化着，它不能不承认这个特点。但是，它认为不变是根本的；运动是表面的现象。形而上学认为运动是相对的；静止是绝对的。事物的运动变化是有的，但变化不是根本的东西，只有位置变化的表现，数量变化的表现。牛顿的“太阳系”观点，认为变化是地球绕着太阳，这是变化，但这是表现，在根本上是不变的。形而上学认为：静止不变是根本的、绝对的，运动、变化是表面的，只是现象。

辩证法是相反的，就是运动是绝对的。有没有静止不变的现象呢？辩证法承认有静止不变的现象，但静止不变是相对的。任何一种事物，它可以有相对的静止，这是一方面；但根本上来说是变化的。

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是这样。过去旧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中国革命胜利，始终是没有变化的，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可是这个不变是相对的，是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我们旧中国虽

然根本上是完全一样;但是不能说鸦片战争到1949年之间没有许多重大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界线，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有许多变化，但社会的性质是相对的没有变化，是相对的静止，就是质的相对安定性。

事物的性质在一定范围内有相对的安定性，任何事物在根本上是不安定的，但有相对的安定性。睡觉就是相对的安定性，但是在呼吸，在新陈代谢，恢复精力，并准备明天的工作。辩证法并不是否认一切静止的现象，只是否认形而上学者把静止不变看成绝对的这种错误看法。不承认相对静止是不对的，相对静止要承认。一种东西在一定范围内是相对的不变的东西。如果没有相对不变的东西，那什么也抓不住。我们学习辩证法不要忘记这一点，认为：既然认识一切在变化，因此认为什么都不能肯定，这是不对的。就是在肯定中有否定，在否定中有肯定。赫拉克利特讲：“人不能两次走入同一河流”。他的学生就不同，说：“人不能走入同一条河流。”这是过去古代的诡辩。革命者也是不能静止的，但质是相对的安定，革命者总是革命者，但也有变化，他的觉悟提高，知识在增多，是变化的，证明世界是运动变化的。自然科学就是我们丰富的例子。

三、运动发展特征在社会历史上的应用

第三点：辩证法第二个特征在人类社会研究方面的表现。

这个问题内容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说明，也可以用另外一个题目说明，我们所讲的内容就是：辩证法第二个特征在人类社会历史研究上的胜利。

刚才讲，辩证法在自然科学上的胜利，现在来讲：辩证法第二个特征在人类社会历史研究上的胜利。在人类社会历史方面，可

以说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始终是受形而上学支配的。如果说在自然科学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以外的许多人，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应用辩证法看问题，那么，社会研究方面不同，除了马克思主义外，没有任何一个学者曾经用辩证法来看问题的。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在马克思主义外，所有研究社会的学者、社会历史学者，主要地是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譬如讲，否认历史运动、发展、变化的方面；否认历史发展在社会历史中是根本的东西，认为人类社会运动发展只是一种现象，在人类社会中总是有一种永久不变的东西在支配着。研究人类社会的人总是在找一种永久不变的东西。斯大林讲：外国的学者总是想在人类历史中去找永恒的真理。总是想找某种东西、不变的原则来当做它的基础。历史好像是开始就按照永恒真理的表现来发展，或当做目的、当做基础。有些研究社会的学者把历史认为是抽象的善恶的斗争，好事与坏事的斗争。

从古代起，我们讲希腊的哲学时，苏格拉底，他是专门研究人类社会的道德，努力想找到不变的原则，一般原则，希望说明永远遵循的条件。

资产阶级学者就有一种在研究社会历史上执行本阶级利益的责任。把资本主义解释成为永恒的东西，用一种道理证明资本主义是永久的东西。资产阶级想这样来解释社会，说明人类社会如果没有资本是不能存在的。有的学者这样解释：在原始公社的人都是有资本的，没有资本就不能生活，人在原始公社社会中要生活就需要在手中拿棍棒，这就是资本。你们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就会知道，它是荒谬的。资本是人剥削人的工具，棍棒是资本，难道在剥削野兽？而野兽不是人。他们把资本与工具简单地混淆起来了。他们认为，人类是永远需要资本的。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人类永远是为自己的。人类所以结成社会就是为了自己，所以，要组织社会也是为了自己，一切都是从个人出发。个人主义是永久的。个人主义是“天经地义”的，是永恒真理，永恒正义。

永恒正义其实也有具体内容的，资产阶级有他的永恒正义，封建社会也有它的永恒正义，奴隶社会也有它的永恒正义。封建地主阶级认为：人类分成各种等级就是永恒正义，大人，小人，公、侯、伯、子、男，就是永恒正义。其实，没有什么抽象的永恒正义，都是具体的。实质上，永恒正义按照辩证法来讲也是一种历史东西。

当时资产阶级学者研究社会，研究历史的人，总是认为：他的那种阶级道德和永恒正义是永久的。中国也有这样的现象。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天不变，道也不变”，还有所谓三从四德的“天经地义”，儿子服从老子，男尊女卑的永恒正义。这是封建社会的教义，在封建社会的学者说来，这是“天经地义”。他们把封建制度看成是永久的。“三纲五常”等各种封建社会的教义都是永久的。过去形而上学者，他要想在人类社会中找一种不变的东西，但是他们找到的并不是不变的东西，而仅仅是在历史上某种历史性的东西；可是，他们形而上学地夸大起来，说它是永恒的。

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在社会问题上的应用，不仅仅是形而上学者是这样，过去像对辩证法有贡献的人，他在考虑社会问题时也陷入形而上学。我们譬如讲，中国古代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中国的老子是辩证法的哲学家的大人物，老子的理想是什么？他始终是想回到原始公社社会去，回到自然经济的家长制去。他的理想是什么？“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他的哲学本来是辩证

法的，因为社会问题是愈变愈多，愈变愈复杂，他也承认这个规律，但认为是麻烦，他的理想是愿意社会变成孤零零的村落社会。他把这种社会变成了永久的正义。当然，他的哲学思想是有进步因素的，是辩证法的；可是他的社会理想是倒退的，是反动的。他的阶级性是很难捉摸的。

孔子跟希腊的赫拉克里特，他们都是出身于贵族，他的政治是倾向于贵族，也是在原始公社末期的制度，他希望回到原始公社制度去；但他又看到了社会在变化，又不得不承认这个变化，但把这个变化看成是一个坏事情。孔子思想有一点近似赫拉克里特思想的味道。从辩证法倒退的结论是很特别的，所以他的辩证法是不完全的，不是彻底的革命辩证法。彻底的革命辩证法应该是得到前进的结论。

古代辩证法就是有倒退的现象，它是不了解辩证法中的转变，就是在前进运动中有倒退的，好的会变成坏的现象。中国的老话说："物极必反"，"相反相成"。老子说："反者道之动"，他把辩证法这方面片面地夸大了，他认为发展的结果是可以倒退的。认为，倒退是更自然一些，进步变成倒退是自然现象。希腊赫拉克里特的思想没有这样明显，老子就很清楚，结果在社会理想方面走向形而上学去了。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基本上没有在社会问题上能够应用辩证法来了解的，在马克思主义以后，更是这样。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后，资产阶级始终是跟马克思主义思想敌对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者是用种种办法来反对，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跟马克思主义对立。资产阶级形而上学思想，譬如说，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就是一种形而上学思想，就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看人类社会的一种例子，一种跟我们有实际关系的例子。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为什么

可以说是形而上学的呢？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是把“民族”看成是不变的，特别是在民族中的对立是看成是永久不变的，认为民族与民族之间不能够没有一个绝对的界线。害怕民族界线的消灭，总想要保存民族界线，要想保留永久的不变的原则。这种民族主义的原则对人民的影响很深，所以现在我们处理民族问题很谨慎。不能说我们讲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因此我们就要立刻消灭民族界线。现在我们要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不这样讲是不行的。在民族中受到民族主义的思想影响是很长期的，不仅在统治阶级中有民族主义思想，就是这种思想对群众影响也很大，群众一下子是不能够忘记民族主义思想的。要想民族团结，不首先讲尊重民族生活习惯，这是不行的。第一要承认民族自决，然后才能讲民族团结；不承认民族自决，就不能够达到民族团结。如果不承认民族自决，你要团结这个民族，对你就不相信，就把你跟帝国主义混淆起来。如果我们搞民族政策，搞得不好，对少数民族不尊重，他就把共产主义看成帝国主义一样，他们认为我们与帝国主义没有区别。民族主义思想是剥削阶级思想。另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民族侵略，民族剥削对群众有很大的影响。他们有民族感情，害怕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利用这些民族感情，由于这种资本主义的民族侵略，民族斗争，使得民族跟民族之间，特别是少数民族中有迫切要保护自己民族的要求，想要保存自己的民族，害怕自己的民族被消灭，有这种意识。这种意识是带有形而上学性质的，再加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夸大原因，形而上学的成分是更强盛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打破形而上学，逐渐通过民族团结来提高群众的觉悟，认识民族界线并不是绝对的。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要想把民族问题与国际主义绝对对立起

来。甚至把民族主义解释成为种族主义，认为，种族中的界限是不能改变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说法也不一定在中国有，外国也有，就是把种族界线看成为绝对不变的。不同的种族，心理是不同的。在解放军未进西藏以前，他们认为：汉族人的心是不会好的。民族主义有时跟种族主义混淆的。种族主义者也是形而上学的看法。

这种种族主义最反动的表现，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最反动的表现，就是法西斯的种族主义。他们把人分成各种不同的种族，就是天生优等的种族是支配世界的；有些是劣等的种族，是受人支配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这样来看人类社会，反对种族主义。凡是有种族主义思想的人，他的思想也就有法西斯主义的因素。把人分成是优等的和劣等的。希特勒是这样认为：只有日耳曼民族是优等种族，最好的民族，黄种人是猪，黑种人是最坏的。美国也有种族主义，但不如希特勒这样明显。但他是要想建立一种种族主义的思想，想建立一个“英美民族”。现在英美有矛盾，没有提。但是现在讲的“美国生活方式”，要美国领导世界的生活方式，要把美国生活方式看成是绝对优秀，另外的生活方式是劣等民族的。这种思想都是法西斯思想，都是想要侵略世界的思想，想要挑起世界战争的一种理论。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形而上学对社会的看法，是已经到了最腐朽的地步，最反动的地步，发展到最反动的一面了。没有任何一点所谓“学说”的价值了，如果说资产阶级革命初期，形而上学思想还是一种学说的话，现在形而上学来看社会的方法，已经丝毫的学说性质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从整个历史来看，只有马列主义才能够对人类社会

历史研究中应用辩证方法,应用辩证法第二个特征。就是说能够把社会看做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能够驳斥所谓永恒的正义,永恒的“天经地义”,而把社会看做是不断产生新的制度,不断由新的制度来代替旧的制度这种过程。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所以在跟资产阶级形而上学斗争中每一次都得到胜利。因为他是科学的,是符合事实的。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观点出现的地方,就把形而上学的荒谬的面目揭露出来了。

关于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看法与资产阶级的看法就不同。资产阶级的看法是把民族界线、民族对立看成是永久不变的东西。可以从斯大林的著作中知道,马克思主义对于民族的看法,认为是一种历史的东西,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必然产生的现象。因此很清楚,民族不会有什么永久的限线,因为过去并没有什么民族。民族一定要走向国际主义的联合,民族与民族的关系逐渐要由国际主义来代替,由世界各国人民的联合来代替。民族是发生、发展的,它曾经是新东西,但它也要变成衰老的东西,应该消灭的东西。

法西斯种族主义更是反动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所谓天生优越的种族是没有的。法西斯主义是把“优越的种族”作为理论基础。法西斯主义并不是依靠种族主义,它是依靠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制度上的一种政治形式,它是最反动的最腐朽的帝国主义的一种制度,是帝国主义到危机,要垮台,没有办法,临死挣扎,所采取的最恶劣的办法。它本身是一种没落的现象,它并不能永久支配世界的。

我们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用辩证法来反对。不学习辩证法,只能一般讲,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是错误的;学习了辩证法,我们更深刻地从思想方法上来推翻它,从根本上把它推翻。使它在思想方法上站不住脚。你们知道,这种理论是根

本没有价值的。学习了哲学，就能够对问题从根本上来研究，从根本的地方来加以批判。所以，人类社会也同样受辩证法第二个特征的支配。

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说：社会生活处在不间断的运动与发展底状态中。这是很正确的。不能认为是什么不变的和凝固的东西，它决不能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它处在永久的运动中，永久的破坏与创造底过程中。因此，生活中总是存在着新东西与旧东西，正在生长着的东西与正在死亡的东西，革命的东西与反革命的东西。

这一段讲人类社会生活是受辩证法第二个特征支配的。人类社会的生活就是破坏与创造的过程，这说明人类社会也是一种发展变化的过程。辩证法基本特征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并不是不承认静止，而认为静止是相对的。讲破坏与创造的过程是包含着相对静止的。创造过程中，基本上是一个新生的东西的产生过程，在破坏过程中，虽然在不断破坏，是基本的，是与旧的没落的东西相对来说，可以说是相对的不变。对人类社会说，我们也就要这样看，根本上是不断变化，但是有相对的静止的状态，自然界要这样看，社会生活也要这样看。这样看问题并不是纯粹抽象的理论问题，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可以提高我们在生活、工作中的某些自觉。

譬如讲，我们革命是不断要改革社会，我们做革命工作的人要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满足现状，任何时候都要努力创造新东西，任何时候都要与旧东西决裂，要抛弃旧思想，要经常采取这个态度。哪怕我们在过去工作中有某些成绩，但不能满足于现状，我们要抛弃的就要抛弃，要破坏还是要破坏，要不断创造新东西。我们党的指示经常指出，我们要创造新东西。毛主席的许多著作中讲

到这个问题。在1938年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在《论新阶段》中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我们已经创造了新东西，但还有更新的东西在后面。这个意思叫我们的同志经常注意创造新东西。在1949年他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他告诉我们要老老实实学习新东西。

在我们工作中，要不断破坏，不断创造。经常注意从头学起，就是把辩证法贯彻到我们工作中去，学习中去，把世界观变成我们的工作态度，生活态度。坚持变化、运动是绝对的，应用到我们生活中，应用到我们工作中；同时也注意到相对的静止的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应该做什么？某种范围中应该抓住什么。绝对变化中有相对的静止。某一时期中，我们党发出一个指示，我们就应该坚持这个指示。因为运动是绝对的，今天接到这个指示，就应该坚决地执行这个指示，党指示叫我们如何创造新东西，但新东西在一定范围内是相对静止的。这个指示达到了，任务做完了，然后我们再按新的指示、新的任务去做。一方面要注意运动、变化；另一方面要坚持，要注意变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这是辩证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

马、恩、列、斯怎样应用辩证法第二个特征，可以再举一些具体例子来加以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要讲一讲，关于应用第二个特征作为方法、要素，怎样应用第二个特征来作为我们研究的方法的问题。

一般来讲，辩证法第二个特征是要我们承认，不管自然或社会，一切人类思想，都是变化的过程。既然承认这个规律，既然承认这是事实，因此，我们在研究事实，研究任何问题时，研究任何一个对象时，任何一个现象时，就应该用从它的运动中来考察。就是说，不要把他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来研究，什么对象都不要把它当做一成不变的，当做静止不变的东西来研究，而要从

它的运动中来考察。所以，马克思主义方法，是从运动变化中来研究问题的方法，来研究事物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已经写到这一点，他应用了俄国赞扬他《资本论》的一段话，来说明他的辩证法是怎样的。在序言中关于《资本论》主要的特征有这样一段话：“在马克思，只有一件事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所研究的现象的法则，但他认为重要的法则，不仅是已在一定时期具有完备形态且保持相互联系的现象之法则，他更着重的，是现象变化的法则，是由一形态到他一形态，由一系列关系到他一系列关系的推移法则。”马克思很赞成这个说法，说这正是我的辩证法，他研究《资本论》正是这样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就是发现了发展变化的法则，由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由一系列关系到另外一系列关系推移的法则。

我们认识任何东西，要研究它的变化法则，它怎样变化，它的变化规律是怎样的，由一种形态怎么样变成另外一种形态。我们革命斗争中也有这样的情况，由一种形态变成另一种形态。在革命没有胜利以前，革命在国内来讲始终是武装斗争的形态；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国内的建设就是我们的主要形态。国内阶级斗争也是有的，对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斗争形态和对过去反动派斗争的形态是不同的，性质是不同的，研究变化经常注意如何变化。这个方法，斯大林讲过一段话，更具体，也就是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讲的辩证方法这一节，他说：我们已经看到，生活处在不断运动当中，因而我们应当从其运动中考察生活，并且提出问题：生活走向哪里呢？我们已经看到生活是不断破坏与创造底图画，因而我们的义务是从其破坏与创造中考察生活，并且提出问题：生活中什么破坏着与什么创造着呢？这一段话是把辩证法第二特征当做方法来应用的最好说明。

这一段话告诉我们，应用第二个特征研究问题时，最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碰到任何一个对象要研究时，第一个问题就要考虑这一件东西是向哪里发展，就是说不要只看到现在的情况，问题首先是考虑他走向哪里？所谓向哪里发展，它究竟是向没落腐朽方向，还是向发展的方向。碰到任何一种事都要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研究工作问题，毕业后做什么工作？有人想做这样的工作，有人想做那样的工作，就要考虑。我做工作去向哪里？我们的工作是没有问题的，每一种工作都要向发展方向走去，不会向没落方向走去，不会这样。也有这样一种人，他选择自己要走向的路时，没有注意到也会走向没落的路上去的。在刚刚解放以后，有些人要想回家，觉得住在城市中没有回到农村中分一块土地好，做一个农民好。因为刚刚解放，在城市中苦，津贴不多，不管老干部、新干部都是一样，饭也不见得吃得好，没有农村中好。他们不懂得用辩证法去看问题，对自己生活工作没有注意这个问题。现在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分配一个工作，不愿意干，就是感到现状的这个工作好像很冷落，不怎样给人注意，不愿意干。当然对新工作不熟悉，具体搞起来有困难，新的东西往往是有困难的。

如果看现状，有时不了解新的意义。我们说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中也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处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有人就想确立、确保新民主主义。确立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只是看到新民主主义的现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新民主主义走向哪里？新民主主义一定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去，不能确保新民主主义制度，我们的问题是要使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去，使它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是要确保它。所以能不能够按照辩证法提出问题，来研究，来考虑，跟我们的结果正确不正确有很大的关系。碰到任何问题在研究时，首先要提出考虑这个问题往哪里走向，要注意

研究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研究什么东西在创造着，什么东西在破坏着？我们研究的对象中有什么新东西，有什么没落的东西？我们在考察新民主主义经济时，就要注意是什么在破坏着，什么在创造着，不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就会糊里糊涂地要求确立新民主主义；如果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就会从另外一方面来研究。我们就会感觉到，在我们社会中，资本主义不断在破坏，我们不能"确立"它，但也不能马上消灭它，也不能使资本主义一点发展也没有，但它的趋势是走向破坏的。什么在创造着？社会主义很迅速地在创造着，社会主义的制度不断地很迅速地在创造着，这样一提问题，就好了，这个问题就好研究了。应用辩证法第二个特征来研究问题的方法，就在于经常注意生活走向哪里，生活中什么东西在破坏着？什么东西在创造着。把这两个问题当做我们研究的任务，按照这个方向，碰到任何一种事情研究时，首先提出这两个问题。我们考虑考虑自己，检讨检讨自己，我们在工作中，我们对某种问题处理时，对问题研究时，是不是这样做了。是不是碰到问题后，就问它走向哪里？哪些在创造？哪些在破坏？如果用这个原则来检查我们的工作，会得到许多益处，我们就能够得到更深刻的思想。

和辩证法这两个方法完全相反，就是在研究问题时，不注意它的发展方向，不研究事物破坏和创造的内容。辩证法要求对任何事情研究时，先要注意事物发展的方向，注意什么是在创造，注意什么是在破坏。这两种对立的方法在研究问题时，可以对同一件事情得到两种相反的结论。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可以得到"确保"新民主主义的结论；用辩证法的方法来看，可以得到要设法逐渐过渡到使新民主主义变为社会主义的结论。我们研究任何问

题，两种方法都可以得到相反的结论。形而上学只看到现状，也可以说是表面现象，现状往往是表面现象，现状与发展趋势往往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从现状来看，革命在开始时往往是很小的；衰亡、腐朽势力往往是很大的，但他们的发展趋势是相反的。革命努力的发展会成为很大的力量；腐朽势力，现在是强大的，但将来是没落的、腐朽的。从形而上学来看问题，往往就把没落的东西看成是强大的，把美帝国主义看成是强大的，把发展的趋势，新生力量看成是不可靠的，把有强大生产力的势力看成不可靠的。新生东西在开始时总是很弱小的，小孩与老人比，小孩是弱小的，要老人去养大他，但小孩与老人的发展趋势比较，小孩要优越得多，他的生命力是比老人强得多。从形而上学来看，新生东西是弱小的，没落的东西是强大的；但从辩证法来看，虽然没落东西现在是强大，但是已开始衰亡的，将来发展趋势是衰亡的。新生东西虽然现在是弱小，但将来是强大的，它有强大的发展力量，在发展趋势上不是弱小的，因为是新生力量，它有生长的条件，它有强大的生长条件。这两种方法可以得到两种结果，这两种结论哪一种是对的？当然我们是可以看出，拿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看问题一定是错误的；拿辩证法来看问题一定是对的。最后是由实践来证明。确保新民主主义，这种形而上学的例子是经不起实践来证明的，因为这些东西是不能“确保”的，这种形而上学都是要破产的。资产阶级认为资本主义是永远的制度，可是实际生活驳倒这种看法。形而上学只看到现状，不看资本主义走向哪里，所以犯了错误。

拿形而上学来看朝鲜战争，有许多人，尤其是没有注意到什么在破坏，什么在创造，什么是新生的力量，什么是没落的力量，没有注意这个趋势，而只注意现状，得到这样的结论，就是说美

国一定胜利，朝鲜一定要失败。我们整个革命队伍是没有动摇的，革命内部也有个别人动摇，但是在革命队伍外有许多人都动摇。为什么他有这种看法呢?就是没有把美国当做虽然现在是强大的，但他是腐朽的，衰亡的，没落的。只看了表面，没有看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新生的力量，新生的势力是软弱的，这样小的国家，人口又少，武装上也没有美国利害，但他是新生的势力，他是在发展着，有新生的条件在发展着，首先有中国的帮助。所以实践粉碎了形而上学，实践证明了辩证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虽然小，虽然软弱，但这是不可战胜的。因为他有新生的条件，他有强大的条件，美国虽然强大，但不得不让步。

形而上学只是看到表面，不能看到本质。本质是要看到规律的，本质与规律是同一的范畴。有这种本质，就要发展这种表现，这是规律。我们研究社会主义问题，一定要坚持辩证法的方法，反对形而上学的方法。辩证法这种方法正如斯大林所讲：这种方法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对工人阶级有重大实际的意义。这种方法是科学的，而且是革命的方法。辩证法总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应用辩证法来研究问题，不能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主观主义是不对，客观主义也是不对的。主观主义是脱离客观实际的空想。客观主义是不讲立场，没有自己的立场。主观主义虽然也有主观主义的立场，也有阶级立场。辩证法是有斗争性的，应用辩证法是有立场的。我们应用辩证法是着重新生力量，这是我们的立场。为什么要看生活走向哪里，不仅要注意生活中什么在破坏？什么在创造？而且要考虑我应该站在新生的方面。考虑这三个问题来研究社会生活的主要条件，只有依靠新生的力量，我们才能够胜利，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是要这样做，研究新生、没落的结果使我们选择一个正确斗争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就是无产阶级是世界上最彻底最革命的新生力量。这一点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经常讲到。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讲辩证方法时说：能够彻底进步的只有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就是我们服务于无产阶级，把我们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不要只靠农民，而且要依靠工人阶级。在解放后，有许多人想回家，要求自己做一个农民，这就是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各种革命问题，各种实际问题。社会生活走向哪里，什么在创造着，什么在破坏着，再决定自己的态度，站在什么地方。不是由自己决定，而是由客观决定，但并不是客观主义，而是站在新生的立场上。

四、学习经典作家对运动发展原则的运用

马克思在观察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情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巴黎公社成立两个多月就失败了。如果用辩证法来看，对巴黎公社革命，马克思在最初是不太赞成的，他认为有些冒险，但马克思听到巴黎公社起来了，非常高兴，欢迎这个巴黎公社，认为是“冲天的创造精神”，用最高的形式来形容工人阶级的创造。他认为，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的形式，就是新生的力量，它失败了还是给他很高的评价。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可是它在世界上是第一次出现工人阶级的组织，那就是一个创造，就是历史转变的一种开始，这个巴黎公社就是将来的发展是不可抵抗的例子。虽然公社失败了，别的国家的工人要学习它。马克思主义用辩证法的估计，在俄国革命中证实了。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很快地、果断地认为，当时用工农兵自发的组织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这在世界上是没有的，这

是群众的创造。列宁看到这种新的创造，指出其伟大的意义，就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的形式。这是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验，即和巴黎公社的经验有关。如果我们看过《国家与革命》，列宁对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估计有着很重要的参考。列宁为什么断定苏维埃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他讲到理由，曾经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列宁曾经这样讲，苏维埃制度就是一种巴黎公社，像巴黎公社同类的东西。虽然有些不同，但巴黎公社中有许多制度在苏维埃中都有。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估计它的发展趋势，这种估计在俄国革命中证实了。这是无产阶级的组织，自发的组织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的形式。这表示，列宁也能够用辩证法来研究问题，看到生活中有新东西，立刻能够用敏锐的眼光看到它是新生力量，估计它的意义，坚决站在苏维埃方面，赞成苏维埃制。这是很好的例子。

列宁还有其他的例子，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1919 年胜利后，反动派打垮了，国内外的武装干涉也打垮了，要恢复生产，要搞劳动纪律问题，有些工人也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列宁研究了生活中事情，发现了莫斯科工人自发的组织，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列宁称之为："伟大的创举"。工人阶级在星期六本来是应该休息的，但是我们要义务劳动，自觉地加班加点，列宁看到了这个伟大的意义，有许多工人对劳动纪律不遵守，但有些同志自觉地参加了义务劳动。他写了一篇文章说："这是伟大的创举"。他说：在这方面，由工人首倡所组织的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具有莫大的意义。显然，这还只是开端，但已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彻底，更有决定意义的开端。他说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重要，这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工人阶级自己反对自己所受到旧思想，恶习惯，因为这是对自身的因

循守旧、放荡行为，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对万恶资本主义所遗留给工农的这些积习的胜利。列宁写了这一篇文章，他要求推广到全国去，他自己也参加这个义务星期六，以推广到全国，这样劳动纪律也就改善了。

斯大林对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发现也是一样。斯达汉诺夫运动与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有同样的意义。斯大林指出：这种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是对资本主义劳动态度的胜利。

关于第四个问题，还要讲一下，毛主席著作中的两个具体例子，对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学习辩证法，会有些帮助。这种例子在毛主席的著作中是很多的。《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根据中国许多实际材料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典范。他指明了中国社会中哪些阶级是没落的、哪些阶级是新生的？特别在文章中，用中国材料独立地再一次证明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毛主席解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并不是抽象地解释的。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应该依靠无产阶级，这是普遍真理。毛主席并不单纯说，马克思、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他并不是这样，他是以中国的材料，如“二七”大罢工、海员罢工、铁路罢工、开滦和焦作煤矿罢工、沙面罢工等等，震动了全国，来证实这一点。他说：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我们再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可以看出依靠新生力量的这一方法。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的估计与当时社会上其他人的估计不同，有人说：“糟得很”，他说：“好得很”；有人说：“过分了”，他说：“一点也不过分”。他说：目前农

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数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他估计得非常高。农民运动是新生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这个力量是强大的，他是充分估计到了。

每一个革命时期，毛主席都应用这个方法。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可以说明。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也研究了什么是新生的，什么是没落的，在《论持久战》中讲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研究了每一个阶段是什么力量在向上发展，什么力量在向下降落。他讲：抗日战争第一阶段是退却阶段，它的内容怎么样？他说：我们是处于劣势，退却；形而上学的看法就是：劣势就是退却。毛主席看法不同，指出劣势中、退却中，有进攻与优势的因素。经过第一个阶段，有一个向上变化的情况，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增长等等，这些是新生的东西。在第一个阶段中，虽然是退却，但有这些东西在生长，这是辩证法最好的应用。向下的东西是旧东西，主要是蒋介石的那一套，表现在质和量上，主要表现在量上，量的减少，质本来就是旧的。向上的量和质都有增长，主要表现在质上。碰到问题这样来研究，深入到内部，在现象上我们是退却的，研究内部本质上是有向上的，但也有向下的，向上的是新生的力量，向下的是没落的力量，我们要站在新生方面。他分析了向上向下的因素说：新生的、向上的东西，就是我们持久的和最后的胜利的根据，我们指望这个新生的东西。如果我们应用辩证法特征来研究毛主席的著作，我们可以领会许多更新的东西。毛

主席著作的科学性，高度的科学性，是真正的彻底而精密地应用了革命辩证法的结果，所以他的结论是正确的。

五、学习方法应注意的要点

首先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原则，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榜样。怎么样学习呢？就是无论什么问题，首先要注意它的发展趋势，首先在精神上准备研究它的发展趋势，它走向哪里，要仔细去研究社会中哪些是新生的，哪些是衰亡的。我们要看某种东西是向上发展的，还是走向下坡路的。要注意分析这两方面的东西，分析破坏的与创造的，新生的与没落的。同时在分析这两方面的变化时，就要把最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新生的事物方面。如果已经发现了新生的事物，就要把主要的注意力用来考虑如何培植新生的事物，如何创造一些条件来促进新生事物的发展。对于新生事物须要有这种态度，积极地扶植、培养它。不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是这样做了。看到新生力量，就立刻用最大的力量来保护它，发展它。列宁看到共产主义义务劳动星期六，就来保护它，推广它。我们看过一个电影，就是《顿巴斯矿工》，有一个工程师发明了联合开煤机，用机器挖煤，同时自动地运输到火车上去，这是一个新的创造。在工人中最苦的就是矿工，矿工中最苦的就是煤矿工。发明了这个机器，工人很高兴，要求推广这个机器。工程师对党支部书记说，要推广一、二架，支部书记想了一想说：一、二架太少了，可推广到10架；后来到省委书记那里，书记认为：10架太少了，可推广到50架，后来跑到斯大林那里，斯大林问：成不成，工人赞成不赞成？他们回答说：成，工人们都赞成。斯大林又说：工人怎么样赞成？他们说：青年工人都很拥护，唱歌跳舞，有人说：发明了机器，要

结婚，青年工人特别拥护。斯大林又问：你们要推广多少？他们说：决定推广 50 架。斯大林说：太少了，仅仅为了开始，500 架。斯大林认为：对新鲜事物丧失了感觉，那是最危险的。

我们可以检讨一下，是不是对新生事物很敏感，可能不仅不敏感，而且对新生事物有点麻木不仁。我们不仅对新生事物要敏感，而且要对新生事物有坚决相信的态度。参加革命的人一般地对新生事物有自发的信心。朝鲜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就是不怕，像飞机在轰炸时，他们还在种地、修桥。所谓新生力量，不是个人的问题，我们过去长期革命，对新生事物是有信心的，我们参加了数年革命，总是遭受过困难，克服过困难。过去我们没有学习过辩证法，这是生活中自发的，生活中仅仅是自发的是不够的，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就要求自觉。因为自发的东西是有些盲目，不稳定，不能成为一个方向，不能成为始终一贯的方向。有些人曾经艰苦奋斗过，但是革命胜利后，就怕困难，新工作不愿意做，学习也不愿意，还认为学习理论没有用，说搞这些教条有什么用？为什么有些人对许多事情没有信心，这就是没有自觉的辩证法。现在我们学习辩证法就是要把生活中自发的辩证法变成我们自觉的思想，要把原来的优良的传统，原来的革命精神变成理论上自觉的东西，使我们能够经常注意这种精神，不要因为有新的情况变化就发生动摇。

所以，学习辩证法特征，就是应该把这个特征自觉地用到我们生活工作中去，把我们过去原来有的优良的传统发展起来，对新东西有胜利的信心。事实上，我们大多数同志基本上是有这种信心的，为什么我们建设搞得这样好？是因为我们有很大的信心。

要应用辩证法这个特征来研究事物，同时要反对形而上学，要反对自己思想上的形而上学，就是反对看问题只看表面、只看片

面的思想方法。不解决这个问题，要想学好辩证法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过去仅仅对革命有信心，在胜利以后，就忘记这个信心，就是对新情况是表面的看法。这个问题，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有一句话，可以作为指导革命的原则，他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做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这一段话我们要牢牢地记住。

又有一种情况，新生的事物已经表现了力量，不一定就是软弱的，虽然表现了力量，可是还没有引起注意，不感觉到这是新生事物，不给它很高的估计，不重视，这种情况还是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家，在事情还没有明显时，就应该估计到他的力量，在事情还只有一点苗头时，就已经注意到它的发展。但有些人对事情已经有了苗头，他还是不注意。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两种情况，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看法就是第一种，还有一种就是现象已经很明显了，但还是不注意，这种不注意的情况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到了。毛主席讲：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但陈独秀派去的农民部长谭平山却想把暴风骤雨的农民运动压下去。日本已经打到东北，但"左"倾思想的人，还没有注意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采取消极的态度。在1933年福建人民政府成立，要打倒蒋介石，希望和我们联合。在那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很容易联合的，"左"倾分子把他们的代表带到招待所，开了一个会，他们就听了我们的报告，大骂了一顿。毛主席主张和他们联合，但他们麻木不仁。这就是严重的形而上学、严重的保守主义思想在作怪。

在新中国建设事业中也有，郝建秀管理纺织机器的先进方法，

总工会也派人去总结这个经验，证明了这是先进的经验，有些人却说：这是扫扫地，把机器弄得干净一点而已。在当时的领导上也是麻木不仁的，这也叫官僚主义。这些官僚主义阻碍了新生事物的发展，保守主义阻碍了我们新生事物的发展。有了对新生事物敏锐的感觉，不反对官僚主义，不反对保守主义，不克服形而上学，这是不行的。要反对片面性，保守主义是严重的片面性，把旧东西看做是不可动摇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保守主义。把个别的原则，个别的教条作为普遍的原则，这就是保守主义。在党的历史上有保守主义，在工业建设中也有保守主义，不肯接受工人先进的创造。经验主义也是保守主义。要学会辩证法第二个特征，一定要有反对保守主义决心。我们要注意保守主义，往往是屈服于困境的压力，没有勇气反对。一种新生东西出来了，周围的人要反对，造成一种空气，说一些怪话，阻碍我们接受新东西，所以不仅要反对我们脑子中的保守主义思想，而且要反对周围环境中的保守主义的气氛。可能这种情况，自己有些辩证法的感觉，就是缺少辩证法的勇气，对辩证法没有充分的信心。

还有一种，应当把辩证法的观点与群众路线结合起来，经常注意群众中的任何微小的创造，要经常向群众学习，要有很大的敏锐力来注意新出现的事情。一个领导者领导的艺术是不是高明，要看他是不是善于及时发现群众中的新创造，并给予及时的帮助、推动和培养。列宁、斯大林都有这样的特点，对群众新的创造经常地注意，并及时抓住它。毛主席告诉我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种原则与辩证法都是相同的。什么东西从群众中来？就是新的创造；什么东西到群众中去？就是新的创造经验到群众中去。新生事物的发现，有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况，不是首先从群众中来，而且首先学

习了外国先进经验得到的启发，然后再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不是任何先进经验都是从群众中来的，也可以从苏联或别国的先进经验中来，问题是在于学习外国经验，也要结合中国实际。

发展新经验是有步骤的，要从典型中加以研究，根据各种情况再加以研究。因此要反对急躁冒进，要反对不看时间、地点、条件搬用外国经验。一方面是要善于发现新事物，要向群众推广，对新事物不允许有麻木不仁，要反对保守主义；同时要反对急躁冒进，做工作要有步骤。

量变质变的辩证法*

(1953.10)

今天讲辩证法第三个基本特征的特点。

根据第二个特征再进一步研究，就知道事物发展决不是简单地重复。当然重复还是有的，有的是表面的事情，仿佛重复，但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并不是循环绕圈子。

形而上学仅仅承认发展，它只是承认循环，是数量上的变化。所以，还是原来的东西，没有什么变化。在旧小说开头就是“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看法是形而上学的。

把发展看做是简单循环，就不是辩证法。辩证法认为：发展是由旧的到新的、旧质到新质，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

如果承认第二个特征，又认为发展是简单的循环，那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

斯大林说：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发展过程看做什么简单增长的过程，看做数变不会引起质变的过程，而是看做由不显露的细小的数变进到显露的变，进到根本的变，进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质变不是逐渐地发生，而是迅速和突然地发生，即表现于由一种状态突变为另一种状态，不是偶然发

---

* 见《辩证法引言》一讲题注。1953年10月8日讲。本讲标题是我们整理时加的。

生的，而是规律性地发生，即由许多不明显的逐渐的数变积累而引起的结果。

一、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的关系

为什么否定之否定能够包含在这一定义中呢？否定之否定的意义，说明在事物发展表面来看，好像是循环的，事实上不是在循环，而是在向上运动。

否定之否定，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已经说过，并且他举了许多例子。列宁曾经说过“似乎是出发的复归”。他的意思是说，否定之否定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斯大林不用否定之否定，就是为了说明，不要把它当做公式，不要在什么地方都用三个阶段来套。有的否定之否定看起来好像绕圈子，实际上是上升的过程。自然界、人类社会发展是这样，人类思想的发展也是这样。

社会发展到了共产主义后，是不是又要回到阶级社会去呢？当然不会。共产主义就是人类社会新历史的开始。

否定之否定，正、反、合三个阶段，发展告一个段落，完成了一个循环，好像是翻来覆去，看起来是反复，绕圈子，实际上是一个上升运动。这种运动是相当普遍的。自然是这样，春、夏、秋、冬是年年绕圈子，实际上是年年不同。人类历史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制度建立起来，破坏了，又建立起来，是绕圈子，是上升的绕圈子。人的思想也是这样，如果把个人思想研究一下，思想的发展往往是这样，一个人犯了错误，你给了他批评，他就接受了，就要否定自己的过去的事情，回去想一想过去，感觉过去还有点好处，对你的批评有些动摇了，又回去，又受了批评，又解决了，反复几次，就搞清楚了。是不是这种情况？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想一想。如果自己的思想上曾经有些什么问题，自己进行斗

争，就是这样翻来覆去考虑问题，要考虑得好，总是考虑到这一点，然后再考查那一点，看一看这一面、那一面，翻来覆去考虑，才能考虑得好。如果不经过反复，任何问题不可能考虑周到的。

否定之否定，就是是否、否是。如果自己不主动考虑那一面，事实会逼迫你考虑另外一面。因为不考虑这一面，那就要碰钉子，那么事实就会迫使你考虑另外一面。你说推广这个农具好，你考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没有考虑结果有不好的一面，结果碰钉子，犯错误，不敢推广了。后来又考虑到还是推广新式农具好。应该把这个方法作为我们思想方法，主动地用这个方法来考虑问题，以免在实际工作中被动，这是符合辩证法的。

事情的发展基本方向，是由数变到质变，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外部看起来好像是绕圈子，在循环。由质到量，又由量到质，看起来是绕圈子，实际上是上升。这种上升运动好像是绕圈子、循环，实际上并不是简单循环。所以，发展并不是平滑的直线，并不是简单的直线，而是有曲折的关节线。量变到一定程度，就发生质变，就是一个关节，由质变到量变又是一个关节。量变到质变就是发展中的一个关节。发展的路线是关节线，并不是平滑的直线。

在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翻译成为“交错线”。陈昌浩同志考虑还是改成“关节线”比较好。交错就是量变与质变的交错线，“交错线”不太确切，改成关节线比较好。

任何事情，量的发展是有限制的，到一定程度就要到关节，一定要发展到质变。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主义就要垮台。整个量变到质变就是关节线。黑格尔就是用水做例子。水的温度到一百度就会沸腾，这个一百度就是关节点，水就发生了质变。这是关于斯大林如何用否定之否定来说明数变到质变的大体上的内

容。

关于否定之否定，就是要反对“循环论”。另外，我们要注意，斯大林讲的定义告诉我们，事物运动发展是千变万化的，但是运动变化最基本的形式是两种，就是量变形式或叫数变形式和质变形式。一切事物的发展基本上是这两种形式，当然这两种形式还可以具体地表现为很多形式，基本上是两种。

同时要注意一点，这两种形式不能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把他们当做是绝对对立的形式，不能认为这两种形式是没有联系的。辩证法要把这两种形式加以区别，但更要注意的是对这两种形式要从相互联系中来观察。这就是说，不能把数变当做量和质变完全没有关系的，永远是数量的增减，数量永远是增或减而不会引起任何质的变化。

我们应该认为：数变中就包含着和准备着质变的因素。这是一方面，就是说，不要把数变与质变相脱离，看到数变时，不要忘记质变；另外一方面不要把质变当做量与数变一点没有关系的，不要把质变当做是突然发生的偶然现象，这就很难说明事物的确定规律。我们应该把质变了解成是有规律的，必然发生的东西，而规律的关键是在质变上。质变是经过数量的变化，逐渐准备起来的，而且是有一定规律的，数变到什么程度时，就会引起质变，是有其一定的规律，是有必然性的，是可以确切地证明的，用科学的看法就能很清楚地指出它，弄清楚它。

要弄清偶然和必然的互相关系。必然性就是指规律，我们可以确切地弄清楚，偶然性就是很难指明它的规律的，当然不是说，它是没有原因的，有原因，但是很难确切地指明。

有一种观点认为，事物的突变就是偶然性。就是说，很难估计它的变化，说它没有原因很难说，讲原因是有的，或者是上帝

的原因，上帝想起来，就要某种生物变，变为什么？不知道。偶然并不等于没有原因。偶然的事情是有的，但都有原因。我们这里有人在咳嗽，在我们课堂上咳嗽是偶然性。但和讲课，就没有什么规律性的联系。什么时候知道他咳嗽呢？他的规律很不确定，他的原因是有的。偶然性的事情不是重要的。规律性的东西，必然性的东西在发展中是会贯彻下去。偶然性就不一定，在发展过程中，它可以发生，也可以不发生，它并不是重要的；但也并不是没有作用，作用也有。机械唯物论认为：一切都是必然的，偶然的也都是必然的，跳蚤咬人也是必然的。列宁就批评过这样的观点。列宁认为：睡觉是必然的，跳蚤咬人是偶然的。跳蚤咬人对人的睡觉有没有关系呢？如果跳蚤太多，那就会发生重大的作用，睡不着觉。这中间也有量变到质变的关系。

辩证法就是要区别必然性与偶然性，这样才能抓住事情中心，看到它们的主要发展。区别必然性与偶然性跟我们的实际生活是有关的。你不区别必然性与偶然性，在看问题时就不能够区别主要的与次要的，所以问题也弄不清。机械唯物论认为一切都是必然的，把必然性的与偶然性当做是一个东西，不加以区别，这是不对的。

机械唯物论把偶然性的东西当做是神秘的，没有原因的，上帝创造的。从前在外国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看法，总把小事情当做大事情，拿破仑在俄国打一个败仗，说这是由于拿破仑伤风。当然伤风可能有一点关系，但如果不伤风，也不一定能不打败仗。

研究量变到质变，要注意这两种变化的交错，数变跟质变的联系，数变是质变的准备，包含着质变的因素。观察质变时，不能忘记质变跟数变的联系，不能忘记质变是由数变有规律地准备起来的。斯大林所讲的这个定义，他说在过程中的质变并不是逐

渐发生的，而是迅速发生的。这里就要注意到在数变变化的过程中是突然发生质变的，但又要注意质变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由数变准备起来的。在书上的这一段话应该这样来了解。

二、量变质变特征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的结论

在人类历史上，在自然科学上，人类是怎样认识辩证法第二个特征的呢？怎样发现第三个特征的呢？我们可以这样说，辩证法第三个特征，是人类经过长期地研究自然、研究社会所得到的结论。从古代开始，就有人认识了辩证法的因素，同时也就认识了辩证法第三个特征的因素。认识是随着人类对自然、对社会整个认识的进步而进步的。古代人的知识是很有限的，对自然、对社会的知识是比较少的，虽然有人认识了辩证法的因素，但是很不够的。数变到质变的规律，在古代只是有一点认识的萌芽，不管在中国，在外国，都有这样的情况。中国这种思想是萌芽，不是完全的，是非常不够的。这种萌芽，我们举一个例子：中国在古代统治阶级的思想中就有“过犹不及”的思想。有一个学生问他的师父一件事情，说大家替老百姓做好事，可以不可以？这个学生就是子路，子路是急躁冒进的，他向老师表示愿意做好事，他的师父孔子说：做得多等于不够，过与不及差不多。孔子回答问题是很会看对象的，对于脾气迟后，他回答得急一点；对脾气急躁的人，则说：“欲速则不达”，做事情想快，结果是达不到。孔子在许多问题上还是有很高明的辩证法思想，当然，比起老子，还差得远，但他还是有一点辩证法的，虽然他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家，无怪乎在封建社会中把他当做是一位伟大的人。他的这种思想是很不科学的，思想是很不明确，很模糊，但在猜测中估计到一些

数变到质变的规律，做事情做得多，它的质就会变化，有一点否定之否定的味道。事情要恰如其分地掌握，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我们要反对急躁冒进与保守落后，这是与质变到数变是有关的。希望完成任务，超过条件所许可的范围，就要碰钉子。要求过高，质会变化。

在一个工厂中生产是有一定的限制的，要保证质量，如果你不注意客观条件的限制，不注意把你的工厂的生产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那你的质量没有保证的，如果不照顾数量多少，那就会在质量上有粗制滥造的情况；如果数量太低，那就浪费了国家材料，有人"磨洋工"，生产停滞在那里。如果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就使质量合格，如果超过这个范围，就会发生粗制滥造的现象，如果落后于这个范围，就会浪费国家财产。"过犹不及"，过与不及一样。这种"过犹不及"的思想，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是可以用控制精确的数量来防止。我们的领导给我们一个量的任务，他是根据全国的客观条件给我们一个总的任务，在各个部门工作的人，在总的任务规定中按照自己部门的特殊情况，来制定自己部门的特殊的任务，这样做，就会做好，就合乎辩证法第三个特征，不这样做，就会违背第三个特征。

在"三反"时，上面规定了打"老虎"的数字，这是领导上根据全国客观情况的分析后所提出来的大体数字。有的部门不能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而主观主义地来分配任务的，因此就发生了扩大化的现象，发生了偏差。

在应用辩证法时，特别是第三个特征时，任何时候都要注意唯物论的基本原则。要承认物质世界客观存在，承认客观世界是有规律的，要反映在主观思想上，相信客观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如果认识辩证法第一个特征，必然会得到第二个特征，客观世界有

规律，我们一定要掌握这个规律，要相信这个客观规律。

总之，我们应用辩证法是要掌握唯物论科学。为了掌握辩证法这个特征，就要研究联系的条件，根据事实来研究联系，不能主观地讲联系，研究运动也要经常注意对客观世界的观察。掌握数量，掌握“过犹不及”的原则，也要根据这个情况。中央指示要根据客观情况，各部门的工作要具体分析。这样才能正确地执行。

“过犹不及”和“欲速不达”，在古代社会中，就有这种学说，在中国的易经中讲：“穷则变，变则通”。这种话也是模模糊糊的，但讲的就是量到质的变化。“穷”就是发展到尽头，还是走不通，要变化了，但一变，就通了。读书一遍、二遍、三遍，到十几遍时，没有办法再了解了，再读二十遍，也不一定能够了解，到了尽头了，穷了，在那个时候要变，走出房子，跟大家聊一下，扯一扯，思想上斗争一下，便了解了，有了新东西，学习方法变了，那就通了。漫谈到一定程度，又没有东西可以谈了，如果再扯下去，也没有东西了，变成了“穷”，再去看一看书，联系一下实际，看看报，也许就通了，这样才能不断前进。古代这种思想是很高明的，是对自然、社会生活概括出来的原则，很了不起。这是中国的一些发现，当然是不完全的，哪里有斯大林讲得完全。但是古代人讲得虽然简单，但有好处。我们这样讲，再回头来看斯大林的著作，又深刻一些。研究历史，回顾过去，再来学习现在，那就有好处。

西洋也有一样的情况。亚里士多德说：“勇敢太多，就是变成粗暴，勇敢没有，那就是怯弱”。内容不同，但结果是一样的。古代的原子论，我们讲，他是有机械唯物论的因素，但也有辩证法的因素，他说原子是有重量的，大小不同的，物质最小的单位就

是原子。从古人的话中知道，他们的内容虽然是很朴素的，却有辩证法的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他们有些具体形式是不科学的，但他们的精神还是有辩证法的，他们证明了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的。我们要用历史观点来了解这些观点，其中有辩证法的积极精神。

近代的自然科学证明辩证法是普遍的规律。在19世纪，黑格尔讲辩证法，讲了许多自然科学的例子，刚才讲的水的例子，就是黑格尔用来证明数变到质变规律的一个典型例子。恩格斯写作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把自然科学中许多成就总结起来，内容非常丰富，概括了以前和当时的自然科学所揭示的规律，证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是正确的，是自然界普遍的规律。

恩格斯特别用物理学与化学的所有材料来证明。今天有人来讲化学，他会告诉我们很多知识。我们看《自然辩证法》，会感到很难看，因为专门知识很多。恩格斯把化学当做是量变到质变的科学，认为化学是证明量变到质变材料丰富的科学。原子结合起来变成分子。数量不同，分子的质量就不同。水的分子就是二个氢、一个氧结合起来的；可是水的分子中如果多加上一个氧分子，结果不是水，而是双氧水，看起来好像是水，但实际上不是水，是消毒用水。有许多事物就是因为分子数不同质就不同。橡皮，就是氮与氢的原子结合起来的，就是几十个氮原子与一百个氢原子结合而成的；如果数量不同，还会变成人造玻璃，也可以变成电木。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恩格斯根据自然科学的研究，他得到了自然辩证法的结果。他说：自然界中，只有首先在数量上的增加和减少，才能引起质量上的变化，这对于任何场合都是正确的，没有例外。

自然科学发展到19世纪，我们人类从自然界中所得到的全部

材料，都可以充分地证明数变到质变是普遍的规律，这是毫无疑义的，是完全可以证明的。如果在古代，量变到质变还是一种估计，是不是百分之一百地正确，个别场合是不是可以利用，古代人不敢断定，但到19世纪，科学就可以保证任何场合、任何事物，都可以证明量变到质变是正确的。

三、量变质变规律在社会科学上的应用

在社会科学上，在社会研究上，马克思、恩格斯也把辩证法作为研究方法，因此才能够使社会问题研究第一次变成社会科学。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当做是由量变到质变有规律发展的过程，认为社会不仅仅是有联系的整体，不仅符合第一个特征，社会不仅是发展变化的，而且社会的发展，也是按照关节线形式发展的，也是由数变到质变的过程，不仅仅只有数变，而到一定程度由量变进入质变，或者说，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的最重要的表现。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结果。超过这个水平，这个社会就要进一步发生变化，就会发生生产关系的改变，就会发生社会的质变。所以，社会发展最后由生产力的发展来决定。而社会性质则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斯大林讲：生产关系是社会的基础。为什么是基础？就是由上层建筑，连政治思想都是生产关系决定的。上层建筑面貌、性质依赖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怎么样？政治、思想大体上也是怎样。生产力就是社会生产的力量，这种量变就会引起生产关系质的变化。这是由量变到质变的应用，也是列宁所提到的最根本的，最普遍的规律。生产发展决定生产关系，当然这个规律应用量变到质变、质变到量变，不仅仅表现在

生产关系、生产力的运动、变化中，而且表现在社会的各方面和任何个别场合。

恩格斯曾经在《反杜林论》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证实了数变到质变是支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他在《反杜林论》关于辩证法的量与质一章中，举了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例子，大家记住这个规律，将来学习政治经济学时，是有好处的，将来容易了解。恩格斯说：资本家为了剥削相对剩余价值，就改进了生产技术，生产由简单的劳动合作提高到分工合作，由分工合作提高到机器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是把许多劳动者结合起来，共同进行一种劳动。一个工厂管着很多劳动者。每一个工人拿一件劳动工具，这叫简单的合作。简单合作的人数有一定的限制，人数太多就要分工，不然就忙不开，而且生产也不方便。生产一发展，人数一多，一定要分工，把一件事情拆成很多部分，这些人做这一部分，那些人做另外一部分，分工劳动逐渐增多，逐渐发展起来后，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应用机器，在机器生产中就把工人挤出去了。劳动组织也是一种量变到质变的关系。

对辩证法第三个特征在社会中的应用，要注意斯大林的贡献。斯大林把这个法则直接应用到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更明确地、更简明地指出这个法则对我们实际革命行动的意义。

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指出：社会运动有双重意义，有两种形式：进化的与革命的。这就是由量变到质变的有规律的运动。这个情况首先告诉我们一切事物的发展是双重的，有量变的形式和质变的形式。有许多情况可以证明，社会运动，一方面有进化的形式，一方面有革命的形式，一方面有逐渐变化的形式，另方面有剧烈的突变的形式。用量变到质变规律来观察社会运动，要先从社会运动中有两种形式来观察，我们做革

命工作要注意进化的工作，逐渐准备的工作；另外又要注意到逐渐准备工作后的突然变化的工作。斯大林的著作中，把这两种形式都具体地说明了。

什么叫进化的运动形式？当先进分子自发地继续着自己的日常工作，并且把小的量的变化输入旧秩序的时候，运动就是进化的。

什么是革命的运动形式？当同样的分子联合起来，渗透着统一的思想，并且冲向敌人的营垒，以便根本消灭旧秩序，并且把质的变化输入生活中间，建立新秩序的时候，运动就是革命的。

这就是斯大林所说：包含有两种运动形式的区别，并且还做了一个结论：进化准备革命，给革命造成基地，并且为进化的促进进一步工作。进化准备革命，革命完成进化。由数变准备到质变或质变实现，使数变进一步展开，进一步使数变的规模得到更大的发展。这是斯大林对数变到质变应用到社会去的论述，这是在科学上重要的贡献。明确地当做公式规定下来，这是斯大林的功劳。

斯大林应用辩证法第三个特征扩大研究了我们的社会生活，他不是仅仅简单地应用，而且是发展了。刚才讲的例子也就是一种发展，他把量变到质变的内容具体应用，他把量变到质变具体地解释了。在进化与革命的关系上，发展了他关于进化与革命问题上所提出的新原则。

最近，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中提出的原则，主要就是认为，质变又可以采取两种形式，由旧质态到新质态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就是说爆发的形式和逐渐过渡的形式。质变是迅速的，是由数变准备到一定程度时迅速发生的，但迅速变化也不是简单的爆发式的，虽然迅速变化，它也可以有逐渐过渡

的这种形式。这种新的原则对革命理论有很大的贡献，对工人阶级的事业有很大的意义。因为他本身就是从工人阶级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特别是概括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概括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改善农业经济的经验。苏联五十多年来，最迫切方面的改革就是农村的经济，不能说不迅速，经过几年准备，组织了集体农庄，开始几年准备到了30年代，一下子就使农民参加集体农庄，不但是个别的农民，而是几十万，几百万，整批整批的农民涌到集体农庄这个制度中去，这不能不说是迅速的，同时它的意义也是和革命的意义一样，农村的改造的意义不下于十月革命。可是这个转变不是爆发的形式，而是逐渐过渡式的。为什么？因为过去的改造是由下而上的，推翻政权，把压力冲破；现在是由上而下的，在政府领导下，有群众的拥护，不需要爆炸什么旧政权，相反，这个政权是支持，所以是采取逐渐过渡的形式。新的质态是在原来的制度中生长，新质态就逐渐代替旧质态。斯大林指出：这两种形式不同，就是因为条件不同，旧社会是剥削阶级统治，社会制度改变一定要爆发。如果在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中，工人阶级不打算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而是用改良的办法，那是错误的。譬如在美国和日本，日本共产党曾有同志就犯过这个错误，希望日本经过社会的改良，走向社会主义。如果在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下，我们做工作要想采取爆发的办法，那也会犯错误。在不同的条件下，要采取不同的质变。

斯大林的原则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形式推动质变，这对革命工作有很大的意义。在我们社会中，要工人组织罢工是不好的。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工会工作者犯错误，不知道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政权。个别的工会工作者是犯过这种错误的。当然也有的是由于特务的捣乱，也有工会工作者采取旧的斗

争方式，使得工人愤怒而罢工。这是对新质与旧质没有明确划分清楚的缘故。

斯大林在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也说过：我们的政策掌握得不正确，也可能发生冲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在社会主义中是相符合的，但也有矛盾。我们的政府一般会及时地发现这个矛盾，能及时地解决它，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求正确地掌握政策。如果像雅罗申柯同志的看法，就是不注意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不注意新的条件与旧的条件的区别，那就会引起冲突，爆发的现象还是会有的。

斯大林的原则对我们的事业有很大的意义，不仅仅对工人阶级的事业有贡献，就是对一般的科学研究工作也有重要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也有这样的例子。不能希望语言学的改善采取爆发式的形式，一天晚上就改善旧的语言，明天就用新的语言，明天就不用汉字，明天就用拉丁化，有人说在一年中要实行拉丁化，行不行？不行。毛泽东同志到苏联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说：拉丁化不太恰当，要采取中国的形式。中国人民是习惯于方块字，可是今天我们的文字是很不方便的。在社会主义大规模建设时，需要大批有高度文化的人，要小孩子花这样多的时间去学习方块字，是很不容易，它会阻碍我们经济建设。文字改革对我们经济建设有很大的意义，但是不采取逐渐的改革，那就不行。

突变并不是一分钟的事情，但比一般快，最剧烈的革命，像俄国十月革命也要打 8 天。如果是平常的革命，那不是几天的时间，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几十年。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起，从 1921 年到现在，不算以前的，是三十多年；从 1947 年到 1949 年，打垮蒋介石也要二年多。由猿猴变人，要几十万年。可

见，在突变中也可以有逐渐过渡的形式。

现在讲毛主席著作中应用量变到质变的例子。从毛主席的著作中我们看到很多。毛主席在分析中国各阶级的文章中，就包含量和质的研究方法。各个阶级，这和它的政治质量不同，政治态度不同，特别是它的经济地位不同，是有关的。毛主席分析了买办、地主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中间有量的不同，量不同，就跟质不同有联系。各个阶级在经济地位上有不同之处，在政治上的质就不同，对革命就有不同的态度，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革命领导者，还是革命的同盟者，革命还是不革命。毛主席分析小资产阶级也很有意思，把小资产阶级分成三种，首先根据他们的量来分析，上层小资产阶级，每一年有余钱剩米的；第二种是在经济上大体上可以自给的，是中层小资产阶级；第三种是生活下降的下层小资产阶级。他把经济上不同的量分成三个阶层，分成三种不同的质量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是不同的。但与中产阶级不同，有区别。中产阶级有反革命与革命的两面性，小资产阶级没有这两面性。上层小资产阶级对革命是冷淡的，中层小资产阶级对革命不太积极，只有下层小资产阶级对革命才是积极的。

我们根据这个方法来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才能更深刻地领会其精神，作为我们以后观察问题的方法，观察从量的不同与质的不同中的联系。事物就是这样，量不同到一定程度可以使质变化，这些地方很值得我们学习。

在《论持久战》中有许多例子说明这个问题。抗日战争为什么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是退却阶段，第二个是相持阶段，最后进入反攻阶段。抗日战争三个阶段质量的不同，是引起战争发展不同阶段的关键原因，就是因为在抗日战争中不同阶段在数量上

有变化，力量的对比上有变化。力量变化的主要内容是：敌人最初是优势，我们是劣势；我们逐渐由劣势变为优势，敌人逐渐由优势变为劣势，敌我态势的变化就规定了我们不同的战略阶段。这些道理，我们翻一翻《论持久战》就可以了解了。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刚刚胜利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定上，毛主席指出，解决中国各项问题的出发点是什么？就是跟我们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程度有密切联系。我们中国的生产力在当时，工业是百分之十，小生产是百分之九十，生产的比重是这样，说明我们的生产还很落后，是农业国，我们一切问题要从这里出发。生产力作为我们规定各项工作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告诉我们在执行政策时，经常要把这个数量摆在我们的脑子中，经常要根据生产力的量的估计。毛主席指出，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必须要经过相当长的过渡时期，不能没有这个时期，才能逐步实现工业化与社会主义的改造。因为生产力的基础是这样，所以革命胜利以后，只能开始实行过渡性质的社会制度，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要实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就要通过过渡时期，发展我们社会经济力量，就是工业化，经过工业化，然后，一步一步在社会中进行各种改造，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引起过渡时期到社会主义的改变，形成质的变化，这是一个好例子。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经过比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这种过渡的制度呢？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考虑到生产力的量的发展。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毛主席屡次讲到这一点，也可以说，数变到质变的规律是到处都有表现。

我们刚才说的一个例子，对工业生产任务的数量的控制要恰当，这就是在实际工作中的一个例子。同类的例子是很多的，这种例子在各方面举出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譬如解放后的税收制

度，我们对于私人工商业总的政策是利用、限制和改造，不能立刻消灭资本主义，但也不能确保资本主义，使他一直发展下去，而是暂时利用，给他一定的限制，逐渐地改造，最后达到根本的改造。我们的工作的量要注意到与税收政策更有直接的关系，对工商业征税征到什么程度，就是根据政策上的规定。如果征税过高，会得到什么结果，就使得私人资本主义无利可图，无利可得，税收完全把他收走了。这样做，私人资本家的积极性就会丧失，他就关门，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利用，我们就达不到利用的目的。如果征税过轻，就会发生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过去的新税政策，大大减轻私人工商业的税收，和合作社、国营工商业一样纳税，合作社就没有什么优先权，私人资本主义相对的提高优越权，这样一来就无所谓限制私人资本家。所以，征税的数量的控制很重要。需要控制到什么程度，这是具体工作的大的事情。我们对私人资本主义赚的钱是“四马分肥”：国家税收，工资，公积金，私人利润。大体上都是百分之二十五：国家税收百分之二十五，工资是百分之二十五，公积金百分之二十五，私人利润是百分之二十五，大体上是这样，不是绝对是这样。私人大体上是有四分之一的利润，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润并不是太低了，比较有利，他就有积极性。但是这个利润是受限制的，不能够和国营工业得到同样的地位。所以一定要控制税收的数量，使它符合我们的政策精神。

在农村中的征粮也是这样情况。征得恰当，可以起鼓励农民生产的作用。按照他们的收成的可能性，规定一定的税收的数量，如果收成更好，我们不再征他们的税，如果超过一定的数量，就会损害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在解放后不久，强调税收，农民挑鸡蛋进城来卖，一进城就征税，结果，蛋也没有了，把鸡也杀了。羊养得多要税征，都杀了，后来羊也没有了。

对敌人斗争也有数量上的控制。在土地改革，消灭地主，土地改革就是百分之十打击面，如果超过了百分之十，就可能打击了富农，也可能打击了中农。打击了中农，就会影响革命的性质了。打击面打小了，也可以使革命性质变化。在“三反”、“五反”时也有控制，“老虎”的打击面也不超过百分之十，如果超过这个控制数字就会损害统一战线。我们一方面跟他斗争，还要跟他联合，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打击面过大就会超过我们的两面性政策。

四、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

资产阶级的学者在思想上，用种种形式来反对辩证法的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来反对辩证法。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资产阶级就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唯物论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就是认识物质在运动中，只有量的增减，没有质的变化，只证明量的增减，不证明性质的变化。这就是比较早的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片面观点。这是不合符事实的。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已经出现后，有这样一种情况，要想根本地反对事物中的质变是不可能的。这是在19世纪，不管在自然科学上也好，不管社会的变化上也好，革命运动也好，都提出了非常丰富的材料，证明在世界上不仅仅有量变，而且有质变。自然界的化学、物理学，都证明这一点。斯大林说，很多地方证明这一点——社会运动，社会变化，革命运动等等，有很丰富的事实，使得人们不能怀疑这个质变。法国的革命运动，天翻地覆地把法国的封建制度推翻了。法国革命后，欧洲革命就爆发起来，这种变化使得任何人只要不是闭着眼睛，不看事实，都会证明质变是存在的。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出现后，资产阶级形而上

学者反对辩证法，就不采取公开的那样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的形式了，不是明白地主张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否认质的变化，就不可能了，或者一般地说不可能，大多数不这样说，大多数资产阶级不这样做。在这个时期，形而上学反对辩证法采取另外一种形式，即采取庸俗进化论的形式，就是否认有突变，否认质变跟数变的联系，否认这个规律，否认突变是经过数变有规律地产生的结果。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形而上学反对辩证法思想在主要的大多数的场合都是采取这种形式。所谓庸俗进化论，就是所谓事物变化，只应该当做是连续不断的细小的变化，而不承认细小的变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引起质的变化，至少不承认突变是变化的主要因素之一，不承认突变与数变、细小的变化在辩证法中是同样重要的形式，就是用细小的变化否认突然的质变，把质变当做是很不重要的东西，当做是发展中可有可无的事情。事实上，细小的变化，在辩证法看来都应该归于数变的范畴。斯大林讲的进化是什么？进化就是逐渐移动的新的质的变化。量变中并不是没有质的变化，量变是结合质的变化。量变也不仅仅是数量上简单的增减。

在自然科学里，达尔文进化论在生物学上是一场革命，但对生物进化的看法是有片面性的。他把细小的变化当做是主要的东西，他把突变当做很小的，否认突变的作用，甚至认为生物学上的变化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微小的变化看起来是质变，实际上没有质变。资产阶级形而上学者把达尔文进化论搬到政治、哲学上，变成庸俗进化论。这种庸俗进化论，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修正主义、改良主义。改良主义认为在旧制度中逐渐逐渐的改良，变成新的制度，幻想这样做，或者是欺骗某些阶级这样做。

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反对辩证法的第二种形式，是把突变、把

质变归结为偶然的现象,否认质变是有规律地由数变准备起来的。这就是他们表面上承认了质变,但是把质变跟量变的联系割断了,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可能去研究质变的规律,使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变的原因,这样也可以把我们引到错误的道路上去,这样就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了。把突变、质变当做是偶然的现象就是一种不可知论。形而上学也是一种唯心论的不可知论。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列宁所批判的唯心论主要的都是不可知论的思想,有的是公开主张不可知论,有的人是实际上主张不可知论。他们这种学说自称为科学,而他的目的要解除我们的科学的武装,使科学变成不可知论,使科学变成自己不相信自己。所以,如果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要坚持反对不可知论。在辩证法这一条特征上,我们就要反对这种把质变、突变当做偶然现象的错误观点。要坚决相信质变,质变是有规律的,由量变准备起来的。

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在政治上还表现为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空谈社会主义的根本改造,要把政府都完全取消,不要政府;但又反对为了根本改造所应该做的许多具体的准备工作,反对为根本改造所必须创造的许多条件。无政府主义者经常讲,我们是要做大事情,我们是要根本地推翻一切,说其他都是细小事情,不肯做具体的细小的工作,不肯做那些为了创造胜利的条件而需要做的许多具体工作,特别是各种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有时候需要利用议会的斗争,无政府主义根本反对这一切。他们说:我们根本不要政府,要参加议会,那就是可耻的。他说:组织是不必要的,一讲组织,就要讲权力,就要用暴力压迫个人,他们不干。这种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一种形而上学,也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它也是一种

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观点，不要组织，只要个人。无政府主义自称为为工人服务的，是工人中的一个派别，但实质上，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不要把无政府主义解释成为小资产阶级的或流氓无产阶级的。他们派别中的人可以说是小资产阶级的，有些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但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

斯大林批判无政府主义，就着重地批判了它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当然有的地方讲，只是工人阶级运动中的一个派别，但是它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

自称为是工人阶级中的一个派别的无政府主义，在我们党内也是有的，虽然不是公开地这样主张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的这种思想就是无政府主义，它跟马克思主义的要求组织、要求纪律的原则不同。马克思主义主张，党要有领导、有组织、有纪律地对敌人斗争。无政府是反对领导的原则的，认为有领导，就像有政府一样，也就是有压迫，就是不对。我们党内，无组织、无纪律这种思想，实质上与无政府主义是一致的。这个思想的来源常常是小资产阶级带来的，我们党内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人很多。小资产阶级思想实质上也是资产阶级思想，他把个人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他的眼睛不是看到群众的。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讲到小资产阶级革命狂热病，是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这是与无产阶级的组织相对立。“左派幼稚病”，是没有纪律的乱干，是带有某些无政府主义的。

我们读《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时，不能认为：这是过去的事情，无政府政治派别是过去了，对现在的人有没有影响呢？我们都知道，过去搞马克思主义的，也跟无政府主义争论过，过去的无政府主义者也经营一些小生意，开一些小店，吴稚晖就是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但也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转变到我们队伍里来，他要找群众，靠拢我们。无政府主义在工人阶级的组织中还是有的，要经常反对和肃清。在个人的思想中，表现在组织观念中有，在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中也有，闹独立性、违法乱纪的、无组织、无纪律的思想，实质上都是与无政府主义有关，都是把有规律的量变的工作看得很轻易，而把突变看做是偶然的，讲突变就突变，这都是形而上学，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列宁和斯大林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特别着重跟无政府主义者作斗争。他们在工人运动中，一方面反对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另一方面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改良主义，一直到现在还是和我们斗争。改良主义、修正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也是有的。列宁说：实际的生活，实际的历史本身，包含有这些各不相同的趋向，也好像自然界中的生活和发展过程，既包含缓慢的进化，也包含有迅速的突变，即渐进过程底间断一样。

修正主义者认为所有一切说明“突变”，说明工人运动与旧社会根本对立的议论，都是一种空话。他们认为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排斥“细小工作”，特别是反对利用国会的讲台。其实，后一策略就是等候“伟大日子”到来，而不善于收集那些造成这种伟大事业的力量。前后两者都阻碍着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即阻碍着把工人团结成为一个规模巨大、力量坚强、动作灵活，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好好动作的组织，团结成为充满阶级斗争精神，明白认识本身目标，受着真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的组织（见列宁著：《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

现在我们不讲资产阶级这一方面，讲我们工人阶级这一方面，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在工作中，也经常有这种割断量变到质变联系的错误，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也是一种片面性。只看到

量变，不看到质变；或只看到质变，不看到量变的这种片面性，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在我们的队伍中，也是有表现的。

“左”倾机会主义，就是注重工作中的质变的任务，忽视了要完成一定的质变任务，是要做许多非常细小的、具体的工作，来进行量的积累。也就是他们在量的积累还没有成熟以前，就要举行进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的错误就是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的典型，就是轻易地想要对敌人举行进攻，而不知道进攻是需要量的准备的。“左”倾机会主义讲：革命是一直进攻的，并且引证了马克思的话。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中，就批判了这样的提法。的确，革命是要进攻的，但阶级斗争中是有曲折的。“左”倾机会主义看不到这一点。毛主席主张我们的战略是迂回战略，不赞成“左”倾机会主义者的观点。敌人是围剿，我们是反围剿，“左”倾认为，这是不光荣的，我们是革命者，我们是要围剿敌人的，我们是不能反围剿的，动不动就要打大城市，动不动就是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动不动就是要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是只看到质变，没有看到量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

另外，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忽视质变的必要，忽视社会的进步是需要经过质变的。凡是工作做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举行进攻。日常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进攻。右倾机会主义不懂得这一点，在工作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应该进攻，到了进攻时期，没有勇气，不敢进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就是这种表现。在当时湖南的农民运动高涨起来，革命要向反动势力进攻，陈独秀没有决心与勇气，就犯了错误。

在我们新中国建设事业中，急躁冒进的思想错误，跟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思想错误，有类似的地方。急躁冒进只急于完成任务，没有注意量的准备工作。保守主义认为质变是不必要的，

看得很轻，对新的质的产生不很重视。这两种错误情况，不管是“左”或右，不管是急躁冒进或保守主义，都是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有一定联系。当然，不一定完全是资产阶级思想，但有联系，也可以说是影响。领导者急躁冒进就是自己想要表现自己，因此就有冒进的思想。保守主义也是与个人主义有联系，认为自己了不起，对旧东西没有反对的决心，这是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分不开的。学习辩证法的思想方法，要常常联系和检讨自己的思想意识。

五、学习方法要注意的问题

最后的一个问题是学习方法。

学习辩证法第三个特征，必须注意哪些？这一点上面已经讲过，现在把已经讲过的作一个概括，作为我们学习中应该注意的要点。

根据我们所讲过的原则归结为几点，然后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和思想，从而学会正确的思想方法。

要注意的是哪些要点呢？第一，首先要根据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来规定我们对革命工作的态度。辩证法这个特征告诉我们要用革命精神来对待一切工作，对一切事物要有根本改造的勇气。在工作中凡是工作准备到相当的时期，就要有勇气向旧事物进行突击，要反对满足现状，要反对改良主义、保守主义，反对在需要进攻时迟疑不决。这就是学习辩证法第三个特征的首要一点。

简单地说，学习辩证法第三个特征就应该树立革命精神。进一步树立革命精神，并不是说我们没有革命精神，不然就不会参加革命工作了。学习了辩证法可以使我们的革命精神更自觉，更彻底些。为什么？原因是这个特征告诉我们发展都是要通过质变，

要通过质变才能进到高级的阶段。不管工作也好，不管是社会制度也好，不管是个人思想也好，都要经过革命才能前进。工作要有革命精神才能经常改变旧作风，个人要有跟自己的旧思想坚决斗争的勇气，要有坚决批判旧思想的勇气，然后思想才能进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掌握这个规律，才能把这个规律变成我们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生活态度。

斯大林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中讲：既然由缓慢的数变进到迅速的突然的质变是发展底规律，那么由被压迫阶级所实行的革命的变革，当然也就是完全自然而必不可免的现象。

由此可见，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压迫，决不能经过缓慢的变化，经过改良来实现，而只能经过资本主义制度底质变，经过革命来实现。

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做革命家，而不要做改良主义者。

学习辩证法第三个特征要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原则，在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时，实际工作问题也好，思想问题也好，检查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具有革命家根本改造世界的精神，结合我们的思想斗争来学习，来掌握这个特征。如果检查我们的工作、思想，可能发现在我们思想中存在着保守主义、改良主义的东西，经过自我批评，提高了自觉性，这就能进一步掌握革命的辩证法。

第二点，质变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规律地发生的。斯大林讲的，也就是由许多细小的逐渐的数变积累，而引起质变的结果。注意这个规律，我们就应该检查一下，我们对待实际工作，处理实际问题的方法，是不是符合这个规律。譬如说，我们做工作是不是能够考虑到，在我们准备要完成这个任务时，能够做许多量变的准备工作，任务摆在面前，是不是事先耐心地积蓄力量

去作好准备工作，注意到恰当的程度，然后举行进攻，然后实行质变的步骤。我们如果检查一下工作、思想，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不能够按这个规律办事，一个任务摆在面前，不准备、没有积累量变，就想进攻。我们同志中有搞组织农民工作的，是否想一下子组织起来，都组织成很高的生产合作社，农具归公，吃大锅饭，没有准备好，就要举行质的转变的步骤。有许多同志做工作可以说，常常不按照这个规律，办事情就发生急躁冒进。大多数的急躁冒进都是这样来的，都是没有量的准备。

我们总起来讲，这两方面是有联系的。在思想方法上要把量变到质变经常联系起来。要反对两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或安于工作中的数量上的变化，没有根本改造和打击旧事物的勇气；或者就是空谈根本的改变，没有数变的准备。要反对这两种倾向，要把这两种变化结合起来。经过量变，做细小的工作准备的过程达到质变的目的，有规律地引起质变，自然而然地达到根本的改造。这是我们学习所要达到的目的。

除了刚才所讲这一点外，还要注意一个原则，就是在我们接受任务的时候，规定任务的时候，尽量要把量和质联系起来考虑，刚才我们讲的要解决任务首先要有革命的勇气，然后要有准备革命的耐心细致的工作精神、科学的精神。

现在我们再来讲一下，如何来规定任务、考虑任务的问题。我们的任务往往是这样，上级给的任务和自己规定的任务，有的时候是量的任务，有的时候是质的任务，上级指示我们要完成一个数量，我们自己规定的一个数量，如炮火要打多少，打击敌人多少，生产多少等等；也有质的任务，如把农村中的个体农民变成集体农民等等。任务本身都是有这两种形式的，量的任务或是质的任务，都不外乎这两种。在考虑决定这两种任务时，都要注意

量和质的联系。注意量的任务时，不要忘记量的任务与质有关系，譬如讲，规定我们生产任务时，不要只规定了数变而忘记了质。规定多可以使上级高兴，上级没有注意，给了奖励，个人主义的目的达到了，结果产品质量上不去，粗制滥造，浪费了国家的财产。中央指示我们，因为我们国家在财政上有一点困难，提出要我们增产节约，要在很短的时期内完成这个任务。这是一个数量上的任务，在指出这个数字的任务时提出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改善经营、提高技术、提高管理、保证原料的供给和销售市场。中央有这样一个辩证法思想，他的目的是要完成量的任务，但又要注意质，在质的基础上进行增产节约。

考虑质的任务时，又一定要考虑和量的联系。进行土地改革或者农村的合作化，改造社会，在真正接受质的任务时候，不要只看到质，还要注意怎么样通过量的准备，才能实现出来。只有这样做工作，才能圆满完成任务。

总的来讲，学习辩证法第三特征的要点：

（一）要进一步树立革命的精神。

（二）要懂得：任何质变，任何革命工作都要有量的准备。

（三）考虑任务时，要注意质和量的联系。考虑质的时候，要注意以量为基础；考虑量的时候，又要注意以质为前提。联系我们的思想，联系我们的工作，来检查和领会我们所学到的东西。

对立统一的辩证法*

(1953.10)

今天讲第四个特征。辩证法的第四个基本特征就是认为发展是事物内部对立方面的斗争。分几个问题讲。

一、第四个特征的一般意义;

二、这一特征在自然科学里的表现;

三、马列主义如何按照这一特征来观察社会,观察人类的历史;

四、对形而上学的批判;

五、学习方法。

一、事物发展的源泉

首先我们还是要讲一下这一特征和前一特征的联系。我们以前已经研究了三个特征,已经知道自然界社会的一切事物都是联系着的,都是有条件的,而联系是变化的,条件是变化着的,所以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不断发展的。发展又不是简单的重复,不是循环,而是由低级到高级,由量变到质变的。

已经了解这些问题后,如果还想对事情深入一步,就一定要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运动变化怎么会发生的,就一定会问这

* 见《辩证法引言》一讲题注。1953 年 10 月 9 日讲。本讲标题是我们整理时加的。

个问题，我们只要深入想一想就会引起这个问题。人的理性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用思想则已，用了思想无论碰到什么问题总要问一个为什么？对辩证法这个根本问题也是一样，我们看到事物会变化，而且变化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由量变到质变。我们看到这些事实后，我们的思想是不是仅仅承认了这一事实就满足了呢？人的理性对一些事实仅仅承认还是不满足，不用思想的人就无所谓，凡是肯用思想的人，总要对摆在面前的事问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就要提出问题：运动是怎么产生的？量变到质变的原因是什么？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源是什么？社会的动力是什么？运动总有一个力量推动它，什么力量推动它这样变化？社会运动的源泉是什么？运动从哪里开始，动力的泉源在哪里？这些是我们看到了事物变化现象后跟着一定要提出的问题。

怎样回答这个问题？辩证法的第四个特征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所以，辩证法的第四个特征是告诉我们要更深刻地来研究问题，然后发现了一个特征，这一特征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就是运动发展的源泉动力是什么的问题。简要地说，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就是事物自己本身内部的矛盾，就是事物自己本身内部的对立方面的相互斗争。所以这一特征放在第四个特征，当做辩证法的最后一个特征，表示这个特征是我们对事物认识到最深刻、最根本的地方。换句话说，最后一个特征也是表示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到了最深刻的程度。这四个特征表示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一步比一步深刻，逻辑上追究问题愈来愈深的程度。事实上也是表现着事物的内容愈来愈深刻地反映在我们脑子里。

第一个特征还是比较表面的，当然比形而上学要深刻，可是比起其他的特征还是比较表面的。最后把根本的问题提出来，对立方面的统一斗争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源，认识问题认识到这样

的程度就是最深刻的，能够根据它的特点找到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这是最深刻了，马、恩、列、斯他们都是把辩证法的第四个特征看做是一个最深刻的特征。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了一段话：如果我们把事物看做静止的状态，看做没有生命的，各相孤立的、互相并立或前后相继的东西，那么我们在其中就遇不到什么矛盾。就是说根据形而上学的方法就一定看不到什么矛盾。以后又讲：当我们在运动中、变化中、生命中、交互作用中来观察事物时，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场合上，我们立刻陷于矛盾的领域中。就是说，遇到了要立刻注意矛盾问题。否则，我们认识事物就没有完成。

毛主席的《矛盾论》中说："运动本身就是矛盾"。哲学历史已经给了解释。哲学历史上就有一种：不承认矛盾的观点，反对事物是运动的，认为运动是不合理的。希腊哲学爱勒亚学派说：如果要承认矛盾，就要承认它既是停留，而又都不停留；同时在这里，同时又不在这里；同时又是这东西，同时又不是这东西。哲学史上对这问题纠缠了几千年，以后哲学就承认运动就是矛盾，承认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是对的。就这样解决了哲学史上的这样一个重要争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因为它是运动，是是而又不是；又在又不在。当时机械运动也只能是这样，就是物体在同一瞬间，处在这一地方，又不处在这一地方。这种矛盾经常产生，同时又经常解决，这就是矛盾。恩格斯认为机械运动的意义就是这样。就是每一时刻都产生这个矛盾，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又在这里，又不在这里，矛盾不断地解决。如人走路，第一只脚踏下去，第二只脚就已经上来了，你说它在这里，另一只脚来了，它又不在这里，不在这里又有一只脚在这里，左脚右脚互相轮流产生这矛盾，左脚在这里，右脚不在这里；右脚在这里，左脚不在这里，没有

这矛盾就没有运动，这也是内部的矛盾。所以，形而上学和辩证法根本相反的地方，就是辩证法总是要承认一切事物都有内在矛盾，形而上学则相反，不承认事物有内部矛盾。形而上学一定不承认这矛盾，辩证法一定要承认这矛盾，因为不承认矛盾就不能说明运动、变化的原因。

为什么一个东西会由量变质？本身是一个东西，后来变成另外一种东西，它是自己变的。一个鸡蛋变成鸡，就是它内部原因起作用。除了承认内部矛盾而外，不能找出别的原因来。外部的原因是一个，把鸡拿过来，把蛋拿走，这是舞台上的魔术表演。现在问题是要解释物质自己的运动，除了承认物质自己运动外，不能说明运动的原因。形而上学就不需要这样，形而上学不承认事物本身能够变，因此它也不需要用内部的矛盾来说明。形而上学最多承认数量的增减，物质外部的移动，不承认物质本身能够变化。所以，他就不需要根据事物内部矛盾来说明这变化。

列宁有一段话解释这个问题：有两种基本的发展观：一种是认为发展是数的增减，是辗转重复；另一种是把发展看做是对立的统一。这两种基本发展的观点，有什么不同呢？在第一种发展观点里面，运动的动力、源泉都被忽视了，把这些源泉认为是神的支配；认为革命的发展是英雄伟人的主体作用，是英雄伟人的个人作用，而把这些运动的内部原因抹煞掉了，把原因推到外边去。第二种发展观就是辩证法的发展观，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这些运动的源泉。一个人思想进步主要是依靠周围的批评和自己的思想斗争。周围的批评还是必须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自我批评。有时周围的批评启发了自我批评，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周围的人再怎样批评也很难进步。如果有了自我批评的精神，周围的人只要稍微一启发，自己就能够前进了。辩证法并

不是不要我们注意事物外部的联系，注意还是要注意的，但主要的注意是这些运动的源泉，这就是辩证法主要研究的问题。中国怎样最后胜利了，原因是什么？日本很狂妄，一个小国要想占领亚洲，这就是找死路。我们的胜利主要是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有了很多的进步，苏联的帮助是最后胜利的一个决定原因，美国那时也是一个盟国，在太平洋打了一下，那在客观上也是帮助了我们。但是我们能够得到胜利，而胜利又能够保持，能够有今天的新中国，如果不是因为主要是我们内部有共产党的领导及人民民主制度，那么外部的帮助是不可能使我们胜利的。苏联打败了日本，但美国和蒋介石还想占领中国，苏联决不能打了日本接着就来打美国，如果那样，就是与蒋介石打起来了。所以，苏联不能这样，如果那样，就给别人造成了口实。所以胜利后，就靠我们自己巩固这胜利，再向前进。由于我们自己的努力才能使苏联帮助的积极作用发挥起来。这并不是说苏联的帮助就不重要了，这是很重要、很大的帮助，但是主要的能够使我们发展，能够使苏联的帮助发挥积极的作用、重大的作用，那就要我们自己努力进步。所以，第二种宇宙观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认识这些运动的源泉上。

第一种宇宙观是没有生气的、僵化的，第二种宇宙观是活生生的。只有第二种宇宙观才能提供理解一切存在物自己运动的钥匙。只有它才能提供理解飞跃和突变，理解飞跃及连续性中断（连续性中断是由量变到质变，量变是连续不断的变化，但是量变到一定程度就发生了质变，就叫做连续性中断），向对立转化、旧东西消灭、新东西产生等等的钥匙。

列宁这几句话也很深刻地指出：辩证法里主要的问题就是从事物内部找它的矛盾，根据它的矛盾来说明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源。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过：辩证法在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

含它的否定的理解。这意思也是讲：研究事物的矛盾的对立就要看到事物肯定的一方面，又要看到否定的方面。因为事物本身就有这两方面，就一定要看这两方面，要看到肯定和否定。马克思这样讲的意思也就是为了要说明运动。有一些东西要消灭，资本主义有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结果就是资本主义运动到最后要消灭。所以运用这种方法资产阶级就害怕了，他们害怕用这种方法看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这种观点被工人阶级传布后，资产阶级就很烦恼、很恐惧。

归结起来，可以说辩证法是把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运动看做是一种事物自己的运动。这是辩证法对运动认识的根本观点。它自己在运动，自己在发展，不是由任何外力产生的。这些运动的根源就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所以只要能够认识事物的内部矛盾，弄清楚一种对象、一种现象，它本身所包含的各个对立方面，只要认识清楚这些矛盾，就可以理解这事物是怎样发生、发展，怎样消灭的。

毛主席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中，把中国各阶级的情况弄清楚，相互关系弄清楚了，中国社会怎样发展的，中国革命走什么方向也弄清楚了。

所以，研究事物的矛盾，是理解变化发展，理解由量变到质变，理解事物由一种联系变为另一种联系的关键。我们研究事物的量变质变讲得很多，注意什么是新生的、什么是衰亡的，如果要想说明它们的原因，就都要从矛盾来说明。所以，辩证法的第四个特征是辩证法最深刻的法则，也就是最根本的法则。毛主席讲矛盾是辩证法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认为对立统一的矛盾是辩证法的核心。所以，辩证法的第四个特征也是辩证法最根本的特征，是与形而上学对立的最根本的特征。形而上学就是不看矛盾，是

是否否，辩证法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矛盾。

辩证法的第四个特征，斯大林所下的定义是完整的，斯大林讲：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所持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对象或自然界的现象含有内在的矛盾。因为所有这些对象或现象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其过去和将来，都有其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而这种对立面的斗争，旧东西与新东西间的斗争，衰亡着的东西和产生着的东西间的斗争，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间的斗争，便是发展过程的实在内容，由数变进到质变的这一过程的内容。

发展由量变到质变是一个原则，它的根本内容还是矛盾，这思想也是把对立统一的法则当做是最根本的特征。因此辩证法认为由低级到高级并不是经过各现象协和的开展，而是经过各现象互相矛盾的揭露，经过这种矛盾的斗争，互相对立的斗争。

斯大林的定义，就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完全地联系起来，完整地给它下了定义。这一定义大体上就是把辩证法归结为主要的两面：第一，就是要揭露矛盾；第二，就是要通过斗争解决矛盾。发展过程就是矛盾的展开、矛盾的揭露，并且经过互相对立的斗争来解决矛盾。所以，辩证法基本上就是矛盾的揭露，新的、旧的、生长着的、死亡着的，过去的和将来的矛盾方面的揭露。新生的和死亡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一种对象或内容的两种倾向。新生的和死亡的东西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是一件事物内部矛盾的两方面。一个社会有新的阶级、反动的阶级、没落的阶级；一个人有新的思想、旧的思想。不是先天有新的思想，现在学习辩证法就是要把形而上学打倒。新的旧的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揭露矛盾就是揭露一件事物内部的新的、旧的，过去的、将来的，正面的、反面的，是不是揭露就完了，还不是，辩

证法不仅仅要揭露，还要能够开展对立矛盾的斗争。要开展斗争，解决矛盾才能前进。你有新思想和旧思想，你现在学了辩证法，但是还有形而上学的思想，是不是指出来就够了呢？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仅指出来就完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学问是要讲立场的，不是客观主义。你有这么一回事，不是指出就完了，指出后还要确定我们的态度，站在那一方面。指出你有形而上学的思想，现在又学了辩证法，我们就要进一步地指出：你要用辩证法来反对形而上学，与它进行斗争，这样作才能完全掌握辩证法。过去有些人不是不懂得矛盾，而是往往在指出矛盾后又拒绝开展斗争。古代的老子就是看见斗争，但是不要斗争，回到原始的社会里去，老死不相往来。所以老子的思想就是一种清静无为的思想。不讲斗争，能指出事物的矛盾，但是不注意斗争，历史上这种倾向最多，调和矛盾，而不是开展对立的斗争。以前辩证法多少有这种形式。我们又要揭露矛盾，又要开展斗争。揭露矛盾以后，确定态度，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样才能掌握辩证法。

二、自然科学中对立统一法则的表现和运用

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核心。根据这一核心的法则，我们可以说，辩证法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要我们研究事物的矛盾、分析矛盾，然后又来研究如何通过斗争，通过对立的统一来解决矛盾。列宁这样讲："辩证法按其本意来说，便是研究对象自身内部的矛盾。"列宁论辩证法的第一句话也是这样讲："一分为二以及吾人对其矛盾组成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本质。"辩证法当做方法，就是把一个东西分成对立的两方面来认识其矛盾的本质。恩格斯在他的著作里，特别是通过自然科学的例子，指出它的特点。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及《反杜林论》里，总是用自然科学例子来分析矛盾，他说：机械的运动需要根据矛盾来了解。物质的更高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动物、植物的发展，更加包含着矛盾。他说：生命就是每一瞬间是这样，同时又是别样。生命的特点就是不断地新陈代谢，不断地呼吸空气，血液不断地循环，细胞不断地生长死亡。我们感觉到一个人年年如此，但是在生理上是年年不同。一个人经过七年，全身的机体就统统都是新的东西了。七年中，天天在破坏一些旧的，天天在生长新的东西。

生命也是由自己不断产生矛盾，并解决矛盾的，这些矛盾停止的时候，生命也就停止了。“生命的特点就是新陈代谢”，这一句话启发了苏联的勒柏辛斯卡娅，她在八十几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长生的方法，用小苏打洗澡，把自己的身体搞得很好。她就研究用这种方法来促成新陈代谢，把新陈代谢恢复了，至少可以长生。但是，这种方法一方面促进新陈代谢，另一方面又破坏新陈代谢，可以引起贫血症，医生说是不能乱洗的。生命所以衰亡，就是因为细胞里的水分减少了，固体物质太多了，细胞愈来愈硬，细胞本身与外面的交通很不灵活了，因此衰老就是这样来的，老年人的骨头愈来愈脆，年轻人骨头就是软的，小苏打就能够使细胞变得柔软、轻松，使水分增加，新陈代谢就能够灵活一些，可是用得过多细胞就会破坏，身体就要受影响。她掌握了这点，就有这样的发明。懂得恩格斯的辩证法指示，可以使我们想出更多的办法。所以要紧的就是能够揭露矛盾，掌握矛盾。

运用辩证法分析问题的时候，一个根本的方法就是正视矛盾。在了解运动变化时，这一条件是这样，那一条件又是那样，了解量变到质变就使这种了解更深刻。我们用辩证法的时候，同时四

个都要用，但是要着重运用第四个特征。所以联系实际来运用的时候，要以对立统一的法则作重点。

矛盾所包含的对立方面，是一种有机的联系，不是随便拼凑在一起的，是统一物分为两方面，是统一物的两面性，不是两个东西随便堆在一起就叫做矛盾。所以了解矛盾不能乱了解，要注意这一点，一定是统一的东西自己本身的两方面。磁石的南北极就是一个东西的两方面，有磁石就有南北极。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虽然是两个阶级，但是在那个社会里两个阶级是分不开的。斯大林在语言学问题中也讲到人为什么要运用语言作根据，各阶级为什么要用共同的语言。因为虽然是两个阶级，但是在一个社会里，还要互相依赖，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苏联的工人阶级就不叫无产阶级了，斯大林在1930年解释新宪法的时候就正式公布，不能叫做无产阶级了，因为已没有资产阶级了，只能叫工人阶级。所以它们是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的，资产阶级离开无产阶级就不能存在，没有无产阶级就不成其为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性质是由无产阶级的存在而决定的。凡是矛盾的对立方面都是这些相互依赖的有机联系，所以，讲辩证法的第一特征时要注意，它也是这两方面的联系，因为它是初步的认识，还没有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在讲第四个特征时，才能认识到最主要的是矛盾内部对立方面的相互联系。我们要找矛盾，总是要找内部的矛盾，思想矛盾是你自己的思想中的正确和错误等方面的矛盾。一切事物都有矛盾，但并不是任何两件东西凑合起来就有矛盾。有的同志问，你说一切事情都有矛盾，玉泉山的茶和水是否有矛盾？这问题根本提错了。有一次一个同志问：桌子与茶杯有什么矛盾，我说没有矛盾。其实不对，是问题根本提错了，那是机械唯物论的说法。我弄错了好

几回，讲课时有人提意见，批评了，想起来才注意到。

所以，辩证法讲的是内部的矛盾，不是两个东西随便凑在一起，乱联系的方法是庸俗的方法。这一点要注意。自然科学中的形而上学，不大注意研究矛盾，因为他要收集材料，把这一东西与那一东西排列起来。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把它们看做互不相干的东西排列起来，没有什么互相联系。以前以为自然界是根本没有矛盾的因素组成的，是任何东西的联合，是没有矛盾的。自然科学中，过去18世纪认为原子是没有矛盾的，现在我们了解原子里有电子，电子中有正电子和负电子，还有质子和反质子，都是矛盾。科学是愈来愈发展的，任何一种科学都是要研究矛盾。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里举了许多例子，他说数学就是研究矛盾规律的，初等数学是研究数的对立的关系，高等数学研究微分和积分。恩格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微分有一个道理，如$\frac{xa}{yd}$其中xy代表任何一个数目，a的意思是使这数目的微分加强，使数目渐小，如果无限制地缩小下去，其结果就很妙，如果这数目是$\frac{8}{16}$，这关系总是一样的，下面总是上面的一倍，总是二比一。如果说是$\frac{1/4}{1/2}$，其关系还是缩小一倍，不管怎样缩小，它的关系总是一倍，如果无限小下去，小到极限，这公式就等于$\frac{0}{0}$，这样就起了变化，也可以等于$\frac{1}{1}$，这就难于理解。过去的数学家就觉得荒谬得很，不应该这样作，而我们研究数学就应当这样研究，我们研究高等数学就要这样研究。所以$\frac{0}{0}$还要把它看做$\frac{x}{y}$来认识。

还有，有时要把曲线当做直线，有种种方法可以当做直线，一种是微分的方法，把曲线切到小的极点，就和直线一样了。所以

其中包含着无限多的直线。我们实际工作中这些东西都是用得着的，如果我们搞工业，就要用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学工业，也是不困难的，因为它是客观规律。现在随便抽象地讲，有一些奇怪，但是它是非常有用的东西，在科学上计算最复杂的都要学好数学。马克思是一个很高的数学家，因为他要计算新的变化，做出各种复杂的计算。

我们简单讲这一点，是为了帮助大家了解辩证法，大家到工作岗位上也要研究这些东西。物理学、化学都是研究事物的矛盾，巴甫洛夫的神经学说也是研究矛盾的。巴甫洛夫认为人的神经和整个的身体有联系，又和环境有联系。研究脑神经，不能撇开外部的关系单独地研究脑神经，要研究条件的反应。至于脑神经的活动根源，这是脑神经自己的一种对立作用。巴甫洛夫认为一切神经都有一种对立的作用，兴奋的与抑制的。神经能够对某种刺激兴奋起来，积极地反映，消化器官也兴奋起来。可是神经也有这种作用，就是无论怎样，都不反映，睡得很沉就拒绝反映。《三国演义》的关公受了伤，华佗把他皮肤割开，刮出骨头上的毒素，平常一个人就会感觉到很痛，可是关公就集中注意地下棋，在下棋方面兴奋了，在另一方面就不感觉疼了。一方面兴奋，一方面抑制。是这种对立关系的斗争，也可以说是互相排挤，这也是巴甫洛夫脑神经学说的中心观点。它的特点表现是条件反射，它可以兴奋，反射也就不反射了。利用这种矛盾的作用，在医学上在各方面创造了许多新的道理、新的方法。妇女生小孩，有无痛分娩的方法，这很奇怪，为什么不疼，这办法不是绝对灵的，有的人可以不痛，有的人可以减少，用一些办法从另一方面兴奋，在痛的方面就抑制了。方法很多，产前说道理，使她安心，她就不注意了。有些人神经过敏，你讲道理，她也记不得，还要用别的

办法，在床上搞一个东西，用手拉住，咬紧牙齿等。我说得很粗糙，但是原理就是这样，一方面兴奋，一方面抑制。睡眠疗法也是这样的，利用这种作用，胃病也可以医好，神经病也可以医好。神经病就是因为脑神经太活动了，乱兴奋，所以就用睡眠疗法，经过一个时期把它给制止住，保持人的健康。我们有的同志脑子疲倦了，坐下来就不太好，巴甫洛夫说，最好是去运动一下，身体运动就可以恢复脑子。不要以为看书多了，身体也累了，你身体累一些，脑子并不累，因为肌肉神经兴奋了，脑子的神经就抑制了。如果认为疲乏了，你就愈想愈疲乏，当然睡觉也是一个办法，看书看多了，睡不着就只有运动的办法。所以学习要注意运动，不然学习两年，身体也衰弱了，脑子也衰弱了。巴甫洛夫的学说就是整个神经系统兴奋和抑制的矛盾，也是利用对立矛盾的斗争，我们就利用这些，创造许多新的医学上的办法。

米丘林的学说也是这样，不要以为米丘林简单地以环境条件来改变生物的性质，环境条件所以能够有规律地改变生物的性质，是通过生物自己的遗传细胞的对立方面。生物遗传细胞包含着两个倾向，一个是把旧的东西遗传下去；只一个就是他可以发生变异。能够把老的特点遗传下去，也能够排挤老的东西，变为新的东西。摩尔根学派只承认遗传一方面，否认变异一方面，至少是否认变异是有规律的，是必然的。米丘林学派就相信两种对立的倾向都包含在生殖机能里，可以用环境的条件有规律地影响生殖机能，按照一定的方向去改造生物，就是定向的改变旧的物质，创造新的物质，所以归根结底还是研究生物内部的矛盾。不忽视内部的条件，但是推动它自己变化，内部矛盾不起作用，它也变化不了。总之要利用内部的矛盾。

三、马克思主义如何把辩证法运用到社会中

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当做统一的有机体。研究社会发展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也是着重揭露社会各方面的矛盾，研究社会现象多方面自己的矛盾，内部的矛盾，揭露矛盾来理解社会变化的规律，又通过矛盾的斗争来改造社会。基本原理就是这样。

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社会的矛盾，首先要研究物质生活条件的矛盾。因为它是对整个的社会生活，对社会的面貌起决定作用的。所以，就从生产的矛盾着手，了解了生产如何发展，然后根据生产发展的情况，进一步地了解政治怎样发展，政治矛盾怎样，思想矛盾怎样。整个社会是一个大矛盾。社会各方面的现象，又有它复杂的矛盾。生产有生产的矛盾，政治有政治矛盾，思想有思想的矛盾。首先是研究生产的矛盾，根据生产的矛盾来了解政治思想的矛盾。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把辩证法的第四个特征应用到社会上，研究社会的发展所采用的具体方法。

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如何分析经济。我们考虑问题也要从经济考虑起。毛主席最初是作调查研究工作，主要的是调查生产，调查农村的经济情况，在生产基础上有阶级斗争。分析阶级斗争是根据生产来分析的。这道理大家都了解，将来还要讲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进一步地了解。总之，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自身的矛盾当做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特别是把生产的矛盾看做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动力。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因为阶级斗争是表现生产的矛盾斗争。马克思主义用了这种方法后，就使得社会的运动变为科学，可以用精密的方法加以研究，可以正确

地认识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者所有的著作都是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因此能够正确地指导革命。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用分析社会矛盾的方法，科学地说明了全部人类的历史。第一句话就指出了“迄今存在过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就是辩证法第四个特征的应用，全部的书都是分析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资本论》也是分析资本主义的矛盾。可以说，《资本论》就是分析资本主义各方面矛盾的一部最伟大的科学著作。社会化的生产，资本主义的占有，这两种是根本矛盾，根据这根本矛盾指出表现在各方面的矛盾，特别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斗争是资本主义自己发展、运动以至没落的根本原因。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讲，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自己内部产生出来的给自己挖掘坟墓的人，准备棺材的人。这种表现非常明确，把辩证法的方法表现出来，有否定，有肯定。资本主义是肯定，资本主义自己产生了挖自己坟墓的无产阶级，这就是否定。因此，得出结论：要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没有无产阶级斗争就不能实现。我们将来研究经济学就可以更好地、更具体地领会，我们现在只是把一般的方法提出。我们就知道《资本论》是从头到尾研究资本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大大小小的矛盾都研究到底了。商品可以使用，又可以买卖，这矛盾就是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反映。商品应该是社会的，但是要买卖，因为有私人的占有，这就是矛盾。每一个小的矛盾都是和最根本的矛盾联系着的。学经济学注意到这一点就容易了解了。经济学讲很多的矛盾，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商品的质，商品的量，各种价值形态，相对的剩余价值，绝对的剩余价值，等等，几百几千的矛盾归根到底，都反映了根本矛盾

——社会化生产和私人占有的矛盾——这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根本方法。

斯大林在关于辩证法第四个特征如何运用到社会上来这一点上，他也有一些解释。我们可以根据这种解释，作为我们运用辩证法的一种指导。他说：由此可见，既然发展过程是经过内在矛盾的揭露，是经过基于这些矛盾的彼此对立势力冲突来克服矛盾而进行的，那么，阶级斗争当然也就是完全自然而必不可免的现象。由此可见，不是要掩饰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各种矛盾，而是要暴露和揭开这些矛盾，不是要熄灭阶级斗争，而是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这些都是表示运用辩证法第四个特征在社会上的要点。但这里不仅仅指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指一般的社会。还是两点：第一，不要掩饰矛盾，不要遮盖矛盾，而要暴露矛盾，揭开矛盾。对犯错误的人，是掩饰他的错误，还是揭露他的错误？当然要揭露；第二，不要熄灭阶级斗争，而要把斗争进行到底。揭露矛盾要赞成一方面，反对一方面，把态度明确起来。毛主席分析各阶级的时候，分清敌友，联合谁、反对谁。辩证法的要点就是这两点。这两点是我们指导的方向。揭露出来就是要赞成一方面，反对一方面，反对要反对到底。

由此可见，为了在政治上不犯错误，便要执行不调和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而不要执行调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政策，不要执行使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的妥协主义政策。布哈林在苏联实行五年计划以前，以为富农可以自然而然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工业要依赖富农，认为富农对社会主义工农业有贡献。他有一种很错误的思想，以为农村只有富农的粮食多，只有他们能够提供许多粮食给城市，小农就不行，因此就要依靠富农。实际上他是想要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就

反对他，我们不应该依靠富农，富农只能破坏社会主义，它们产的粮食多一点，但是很有限，社会主义大大发展起来了，富农的一点东西不算什么。我们可以供给城市原料和粮食的就是集体农庄，集体农庄是配合工业发展的。富农是自私的，城市愈需要粮食，他就愈要高的代价，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或者保存起来不卖给国家。富农是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不是可以“长入”社会主义的。只有与资产阶级斗争，消灭富农，才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这些原则可以作为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方针，这些原则是有很大的意义，辩证法的实践作用。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斯大林这些话可以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结。不管无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都说明不能对资产阶级采取调和的政策。我们对资产阶级是否调和？不是，我们是利用、限制、改造，改造实际上就是消灭，我们现在虽然与资产阶级是统一战线，但这统一战线并不等于阶级调和，这是我们的一种方式，是消灭资产阶级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在统一战线的形式上逐渐消灭资产阶级。我们的形势是这样的，资产阶级只能接受我们的领导，只能在我们的限制、领导下暂时维持他的存在，最后还是要接受我们的改造，消灭它们。所以不能因为我们有统一战线，斯大林的原则就不对了，他的原则对我们还是一样的。因为在统一战线中还是有斗争，它们要生存，我们要改造、消灭它们，不这样，社会主义就不能发展。

斯大林这一点是运用了列宁的原则的，列宁也是这样认为：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相互排斥的对立斗争是绝对的。斯大林把这原则具体地表现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上。

斯大林对辩证法第四个特征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指出社

会主义制度里生产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或一切阶级社会里的生产矛盾是有原则区别的。他很具体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虽然完全适合，但也有矛盾。所以，分析矛盾在一切社会都是适用的，分析揭露矛盾对一切社会都适用，是普遍真理。而且用在具体社会中，又要注意到具体的情况，具体的了解，不能把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简单地与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划一个等号。他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还是落后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矛盾无疑是有的，但是这矛盾在领导机关的正确政策下，这些矛盾不会变成对立的矛盾，也就不会弄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的冲突。资本主义社会领导机关保护旧的生产关系，因此新的生产力与旧的生产关系一定要发生冲突。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的政策对已经过时的生产关系不是保护，而是要采取新的体制来解决这一矛盾。因此，斯大林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需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不需要通过冲突来解决矛盾，来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新旧矛盾。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揭露矛盾，也就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斗争来解决矛盾。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原则上的区别。这是一个贡献。它可以指导我们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如何去解决我们社会的矛盾。

新中国解决矛盾，甚至对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当做一种推动的方法。毛主席在政协会议上说：对人民，我们是用民主的方法来改造思想，对反动派，就用专政的方法。民主的方法主要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这里当然包括资产阶

级的代表，资产阶级有一些不能接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的，但是一般来说，是可以用这种方法的。在我们的政策下，也可以采取这种方法。资产阶级以外的社会各阶级更用不着讲了。

毛主席也是根据列宁、斯大林的原则，来了解辩证法的第四个特征的，把辩证法看做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矛盾论》对这个问题有重大发展，以后我们还要学，今天不讲了。毛主席的很多著作都是这样，只要提起大家注意就是了。

《矛盾论》中“两种宇宙观”的最后一小段，把辩证法的主要特征概括了一下。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是教导人们要观察分析事物的各种矛盾运动，并且根据这种分析去找出解决的方法，《矛盾论》里都讲到了。毛主席自己都是贯彻了这个方法。《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一方面分析了各阶级，另一方面是根据分析的结果，掌握分清敌友的原则。这不仅是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的基本方法，而且在每一时期里写的文章著作中，都可以说是这一方法的应用。以后讲《矛盾论》还要具体地说明。

四、对形而上学的批判

这里主要讲对社会研究方面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的批判。

形而上学的特点就是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

形而上学否认矛盾是自己运动的源泉，而把运动的原因归到外部的力量方面去，用外部力量说明运动发展的原因。机械唯物论一般的都是这样来看运动的，它认为一切变化都是外力推动的结果。这种思想归根结底和唯心论走到一条路上去。他们认为物质自己不会变化，不会发展，把事物发展的最后原因归结为物质以外的力量，除了神以外就找不到第二个东西。牛顿的例子，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一个科学家，应该是不相信神的，可是因为他是机械唯物论者，所以最后没有办法只好说出上帝来。

社会怎么会发展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者也多半用外部的原因来说明。有的人说社会的发展是由地理条件决定的，这就是地理决定论。斯大林在他的著作里反驳了他们，认为地理不是决定的原因。有的说地理决定社会进步不进步，热带的人因为物产丰富，所以就懒了，就不进步；太冷的地方也不进步，只有温带地方的人才进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苏联是在很冷的地方，但还是最先进的国家。有一些人把社会发展的原因归到很多条件方面去，也是错误的。有的归到人口方面去，又有的种族论，认为优秀的种族生来就要支配世界，劣等种族生来就要做奴隶。这些都是外因论，把社会的发展归结到偶然的原因。唯心论也是外因论，以为一个伟人就可以支配世界。我们中国“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有一种思想叫“外铄论”，这是托派的思想，认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外来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中国近代有资本主义，所以能够革命，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否则就永远是封建主义，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因为帝国主义侵略是要中国停留在封建主义，它不愿意叫你进步。中国的进步是因为内部生长了新生的力量，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所以“外铄论”是错误的。这种说法现在已经没有人敢公开讲了，但是有的知识分子也还有类似的思想。

辩证法也不是忽视外因的，也承认外因的作用。以条件，地点，时间为转移，这里就包含了外部的原因。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假使没有俄国革命，就不会这么快的转变。外因是相当重要的，问题是外因要发生作用一定要通过内部，外因如果不变成内部矛盾的动因，它是不能起作用的。俄国革命

影响了中国，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并不是中国立刻就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它是影响中国内部阶级关系，所以中国革命归根结底主要还是内部的阶级关系，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个问题《矛盾论》上也讲了，我们以后还可以再研究。

地理条件对中国有没有好处?中国地大物博有很大的好处,对我们的建设事业有很大的便利，自己什么都有，就是机器少，靠外国帮助，原料、粮食都有了，地理条件就决定了中国建设事业有很好的条件。但是为什么旧中国的地理条件就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条件呢？旧中国为什么建设不起来？因为地理条件总是要通过内部的阶级关系的变化才能起作用。不忽视外因的作用，但是一定要注意到只有内因才是发展的根本原因。

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思想除了外因论外,还有其他的思想,特别是在社会阶级斗争已经不能掩饰时，资产阶级就用其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来反对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产生后，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影响很大的时候，资产阶级反对辩证法的形式就不是简单的外因论，一般的资产阶级或受资产阶级影响的人，不是公开地否认社会有阶级矛盾，而是竭力想把矛盾的作用看轻，把矛盾斗争的力量减低，强调对立的统一性，抹煞对立的斗争性，用这种方法来作为阶级调和的思想基础。阶级调和的思想就是强调统一性,减低斗争的作用。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就是在辩证法上忽视斗争性，抹煞斗争性的作用。英国工党一直到现在还宣传这种反动的观点。有人这样主张，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陈旧了,把阶级斗争看做是社会发展的内在根源的学说是过时了。这是继承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与列宁的原理绝对相反的，事实证明就是不对的。因为工党是投降资产阶级的，它宣传阶级调和思想。

孙中山是革命家，与共产党合作，那是很大的事情，这一点他是资产阶级中伟大的革命家。但是，他的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认为中国是大贫小贫的国家，忽视了阶级的对立，他说中国的阶级没有那么尖锐，资产阶级不过是小穷人，无产阶级不过是大穷人。所以不能看做是对立的阶级，强调大贫小贫的统一性。实际上不是那样，资产阶级不是贫穷的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以后，资产阶级要想用阶级调和的办法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与共产党联合；一方面宣传阶级调和主义。有一个故事，1921 年中国共产党快要成立了，中国资产阶级就从外国请了一位罗素，他说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也讲了一点阶级问题，承认俄国革命是有成绩的，但是认为这办法不很好。他在中国演讲，一次到了长沙，他听说长沙马克思主义搞得很厉害，他讲的时候就指出了反对劳工专政，主张采用教育的方法使资产阶级觉悟，这样可以不致妨碍自由，不致引起战争，不致流血。这也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怎样斗争的。资产阶级也没有睡觉，用了几种方法来斗争，请外国人来讲课，罗素演讲时，毛主席也在长沙，于是毛主席就勇敢地给了批评，一句话就驳倒了：事实上做不到。因为你要教育就要有钱、有人、有机关，可是这些东西都在统治者手里，你拿什么教育资产阶级。所以，如果没有政权是不行的。

阶级调和主义在党内也有反映，显著的就是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你说陈独秀否认阶级，也不能这样说。陈独秀是否有意识地违反列宁的原则？从他的行动、他的具体政策，尤其是他的思想，都是违背列宁的原则的，是与资产阶级的调和主义一致的，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我们胜利后也有这种问题，我们有一些干部在工作中与资产

阶级接触，就忘记了划清界限，糖衣炮弹打来了没有感觉，以为是讲朋友，接受了糖衣炮弹的攻击。“三反”、“五反”就证明了这种情况，这不是一种自觉的阶级调和主义，是在行动上的阶级调和主义。我们讲统一战线，也不一定就说资产阶级很不好，把对立性摆在脸上也是不对的。但是要有这种原则性，就是我们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总要消灭它。

五、学习方法上的要点

根据这第四个辩证法特征的本身要点，在原则上就是要学会善于揭露事物的矛盾，又善于根据分析的结果，采取一定的斗争方法来解决矛盾。

根据这原则，就要结合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思想，从两方面反对形而上学的倾向，一方面要学会善于分析矛盾，一定要反对忽视矛盾、掩盖矛盾、不认真分析矛盾的倾向。忽视矛盾要反对、故意掩盖矛盾更应该反对。不忽视、不掩盖，但是不认真研究矛盾也要反对。因为它们都带有形而上学的倾向，是违背辩证法的。还要反对把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推到外部，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善于采取一定的斗争方法来解决矛盾，所以首先要反对阶级调和的倾向，就是要反对轻视斗争，或者没有决心和勇气坚持斗争到底的倾向。这不但是对资产阶级的问题，而且是对一切错误、一切坏事情都要这样。同时要反对斗争中的主观主义。所谓斗争的主观主义，就是不考虑适当的斗争方式，不按照具体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方式和步骤。

第一方面，要反对忽视矛盾，或故意掩盖矛盾，或不认真分析矛盾，或把变化的原因推到外部的观点和做法。忽视矛盾、掩盖矛盾的情况，在我们观察国际、国内大事的时候，一般是比较

少的。会不会有人忽视我们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与反动派的矛盾？大问题上，一般地看是没有人这样的；但在具体工作中，对具体问题看法上常常就有忽视矛盾的情形，就有有意无意掩盖矛盾的情况。具体工作中的“左”倾思想我们已经举了一些例子，在全国革命胜利后，也有些工作同志对敌人的阴谋破坏没有提高警惕性，这就是忽视矛盾的具体事实。我们可以在自己碰到过的事实中找到这种例子。和资产阶级合作不注意糖衣炮弹，这也是忽视矛盾。他并不是不知道这矛盾，而是在具体问题上就忽视了，糖衣炮弹来了还不知道这是一个炮弹。掩盖矛盾这方面，多半可对自己的成绩缺点的问题上考虑，在这问题上最容易发生掩盖矛盾的错误。我们做工作，都有成绩与缺点的矛盾，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成绩，也不能说完全一塌糊涂，一般的都是有成绩有缺点的。把工作看做只是有成绩，或者把成绩看得比较大，缺点看得比较小，虽然讲了一些缺点，但是讲得很轻，这也是一种不愿意揭露矛盾，尤其是一些有功劳包袱的人就要掩盖自己的缺点，这就有点自觉地反对辩证法了。报喜不报忧，虚报成绩等等，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有这种情况呢？也可能有的。有人就喜欢报喜，上面喜欢，他就这样报告。因为掩盖自己的矛盾，因此就会拒绝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愿意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矛盾，这是我们实际工作中不能贯彻辩证法解决矛盾的比较普遍的情况。苏联文艺界有过这种情况，只许写成绩，不许在文学上反映缺点，这种理论苏联文艺界批评了。这种思想主观上以为是好的，他说，我们苏联当然都是好的，就不应该有缺点，文学上暴露了是不对的，这不能帮助进步，不能发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用。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有缺点应该暴露。当然成绩是主要的，但是，太夸大了，不注意缺点，也是不对的。我们中国文艺作品描写英雄人物，还是

把他的缺点不要着重地说好一些，因为你要他当做一个英雄，就要少说一些缺点，为了反映真实，不能夸大缺点，相反地，要把好的地方如实地反映出来，把缺点写得突出是不好的。所以一般地讲，我们说出缺点是好的，有教育意义，但是把缺点写得多了，教育意义就不多了。从来一个阶级在描写它的英雄时，总写成他的缺点是可以原谅的。李逵的那把斧子可以往每个人的头上砍，但是使人感觉到可爱，因为他忠于农民斗争，使人不感觉到他可恨，相反地，觉得天真、忠实。揭露矛盾也要看情况，不允许只讲成绩不讲缺点，也不允许只讲缺点，否定成绩。

有些人要掩盖缺点，因此就喜欢把错误的原因归到外部去，这是常有的。我们有些同志犯错误受了批评，就想进一步地解释一下，这不是辩证法，是形而上学，是与机械唯物论有类似的地方，凡是发生错误的，外部原因可能有，但主要是你怎样对待外来的影响。“三反”、“五反”里贪污分子被揭发了，他不能说是因为资产阶级的进攻，我才贪污。不能这样说。主要是你为什么要接受资产阶级的“炮弹”，为什么别人能不接受？所以自己的内部矛盾决定自己向那一方面发展。用客观原因、外部原因来解释自己的错误，也是一种外因论，是不符合辩证法的矛盾法则的。不是说外因不可以提，而是不可以作为辩护自己错误的理由。

刚才讲的是忽视矛盾、掩盖矛盾，现在讲不重视分析矛盾。

不忽视，也不掩盖矛盾，但是不认真分析，这也是形而上学的倾向，因为他不能充分贯彻辩证法。因为不认真地分析矛盾，就不能深刻地认识矛盾，因此也就不可能解决矛盾。这种情况在实际工作中和人们的思想中比较多。好像也承认矛盾，但是不能用很大的力量来分析矛盾，揭露矛盾。矛盾是一定要揭露的，要认真地分析，因为矛盾很复杂，不认真分析就搞不清楚，你即使承

认矛盾，分析矛盾，但是不认真地分析，你的了解就带有表面性，带有表面性就不符合辩证法。所谓表面性就是随便望一望，看见一点矛盾形象，就想粗枝大叶地考虑解决的方法，这是要犯错误的。这种情况，中国外国都有。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面，关于分析国际问题一章中，他批评了一些同志对各种阶级问题的表面看法。有一些人说，资本主义国家战争不会有了，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剧烈，用这种理由说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人你说他不承认矛盾，不研究矛盾，不是的，问题就是不太认真。斯大林就说：他们只看见表面上闪现着的外表现象，而没有看见那些暂时虽还未明显地发生作用，但终究会决定事变进程的潜在力量。这种力量就是资产阶级之间的自由竞争、争夺和掠夺。从长久来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很尖锐，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资本主义的矛盾更剧烈。因为苏联很强大，进攻苏联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生死问题，而且苏联不要进攻资本主义，这也是很清楚的，资本主义国家也知道虽然剧烈，但是爆发不起来。这种例子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土地改革中，因为不能正确地划清界限，就发生了偏差，打错了人，把富农和富裕中农都当做地主打了；解放以来，对于资产阶级的观点，有“左”的右的，不能正确地掌握又斗争又团结的政策。这也是一个例子。“九·一八”以后，民族危机突出，我们的“左”倾冒险主义不认真地研究矛盾，没有看到主要矛盾已变成了民族矛盾。在经济建设中，不知道把重工业的建设当做重点，这也是不能认真分析矛盾。我们要发展工业，但是我们落后，这是矛盾。不看重点在什么地方，障碍我们工业发展，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是什么，表面上看一下，觉得我们没有轻工业，对人

民生活提高不快，就主张以轻工业为主；当然，重视重工业，又把轻工业看得太低，这也是错误的。

在各种工作中，不知道一个时期抓住一个主要环节，这也是不懂得深刻分析矛盾的结果，怎样抓住一个环节？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问题在《矛盾论》上更具体地解决了，以后还可以讲。这些问题所以要反对，就是要对矛盾进行全面的、深刻的分析。学《矛盾论》时，我们再解释这问题，全面分析、深刻分析，要用什么原则。

最后一点，要学会通过一定的斗争方法来解决矛盾。当然首先要领会斗争绝对性的原则，首要就要坚持这一点，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前进。更具体一点说，只有通过新的事物对旧事物的斗争，才能真正地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分析矛盾与我们的立场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推动发展。依靠新的东西，反对旧的东西，这是我们任何时候都应该有的态度。因此就要反对形而上学，反对旧事物。留恋旧事物就没有斗争的勇气。要对坏事情有斗争的勇气，在政治上反对阶级调和主义。在实际工作中这种没有斗争勇气的情况，就表现为尾巴主义、保守主义，跟着旧的东西走，就叫尾巴主义，留恋旧东西就是保守主义。

我们现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应该树立新的劳动态度，反对剥削阶级的思想，偷懒取巧，不重视劳动纪律。要和不重视劳动纪律，破坏劳动纪律的现象进行斗争。不仅是工厂，我们的工作，也要讲劳动纪律，这样才符合辩证法。

树立斗争的精神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斗争的时候要考虑方式。考虑斗争的方式，怎样考虑应该注意一下。原则就是矛盾的性质不同，斗争的方式不同，矛盾所处的条件不同，斗争的方式也可以不同。要按照矛盾的不同性质来规定不同的方式。同一矛

盾，条件不同，也可以规定不同的斗争方式。矛盾最主要有两种形式，对抗性的，非对抗性的，对抗性的矛盾就可以用冲突性的方式来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就不能是冲突的。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要有冲突；党内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是冲突性的，主要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同一矛盾事实上要冲突，但是情况不同，冲突的形式就不同。资产阶级和我们的矛盾在反动政府的统治下，有时是冲突性的；我们胜利后，资产阶级对我们的冲突不是用枪杆子，而是用糖衣炮弹，资产阶级对我们捧场，看起来不是冲突，但实际上是一个冲突。我们对资产阶级用利用、限制、改造的方法，形式上不是剧烈的冲突。这就是考虑斗争方法的一些原则，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

我的讲课就到这里。

关于辩证法学习小结的几个问题*

（1953.11）

今天讲三个问题：

一、学习方针的问题；

二、学习方法的问题；

三、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

现在开始讲第一个问题。

一、学习方针的问题

我们以前在讲课时也提到过，学辩证法是学唯物论的继续，是进一步地学唯物论，进一步地反主观主义。因为学了辩证法，就可以使我们找到主观主义的根源。在思想方法上来说，这种根源就是形而上学，即认识上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在看问题的方法上违背了辩证法，在理解事物的方法上离开了客观的辩证法，就不能正确地反映事物。斯大林在讲唯物主义第一个特征时说：各个对象对各个现象是互相密切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的，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发展规律。例如：布置文化工作太多，那就妨碍了行政工作，这是因为不懂得两种工作间的规律。如何使得文

＊ 1953年11月初，马克思列宁学院七、八、九班学习唯物辩证法告一段落，按当时教学计划规定，进入学习小结。为了搞好小结，艾思奇在1953年11月3日进行了布置和动员。这里是按当时速记稿整理。

化工作与行政工作配合起来，那就必须依据辩证法来了解其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掌握其规律。所以，要认识客观规律，就要把各种客观事实、材料拿来，用辩证法来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如此，就可以避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否则就会产生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产生的原因是有其阶级根源的。立场不正确会产生主观主义，但还要研究方法上的根源，即在方法上犯了形而上学的毛病。我们学了辩证法，用它来联系、研究过去的工作，就可以找出发生错误的原因。从上次的小结中使我们知道：所以在工作上犯错误，就是由于有主观主义。现在我们再作小结，我们就要进一步了解主观主义是怎样产生的。这是我们在学习辩证法当中的一个中心任务——继续揭发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这就要根据我们的学习方针："联系实际改造思想"去做，也就是在改造思想上、工作上形而上学的毛病，即表面性、片面性的毛病。

辩证法的每一个特征都是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辩证法的每一特征都要求我们反对形而上学。辩证法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反对孤立地去看问题；第二个特征是要我们看到事物的发展，特别要看到新生的力量，也就是反对表面地去看问题；第三个特征，要我们注意量变到质变的规律，估计到质时要注意量的条件；第四个特征，是要我们认识矛盾，也就是叫我们全面地去看问题。

我们学习辩证法，必须是在反对思想上、工作上的形而上学当中来学习。中国有一句话，叫"不破不立"，如不反对形而上学，就不可能领会辩证法。我们说联系实际就是这样联系，这也是我们学习的总方针。所以我们的学习就一定要反省自己与检查自己，学唯物论我们已经检查过，现在还可以进一步地检查，这个方针一定要坚持。这个方针我们同志中间有没有人反对呢？看起来个别的人还是有的，虽然我们学习了这样久了，但还是有人不相信

这种方针。有个别同志认为自己是学习知识，一谈联系实际就感觉是一件头痛的事情，觉得无从联起。我想我们大多数同志恐怕不会赞成这种想法的。

由于有些同志对我们的学习方针有抵触情绪，因此关于学习的方法也就与我们的方针不一致了。我们所规定的必读的一些书，有些同志不读，而自己去搞一些，这种人也是有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是要进行批评的，下面我们对这种思想还要进行一些批评。

现在我们再把方针的问题讲一讲。

按照我们的学习方针，我们应该怎样做呢？就是需要我们把唯物论的学习所得到的成绩深入一步进行研究。在唯物论小结里面，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据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卷子，很多同志在批评主观主义的时候已经解决了形而上学的问题，但还不是有意识地提出问题来，实际上是已经解决了。很多卷子里面都有这种情况，但是是不自觉的。

我们学习辩证法，就是为了使我们解决的问题更明确起来，更自觉地去反对形而上学。刚才我举的一个例子，也就是唯物论小结上面的一个例子，一个同志检讨作文化教育工作方面的错误，在卷子上批评自己布置文化教育工作是主观主义，没有按照地点、条件来布置工作，实际上解决了在工作上的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其他卷子中也有这种情况，有的作财经工作的同志，像有的同志搞银行发行工作，不能够把这个工作与全面的财经工作联系起来，如有的时候发行的多了，有的时候发行的少了；还有怎样回笼货币等等，这些之间的变化与整个财经工作都是有联系的，如果注意到这些联系，就可能知道发行的规律了。在唯物论小结里面对这个问题没有提到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思想的应有高度，但实际上

也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作辩证法小结的时候，就可以把我们一些唯物论的学习作为基础进一步地去检讨方法上的问题，这样就使得我们的认识更提高了一步。所以有人问：我们写辩证法小结的时候，能不能再一次地重复唯物论小结的问题？我们说还是可以的，可以以它作为基础，再进一步地发挥它的内容，但是尽可能还是不局限于已经检讨的方面，尽可能多谈一下。为了使我们的思想更开展一些，我们在想一下其他方面的问题来进行检讨，那就会更好一些。

关于辩证法的小结，是不是把我们的思想全面地来进行检讨呢？或者把工作也进行一次全面的检讨呢？我们可以这样说：辩证法小结是为了解决辩证法的问题，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不是把我们的整个思想、立场、观点、方法各方面来作一次检讨；我们现在主要的就是检查主观主义、片面性，以及检讨思想上的各种错误，而不需要作一个思想上的总的检讨。当然检讨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也就可以解决主观主义的问题，有时候也可以解决到立场问题，因为辩证法的第二个特征就是讲立场的问题，依靠新生的东西，这就是一个立场问题，这些问题是可以接触到的，就好像我们作唯物论总结的时候，已经接近了辩证法一样，但我们主要的是检讨主观主义、片面性，因此不要求全面地去检讨。但是事实的方面不妨扩大一点，如果有重复的必要，也是可以重复的，但最好是把检讨的事实范围更大一点。在作唯物论小结的时候，有些同志检讨了一些小事，像什么东西被人偷掉了这类的事情，作为一个总结，用哲学的思想全部进行检讨，在开始时当然是不熟练的。最初用一两件事情进行检讨也是可以的，但不能够停留在这一个阶段上，要检讨一些带普遍性的东西，范围要求更大一点。这种学习能够概括更多的东西，我们的方法能够总结得

好，我们就能够概括更多的东西。我们看一些经典著作有一个特点，就是概括的东西非常多。像斯大林同志的文章，很小的一个小册子，里面包括整个一个时代的各方面的问题。恩格斯的一本小册子，像《费尔巴哈论》，把当时社会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都概括了。当然我们不能学得那样高明；如果我们长期地努力学下去，也不是学不到的，当然现在离得还很远，但是我们可以向这方面努力。因为我们一个人活了二三十岁，我们经历了很多实践，我们的认识已有相当丰富的内容，我们可以尽可能地多找一些材料来进行分析，当然还是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因为时间也很短，所以我们的要求也是不很高的，只是希望把唯物论小结更深入一步。

有一些问题再声明一下，我们现在是学习，所以我们作小结，或将来作总结，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提高思想，提高思想也就是改造思想。这与组织问题没有联系，在检讨问题的时候，开展批评自我批评的时候，免不了谈到历史上的问题，过去工作上的问题也要检讨，但当检讨自己问题的时候，绝不是为了在组织上作什么结论。关于这个问题以前已经讲过，这一次再声明一下，因为过去有一些人在这方面有所顾虑，害怕在组织上作什么结论与处理。关于这一点声明一下，我们现在是学习，学习就是为了解决思想问题，不是为了在组织上下结论。希望大家清楚这一点。

关于方针问题就讲到这里。

二、学习方法的问题

我们作小结怎样一种作法，我们现在还不是讲作文章，作文章的方法我也不大会讲，等语文教员给你们讲。

我们讲的方法，就是如何分析问题的方法，因为大家都提过

这个问题，学唯物论也提过这个问题，学辩证法也提过这个问题，所以应该讲一讲。

我们作小结怎样来分析事物呢？用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来分析问题呢？其实没有什么更特别的方法，我想只要不忘记一点，就是辩证法本身就是分析问题的方法。提出方法问题的同志往往忘记了辩证法本身就是分析方法的这一点。我们的方法除了辩证法以外，再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了；如果再有别的方法，那就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总起来说，仍然是一句老话，就是把事实材料从各方面想一想，然后再运用辩证法的原则贯穿起来。在我们没有学习辩证法以前，对很多事情摆不出来，只是看到一些不相关连的事情，而当学习了辩证法以后，我们脑子里经常注意辩证法的原则，然后摆事实的时候就可以想一想按照辩证法的方法来看一看是一种什么关系。有同志检讨自己的时候，说自己领导一摊秘书工作，像打字之类，下面同志发现了新的工作方法，而自己还不注意，因此工作上总是老样子；可是以后看到别的机关的工作效率提高了，这是由于自己单位的好的工作方法人家学去了，而自己是新工作方法的创造者，反而使工作停顿下来了。在没有学习辩证法以前，自己只知道是这样一件事情，当学习了辩证法之后，自然就了解到这是形而上学的思想。它违背了辩证法第二条——不注意新生的事物。这样检讨就是从一些事实中间引出了辩证法的原则，不是硬套，而是从事实中间看出与辩证法的联系。

我们研究基本的方法就是应该这样，把辩证法的方法以及许多原则当做我们一个指导方向的指南，或者是把它当成一个引路灯来照耀事实，从事实当中引出它的关系来。所以要紧的是先有事实材料，然后根据事实材料才引出结论来。我们已经学了辩证

法，是不是有这种危险，就是只是摆出了材料，而不能联系。我们说既然学了辩证法就不能这样了，没有学辩证法就是有这个毛病——把事实摆一堆而不能够联系起来。我们学了辩证法就能够避免这个毛病，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联系事实的武器，以及发现事实的武器，我们在考虑事实的时候，只要不忘记辩证法的许多特点与原则，那我们就有可能把事实与辩证法的关系联系起来。所以要紧的还是先把事实揭露出来。凡是学不好的人，多半是因为不肯揭露事实，或者只愿意揭露好的事实，而不愿意揭露坏的事实，只愿意讲成绩，而不愿意讲缺点，要不就是讲错误的时候也是避重就轻，不肯恰如其分，不肯把典型的事实拿出来考虑。如果有这种情况，我们说就永远学不好，因为辩证法是科学，科学就是要研究客观事实的规律，首先应该把客观事实拿出来，然后科学的方法才能够运用上去。所以检讨自己，就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客观的对象来检讨，要撇开个人主义的因素，把个人的得失撇开，就是勇敢地把事实弄清楚。如果不打破这一关，我们学唯物论与辩证法都是学不好的。必须勇敢地揭露事实，然后才能够运用方法，否则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辩证法是客观物质的辩证法，因此就要有事实才能够运用这种方法，有了事实就可以或多或少地引出结论来，当然这并不是说有了这一条我们就能够做得非常高明了，因为开始总是有困难的，自然不能够就马上很好地融会贯通。如我们在讲辩证法几个特点的时候，大家就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辩证法四个特征怎样联系？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开始学的时候，就感觉四个特征很难联系，所以在我们开始运用辩证法的时候，在运用一个特点的时候，好像作为这一件事情，只能够运用第一个特征，另外一件事情只能够与第二个特征相联系。这种情况，在开始的时候是免不了的。而

实际上我们要注意到，无论某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它主要是表现某一特征，但也绝不是仅仅只能表现这一特征，如刚才举的例子，新的工作方法发现了，而没有注意，这一件事情主要是表现在违背了辩证法的第二个特征，应该根据辩证法第二条来进行检讨。但是这一件事实也可以联系到第三、第四个特征，因为不注意新生的事物，自然而然地就有保守主义，这样发展的结果，与其他的特点——第三、第四个特点怎样联系呢？不注意新的方法，以及新旧的矛盾、新旧的斗争，就是不注意用新的东西反对旧的东西，这样就可以把整个辩证法运用在某一些问题上。第一步可以一件一件事情地来检讨，然后就可以考虑更多的事情，从一个原则考虑到其他各方面的原则。大体上总的方法也只能这样来了解，更多的道理也讲不出来。再就是希望大家多看一下发下去的参考材料，还有一些党的文件，如关于新疆的工作问题，工会方面关于李立三错误的问题，这些文件都提到了思想方法的问题，大家可以从这些文件当中去学习，然后从事实中引出辩证法的原则。在新疆工作的文件里面，它检讨了工作中的片面性；在工会工作检讨里面，关于工会工作违背辩证法的原则，布置工作不看情况，这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总之，再没有什么更巧妙的方法了，主要是靠自己努力去做，自己开始做得不熟练，可以参考一些别的东西，这样就可以逐渐得到更深的领会。

此外，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要把问题弄清楚，把事实摆出来以后，要注意中心问题在哪里。我们往往有了事实材料，但不能从事实当中正确地找出问题来，因此也就不能够进行分析，从而也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我们对某一件事情，考虑一下问题在哪里，究竟想解决什么问题，要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作检

讨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在我们所看到的唯物论的小结中，往往因为问题提得不正确，因此也就分析不正确。如有人检讨“三反”、“五反”打“虎”的例子，他说：打“虎”工作是有成绩的，但也有问题，就是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原来我们预计打十个“老虎”，结果只打了三个“老虎”，因此没有实现我们预期的计划。像这样的例子，要考虑一下自己订的计划是不是过高了呢？这恐怕不是成绩与计划不一致的问题。没有实现这个计划，这是正确的，如果实现了计划，那就要犯错误了。因此对这样的问题就不能看成是一个错误的事实，因为问题不在于计划与成绩有矛盾，而是在于在“打虎”过程中是否经过了调查研究，问题在于计划是否合乎事实。像这样的问题就是把问题没有提对，因此对问题的分析也就不能够正确，结论也就不能够正确。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是个别的，不是很多的。但是这种例子就说明我们往往提出问题不正确，出发点错了，分析问题也就错了。所以我们摆事实的时候，要考虑在许多事实中间包含一个什么问题，做对了，或者是做错了，在什么问题上做对了，或者是在什么问题上做错了，要这样考虑一下，正确地提出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个中心问题来贯穿着这些事实，那事实就成了一大堆零碎的东西。事实不一定只一件，可以有很多，但作为一个小结的中心问题，则应该只有一个。怎样正确的提出问题，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里面讲过：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矛盾。如何提出问题，就是把矛盾中间大体上看一看，总的矛盾大体上是在哪里，这样研究一下，就容易提出问题了。所以在我们作小结的时候，首先要揭露事实，然后再想一想要解决什么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进行分析就不太难了，如做文化工作的同志，首先想一想有一些什么矛盾，做文化工作与行政工作发生矛盾，主

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做银行发行工作，也考虑一下主要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就在于把发行工作没有与全国的财经情况联系起来。提问题并不难，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提出来。所以我们每个人提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考虑想解决一个什么问题，问题提出来了，再进行分析就不难了，大家可以试一试看。

三、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

这个问题还需要再讲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好像还有一些不够明确的地方。我们的学习方针是：联系实际，改造思想。怎样才能实现我们的方针呢？就是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果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这个计划就是空话。所以我们还要强调这一点，要反复地来说明一下。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学习当中的有力武器，是我们思想能够进步的动力，是推动我们学习的有力的主要方法，要使我们的小结做得好，主要还不是在文字、技术等方面，甚至也不在于把辩证法的几个原则拿来运用，运用辩证法的原则当然是我们的任务，但要实现我们改造思想的方法，主要还是要靠批评与自我批评，只有运用这一武器，我们的学习方针才能够实现。所以当我们做辩证法小结的时候，要更进一步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做唯物论小结的时候，有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呢？当然是有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但是不是够了呢？当然是不够的。现在我们还有这种情况：对批评与自我批评还有所顾虑，甚至有对抗的情绪。这种情况是妨碍我们进步的，因为这种情况使得我们不能够掌握一个最主要的武器。我们讲方法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要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贯彻，如果有对抗的情绪，那就剥夺了我们进步中最主要的武器和最好的方法。

这方面有两种情况妨碍着我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一种情况，就是对自我批评有对抗情绪，不愿意实事求是地把问题摆出来；第二种情况，就是对批评有所顾虑。这两种情况都是不正常的，都是应该克服的，都是妨碍我们进步的。

第一种情况，对批评特别是自我批评有对抗情绪，这种情况是不多的，是个别的。虽然是个别的，但它对一个小组，或对我们大家都有妨碍。一个小组里如果有这样一个人，那就会影响一个小组；一个班里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也就会影响一个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像刚才所说的，有人说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知识，对我们所布置的参考书不愿意读，自己另外找一些书读，当然多看一些书是好的，但应该以我们规定的为主，多读一些书是好的，只要有能力就可以，不能够完全说不对。问题是在于这种思想与我们的方针相反，主要是把学习看成是求知识，而不是联系实际，改造思想，因此把联系实际看成是一件麻烦的事情。这种情况怎样产生的呢？因为怕麻烦就不联系实际，原因恐怕是由于头脑太懒，认为辩证法有那些特点，联系起来太麻烦，不如不联系为好，所以这是一种偷懒思想，认为多读一些书，用不着太动脑筋。另外也有一些这样的人，认为自己已经很够了，自己早已会联系实际了，来到这里就用不着在联系实际了，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把学过的东西整理整理，再多看几本书，使知识更多一点，这种思想就是一种自满情绪，以为自己已经很行了。有这种自满情绪的人，好像自己不应该再作检讨了，所以别人一批评自己时，自己就有些生气。有的人是有顾虑，怕检讨了对自己不利。

对我们学习方针的对抗情绪，大体上是由以上几种原因产生的——第一是怕麻烦；第二是有自满情绪；第三就是有所顾虑。

由于这几种原因产生了对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对抗情绪。以上这一些想法都是不对的，不管怕麻烦也好，有自满情绪也好，或有所顾虑也好，在马列学院是不应该产生这种情况的。如果有人怕麻烦最好是不要学习；怕联系实际，觉得头痛，我们说学习理论一定要头痛的，怕头痛最好连书也不要读，要真正想学到一点东西，那就绝不能怕头痛。自满是学习的敌人，有一点自满就会妨碍我们的学习。自满的人自己总以为没有什么错误，所以当别人批评了就生气，脸就红起来，就要吵架。吵架并不是不可以的，但看为什么吵架，争论问题可以吵起来，这是可以的。但当人家批评了自己，有人就以为：这是有意地来整我吧！如有个别同志感觉别人批评的时候，就说：你是不是把我当樊弘来整我？我们要问：一个人是不是应该被整呢？如果一个人以为别人有意识地来整自己，这样对不对呢？我们说有意识地整并不是坏事情。当然要看对自己怎样的整法，如果像对敌人一样的整法，或者是危害你的生命，这种整当然也不妥当。如果我们是整思想，这个整完全是应该的，有意识地整也是应该的，没有意识地整反而不能解决问题，每一个人或多或少地都要整一整，因为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一点错误都没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这里没有这样的人，连我自己在内，所以整一整也要有自觉性。毛主席为什么搞整风呢？就是让大家有意识地整一下。所以我们对某一个人提出批评，他说：你是有意识地来整我吧！那我们也不要害怕，因为这是毛主席在 1942 年整风的方针，这是党的方针。那么可以不可以像樊弘那样来整一下呢？如果有一个人真像樊弘，我说是可以的。樊弘开始的时候，就认为：你们为什么整我呢？认为不应该整自己。樊弘在三班学习，是大学教授，自己以为了不起，他写了文章，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提出批评，他就要告状，要告到苏

联去，想拿到苏联科学院去讨论。实际上他的经济学里面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在他没有进马列学院以前，任何人批评他都没有办法，当进到马列学院以后，我们是一个党校，经过对他展开了批评，经过他自己的反省，自己承认了错误，认识了自己有资产阶级思想。

所以，凡是这样的人：认为自己了不起，是不应该被整的，我们说这样的人是应该大大地被整的；如果一个人自己认为应该整，自己恐怕有什么缺点，这样的人问题还少一点，就是有问题也能够改正。就是那些以为自己什么就够了，没有什么可整的，这样的人是应该好好整一下的。当然如果自己的思想改变了，认为自己是应该被整的，那情况就不同了。

另外，有所顾虑的人就不一定是自满，知道自己有缺点，但自己有些包袱，有自尊心，怕批评了影响自己的自尊心，这也是不正确的。如果是不正当的自尊心，那是应该丢掉的。我们应该有自尊心，我们的自尊心就是：一定坚决地要求进步，一定要前进，绝不停留在一定的水平上，一定要走到时代的前面。这是真正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的自尊心，但有一种自尊心是不妥当的，就是想保护旧的东西，不愿意丢掉旧的东西，把旧的东西当成生命一样，丢掉这些东西好像损失了第二条生命，这是不正常的。把错误掩盖起来，怕揭露错误丢了面子。当然也可能有顾虑，就是怕揭露了错误，是不是在组织上、地位上有什么不利呢？这种思想都是不正确的。是不是揭露了错误就丢了面子呢？就要使别人不能尊敬自己呢？事实上恰恰相反，在旧社会里有一个错误隐藏起来就能够装饰自己，为了面子好看。在我们党内就不同了，如果一个人有错误有缺点隐藏起来，别人也不给你讲，自己也不讲，这并没有什么好看的。因为同志中间如果对你的错误缺点不肯提

出来，那就是别人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同志来看，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共产党员来看待。自己有错误掩盖起来，也就是自己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共产党员来看待。这样是不是就算看得起自己了呢？是不是就算别人尊敬自己了呢？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有错误别人不提，这就表明同志们没有把你看得起，就是对你这个人，不值得向你提意见，认为你这个人不是对党负责的人，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对你提意见没有什么必要。所以一个人如果不接受批评，人家对自己又不进行批评，这是很不好看的事情，我们党内如果尊重一个人，这个同志有缺点一定讲。地位问题也是一样，如果一个人的错误老改不了，地位问题是老也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这一些看法都是不正常的。为了不正常的自尊心，为了面子，或为了地位等等，就不能够实事求是地去检讨，这都不是一种正常的表现。我们一定把自尊心摆在正常的地位上去，正常的自尊心是在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了缺点勇于改掉，使自己更进步，更发展，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自尊心，一个革命者的自尊心，应该是这样。

因此，有些同志存在着顾虑，这是完全不必要的。相反地对这样一个顾虑不能够放弃，不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自尊心，那就是错误的。要按照辩证法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过去，我们党内犯错误的人多得很，有的人就不肯改正错误，因此就愈来愈坏，坏得脱离了党，可以由党内非对立的斗争变成对立的斗争，像张国焘那样。有的人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但自己能够改掉，像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有一些人反对毛主席的方针，错误很严重，但自己以后都改正了，现在还是很好地在为党在做工作。又如从前的教条主义集团，有的人就堕落了，有的人改正了错误，现在还是很好地为党工作。这也是辩证法的原则——

向前看，不要向后看。

共产党发展的主要力量就是靠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对抗情绪是不好的，对自己不利，对大家也不好。因此，我们大家就要注意反对这一点。希望能够克服这种错误，如果一定不肯克服，一定固执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学习，不愿意按照我们的方针来学习，我们可以这样讲：对这些同志的学习将来会不利的。因为你一定违背我们的学习方针，我们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一点希望同志们考虑。

另外就是对待批评有所顾虑的情况，使得批评不能够展开，顾虑主要就是一点，怕对立、过火。批评会不会引起对立呢？会引起对立的。但问题不在于因为批评而引起对立，而是原来有对立才进行批评。我们批评是为了揭露矛盾，把对立的思想摆在桌子面子上，通过批评来克服对立，所以说批评能够引起对立，这种讲法是不合乎辩证法的。如果有对立的思想而不进行批评，那我们党就不能成为思想上统一的党，因此必须通过批评来克服对立，不能因为怕对立就对批评有所顾虑。批评当然要按照对象有轻有重，力求做到恰如其分，要力求适当，注意这方面并不错误，问题在于太注意分寸，因此连批评都害怕了，这就不对了。批评的轻与重，是要看这个人对错误的认识怎样。对哪样的人应批评得轻一点呢？就是对不坚持错误的人。绝不是对坚持错误的人，怕他生气就对他批评得轻一点，对这种人不但不应该批评得轻一点，而且应该批评得重一点，这就是按照他坚持错误的程度而决定批评得轻重。事实上是这样的，有些人批评得轻了是不顶事的，批评得轻了就满不在乎，他一点也没有感觉，他的神经有些麻痹，用一般的针刺他不觉得痛，因此必须用粗针刺得更厉害一些。在整风运动当中，毛主席有一个原则：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

向他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让他治疗。我们对于樊弘就是这样做的，使他大吃一惊，结果他想了一个暑假想通了。所以一个人的进步当然主要是靠自己，但外因也是能起一定的作用的，这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有许多人批评轻了，启发不了他，那就需要批评得重一点，内因是进步的主因，但有时候外部的力量也起一定的决定的作用，当然不是根本的决定的作用，因为你批评得他怎样厉害，他不动也是不行。我们对张国焘可说是仁至义尽，但是他终久还是反了党。一个人如果还不是坏得像张国焘那样，还有一点党性，批评他是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的。因此批评是很重要的。

当然在批评的时候免不了有一定程度的对立，这是用不着害怕的，有的时候能够引起反感，这种人还是很少的。中国有一句古话：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意思就是：好药总是苦的，但它对病有好处；好话听起来都是刺耳的，但对人们的思想、行为有好处。所以说好话要想一点反感没有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揭露对立的，问题在于把对立性揭露了以后，可以克服这个对立。因此我们应该打破这个顾虑，我们要在以前的学习阶段上更进一步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这样就不能够前进。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切学习方法中最主要的方法，当然辩证法的本身就是方法，但这个方法要贯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有对立的思想就必须展开争论，从争论当中可以找到真理，自古至今都是这样。一个人坐在房子里自己想，以为自己掌握了很多的方法，但一个人想的总是有限的，如果大家展开争论、展开批评，就会得到很多的启发，会对一件事情得到更进一步地了解，因此我们就应该更好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作为我们做学习小结的一个有力武器。那么要不要避免过火呢？当然是要避免的。问

题在于正确地了解什么叫过火，是不是对立就叫过火呢？那不一定。有了对立，甚至说了一些很刺耳的话，这也不一定就是过火。譬如我们批评一个人的时候，在批评当中就是有一些很刺耳的话，比如我们常说：你这种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当然这样的话是很刺耳的，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怎么有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当然这是很难听的。但这是不是就算过火呢？不一定，因为它是事实。所以过火不过火的问题是在于是不是实事求是。不实事求是就是过火，不实事求是，无论你口气讲得如何缓和，名词讲得如何文明，但你讲得不合乎事实就是过火。如果是实事求是的批评，那就不是过火。如：你这种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你这种思想是对台湾有利！可以不可以这样批评呢？如果合乎事实那就可以这样说。在我们反贪污的时候，我们常说：贪污分子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这种行为对台湾有利，是台湾的路线！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呢？可以的，因为如果不改正，那是容易走这一条——台湾——道路的。所以批评只要是合乎事实，那就是批评得如何尖锐，也不是过火。

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很好地考虑考虑。我们与献珍同志研究了一下，觉得我们应该更好地认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意义，更好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了更好地使大家认识这一点，还希望大家认真地研究一下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一些文件。

关于 1942 年的整风决定里有一段：“讨论与批评的态度，应该是严正的、彻底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而一切冷嘲暗箭、诬蔑漫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都是不正确的”。这一段大家可以看一看。为了避免过火，下面又说：“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想改正，想求进步，即使是在进步中尚不免有错误，也应鼓励他，帮助他。要欢迎每一个

同志的微小进步，从此去争取他的完全进步”。

此外，还有联共党史结束语的第五条，这一条主要是讲党，但对于个人也是特别重要的。里面说：“党史教导我们说，如果党竟因迷恋于胜利而骄傲起来，如果党竟已看不见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如果党竟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及时来公开诚恳改正这些错误，那它就不能实现其为工人阶级领导者的使命”。作为个人，一个共产党员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害怕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讲，那也就失去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成员的资格。

相反，“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党不去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党能根据党工作中的错误的实例来教育和训练干部，如果党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缺点，那就会是不可战胜的”。作为个人也是这样，一个人犯了错误能够改正，能够公开检讨自己，即使这个人犯了错误，他也是不会失败的，还是可以胜利的，因为他从错误中学习到了经验。毛主席说过，一个犯过错误的同志，可能比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更好一点，因为犯过错误的人曾经受过深刻的教训。人并不是怕犯错误，而是怕不改正错误。

最后，“如果党竟隐瞒自己的错误，抹煞迫切困难的问题，用百事大吉的粉饰辞令来掩盖自己的缺点，不能容忍批评与自我批评，浸透自满情绪，一味自高自大，高枕而卧，那它就会必遭灭亡。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也是这样，如果隐瞒自己的错误来粉饰自己，对待错误避重就轻，不能够勇敢地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别人提出意见老向坏的地方想，不虚心接受人家的批评，这样的人是要灭亡的”。

我们发下去的文件大家都看到了，也许比我讲得还要深刻，在

进行做小结的时候，建议大家再看一看。

在这一次小结里面，希望能够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地开展起来，以后在学习历史唯物论的时候，才能更前进一步。希望同志们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看成是我们学习当中的一个主要方法，有了这个方法，其他的问题也就会解决了，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分析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1953.11)

第一次讲课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意义及其特点

(1953.11.24)

今天开始讲历史唯物论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问题。

这一部分主要是讲两个大问题，今天讲阶级的产生与发展，明天讲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主要就是分这两部分来讲。这个问题讲的少一点，原因就是因为阶级的问题很具体，大家在联系实际这一方面也比较容易领会一点。因为我们学了辩证法，又学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关于阶级的问题就更不难了。所以我们就不一定讲得很多，也不需要讲得非常详细。

今天讲关于阶级的产生与发展，共分四个问题来讲。

第一，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的意义及其特点；

第二，关于阶级的定义；

---

* 这是艾思奇在1953年11月24、25日给马列学院七、八、九班的讲课稿，我们按速记稿整理，只作了文字加工，没有什么删节，只在人民民主专政问题上稍有改动，艾思奇在当时情况下只是讲人民民主专政是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政权，我们加上了其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阶级是如何产生的?

第四，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怎样发展的?

下面我们开始讲：第一个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意义及其特点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是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之一。马列主义与社会科学是分不开的。从来的社会学说没有像马列主义这样很彻底地揭露了人类历史上阶级斗争的各种规律。《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地向人类宣告：除了原始公社以外，一直到现在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当然也了解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但《共产党宣言》算是宣布了这样一件事情。马克思宣布了这件事情以后，就指出了一个方法——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因为从来研究社会、研究历史的人，总觉得人类历史太复杂，好像很混乱，没有一点头绪，究竟怎样去研究社会发展规律，这个问题总不能得到解决。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的学说就是第一次宣告了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的主要线索。无论社会现象如何混乱，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加以分析，就可以找到必然的规律，不但指出方法上的线索，而且指出行动上的方向，指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够获得解放，也才能得到全人类的解放。因为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无产阶级想获得解放没有别的道路。所以斯大林说过，不要熄灭阶级斗争，要坚持阶级斗争，要认清阶级斗争是我们惟一争取人类解放的道路。这也是辩证法在社会科学上主要表现的因素之一。

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列宁有一段话：只有研究特定社会或一群社会的所有成员的意图之总和才能得到这些意图的结果的科学定义，而各种矛盾的意图的来源乃是每个社会所划分的那些阶级的生活状况和条件的差异。列宁的这个原则如果找实际例子来研究，那就是毛主席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我们想一想毛主席是怎样了解中国社会的，把中国各阶级的趋向分析了一下，分析了买办、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把这种趋向总和起来，然后作了一个总和的判断，如何分清敌友。这是经过科学的历史唯物论所证明的，因为毛主席是在1926年分析了这些阶级，一直到1949年，全部历史发展的趋势证明，就是按照毛主席当时所分析的情况发展的。所以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在阶级社会中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指导行动的主要方法，是辩证法运用到社会科学上面最主要的方法。分析矛盾是辩证法的一般原则，运用到阶级社会中就是分析阶级。这种学说与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是根本对立的。

资产阶级的学者一般都是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因此也就否认阶级分析的方法。当做一种科学的研究历史的方法，在资产阶级学说当中，是没有阶级分析这一条的。像中国的梁启超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根本没有阶级分析的问题。孙中山是在政治上与共产党合作，而在人生观上是与共产党对立的。我们说中国有阶级斗争，他说中国没有什么阶级斗争。因为他认为中国所有的人都是穷人，工人、农民当然是穷人，他们认为买办、地主也是穷人，按照孙中山的说法，蒋介石也成了穷人。所以资产阶级的学说首先不承认有阶级，自然也就不承认要了解中国问题需要分析阶级，需要把阶级趋向加以区别，把阶级对立加以揭露。资产阶级的学者就是不揭露阶级斗争，而是模糊阶级对立。

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有机会主义者，它也是用这种方法来模糊阶级对立，有时候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不根本地去否认阶级，但认为阶级利益不是对抗的。有一些机会主义者是企图从哲学的基础上来模糊阶级对立，他们用经验批判论、主观唯心论当成主观的方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主观的，我们的知识科学都是主观的，经验批判论上的思维经济原理，认为这样看问题是为了节省脑力，实际上、客观上是不是如此呢？客观存在的东西与我们的主观不是一致的。

凡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般都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所以要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这也是一个原则。是不是坚持阶级斗争的学说，是不是坚持阶级斗争的方法，是不是认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而是对抗的，这是辨别马克思主义敌人与朋友的标准。

梁漱溟自始至终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是代表地主阶级的，代表封建买办的，他的思想就很明确是反对阶级斗争的学说的，对中国社会就是不承认中国社会有阶级，他认为中国是东方的特殊的社会，没有什么阶级，只有职业的不同，他叫“职业分途”。他说有做工的，有种地的，有读书的，有经商的，所谓“士农工商”，基本上就是这四种不同的职业。他把地主也当成农民，当我们讨论总路线的时候，他就起来反对，说共产党忘记了农民。他这种说法实际上也是对的，因为他所说的农民（地主），不但被我们忘记了，而且还被我们打倒了，因为他所指的农民实际上就是地主。在抗战的时候，延安曾到过中外记者团，他们到延安看到了我们的农民代表，他们说：怎么你们这里的农民代表与我们在国民党地区看到的农民代表不同？你们的农民代表都是穿短衣服的，黑黑的；而国民党地区的农民代表都是吃得胖胖的，

穿着大褂子的。我们的敌人就是这样来模糊阶级的对立——把地主阶级也说成是农民。

在马克思主义没有出现以前，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也是模糊了阶级的对立。像法国的圣西门，他认为世界上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懒惰的阶级，一个是劳动的阶级。懒惰的阶级他指的就是地主阶级，而把资本家与劳动人民放在一起了。这种思想也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劳动者分化得还不够厉害，特别是机器工业没有发展，资本家自己还管理着工厂。由于后来资本家愈来愈变为了寄生的阶级，变成了靠股票到银行去拿利息过生活，这才显出了阶级上的分化。所以假马克思主义者把直接对立的阶级，看成是一家人的样子了。当然不能够把圣西门与梁漱溟相比，因为圣西门还是站在工人阶级方面的，而梁漱溟则是站在地主阶级方面的，他是想压迫农民的，这是立场不同。

资产阶级的学者一般都是否认阶级斗争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资产阶级中间从来没有人发现过阶级。马克思说，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已经有人根据阶级的对立来说明社会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和法国的历史学家。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李嘉图，他们是马克思主义以前带有科学性的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他们承认社会有阶级，但没有从发展观点上来看阶级。他们认为阶级的区别是有的，这个区别就是由于收入方式的不同，资本家的收入是靠利润，地主的收入是靠地租，工人的收入是靠工资，他们认为社会上人的主要收入方式就是这么三种——利润、地租、工资。这样三种收入的方式就规定了三种阶级——资本家、地主和工人。

这样一种看法有一点接近历史唯物论，但不是历史唯物论，因为历史唯物论不是按照收入方式来划分阶级的，而是根据对生产

资料的所有权来划分阶级的。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社会地位也就不同，阶级地位也就不同。收入只是由生产资料所有权所决定的一种方式，所以不能以收入的方式来说明阶级产生的原因。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都是这种看法，我们四班的樊弘教授就是这种看法。他叫收益方式，在班上讨论的时候总以为自己是唯物论，不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观点，而实际上这种说法就完全证明了他主张的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

这种用收入方式来规定阶级，这种看法就是形而上学的，因为他把社会上的阶级分为三种，好像社会上就是这三种阶级，认为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永久是如此的。所以他们虽然承认阶级存在，但不承认阶级是不断变化的一种现象。

法国的历史学家，在法国革命以前，曾经用阶级斗争的学说作为原理来说明当时的历史，因为当时地主阶级与资本家斗争得很尖锐，所以就用市民阶级与封建贵族的斗争来说明法国的情况。这样就说明了一个真理。但问题也在于他们对历史是用形而上学的眼光来看的，首先他们认为阶级的起源是由于武力的征服，一个民族用武力征服了另外一个民族，因此就产生了阶级。这种思想后来就发展为“暴力论”。以后还讲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用武力征服来说明阶级的产生，因此就认为阶级斗争总是有条件的，认为只有资产阶级反对地主阶级时才是必要的，因为地主阶级是靠武力征服来统治的，资产阶级为了要实现一个平等的社会，所以资产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压迫是合理的。只有在这种条件下，阶级斗争才是必要的。

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资产阶级学者，即使是最优秀的人物能够发现阶级，承认阶级的存在，但也不能揭发阶级斗争的

根源，也不能揭发阶级斗争的真正规律。马克思主义就是跟所有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根本不同，能够真正把阶级产生的原因讲清楚，而且把阶级斗争的真正规律都揭露了。

关于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学说，它的内容当然是很丰富的，但马克思把它概括了一下，认为包含三个要点：1. 阶级的存在，必定是和生产上的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结合着；2. 阶级斗争必然要走到无产阶级专政；3. 这专政本身仅只是扬弃一切阶级而达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以上这三点合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学说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它的特点。这是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一切机会主义者的学说有所区别的根本的要点。这三个要点，一方面指出研究历史、研究社会的方法；另外一方面又指出了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

二、关于阶级的定义

要了解阶级，首先要区别阶级与等级。阶级与等级是不同的，不懂历史唯物论的人，就不懂这一点。所谓等级，就是指法律上规定的各种不同权利和义务的社会集团。所以等级是法律上的概念，或者主要是法律上的概念，不是经济上的集团，不同的等级可以在经济上成为一个阶级，比如，中国过去有皇帝，有贵族，有将相。皇帝和宰相、将军是不同的等级，将相与一般做官的又是不同的等级，做官的与普通的地主又是不同的等级，但这些不同的等级，归根结底都是地主阶级。他们在经济上都是一致的，都是压迫农民的，但在权利上是可以成为不同的集团，就是封建的等级。封建社会表面上就是一种等级社会，等级掩盖了阶级。比如，从前清朝时代，做官的见皇帝是称奴才，做官的又可以对老

百姓叫奴才，看起来官是皇帝的奴才，老百姓又是做官的奴才，这样看起来好像都是一个阶级，实际上官与皇帝是一个阶级，老百姓又是一个阶级。所以不把等级与阶级弄清楚，就不能划分清楚阶级。等级是法律上的概念，阶级是经济上的概念。

封建社会垮台以后，等级是不是还有呢？还是有的，但不是封建的等级了。譬如今天我们在工作上、部队上有等级，这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不是封建的等级。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就有坏分子挑拨这一点，他们说延安存在阶级，像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就是挑拨这一点。这种思想也是要注意的，因为我们常常有平均主义的思想。

我们把等级与阶级弄清楚以后，就可以了解什么是阶级了。阶级不是根据法律所划分的社会集团，阶级是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所构成的不同的形式的集团。所谓经济地位不同，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某一些人占有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就是有些人全部或部分地丧失了生产资料。占有了生产资料的人就有可能利用占有的生产资料来剥削那一些丧失了生产资料的人；丧失了生产资料的人就必然要受剥削，因为他没有生产资料不可能生活，因此，就不能不依赖、服从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所以阶级地位的不同，主要就表现在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的不同。占有生产资料者成为统治者，丧失了生产资料者成为服从者。在经济上就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关于阶级最完全的定义，是列宁所说的："所谓各个阶级，就是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都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各不相同的几个巨大集团"。（列宁：《伟大的创

举》）

因此，所有各个阶级就是由于在一定的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他始终讲到经济地位的问题，讲到对生产资料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是没有法律规定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法律规定的，但法律规定不是主要的。这些问题也就不多讲了。总之，划分阶级最根本的根据，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列宁在阶级的定义里面，还是把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当做最根本的，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就决定了各个不同的几个集团。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就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不同。有的人在劳动组织中起支配作用，有的人在劳动组织中则处于服从的地位。这就是在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的意思。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过这样的话：在任何时候，凡是占有生产资料，对生产起主要作用的，这种人一定是生产中的支配者。不但阶级社会是如此，甚至在原始公社里面也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在原始公社中虽然没有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但在生产中间的作用大小是有分别的。譬如在狩猎时代，妇女在生产中的地位就比男子大，因为男子在外边打猎是很不可靠的，常常空着手回来；家里的事情还要靠妇女去维持，如果男子打不到野兽，妇女还要想办法。所以生产资料虽然是归公有的，但妇女所占的地位是更重要一些，妇女虽然不直接出去打猎，但她要考虑到大家的生活问题，所以当时是母系社会。

阶级社会与原始公社有原则的不同，因为有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在劳动组织中起决定的作用，由于在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此分配的关系也就不同，对产品取得的多少与形式也就不同。所以列宁划分阶级的定义与斯大林所讲的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是分不开的：1. 生产资料归谁所有；2. 在劳

动组织中关系如何；3. 产品分配形式如何。大体上是根据这三方面划分阶级。我们从前在农村中搞土地改革划分阶级时，也主要是根据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划分，地主与农民的区别，基本上就是对土地所有权的区别。

这种划分阶级的方法，可以看出收入方式对阶级的性质来说是一种附属的特征，不是最根本的特征，收入方式是决定于对生产资料所有的关系，所以资产阶级的说法是片面的。阶级的定义就说明阶级的产生，只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现象，这种现象是由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问题引起的。有些人占有了生产资料，有些人丧失了生产资料，这两个集团就产生了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这种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因为经济上的利益是对抗的，因为一个集团豪华的生活是靠损害另外一个集团来维持的，剥削的特征就是损人利己。所以，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这种阶级产生的情况，就很自然地使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阶级是可以消灭的。阶级消灭不是伟大人物善良的愿望，而是客观的条件，就是生产关系、生产方式要改变，产生阶级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消灭了，那么阶级也就消灭了。产生阶级的生产方式是不是能够消灭呢？这在历史上早已有过证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阶级社会以前曾经有过原始公社——没有阶级的社会，指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也就完全证明阶级是可以消灭的。因为从前既然有过没有阶级的社会，那么以后也可以没有阶级。只要把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与一部分人丧失生产资料的情况消灭了，阶级也就消灭了。一部人占有生产资料这种情况是不是永久的呢？资产阶级学者认为是永久的，但历史事实证明不是永久的，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恩格斯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原始公社的问题，

他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是为了证明阶级是可以消灭的。

以上这些理论我们大家都懂得，用不着多加解释。最重要的是事实，事实上苏联已经是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了。当然在苏联还有工人与农民，还是要以两个阶级来看待，因为这两个阶级——工人与农民，在财产的关系上还是有些不同，还是两种社会意义所有制的集团，就是全民所有制与集体农庄所有制。这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在生产资料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集体农庄的产品是归集体农民所有，集体农民还有一些自己的生产资料，所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上是相同的；其他财产还是有些不同的。所以在苏联的宪法上还不是把工人与农民当成一个阶级。但这两个阶级的区别，不是像旧社会里阶级的区别，因为他们不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因为他们不是一方面占有生产资料，另外一方面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区别，而是占有生产资料形式上的区别。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工人与农民，他们是同一个社会里面互助合作关系的两个不同的集团。如果把他当做阶级来看，则是一种旧阶级形式的残余。

关于阶级的问题就讲到这里。

三、阶级是如何产生的？

关于阶级怎样产生的问题，也是很容易了解的。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阶级，也就容易了解阶级是怎样产生的了。阶级的产生是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分不开的，要产生阶级，就要使社会分裂为剥削与被剥削者的对抗的集团。首先就要使生产的发展可能发生剥削。基本上需要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到一定的水平，就是劳动者生产出

来的东西，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以外，还能有一些剩余的生产品。阶级社会中所以可能有剥削，就是因为有剩余劳动。所以，第一个前提，就是生产力要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有了剩余劳动可以剥削，但剩余劳动也不可能太多，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以外，所剩无几。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劳动者担负着很苦的劳动，因此劳动者就没有可能来发展自己的文化与知识，这就容易使剥削者能够利用一些狡猾的办法，来压迫统治劳动者。如果到了有了大工业这种生产力的时候，劳动者所生产出来的东西，不但有自己的生活所必需的，而且还有很多可以用来提高物质文化生活，这种生产也需要劳动者有比较高的文化，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就容易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就容易揭破剥削阶级的各种阴谋诡计，就能够产生自己的领袖人物。而在剩余劳动很少的情况下，劳动者是没有办法不受剥削的。

第二，就是需要有私有财产制度。仅仅有生产力的发展还不够，还需要财产归私人所有。这种条件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跟着私有财产制度也就产生了。为什么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就会产生私有财产呢？原因就是因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就会产生社会劳动的分工，最初的社会劳动分工是畜牧业与农业。畜牧业与农业的分工为什么会产生私有财产呢？首先，是因为这种分工引起了产品的交换。这种分工大半是以部落为单位；有些地方适于畜牧，有些地方适于农业，因此就有了这种分工。这种分工引起了互相交换产品的需要，这种产品交换是引起私有财产出现的一个原因。因为生产力发展了，平均主义就不大适合了，不能够刺激劳动的积极性了，生产力发展的本身就有了一种可能——私有财产的出现。但要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需要通过产品交换。产品交换首先是部落与部落之间，

有些部落的领袖，他们在交换的时候可以隐藏起一些产品来；以后部落中的成员也慢慢地进行交换了，因此私有财产就逐渐地扩大起来了。首先破坏了公有制度，后来生产资料——土地也归个人所有了。

私有财产产生以后，然后才可能产生剥削，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才有可能剥削丧失了生产资料的人。这种剥削制度怎样产生的呢?它的决定的条件也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私有制的产生，但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最初对奴隶的使用不是从内部产生的，即不是从氏族内部产生的，因为在氏族里面剥削人是不允许的，当时剥削最方便的来源就是俘虏，是从外族人开始的，把战争中的俘虏变为自己的奴隶。这种情况也首先是从氏族中的领袖开始的，因为他们是带军队的人，是最富有的，需要别人帮助他生产。最初的奴隶是家内奴隶制，在原始公社末期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奴隶制度，或者是家长奴隶制，因为当时是以老年的家长来支配一切的，奴隶就是在家长下面使用的。当时的奴隶只是家庭的帮手，多半做一些家里的事情，主要的生产任务还是公社氏族的成员来担任的。这种家长制的奴隶制，在四川边缘的地方的彝人就有这种制度，他们的奴隶就是汉人，他们把汉人抓过去变成他们的奴隶。这种奴隶不是世世代代地做奴隶，把工作做得好一点，奴隶主喜欢了也可能解放他，给他一块土地，或让他结婚。所以家内奴隶是奴隶制的萌芽。

由家内奴隶制进一步地发展，奴隶数量增加了，奴隶在生产当中成了主要的力量，不是使用在家内了，而是使用在土地上种地去了；氏族本身的成员不成为农业劳动中的主要力量了，这时候就开始正式形成奴隶制了。这种真正的奴隶制也是与部落之间的战争分不开的。原始公社将要垮台的时候，战争就很多，因为

使用奴隶有利，因此各部落间认为打仗是一件合算的事情，可以抢奴隶、抢财产，所以部落中的领袖就经常想打仗。恩格斯讲过，从前欧洲在原始公社末期，很多部落领袖养了常备兵，因为生产力稍微高一点了，养得起常备兵了，打起仗来也能够使军队扩大，因此战争就愈来愈多，战争变成了维持扩大军队的主要方法之一了。

在这种情况下，氏族里面就产生了完全脱离生产的集团，这种集团一方面要靠打仗来养活自己，另外在家里又专门靠奴隶来替他生产。所以带军队的人在家里就逐渐集中了很多的奴隶，他们成了生产中的主要劳动者，奴隶主就完全脱离了生产。这样，真正的奴隶制就产生了。

我们上面所讲的，是阶级怎样产生的过程。奴隶制的产生就是先从家内奴隶开始，然后进一步发展成为真正的奴隶社会。各个国家的历史经常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国家阶级的产生，并不会发展到奴隶社会，家内奴隶制度是有的，但并没有发展到奴隶社会。原始公社再进一步地发展就变为封建制度。苏联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俄国的历史就没有经过什么奴隶社会，原始公社进一步地发展就进入了封建社会。所以历史上的五种生产关系，是可以跳跃式地发展的，这种跳跃的原因当然有许多的具体情况，譬如俄国的原始公社经过很长时间才瓦解了，当时欧洲的许多国家已经进入了封建社会，俄国社会的发展就受到了这些影响，因此就由原始公社跳跃到封建社会。

原始公社还有一个特点，它到末期的时候，农业公社可以包含变为奴隶社会的因素，也可以包含变为封建社会的因素。主要还是原始公社有这个特点。原始公社末期，一方面使用奴隶，另外一方面，公社的领袖他逐渐开始用类似封建的剥削来剥削本氏

族的人，他可以用管理的方法来向氏族的成员抽税，这就已经包含了封建剥削的性质，因此就可以变为封建社会。

中国历史现在还没有搞清楚，究竟什么时候是奴隶社会，原始公社什么时候瓦解的，这些还都没有弄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是有奴隶社会的，中国的商朝就是奴隶社会，这是明确的。因为从古代帝王的坟墓中挖出来的东西来看，是证明了这一点。从帝王的坟墓中有的挖出几十个殉葬的人，这说明当时的一种迷信，就是帝王（奴隶主）死了，他还需要奴隶。所以奴隶社会在中国是有的。但中国奴隶社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还没有这个可靠的材料。有些传说证明原始公社到奴隶社会的规律，但不一定是事实。譬如中国商朝以前有夏朝，按照传说，夏朝的最初阶段就开始了奴隶社会。大禹是夏朝的第一个皇帝，因为他把洪水治好了，舜就把皇帝让给了他。从尧到舜到禹都是让位的。可是到了大禹做了皇帝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大禹死了以后也是想让位，被让的人名字叫益，但结果让不了，因为周围的人不愿意跟益，愿意跟启（大禹的儿子），结果就这样由启继承，皇帝就从此变成世袭的了。这是由于私有制产生了，而且相当巩固了，以至于皇帝也变成私有的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制度呢？就是因为新的生产关系产生了，当时大禹家里已经有了很多的私有财产，不是一个皇帝位子的问题，而是许多财产的问题。因为有了很多的财产，如果不让他的儿子去继承，那谁来继承呢？所以禹让位给益，这只是一种借口，这不是真心想让的，只是做一些样子看一看，让大家看一看你们是不是拥护启。老百姓是了解这一点的，也就假说拥护他。因为他是领袖，而且是带军队的人，他如果不做皇帝，兵是不会服别人的，因为军队在司令官的手里，大禹在做皇帝的时候，就使军队服从他的儿子。所以当他死了以后，

就不能不让他做皇帝。

以上这些事实是不是如此呢？当然不一定完全可靠，但这是古代传说留下来的，以上的事实可以说明私有财产的发生，以及皇帝地位的形成。中国的历史大体上只能够根据传说来猜测，比较清楚的就是商朝——奴隶社会。而像周朝初期是不是封建社会，这个问题还有争论。有人说周朝初期还是奴隶社会，有人说已经是封建社会，还没有统一起来。这方面我们的教科书就很难编定，讲历史也很难讲。毛主席早已说过，中国自周秦以来已经是封建社会，所以总的研究方向是有的。中央最近也想解决这个问题。大体上封建社会是从周朝开始，郭沫若就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周朝开始还不是封建社会；范文澜则认为周朝初期即是封建社会。中央已经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请研究历史的一些同志讨论这一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恐怕最短期间还不能获得解决，可能暂时统一为某一个说法，而不是最后决定下来。

我们认识大体上汉朝以后是封建社会，但苏联也有人认为东汉是封建社会，西汉是奴隶社会，因为东汉时代正是汉光武帝下令禁止奴隶的买卖，当然这个意见苏联同志也不大坚持。只有周朝一段是比较复杂的，的确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两种说法都有根据。说周朝是封建社会的，认为周朝已经开始把部下分封到各地去，开始占有土地。从这一点来说这已经是封建社会了。可是说周朝是奴隶社会的认为：周朝还是大批地买卖奴隶，郭沫若根据一些铜器上的文字，证明买卖奴隶多少、钱数多少等等，所以两方面都有理由。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不是现实问题，但我们也需要知道。

阶级产生的规律是说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正确，也就可以批判资产阶级的历史观点。刚才提到法国历史学家的时候，曾

说他们用武力征服作为理由来说明阶级的产生，这种思想就是“暴力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批驳“暴力论”，杜林就是主张“暴力论”的。这种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历史观点的主要成分之一，从资产阶级革命时起，法国历史学家就主张这种思想，后来又由杜林加以发挥，他称自己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实际上他是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来影响工人运动，他认为私有财产的发生是由于武力霸占的结果，因此阶级也是由于武力征服的结果而产生的。

这种“暴力论”的思想，一直到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还是坚持着，法西斯主义也就是“暴力论”，认为暴力征服好像是正当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帝国主义者，都是这种“暴力论”的思想。他们认为阶级既然是由于武力的征服而产生的，因此征服者成为统治阶级是正当的。所以这种思想到现在是一种最反动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者自始至终都是反对的，认为武力征服不是产生私有财产与阶级的根本原因。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评了“暴力论”，这不仅仅对杜林适用，对一切“暴力论”都是适用的。恩格斯说：在掠夺者占有了别人的财富之前，这个私有财产的结果早就存在了，所以暴力虽然能够变更所有制的面貌，但不能够造成私有私产的本身。这就是说，用武力去征服一个民族，霸占了他的财产，这种私有财产制度并不是由暴力引起的，行为暴力征服以前已经有了私有财产，武力征服的结果只能够扩大私有财产，所以不是暴力征服产生私有财产。

奴隶社会打仗的结果，主要是抢奴隶；封建社会打仗的结果主要是霸占土地；资本主义用武力征服的结果，还是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利润。所以恩格斯又说：掠夺方式终究是决定于生产方式。暴力不是第一位的原因，第一位的原因

终归是生产方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批判“暴力论”最基本的理由。这个理由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经过事实证明的。

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暴力论”的，但是不是就认为暴力一点作用也没有呢？虽然反对“暴力论”，但我们并不轻视暴力的作用，只是不能把暴力看成是第一位的原因——私有财产与阶级产生的根源。暴力在社会上有以下两方面的作用：

第一，就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以后，统治阶级总是利用暴力来巩固它的阶级统治，利用暴力来维持和加强现有的生产方式。所以暴力在剥削阶级的手中，可以成为剥削阶级巩固它的剥削与加强它的剥削的有力工具，也可以成为延缓它的阶级统治灭亡的武器。譬如美帝国主义早就应该灭亡，因为它手里掌握着了暴力的工具，它掌握着原子弹，原子弹是能够吓唬一些人的。它的武器能够维持它的统治，能够延缓它的阶级制度灭亡的时间。从这一点看，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不重视暴力的作用。

第二，暴力可以成为新的生产方式产生的推动的力量。马克思说：如果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已经在旧社会中孕育起来，就要依靠暴力作为它的“接生婆”，通过暴力使新的生产方式产生出来。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目的只有经过暴力的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工人阶级就是这样做的，不能够幻想用和平的方法去改变旧社会，一定要用暴力，反对阶级调和主义。即推翻了旧社会，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以后，仍要用暴力来巩固自己的政权。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对暴力是给予很高的估计。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说：国家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

所以，我们一方面反对“暴力论”，一方面又充分估计到暴力

的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面观点。

四、阶级与阶级斗争是怎样发展的？

我们讲了前面的几段以后，我们就能够很清楚地了解到：阶级的产生总是与生产方式的产生结合着的。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就是生产方式本身矛盾的表现，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本身矛盾的表现，也就是生产关系的发展总是多少落后于生产力的这种规律的表现。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情况是起阻碍作用的，就是说生产关系不能够及时地、主动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阶级社会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发展，就是反映生产方式矛盾的发展。不同的阶级社会，不同的阶级制度，是由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的。阶级社会制度基本上只有三种：奴隶制度、农奴制度、雇佣劳动制。这三种制度反映了三种生产方式：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以上这三种生产方式，是历史上三种阶级社会发展的顺序，就是说阶级社会的变更，是由奴隶制到封建制，再到资本主义制。首先是反映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就是首先反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由一种阶级制度变为另一种阶级制度，就表示由一种生产关系变为另一种生产关系，也就是生产关系的一种所有制变为另一种所有制的形式，更简单一点说，就是由一种财产关系变为另一种财产关系。所以阶级制度的变化，基本上就是财产关系的变化，讲得再清楚一点，就是财产由一个集团手里转移到另外一个集团的手里；一个集团的财产被剥夺，另外一个集团则得到了财产。这就是生产关系的变化，也就是阶级变化的实质。

从上面这一规律看来，就说明了一个社会的变化，没有暴力是不行的，没有对抗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

它要拼命保护它的生产资料，没有暴力是不可能剥夺它的财产的。所以财产的私有性，是阶级社会生产方式对抗性的根源。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所以是对抗的，就是因为财产是私有的。无产阶级之所以与资产阶级是对抗的阶级，就是由于财产的关系是对抗的，因为资产阶级拼命保护它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而无产阶级则要剥夺它的财产所有权。无产阶级不能够满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加以改良，因为这种改良不可能改变劳动者的生活。资产阶级总是要损害劳动者的，因此改良总是有限的，可能一部分劳动者生活改良了，而大部分劳动者的生活则更坏。所以工人阶级只能够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才能够达到自己的解放。就是像中国这样的社会，无产阶级已经是领导的阶级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是受限制的，但工人阶级还是受损害的，只要有资本主义，工人阶级还是受痛苦的，即使某些地方好一点，也好不到哪里去。梁漱溟说工人的生活是九天之上，这不是事实。当然个别工人的生活有好的，一个人可能一个月拿到一百多万元（旧人民币，下同），甚至二三百万元，不过这是资本家收买了的工人，这样的工人就不愿意再做工了，就要成天跳舞、大吃大喝，这是个别的现象。一般的工人每月也不过拿六七十万元，他还要养活一家人，所以生活还是不算好的。这方面生产力不能够很快地提高是一个原因，但资产阶级的剥削也是一个原因。所以不剥夺资产阶级就不能够根本地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要剥夺就是一种对抗的斗争，不管这种剥夺的形式如何，总是要靠暴力来支持。将来我们实行社会主义时，虽然不至于成为公开的对抗，但总要国家的暴力支持，这是事实。

所以，阶级矛盾的性质总是对抗的，不过在中国的条件下是采取非对抗的形式进行斗争。每一个阶级社会都有两个互相对抗的基本的阶级，就是奴隶与奴隶主，封建农奴与地主，无产阶级

与资本家。除了这些基本的对抗的阶级以外，当然还有其他的阶级，这些阶级可能是新社会的萌芽，也可能是旧社会的残余。我们分析具体社会的情况，就要注意到基本阶级的一些对抗情况以及其他阶级的关系。因为阶级社会的矛盾是对抗的，因此一定要通过对抗的斗争来发展，阶级社会发展的历史，也就是阶级对抗的历史。

下面我们具体地讲一讲几种阶级社会发展的具体规律。

一个阶级社会变为另一种阶级社会，就要消灭一种生产关系，变为另一种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是为了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我们革命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在奴隶社会里，基本对抗的阶级是奴隶主和奴隶，除了这两个阶级以外，还有自由的农民与自由的手工业者，他们有自己的土地与自己的工具，他们自己进行小规模的生产。所以小农不仅在封建社会里有，奴隶社会里面已经有了。这种历史上的小农与小手工业者是一种自由人。我们历史上常讲自由人，一种是奴隶主，一种就是农民与小手工业者。奴隶社会发展的过程，最初是奴隶主联合自由民共同来压迫奴隶的，奴隶主所组织的军队，主要就是依靠自由民，因为他不敢把武器交给奴隶。但是在奴隶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穷的自由民是受奴隶主的压迫的，首先在经济上受排挤，因为奴隶生产出的产品是很便宜的，在市场上就排挤自由民。小农生产也非常困难，他要借债，所以小农就逐渐变为奴隶主的债务人，最后还不起，只好变为奴隶。所以在奴隶社会里，阶级斗争的情况是两种：一方面是奴隶与奴隶主进行斗争，另外一方面还有奴隶主与自由民的斗争。这样一来，奴隶主与其他的自由民便不能联合了，从而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就愈来愈尖锐，最后奴隶起来革命，使奴隶社会垮台。

奴隶社会的垮台是不是地主阶级起来革命垮台的呢？我们院里也有个别同志有这种看法，认为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是地主阶级革命，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奴隶制度的垮台不是地主打垮的，而是奴隶打垮的。封建地主阶级是在奴隶社会垮台以后逐渐产生起来的。这种制度有时候是外力的原因产生的，利用占领土地而后成为地主阶级。也有的不是靠外力的，有些奴隶主看到奴隶起来了，他很聪明地就自动放弃了奴隶制，把自己的土地分给奴隶们，让他们每年交纳生产品，所以有些地主就是奴隶主变成的。按照郭沫若的认识，中国社会由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就是奴隶主变为地主阶级，中国的周朝就是一个过渡的时期，既有奴隶制的性质，又有封建制的性质。

以上就是由奴隶制变为封建制的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具体情况非常复杂，大体上就是这样发展的。

封建社会里，基本的对抗阶级是地主与农民，可能还有一些奴隶制的残余，奴隶社会垮台以后，有的奴隶又变成了家内奴隶。我们中国以前皇帝用的人就是家内奴隶，地主阶级家里也有奴隶，像《红楼梦》上，贾宝玉的家里就有一些奴隶，特别还有一些女的，像袭人、晴雯等，作者把她们描写成为很有才能的人。我们有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大概也都见过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因为已经是残余了，所以不能成为一个阶级。封建社会里除了地主与农民以外，就是城市里的市民，包括商人与小手工业者，手工业者里面又有行东，帮东，后来行东就变成了资本家，这一些人就组成为市民阶级。在封建社会里，最初是一个市民阶级，在最初没有分化的时候，他们都是受地主阶级统治的。所以在封建社会中，主要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再加上市民与地主阶级的斗争。在封建社会中，与奴隶社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阶级与等级常常是

一致的，不同的阶级就是在经济上不同的集团，同时在法律上也规定了不同的权利与义务。地主阶级就有一些特权，可以随便买卖农奴，可以打骂农奴，甚至于可以随便杀死农奴。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的等级，不仅仅是法律上的问题，而且是人格上的依赖的关系，身份上没有自由，这在旧社会中就是常说的所谓“门第”，有很多礼节不能共同的，有很多习惯也是不能共同的，形式上是很严格的。

所以，在阶级社会中，等级把阶级掩盖起来了。在法国革命的时候，把资产阶级说成是第三等级，就是把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划在一起，因为当时在法律上把资产阶级与劳动者的权利与义务规定是一样的。譬如，封建贵族组织议会，在议会上贵族坐在前排的椅子上，资产阶级与劳动者就坐在后面，或坐在旁边。所以有的资产阶级就想起来革命了。但是在封建社会里打击地主主要是靠农民的力量，农民是推翻封建的主力军。农民的优点是反封建，弱点是无组织，因为他们是小生产者，所以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斗争是自发性的，所谓自发性就是看不到远大的目标，只知道受压迫就起来反抗，但对以后的前途没有什么办法。所以农民进行斗争必须要有具有远大目标阶级的领导，不然农民总是要失败的。农民的暴动可以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可以动摇它的基础，但不能获得最后的成功。在中国有很多次的农民暴动，动摇了封建统治阶级，譬如，太平天国是动摇了清朝的基础，但还是没有战胜清朝统治，最后革命还是失败了。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间，农民成了主力军。但是，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那农民的斗争就是要混乱的，甚至于就要失败。当然对农民领导错了也是不行的，土改当中我们有的地方领导的不好，那些地方就是一片混乱，变成为自发的运动，地主阶级打

倒了，但农民自己也打击了自己，因为农民不能集中一个目标到地主身上去，不管是谁，只要过去对他有点不好的，他就要起来报复一下，这样就容易被地主阶级利用。所以农民必须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农民没有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他总是自发的。领导农民的，不是资产阶级，便是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倘若没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就要利用农民来夺取统治权。就是在新中国，资产阶级也总是想利用农民，我们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任务之一，就是农民斗争的果实是归资产阶级所有，或是归农民、劳动人民所有。资产阶级是力图得到领导权，想尽各种办法取得农民斗争来的胜利果实。对这一问题，我们就要用很大的力量，不能够随随便便地去反对它，因为这不只是资产阶级的活动，而且还影响到小资产阶级的问题，甚至于农民也受到影响，自发地进行资本主义的活动，这我们是要坚决反对的。

在封建社会中，关于阶级斗争的情况，大体上就是如此。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将来学政治经济学还能够详细地去研究，现在我们只简单地谈一下。基本的对抗的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除了这两个阶级以外，还有从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的农民与小手工业者，他们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以个体劳动为基础。资本主义的特点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不同，就是阶级与等级有区别了，在法律上、形式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平等”的了。当然在一些国家中，封建的等级制度还是存在的，像英国还有这种情况，还有皇帝，还有伯爵、公爵；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德国的希特勒也曾想恢复等级制度。所以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封建的残余还是有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讲一下，就是不但阶级

与等级有所区别，而且社会阶层与阶级也是有区别的。所谓阶层就是有职业与生活上的特点，不是生产关系的区别，也不是法律上的区别。这个阶层主要是知识分子。在封建社会中也有知识分子，但没有形成一个广大的社会阶层，因为知识分子比较少，大部分又集中在统治阶级的周围。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才形成了一个非常广大的阶层，这个阶层中间又有上层、中层与下层之分。上层知识分子是为封建买办阶级服务的，大学教授也是上层知识分子。中层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差不多，如一个人开一个医院，生活也不坏。还有下层的知识分子，如小学教员、小职员，这个阶层几乎与无产阶级一样。

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这个阶层，苏联的宪法就把农民、工人、知识分子规定为三种不同的公民；但如果讲阶级就只有两个——工人与农民。知识分子在旧社会中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新社会中则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就逐渐工农化了。我们改造知识分子，主要就是改造他的资产阶级思想。知识分子是具有小资产阶级的特点，但主要的毛病还是资产阶级的毛病。我们党内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实际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我们在内战时期，党内展开斗争的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现在我们革命胜利了，与资产阶级联系很多，所以现在我们在党内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

总之，把知识分子看成是一个阶层是正确的，把知识分子看成是一个阶级是错误的。认清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的特点。我们就可以正确地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我们是很重视知识分子的，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要起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团结他们，并改造他们，以使得我们的革命事业更顺利地前进。所以谈到资产阶级，就一定要估计到知识分子的作用。

第二次讲课 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1953.11.25）

今天讲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第二部分——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共分四点来讲：

第一，无产阶级的特点；

第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形式；

第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组织；

第四，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后目标。

这些问题都是辩证唯物论的具体化，把辩证唯物论运用到研究阶级具体地说明无产阶级及其斗争的问题。有许多具体问题大家都可能了解，所以我们主要是把一些重要问题提出来说明一下。

一、无产阶级的特点

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里面所产生出来的阶级，这一个阶级是革命最彻底的阶级。历史上也曾经有过无产阶级，如奴隶社会中就有，这个阶级一般是叫无产者，他们是由小手工业者、自由小农破产以后，没有任何职业，就在城市里面流浪，他们一无所有。但这一个无产者与我们现在所讲的无产阶级不同。这个无产者是带有游民性质，是不肯劳动的，以过寄生生活为荣。所以奴隶社会中有一个特点，就是看不起劳动，把劳动看成是奴隶的事情，认为劳动是最可耻的事情。所以凡是能够不劳动的人都尽量不劳动。奴隶社会的科学家认为研究科学都是可耻的事，认

为动手动脚与奴隶差不多，所以当时研究科学的人都事先声明一下，他说：我研究科学是为了消遣。所以当时的自然科学就很不进步，技术就不能够提高。

在奴隶社会中的自由民破产以后，他们就很不愿意找职业，而是成群结队向政府要饭吃，政府为了维持也不得不给他们一点生活资料，譬如开大会，政府想决定一件什么事情，就把这群人集合起来，发给他们一些钱，或给一些吃的东西，因此他们就拥护政府的主张。所以自然而然地就变成为统治阶级的走狗。政府利用他们，也就得养活他们，当时的无产者就是这样地过着寄生的生活。

马克思在他比较早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做过这个比较，就是说，早的无产者是靠社会生活的，而现在的无产者是社会靠它生活的；早的无产者是过寄生的生活，现在的无产者则是担负着社会的全部生活。

现代的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特殊的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革命的阶级，奴隶起过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起过革命的作用，农民也起过革命的作用，但历史上所有的革命阶级，它们的革命性都是有条件的，革命性的范围不大，革命性都是有限制的。所谓有限制，就是因为与它自己的利益有限制，仅仅是在触犯它自己利益的时候他才革命。譬如资产阶级以前是革命的阶级，但资产阶级仅仅是在反对封建这一点上是革命的，因为反对封建不会触犯它的阶级利益。中国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但仅仅是在反帝、反封建这一点上是革命的，而且还是不彻底的，因为太彻底了就要触犯它的阶级利益。不仅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如此，过去各国的资产阶级都是这样，反封建太彻底了，资产阶级总是不愿意的，因为反封建彻底了，就是推翻

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彻底地推翻地主阶级的特权与制度，彻底地发动农民群众与城市的市民群众。在历史上只有一次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法国大革命，但最后还是被资产阶级破坏了。因为这种彻底的革命，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有威胁，把贫民发动起来以后，面包怎样分配就有问题了，就需要资产阶级把面包卖得便宜一点。贫民起来以后不但反对封建势力，而且还要触犯资产阶级的利益，那资产阶级自然就不同意了。当法国革命高潮的时候，是小资产阶级支持的，大资产阶级是在旁边看着的。

奴隶的革命性也是有限制的，奴隶只是想废除奴隶制，只知道要自由，解放了以后怎样呢？他是不知道的；而且奴隶革命的理想是反动的，因为奴隶社会是离开原始公社不久的社会，奴隶暴动总是想回到原始公社制度中去，而不是想前进一步，因为前进一步就是封建社会，奴隶是不想建立封建社会的。

所以，资产阶级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革命的；奴隶革命的理想是倒退的；农民是得到了土地就认为革命完结了。我们的干部中有一些农民出身的人以前就曾经有这种思想，认为革命胜利了，可以回家了，这种思想经过批判，现在大概没有了。另外一方面也因为城市工业有发展，农村中组织了生产互助组织，再经过思想上的教育，这种农民思想是克服了。关于革命是谁领导的问题，以前也有争论，农民出身的干部总以为革命是农民领导的，认为共产党也是“农民党”，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就很不高兴。当时我们为了批判这种思想，曾进行了许多的工作。少奇同志号召整党，提出了党员的八条标准，里面有几条都是与批判这种思想有关系的。有的人不了解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把党看成是“农民党”，把党限制在农民利益的范围以内，按照农民的利益来进行革命，所以我们就提出了许多解释。我们党员虽然有很多是

农民出身，但并不等于党就是农民的党。首先我们党的物质生活不是农民的生活，而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这种物质生活就决定了我们是无产阶级，再加上我们有马列主义的教育，所以无论物质与精神都是无产阶级的。

中国的这种情况，外国人也有一点不了解，认为中国党农民成分这样多，为什么是这样一个坚强的党呢？我们中央派了代表团到苏联作了报告，苏联同志都认为是一件很新鲜的事情，确实是各国共产党中间很特殊的一件事情。从这里证明，党员虽然是农民出身，但不受农民思想的限制，他的革命性就不同了。如果我们党真是农民党，那就不可能在土地革命以后还进行革命，如果是完全表现农民的利益，当我们打到北京以后，我们革命就要停顿下来，像李自成进了北京，太平天国洪秀全进了南京一样。因为农民就是这样眼光短小，没有远大的革命目标。

所以其他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阶级，其革命性都是有限制的、有条件的。只有当符合它的阶级利益的时候它才革命；如果革命不完全符合它的阶级利益，它就不革命。所以任何一个无产阶级以外的阶级，其革命性都是有限制的。而且有些阶级只能够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它才是革命的。譬如中国的农民与资产阶级，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是革命的。中国革命中间，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可说是达到顶点，除了苏联的农民以外，中国农民的革命性是最大的。在彻底反帝反封建以后，还要跟着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农民的这种革命性，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在 1929 年写过中国革命的问题，说明中国农民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他们的革命性发挥到了绝大的程度。

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其他阶级，甚至能够利用反动派的力量，这

就说明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是最彻底的。当然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并不仅仅表现在这一点上，主要是无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斗争中没有任何顾虑，不会有革命中断的现象，不能够在某一个时期认为革命就够了，满足了。凡是在革命队伍中认为已经满足了的人，这就说明在这个问题上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如果我们感觉做了一些工作就够了，这就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无产阶级在要求进步这一方面是没有止境的，是不断地求进步与革新，不断地进行改造。换一句话说，也就是对于一切落后的东西，对一切应该丢掉的东西，对一切坏的东西，毫不抱妥协态度，毫不留恋，这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无产阶级以外的阶级对旧的东西都是有所留恋的。奴隶留恋原始公社，农民留恋土地，资产阶级拼命维护它的剥削制度。所以只有无产阶级对任何坏的东西才是不妥协的，把革命斗争进行到底的。

无产阶级为什么能有这样的革命彻底性呢？无产阶级所以能够如此，这并不是偶然的，是有它的条件的，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生产关系方面。无产阶级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是一无所有的，它跟农民与奴隶都不同。奴隶连自己的劳动力也是别人的，奴隶是完全没有自由的；农民有自己的劳动力，也有自己的生产工具，所以农民不是一无所有。农民阶级是接近小资产阶级的，因为它有一点私有财产，所以革命就有一些留恋旧的东西。无产阶级是一无所有，因此在战斗中间就毫无顾虑，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光明的前途，战斗起来就毫无所惜。《共产党宣言》中讲过，无产阶级起来革命只是失掉一件东西，就是一条锁链。这样一个阶级的条件，也就决定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第二个特点，是生产力方面。无产阶级是与大工业相联系的，

无产阶级以前的劳动者都没有这个条件，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是在大工业当中生长出来的，大工业训练了无产阶级。大工业的生产是具有社会性质的，就是有组织而且又很集中的这样一个特点。因为资产阶级要办工厂，所以自然而然地就训练了无产阶级成为一个有组织的部队。马克思讲得很俏皮，他说：资产阶级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无产阶级受了这种训练，因此它是最能团结一致的，是最有组织性的，组织是无产阶级最主要的力量。无产阶级在没有得到政权以前，就是由于组织力量还小，无产阶级所以能够胜利，组织是一个很大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所以相信无产阶级一定能够胜利，比任何其他阶级都优越，就是看到了它与大工业相结合的条件。正因为无产阶级有这个条件，所以它是不可战胜的。

大工业另外的一个特点，就是增长速度很快，所以无产阶级不但是团结一致的，而且这个队伍是愈来愈大，除非资本主义不发展，只要资本主义发展，无产阶级也就一定发展。资产阶级没有办法，因为它要赚钱，就只能把为它挖坟墓的人也培养起来。

无产阶级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它的先锋队里面。它是最有组织、有纪律的，违背组织、违背纪律，对共产党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违背党章的问题，还是无产阶级的立场问题。我们在党章上规定了无产阶级应该有组织、有纪律，这是按照无产阶级的特点来规定的。我们对分散主义、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一定是要反对的，因为这是与无产阶级的特点不相称的。无组织无纪律，以及分散主义，这是农民的倾向、小资产阶级的倾向，甚至于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倾向。一般来说是农民的倾向，小资产阶级也有分散主义的特点。在革命没有胜利以前，在我们党内所反映的思想，主要是农民思想；而当进城以后，由于我们与资产阶级联系较多，

所以在党内所反映的思想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所犯的一些错误的性质，都是违背了无产阶级的特点，特别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贪污腐化算不算无组织无纪律呢？当然算无组织无纪律。我们在财经工作方面犯右倾的错误，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同时也是无组织无纪律，有些问题是很露骨的无组织无纪律。譬如实行新税制，不是先向中央请示，而是先与资本家商量商量，这就是非常露骨的无组织无纪律，这种错误产生的原因就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

所以，凡是违背了无产阶级的特点，都是反映了其他阶级的特点。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今天，主要是反映了离开无产阶级的立场，受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必须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行动，必须要有高度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只有这样行动才算是与无产阶级的称号相称，才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称号相称。无产阶级之所以是革命的阶级，主要就是由于这样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从生产方式中来的，因为它是无产者，再加上大工业，这两方面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要站在无产阶级这一方面，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告诉了我们无产阶级有这些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是首创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的出身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马克思的家是在德国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的莱茵河；恩格斯的家庭就是资产阶级。但他们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认清了无产阶级的特点，因为他们是要革命的，所以就把无产阶级的立场作为自己的立场。

列宁、斯大林出身都不是无产阶级，但他们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看清了无产阶级是最进步的阶级，因此就走到无产阶级的队

伍中来。斯大林这样说："既然无产阶级是惟一的不断成长和不断壮大的阶级，是惟一的将社会生活向前推进、把一切革命分子聚集在自己周围的阶级，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它是现实运动中的主力，应该加入它的行列，把它的先进的愿望当做自己的愿望。"(《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76页)这一段话大体上包含以下三点意思：1. 无产阶级是彻底革命的阶级，它是不断增长不断把社会推向前进的阶级；2. 因为它是最革命的阶级，所以它是天然作为革命领导者的阶级；3.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首先应该承认无产阶级是主要的力量，就应该站到它的行列中去，并把无产阶级的先进愿望当做自己的愿望。

斯大林是这样讲的，列宁也是这样讲的。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说："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页)

所谓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什么意思呢？所谓革命的领导力量，就是要能够走在一切革命势力的前面，比其他阶级更前进；同时还要团结一切的革命势力，把它们集合在自己的周围。这是作为领导阶级不可少的特点。

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是不能够孤军作战的，无产阶级主要是应该联合农民。这种思想从马克思起，一直到列宁、斯大林，以及毛主席，都是这样认识的。能否联合农民的问题，这是区别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者的主要标志之一。机会主义者只是表面上讲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因为它不要农民，所以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如果不团结农民，也就不能够团结其他的阶级，因而无产阶级也就一定是孤军作战。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对资产阶级起领导作用呢？首先就是因为有一个工农联盟如果没有工农联盟，

资产阶级是不能接受我们领导的。因为资产阶级是一个很软弱的阶级，又是一个很狡猾的投机的阶级，它是看风头说话的，如果在它面前暴露力量不够，它就不会接受你的领导。资产阶级在革命过程当中是不断动摇的，动摇的原因除了因为它本身是资产阶级以外，就是因为以前还有旧势力，它看到我们力量还不大，不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胜利，所以它就老是摇摇摆摆。但我们联合了农民，我们不是孤军作战了，农民在我们领导之下，建立了强大的工农联盟，建立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因此资产阶级就一步一步地靠拢我们了，勇敢的先靠拢了我们，动摇的靠拢我们慢一点，有一小部分就不过来了，而投靠了蒋介石。所以，我们必须先把农民团结起来，把农民集合在自己的周围。这是作为一个领导阶级的无产阶级要掌握领导权时，首先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里面说过联合农民的问题，最初农民对拿破仑有幻想，等到以后拿破仑做了皇帝，还是照旧压迫农民，农民仍旧受苦，于是农民就逐渐对拿破仑丢掉了幻想，而走到了无产阶级方面来。在当时马克思已经有了这种思想，——联合农民的思想；可是第二国际以后就把这种思想抛弃了；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都是抛弃了这种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最后由列宁、斯大林恢复了，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这是在政策上与思想上的主要因素之一，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工农联盟的思想。

我们中国革命所以能够胜利，就是由于毛主席正确地掌握了工农联盟的这样一个基本力量；像陈独秀则是反对农民运动的；“左”倾冒险主义也是不善于联合农民的，他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口头上是联合农民，坚持土地改革，主张建立红军，但由于他们所执行的政策是脱离农民的，特别是对待中农的问题是

错误的，他们联合贫雇农这一点是没有错误的，但脱离了中农，因此就不能很好地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能够使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起来，所以也就不能表现出无产阶级的特点。

列宁在1920年所写的关于反对自由主义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讲过这个问题，他说：无产阶级不仅在认识上，而且还要实现了领导权这种思想的时候，才算是革命的。这就是说，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那就必须认识了和实现了这种领导权，否则还是不能够起到革命作用的。

关于无产阶级的特点就讲到这里。

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形式

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形式很多，我们研究矛盾法则的时候，已经讲到过这个问题。要进行斗争，而且要斗争到底，就要讲形式，要区别不同的斗争形式。

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是很多的，有：合法的、非法的、公开的、秘密的。但基本上也只有三种：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各种的斗争形式都可以概括到这三种形式里面。武装斗争也就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因为进行武装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政治，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继续。我们研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我们就应该研究这三方面。

首先，就要研究经济斗争的形式。

什么是经济斗争呢？经济斗争是为了保护无产阶级的直接的利益，也可以说是保护无产阶级日常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譬如缩短工作时间，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这个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经济上的要求。这种斗争有没有必要呢？在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工人阶级的利益经常受到损害，如果不进行斗争，那

损害就要更大，所以这种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一个规律，就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规律。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一天一天地贫困下来，这种贫困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绝对的。所谓相对贫困，就是说社会全部生产品分配给无产阶级的这一部分相对减少。譬如说去年资产阶级从社会全部生产中拿去百分之六十，无产阶级拿到百分之四十，经过了三年以后，资产阶级拿去百分之七十，无产阶级只拿到百分之三十。这就表明在全部国民经济收入中，无产阶级的收入比例逐渐下降了。这就是相对的贫困化。但是绝对的收入数字还是可以增加的。譬如我们现在的国营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的是私人资本主义减少了，从前私人资本主义占百分之六十，现在占百分之四十，这是相对的数字减少了。但是私人资本主义绝对的数字还是增加了。因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了，虽然国营经济发展得更快，但私人资本主义也跟着发展了。所以无产阶级所得到产品部分是相对减少了，但绝对数字也可能多一点。譬如以前的收入是百分之四十，其工资是每天1万元，但到后来总收入是百分之三十，但其工资实际上也可能是1.5万元。能否有这种情况呢？这种情况是可能有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也证明了这一点，就是工人阶级不但相对的贫困化，而且也绝对的贫困化了。譬如以前一个工人每天收入1万元，到后来只收入七八千元了，实际数量也减少了。资本主义的情况就是如此，无产阶级不单是相对贫困的问题，而且是绝对贫困的问题。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经常受到损害的，因此无产阶级为了经济的利益进行斗争是不能停止的，因为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的确是一天不如一天的。在旧社会里，无产阶级所进行的这种斗争应该不应该给予支持呢？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应该不应该去领导经济斗争呢？肯定地说，是应该支持与

领导无产阶级这种经济斗争的。因为这是无产阶级切身的利益，不去领导与支持就要犯错误，就是脱离群众的错误。不过要注意一点，我们说开展经济斗争，是说的在旧社会里面，不是在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还要组织无产阶级去进行经济斗争，在新社会里就不用这样了。我们工会工作中李立三同志所犯的错误，就是忘记了新社会与旧社会的不同之处。在新社会里，我们能够主动地去注意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工会也可以帮助工人提出经济上的要求，但不是搞经济斗争。当然现在还有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这方面还是有斗争的，这种斗争主要是靠和平的方式、劳资协商的方式，但这是一种斗争。一般来讲，在新社会里的工会工作，就不能够把组织经济斗争当成主要的任务，把为了争取经济利益当成工会的主要工作是错误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工会不要管工人的生活问题，如果完全不管也是会犯错误的。在新社会中工会的主要工作应该是组织工人进行生产竞赛，启发工人的自觉性，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适当地注意提高工人的生活福利。

上面我们讲了一定要支持与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但经济斗争是有限制的，经济斗争的目的，绝不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真正目的，而只是一个直接的眼前的利益，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整个阶级利益问题，只是无产阶级局部的利益。为什么经济斗争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主要目的呢？因为这种斗争只能够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面来要求改善工人的生活，但要根本改善工人的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根本改善工人生活的状况，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因为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时候，基本上无产阶级是绝对贫困化，不是相对贫困化，不可能根本改善工人的生活。一部分工人的生活改善了，其他工人的生活还是没有得到改善。英国有工人贵族，资本家把他们的

生活改善了，改善得与资本家差不多，银行中有存款，衣服穿得很漂亮，工人给他们一个名字，叫穿白领子衣服的工人。这是特殊的情况，整个工人阶级的生活还是愈来愈坏，不能够得到改善。

所以，无产阶级真正革命的目的，只能够是消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消灭，进行改良是不可能的。在新社会中就没有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了，但在新社会里面，如果工人阶级只注意经济利益，也是同样只能够局部地改善工人的生活，而不能全部改善工人的生活。在新社会中主要是要靠生产的提高，新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现在已经是向社会主义社会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首先是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不断提高，然后才能满足整个社会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个规律毛主席早在延安已经提出来了，就是："发展生产，保证供给"八个字，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现。所以单纯注意日常利益，对工人阶级不是根本有利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注意经济斗争这是一种偏向，这种偏向就是经济主义，经济主义也就是改良主义，也就是使工人阶级不要去触犯资本主义，因此就帮助了资本家使工人阶级永远贫困下去。

在新社会中，经济主义就阻碍了生产的发展，使工人生活趋于腐化，只注意穿的好、吃的好，整天吃喝玩乐，因此就放弃了生产的任务。经济主义在我们的生产中有很大的坏作用，工人对劳动纪律根本不遵守，缺勤率很严重，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所以经济斗争最多只能够维护工人阶级日常的局部的利益，经济斗争不能够根本解决问题。但我们不能够说经济斗争在旧社会一点作用也没有，因为它能够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最主要的还是通

过经济斗争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首先是提出经济上的要求，通过经济上的要求把工人组织起来以后，就要进行政治斗争。我们可以看一看《联共党史》的第一章，列宁通过工人了解工厂里的情况，然后根据工人的情况写传单，在这个传单上就把工人生活的痛苦情况充分地描写出来了，同时又适当地提出经济上的要求，最后又提出了政治上的要求。列宁领导工人运动就是这样，任何时候都要把政治要求适当地提出来，不是一下子就把共产主义的要求提出来，而是按照不同的情况提出来不同的要求。

总之，无产阶级的斗争不能仅限于经济斗争，应该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列宁说：政治是经济集中的表现，就是包含了这个意思。因为经济斗争一定要发展为政治斗争，并且应该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所谓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就是政治是把无产阶级的全部利益集中起来了，所以政治斗争是更高的斗争形式，经济斗争是初级的斗争形式。政治斗争中也包含着许多具体的形式，有比较和平的斗争形式，有激烈的斗争形式，也有公开的以及秘密的斗争形式，所以政治斗争的范围是很广的。政治斗争的根本任务是要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是要取得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权问题则表现阶级的根本利益，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巩固新政权。在新社会中所提出的爱国主义的口号，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口号，目的就在于巩固新政权，号召工人阶级爱自己的祖国。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不在增加一点工资，而在于把既得的政权巩固起来。所以政权问题是政治的根本问题，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是政治的根本目的，但政治斗争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的。譬如和平的形式，在旧社会中议会斗争，像我们参加蒋介石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另外还有激烈的斗

争形式，由武装暴动一直到革命战争，这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这些就是政治斗争的具体形式。

关于政治斗争的种种形式，无产阶级要善于很好地去利用它，在不同的情况下，利用不同的斗争形式，各种形式都有一定的作用；但要有一个分别，就是最高的形式是武装斗争，因为只有革命的武装斗争，才能解决政治上的根本问题——政权问题。其他各种的斗争形式都是为了解决政治上的根本问题所采取的一些准备手段。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讲得很清楚，他说：议会斗争、游行示威等等，“其中任何单独的一种形式都不是无产阶级能够借以摧毁资本主义的决定的手段。单靠总罢工是不能摧毁资本主义的：总罢工只能为摧毁资本主义准备某些条件。决不能想像无产阶级只要参加议会就能推翻资本主义：利用议会斗争只能替推翻资本主义准备某些条件罢了”。（《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13页）

政治斗争也可以有其他的内容，譬如英国在十八世纪有一个宪章运动，它就是要求政治目的的一个组织，这个运动的要求就是在国家的宪法中规定进去工人阶级的地位；而不是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所以这还不是政治斗争的主要任务。政治斗争的内容还是要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列宁在1931年2月革命的时候曾提出过：革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政权问题。所以对政治斗争不仅要注意到它的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它的内容。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无产阶级只有在进行斗争时包含了政治方面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彻底地展开阶级斗争，才能够免除限制在细枝末节上，而触到最根本的东西。这是与自由主义者们所讲的一段话，因为自由主义者进行斗争时总

是限制在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上。我们中国以前也有人想组织“好人政府”，在1923年的时候，胡适就想组织一个“好人政府”，认为换一批人就可以把政府搞好。他写了很多文章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要求想做官，这群人中间还有王宠惠。他们这个要求也起了一点作用，北洋军阀给了一个部长的位子让王宠惠做。后来胡适就找王宠惠说：你现在做了官，你还要想办法把我们都拉进去才好。王宠惠答复得很妙，他说：我是以我个人的名义进入政府的，不是以这个集团进入政府的。这个例子就是资产阶级想在政治上搞一些细枝末节，只是要求某一个人的良心好一点。譬如袁世凯要做皇帝的时候，梁启超就写文章说，你不要做皇帝，还是做总统比较好。这也是政治上的一些细枝末节，也就是一种改良主义。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定要发展为政治斗争，而且要抓住政治斗争最主要的东西，只有这样才算是展开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如果斗争没有成为政治斗争，或没有抓住主要的东西，这还不算是完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以马克思说：一切的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所有的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是说一切的阶级斗争都应当是政治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式的话。这句话常常被一些机会主义者所曲解，他们说：既然一切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那么经济斗争也就是政治斗争了。所以马克思主义者讲政治斗争时就要区别政治斗争的高级形式与低级形式，高级内容与低级内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有发展到政治斗争的根本问题时，才算是觉悟的阶级斗争才算是彻底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自觉与自发的区别，与经济斗争是有联系的，但是，阶级斗争如果老停留在经济斗争的范围内，那就不是自觉的阶级斗争。

政治斗争是需要思想领导的，所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又应该有思想斗争的形式。思想斗争是保证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能够开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为了使政治斗争达到更高的阶段，就需要有思想斗争，因为进行政治斗争需要无产阶级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如果无产阶级不觉悟，只看到眼前的利益，那就不能够进入政治斗争的高级水平；如果无产阶级有很高的觉悟，就应该使无产阶级脱离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经济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表现，因为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就是把眼前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们工会中间的经济主义也就是受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如果我们只注意眼前的利益，资产阶级就有办法收买工人，就能够使工人不注意爱国主义思想，就容易使工人与我们国家分离。譬如工人要提高工资，要求得很高，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不可能使工人工资提得太高，我们希望工人的生活在一定的限度内提高。这样一来，不觉悟的工人就不满意我们了，资本家就可以从中挑拨。这就是资产阶级与我们做斗争的方法之一。资产阶级就是利用经济主义的思想使工人阶级离开我们，而我们的工会又用经济主义的思想去领导，那就一定要上资产阶级的当。所以要想脱离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就要进行思想斗争，要揭露资产阶级的思想本质。

列宁、斯大林在1930年时反对经济主义，就明确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斯大林写的《略论党内意见分歧》，就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我们的工会工作都不敢宣传共产主义，不敢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是自己解除武装，用落后的思想来影响劳动群众，这就阻碍了社会的前进。所以我们要用先进的思想——马列主义思想，来反对落后的思想，这样才能够使工人阶级觉悟起来。先进思想的作用是很大的，斯大林说：先进思想有组织群众、动员

群众、改变社会制度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不经过斗争是不能发挥的,先进思想是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作用的,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也是与斯大林同时讲的话。

旧的思想影响也不是完全是自发的，有时候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方法之一就是模糊它的阶级意识；除了日常的自发影响以外，它还有系统的有意识的宣传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我们就更需要与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

思想斗争，是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首先来进行，在工人阶级斗争里面要使工人提高觉悟，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这就是说思想斗争不是在工人运动中间自己产生的。列宁与斯大林都讲过这样的话。列宁的《做什么?》与斯大林的《略论党内意见分歧》，都说过工人的自发运动不产生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是要靠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从外部输入到工人中间去。社会主义思想是工人阶级的思想，那么为什么又不能在工人阶级中间产生呢？就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思想是科学，既然是科学就不能在工人阶级自发运动中间产生出来。因此就要经过科学的研究，经过倾向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首先去创立，然后才能够输入到工人中间去。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也是如此，也是由先进的知识分子在“五四”时受到锻炼，然后再走到工人中间去，这是无产阶级斗争的规律。这也说明我们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不要以为现在工人阶级已经是国家的主人了，自然而然地就有马列主义，就不需要去宣传了，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学了马列主义的人不去进行宣传工作，我们学到的东西就不能成为实际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要掌握了群众才能够成为实际的物质力量，要能掌握群众，就需要做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群众由自发到自觉的一个中心环节。思想当然是客观物质的反映，物质

决定精神；但要使物质的运动变成自觉的，那就又要靠精神——思想工作来启发。归根结底是物质决定精神，新的思想是新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但推动运动加快发展，那又是新的思想起决定的作用。

这就是思想斗争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思想斗争，无产阶级是不可能觉悟的，因此，也就不可能使斗争提高到应有的政治水平，也就不能使革命达到胜利。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应该把各种斗争形式结合起来，而这个斗争是要由初级斗争的形式，发展到高级的斗争形式，这种发展是经常存在的，因为斗争经常有自发的形式，我们就要经常注意把它提高。在旧社会中斗争是由自发到自觉，在新社会中也有许多运动是由自发到自觉。譬如我们今天的建设工作，如增产节约、劳动竞赛，起初是少数人自发的，这种自发的思想可能受到一些保守思想的抵抗，我们就要开展这一运动，支持这一运动，广泛宣传这种进步的思想，使保守思想得到克服，这样，这个运动才能成为群众性的自觉的运动。要把自发的运动变为自觉的运动，一定要使工人、农民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使眼前利益与长远的利益结合起来，使国家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就是能够使群众为远大的目标而奋斗。譬如生产竞赛运动，不仅仅是发展生产的运动，而且要使工人了解能够巩固我们国家的政权。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群众的思想水平，以及明确斗争的主要方向。

关于第二个问题就讲到这里。

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组织

斗争的组织与斗争的形式是分不开的。我们的斗争形式有初

级的和高级的，有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我们要通过高级的斗争形式来实现我们的目的，主要是实现我们的政治任务，特别是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就必须有一个斗争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共产党的组织。无产阶级的特点就是有组织。组织也有种种，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说：有工会组织，有工人合作社的组织……这些都是无产阶级的组织，也都是必需的。这些组织是不是能够完成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呢？单靠这些组织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它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初级的组织，斯大林告诉我们，工会与合作社组织都是适合工人阶级进行经济斗争的要求，职工会的目的只是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来改善工人的状况，而反对工业资本。合作社的目的是为了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降低第一必需品的价格，以扩大工人消费量来反对商业资本。这个分析是非常正确的，虽然它们都是反对工业与商业资本的，但还只限于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所以它只适合经济斗争的要求，而不适合政治斗争的任务。

斯大林指出这两种组织，虽然为了发展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是必需的，并且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比较有利的组织手段，但无论如何还是不能满足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需要，只能满足无产阶级暂时的需要，因为无产阶级的需要是为了使自己的阶级从资本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因为整个工人阶级是绝对贫穷化。所以斯大林就说：“因此，还需要一个能把各行各业工人中的觉悟分子集合在自己的周围、能把无产阶级变成觉悟的阶级，并以粉碎资本主义制度和准备社会主义革命为其最主要目的的组织”（《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16页）。这种组织就是先锋队的组织，因为它是最觉悟的，目标是最远大的，所以无产阶级必须要有共产党的组织。

刚才讲到斗争的形式问题，需要我们利用种种的斗争形式，这

样的一个阶级可以用种种形式是不是合乎辩证法呢？这是需要解释一下的。因为有人提出来这个问题。从前我们讲到对抗与非对抗的问题，讲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的，但斗争的形式又是非对抗的，这是不是内容与形式有冲突呢？辩证法不是要求内容与形式一致吗？现在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应该了解什么叫形式合乎内容，形式合乎内容是应该按照辩证法从发展方面来了解，不要当做静止的东西来了解。内容是发展的变化的，所以形式合乎内容这个原则，是要注意到形式要合乎发展的内容，不是说内容是这样一个内容，形式也就永远是这样一个形式。因为内容要发展，所以形式也就跟着要发展，就是形式要适合发展的需要。内容的发展在某种条件下可以需要这种形式，在另外的条件下就需要另外的一种形式，只要形式与内容在条件上适合了，就算是形式合乎内容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现在需要和平的形式，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需要对抗的形式，因为事实上也是有对抗形式的，问题在于我们现在需要以和平的斗争形式为主。因为在新中国的条件下，尽可能争取和平的斗争是有利的，这样牺牲就可以少一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发展到中国现在这样的条件，需要以和平的斗争形式为主，此外再配合一些对抗的形式，这是我们今天进行阶级斗争所需要的。

在旧社会中，无产阶级需要最高的斗争形式。一般来讲，为了要解决无产阶级根本的利益问题，需要最高的政治斗争形式。组织形式也是这样，就是需要有共产党的组织形式。而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初期，在共产党还没有成立的条件下，那就需要工会斗争的形式，经济斗争的形式，适当地加上一点政治内容。但这个斗争是一步一步提高的，由经济斗争一步一步地提高到政治斗争为主的阶级斗争。

这样了解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这才是合乎辩证法，才是正确的。内容是对抗的矛盾，形式是和平的斗争形式，或主要是和平的斗争形式，看起来好像矛盾，但这是表面的看法，因为没有根据辩证法来理解问题，首先没有根据条件来理解问题，其次没有根据发展观点来理解问题。因此对这一问题就不容易了解了。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理解。

我们讲了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共产党，共产党的特点，大家学过《列宁主义问题》与《列宁主义基础》，那就都知道了。我就不多讲了，只是讲一下一般的原则。

工会与合作社都不是政党，无产阶级要解决根本问题就需要有一个政党。凡是从事政治斗争的各个阶级都是有政党的，凡是一个阶级已经走入政治的漩涡，那就一定要有一个政党。资产阶级就有政党。在封建社会中没有政党的公开形式，孔夫子规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君子群而不党”。这句话就是：君子可以一群一群地联合起来交朋友，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党派。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中有这样一条，所以就不需要党派；可是在封建社会中当阶级斗争非常尖锐的时候，封建阶级中还是有党派的，名义上不叫党派，但有许多代表不同意见的集团。像明朝就有一个“东明党”，有魏忠贤党，有巩固统治的党，有要求改良的党。总之，凡是走在阶级斗争里面的阶级，都是有政党的。

为什么必须有政党呢？因为政治斗争是一个很复杂的斗争，需要有经验，需要有全局观点，需要有比较高一点的眼光与目标；这种条件普通的群众是做不到的，因为他没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没有远大的眼光，不能从政治上着眼来看问题。所谓政党，也就是阶级斗争的领导集团。政党的成员都是各阶级里面最积极的分子，他的阶级意识比较明确一些，能够认识到自己本阶级的阶级利益。

国民党就是抓住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最高的领导人也就是最反动的分子，因为他的阶级意识是最顽固的，同时也是最有经验的。蒋介石就是最有反动经验的，有很多反动的阴谋与办法。他集中了反动势力的阴谋，集中了世界上法西斯的阴谋。但结果他还是在中国人民面前失败了。

无产阶级因为有自己强大的敌人，敌人又有它的政党，因此，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也就必需要有自己的政党，能够善于揭露敌人的阴谋，能够引导本阶级走向革命胜利的道路上去。所以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党是其阶级的先锋队，是带头的力量。政党不仅仅是阶级带头的力量，而且还是使阶级能够统一的力量。带头与统一是分不开的，要能够带头，首先就必须统一起来。资产阶级的政党要统一资产阶级的力量；无产阶级的政党也要统一无产阶级的力量。这是一切党派的共同点。但无产阶级的政党与其他政党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个区别是什么呢？我们简单地讲一下。

首先，资产阶级政党虽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但一般地不敢承认自己的阶级面貌。资产阶级的政党总说是代表民族，代表人民，甚至于说是代表人类的。譬如美国的政党就号称是解放人类、解放世界的，它们都是以超阶级的面貌掩饰自己自私的企图。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需要掩盖自己的阶级面貌，而是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面貌，公开承认自己的主张——反对资本主义。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最后一段说："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这并不是说自己的秘密工作不用隐瞒，而是自己的主张与阶级观点、立场是公开的。所以无产阶级公开宣言，无产阶级的利益只有经过暴力才能达到，公开宣传自己的阶级立场，这不是偶然的。只有这样，才能够把自己本阶级与资产阶级划清界线，在思想上划清界线，明确地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

级的对立揭露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对无产阶级起带头作用。所以无产阶级的党是历史上公开主张自己革命立场的党。如果我们现在因为与资产阶级联合，就害怕说出我们将来要消灭资本主义，那就不对了。应该与它说清楚，我们是不隐瞒这种主张的。

其次，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不同的一点，就是资产阶级政党虽然也讲联合本阶级，统一自己的阶级力量，但由于它的阶级性，不可避免地要分裂为各种利害冲突的集团。因此资产阶级可以有几个政党。地主阶级也是如此，在内部斗争激烈的时候，可以有两个党、三个党，如“东明党”是在野党，另外还有在朝的党。它自己阶级中分成几个集团，经过党互相斗争。这也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特点。

这就是阶级决定了它的党，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产阶级所以有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它阶级的必然规律，另外一方面它也需要这样做，因为它可以利用这一点来欺骗劳动人民，利用两个以上的党，表面上显出民主，反对专政。像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在选总统的时候互相斗争，这种斗争多少欺骗一些劳动群众，因为他们也可以讲几句同情劳动人民的话。在野党反对在朝的党，说某一个政策搞得不好，某一件事情没有做好，结果吵吵闹闹，用来欺骗劳动群众。在我们党外有一些知识分子就受过这种影响，认为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美国的两党政治是民主。英美号称民主国家，就是用这两党政治欺骗人民。

无产阶级就不需要这样做，因为它的整个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阶级本身没有对抗，如果无产阶级内部有一点分歧，那是资产阶级挑拨的结果，不是无产阶级本身的矛盾。所以无产阶级就应该只有一个党。无产阶级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为党的统一进行斗争，应该坚决反对宗派主义的倾向，我们提出反对分散主义不是

现在才提出的，而是早就提出反对的，因为分散主义就是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反对这一点的。共产党就是从清除自己内部的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一方面要在党内争取统一，另外还要在党外争取整个工人阶级的集中统一，甚至要在全世界范围内争取工人阶级的集中与统一。无产阶级所以有力量，就是由于有统一集中的组织。像苏联国家的这样一个水平，当斯大林逝世以后，还要争取党的集中与统一，因为还有贝利亚这样的坏分子，还有帝国主义存在，因此就还要注意这一点。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与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这是长期的任务。

以上就是无产阶级党的一些特点。

四、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后目标

无产阶级斗争的最后目标就是要消灭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就要经过一个道路，——无产阶级斗争的道路；而无产阶级斗争道路最主要的环节是能够掌握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能不能说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呢？就其实质来说，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我们现在还不这样说，因为我们今天还有资产阶级，在政权机关中还有地位。所以，还是根据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讲的我们的政权，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可以这样说，人民民主专政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政权。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经讲过这种过渡性质的政权。俄国革命最初曾经考虑过由民主共和国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也说过，民主共和国是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形式。列宁

的《国家与革命》也讲到过这个问题。这都说明马列主义的创始人都曾经考虑过这一问题。但这个意见没有成为事实，像二月革命本来可以成为事实，但因为当时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虽然是两个政权，但苏维埃那个时候不是主要的，而是克伦斯基掌握了主要政权。克伦斯基政府就是该打倒的，因为当时条件使过渡政权没有产生；不过当时的苏维埃也是一种工农民主专政的形式，这种工农民主专政的形式，也是有过渡的性质，因为当时还是联合小资产阶级，目标还不是马上消灭剥削制度。这种情况一直到十月革命才结束了。

中国的条件就使得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过渡的政权，不是工农民主专政，不是苏维埃，因为苏维埃里没有资产阶级，我们现在还有资产阶级；但是资产阶级没有占主要的地位，是被领导的阶级，所以我们这个政权是过渡的。当然无产阶级没有领导权，那就不能保证我们能够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法国打垮希特勒以后，政府中曾经有过共产党的两个部长，当中有一个是卫生部长，还有一个是航空部长（不是军事航空部门），这简直是开玩笑，这就不能成为过渡的政权。

总之，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政权，然后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最后目标。为什么一定要有政权才能够实现最后目标呢？因为政权是一个强大的力量，有了政权就可以创造经济条件。有了客观上的经济条件，然后政权才能够起作用。我们之所以强调要政权，原因就是因为有阶级斗争，阶级不是自然而然地消灭的，腐朽的势力不是甘心退出政治舞台的，阶级消灭的时候是要反抗的。所以就需要有一种克服这种反抗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工农联盟。为了在无产阶级得到政权以后，能够消灭更加拼命挣扎的腐朽势力，就更应该加强我们的政权，马克思主义者是非常看重这种作用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的区别，也在于机会主义者是不看重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共产党宣言》起，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都是非常注意政权的作用的。

联系到我们中国，毛主席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开始就说："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

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但要有自己的党，而且还要通过这个党创造国家政权的条件。

马克思列宁学院哲学教研室 1953年下学期工作总结*

（1953底）

本学期我室开始成立，主要地担任了二部六、七、八、九班哲学教学任务及一部一、二班的哲学辅导任务，以及院外的一些讲课和写作的任务。其中六班教学任务只完成了辩证法唯物论部分，历史唯物论部分须移到下一学期。由于室内力量还很薄弱，二部的教学任务没有能够做到全部专业专管，教学方面，各班的唯物论部分和七、八、九级历史唯物论基础与上层建筑个人与群众部分是由杨副院长分担的。搜集情况，组织讨论，整理材料的工作大部分（主要是七、八、九班）是教务处分担的。我室的全体同志，都尽了自己的力量，按照院部所规定的方针进行工作，使上述任务基本上胜利完成。在同学中一般地得到了良好的反映，并取得了一些新的经验。由于一部和二部任务不同，以及各部各班的任务及情况也有所不同，必须分别加以总结。

---

* 1953年下学期，马克思列宁学院哲学教研室刚成立，即担任了二部六、七、八、九班及一部的一、二班的哲学教学任务，当时艾思奇任哲学教研室主任。为了总结工作经验，按当时院领导的要求，艾思奇亲自撰写了“1953年下学期工作总结”，其中第三部分，是其他同志起草。经艾思奇修改，在这个工作总结的基础上，艾思奇又亲自撰写了“马克思列宁学院二部对党的中级干部进行哲学教学的经验”。这里是按手稿排印。

第一部分　二部七、八、九班教学总结

（一）七、八、九班的哲学，是从1953年上学期末，即6月下旬就开始了哲学的学习，学习由唯物主义开始，为第一单元，辩证法为第二单元，历史唯物主义为第三单元，历史唯物论又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及阶级斗争，个人与群众的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各专题，每一单元学毕，做一次思想小结，开一次以班为单位的大讨论会，历史唯物论单元开了两次班讨论会。全部课程到1954年1月13日才学习完毕。计时二十二周半，学习前学员的情况及学习的收获，大致如下：

七、八、九班的同学们一般都具备着许多适合于学习辩证法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优良条件，最主要的是：1. 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有八年以上党龄的，受过党的许多教育和做多年工作，因而具有相当的实际经验和领会能力的中级干部；2. 他们都有着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和在党内教育之下所受到的一定阅读训练，因而对于经典著作的阅读困难也具备能够克服的条件；3. 他们来马列学院已经学习了半年多才开始学哲学，在院的领导反复诱导之下，已经养成了一定的学习习惯，并准备了若干历史和理论方面的知识，对于学习哲学的必要开始有了一些认识。

但在学习哲学开始的时候，仍遇到了许多困难。首先是，由于大多数同学，过去都是很少看过哲学书，甚至完全没有看过的。因此不可免地对哲学怀抱着种种不正确的看法，有的人把哲学看做神秘难懂的，“可望不可即的”，或者笼统地认为一切哲学都是“悬在空中的”，“脱离实际的学问”，以为实际工作者是不需要哲

学的，或者认为只有高级干部才需要学哲学，“咱们这些小干部学它是没有用处的”，或者以为学习唯物论的用处仅只是“用来反对宗教迷信的”，以为只要不信鬼神就没有唯心论。甚至还有一种极庸俗的看法，认为“喜吃爱穿也是一种哲学，人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哲学”。也有少数同学看过一些哲学书，听过一些哲学讲课，但学习都很肤浅，一般都只限于概念、名词的表面意义的推敲，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对于辩证法唯物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的武器的意义是不能理解的。以上这些，就是同学们在学习开始时对于哲学的不正确的看法，不纠正这些不正确的看法，学习是无法进行的。其次，由于对哲学的不正确的认识以及多数同学在思想上还有着种种不同的顾虑和障碍，因此他们对于本院所规定的学习方针在开始时也是不能领会的。有的人由于自己有些实际经验而自满自足，对于“学习理论，提高认识”的必要性缺乏足够的重视；有的人对于过去整风整党运动的某些缺点有着片面的看法，不理解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积极意义，因此对“联系实际，改造思想”这一个正确的学习方法抱着某些不正确的顾虑。还有个别的人单纯地抱着“学一门知识”的观点来学习，不重视本院所规定的学习计划，盲目地扩大阅读范围，不注意如何提高认识，也忽视了改造思想的任务。这些思想障碍，都是在学习过程中必须克服的。此外，同学们在学习中间还有一些技术上的困难，主要是历史知识和自然知识的缺乏，这首先是在阅读经典著作的时候是必须适当克服的障碍。

（二）以上情形说明七、八、九班同学的情况，和以前二、三、四、五班的情况是基本上相同的。因此不但在二、三、四、五班已经证明有了成效的教学方针应该在七、八、九班加以贯彻，就是以前的许多教学方法，也是基本上可以通用的。但是，由于在

以前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已获得了许多经验教训，又由于现在已经开始有了教学研究室的组织，不论主观和客观方面我们的力量都比较增强了一些，因此这次的教学方针就有可能比以前贯彻得更好一些，在教学方法上的缺点就比以前减少了一些。

发挥同学们的优良条件的作用，克服他们在学习中的困难和障碍，来贯彻我们的学习方针，来实现“学习哲学，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任务，这些就是我们教学方法的原则，在全部教学过程中我们采取的最主要的办法是：1. 在杨献珍同志的动员报告中以及每一单元的教课中，对学习哲学的以上方针反复地加以阐述，同时针对着同学中的各种与教学方针相抵触的不正确的认识给予适当的批评。2. 通过各个单元的讲课、辅导和讨论，向同学们一方面比较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划清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界限，同时又与党的各项政策，党的各种斗争经验，特别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结合起来，启发同学们领会为什么党的正确的政策路线是以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理论基础的，而工作中的各种错误归根结底是违背着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使同学们了解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从宇宙观到工作作风一贯地系统严整的科学，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就是这一科学的方法武器。使同学们了解所谓理论联系实际，首先就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和解决我们工作中的实际问题。3. 为要使同学们学会如何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首先引导他们提出一些自己本身所体验过的问题来加以解决，这就是要启发同学结合自己本身的工作和思想中的实际问题来进行学习，也就是结合着自己的思

想改造的任务来进行学习。具体的方法，就是在讲课之前通过支部来了解同学的历史情况和思想情况，在讲课中选择若干情况加以分析和批评。在课后的小组讨论中，特别是在思想小结和总结中，经过支部推动同学们就相互间的工作和思想问题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大家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照耀之下，来估计自己过去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使同学们了解凡是工作中有成就的地方在思想上就是符合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各项原则的，凡是错误和缺点的发生，就其思想根源来说，都是违背这些原则的。为了通过学习来通常地解决各人的思想问题，每一学习单元中都指出一些应该着重解决的重点问题，作为全部学习过程，包括讲课、讨论和总结中心点。为学习唯物主义解决主观主义的问题，学习辩证法解决思想的片面性和表面性的问题，学习历史唯物论解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分散主义的问题等等。4. 关于缺乏历史知识和自然知识及其他技术上的困难采取了对经典著作的辅导讲解及自然科学知识的专题报告以及放映科学电影等方法来解决。以上的各种教学方法，也是在二、三、四、五班基本上采用了的，但在七、八、九班做得更好一些。

（三）在整整半年的时间里面，同学们在学习哲学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的认识逐步获得提高，同时在思想改造方面也收到了相当的成效。

就理论认识的提高方面来说，首先是对哲学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错误认识得到了端正，认识到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者用以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就使一部分人不重视哲学和一般地不重视理论以及另一部分人把学习哲学看做只是单纯地吸收一门知识而不重视理论与实际结合，特别是不愿与自己的工

作和思想结合的思想偏向得到初步的纠正。同时，通过全部学习过程，同学们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各项基本原理，以及这些原理的实际意义都开始有了相当的领会。例如由于学习辩证唯物论单元而了解了“物质是第一性现象”的原理，思维与存在的正确关系的原理，由此领会到在我们的一切实际工作中来解决问题时必须首先着重“调查研究”，必须采取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和反对主观主义，领会到我们党的各项政策之所以是正确的，就因为它是严格的科学的。又例如通过学习辩证法而了解到事物的普遍联系的原理，发展是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是由量变到质变，由低级到高级的关节线，发展的源泉是事物的内在矛盾，是对立面的斗争等等。因此领会到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依据这些原理来对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分析，反对观察问题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并领会到我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各项内容，就是严格依据这些科学方法原理制订的。又例如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了解了生产是决定社会发展和社会面貌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者——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决定力量，因而领会到在实际工作中为什么必须有群众观点，为什么必须克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领会到党的各项政策都是与发展生产的需要和群众的生活需要紧密结合着的。由于了解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性质这个经济法则，就领会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正是符合着这个法则等等。这些领会虽然是很一般的，但就许多同学来说，还是从来未曾有过的新的东西，是使理论很快提高了一步。而这理论认识提高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经过这段学习之后，同学们普遍地感觉到对于党的路线和政策的体会能力加强了，对于毛主席的著作以及各种经典著作阅读兴趣和领会能力增进了，因而学习理论的信心也提高了。有的同志说：“过去对党的政策是知

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这就是我们在工作中左右摇摆常犯错误的根源，现在懂得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去观察社会历史，观察社会生活，进而理解了党的政策的制订是以社会生产发展规律为基础的。这对今后工作中的克服盲目性，提高政策性和思想水平，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话对于七、八、九班来说是具有代表性的。

就改造思想方面来说，通过全部学习过程，使全体同学在不同程度上认真地对于自己工作中和思想中的错误和缺点进行了揭发，并应用学习中领会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原理，来进行分析批判。因之对于这些错误和缺点就获得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而对党的思想立场的领会就随之而愈益明确了。过去大家在不同程度上普遍地有着主观主义，片面观点，个人主义，自满情绪，官僚主义以及分散主义的坏作风。但是，对于这些错误，部分同志长期没有自觉到，部分同志虽然有些自觉，但很不全面，更不能提高到应有的原则高度来加以认识，即不能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来加以分析批判，甚至有的人认为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无伤大体，或将缺点认为优点。因此，过去虽然许多人经过了整风整党的锻炼，但思想改造都是不大深刻的，这次通过学习哲学，从世界观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来检查了思想，所获得的思想改造的效果就深刻得多了。有的人经过这次学习和大家的帮助，对自己的毛病开始有了较清醒的认识，因而感到大吃一惊，说:“像这样深刻的教育，在我参加革命以来还是第一次”。

与思想改造之获得成效分不开的一个显著的因素，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地很自然地普遍开展起来。在学习唯物论单元时，批评与自我批评已初步有了开展，在学到辩证法时，特别在学到第四个特征时，由于了解到事物内部对立面的斗争是发展的动力的原理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社

会发展的动力的原理，于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就获得了一个理论上的自觉的指导力量更迅速地普遍展开起来，就是个别的一直对批评和自我批评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也开始注意倾听别人对自己提的意见了。有的同学说："过去有人批评我，我不是用耳朵听，今天同志们对我批评，我才用耳朵听了"。又有人说："改造自己的思想，首先要经过自己内心斗争，不能全靠外因"。这说明大家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必要已有了真正的领会，而批评与自我批评愈更开展得好，思想改造的收效也就愈大。

和以上的成绩分不开的一个成绩，是同学们学习方法有了显著的进步，也就是初步解决了如何使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的问题。过去对理论与实际联系这句话很熟悉，但都不能真实加以领会。有的把它看做是原则加例子，有的人以为"言行一致"，干部带头就是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学习和讨论，特别是通过思想的小结和总结，开始体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就是要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当前存在着的一些实际问题。通过个人的思想检讨和思想改造的过程，这样的方法在学习哲学后大家不但初步领会了，而且也初步应用了。

（四）从七、八、九班这半年的教学工作中，我们体会到以下的一些主要经验：

第一，这次教学之获得成绩，又一次证明我院教学方针的正确性，证明坚持这个方针是保证教好学好的根本条件。这在同学的反映中也差不多是一致承认的。有些同学说，我们的方针应该不仅仅是学习哲学的方针，而且应该成为一切党校学习理论的普遍方针。掌握这方针必须是全面的，不能把"学习理论，提高认识"和"联系实际，改造思想"割裂开来，而必须使之密切联系着。这就是说一方面要对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各项理论

原理作相当全面系统的讲解，并依据自然历史、人类历史以及党的政策路线、工作方法等等方面的现实材料，来指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是从我们的世界观到工作作风一直贯串到底的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又必须有重点地抓着同学们的思想和工作中的某些实际问题来加以解决，使同学们在学习哲学的过程中同时就得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的锻炼。这就是“边学边联”、“边学边练”。

这是教学过程的中心环节，通过了这个中心环节，同学才有可能在实践上领会到理论与实际联系是怎么一回事，才能亲切地体会到所谓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实质是什么意思，才会真正了解作为改造世界的方法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意义，才能领会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党的政策路线和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密切联系，因而对经典著作和党的政策路线获得较高的理解能力。这就是说，“改造思想”是“提高认识”的关键。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相当全面地系统地学习理论，就不可能掌握联系实际的完整的理论武器，要想很好地完成改造思想的任务，也是困难的。忽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这个中心环节，以为只要盲目地多读书，多蓄知识，就可以学会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教条主义性质的错误倾向，是应该反对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注意结合着实际比较系统地来阐明理论原理，不结合自然历史、社会历史以及党的政策路线工作方法等等来指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真理性，把学习范围局限于某些重点问题，那又会使得同学的认识不能开展，这样要想很好地解决工作和思想中的实际问题，也是不可能的。

在教学中间，除了联系同学本身的工作和思想问题之外，还应该着重联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问题，这次讲课和组织班的大讨论会时，由于结合了总路线问题，收到了很大的效果。这不

但很能启发同学对于理论原理的领会能力，而且提高了同学们对于当前国家的实际问题思考钻研的兴趣。今后哲学教学应该把联系总路线的问题作联系实际的一个主要内容，不论写讲课提纲以及指导讨论中间都应该体现这样的方针。

第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实现思想改造和推动学习进步的动力，必须正确地加以掌握。在这次教学过程中，我们比较以往更为恰当地引导着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起来。这主要是掌握了以下的方针，即把坚持严肃批评的原则和强调思想改造必须依靠本人的自觉自愿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即一方面坚决反对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又适当地防止了过火的斗争。同时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是随着学习的发展过程和同学的思想情况的变化而相应地有着变化的，一般地说，在学习辩证法的单元以前，是主要侧重于鼓励和推动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方面，因为这个时候批评自我批评还没有完全开展，在同学中间还存在着不少的自由主义倾向。从历史唯物论的学习开始，特别是到了最后进行思想总结的阶段，批评与自我批评已普遍开展起来，这时就在坚持严肃批评的基础上更强调了自觉自愿的思想改造原则，这样就使批评与自我批评循着积极的同时又是极稳健的轨道上发展。大家相互批评的态度一般地都是诚恳、认真、实事求是的，大体上做到既批评错误又团结了同志，使所有的同学都在不同程度上愉快地获得了认识的提高和思想的进步。自然，发展还是不平衡的，一些同学在学习中表现了显著的进步，一些同志因觉着这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确实使自己获得了利益而受到深深的感动，但也有少数同学直到学习总结时才表现着进步的开端，还不能够对于自己的问题进行深刻的检讨。但无论如何，进步是普遍的情形，而这次学习中的或多或少的进步，就为往后进一步的学习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这次教学工作比过去较好地发挥了组织领导的作用，这是获得成绩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次每一单元的教课提纲都有比较充分的准备，都通过支部的汇报了解了同学的思想情况来适当调整教课的内容。在正式讲课之外又有较多的辅导工作。每一学习单元告终时都开一次以班为单位的大讨论和作一次思想小结和最后阶段的总结。每一次班的大讨论会都结合着两三个有关我们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际问题来进行讨论，对于有争论的问题及时地做出明确的解答。对于重要问题的讲解以及争论问题的解答，首先经过教研室同志及主讲教员之间的研究，使大家的认识一致，因而避免了以前不同的讲课人在某些问题上说法互有出入的缺点。以上的许多组织领导的办法，都对同学们的学习给予了有力的帮助，在同学中获得了良好的反映。其中尤以每一学习单元做一思想小结而最后汇为一个学习总结这个方法，引导着同学们在思想和认识上一步一步地上升，使同学们在每一学习段落都自己感觉到某些明显的进步，而最后就得到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收获。这在同学中间可以说是普遍地感到它的好处的。这种一步步结合自己的思想进行小结一直到总结的方法，据同学们的体验，是符合着每个人的思想的发展与提高的规律的。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使同学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地实际训练着自己来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武器。据一些同学的体验，就是“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就进一步深刻理解学习哲学理论的重要性，理解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实质，因此就把所谓抽象的精神实质变作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东西。有些难懂的抽象概念，经过思想小结也得到了解决。”

(五) 这次哲学教学工作虽然获得以上的许多成绩，但其中问题和缺点还是不少的。根据我们自己的检讨以及同学的反映，有

以下的主要问题和缺点必须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解决和改正：

在讲课方面，一部分课程的准备还嫌仓促，特别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阶级斗争部分的准备是很不够的。其具体的表现是：第一，在讲课之前没有深入同学中间去了解它的全部思想情况和学习情况，因此在讲课内容联系实际方面就显得不够，在这方面虽然抓紧了联系党的政策，特别是联系总路线这一个环节，因而在同学中间获得了良好的反映，但弱点则是缺乏对于同学思想实际的很好的联系。第二，理论的阐述方面也是有很大缺点的。这一方面是讲课的系统性还不够，为着要使同学们在学习中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系统性和科学性，在这一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努力，另一方面是有些必须充分交代的论点缺乏足够的明确交代。例如讲授生产的第三个特点，在说明生产的发展是由自发的过程进到自觉的过程这个规律时，必须同时着重说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个规律的特殊表现以及人的自觉活动在这里所起的主导作用，然而在这次讲课中对于这一点的交代是最不明确的。

在工作方面，这次教学没有采取教研室专业专管的办法，而大部分还依靠着教研室以外的力量来进行工作，如讲课方面一半是依靠杨献珍同志，组织领导方面一部分是依靠教务处和组织处的同志，而在与各处配合工作时又没有一个正式的组织，没有确定一个领导的核心，因此在工作中有时还有某些各自为政的分散现象，反映情况不及时，工作有时拖沓，这是以后教学中必须克服的很大的缺点。

在课程排列方面，同学们曾不断地提出意见，例如讲课时间没有确定的计划，常常是临时拉长，辩证法四个特征原定讲两次，实际上讲了四次，又例如临时的专题解答过多，其中有些自然科

学的报告是听不懂的，因此也是不必要的。这类报告不但本身效果不好，而且侵占了同学的宝贵时间，使同学们屡次提出阅读时间不够或阅读量太多的呼声。其实我们原规定的阅读量是并不算太多的，各个单元合计起来的阅读时间，原定每小时平均阅读量并不超过2500字。倘若各方面的时间调整得好，不必要的科学报告减少一些，是不应有阅读时间不够的问题的。

关于各单元的学习顺序，有的同学提出应加以改变，即按照斯大林的著作顺序从辩证法开始。此项意见是可以考虑照办的，并且六班的教学已是这样做了。

第二部分　二部六班的教学工作总结

（一）二部六班从1953年10月4日开始学习哲学，至12月15日学完辩证法，12月下半月到1月中间学完了唯物论。历史唯物论部分的学习还是开头。

六班同学的特点，是绝大多数都经过较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党龄都比较长，67人中，1929—1937年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入党的有27人，占全体的百分之四十二强。尚有百分之五十六是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因此他们都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这是有利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但另一方面，他们的文化理论水平，一般都比较低。其中高小毕业和在初中学习过的只有19人，占全体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八，其余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都只是高小毕业以下的程度，而初小以下或只念过半年书的人却占百分之四十一，完全未上过学的也有百分之十六的人数（16人）。如果说二部其他各班的学员有百分之四五十都是高中以上的文化水

平，那么六班同学就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小学水平。至于就理论水平来说，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学习过经典著作。加之与这些情形相联系地，在他们的主观上对哲学的学习还有着某些神秘观点和思想顾虑。如个别同志说“哲学是知识分子的”，“是给高级干部有高深学问的人预备的”。“找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看，条条并不多，越看越不懂，只好等教员讲，自己‘听天由命’吧。”有些人以为哲学只是为着用来辩论问题或反驳别人文章的问题，以为辩证法就是反说正说都有理。也有的人对于“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方针摸不清底，顾虑怕通不过等等，这些情形对于他们的哲学学习，无疑就形成了困难条件。但这些困难条件，根据这次学习的经验来看，决不是不可能克服的，原因是：第一，如前面所说，他们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因而也就具有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定的可能性；第二，他们绝大多数都经过整风整党，这就使前面的这一个可能性的作用更为增大；第三，在来校以前通过工作中的学习，他们的文化一般都已提到高小或高小以上的程度，来校后又经过一年半的文化学习，学习哲学时一般都已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第四，在学习哲学前，已听过二、三、四、五班哲学教学总结报告，在思想上一般都很重视哲学这门课程的学习。并且他们的学习热情是很高的，一般都很努力，很用功。这些都说明只要认真贯彻院部所规定教学方针，采取适合于他们的具体情况的教学方法，是可以克服他们的困难条件而完成学习任务的。

（二）六班的教学，在教学方针上是完全与其他各班一致，即仍然是“学习哲学，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方针，而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则采取了适合于他们情况的若干不同的措施。

在教学内容方面，首先是减少经典著作的阅读分量，并选择

一些毛泽东同志的文章和党的各种政策文件作为联系实际的参考。如学辩证法的单元，只规定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辩证法部分及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作精读的文件，另外选读《毛泽东选集》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整顿党的作风》、《学习与时局》等文章以及党内文件如少奇同志的《清除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李富春同志的《在工会工作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习仲勋同志检查新疆工作的报告和《人民日报》有关总路线及国家建设的重要社论。但阅读分量减少并不等于学习的基本内容也要减少。在讲课中间，还是密切结合着党的政策路线以及同志们的工作与思想中的实际问题，来系统阐明辩证法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而在系统讲明各项基本原理的过程中，又把着重点放在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意义上面，特别着重利用同学们自己的工作经验和思想问题来指明这些实际意义。

在教学方法上，最初的单元——辩证法部分，由许邦仪同志一人负起全部教学专责，即从讲课（除《矛盾论》由艾思奇同志讲解外），上辅导课，主持课堂讨论，参加小组会到小结，抽考，从头到尾由一人担任下来。这样使教学的全部过程保持紧密的连贯性，能够较迅速地帮助同学们克服困难，摸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门径。教学方法的中心环节，就是采用各种各样方法去了解学员的学习情况和思想情况，包括个别谈话，参加讨论会，主持课堂讨论，课堂问答，抽考，看档案及有关材料，抽看学习笔记。由于深入了解同学们的学习情况和思想情况，在教学上就能够很好地启发同学通过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来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六班教学中讲课量是比较多些，在学习辩证法的

22天时间里面共讲了11次，加上《矛盾论》讲课三次则有14次之多，讲课方法也与二部其他各班不同，不是一次连续讲完，而是讲一讲，学一讲。

以上教学方法主要是在辩证法单元采用的，由于在这一单元采用了这些方法，有效地克服了同学们学习哲学的困难，使他们初步入了门，这就为以后进一步的学习开辟了顺畅的道路，所以在第二单元以后，已经可以不必完全采用这些方法，而采用与其他各班大致相同的方法，也没有困难了。

（三）经过辩证法和唯物论的学习，同学们不论在理论认识方面和思想意识方面都有了显著收获。在学习辩证法单元后，就打破了对于哲学的神秘观点以及学哲学的思想顾虑，开始深刻感到学习哲学的重要和对于学哲学发生了兴趣，有些人并对一般的理论学习也改变了以前的错误看法，如说："过去认为没有理论一样可以工作，今天体会到没有理论就不能正确地认识问题与分析问题"。"过去工作出了差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辩证法的思想方法"。"现在我们读书，看报，看电影，听报告，感到其中都有辩证法了"。同学们之所以能够有这些领会，是因为初步分清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从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中认识到这是根本对立的两种思想方法。一个同学在思想小结中写道："我过去对于主观主义和片面性的认识，只认为它是人们的水平低，知识不广，缺乏远见，不懂得它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次初步认识了它和共产主义是根本相反的"。他们依据辩证法的第一个基本特征，领悟到过去在工作岗位上对于有些时候上级指示的改变，不能理解甚至于表示不满，就是由于不懂得一切依赖条件、时间地点为转移的原理，他们由于学习第二个基本特征检讨了自己的农民的狭隘性或对新事物缺乏敏锐感觉等缺点，

由于学习第三个基本特征而检讨了自己思想上的两极性以及在学习中的急躁情绪,由于学习第四个基本特征和《矛盾论》,了解到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领会到过去工作中犯了错误,不知道应该着重检讨自己而把原因推到客观方面,因此问题总解决不了,思想苦闷,是由于思想方法违背了辩证法的原故。总之,由于学习了辩证法,开始认识了正确的思想方法,使有些同志过去没有解决的某些问题初步得到了解决。

学习唯物论单元后同学们的思想和认识就更前进了一大步。由于初步划清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界限,领会了“存在第一,思维第二”这个正确的原理,懂得了认识是来源于实践,正确的认识必须去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因而普遍地检讨了过去工作盲目性很大,工作中缺乏调查研究,分析情况,只凭自己的热情和主观愿望,只凭自己的狭隘经验去工作等等缺点。由于学习了事物规律的可知性的原理,因而增加了自己学习的信心。由于了解到认识是无限发展的过程,因而批判了某些自满情绪。由于懂得了认识的能动作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必要,因而提高了学习热情,增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有些同学过去把主观主义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说:“谁还没有主观主义!”有些人过去以为自己的主观主义不多,没有什么要紧,有些人过去虽然也常常检讨自己的主观主义,但总找不到根源,这些在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通过唯物论的学习,一般都得到了初步解决,因此学习的结果,大家在精神上是愉快的。同时这一切学习的收获并没有引起自满,而是使大家更加虚心了。一般同志都能主动地找别人批评帮助,也能热情地耐心地帮助别人。不但增长了热烈互助的空气,而且创造了一些有效的互助的新的方法。有的人说:“这是参加革命以来才真正体会到‘平心静气’的滋味。”一个同学过

去遇到困难就表现急躁，学了唯物主义后，在写小结时不但不叫苦而且耐心地作了深刻的检讨。有个别带有特别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同学，如一组的陈贵芳同志，在以前始终不能认真接受批评的，学习唯物主义后，在大家的耐心的适当的帮助下，经过了内心斗争，也愉快地接受了大家的批评了。

（四）根据六班学习辩证法唯物论的经验，可以得到以下的几点主要结论：

第一，文化理论水平较低的工农出身的老干部是否可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答案是肯定的。文化理论水平并不是不可克服的严重障碍。主要地是由于这些干部有相当的实际经验和党的思想的锻炼，由此就有了能够正确领会辩证法唯物论原理和依据所领会的原理来批判实际工作和思想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论因素的有力的条件，只要能够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认真贯彻我们的教学方针，就不但可以使他们学到能够入门，而且可以使他们领会得相当好。五组王志中同志说："在学习中，当遇到了自己一下看不懂的问题，只要一联系自己的实际问题，就很快能理解了"这话就是明证。

引导同学们入门的关键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同学们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相结合，但也必须联系一些自然的和历史的知识，以便说明辩证法唯物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普遍规律，以避免认识上的片面狭隘性。由于他们来院后有了一年半的文化学习，初步获得了许多自然科学和历史的知识，所以酌量讲一些自然科学的材料也是可以的和必要的。

第二，必须具体了解同学的情况，针对他们的特点采取适当教学方法，启发他们通过自己的经验来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这是教学方面必须注意的主要点。

所谓要具体了解同学的情况，就是除了一般文化程度，工作历史，理论水平等等之外，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思想情况，其中除了了解学员中一般性的，即大多数同学中或多或少存在着的思想问题（如农民的狭隘性，经验主义倾向之类）之外，还要了解学员中比较突出的个别同志的思想问题。这样一方面可以利用来充实讲课内容，一方面可以有步骤有分别地求得在学习中来解决这些问题。

学习过程中困难的第一关是要打破难学的情绪，即对哲学的神秘观点和学习上的种种顾虑。这除了一般的动员说明之外，只要在讲课中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党的政策路线与革命工作实际结合起来，一般地都可以达到目的。这一关打破之后，就要引导同学一面学习，一面联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练习运用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武器，来解决自己亲身所体验到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同学较深刻地领会到辩证唯物论哲学实际意义。而如何联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又是困难的第二关，打破这一关的方法是要反复强调“边学边联”，随时注意应用唯物论的原理来检讨自己的经验和思想，批判自己思想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因素，树立辩证法唯物论的世界观。而最主要的环节是要采取一些办法帮助同学们做好思想小结。除了一般地解释如何做小结之外，选择一些其他班的同学的思想小结作为参考材料，也是很有效的办法。思想小结做的好不好，是学习成绩好坏的主要标志。在做思想小结的过程中，往往会得到新的启发。一方面，在做小结时要再翻一翻书，就会提高理论认识，另一方面，往往在平常自己以为没有什么问题的人，在思想小结的过程中就认识了自己的毛病。因此，做好思想小结，是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环节。这个原则不仅对六班适用，对于二部其他各班也是适用的。但对

于六班同学更应该多用力帮助他们做好思想小结。

讲求适当的讲课的方式，对于六班同学学习也是有一定重要性的。许邦仪同志讲辩证法时，每讲有提纲，指出要点，最后有综合性的小结。遇重点反复解释，遇困难的地方讲慢一些，有时还停下来，问一问听懂了没有，特别要问水平较低的同志，没有懂的要重复讲。有时遇到困难的地方，采取先问后讲的方法。此外还收集了学习中的问题在辅导课程中解释。辅导课不只解释技术性的问题，还要更深刻地讲解一些正课中没有充分解释的问题。这些具体方法，在六班学习辩证法时，对于同学是有帮助的。

第三，开展同学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和互助活动，是配合教学保证完成学习任务的必要条件。六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随着学习哲学认识提高的过程，由于真正理解自己思想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和体会了正确的方法而逐渐开展起来，所以是健康的。而所以能做到这样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在讲课时依据既强调反对自由主义又强调要从团结出发达到团结的目的这一方针反复进行启发的结果。五组的辩证法学习小结写道："通过这次辩证法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又前进了一步，小组的团结上也前进了一步。这次思想小结基本上做到，批评人是根据具体的人和事情做具体的批评，态度诚恳，不犯自由主义，有什么提什么，而被批评的同志能虚心听取与考虑别人的意见，正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过去有些同志害怕批评，一当批评到自己头上就"冒火"，这种情形在学辩证法之后就没有了。学习唯物论以后，由于了解到唯物论的各项原理，更进一步领会了"联系实际改造自己"的方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觉性就更为提高，解决了以前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说学习第一单元在联系实际方面还有很多强拉硬套的毛病，那么学习唯物论后就比较能够自然的把哲学原理与自己的思想结

合起来了。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讲授来引导同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过来又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开展来推动教学的进步，这是六班教学工作中得到的一条相当显著的经验。

六班互助组的活动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作用得到很好的发挥，最初互助活动也不是很好的，但在学习第一单元中间，对互助组工作作了一次检查，批判了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以为互助不如个人自学好，因而轻视互助活动；一种是盲目互助，没有计划没有中心。经过检查之后，确定了以思想互助作为互助的中心，采取自愿结合的原则和灵活的形式，包括互助组漫谈及个人交谈等形式，来推动互助活动。这次经验证明，这样的检查是必要的和有效的，经过检查，规定了互助组的明确方针，互助活动就很好的开展起来。互助活动的主要工作，是相互帮助做好思想小结，因为思想小结是学习好坏的关键。根据六组的总结，互助组要活动得好，需要注意三点：第一，要能互相帮助做好思想小结，首先要互相帮助找出思想和工作中的中心问题和各人的特点，使每人的小结都能正确地抓着主题，因此也就容易解决问题。第二，互助组的活动必须贯彻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互助中间必须有思想斗争，决不能采取一团和气的自由主义态度，互助组的活动，应该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一种具体组织形式。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即使能找到中心问题，也不能解决问题。第三，互助的方法要灵活，要结合个别互助与集体互助，不拘泥于定型的互助会，也要采取个别的谈心的方式，这样就可以进行反复多次的互助，使问题解决得比较深入彻底一些。采取以上的互助办法，就可以使每个人的思想小结在较短的时间得到完成，而且完成得比较好。

（五）对六班的教学，虽然有相当大的成绩，但还有着以下的

缺点（只是最主要的）：

第一，在教学中联系总路线还不够紧密（不是没有结合）。这不论是在讲课方面，选择参考材料方面，指导小组讨论方面都有这种情形，因之在各小组总结中，也没有特别反映出同学们通过哲学学习在总路线的认识方面得到了些什么重大的启发，虽然这方面并不是完全没有收获。

第二，在学习过程中对理论的钻研不够。表现在讨论会上没有很好地展开理论上的争论，在学习中很少提出理论上的问题。客观的原因是时间还嫌太挤（每个特征学四天，除了两个半天讲课，一个半天讨论，上半天讲课后要对笔记，正式读书时间不到一天半，还要写发言提纲），主观的原因是有些人有过早地急于联系实际的偏向。

第三，个别人的思想小结还只作了一般的检讨，没有提出主要思想问题加以分析，有的人联系实际还有些勉强，帽子戴得不对头，也有个别人避重就轻，没有抓着中心问题进行检讨。

第四，就六班的情形来说，具体辅导还应该做得多一些。

第三部分　哲学专业第一、二两班的学习和助教工作概况与关于向苏联专家学习及如何做好助教工作的专题总结

一、两个专业班的学习和助教工作概况

两个哲学专业班的学习情况，一般看来，发展正常，进步也

较显著，对于学习苏联经验，热情很高，同时也注意到联系中国问题（特别第一班）。助教工作的逐渐深入。但由于两个班的成分、时间长短不同，也还各有特点。兹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提供领导参考：

甲，第一班：

该班在专家未来之前，支委布置了总路线的学习，教务处、教研室也指定了关于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参考书目。后因专家未来，情绪稍有波动。专家来后，正课开始又立即稳定下来。大多数人紧张努力。据支委反映，该班在最近是出现了一种新的气象。表现在：

第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高了他们的学习热情，逐渐把学习引向深入。总路线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观点，分析了我国在过渡时期的情况而制定出来的，它和当前所学习的历史唯物主义课程正是息息相关。因此，他们在课堂讨论（例如讨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写文章（例如林荫写的严重问题在教育农民，韩树英写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改造有什么不同等），写讲义时就不能不紧密地和总路线联系起来。这对他们学习推动很大。有人说，总路线确实在照耀着自己的学习。

第二，派人出去讲课（全支部已出去五人，陈仲平、张克、林荫、丁池、萧真）给外边写点小文章，纵使在分配任务时，还多少有些困难，但在准备讲稿和写作时一般是认真的，是集中力量去搞。在完成任务后，心情很愉快（我们召开过一次讲课座谈会一般反映如此）。这也就引起了搞理论工作的兴趣。关于我们根据院部和专家指示，组织他们写历史唯物主义讲义初稿，大家热情很高也很认真。刘亚民同志已交来第一讲初稿。这对于推动他们学习也起了重要作用。这说明院部所指示的“练兵”方针是完全

正确的。

第三，大家较普遍地初步地坚定了长期搞理论工作的信心。他们说：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事情。固然，二、三班毕业同志，多数作宣传工作，对他们是一个推动，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由于他们在学习理论的过程中，不断地在院首长和专家的教育和启发下，确实提高了他们作理论工作应有的觉悟和认识的原故。支委反映，最近郑海奇同志（他是最缺乏作理论工作信心的）也开始下了搞理论工作的决心，这是最显著的标志。

该支部还存在着一些问题：1. 个别同志学习的努力还差；2. 个别同志学习方法上还存在着钻名词扣概念倾向；3. 批评还需要更进一步开展。

我们在该班的助教工作，似比上学期稍有进步（但还是很不够）。这次支委反映，他们对助教工作一般满意。在这一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主动地召集他们开过一次会，请他们对助教工作提出批评意见，我们也作了自我检讨以后，助教和支部的关系也就逐渐地亲密起来。大家认为我们和他们一起研究总路线，一起写讲义，并组织他们讲课写文章，都很好，对他们帮助较大。但他们还要求今后助教工作需要更有计划性，更深入。例如审阅课堂讨论提纲组织讨论等。

乙，第二班

这个班学习的积极性很高，对于向专家学习，思想上也较有准备。其中仅有个别人信心不很足。但也还有人要求过高，他们认为一出去就要当教员，现在要多搞些知识。开始时，他们还提出来要学习自然科学的知识，哲学史的知识，特别是对于经典著作一定在学校搞懂。这些，我们对他们已作了适当的解释。

关于向专家学习大家的态度是正常的，对专家的学问很信服，

对苏联先进教学经验也有些认识。如有人反映，苏联教学有一整套经验，一个环节接一个环节，计划性非常强，显示了它的优越性。有人说：专家认真严肃的科学态度与循循善诱的教学作风，值得我们深刻学习。但由于时间短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对专家各方面的好处和苏联先进教学经验体会得还不够深刻。如有人首先是看专家的讲课方式——讲的是不是活泼，是不是脱离了讲义等等。而对讲义本身对讲课的全部内容则不是首先加以注意。其次还有个别人没有认真地研究讲义及对专家的意见还不够虚心等现象，现在已逐渐解决。

学习方法问题对该支部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从他们提问题、发表意见、争论的问题来看，往往有人是在名词概念上打圈子，不善于结合实际来考虑问题。其次还有人片面强调学习原著中或讲义中的逻辑性与系统性，忽视领会精神实质。再次，有的同学埋头于写笔记，作摘记，记卡片，作索引（当然这些还是必要的），对于反复考虑问题，多开动脑筋，不大注意，结果是对理论问题不能真正消化。这些现象虽不十分严重，但不及时纠正会使他们脱离实际，甚至搞成教条主义。这一点我们已提起支部注意。

关于该班的助教工作也是在逐步深入。在开始的时候是存在着很多缺点的，最主要的是我们不够主动，助教与班的联系不多，对同学们的帮助也不够。在工作中表现了不够大胆和不够耐心的两种情况。以后这种情况有很大改变，助教与支部和同学们的接触多起来了，辅导工作也逐渐加强起来。

二、如何向苏联专家学习及如何做好助教工作？

关于认真地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教研室贯

彻院部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办法》的决定，从而也是教研室有效地接受苏联的先进经验，并密切结合我院教学经验，逐渐提高我院哲学教学质量的中心环节。抓紧这一中心环节，应该是教研室的首要的政治任务。当然要完成这一任务在今天又是和助教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对于这一方面工作进行了检查和讨论，作为专题总结：

（一）经过检查和讨论之后，大家认为我们前后在契尔特可夫、费道洛娃、尼古拉也夫等三位苏联专家的帮助和指导之下，工作和学习有了很大进步，不仅使我们在我院的哲学学习的基础之上，更有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并使两方面的优长更好地结合起来，而更重要的则是使我们更深刻地领会了苏联专家工作中的许多优点：1. 苏联的教学工作从缮写讲义、讲课、课堂讨论、解答问题到考试——这一个统一的完整的过程，它本身就具备着严密的科学性。2. 在进行每一课程的每一单元中，也是层次分明、首尾一贯，显示了这一科学本身的系统性。3. 专家教课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它的严格的计划性。费道洛娃说："没有计划我就不能工作。"当她接到教务处给她的关于哲学专业一、二两班的学习时间通知的时候，立即提出了整个学期、整个学年的教学计划。这个计划不仅完整地规定每一讲的讲题和全部参考书，而且还详细地规定了整个学期、学年中的讨论题目。具体地分配了讲课和课堂讨论的时间。尼古拉也夫非常强调教学大纲的作用，他说："没有教学大纲，怎能讲课？"专家贯彻自己的计划，十分严格。我们因为费道洛娃同志写讲义太多，身体有些疲劳，有一次她上午有课，下午还要解答问题，我们请她在讲课时少讲一点，她说："那不行，不讲，完不成计划。身体等到寒假再休息。"在她们看来，计划确实是法律。4. 苏联专家特别注意解答问题。费道洛娃

同志把解答问题，列为教学活动的重要项目。受到大家的普遍欢迎。她回答问题有如下几个特点：(1) 在回答中，极善于把一般的原则与实际工作深刻地结合起来。例如她回答生产中两要素。工具和人的关系的时候，她既说明了人在生产力要素中的重要地位，而又突出地阐述了工具的首要性质。她说“先有坦克然后才有坦克手，先有汽车然后才有司机”，她把这个问题引向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后和我国在过渡时期首先发展工业，通过工业的发展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这样一个富有重大意义的而且是现实的问题上来。对人启发很大。(2) 她不但正确地给我们回答问题，而且还常常指导我们如何正确地提出问题。例如她在回答“为什么说辩证法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的问题的时候，她说：“你们不要这样提，你们应该把辩证法和唯物论联系起来，应该说为什么唯物辩证法是工人阶级的宇宙观？这样提问题就好回答了。”她明确地指出：“辩证法成为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这不仅是一个自然科学发展的问题，而且是和大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成长分不开的。没有大工业，没有工人阶级，就不可能有辩证唯物主义。”因此为什么辩证唯物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就是很显然的了。5. 在我们经过的几位专家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1) 他们对于经典著作非常熟悉。(2) 他们善于把讨论问题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但对于中国问题，则采取非常审慎的科学态度，注意中国同志意见。费道洛娃同志在回答中国问题的时候总是先问我们的意见如何？即使她回答了问题，还要声明这意见只供你们参考，她主要的是在理论上进行些阐述；尼古拉也夫是不肯轻易回答中国问题的。在一次课堂上，有人问中国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问题时，他说：“我们责任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教给中国同志，并尽可能地把苏联的经验介绍出来，至于中国的问题需要中国同志自己去解决。”

费道洛娃同志在课余常提出一些中国问题和教研室同志讨论，并且提议教研室对党的各政策决议都必须在教研室进行专门的讨论，研究如何在教学工作上反映这些政策和决议。我们认为这项提议很好，已经决定在最近就总路线和四中全会的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3) 专家在讲课中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是经常的而且是尖锐的，他们在任何问题上总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当做两种思想体系的对立来处理的。他们在这一方面抓得非常紧。从契尔特可夫到尼古拉也夫都是一样的。而最后还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费道洛娃同志的教学方法和民主作风，引起教研室和两个专业班的普遍注意：她的教学方法最突出的一点是表现了十分耐心地注意培养同学的学习积极性，真正做到体贴学生，循循善诱。她明明知道哲学专业二班水平低，她总是不厌烦的讲解。甚至当助教向她提出某同学提问题提得不对头或态度不够虚心的时候，她还是认为他们是学生，或者说，她并没有感到什么，她还是不厌其详地教育同志。她的这种循循善诱的作风，不仅使我们感到她的那种对待学生的共产主义教育家的态度，而且使我们深深感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它本身是一门科学，对于科学的接受，就不能不有一定的过程，费道洛娃同志正是依此为出发点，从而在教学方面，从不操之过急。此外我们还深刻感到专家对教学工作的集体领导的重视。费道洛娃同志定出计划，甚至是确定课堂讨论题目，总是说要取得我们同意，要征求教研室的意见，她又指出，她给我们改写的教研室计划必须在全室通过。这些地方，对我们启发很大，班上同志都感到费道洛娃同志的这种作风和她的做过党委工作是分不开的。因此她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已直接地影响了教研室的某些助教同志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二)从这些方面看来我们认真地向专家学习，确为当务之急，

特别是当院部抓紧成立教研室并颁布了《关于加强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的几项办法》之后，在这一方面我们更应该提高自觉，向专家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学习，但是经过这次会议检查，我们在这一方面，虽然是具有相当热情，但还是缺乏真正的科学的自觉。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这首先是在室的领导上，认真地争取主动使专家有更多机会加强室的领导工作，使专家真正在实际上起着室的顾问作用，还是很不够。直到现在为止，费道洛娃同志还没有正式参加全室的一次会议。这虽然有许多客观原因，但主要的还是由于我们室的工作没有走上正规的轨道，我们在工作作风上，还存在着游击习气，还存在着拖拉因循的现象，我们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到，室的工作不逐渐走向正规,就不可能适应我院日益走向正规化的要求，而促使室的工作走向正规化，有三方面的推动力量，第一是领导上的抓紧与推动，第二是专家的具体指导，第三是学员同志们的要求和监督。我们必须坚信：只有根据必需与可能，切实地来接受专家对我们的指导，才能使我们的哲学教学工作日益正规化起来。才能适应今天和将来的哲学教学工作的要求。应该承认我们在这一方面，还多少存在着一些盲目性的。

其次是随之前一个问题而来的又表现在我们还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要使教学工作正规化起来，中心环节在于制定正规的哲学教学计划，而制定正规的哲学教学计划的物质基础首先是要编写出一套初步的（哪怕是不成熟的）哲学讲义——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有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特点，同样地也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特点。直到今天才逐渐促起我们在这一方面的觉悟。虽然这个觉悟是可贵的，但是不能不说这个觉悟是稍迟些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有了这个觉悟就可以使着我们的哲学教学马上就正规化起

来或者说就能够马上制订出来一个严整的教学计划。问题并不是这样。而是有了这样的觉悟之后，对我们就不能不有三方面的鞭策，一方面是鞭策我们注意同学们的具体水平，无论是理论的还是思想的（这一部分的材料是很多的，应包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班八个班及专业班的各种材料在内）。注意同学们在学习中的情况，要作为将来制订计划的基础之一，一方面是鞭策我们更努力向专家学习，首先是准确地把他们的讲义接受过来，同时又细心地研究专家在讲课、作课堂讨论、解答问题——各个教学环节的内容、时间、方式的恰当配合和紧密联系。而在这里特别重要的又一方面是鞭策我们更努力地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包括毛主席的著作在内）努力地学习党的决议、文件。研究它、熟悉它，——而这一些都是我们制订教学计划以及编写哲学讲义的重要依据。而如果我们长期地没有为马列学院的哲学教学制订出来一个比较严密的科学的哲学教学计划来，那么我们就没有可能自觉地注意到上面这一切事情，也就是注意到为制订和实现这样一个计划而准备好一切条件。

再其次还表现在我们对于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完全不可分割的关系的真正统一的了解。契尔特可夫同志就曾经告诉我们，科学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的关系，他认为两者不可偏废。没有好的科学研究就不可能有好的教学工作；同时不进行一定的教学工作，也不可能推动科学研究。费道洛娃同志来后又特别强调科学研究工作。她在指导制订教研室计划时，特别注意到科学研究，甚至还亲自指导我们选题，并介绍她自己的经验，她说："在过去她自己也是认为讲讲课还可以，但要作科学研究，那就不行了。"她指出：作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在开始阶段自己的信心不足是最大的困难。而在事实上我们对于契尔特可夫的指示并没有认真地执行，

而从全室的一般情况看来，我们在这一方面恰恰还是处于费道洛娃同志所指的自己信心不足的困难情况中。例如有的同志总认为我们现在还是在学习的阶段，现在还不能进行什么科学研究。而室的领导也没有十分抓紧。这种不敢着手进行科学研究，不敢勇敢地选题的情况，是不能允许长期存在的。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向专家学习，也还只能学得一半，也只是教学的一半，而关于科学研究，势必推迟再推迟，直到专家合同期满我们才能开始或者还不能开始，这样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就可能得不到在专家直接指导之下来进行。这样我们必然要吃大亏，因为选题是较长期的事，不早动手，收集材料，重点攻读经典著作，希望将来有一天，一蹴而成，那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也还表现在我们没有及时地经常地研究专家的批评建议，总结专家教学方面的经验，把这一工作作为教研室的经常工作之一。不这样做，就不可能对专家的批评建议和教学经验做出全面的系统的总结，也就使我们得不到迅速的提高。

总之，自觉地系统地全面地向苏联专家学习，我们做的是远远不够的。经过这一次检查与批判，大家认识也逐渐一致起来了。

(三)为此，关于向苏联专家学习的方面，我们就不能不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做得更好，做得成绩更大些。我们的具体措施是：

第一，从在寒假后费道洛娃同志领导我们第一次室务会议公布教研室计划（此计划已交翻译室）之日起，我们就竭力争取费道洛娃同志在实际上具体指导全室的工作，使室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反对游击习气，反对拖拉现象，克服走向正规化的一切障碍，稳步前进。

第二，教研室计划一经院部批准，一经在全室公布，就变成全室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人人按计划办事，人人为实现计划而

斗争，反对人自为政，朝令夕改与一切破坏或不按照计划做事的现象作斗争。也应指出，当然计划本身是可以随着情况的发展而有所修改或补充的，但那也必须经过全室的正式的讨论研究。

第三，我们趁在老班哲学学习结束新班哲学课未开之际，我们第一步争取做到完成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讲义初稿，作为全室的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与此同时，大家普遍进行选题（包括初调助教在内）本着院部指示的“竭力争取，量力而行”的精神，选出题目来由教研室通过，专家审查，院部批准，个人即作长期打算逐步进行。在选题时，尽量选择与过渡时期总路线有关的题目，我们认为：通过科学研究深入宣传并为实现总路线而斗争，是我们重大的政治任务同时也是我们今后教学工作的基本要求。

第四，教研室定期研究专家批评建议与教学经验，对于全院有意义的即呈请院部批准通报全院，仅限于教研室内部的也必进行全室会议研究执行。

第五，认真加强两个专业班的助教工作，是加强向专家学习的基本环节。因为教研室除艾思奇同志一人外，其余全部均做助教工作，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机会，一方面把专家要教给同学的东西，由助教来做一个好的桥梁使之正确地传给同学，另一方面助教又要很好地注意自己的学习。自己学不好也就帮助不了同学，而要帮助同学就必须自己学好。但是在这里我们确实要克服第一期助教工作的脱离群众的现象。第一期我们认为我们主要是学（实际上自己也没有学好），因此对同学帮助不大。我们认为在助教工作中现在有两件事值得特别注意：1. 是认真地帮助同学们弄通专家讲义，尽可能地帮助同学们学好经典著作；2. 无论如何要帮助同学们注意联系中国实际问题，特别是注意党在过渡

时期的总路线的问题，这一点在第一班是如何帮助他们提高的问题，在二班则是如何帮助他们开始的问题。关于联系中国实际问题苏联专家都给予了重大的注意，助教工作不从这一方面下点功夫，而只是限于对大家作一般的帮助，同学们是不会满足的。最后还必须指出助教在与专家接触中还必须注意学习专家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们献身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事业的精神，学习他们的高度国际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的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忘我劳动的精神，学习他们的善于为人师表的那种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精神，只有学到这些，才能更好地做好助教工作，才能更好地培养成党在思想战线上的好战士。

马克思列宁学院二部对党内中级干部进行哲学教学的经验

（1953 底）

如何对干部进行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教学？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工作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斯大林指出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曾反复教导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要学会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是包含在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哲学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说："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所以，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方法武器。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哲学教学，就是要设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个科学的方法武器交给干部去掌握，使他们有可能依靠这个武器来正确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是要帮助他们正确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并把这精神实质应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中。真正懂得了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哲学，就是真正从根本上懂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如何完成这样一个重要的教学任务，是值得仔细研究的问题。

马克思列宁学院二部几年来对许多较老的干部进行了理论教学工作，并把哲学作为一个重点的课程。在学员多，教员少，任务重，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教学过程中曾遇到许多困难，学习的结果也还有不少缺点，但由于应用了我党整风学习的经验，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反对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同时又利用参加学习的干部们都拥有相当的实际工作经验这个有利条件，启发他们的努力自学，终于克服了困难，完成了教学任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这里把二部二、三、四、五班和七、八、九班共五百多同学中的哲学教学工作经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几班的学员能代表我党为数最多的中级干部的情形。

一、参加学习的学员的基本情况

这几班学员的成分，绝大多数都是有 8 年以上党龄的，相当于地方系统县级以上（有少数省级的）或军队系统师团级的干部，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他们一般都长期地做过党的工作，经过了几次整风学习，对于党的工作方法是有些体会的。这就是说，他们的经历为他们提供了领会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哲学的可能条件。就文化程度来说，他们原来都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只有少数（百分之五左右）是高小程度，但在党内教育之下和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也有了一定的阅读书籍文件的训练。尤其是来马克思列宁学院以后，已经学习了半年以上才开始学习哲学，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经过院的领导方面和教员方面的反复启发诱导，已具有了钻研理论的初步的习惯，对于学习哲学的重要性也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准备了若干的历史的（主要是近代革命史）和理论方面的预备知识。这些条件使

他们对于用新的经典著作也具备了一定的自己钻研的能力。以上就是在他们中间进行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哲学教学时可以依靠的有利条件。

但在他们中间进行哲学教学,是有着许多必须克服的障碍的。绝大多数的同学从来都没有学过哲学或至多只是零碎看过一点哲学书,只有极少数的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有若干基本的理解。因此他们对于哲学就有着各种不正确的看法。很多人认为哲学是神秘难懂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以为只有专家才能学,而与自己无缘;或者以为哲学只在掌握大的方针的时候才有用,因此只有高级干部、中央领导同志才需要学习哲学;或者干脆认为哲学都是脱离实际的学问,在实际工作中不需要任何哲学;个别人又有一种庸俗的看法,说"喜吃爱穿也是一种哲学,人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哲学"。这些错误的认识对于学员们学习哲学的信心和决心都有着消极的影响。是在学习开始时就必须加以纠正的。

由于长期地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做工作,这些同学对于党的工作方法一般地都相当的熟悉,并且在他们的工作中也曾做出许多的成绩。但是因为没有学过或没有认真学过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哲学,因此仍缺乏自觉地、独立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情形在工作中的表现是正如有些人反映的那样:党抓得紧,自己也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去工作时,工作就做得较好,反之就难免要犯错误,而在一般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上经常要暴露许多缺点。这些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就其思想方法的本质来说,正是违背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原则,正是在思想上存在着片面性、表面性、主观性,缺乏群众观点和明确的阶级的分析观点的毛病。从一般的鉴定表上以及学习班各组的总结里,可以看到关于他们过去的思想缺点如

下的记录："意见不大合乎实际"，"依靠想象推断多于依靠实际材料"，"从一般概念出发"，"不能虚心、冷静"，"强调过去"，"怀恋过去"，"从问题的一面做出全盘的结论"，"左比右好"，"在工作中一般是从上级指示出发，不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用经验框子，套上事物的某些现象，作为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据"，"群众观点差"，"重视伟大人物多于重视群众"，"相信群众不如相信自己"。这种种思想方法上的缺点，在这些学员中间是带普遍性的。在进行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教学时，如果不改正他们这些思想方法上的缺点，是不可能真正完成任务的。

和以上的错误认识分不开的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际联系这一个原则的不了解。一些学员认为懂理论的人不一定能做实际工作，而能做实际工作的人不一定懂理论，因此两者没有关系。甚至于还有人把理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与工作有关的指导实际的政策，一部分是与工作无关的只供宣传之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员们虽然都知道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互结合的典范，但很少人能了解这个相互结合的真正意义。对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理的不了解，在学习中就表现为各种不正确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例如有的人以自己的某些工作经验而自满自足，对于学习哲学提高认识的必要性不予以重视，也有的人单纯地抱着多学些知识的态度来学习，盲目地扩大阅读范围，或把主要力量用来推敲名词概念的问题，而忽视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任务。这些错误不加以澄清，学习是无法顺利进行的。

此外，学员们一般都缺少历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这也是在学习过程中必须克服的困难条件。

二、哲学教学的任务、方针、方法和步骤

我们的哲学教学，就是针对着上述学员们的基本情况，来规定自己的任务、方针、方法的内容的。

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教学任务，就是要帮助学员们澄清对于哲学的神秘观点以及其他不正确的认识，使他们明确地认识到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用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武器，使他们明确地认识到我党的理论的正确性，党的纲领、路线、政策、指示等等都是依据辩证法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和中国社会及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来确定的，党的一套科学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也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使他们认识到为什么斯大林要说辩证法唯物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为什么党要求我们一定要把辩证法唯物论、历史唯物论作为我们研究问题和处理工作的方法原理，而不应该采用另外的方法，为什么违背了这些方法原理就是缺乏党性或党性不强的表现。通过这些认识，就进而启发学员们来自觉地努力改正自己的与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原理原则相违背的错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改正自己原来的认识上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的毛病以及缺乏群众观点和明确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观点的毛病，从而自觉地学习掌握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学习运用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理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来理解周围事态发展和工作发展的规律，来领会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政策和指示等等的科学的正确性，来总结工作经验，来找出成功的经验之所以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之所以失败的思想方法上的根源，以便有可能积累成功的经验，避免

重复错误。

哲学教学的方针，是应该与我们的任务符合的。马克思列宁学院的一般的教学方针是：“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这个方针也就是我们党的传统的整风学习方针，我们的哲学教学也坚持了这一个方针。这个方针的意义就是要引导学员们较有系统地钻研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原则，并应用这些原理原则来观察实际问题，领会党的纲领、路线、政策，检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把这些原理原则变为自己的思想武器，变为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处理工作的科学方法，并改造自己原有的错误思想方法。简单地说就是要通过哲学理论的系统的学习以达到改造思想，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套正确的世界观、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这个方针的贯彻，就包含着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也就是包含着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的意义。片面地强调学习理论，因而只注意钻研书本，在概念名词里打圈子，而不注意联系实际生活，不愿意检查自己的工作思想，改造自己的思想，这是教条主义的学习偏向。不注意钻研理论，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并随着学习的进度有重点地相当地逐步深入逐步多方面地联系实际，而是过早地急于全面检查工作和思想，把学习讨论变成无秩序指导的工作漫谈，甚至于把鸡毛蒜皮的纠纷代替有原则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经验主义的偏向。以上的偏向，是在教学过程中常常要遇到的，为了贯彻正确的教学方针，必然随时加以纠正。

根据上述的教学任务和方针，根据学员的基本情况和马克思列宁学院的教学条件（教员少、学员多、班次多），我们所采用的基本教学方法，就是通过教员的启发性的讲授，加上学习过程中的适当的辅导，引导学员积极自学，发挥他们自己所具有的有利

条件的作用，也就是依据他们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和自己经历过的党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来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原理原则，这样来逐步克服他们学员中所遇到的困难，完成学习的任务。运用这样的方法，一般地是通过以下的步骤的。

1. 在学习开始之前作一个总的动员报告，说明学习哲学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明学习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键，交待教学计划（包括阅读、讲课、辅导、讨论、总结等共四个半月到5个月的学习进程计划），反复地解释我们的教学任务和方针，针对着在学员中存在的某些与教学任务和方针相抵触的情况给予适当的批评，澄清学员中对于哲学所存着的神秘观点和错误看法，解除他们对于学习哲学信心不足的顾虑以及其他思想障碍。阅读计划主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哲学的基本经典著作作为教材，如：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反杜林论》（选读部分）；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和整风运动中的几次报告，以及毛泽东同志著作中对于学习哲学能够直接有所启发的文章。此外，党在当前的重要政策文件及各种重要工作报告，都作为联系实际必要的参考材料。以上阅读的教材和参考材料，是按照教学进程（二、三、四、五班是先唯物论，次辩证法，再历史唯物论；七、八、九班是先辩证法，次唯物论，再历史唯物论），适当分配在各个学习单元里，如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分配在唯物论单元里来阅读。在每一单元教员的启发讲授以后进入阅读过程，并组织小组讨论，必要时选择较重要的在学员中比较普遍地引起争论的问题来组织班为单位

的大讨论，最后每人写一次学习小结，在全部课程学习完时每人再写一次总结。

2. 在各个学习单元中，首先由教员作启发性的讲授。讲课内容一方面是要比较有系统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明确划清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同时又必须把理论原理的阐明与党的各项纲领、路线、政策，党的历史经验结合起来（在七、八、九班教学时，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已经公布，我们即把总路线总任务作为教学中联系实际的主要的内容），启发同学们领会为什么党的正确的路线、政策以及成功的斗争经验在思想方法基础上都是符合于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理的，而工作中的各种错误归根结底，是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而与形而上学、个人主义以及非无产阶级思想相联系的，使学员们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的从宇宙观到工作作风一贯地系统严整的科学，使他们了解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也就是要掌握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来分析和解决我们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就是要反对在处理实际工作实际问题时思想上的主观性、片面性、表面性，缺乏群众观点，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等等。以上教员们讲授的内容如果在学员中还有不能领会或不能深入领会的地方，就应该在辅导和讨论的过程中加以解决。辅导的任务之一是帮助同学来理解某些困难的经典著作内容，解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但必须注意上述理论联系实际的原理，避免单纯地只作技术上和名词概念上的辅导。讨论必须着重针对学习中提出的具有一定理论的和实际意义的问题。不论教课、辅导和讨论，都必须避免纠缠一些毫无实际意义的问题，如“茶杯和

桌子的矛盾何在”之类。

3. 为要使学员亲切地了解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意义，学会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其中心关键就在于要引导他们就自己本身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来提出问题加以解决。这不仅因为联系自己亲身经历的实际是一个最便利和最容易被领会的方法，而且因为只有通过这个方法才能达到改造思想和改进工作作风的目的，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成为真正自己的东西，以此作为基础，才有可能进一步联系比自己的直接经验更为广泛的实际问题。所以，改造思想不只是我们的学习任务，也是我们学习方法的一个基本部分，这个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是我党历次整风经验的积极成果所证明了的，而我们适当地应用到哲学教学中，也是正确有效的。这个方法的具体运用，就是教员在讲课之前通过支部来了解同学的历史情况和思想情况，在讲课中适当选择一些事例来加以分析批判，这就是说，教员讲课不只要像前节所说的那样联系社会历史事变的实际和党的纲领政策的实际，而且直接联系课堂中学员思想的实际。在学员们自己钻研经典著作的时候，必要适当反省自己思想、工作和历史，在课后小组讨论中特别是写学习小结或总结的过程中，也要推动学员们就相互间的工作和思想中所存在的问题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使每个同学通过自己工作中的成功经验来领会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原理的正确性，通过自己的错误和失败的经验来领会思想的主观性、表面性、片面性以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危害作用。这里必须注意一点，就是对学员的思想实际的联系必须是随着教学的进程有步骤有重点的进行。例如学习唯物论时着重解决思想的片面性问题，学习辩证法时着重解决思想的表面性和片面性的问题，学习历史唯物论时着重解决缺乏群众

观点和阶级斗争观点等等。

4. 关于学员们缺乏历史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困难问题，主要解决的办法是组织一些专题报告，如自然科学方面的米丘林学说专题报告，以及放映各种科学影片等等。

三、哲学教学的收获和缺点

根据以上的方针、方法进行哲学教学的结果，收到了相当好的成绩。这首先是打破了学员们对于哲学的神秘观点和各种错误看法，普遍地认为哲学是“可以学，而且必须学”的东西。学员们在学习后了解了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一系列的理论原理，而且开始领会到它的实际意义。例如在学习了唯物论单元后，不仅能够依据思维和存在的正确关系的原理来划清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界限，而且根据唯物论的根本原理而领会到在我们从事实际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时，为什么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首先注意“调查研究”，必须反对主观主义。许多同志根据唯物论原理检查了自己过去在土地改革、革命战争、城市工作中所犯的错误，懂得了它的思想方法根源就在于违反了存在第一、思维第二的原理，违反了反映论的原理，陷入了主观主义的盲目性的缘故。一个小组这样总结道：“从实际出发的口号，对这些同志并不是生疏的，但他们不真正知道，怎样才是从实际出发，不懂得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这次大家都认识到，要克服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就必须有明确的唯物主义的观点。”

又如学习了辩证法的矛盾法则，学员们理解到这个法则的意义就是要求我们在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必须就事物的矛盾的各方面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必须反对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于是就进而检讨了自己过去对许多实际问题——如党的总路线与党

的具体政策的关系，新老干部的关系，老区工作与新区工作的关系，党与个人的关系，以及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工作中的成功和失败的关系等等问题——的看法上的片面性。在学习矛盾论了解了“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的原则之后，就检讨了自己过去对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常常着重把原因归结到周围环境条件的困难，而很少就自己的思想毛病来进行自我批评，这种看法是片面的，违背辩证法的原则的。学习历史唯物论以后，学员们对于生产是社会的物质基础，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要力量，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以及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正确关系，都获得了一个较有系统的了解，并解决了若干自己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特别普遍的是大家都检讨了自己的重视个人英雄作用，忽视群众力量的历史唯心论观点。

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学习哲学使学员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而这认识提高的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阅读经典著作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时的领会能力和兴趣显著地增加了，对于党的路线、政策等等的了解比以前深刻多了，因此学习理论的兴趣和信心都大大加强了。“现在读毛主席的著作，觉得字里行间，辩证唯物论的精神活跃地在我们的眼前跳跃着”；“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密切相联的”；“过去对党的政策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这就是我们在工作中左右摇摆犯错误的根源，现在懂得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去观察社会历史，观察社会生活，进而了解党的政策的制订是以社会生产发展规律为基础的，这对今后工作中克服盲目性、提高政策性和思想水平，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就是学习中具有代表性的反映。

认识提高的效果和思想改造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学员们在学

习哲学后思想作风上开始有了某些显著的变化，最主要的就是对待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表现了比以前更为虚心的和严肃的态度，相互间批评与自我批评随着学习的进程而逐步地、很自然地普遍开展起来，特别是七、八、九班学到矛盾法则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的原理时，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获得了理论上的自觉的指导力量而更加开展。有的人这样写道："改造自己的思想，首先要经过内心斗争，不能全靠外因"，学员们在过去曾受过党的教育，对于思想改造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意义是有相当理解的，但大家都认为从来没有像这次学习哲学那样从根本的思想基础上获得了最深刻的认识。几乎每班每组都有人不约而同地说："像这样深刻的教育，在我参加革命以来还是第一次！"

我们的哲学虽然有以上的成绩，但缺点还是不少的。最主要的是缺乏完整的教学计划和严密的教学组织，教学进程常常有变动。教员间的集体商讨和审查讲授提纲或讲稿的制度没有认真建立起来，不能不影响讲授的质量和我们的方针的贯彻，特别是在二、三、四、五班教学时，有的教员事先不作充分准备，在讲台上随意发表自己的意见，以至有时把错误论点灌输给学员，并表现了教员相互之间在同一问题上讲法的不一致。讲授内容的系统完整性也很不够。由于人力不够，在学员中对他们自学的辅导工作做得不及时和不充分，对班和小组的讨论也缺乏经常的细致的检查和领导，不能随时交流各班的经验并及时解答学习和讨论中所提出的问题，随时纠正某些缺点和偏向，因此教学的成绩在学员中是不平衡的。这些缺点在七、八、九班进行教学的时候，因为开始有了教学研究室的组织，因此已有一部分改正，但还需要更大地努力，才能完全改正。

四、教学经验的几点主要的体会

上面说过，我们的哲学教学对象，是我党为数最多的中级干部，他们具有相当多的实际工作经验，而却缺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首先是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方法的武器。如果用毛泽东同志的“有的放矢”这个比喻来说明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方法，那么，对这些干部的哲学教学任务，主要的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方法这一支“矢”交到他们手里，使他们学会用它来射中国革命实际之“的”使他们由一般地有些实际经验和一般地懂得一些党的工作原则提高到能够自觉地应用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原理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问题就在于如何把这支“矢”交给他们去掌握，也就是如何从思想方法上提高这些干部。马克思列宁学院的哲学教学，初步地摸到了一些解决这个问题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一般的中级干部——也可以说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应该说是普遍适用的。

哲学教学方法的本质，就在于要贯彻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精神，就在于要全面地掌握“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方针。首先必须使我们的干部钻研一些经典著作，比较有系统地学习哲学理论，因为他们所缺少的主要的就是这一方面。然而要把书本上的理论真正变为干部自己所能掌握的东西，专靠死读书本或讲授一般原理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要达到这个目的最有效的入门方法，就是依据我党整风学习的经验，使学员用书本上和教员讲授中所学得的原理检查自己的工作经验和思想作风。这对于有些工作经验的干部们，又是比较便利的，不“学习理论，提高认识”，就没有“矢”，就谈不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联系实际，改造思想”，不把“矢”对准一定的“的”来放射，

就不可能体会到"矢"的作用，就不可能真正提高认识，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所以，哲学教学方法必须是引导着学员注意到要边学边用，边钻研理论原则，边考虑到它的实际意义，而不应把学习理论和联系实际在学习过程中截然分开。自然，这并不是说上述16个字方针的各个方面，任何时候都是要平均地同时出现，在学习过程的不同阶段，着重地掌握整个方针的某一个方面，这是容许的，也是应该的。例如在听讲、阅读的时候，侧重理论内容的钻研；在做学习小结或总结的时候，侧重联系实际，特别是检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但是，在着重钻研理论原则的时候，必须随时注意考虑到每一理论原则在我们生活中、工作中的实际意义，以避免对理论原则陷于教条主义的空洞了解，在着重检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实际的时候，必须随时注意到理论原则的指导，以避免陷于经验主义的无秩序的工作漫谈。

所谓实际，决不能狭隘地看做只是个人的直接经验。我们把检查个人的工作和思想作为学习用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心环节，是因为这是学习哲学以及一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有效的入门方法，而并不是说这已是全部的方法。通过这个入门方法，我们要引导学员联系更广泛的实际，自然科学的实际，生产的实际，阶级斗争的实际等等，来加深学员们对于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的理解。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必须适当地用自然界的，社会发展史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以及党的政策路线的知识，来丰富学习的内容，而尤其要以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方法的基础上来领会党的政策、路线等等作为全部哲学教学的重点和归宿。正因为这样，在我们的哲学课程教学全部结束了以后，我们还不能说是哲学的学习就从此告终了，在转入其他课程（如苏共党史、中共党史等）的学习后，我们还要

启发学员能继续运用哲学学习所获得的方法武器和领会这些课程的内容，并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来不断加深和提高自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科学的思想方法的认识。

每一班的教学经验都证明了，执行上述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方针，是必然要遭到各种不同程度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抵抗的，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如果不设法引导学员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是难于前进的。必须正确地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使之作为实现思想改造和推动学习前进的动力。我们的哲学教学是从最初的动员启发报告、讲课、辅导、讨论，直到最后进行思想总结，都不断地进行了必要的适当的思想斗争。作为教学方法的思想斗争，应该依据着这样的原则：即把坚持严肃的批评和强调启发自觉自愿地进行自我批评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即一方面坚决反对自由主义，一方面要适当地防止生硬过火的斗争。这两方面的结合又要随着学习的发展和学员思想情况的变化而有所侧重。就七、八、九班的经验来说，在学习辩证法单元以前，是侧重于鼓励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开展。当批评自我批评已经普遍开展，自由主义的倾向基本上已被克服了时，一般是在学习历史唯物论单元，特别是在最后做思想总结时，就侧重于强调自我批评和自我检讨的自觉自愿性。

要保证哲学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教学组织的集体领导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主要应该注重以下几点：1. 教员对于所讲授的内容一方面必须个人负责充分准备，另一方面讲稿必须经过集体审查，至少某些重要问题的解释，特别是新的问题的解答，必须经过集体的讨论。必须反对教学工作中的个人主义和分散主义，反对个人自以为是地任意发表意见，以便尽可能地避免讲授方面的错误，或同一个问题在不同教员中间讲法不一致，使学员无所适

从。2. 教员、辅导员与同学，特别是与支部、班和组的骨干分子必须密切联系，以便了解同学的历史、思想情况和学习发展情况，使讲授和辅导内容能够针对学员的思想实际，充分贯彻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方针。这里要反对脱离学员群众的教学上的官僚主义。3. 必须组织学员中间的集体互助，这是在教员少、学员多、班次多的情形下补助教学力量不足的一个重要方法。学员中的互助应包含阅读的技术问题(如因某些名词概念的不了解和某些自然、历史常识的缺乏而发生的技术困难）上的互助，理论原理的领会方面的互助，而特别要着重思想方面的互助，在进行学习小结或总结，进行检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时的互助。就这样的意义来说，那么，相互批评也应该看做是一种互助的形式。

学习斯大林的学说，为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

（1954.3）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不朽的列宁的战友和列宁事业的天才的继承者，和列宁一起在十月革命时期共同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在列宁逝世后领导着苏联人民把这个国家建设成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斯大林同志，已经逝世一周年了。

当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写了题名《最伟大的友谊》的悼念文章，指示我们说："为着纪念我们伟大的导师斯大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名义下的伟大友谊将无限地加强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更加紧学习斯大林的学说，学习苏联的科学和技术，以建设我们的国家。"（毛泽东：《最伟大的友谊》，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5页）一年以来，我们看到的事实正是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方向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最伟大的友谊更进一步加强了。为着建设我们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学习斯大林的学说和学习苏联的科学和技术的热潮进一步高涨起来了。

我们国家已进入5年建设计划的第二个年头。我们的国家建

设所遵循的道路，是逐渐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道路，也就是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所曾走过的道路基本上一致的道路。为着正确地把握当前我们国家各方面的事变发展规律和工作规律，争取实现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我们要热烈地来学习苏联的科学和技术，学习斯大林的学说，特别是关于过渡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学说，这是很自然的。

列宁曾奠定了过渡时期的基本理论，并以此指导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在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后不久，列宁就逝世了。斯大林领导着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把列宁的思想和列宁指导下开始了的事业贯彻下去，胜利地实现了“使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体会议上的演说》，《列宁选集》第17卷，1949年东北新华书店版，第105页）的列宁遗志。完成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过的任务是不能不经过艰难的斗争的。在苏联当时，这不但要打败国内外的资产阶级的反抗行为，而且要粉碎那些混在党内为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极力妨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反对派”分子的种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荒谬言论和阴谋活动。斯大林在斗争中捍卫了和向前发展了列宁关于过渡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学说，在他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实践完全证实了这学说。

毛泽东同志对于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所获得的胜利这样评论说：“这个胜利用最现实的生活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限正确，具体地教育了全世界劳动人民应该如何朝着美好的生活前进。”（毛泽东：《最伟大的友谊》，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页）我们中国人民现在正是在这无限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之下，朝着苏联人民已经为自己创造了的美好生活方向前进的。学习斯大林的学说，就会使我们在争取实现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斗争中获

得无穷的力量和信心。

斯大林在指导苏联人民胜利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首先捍卫了和发展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思想。恢复时期结束以后，苏联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能够自力出产必需装备品的工业国。由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形势，这个任务必须在短期内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是首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指出，把重工业放在建设的第一位，是标志着社会主义工业化方法与资本主义工业化方法根本不同的特点。“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方面开始。因为在轻工业方面，较之重工业来说，所需要的投资数量是少些，资本周转得快些，而且获得利润也容易些，所以那里的轻工业，也就成为工业化的首先的对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让轻工业积蓄一些利润而将其集中于银行以后，才会轮到重工业方面，开始来逐渐把所积蓄的资本转用到重工业中去，造成保证它发展的条件。但这是一个悠久的过程，需要在数十年长久的时期内，静待轻工业发展起来，而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形下勉强过活。”（《斯大林同志于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选区两次选民大会上的演说》，1950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6页）在苏联，首先发展了重工业，才有可能依靠自己国家的力量，来使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事业迅速获得现代化的装备；才有可能加快工业化的发展速度，使自己国家在较短的时期内达到经济上完全独立的先进国地位；才有可能使广大农民尽快地获得大量的农业机械装备，以完成农业集体化即在农村中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所以，重工业的建设，是能够带动一切向前进步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枢纽。斯大林说：“不是说随便怎样发展工业都是工业化。工业化底中心，它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五金等等），归根到底，

就是发展生产资料底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斯大林：《论苏联经济状况和党底政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页）。大家知道，苏联一开始进行五年计划建设的时候，就是以这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正确思想作为指导方针的。斯大林说：“五年计划底基本任务，就是要在我国创立一种不仅能把全部工业，而且能把运输业和农业都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改组过来的重工业。”（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底总结》，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页）

在苏联实行工业化的时期，斯大林坚持了工业化必须与劳动人民的利益相一致的原则，驳斥了“反对派”要以剥削农民的办法来实行工业化的谬论。斯大林又坚决驳斥了某些人以为不必从重工业开始而应该从轻工业开始来进行工业建设的资本主义思想，这也就是企图以延缓工业发展速度来阻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动思想。

从发展重工业来开始实行国家工业化，这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因为重工业需要非常巨大的资金，必须迅速地聚集起这样的资金，才有可能来开始建设，但要聚集这样巨大的资金，又决不能依照资本主义国家的方法，如英国式的掠夺殖民地的方法、德国那样通过战争取得战败国的大量赔款的方法、或旧俄国那样在奴隶性的条件下出让厂矿租借权以取得奴役性的借款的方法，而必须依靠自己，从工农业生产中实行节约的积累方法。斯大林说：“为发展工业而自行节约的道路，社会主义积累底道路，这条道路，列宁同志曾多次指出，是使我国工业化的惟一道路。”（斯大林：《论苏联经济状况和党底政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9页）要遵循这一条道路来聚集工业化的巨量资金，是极困难的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中的头等重要的问题。然而，斯大林估计到苏联的社会制度所具有的种种优越条件，指出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并且

坚决地领导着苏联人民实施了一系列的节约办法，解决了社会主义积累的问题，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捍卫了并发展了列宁关于农业集体化的学说。斯大林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发展，必须引导个体农民逐步走向集体化的道路，以建立农村的社会主义基础。不建立起农村的社会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就是不稳固的。还在 1928 年，苏联就遇到了粮食困难的问题。斯大林分析了当时的情况，指出粮食困难的根源就在于当时苏联农业的主要基础，还是“商品粮食出产量极少的小农经济和中农经济”（斯大林：《在粮食战线上》，1953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4 页）。在这样的农村经济基础上，要想能够满足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的城市方面的粮食和原料的要求，是不可能的。因此，解决粮食困难问题的根本出路，首先就在于把落后的散漫细小农庄联合为先进的大规模的公共农庄，就在于实行农业集体化。农业集体化的好处，就是“它使我们能于几年以内便在全国布满了能够采用新技术，利用一切农学成绩，而多多供给国家商品农产物的巨大集体农庄”（《斯大林同志于 1946 年 2 月 9 日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选区选民大会上的演说》，《在莫斯科城斯大林选区两次选民大会上的演说》，1950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27 页）。

当时曾有人认为富农经济也能生产较多的商品粮食，因此把恢复富农经济，发展和扩展富农经济，当做逃出粮食困难的出路，这就是布哈林集团“反对派”企图用来反对农业集体化和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荒谬主张。斯大林对这种反动的主张给予了坚决的驳斥。

斯大林在实践上证明了领导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发挥了以合作社运动作为个体贫农中农经济过渡到

集体公共农庄的桥梁这一个重要的原理。斯大林在总结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胜利经验时说，这些胜利的获得，“首先就是由于合作社和合作社运动底发展。毫无疑义的，如果没有合作社，特别是那些在农民中间造成了赞助集体农庄的心理基础的农业合作社雄伟的发展，我们就不会有像现在整批整批农民阶层所表现的这种趋向于集体农庄的热心。”（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6页）

斯大林领导的集体农庄运动完全证明了列宁合作社计划的伟大作用。苏联的集体农庄运动就是在合作社加强了的时候才发展起来的。斯大林说：“集体农庄一般说来是合作社运动不可分开的组成部分，局部说来是列宁合作社计划不可分开的组成部分。实行列宁合作社计划，就是把农民从销售合作社和供给合作社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提高到集体农业合作社。”（斯大林：《在粮食战线上》，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0—11页）

斯大林指出，必须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把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斯大林指出，列宁所提的“无产阶级及贫农与中农实行坚固联盟”的口号，“乃是适合于我国革命新时期即广泛建设时期的惟一正确的口号。其所以正确，不只因为现在可以指望这种联盟，并且因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时应该在农村中运用的不只是数百万人，而是数千万人。不然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7—58页）。斯大林指出，在发展工业和实行农业合作化中间，就可以找到工农联盟的基础。“提高农民经济，大量地使农民合作化，改善农民物质生活状况，乃是这样的一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不能保证我国工业有稍微重大的发展。反过来说，

发展工业，出产农业机器和拖拉机，以大量工业品供给农民，也是这样的一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不能向前推进农业。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农民联盟极重大的基础之一。”（斯大林：《论苏联经济状况和党底政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6页）斯大林又指出，由于工农联盟是为了要把农民引导上集体化的道路，是要走上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因此在工农联盟中必须要保证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我们所捍卫的不是工人阶级和农民底任何一种联盟。我们所主张的是领导作用属于工人阶级的这种联盟。”（同上书，第27页）因为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劳动人民是不能完成上述的任务的。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捍卫了党的统一，贯彻了党内民主和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领袖，要保证党能够成为领导工人农民在争取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斗争中百战百胜的领导力量，就必须有党的统一。斯大林说：“我们过去是由于什么而强大的，我们现在又是由于什么而强大的呢？就是由于正确的政策和我们队伍底统一。”（同上书，第31页）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胜利的过程中，资产阶级不但要从外部来进行反抗，而且要从党的内部来进行破坏，苏联当时的“反对派”就是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阴谋以分裂党的方法来破坏党的事业，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的。在斯大林的指导下，党揭露了他们的反动的面貌，把他们孤立起来，因而保护和巩固了党的统一，党的队伍的团结。

斯大林指出，党的统一和党内民主是分不开的。斯大林纠正了那种把党内民主看做是各派别集团的自由的误解，指出“党内民主就是提高党员群众底积极性和巩固党底统一”（斯大林：《论苏联

经济状况和党底政策》，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0页)，就是使党的“各级组织吸引那些创造我们党底命运的广大党员群众来参加我国建设问题的讨论”(同上书，第28页)。党内民主就是要开展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各个组织的工作放在党员群众的监督下面，使各种错误和坏事受到揭露和批判，使全党在正确的思想原则下团结起来，这样就使党能够发挥最大的领导力量，来提高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为胜利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斗争。

斯大林强调了党的集体领导，把它看做是与党的统一和党内民主不可分的党的组织原则。针对着“反对派”的反党活动，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的大会讨论的结论里指出：“集体工作，集体领导，在少数服从多数条件下实行党内一致，实行中央各机关中的统一——这就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东西。”(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9页)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里，曾经用当时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作为例子，指出这个包含200至250个同志的“我们党内迄今所未曾有过的一个最民主和按集议制动作的中枢”(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4页)，在领导工作上就具有着很大的优越性，这就使得把解决工作中各项极重要问题的责任,“日益更加从狭小上层机关手中转到这个广大中枢手中，转到这与一切建设工作部门及与我们这辽阔无垠的国家所有一切地区保持着极密切联系的中枢手中”(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4页)这个遵循着集体领导原则的、在高度的党内民主基础上坚强地统一着的共产党，领导

苏联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斗争。

我国目前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正在日益向着胜利的前途迈进。我们前进的方向，与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所走的方向是一致的。同样，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中，也有着种种必须克服的困难，也必须粉碎敌人的反抗。力求卷土重来的帝国主义和那些坚决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还要进行一切可能的破坏，甚至于还会妄想在共产党内进行制造分裂的阴谋活动。对这一切我们都需要警惕，需要进行斗争。为着实现这些任务，为着进行胜利的斗争，我们应努力从斯大林的学说中获取教益，把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英勇斗争作为我们的榜样。

（原载《学习》杂志 1954 年第 3 期，1954 年 3 月 2 日）

不能忽视政治*

(1954.4)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愈来愈多的青年同志们献身于自然科学和工农业技术的学习，我们甚至可以说在青年中间有了一种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潮。这是很好的现象。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需要大量的科学技术人材，但旧中国的反动统治，长期地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我国的科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使我国的科学技术人材非常缺少，这是新中国经济建设事业所遇到的困难问题之一。我们正在从各方面来克服这个困难，大批青年从事科学技术的学习，也是克服这个困难的关键之一。所以，目前青年中间学习科学技术的这种高涨的热情，是完全应该加以肯定和加以发扬的。

但是，能不能说，青年们只要埋头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其他一切的事情——特别是政治的事情不闻不问，就可以成为真正满足祖国建设需要的人材呢？能不能说政治的学习和锻炼对于他们是可有可无的或不需要重视的呢？当然不能这样说。没有政治学习和政治锻炼，即使学好了科学技术，要想在实际工作中把自己的科学技术很有效地贡献给人民，保证不至于犯重大的错误，不

* 本文发表时，《中国青年报》曾有编者按。编者按说：政治学习和政治思想锻炼，是每个青年建设者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重要方面。艾思奇同志这篇文章是对学科学技术的青年写的，但是它所提出的问题，对广大青年也十分重要，值得大家好好阅读。

至于使国家遭受许多不必要的损失，是很困难的。

从几年来新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找到数不清的事例来证明上面所说的道理。现在我们就以成都车站设计为例来谈，根据实际运输量和今后发展情况来看，这个车站即使在几十年以后也只要占三千多市亩面积就够了，但现在却占了七千多市亩的土地。其主要原因是有些工程师盲目地要求建筑物宏丽堂皇，追求所谓“高级”的技术设计。由于车站面积的扩大，不仅投资增加25亿元以上，而且使农业生产每年损失一百九十余万斤粮食。这些设计成都车站的工程师们的技术不见得不高，但是他们却不懂得节约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资金的根本方法，他们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不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缺乏对国家财产的负责精神，结果使国家财产遭受了严重损失。从这个最普通的例子就可以看出，青年如果只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注意政治修养，是难于真正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的。

斯大林同志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政治觉悟，他在联共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里，曾特别讲到这个问题，他说：“在国家工作和党工作任何一个部门中，工作人员底政治水准和马列主义觉悟程度愈高，工作本身也愈高，愈有成效，工作底结果也愈有效力；反过来说，工作人员底政治水准和马列主义觉悟程度愈低，工作中的延误和失败也愈多，工作人员本身也会愈加变为鼠目寸光的小人，堕落成为一些只图眼前利益的事务主义者，而他们也就愈易蜕化变节，——这要算是一个定理。”又说：“我们的年青干部底培养和形成，通常都是按着个别科学部门和技术部门，按着各个专门知识来进行的。这是必要而且适当的。没有什么必要使得一位医学专家，同时又是一个物理学专家或植物学专家；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但有一个科学

部门的知识，却是所有一切科学部门中的布尔什维克所必须具备的，这就是马列主义关于社会、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规律以及共产主义胜利的科学。”斯大林同志的这些话，是值得我们学习科学技术的青年同志们来认真地，仔细地加以领会的。

目前在一部分学习科学技术的青年中间，有一种轻视政治的倾向，他们以为谈政治是白费时间，而不关心总路线及时事政治的学习，不关心自己的思想锻炼。他们中间有的人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争取“五分”这一件事情上，以为这是学习的惟一目的，至于思想政治的问题，等将来到工作岗位上再慢慢解决不迟。这种倾向是不正确的，是必须改正的。当然，争取科学技术的优良成绩，也是学习上的一个必要和重要任务。但是如果一个学科学技术的人把眼光仅仅局限于“五分”的问题上，而把政治思想的修养锻炼推到遥远的将来，那就是等于说，他要等到将来在实际工作中犯了和上面例子中的那些工程师一样的或比那更大的错误之后，要让国家遭受了像上面一样的或比那更大的损失之后，才肯开始考虑自己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修养锻炼问题。难道我们可以说这种情形是合理的吗？

有些人有一种错误的想法，他们以为目前国家的各项工作已经有了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科学技术部门的工作人员只要接受党的领导，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把工作做好，个人的政治思想学习即使差一些也没有关系。这种想法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不了解：如果真正是接受党的领导，就必须要对党的理论、党的政策有所认识。如果对于党的理论、党的政策没有什么认识，甚至于就根本不去关心它们，例如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及国家建设各方面的政策根本不去关心，那么，所谓接受党的领导就是一句空话，因

为这表明他们并没有认真考虑如何接受领导，应该跟着领导向什么方向走。这就等于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接受了领导。因此，既然说到接受党的领导，就不能没有政治学习。

有的同志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想法，他们以为过去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科学家、发明家，他们曾经给人类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他们并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政治锻炼，因此，今天学习科学技术的人似乎也不必重视政治。这种想法之所以似是而非，是因为把眼光限制在过去，却忘记了今天和将来。他们不知道我们今天所要完成的事业是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复杂更艰巨的事业，不知道过去的科学发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比起我们今天所要完成的整个事业还是很小很小的。我们现在要把人类社会从根本上加以改变——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从事这样的事业不但需要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空前未有的高涨，而且需要进行最激烈最复杂的阶级斗争，最激烈最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一切都是过去时代所不能比拟的。不广泛提高各种工作岗位上的——包括科学技术工作岗位上的人们的政治觉悟，要完成这空前复杂的任务，——不但要在科学技术方面，要在与自然界的斗争方面取得空前的胜利，而且要在阶级斗争方面，在与社会上一切腐朽势力斗争方面取得空前彻底的胜利——就是不可能的。

总之，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忽视政治的青年，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政治学习和政治思想锻炼的问题：

第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能不通过激烈的、复杂的阶级斗争，不能设想可以风平浪静地达到彼岸。因为我们的任务是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彻底解放广大人民。因此，不但被打倒了的过去的反动统治者还要企图用一切方法来破坏我们的事业，就是国内资产阶级，对我们国家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

也不会没有反抗的。在激烈的复杂的阶级斗争前面，如果不提高政治警惕性，如果对于我们的敌人以及反抗社会主义建设的人的一切可能的破坏行动表现麻痹，就难免要在不知哪一天，突然在什么地方遭受一个意外的袭击，而造成很大的损失。决不要以为科学技术的领域里没有严重的阶级斗争。1954 年 3 月 9 日《人民日报》在刊登破获反革命组织“青锋社”的消息中，就指出这些罪犯进行特务活动的主要方式是“想尽一切办法打进我们的要害部门”。要知道敌人可以利用我们任何一个不经心的机会，用小小的一个炸弹或一包炸药，在一瞬间毁坏我们千万劳动人民在长久的日月里用血汗凝成的建设工程，或者利用技术本身的复杂的机构，找一个关键的地方制造一个重大事故。如果我们的科学技术部门的工作人员不是经常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这样的严重损失是一定不能避免的。而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要能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他就必须有高度的革命的政治觉悟，必须了解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际，必须懂得在阶级斗争中分清敌友，必须认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各项阶级斗争的政策，必须充分估计到我们的科学技术工作和阶级斗争的必然的联系。这样他才能不但在技术上努力改进我们的工作，而且能在政治上经常来关心和保卫我们的工作，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建设事业的成功。所以，政治学习和政治锻炼，对科学技术工作者决不是可有可无的。

第二，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阶级斗争不仅表现在上述的敌对阶级的政治破坏上，而且还表现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特别尖锐复杂的思想斗争上。社会主义建设不是少数人的，更不是个人的事业，需要全国人民和各种工作岗位上的干部一致努力，才有可能完成。这就需要每一个人在工作中发扬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精神和克服个人主义思想。这就

是说要能决心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广大劳动人民，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人民的利益，凡事不是首先考虑个人的需要而是首先考虑人民的需要，是要能够把眼前的个人利益和长远的人民的利益正确地结合起来。否则，如果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是思想上政治上觉悟很低眼光狭小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整天盘算个人的名誉、地位和各种物质报酬，处处埋怨自己的工作不够“显眼”或不够“理想”，怎能设想他会把自己的力量真正贡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呢？要在工作中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就必须经常注意政治锻炼和政治学习，就必须学习党的理论和政策，必须注意国内外时事，特别应该了解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要知道我们还受着资本主义思想的包围，如果我们对上面所说的一切盲目无知，对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和集体事业的要求不了解，我们就会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放松警惕，弄到头脑里所想的只是一些眼前的身边事件，弄到“鼠目寸光”，肚子里装满了个人打算。因此，政治学习和政治思想上的锻炼是一分钟也不能放松的。

第三，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是极大的，它包括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最深刻的变革，在工作方法上需要我们有高度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并善于启发和依靠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要反对旧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部分青年同志中间往往有许多脱离实际的空想，他们常常想着“一鸣惊人”的创造发明，但在实际工作中又粗心大意，不肯做切实的调查研究工作，画设计图纸往往简单图快，弄得潦草不清。在工程技术的实施中往往拘泥书本的个别原则或过去的个别经验，不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学习群众的丰富的经验，不善于依靠他们的创造活动来总结出先进的工作方法。这些青年就需要加强政治思想锻炼，克服上述的毛病，才有可能好好地为国家工作。

根据以上几点的说明，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学习科学技术的人一定不能忽视政治锻炼的道理。希望目前还没有了解到政治的重要性的青年同志，仔细考虑这些道理，在学习科学技术的同时，不放松对政治的关心，使自己将来不但能掌握最进步的技术，并且能有最高度的政治觉悟，那我敢相信他们就能够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很大的贡献。

（原载《中国青年报》1954 年 4 月 27 日）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引言报告*

(1954.9)

今天开始讲哲学课。

我们要在七个礼拜的过程中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课讲完。

我们学习的基本用书和参考书都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经典著作。

我们没有采用教科书，当然这不是因为教科书不好，而是因为我们的学习时间并不太长；而且，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应该钻研经典著作，这样，我们就不应该再找其他的参考书。

当然，如果有的同志看书看得比较快，在把指定的参考书看完了以后，还是可以找一些其他参考书看一看的，但不能把那些书当做主要参考书。实际上，我们指定的经典著作都是最可靠的；而一般的教科书多多少少都是有些缺点的。是的，苏联的教科书大都是比较好的。最近，亚历山大罗夫编了一本辩证唯物主义，这个书就是写得较好。但问题就在于这些教科书都有些缺点，而且不完全适合于我们老干部参考之用，因为在教科书里面对自然科学讲得比较多，这些对我们说来还不是迫切需要的；当然，将来

---

* 这是艾思奇1954年9月21日给马列学院二部学员的讲课速记稿，共三讲，这里只收第一讲，其他二讲因重复而删去。在整理时只作了文字的加工。

我们还要讲一些自然科学，因为我们完全不了解自然科学也是一个缺点，也不能很好地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然而，如果学的自然科学太多了，对我们现在的学习也是不太好的。同时，我们对一些专门的自然科学知识还不是可以很好理解的，除非我们具有高中、大学的自然科学知识才能懂得。不懂，这是一方面；另方面，我们也不十分需要，因为我们同志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不是研究自然科学的，自然科学和我们的工作需要是没有多少关系的，所以不必要更多地来讲自然科学问题。还有，有些教科书在理论说明上也可能有个别的错误。

经典著作就是最可靠的。经典著作是第一手的著作，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要依靠第一手的著作，而不要依靠第二手的著作——根据第一手的著作编写出的一套著作。

我在这里所以要讲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有些同志不注意这个问题，不注意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要依靠经典著作，或者至少是轻视这一点，相反地，倒要去依靠普通的教科书。比如，有些同志要到处乱看参考书，这种热情是值得奖励的，但这样做下去可能就要吃亏，也得不到好结果。如果他看的参考书里边错误很大，那么，他就会跟着犯错误。当然，最近苏联出的教科书，其中根本错误是没有的，可是小的缺点、错误还是可能有的。虽然，教科书的条理可能比经典著作要清楚一些，也好懂一些，但是要知道，苏联同志写的教科书既然有缺点，而我们中国人写的书，其中缺点就会更多一些。我过去曾经写过一本《大众哲学》，它的缺点就很多。

我们现在讲的讲题，大体上是根据苏联的教科书编定的，当然在理论上的说明还是根据经典著作。关于经典著作，除了斯大

林和毛主席的著作比较好懂以外，列宁的某些著作也比较好懂，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我们可以组织一下辅导的解释，大家把问题提出来，我们找人解答。

现在正式讲"引言"。准备分作三个部分来讲。

一、辩证法唯物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又是马克思主义者用以认识世界和革命地改造世界的方法论

这一部分主要是说明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是什么东西，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占什么地位，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性质是什么。

同志们只要是在过去读过列宁的一些著作，就知道列宁曾经说过：整个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这三个组成部分就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

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占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不只是包括辩证法唯物论，还包括历史唯物论，这二者合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所谓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说它是与马克思主义分不开的。讲马克思主义，就一定要讲哲学；要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就一定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整个马克思主义是三个组成部分密切结合起来的一个整体，三个部分是联系着的，不可分割的，去掉了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起一直到现在，在历史上有一种机会主义者，他们的特点之一，就是想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欧洲的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自己号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有

自己的哲学，认为可以用唯心论、二元论来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可以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哲学这一部分在马克思主义中可有可无。

从前，在俄国也有过这样的问题。在1907到1908年，列宁写了一本书《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列宁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批判那些错误的东西。当时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以后，有些本来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动摇了；动摇的表现最主要的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应该改变一下，认为恩格斯坚决拥护唯物论是不对的，他们认为应该用最新哲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要用唯心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列宁当时虽然工作很忙，但还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来写这本书，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能取消的，绝不能用任何其他东西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列宁认为，辩证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性，马克思主义的党就要坚持唯物论，决不能和唯物论脱节。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明确地知道，凡是在我们党内犯路线性系统错误的人，他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方法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们中国，从陈独秀的投降主义一直到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以及以后抗战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最近工会工作的错误，这些都是路线的错误，政策的错误。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就是在研究问题、看问题的时候违背了唯物论的原则、辩证法的原则，也就是说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主观主义就是与辩证法唯物论相反的思想方法。毛主席所以一再教育我们要与主观主义作斗争，就是因为主观主义者抛弃了唯物论，抛弃了辩证法。当然，他们抛弃了辩证法唯物论，也不是有意识地这样做；在这里要说明，第二国际和经验批判论这些人们就是自觉地抛弃辩证法唯物论。我

们这些犯错误的人，并没有公开地讲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也没有一套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们倒公开地讲："我赞成辩证法唯物论!"如果我们问一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犯"左"倾错误的王明同志："你是不是反对辩证法唯物论?"他就会说："我不反对!"可是，他当时在实际上是离开了辩证法唯物论的原则，他的思想不能反映物质，不能反映客观情况。解放以后，工会工作所以犯政策错误，就是因为在工会领导人的思想上脱离了现实的物质生活。本来在解放以后，工会就应该注意生产，而不应该把工人福利当做惟一的问题。在解放以前，工会可以把工人福利当做第一位的问题；解放以后，客观情况就要求我们着重地去搞生产，这样，工会就应该组织工人进行劳动竞赛，搞技术革新。而犯错误的人的思想就是主观主义的，是不能反映客观物质生活的，是离开了唯物论原则的。

从以上所谈的这些例子就可以看出，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党的发展历史可以证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哲学是与马克思主义分不开的。我们只要一离开这个东西，就要犯错误。反过来说，犯错误的阶级根源是由于他站的不是无产阶级立场，从思想说来是思想离开了物质生活，离开了唯物论，走到了主观主义方面去。所以，不能掌握唯物论的原则。就一定要犯错误；反过来，犯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懂得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看问题。

关于这个道理，如果不学哲学，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没有哲学知识，犯了错误，也不知道。学哲学就可以弄清楚这个问题；弄清了这个问题，就使得我们懂得，要做一个真正的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成为一个觉悟很高的共产党员，就一定要坚决地很好地来研究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哲学，要想办法使自己能够自

觉地来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把它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方法。所以我们要反对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在我们党内并不是个别的，这就是认为哲学是可学可不学的东西。就是在座的同志有的也可能有这种心理；最低多多少少也存在着对哲学是非学不可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当然，在马列学院以外，这种情况就更多一些。有些地方，有些同志就认为可以不学哲学；甚至我们党办的一些研究班、训练班也不要哲学；有的是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课程，而不要辩证唯物主义；甚至有的地方争论起来，他说不学哲学，我说学哲学。这种不重视学哲学或者不要哲学的思想是要不得的，我们要坚决反对。

斯大林在“联共党史”中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这种提法就可以说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占的地位。这就比如盖房子，如果基础打得不稳固，房子也就盖不好。如果有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说，我可以不要哲学，这就等于说盖房子不要打地基一样。

那么，为什么说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呢？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用来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了这种立场、观点和方法，然后才能用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如果不能掌握这种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对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都会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出发点，如果出发点错了，路线就会错了，方法就会错了，整个问题的解决也就会错了。所以，毛主席在反对主观主义的时候，特别强调要学习哲学，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

所谓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从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中去掌握，用无产

阶级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唯物论的观点，辩证法的方法去观察问题、解决问题。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无法反对主观主义，就不能正确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理论，在他们掌握了这个东西以后，就用这些方法观点去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果就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发现了资本主义怎样从封建社会产生；同时也明确地提出，资本主义在发展起来以后就要垮台，就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而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关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没落的规律，就是依靠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方法来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这些规律，也就是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所以，先有哲学，然后才创造了经济学，也就是说，经济学是跟着哲学来的。有了经济学的知识，也就是认识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没落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在认识了这些规律以后，才根据这些规律来确定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策略，确定工人阶级如何争取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战略、策略。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所要采取的各种战略、策略和各种政策、路线等，这些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

那么，这些社会主义的学说是根据什么建立起来的呢？就是根据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与空想的社会主义学说是有根本不同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学说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它没有客观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作根据，只是根据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所谓的“良心”和主观愿望，根据他们脑子里的一些空想出发；他们觉得这样做是对的，他们也不考虑这样做是否行得通，客观事实是否允许。因此，他们的学

说就叫做空想的社会主义学说。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为什么是科学的呢？因为这种学说所包括的斗争战略、策略、政策和路线，都不是空想出来的，都是根据客观事实的发展规律制定出来的，都是考虑到在事实上可以行得通的，而且这样做一定能够胜利的。我们中国现在正向社会主义过渡，我们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之中所包括的各种政策，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具体运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一部分，是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中又增加进去的很宝贵的一部分。大家都已学习过了总路线，也了解了总路线，这样就可以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特点。我们的总路线没有一点空想的成分，没有一个政策是没有根据的，也没有一个政策不是根据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的。

中国的社会就是要这样发展，在1949年，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就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有了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有了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这些条件就可以保证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有了这些因素，就不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主义，那就是自己捣自己的蛋。因为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工人阶级就要倒霉，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就要被推翻，所以我们决不能允许资本主义发展。虽然我们有了这些条件，社会就要向社会主义发展；可是，要向社会主义发展，就必须要采取逐步过渡的办法，不能着急，着急是对我们不利的，因为要想一下子用爆发的办法把资本主义消灭掉是不可能的，是客观规律所不允许的。如果有人想这样做，那就是冒险主义，就会弄得天下大乱。现在有些人是希望我们这样做的，托洛茨基派分子、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贼都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如果

这样做，就会和资产阶级发生分裂；这样，我们的政权就要垮台，工人阶级就要陷于孤立，从而就不能保证过渡到社会主义。所以，客观规律就反映出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要到社会主义去，而不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另方面还要做到逐步过渡，而不能操之过急。我们党和毛主席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条件，根据中国的客观规律而制定出我们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

我们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实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其次，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用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办法来实现消灭资产阶级的任务。

这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学说，在中国的具体运用，都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分不开的。我们的总路线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根据中国经济学来制定的；而我们的经济学，是由于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是由于反对了主观主义，是由于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而制定出来的。所以，用中国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例子，也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不能分开的。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要想深刻地了解总路线是不可能的；不懂得这个东西，虽然大体上懂得了总路线，但在具体执行时，仍然可能犯错误。因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只告诉了我们一个大的方向，具体怎样做，就要求我们每一个同志去具体地根据实际情况来解决问题；如果我们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就要犯错误。

所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在学习开始就要学哲学。我们懂得了方法以后，我们再

进一步学习经济学；然后再进一步研究党史和党的各种政策。这样就可以很有系统地把马克思主义掌握起来。

这就是我们要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和学习它的重要性。

那么，为什么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这样重要呢？要知道这一点，我们就应该了解辩证法唯物论本身是什么东西。搞清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同志没有学过哲学，因而对哲学总是有许多奇怪的了解，有许多误解。在过去，有些同志对哲学抱着一种神秘的观点；也有的认为：我是搞实际工作的，为什么要学哲学？这种不正确的想法是与社会影响有关系的。

在过去，资产阶级的哲学确实是有些神秘，不可了解。在旧中国也有一些所谓的哲学，如在马路上摆摊子的算命的先生，他们就信口开河地说知道人在什么时候死，知道吉凶祸福。我们的同志们认为哲学是难以了解的，特别是文化低的一些同志，有些自卑的情绪，认为自己学不了哲学。在我们的同志中间，对哲学的误解大体上有三种：一种认为哲学是神秘的，不可捉摸的；一种认为哲学虽然可以捉摸，但只有大干部、决定政策的干部才需要它，普通党员是不需要的；还有一种认为哲学是空空洞洞的东西，不实际，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作具体工作就不需要这种空空洞洞的学问。

这些看法的存在，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捉摸不到的，难懂的。不学，当然就难懂；学，就可以懂；但是，也不是很容易掌握的；也不是最高级的干部才需要它，每一个作具体工作的同志不需要它。事实上，即使是最小的工作，我们也需要它。在处理工作问题的时候，能够掌握哲学的人和不能掌握哲学的人比较起来就有很大区别。我们每一个马

克思主义者，每一个共产党员都需要学习哲学；不然，斯大林也就不能说："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列主义党的世界观"了。斯大林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凡是参加马列主义党的人都应该对哲学有一个了解。而且哲学也不是空空洞洞的东西，尤其做实际工作的同志更需要它，因为哲学就是我们处理实际工作的科学的方法。

我们应该从两方面来了解辩证唯物主义。首先要知道，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一种研究客观规律的科学。科学就是研究事物发展规律的学问。辩证法是研究最普遍的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是观察世界的最普遍的科学。所谓世界，既包括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也包括人的思想。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就是研究这样一种规律的科学，也就是说，辩证唯物主义这种科学，不管在自然界，或是在人类社会中，以及在人的思想中都可以应用。譬如，辩证法的第一个特征：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有联系的（即都与周围的东西有联系），都是互相依赖的（就是没有孤立的东西）。这个规律，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是如此的，不可能有例外的。也有些客观规律只管一个部门的东西。譬如自然科学规律就只管自然科学部门，如两个东西摩擦就发热，火柴一摩擦就烧起来，这就是一个规律；可是，两个人一摩擦就不能烧起来。又如世界上一切东西都不是孤立的，两个人坐在一起就要相互影响，就是彼此不说话也发生影响。在世界上从来也找不到任何例外的东西是孤立存在着的。所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规律都是普遍的。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又叫世界观。什么是世界观呢？世界观就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唯物论是我们的世界观，辩证法也是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应用辩证法看世界，就可以看出世界到处都是辩证的。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我们研究世界的最普遍规律的科学。这是它的一方面。这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地谈到另一方面，这种

普遍的规律又是我们研究问题、观察问题时的总的思想方法，根本的思想方法。这二者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所以是分不开的。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因为在我们认识了普遍规律以后，在研究一切问题时就可以根据规律去做。譬如我们有了总路线，在处理一切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根据总路线办事。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在总路线里面提到要搞合作化，但必须是逐步的，而不能急躁冒进，这就是方法。所以，凡是普遍性的规律，就都可以作为研究问题的方法。

唯物论的原则是物质第一，精神第二。意思就是说思想一定要反映物质，思想一定要服从物质。所以思想的正确与否，不是思想本身所决定的，而是看思想是否与客观相一致。思想如果和客观不一致，这种思想就一定是错误的；思想和客观相一致，那就是正确的。这是一个规律。我们有了这个规律以后，无论在处理什么问题的时候都可以把它当做方法。譬如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如果想在两天、三天内就想把个体农民改造成为集体农民，那就一定要犯错误；而如果想到了要对农民进行改造，同时是采取逐步的办法，这就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这样做就是正确的。

掌握了物质第一，精神第二这个原则，就要把它当做方法来解决问题。因此在研究问题以前，必须先把事实弄清楚，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理问题，这种方法就是唯物论的方法。

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就是最普遍的客观规律，同时又是我们研究和处理一切问题的总的根本的思想方法。这样一来，就可以打破那些认为哲学神秘、不可捉摸的错误观点。当然，资产阶级哲学就是不可捉摸的东西，甚至连资产阶级自己也不懂。过去读过资产阶级哲学的人就可以知道，“哲学的道理是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资产阶级认为哲学是非常神秘的，是很难用言语来说

清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故意这样做。资产阶级哲学是根本错误的。譬如，为列宁所反对的“经验批判论”的那种错误的哲学，它认为：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依靠“感觉”的。譬如大家在这里听课，经验批判论者就可以认为没有这么一回事。我在这里讲课就是“做梦”。所以列宁批判它们：这种哲学只承认世界上有我一个人，不会有第二个人。这种东西，实际上是非常荒谬的，毫无理由的。

那么，是不是最高级的干部才需要哲学，而普通的党员就不需要呢？不是的。最高级的干部决定政策是需要这个东西，但每一个普通党员在做具体工作时仍然而且是必须有哲学思想。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不是空洞的东西，而是指导工作的实际的方法。每一个党员在实际工作中不仅仅需要知道实际的东西，而且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作指导；否则，就要犯错误。保守主义思想就是错误的，这种思想就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说明了世界上总有新的东西不断产生，旧的东西不断削减，而保守思想就不承认这一个规律，所以是错误的。

下面讲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历史的关系，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发展的历史根源。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的最普遍的规律。这个最普遍的规律是可以了解、可以捉摸的。但是，发现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规律是不容易的，而是经过了几千年的努力，最后才由马克思、恩格斯把它创造出来。为什么发现这个规律是这样困难呢？因为要发现普遍的规律，就需要有很多知识，需要有对人类、对自然界的许多知识，而且要总结许多规律。列宁说过：辩证唯物主义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总结。那么，为什么说必然规律一定要掌握整个人类历史才能够得到呢？

因为要确定必然规律是真理，就必须有许多具体知识来证明它，要有许多自然知识来证明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是符合于自然规律的。在很早以前，人的知识是很少的。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人类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是逐渐发展的。在人的知识不够的时候，就很难证明辩证唯物主义是必然规律。所以，在历史上，人类并不相信辩证唯物主义，而是相信唯心论。在知识很贫乏的时候，人们就认为形而上学是对的。过去的人们，认为一切东西是永久不变的，他可以抓住很多片面的事实来这样看。特别是在过去的历史上，可以说，人类有文化的历史都是剥削阶级的历史。原始社会没有什么科学，从奴隶社会起才有文化。剥削阶级总希望它的统治是永久的，因此它就用一切办法来证明它的统治是永久的。所以，从它的阶级利益要求出发，它就不自觉或者很自觉地要把世界上的事情按照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解释，否认变化，总想肯定某些东西是永久不变的。再加上当时知识不够，这样统治阶级就可以按照它的利益抓住一些片面的事实来证明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不变的，证明形而上学是对的。

我们相信动物是变化的。因为我们在最近一二百年以来，在科学上发现了很多材料证明世界是变化的。可是，在古代没有这些材料，所以统治阶级就会说人类永远是这样，人类不是什么变化来的，而是上帝创造的。所以，没有各种科学的发展，没有很多科学知识提出材料，就不能总结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可以说是人类历史几千年的总结。人类历史发展到马克思时代，才有了必要的材料证明辩证唯物主义是完全可靠的。在古代的时候，也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如在老子、孔子时代就都有辩证法的思想，但是都是模模糊糊的，很不完全的。在200年以前，即在十七八世纪的时候，欧洲有一个

整个的时期是形而上学时期，那个时期的哲学家、科学家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看问题的。后来，一直到19世纪才开始在自然科学方面、历史知识方面证明辩证法是对的。最后，才由马克思、恩格斯发展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创造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一方面是吸收过去人类知识的精华，总结了过去的知识；另方面也批判了过去的错误思想。直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系的就是欧洲的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

黑格尔哲学又是总结了马克思以前的各种知识的一种结果；而费尔巴哈哲学又是欧洲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发展的最高点。黑格尔是第一个把辩证法作为科学的方法的人，并且认为这个方法是最正确的方法，他是第一个有意识地自觉地来反对形而上学，并且想有系统地来解释辩证法；但是，黑格尔的哲学是唯心论的，他的辩证法是主观的，他没有严格地根据科学知识来解释科学知识，他有很多东西都是用脑子想出来的。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很多错误，带有很多公式主义的色彩。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的错误，并把黑格尔思想中合理的东西找出来，加以根本的改变，使之变成唯物论的辩证法。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带公式主义色彩的，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就完全地成了科学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基本上是和事实不一致的，他的辩证法主要是“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与斯大林所讲的辩证法的四大特征是不同的。他把“否定之否定”当做主要的东西，当做公式，主观地想出了一套关于变化的公式。他认为一切都是否定之否定，都是按照三个阶段发展，他认为世界是先有一个莫名其妙的、在什么地方存在着的所谓“世界精神”，这个世界精神要表现自己，于是一变就变成了自然界，所以他认为自然界是精神的表现。而我们，则认为思想是物质的表现，是物质的反映。

黑格尔则认为先有精神，精神要表现自己，不知道怎么一变就变成了物质世界；等到物质世界的变化，就出现了人，于是人的思想就发展，结果人的思想就与世界精神完全一样。

所以，黑格尔认为首先有世界精神，人的思想一发展，就又与世界精神一致。他的全部著作有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又可以分三个部分，他完全按照这个公式来解决一切问题。他这个说法当然是非常荒谬的。所以，虽然他企图有合理的东西，想用辩证法解决问题，可是，他的辩证法又是唯心论的，和事实是不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从根本上打垮了他的公式，抽出他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并把他加以发展。斯大林的辩证法的四大特征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决不能说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黑格尔辩证法。

马克思的唯物论与费尔巴哈是有联系的。费尔巴哈是不正确的，特别是没有历史唯物论的思想。费尔巴哈一般的承认精神是物质的反映，但他在解释社会问题时则完全是唯心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根本的改变，一方面是继承了过去的优秀成绩，总结了过去人类历史的成绩，但另方面，在性质上都与过去又有根本上的不同。不同的地方有两点：立场不同，方法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无产阶级的哲学。过去的旧哲学都是与剥削阶级的利益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无产阶级的立场就是广大人民的立场，为广大人民服务的立场；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要求有广大人民来掌握。

从前的哲学是为少数人研究的东西，有些大学教授讲课的时候，讲得非常深奥，只是叫两三个人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要求很多人懂，至少要求我们每一个干部都懂。只有大多数人掌握这个东西，它才能为广大人民服务。所以，这个哲学本身就要求

通俗化。另方面，它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不是主观的公式。过去的哲学，不管是唯物论也好，唯心论也好，多多少少都带一些公式主义的毛病，过去的那些所谓的科学家都想制造一套公式来解释一切。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不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指出一些科学研究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每一条特征，都是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处理工作的一些原则，一些方面，一些总的方针。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研究的工具，是研究方法，工作方法，甚至也是规定工作作风的一种方法。

主观主义是一种作风；调查研究也是一种作风，但这是唯物论的作风。凡遇到问题时，先把事实调查清楚，而不是凭武断解决问题，也不是遇到问题没有调查清楚就凭主观的想法下结论。

我们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学这样一种工人阶级的立场，为人民服务的立场，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研究原则，科学地解决问题的原则。

我们学哲学就是要按照这种原则来学，不要企图死记公式，死背书本。有些人刚来学习的时候，就准备多读几本书，找一些资本，想出去以后用那些条文来吓唬人。如果有这种想法一定要批评，一定要改掉；否则，你就一定学习不好。

这是第一部分的问题。

二、学习辩证法唯物论哲学就是要克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性，力求用辩证法唯物论的方法和观点研究理论、领会政策和处理工作

这里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

问题。什么叫党性？党性就是阶级性，因为阶级性的集中表现、直接表现，就是党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的首先一个特点，就是公开地承认自己哲学的阶级性，公开承认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是与工人阶级的利益分不开的。过去的任何哲学都没有公开地承认过自己的阶级性。事实上哲学是有阶级性的，每一个时代的哲学都是代表阶级的。封建地主的哲学是地主阶级的东西，欧洲资产阶级哲学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它们可以不公开承认哲学的阶级性，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是与人民对立的。所以，它们就不好公开地把自己的阶级利益宣布出来，相反地还掩盖自己的阶级利益，以欺骗人民，同时把自己装作好像是代表人民的。不仅是在哲学上是这样，在一切问题上，在政治问题上，国家问题上，都是这样。资产阶级政府就是不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的政府。只有无产阶级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承认而且是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而且很强调这个阶级性，强调哲学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因为为无产阶级服务，也就是为人民服务；因为无产阶级是要解放全人类的。在中国，资产阶级也在解放之内。无产阶级受资产阶级剥削，但中国的资产阶级是很幸运的，别的国家的资产阶级要吃很大的亏，中国资产阶级则可以通过和平道路进入社会主义。

因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公开地承认阶级性不但没有坏处，而且还有好处。立场明确是很重要的。辩证法唯物论是和无产阶级相结合的。马克思的最初著作就讲清楚了这一点。马克思说：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反过来，无产阶级又是哲学的物质基础。马克思讲：哲学必须掌握群众，才能成为物质力量。我们现在就是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成为干部的武器。这

样，干部就可以很好地工作，很好地为人民服务。

辩证法唯物论需要很明确地指明阶级性。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干部懂得：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辩证法唯物论；如果不学，就是在精神上解除武装。所以，强调阶级性，指明阶级性，就可以使我们知道学习哲学的必要性。第二国际就违背了这一点，经验批判论也是这样的。陈独秀就是解除了辩证法唯物论的武装，而后就解除了一切武装，从而在各方面离开了无产阶级。我们的干部不懂得辩证法唯物论，处理工作就要犯错误；犯错误，对无产阶级事业就会有损害。我们有的同志过去没有学辩证法唯物论，而工作上也有成绩。由于这样，所以有些人就想：我何必要学辩证法唯物论，过去没有学，也一样作工作！如果有这种想法，就可以想一想。有些人把过去的成绩当做包袱；而为什么在过去的工作上能获得成绩呢？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学哲学，也可以有成绩？是不是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呢？不是的。我们过去所以有成绩，是因为我们有正确的领导。我们中央、上级解决问题是按照辩证法唯物论办事的。我们工作上有成绩，是因为我们按照他们的指示作了。但我们自己处理问题时，则常常犯错误。所以，我们过去工作上有成绩，仅仅是因为我们在组织上表现了党性，也就是说，我们还能服从上级的指导。所以，就不能因为我们在工作上有成绩，而就可以不学习、不掌握这个武器。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明确地、深刻地认识辩证法唯物论的阶级性——党性；要为无产阶级服务，就必须要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的知识。

我们要承认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党性、阶级性。那么，怎么承认呢？就是要有意识地、自觉地注意到一个党员、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学辩证法唯物论，要与唯心论、形而上学进行斗争。如果我们自己思想上有形而上学、唯心论的因素，就一定先与自己

思想上的这些东西作斗争。所谓哲学的党性，就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坚决地和形而上学、唯心论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这样来为无产阶级服务，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哲学的党性。在这方面，毛主席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毛主席从参加革命起，一贯地和主观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坚持唯物论，这样地来为无产阶级服务，为人民服务。毛主席进行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就是哲学党性最高的模范。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解释哲学的党性时说：反对主观主义就是党性问题。他说："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所以说，主观主义就是党性不纯。在这里，主观主义也包括形而上学和唯心论。

坚持辩证唯物论哲学，主要要掌握以下几点：

首先，要学习辩证法，使我们时常能够作到全面地认识问题，能够学会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列宁曾经说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辩证法的特点。辩证法所有一切特征都是为了保证这件事（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就是全面认识问题。因此，就必须反对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特点，正与辩证法相反，是片面地看问题，表面地看问题。以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吧，一方面要消灭资产阶级，另方面在我们中国社会条件下，又要逐步消灭资产阶级，要尽可能地争取通过和平道路来实现社会主义。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看问题，就会只抓住一方面，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他就只看到消灭资产阶级，而看不到逐步改造

这方面，结果就会产生急躁冒进。

辩证法要求我们要全面地看问题。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讲到战争的必然性问题，究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剧烈呢，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剧烈呢？斯大林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从理论上讲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更为剧烈；可是从实际上看来，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更为剧烈。这就是具体分析。有些人因为是片面地看问题，所以得出一个结论，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矛盾是更剧烈的。如果结论是这样，问题就麻烦了；这样，资本主义国家就会团结起来，来共同反对社会主义；这样，我们的和平政策就无法实现。虽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是根本的，但是在眼前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是主要的；这样的结论，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就可以站到和平方面来，因为它与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剧烈的。所以辩证法的观点既注意到了理论，又注意到了实际问题。全面地研究问题，就能够深刻地认识问题。按照错误的说法，那就只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间的矛盾是剧烈的，这种主张也可以找到一些事实，但仅仅都是表面的。譬如在联合国会议上，美国提出个什么，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就都接受；看起来苏联好像是孤立的。其他表面的事实还有很多。这就是表面地、片面地看问题，是不正确的。

学习唯物论的重点，就是要树立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很客观地认识问题的作风。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就是要求人的主观思想符合于客观事物发展规律，而不要有任何主观的空想。所以，学习唯物论，要树立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调查研究的作风，要反对思想上的主观性，反对夸夸其谈。

反对唯心论，就是要反对思想上的主观性。毛主席在《改造

我们的学习》中讲："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他说：马克思、恩格斯是最老实的人。老实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糊涂人，对什么都说好好好的老实；一种是我们说的老实，是实事求是的老实，事实是怎样就是怎样，而没有任何主观的虚伪的改装。

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性是分不开的。片面、表面就一定会主观。因为根据一方面下结论，就会与事实不一致。比如看到在联合国会议上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对美帝国主义提出的问题表示同意，举手赞成，因而你就下个结论，认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结论就是主观的。所以，要想避免主观性，就一定要用辩证法，一定要具体分析问题；没有辩证法，就不会有唯物论，没有辩证法的方法，不可能有唯物论的思想，至少不会有彻底的唯物论思想。

主观主义的实质，都是因为片面地看事实，或者抓住片面的事实来下结论。我们的同志，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看问题片面的人往往只看到缺点。这样进行批评，往往得不到好的效果。很少没有缺点的共产党员，但看问题应该是全面的，既看到缺点，也要看到优点。

产生唯心论的原因，就在于把认识片面化。形而上学和唯心论是经常结合在一起的。反对形而上学就一定要反对唯心论；反对主观性，就一定要追究到主观性产生的根源。

学习历史唯物论也有重点，就是要树立劳动生产的观点、群众观点、阶级斗争的观点；这样，就一定要反对历史唯心论，反对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作用的个人主义、个人崇拜，阶级调和主义和否认阶级斗争的错误思想。这就是学习历史唯物论的重点，也可以说是我们学习的方向。

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些个人主义，我们干部大多数都有点群众观点不够的现象。我们学习历史唯物论，就是要消除一些个人主义。甚至党的高级干部也有这样的问题。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就是个人主义的发展结果。在高、饶问题出来以后有些同志想不通；学了历史唯物论以后，我们就应该想通。如果没有这种问题，就不符合历史唯物论的规律。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的高级干部都会像高、饶，但有的党员就会产生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都是从旧社会来的，觉悟是不一致的；觉悟高的人，问题可以解决；觉悟低的人，问题就不容易解决；或者原来有些觉悟，结果由于受了一些坏影响，又变了。高级干部会发生这些问题，我们普通干部也会发生这些问题。所以，个人主义是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是极端危险的坏思想，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警惕和克服。

此外，阶级调和思想在我们一些干部思想中也是会有的。我们也有时犯急躁冒进，有时又犯右倾的毛病，比如在和资产阶级联合中，往往受他们的影响。这些实际问题是我们学习理论时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我们要讲哲学的党性，就一定要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克服思想上的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性，克服个人主义以及轻视劳动生产、轻视劳动人民的观点，克服否认阶级斗争的观点。

三、贯彻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的教学方针，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惟一正确的方法和目的

我们学习哲学就是要贯彻上述的这个方针。这个方针是一个整体，是不能割裂的。我们就不能说只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而不联系实际，改造思想。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好好地研究理论，把

我们过去没有认识的东西认识一下，提高我们的理论知识，使我们能够把一些问题提到比较高的原则上来认识。过去我们有时犯了错误，不能把问题提得更高；我们学了哲学，就可以把问题看得更高，就可以说我们犯错误是违背了辩证法唯物论的观点。提高认识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联系实际，改造思想，这是我们学习理论的目的。关于联系实际问题，有很多人感到很难了解。所谓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毛主席讲的“有的放矢”。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可以把这个方法当做箭，来射实际问题这个“的”。

理论学得好不好，就看你能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如果你能够把实际工作问题、国家大事以及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处理得更好，就算你理论联系了实际。联系实际时，我们首先要把理论当做武器。马克思讲：“哲学是无产阶级的武器”。我们就要把这个武器掌握起来。学习理论，提高认识，就是要掌握这个武器。掌握这个武器，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实际问题是很多的，大到整个世界大事，小到个人的思想问题。实际存在的问题都叫“实际”。我们自己所遇到的问题，我们需要处理的问题，有什么障碍我们前进的东西，我们要解决它。这些都是实际问题。当然不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可叫实际；这里所讲的实际就是因为有问题。譬如自然界的一些现象，也是实际，可是我们学习哲学就不是为了要解决自然界的问题，如种花，天气如何，气象问题等，对自然科学家说来是实际问题，而对我们就不是实际问题。我们是作群众工作、政治工作的干部，不是自然科学家，因此我们学哲学时就不要把主要力量放在研究自然科学知识方面去。

大家在毕业以后，在工作上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实际问题。在

那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用学得的哲学去解决问题。现在我们在学校学习也有实际问题；认为在学校学习没有什么实际问题的看法是不妥当的。因为学习理论，就必须联系实际；单纯地了解理论而不联系实际是不行的。虽然我们在学校中学习，也要找出一些实际问题加以解决。在学校中的实际问题就是我们在工作上曾经遇到过的问题，或者没有解决的问题以及在工作上发生困难的问题，还有我们自己的思想问题。不能说我们离开了工作岗位就没有思想问题了。学习中的实际问题就是思想问题。我们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就必须把片面思想去掉。思想问题也就是我们学习中的一个直接的实际问题。

所以，根据我们的学习方针，我们的学习方法就是要善于联系我们的工作，联系我们的思想。马列学院一贯地要求我们这样作。不管讲也好，学也好，比如我在这里讲课，我事先就要了解到大家的一些思想问题，根据我们的经验，估计大家的想法，来联系实际问题作一些批判。这样讲课，才能讲得比较好。大家在学习中应该联系自己工作上、思想上的一些问题，应该批判的就批判，应该肯定的就肯定。从自己的思想联系起，这是联系实际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当然光联系自己也不太好，还可以联系到一些国家大事以及对许多具体工作问题的看法。

我们的学习方法基本上是整风的方法。一方面要学习理论，一方面还要反省工作，反省思想。到一定阶段，我们要作学习总结。为了使大家了解这个方法，我们要首先说清楚一点，就是有些人对整风有些片面的、错误的看法。我们一定要注意到整风的积极方面，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提高思想。这些方法我们要坚持。在过去的整风运动中，曾经发生过个别的过火的现象，那是个别问题，是一种错误的东西。我们认为采取整风的

方法来学习是很好的。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向大家说清楚；大家也要考虑，要想通；不想通这个问题，对我们的学习是会有障碍的。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上卷）

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职能是组织社会主义经济*

(1954.10)

一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了五周年了。五年来每届国庆节日，都是检阅我们国家在各方面的工作和斗争中获得的成就的喜庆日子。这次国庆节日也不能例外。迎接这次国庆节日的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就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通过和根据宪法所组织的新的国家领导机关的成立。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我们就有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就走上了向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道路。五年以来，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完成了规模浩大的各项民主改革工作和经济恢复工作，并在这个基础上展开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目前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新的国家领导机关的成立，说明我们人民民主政权又进一步地发展，更加完善和更加巩固了。它对于今后我国社会

* 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邀请艾思奇为政协委员们做报告，这是报告后所整理成的文章。

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胜利完成，将给予有力的保证。

“一切革命底根本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列宁语)不推翻旧政权，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就谈不到社会生活及其他方面的变革，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中国先进人物在百多年间为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奴役地位而斗争，牺牲了不知多少头颅和鲜血，直到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人民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中国社会的面貌才根本改变过来。新中国几年来的许多重大成就，都是在人民政权的领导下实现的，没有人民政权，任何一种成就都是不可设想的事，没有人民政权，就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这些道理都已经为大家所熟知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对于人民政权的意义，都有了足够的理解了。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政权究竟有些什么作用，它的职能是些什么？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弄得很清楚的，相反地，有些人的认识甚至于是错误的。例如有的人把政权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机械地加以分割，以为政权工作似乎和经济与文化建设工作没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们虽然承认人民政权做了许多巨大的工作，但他们却没有注意最重要的一点，即人民政权的重要职能，正是在于组织社会主义经济。

对于人民政权的意义认识不足，就不能以充分积极的态度来关心政权的建设和应用政权的力量以保证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贯彻实现。因此，应该改正这种认识不足的情形，应该对于人民政权的作用和职能加以认真的研究。

二

国家、政权和宪法，是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是

经济基础的反映，是随着它所适合的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后者的产生而产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1949年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这个新政权的成立，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经济方面所发生的根本变化和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革命的胜利剥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使之变为人民国家的即全民所有的财产，没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使之归农民所有，这样就消灭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基础，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时期。在这里面，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或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经济——已开始在形成中，并且作为各种经济成分中的决定的领导的因素而存在。新中国人民政权的成立，正是反映着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出现，正是适合向社会主义社会逐步过渡的这种经济发展趋向的。

但是，另一方面，上层建筑又不只是反映经济基础，它反过来又要积极地为经济基础服务。斯大林说："基础之所以创立上层建筑，也就是为了要使上层建筑替它服务，要使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起来和巩固起来，要使上层建筑积极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斗争。""上层建筑一出现后，就要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帮助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来摧毁和消灭旧基础与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页）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新中国人民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是体现着这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它不仅只消极地反映着新中国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的出现和成长，而且还要积极地用一切办法来帮助社会主义

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实现，帮助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中国逐步形成起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起，我们的人民政权就开始在全国许多重要的经济命脉部门组织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用主要的力量来帮助它发展，极力使它在各种经济成分中发挥领导的作用。人民政权帮助从封建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发展生产，鼓励和帮助他们在自愿的基础上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人民政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即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方面，限制其危害人民的消极方面，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对它们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人民政权的一切政策措施所遵循的指导方针，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我国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把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这些思想规定为自己的主要内容之一部分。它的《序言》一开始就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制度，保证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毫无疑义，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宪法，将要在过渡时期有力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和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消灭，保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作为保证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决定力量，有着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在剥削阶级统治的旧社会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根本不可能产生，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必须"在空地上"把社会主义经济从头建立起来，所以，人民政权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

础的作用，和资产阶级的政权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作用有根本的区别：资本主义的经济，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已经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和成熟了，资产阶级通常只要从封建地主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就能保证已形成了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就算完成了革命的任务。而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取得政权的时候，才只是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时候，也就是说，才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人民政权必须担当从开始到完成的全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没有人民的政权，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经济。

第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把组织社会主义经济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它必须直接领导和管理经济的工作，这和资产阶级的政权也是根本不同的。在资产阶级国家里，生产资料分别掌握在各个资本家手中，资本家为了各自牟取尽可能多的利润而进行生产和经营，资产阶级的政权是没有可能来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领导和管理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组织经济只是资产阶级私人的事情。资产阶级政权只能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保护资产阶级利益、镇压劳动人民的职能，而不可能有组织经济的职能。而在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制度下，工人阶级取得了政权的领导，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既然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其中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又是最具有决定作用的，因为没有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没有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也就不会有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经济），那么组织经济就不再是任何私人的事情，而成为整个社会的事情了。这就决定了代表整个社会的人民政权必然要成为国民经济的管理者和组织者。在我国，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依据经

济发展法则来指导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是通过我国人民民主政权来实现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进一步扩大，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组织经济的职能将占居更重要的地位。

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两个方面——作为基础的，我国人民政权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要逐步地把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确立起来，使之成为我国社会的惟一经济基础。一切国营经济，包括国营工业、国营贸易以及国家银行等等，都是属于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这是以国家作为代表并直接由人民政权掌握的经济。《宪法》规定："国营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第六条）但人民政权不仅只直接掌握着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并且还要依靠着国营经济作为领导力量，来指导和帮助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组织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使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逐步走上集体化的道路，把他们的个体所有制的小商品经济逐步改造为劳动群众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半社会主义经济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人民政权的这个职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是这样规定着："国家保护合作社的财产，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并且以发展生产合作为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第七条）

上层建筑不但要帮助自己的基础形成和巩固起来，而且要帮助自己的基础来逐步消灭过了时的旧基础。过渡时期包含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因素，也包含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资本主义经济虽然还有着它积极的一方面，但随着时间的进展，就愈益暴露出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新中国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合的种种矛盾。作为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过渡时期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逐步消灭城乡资本主义因素。人民政权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同时担负这两方面的职责;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同时要逐步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因素。大家知道，我们的国家已采取了适合于我国情况的正确的政策来贯彻逐步消灭资本主义经济的职责，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人民政权已经通过各种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进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以便逐步消灭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并用全民所有制来代替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人民政权的这个职能，说:“国家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它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鼓励和指导它们转变为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第十条)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各种形式的限制和改造政策的过程中，不能不遭到资产阶级的种种的反抗。因此，在过渡时期，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必然不断地发生激烈的斗争，工人阶级如果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反抗，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民政权为着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实现，就要用力制止资产阶级的各种反抗行为。过去一个时期，资产阶级曾大施其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行为，猖狂地向工人阶级的国家领导权进攻，工人阶级和人民政权通过“三反”、“五反”斗争，才把这个进攻打败了。在最近国家积极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又以经营怠工、抽逃资金、破坏机器设备、变生产资料为消

费资料、收买和腐蚀工人职员等等的非法行为来进行反抗，人民政权也注意到了这些反抗行为，要用力加以制止。《宪法》规定："国家禁止资本家的危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的一切非法行为。"（第十条）这就为克服资产阶级的各种反抗行为树立了法律的根据。

但是，在人民掌握着政权的情形之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完成，并不需要采取爆发的形式。在这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是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从上而下的领导，并取得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和农民基本群众从下而上的直接支持，逐步发展社会主义成分，和逐步改造非社会主义成分来实现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第四条）这就体现着上述原理。这就是说，由于有了人民的政权，就可以保证通过和平的道路来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来完成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就这一点来说，人民政权的意义也是极其重大的。

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必须依据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法则以及社会主义的其他重要经济法则如像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这就是说，必须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那种无政府生产的混乱状态，把全部国民经济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逐步纳入计划的轨道，而这计划又必须安排得适合于如下的原则：即使得国民经济的各部门保持一定的恰当的比例，以便保证社会的生产能够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并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来逐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很容易明白，这样规模宏大的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工作——把全部国民经济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逐步纳入一定的

计划轨道的庞大无比的组织工作，除了人民的国家，除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之外，任何其他的势力都不可能担当起领导的任务。只有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政权，而不是鼠目寸光、只照顾少数人眼前利益的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的政权，才可能抱定伟大的决心来从事像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样艰巨的事业，才有足够的威信来领导人民自觉地从各方面厉行节约，以便积累巨量的建设资金，并把主要的资金力量集中到重工业建设方面，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只有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并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惟一职责的人民政权，而不是那些在资本巨头面前卑躬屈膝的资产阶级政权，才有能力来制订并实施一定的国民经济计划，才能够通过政府的各个部门——工业、农业、交通、财政等等部门，按照计划来领导并管理经济，才有能力保证在首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相应地促进轻工业、农业以及交通运输事业等等的发展，以便在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和不断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使得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逐步有所改进。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才有足够的勇气和魄力来采取粮食、油料、棉布等重要物资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这样重大的措施，来对资本主义的投机破坏活动给予致命的打击，来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因而既有利于农村的生产，也有利于城市的工业建设。关于人民政权的这些职能，《宪法》概括地做了这样的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第十五条)

我国人民民主政权在实现其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职能时，必须充分发动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为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觉悟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才有可

能通过增产节约运动、技术革新运动、劳动竞赛运动等而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正是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主要条件之一。《宪法》这样规定着："劳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的事情。国家鼓励公民在劳动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十六条）

根据以上所说的一切，就可以完全明白，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我们的《宪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有着多么巨大的积极作用。在这过渡时期，它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它积极地帮助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成长和非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它帮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发展成统治的经济形式，也就是说，积极地帮助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

三

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是工人阶级的政权或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重要职能，也是与资产阶级政权或其他剥削阶级的政权根本不同的一个特殊的国家职能。除此而外，人民政权还有着两个一般的国家职能，即对外保卫国家的职能和对内镇压反动阶级和维持革命秩序的职能。很容易了解，这两个职能，虽然没有直接组织经济生活的作用，但仍然是与经济建设密切攸关的。首先，如果我们的国家没有巩固的国防力量，不能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不能粉碎侵略者的挑拨和进攻，就不可能保证国内人民进行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的改造工作。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胜利，如果美帝国主义者的军队打到了我们的东北边境或甚至于侵入了我们的边境，那么，我们东北的工业建设以及全国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就不可能有今

天这样一些成就，这是很清楚的。其次，如果我们的国家不注意警惕反动派的各种可能的破坏活动和暗害阴谋，并及时把它镇压下去，如果对于资产阶级的投机捣乱以及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种种坏事不加以及时制止，如果对于违犯革命的法律秩序，违犯劳动纪律和工作纪律的行为不有所制裁，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地完成经济建设的任务。如果我们过去不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给潜伏的反革命势力一个严重的打击，如果我们不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打退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的猖狂进攻和制裁了国家工作人员中的某些违法行为，我们就不能像今天这样比较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这也是很清楚的。

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所具有着的决定意义，要求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来把人民政权建设得更加完善和更加巩固。目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宪法的通过和新的国家领导机关的成立，是我国人民民主政权进一步完善和进一步巩固的标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使人民政权的民主性更加扩大了，它使我们的国家便于发动和组织更广大的群众来积极参加各方面的经济建设事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使我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一致，以高度的警惕性来注视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破坏阴谋，共同努力来加强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

为着进一步加强我国的人民民主政权，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全国人民必须自觉地遵守我们国家的宪法和一切法律。宪法和法律规定着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工作所必须依循的一定的原则、纪律和秩序，它是广大人民的共同意志的集中的表现，不遵守宪法和法律，就是破坏人民自己的共同意志和共同的利益，就要使有计划的社会主义

建设和有步骤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难于完成。不能设想，一个工厂的工人不遵守全厂共同的劳动纪律，只凭着个人的高兴要怎样工作就怎样工作，也可以保证完成共同的生产计划。同样不能设想，一个国家的人民不遵守共同的法律和秩序，让每个人各行其是，却可以完成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必须强调守法的思想，作为每一个公民真正拥护和支持自己的政权，拥护和支持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要反对各种轻视遵守法律，认为法律、纪律和秩序好像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的错误思想，更要反对那种把法律看做只是为普通的"老实人"制订的东西，而自己则好像有着可以超出任何法律、纪律和秩序之上的特权的坏思想。《宪法》这样规定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第一百条)凡是愿意使自己作为人民民主政权下面的一个名副其实的光荣公民的人，应该经常记住这一条宪法的规定。

（原载《学习》杂志 1954 年第 10 期，1954 年 10 月 2 日；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学习历史唯物论，反对历史唯心论*

(1954.10)

今天讲历史唯物论的第一个题目：学习历史唯物论，反对历史唯心论。

一、历史唯物论的最根本的原理

讲历史唯物论，首先要讲清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这是历史唯物论的最根本的原理。

历史唯物论总的特点斯大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特点就是说，历史唯物论就是把辩证唯物论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论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要了解历史唯物论的特点就先要把辩证唯物论的原理回顾一下。

斯大林所说的辩证唯物论的七个特征，如果用两句话来说明，就是：辩证唯物论是把自然界看做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按照辩证的规律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的自然历史过程；在这种客观发展的过程中有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这两种现象的关系辩证唯物论认为是物质在先、精神在后，即物质是第一位、精神是第

* 这是艾思奇在1954年10月25日给马克思列宁学院二部十至十四班讲课速记稿。原题是："历史唯物论的最根本原理：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整理时，对大标题和小标题，按所讲内容作了变动。在内容的整理上，略有删节，做了一些文字的加工。

二位的。

辩证唯物论的这些原理完全可以运用到历史唯物论上，历史唯物论就是把这些原理彻底地、完全地运用到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来。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要了解历史唯物论的特征，就要按照这些原理来了解。将这原理运用到历史唯物论上，就是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看做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为转移，按辩证的规律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的自然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同样的，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第一性的，社会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即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在先，社会的精神生活在后，也就是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是第一位的，而社会意识是第二位的。

所以历史唯物论的总的特征大体上就是两点：1. 历史是有规律的；2.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精神生活。

历史唯物论认为历史是有规律的，因此我们可以从人类社会生活中找出规律来，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很严密地、准确地找出历史的规律来。我们不仅清楚过去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是今后历史的发展也可以做出相当的估计，我们可以规定总路线，能够毫不怀疑地确定中国社会的发展一定是有规律地走向社会主义。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规律的指示，使我们的工作不会犯大的方向性错误。

在社会发展规律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物质生活决定精神生活，存在决定意识。社会生活怎样、人的思想也就怎样。一定要严格地按照社会的生活、社会存在的情况来规定我们的思想内容，然后才不会犯错误。我们的思想一定要反映实际情况，反映客观存在，如果解决问题不调查研究、不使我们的思想反映存在，我们就会犯错误。

二、反对历史唯心论

这些历史唯物论的特点是与唯心论绝对相反的。我们学习历史唯物论的这些原理时，就不仅要注意这些原理与唯心论相反，同时要注意怎样与唯心论相反。我们一方面要掌握唯物论的原理，另一方面要反对唯心论的原理，学习马列主义就是要在这种思想斗争中学习，研究历史唯物论就是要与历史唯心论对立起来来研究。因此，除了刚才讲了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外，还要跟着讲一下什么是历史唯心论，我们要反对的历史唯心论是一种什么东西。

历史唯心论大体上可以归为三种：

第一种历史唯心论是把人类社会现象看做是一堆偶然的现象，没有任何规律，因此，他们在社会研究方面崇拜偶然性，不承认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及人类历史。这种思想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很流行，特别是到了20世纪帝国主义时代。

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资产阶级学者往往在自然科学方面崇拜偶然性，否认规律性，特别是对人类社会现象认为完全是偶然的，没有一点科学研究的可能。在自然科学方面和米丘林学派对立的新达尔文学派就是代表自然科学方面崇拜偶然性的学派。米丘林认为动植物种类的变化是有规律的，人可以发现、控制并利用这规律，人可以用外界的条件来影响动植物，使它们发生变化。反对他的生物学家拼命提出不同的意见，想要驳倒他，他们对米丘林说：你的思想错了，我并不否认动植物可以发生变化，但是我承认这些变化是不可以找出规律来的。

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家认为自然界有些是有规律的，有些是绝对没有规律的，是偶然的，这样就对一部分自然现象放弃了科学研究；但是他们对社会历史就认为是完全偶然的，是一点规律

都没有的。

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者一般都否认社会科学这名称，认为社会研究不能叫科学，因为没有规律可以研究。所以研究社会就按照自己的一套主观的理论来任意解释社会，这就是自由主义的一种。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认识来说明历史，尽管是胡说八道，但是找出几条理由来也就算是一派。

这种思想在中国也是有影响的，首先是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影响。全国刚解放时，我们碰到一些大学的社会学者，最初和他们争论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社会科学的问题，他们说没有，我们说有。有的人在政治上和我们很靠拢，但是他们很长时间还不承认有社会科学，他们说社会科学这名词是不能成立的。当然，他们现在是没有意见了，不能不承认社会科学是一门科学了。

这种思想在“五四”以后影响很大，1921年至1922年中国出版界有一个争论，叫做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玄学又可以解释为形而上学，就是否认科学的思想。那时的争论是这样，有一派主张人类生活是不能使用科学的，就是说人类历史没有科学研究的可能，人类历史完全是偶然的，历史变化完全是由人的自由意志决定的，人生观完全是凭人的自由意志随便决定的，所以否认科学可以运用到研究社会历史上去。这一派是玄学，就是张君劢这些人的思想，很早就是反动的。

当然有人拥护科学，拥护科学的人有两种：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历史唯物论，这是完全正确的；另一种也是资产阶级的学者，就是胡适这一派。

胡适这些人主张可以运用科学来研究人类社会，但是他们只是表面上拥护科学。他们所谓的“科学”是假的，因为他们的思

想基础是马赫主义，就是主观唯心论，认为世界就是人类主观的感觉，没有科学的真理。他们为什么又主张可以用科学来研究社会呢？他们认为科学有它的作用，科学虽然不能研究客观真理，但是科学可以帮助我们整理我们的感觉，感觉是非常混乱，没有头绪的，我们就用科学加以整理，按照我们自己的要求把感觉编出次序来，排出队来。他们虽然口头上这样说，但是他们的思想本质还是反对社会科学的，和张君劢一样，因为他们归根结底认为人类社会是人们的感觉，没有规律的。所以他们认为科学并不是研究客观规律的工具，而是为了主观的便利而利用的工具。

这两派资产阶级的争论，实际上都是玄学对玄学的争论，而不是真的科学的争论。不同的一点就是胡适狡猾一点，张君劢露骨一点。张君劢说人类社会不能用科学来研究，胡适这一派就警告他说：你要注意，群众是很相信科学的，如果你否认科学，就没有人拥护你了，所以还是要装做信任科学才行。所以他们争论的问题是要不要科学的假面具的问题。

可以这样说，“五四”以前资产阶级还有一些科学思想，还相信科学可以研究自然界、研究社会。那时一些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主要是以进化论为基础，他们相信自然界有进化论的规律，并且机械地把进化的规律运用到人类社会生活中去。这样虽然是错误的，但当时起了一些进步的作用，就是他们感觉到中国人要努力争取进化，不要在世界的生存竞争中，变成被淘汰的失败的种族，应该努力走在进化过程的前面。

“五四”以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完全向帝国主义学了各种各样的唯心论，和科学对立起来了。这种思想一直到解放后大学的教授、社会学家还有这种思想，当然还有些中学教员以及其他知识分子，都是有这种思想的。

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就是否认社会的客观规律，认为应该自由地发表意见，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过生活。譬如，我们现在碰到反动言论一定要打击它，我们不允许反动言论的散布。对自由主义者说来，这就是不自由，这就是共产主义国家“独裁”政策的表现。他们认为任何人想怎样，就应该让他怎样。他们认为人类生活是偶然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偶然的，所以即使是法西斯的思想也要让他发表，可能法西斯的思想也是正确的，因为社会现象是偶然的，或者偶然马克思主义对了，或者偶然法西斯主义对了。自由主义者和法西斯有区别，他们认为法西斯是独裁要反对。但是他们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帮助法西斯，所以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在法西斯国家里还可以讲一下。

这种崇拜偶然的唯心论思想，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还相当流行，在我们中间当然不会流行的。但是也有的同志把事情做好了，就说运气真好；失败了就说真倒霉，运气真坏。讲运气就是崇拜偶然，以为我们的生活是偶然的成功或是偶然的失败。机会主义者也有这方面的情况，机会主义者有“左”倾右倾，在革命时，“左”的是冒险主义，右倾是投降主义；建设新中国时，“左”的是急躁冒进，右的是保守主义，这都是机会主义。为什么叫机会主义？因为这一类倾向都是想靠乱碰得到成功，不能严格地按照科学的规律指导工作，也就是说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不按照客观的情况来规定我们的工作方法。急躁冒进就是不顾客观规律如何，自己有一个好的理想，就想很快地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好，就要马上实现。农村的农民连互助组都没有，你就要他们排队吃大锅饭，这是不行的。所以，急躁冒进的思想也有碰的因素。有一种人喜欢贪功，希望一下子做出一件惊人的事，也不请示也不报告，也可能碰对了，但这样作终究要碰壁。这种机

会主义当然并不就是有系统地崇拜偶然的唯心论，但是这种倾向有崇拜偶然的因素，是不正确的，也就是无意识地把我们的工作看做是偶然的现象。以上所说的是历史唯心论的一种主要的表现。

此外，历史唯心论还有两种，一种是相当于主观唯心论，另一种相当于客观唯心论。

主观唯心论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是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相反地，是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人要怎样就怎样，特别是英雄人物的意志是可以左右历史的。“英雄造时势”，就是这一类的观点，他们把伟大的人物看做是历史上最主要的决定力量。这种唯心论是和第一种有关系的，第一种是把社会历史看做是偶然的，这一种就是认为偶然出现一个英雄，历史就会发生转变。他们认为个人的意志可以左右历史，小人物可以影响小一些，大人物可以影响大一些，杰出的人物就可以影响整个的历史，如果出一个很好的人物，全人类就有好处，如果偶然出现了一个很坏的人物，历史就要倒退。

这种思想在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中间也相当流行。英国有一个哲学家，叫罗素，“五四”时曾来中国演讲，迷惑了许多知识分子。他是一个马赫主义者，是一个主观唯心论者，他主张全人类的历史关键就在十几个人身上，如果历史上没有这一些人，如拿破仑、秦始皇等人物，今天的历史就完全不同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学者就把他讲的奉为经典，认为罗素都这样说，可见“英雄造时势”的话是对的。本来“五四”以前知识分子中有这样的争论：究竟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争论了很久，好像罗素一讲就作了结论。

这种思想也是崇拜偶然性，不过这种偶然性限制在崇拜偶然的人物上。这种观点一直到全国解放后，在许多知识分子中都还

是流行的。这种看法相当于主观唯心论，认为历史可以按照人的主观意志来任意改变，历史不是按照它本身的客观规律发展的，而是按照人的主观愿望发生变化的。

类似这种性质的思想在我们队伍里也还是有的，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不会有公开的主张"英雄造时势"的人，可是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了主观唯心论的观点的情况常常会发生。斯大林就批评了苏联的一种主观唯心论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不一定是客观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可以制定规律、可以改造规律、可以创造规律、可以消灭规律。斯大林指出这是主观唯心论，因为他们说，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可以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苏维埃政府、党的领袖忽然想起要让社会按这个规律发展，它就按这规律发展，或者忽然想到要创造一种规律，那社会就又可以按照那个规律发展。

如果按照这种观点看，我们现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毛主席偶然想出来的，或者我们的党心血来潮，不要逐渐过渡而要突然过渡，制定一个短时期爆发进入社会主义的规律，就可以进入社会主义，这种看法就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可以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种思想当然没有公开地讲"英雄造时势"，也不是认为一切社会、一切历史的发展就是依靠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限制在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在这一点上认为人类可以随便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这是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点在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出现的一种很显著的例子，但是这种例子并不是很特殊的，而是有它的根源的。

在我们的队伍中有一批人的思想是这一种类型的，这种思想还有人相信。如果没有人相信就用不着斯大林反驳它了，因为它

的影响相当大，有一批人坚持这种观点，另一批人虽然不坚持，但是受它的影响，没有力量来反驳这种思想。

因此，我们不能以为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就不会有唯心论了，应该说是会有的，而且往往也会流行起来。中国当然还没有斯大林批判的那种主观唯心论，但是毛主席也批判过主观唯心论。在毛主席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中，有一部分斗争是对主观唯心论的，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他反对以感想代政策，反对有些人凭想当然决定问题，这就是主观唯心论的观点。有些干部就有这种荒谬的思想，以为英雄伟人的感想可以支配环境，以为我已经是负责的干部了，我想怎样就应该怎样。有人是公开这样讲，有人是不自觉地这样讲。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看法来检查我们队伍里的思想情况，就可以发现：一直到现在，有许多人还有这样唯心论的思想，凭自己的意志来决定问题。解放初期我们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是因为解放后干部提拔得很快，有些干部凭自己的意志作工作。在西南，邓小平同志就批评过有一大批干部是凭自己的意志作工作，以为自己负责了，就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左右历史，这就是主观唯心论。我们自己是否有这情况，恐怕也难免。这就是相当于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点。

另外，还有一种相当于客观唯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斯大林批判过的，认为历史的基础是“永恒的正义”、“普遍的道德理性”。这种思想并不认为历史是可以依赖个人的意志随便转移的，历史的发展有客观的基础，但这基础不是物质的，而是思想的原则或精神的原则，或是什么公式。他们认为人类的历史一定是按照某个公式发展的；是由客观的精神决定的。

这种客观的意志如果讲穿了的话，就是上帝，什么人有这力量能够规定这永恒的道德呢？当然没有，只有神灵的上帝，在中

国就是玉皇大帝、阎罗王，他们有生死簿可以规定人类应该怎样生活。所以这种客观唯心论和宗教迷信是无形中有联系的。

“普遍道德”、“永恒正义”是不是真的呢？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有这东西，而是过去的一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或思想家自己想出来的。他们的所谓“永恒正义”、“普遍道德”并不是真正拥护真理，而是按照他们的阶级利益想出来的。所以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唯心论的历史家，都有他自己阶级所喜欢的那种“永恒正义”和“普遍道德”，他们都是按照统治阶级的要求来考虑什么是“普遍的道德”的，所以实际上这种“普遍道德”就是一个阶级的道德。

中国过去的封建时代，有些思想家就是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来规定什么是“普遍道德”的，孔子儒学的思想就很明显。孔子是第一个企图要给社会规定一些永恒道德的原则的人，他认为应该遵守的“永恒道德”就是封建道德，企图按照封建秩序给全世界排队，他想把队伍排得比较稳定，使阶级斗争不太尖锐。地主应该剥削农民，但是剥削要有一个限度，不要使农民造反；农民应该养活地主，不要反抗地主。孟子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没有君子不能治野人”，君子就是地主、统治阶级，野人就是农民。“没有野人不能养君子”，就是说社会上这两种人都是需要的，他的理想就是劳心劳力的能够很调和地在一个社会生存。孔子也有这样的公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做皇帝的要像皇帝，臣要像臣，各排各的队，不能平等，要有一个封建等级观念。封建社会的“永久正义”、“普遍道德”就是希望使封建地主和农民的关系能够很调和、永久维持下去，不要发生尖锐的冲突，这就是他们的理想，就是他们的天经地义。

资产阶级也有它“永恒的正义”，斯大林说的“普遍道德”主

要是指资产阶级的。“永恒的理性”、“普遍道德”这些名词，是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最初提出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它的思想家就主张反对封建秩序，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这种合理的社会就是要符合“永恒正义”和“普遍道德”。

什么是“永恒的正义”？资产阶级所谓“永恒的正义”就是他们所谓的自由。从资产阶级革命最初时期起，资产阶级就叫喊“自由”，现在帝国主义国家还自称为“自由”的国家，法西斯的统治已经弄得人民动都不能动了，他们还认为他们是“自由”的国家。他们认为苏联和我们都不是“自由”的国家。我们看起来这很奇怪，实际上研究一下他们认为的“自由”是什么，那就不会奇怪了。因为他们讲的“自由”和我们讲的自由不一样，我们讲的自由是认识必然的自由，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是必然的，因此我们就能够坚持争取这种社会，因此我们就能自由，这是唯物论的自由。

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和我们所讲的不一样，他们讲的是个人主义的“自由”，财产的“自由”。所谓个人主义的“自由”就是自己想怎样就怎样，最好是一个人生活不要受周围的影响。所以，从前资本主义正在发展时，英国就有人写了一篇小说，叫做《鲁滨逊飘流记》，鲁滨逊一天坐船到海里，碰到风浪，流落在一个小岛上回不了家，同船的人都死了，他就把船上的东西搬到岛上，在岛上他一个人生活了18年。旧社会里就描写他一个人在岛上生活了18年的英雄历史，这就是资产阶级个人自由的理想的表现。

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者这样主张：人生来就是自由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自由权利，人生来就不应该受周围的限制。这种个人主义的自由当然是一种幻想，实际上没有这种孤立的、个人

的那种所谓“鲁滨逊式的自由”。鲁滨逊不过是小说，实际上并没有那样的事，即使有这件事，也不能证明一个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理想，因为他在岛上18年还是要回到社会上去；他能够在岛上生存，就是因为社会给了他船和一些东西，最主要的就是有一支猎枪，能够使他在孤岛上生存，否则早就被野兽吃掉了。

所以，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的空想是不存在的，资产阶级的空想并没有运用到世界上，资产阶级不能在革命胜利后规定一条：把每一个人都摆在孤岛上。因此到了资产阶级革命胜利时，要他们组成社会时，他们就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解释自由，就是用私有财产来解释自由。他们说，自由就是要有权利支配自己的财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所规定的宪法或宣言，如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都是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看做是保证自由的重要的一条。有财产就有自由，有多大财产就有多大自由，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的意思。

私有财产既然是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没有财产也就活该，有财产的人可以任意压迫人，为非作歹，没有财产的人就应该受压迫，这就是资产阶级历史上表现出来的所谓“自由”。所以现在资本主义国家自称为“自由”国家，分析其实质，就是金融寡头、大资本家的自由，自由要按照他的财产的多少来规定，金融资本家就应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被他们所垄断。没有财产的人就应该没有自由，你没有财产，你就有出卖劳动的自由、受剥削的自由。

所以，帝国主义国家一定要说苏联没有自由，中国没有自由，因为他们在他们的世界里很自由，要杀人就杀人，要压迫人就压迫人。他们想打仗打不起来，所以他们反对苏联领导的世界和平

运动，因为限制了他们想打仗的自由。我想侵略殖民地、组织东南亚集团、东北亚集团，把小丑蒋介石、李承晚和日本天皇组织在一起，因为有你使我组织不起来，所以一定要反对你。这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而他们的所谓“永恒正义”、“普遍道德”，从资产阶级进步一直到垮台，私有财产是他们惟一的最主要的自由。这是了解今天世界情况所需要知道的一个原则。

资产阶级的学者有这种客观唯心论，他们认为历史应该按照私有财产、自由意志、自由道德的原则来发展，社会应该按照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来建立。如果有一种社会没有私有财产，他们认为那是不正常、不合理，也不会长久的。任何社会都应该有私有财产，甚至应该有资本，譬如原始社会，原始人拿一块石头抵抗野兽，这石头就是他的私有财产，就是他的资本。资本是用来剥削人的手段，但是他们想掩盖资本的本质，甚至说野蛮人的石头也是资本。这就是客观唯心论的一种历史观点。

这种观点在我们队伍里有没有呢？公开地有系统地主张历史是按“永恒正义”的原则发展的人是没有的，但是把某种一成不变的公式看做是社会生活的固定原则，这种看法往往会发生，不自觉地有这种看法。教条主义思想的性质就类似这种思想，以为人的生活，人的历史是按照一定的公式或原则发展的，所以只要在书本上找到了一两个公式，就可以运用这公式来解决问题，就不需研究历史的本质了。教条主义思想的性质是主观的性质，以为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公式支配我们的生活，教条主义当然不是主张人的意志可以随便改变世界，但他们认为有一种客观的公式在支配我们的生活，因此他们就不去具体地研究我们周围的情况，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多余的。

关于唯心论大体上就是这几种，我们学习历史唯物论，要反

对许许多多的唯心论的历史观点，要反对崇拜偶然性，反对靠运气、靠碰来生活和工作，反对以感想代政策，也要反对公式主义、教条主义。

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是一方面，是最根本的一方面。但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只有这一方面，还有第二方面的观点，就是历史唯物论还要承认社会意识、人的思想也并不是消极被动的，社会的思想意识本身虽然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但是它也可以反过来对社会的存在发生一定的作用。所以总起来讲，存在和意识的关系是相对的，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又影响存在，是相互作用的。

如果只看到第一方面，否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那就是机械决定论，也可以叫片面的因果观点，没有看到社会意识反过来又成为原因，来影响社会的存在，所以应该从相互关系上看。这是我们学习历史唯物论必须注意的一点。

但是，如果只注意到精神对物质的作用，这就是唯心论，唯心论也是有原因的。只是注意到精神对物质的作用，这也是一种片面的观点。

只看到精神对物质的关系，这是一方面，但是如果完全不注意到这一方面，就又变成机械决定论了。这种机械的观点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又会引起一种错误，这种错误就是自发论。这种错误也可以说是与宿命论的性质相近，宿命论认为人的命运是生下来就决定的，八字好就好，八字坏就坏，人主观的活动不能起任何作用。

法国资产阶级的唯物论就有一点片面性，有一个法国的唯物

论者就是这样主张，他说人类生活、人类历史是完全被物质决定的，所以很可能某一个皇帝的胃口不好，也会使历史发生很大的影响；某一个将军的脑神经里有一个分子活动得不正常，就可能使战争发生一个根本的改变；或者某一个皇后的情欲特别厉害，也可能使政治上发生根本的改变。他有一点根据，就是法国革命以前，路易十六的小老婆特别厉害，皇帝很受她迷惑，因此这个小老婆除了皇帝很爱她以外，她还可以自由地和一些将军来往，她很喜欢一个将军，她在政治上经常袒护这个将军，而那将军经常打败仗，皇帝受她的蒙蔽，政治上就受到影响；还有很多宫廷的官吏和皇后来往，他们压迫人民很厉害，生活很腐化，皇帝听信小老婆的话，对这些事情都不管，因而引起人民的反抗，最后引起法国大革命。这个法国的唯物论者就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由于法国皇帝喜欢一个小老婆，受了小老婆的影响而引起的，如果法国的皇帝没有这小老婆，革命就不会产生了。

过去历史上的机械唯物论就是这样，这种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出现后还有，他们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理由是：既然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人类的意识，社会主义既然是必然的客观规律，为什么马克思还要组织共产党、还要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想难倒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且还很狡猾地举了一些例子想来辩护自发论，他们说：月蚀这件事情是必然的，试问我们人类是否为了必要而组织一个月蚀党？如果不需要，为什么马克思还要为社会主义的实现而组织共产党？

马克思反驳了这种错误的思想，他说：你这位先生的譬喻打错了，因为人的事情和月蚀不同，社会和自然不同，自然界的运动是没有人参加的，自然界的规律是完全盲目的，所以月蚀当然用不着人去促进，但是社会是人组成的，社会意识是人的意识，所

以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占很大的地位，因此是否组织党、是否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的实现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普列汉诺夫也写了一篇文章来反对他们。

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时候，这问题已经没有了，但是列宁和斯大林在革命的初期又碰到了自发论，列宁就写了《怎么办?》，斯大林就写了《略论党内的意见分歧》，都是批驳这问题的。斯大林讲：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社会主义可能实现，但是首先要碰很多的钉子，走很多的弯路，遭受很多的痛苦。而且你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还是要和资产阶级思想分裂而进行思想斗争，这是很必然的，完全没有一种思想上的直接指导是不可能设想的。因此我们应该早一点宣传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的实现更顺利些。

列宁就是在这时强调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革命的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资本主义的物质生活条件就提出了这要求，工人受资本家压迫就不满现社会的制度，但是这种要求要变为一种运动，变为真正的革命运动，而不是被资产阶级所利用、所欺骗，就一定要有正确的理论，没有这种理论，物质条件提出的要求就不能变为运动，如果社会生活没有群众运动，那么这种要求就不会实现，始终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包含必然性，但是必然性不能成为现实性，现实性就是已经显示出的必然性，而可能性就显示不出现实来。所以，要把一种可能的东西变为现实，把社会物质生活已经提出来的要求变为群众的运动，就一定要通过人们自觉的活动，就要有理论指导。所以自发论是错误的，应该反对自发论。

经济主义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想来阻碍工人运动的发展，因而宣传一种自发论的思想；还有一种客观主义也是这样。在俄

国革命初期，这些思想都是想利用一种片面的唯物论的观点，把历史唯物主义作片面的解释，宣传自发论，取消党的作用，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作用，阻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如果列宁、斯大林在革命初期不和这些倾向作斗争，马克思主义运动就不能展开，布尔什维克就不能胜利。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自发论往往还是有的，不重视理论的思想，在我们许多老干部里还是有的。我们碰到有些刚来马列学院的同志，他们怀疑理论有什么用处，说过去我没有学理论，工作还照样作，而且作得还可以。学了理论可以增加什么呢？这种思想说它是自发论，帽子太大了，因为他不是有系统地主张这一套思想，所以不一定是自发论；但是这里有自发论的因素，有自发论的倾向。有自发论倾向的人，如果遇到一个自发论者向他宣传自发论，他就会被俘虏，因为他们的思想性质是相同的。

所以，在我们学习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时，就不能忘记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这种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能够推动物质生活的发展，一方面是能够阻碍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为什么会有这两方面？因为社会意识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新的、能够反映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里所提出的进步要求的，这种社会意识就能够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起推动作用；另一种是旧的，反映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里保守的要求、反映反对势力的要求的，这种思想意识就对物质生活条件起阻碍作用。

思想意识的性质并不是它自己本身规定的，归根结底还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规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矛盾基本上是一件事：保守的、落后的代表过去的势力；新生的、前进的代表新生的势力。就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也有这种矛盾。物质决定精神，但是精神反映物质时，按照它的特性对物质生活条件

起应有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是反映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生活条件里的进步要求的，这要求就是工人阶级的要求，工业发展的要求。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反对资本主义就起了很大的推动和变革的作用，这种作用是社会思想意识中很重大的作用，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少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忘记这种作用，一定要注意这种作用，而且一定要利用这种作用。

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就是这样，历史唯物论的根本原理就是这样。

四、正确理解什么是社会存在

历史唯物论不仅仅一般地指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且还具体地找到了什么是对社会意识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存在。历史唯物论所以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点，而不是假的，就是因为它具体地找出了什么是社会存在。

除了历史唯物论外还有一些唯物论的观点，这些观点不是科学的唯物论的观点。机械决定论表面上好像也是唯物论，但它是不科学的，所以不能成为真正的历史唯物论的观点。还有一些历史观点，就是斯大林批判过的人口论及地理条件论等观点，一种人认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人口，另一种人认为是地理条件。人口和地理条件是不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当然不能否认这些也是人类社会需要的一些条件。但是，历史唯物论是否就把人口、地理当做是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条件呢？历史唯物论就不是这样看，历史唯物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其特点就是能够和人口论、地理论区别开来，把不正确的、非科学的、似是而非的唯物论观点加以区别。

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历史学除了唯心论外，还有机械决定论、人

口论等，都是应该反驳的。18 世纪末，英国资产阶级的学者马尔萨斯主张的人口论，是他第一个提出有系统的理论，他的主张就是认为人口的发展比生活资料的发展更快，人口是依照几何级数增加的，而食物的增加是按照算术级数增加的，所以粮食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甚至还有资产阶级的学者认为粮食不但赶不上人口，而且往往还要降低，因为土地的生产力是逐渐减低的，土地肥沃的程度是一年比一年下降的。

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已经驳斥了这种说法，这种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因为资产阶级经营农业不像经营工业那样积极，土地的地租相当重，搞农业不易得到利益，所以资产阶级经营农业就不很注意培养土地的力量。由于资本主义有这种情况，他们就制造这种谬论来宣传人口论。因此，所有法西斯国家都利用这理论作为侵略的借口。

苏联的事实很清楚地证明不是这样，苏联人口的增加是很快的，但是粮食的增加比人口更快，1928 年苏联每人平均可分到粮食 1000 斤，但现在每人可增加到 1200 到 1500 斤，还是粮食增加得快。况且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没有把农业作为重点，最近两年才作了决定，要把农业生产作为重点。

地理条件的说法也是资产阶级国家里很流行的，上面也提到一些。地理条件的谬论常常被一些人拿来和历史唯物论混淆起来，普列汉诺夫就有地理论的因素，他有一套想法：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社会的进步，生产关系又被生产力决定，生产力由什么决定？最后说生产力是由地理条件决定的。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地理论。

中国也有一种荒谬的思想，梁启超把过去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研究了一下，“发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他们出身的家乡都是很好的，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实际上每一个人的家乡都是有优

点的，要找都可以找出来。北方说它坏是空气干燥，说它好是不怕水灾，怎样说都是可以的。所以他们就说：许多伟大人物的家乡地理条件都是很好的，可见地理论的观点有些道理。这是想用地理条件来取消历史唯物论。

我们中间有没有这种倾向？还找不出来，不过有时我们作工作太注意环境，太重视地理条件，不重视主观努力的情况还是有的。

五、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历史唯物论所以成为科学的历史观点，就是因为它根据社会本身内部的物质条件来找到历史发展的原因，这就是生产，就是生产方式的发展。所以历史唯物论就是肯定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强调或看轻了这一点就不是彻底的唯物论。

生产就是人类为了取得自己生活所必须的物质资料所进行的劳动。有的劳动不一定是生产劳动，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有些资本家发表了这种议论，人家说资本家不是劳动者，他很不服气，他说：宪法上规定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有养老的权利，如果资本家不是劳动者，就不能享受这些权利了。我们资本家也很辛苦，有时晚上都不睡觉，怎么不是劳动呢？我们说，当然也是劳动，但是这不是为了物质资料的生产而劳动，而是为了利润劳动，所以不能叫生产劳动，也就不能叫做劳动者。

知识分子的精神劳动可以叫劳动，但还不是第一线的劳动。知识分子的劳动可以间接帮助劳动者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科学家可以改进技术，艺术活动可以帮助鼓舞劳动热情。

所以，生产就是人类为了取得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劳动活

动。当然，广义地讲作工作就是生产。有些同志来学习，就叫脱离生产，但是如果你写科学文章，说我从机关脱离生产来学习，那就不对了。所以对生产的意义应该划一个界限，要把科学上所讲的生产和我们一般所讲的生产加以区别。知识分子的劳动当然是生产精神生活的资料，是精神劳动，但生产首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

辩证法有一条规律：一切东西都是在联系中存在的。生产是怎样联系的？生产所以能够进行，就是靠两方面的联系，就是对自然界的联系和人与人的联系。如果没有这两方面的联系就谈不上生产，鲁滨逊一个人在岛上生活，就是由于在他来到岛上以前和人有联系，并且以后他又碰到一个黑人，收为奴隶，形成主仆的联系。对自然和人与人这两种联系，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讲生产时一定要注意这两方面的联系。

生产力是指的人和自然的联系的这一方面，人要取得生活资料，就一定要从自然里去找，要靠劳动。人和动物不同，动物就是依赖自然界现成的物质资料来生活，动物不会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变自然的物质形态，而人就是要大大地改造自然，经过劳动进行生产。米丘林说：我们人类不要等待自然的恩赐，而要主动向自然索取。这话是对生物学讲的，但是也可以把这意思扩大来说。人和动物不同，就是人和自然联系时是有自己劳动作用的，自己主动地直接地改变自然界，是一种生产的联系，动物是没有生产的。这种生产就是征服自然界的活动，是从自然界取得自己生活资料的活动，是使自然界服从自己要求的活动。这种活动的量在人类历史上是会发展的，这就叫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的大小由什么决定？由两个条件决定，一个是生产工具，另一个是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人。这就是生产力的

要素。

有没有其他的要素？没有。从前有一种说法，生产力有三个要素，除了生产工具和人以外，还有劳动对象的要素。在斯大林的历史唯物论以前，一般的都认为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要素，但后来研究的结果，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劳动对象归根结底就是自然条件、地理条件，如果说劳动对象就是一种生产力的要素，意思就是说自然条件、地理条件也是决定生产力的要素，生产力的发展也是由自然条件、地理条件决定的。归根结底这结论就和普列汉诺夫的一样了。这当然是错误的。因为自然界根本是变化很少的，差不多等于没有什么变化，而生产力则发展得很快，过去旧中国地大物博，为什么生产力不发展？新中国照样也地大物博，为什么生产力就发展得很快？这是一点也不能用自然条件来说明的。新中国生产力所以能够发展，就是因为社会改变了，我们国家能够在农业、工业中使用新的工具、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提高了，能够掌握新的生产经验。这两个条件就是新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决定要素。

此外还要注意，劳动对象是我们生产力发生作用的对象，并不是生产力本身。譬如打仗，我们有战斗力是因为我们运用了武器、有掌握武器的人提高了战术，再加上我们战斗的对象，合起来就有战争。能不能说敌人也是我们战斗力的要素？很明显，敌人绝不是我们战斗力的要素，敌人是我们战斗力发生作用的对象。我们战斗力的要素第一是武器、第二是战士，能够掌握武器，有高度战斗经验，战斗热情的战士。这就是决定我们战斗力的要素。敌人对我们有什么作用？有一个作用，战斗力的发挥、战斗力的表现可以看敌人的情况来决定，敌人强一些我们的战斗就有一些困难，敌人弱一些，我们的战斗就很容易；敌人弱一些看不出我

们的战斗力，比较强的敌人反而可以看出我们很高的战斗力。所以敌人只能起一种表现我们战斗力的作用。所以劳动对象并不是生产力的要素，而只是生产力发挥作用的对象。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发展生产力靠什么？要靠我们能不能改进技术，能不能使工人掌握技术。当然调查地理条件，调查资源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调查了还不等于有了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还是要有工具、有人。我们的技术革新运动靠什么？主要有三点：改进工具、改进操作方法和改进劳动组织。劳动模范王崇伦、张明山都是改进工具的模范；还有提高操作方法的，如郝建秀，她没有改进工具，但她能够运用工具提高劳动技能。从前也有用提高劳动强度的办法来提高生产的，但是我们不看重，我们认为这是生产竞赛开始时的自然现象，但不能依靠劳动强度来提高生产。

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即1928年至1935年间，主要提出了两个口号，一个口号是技术决定一切，另一个口号是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就是把苏联的工业用新的技术新的工具装备起来，干部决定一切是要有掌握工具的干部。再没有第三个口号。

关于人和人的联系，就是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就是生产关系。

人在生产中必然要发生一定的关系，人要结合起来才能生产，单独的个人是不能进行生产的。小农业、手工业也不能是绝对的个人生产，个体生产是小规模的生产组织。这种人和人的生产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关系，就是进行生产时所必要的东西为谁所有，是少数私人所有还是劳动者共同所有的一种关系；另一方面就是与生产资料分不开的人和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地位的关系，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还是劳动互

助合作的关系。其次是生产品分配的关系，生产出来的东西要维持大家的生活，就要分配。这个关系是由前面两种关系决定的。所有权的关系不同，人和人的地位的关系不同，分配也就不同。社会主义的分配因为生产资料是公有的，人和人的关系是互助合作的关系，因此就可以用按劳取酬的方法来分配；但是，如果生产资料是少数人所有，多数人没有，人和人有剥削的关系，分配也就不同，劳动者只能得到必要的生活资料，而剥削者可以得到所有剩余劳动的产品。

这三种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关系，生产关系的基础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关系。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基础是什么？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回答说：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基础。

各种生产关系的性质归根结底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剥削阶级统治劳动者，劳动者不能不服从的剥削关系；另一类是劳动者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原始公社、社会主义社会和集体农民是互助合作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是由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的。还有一类是由统治与服从过渡到互助合作或由互助合作过渡到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后者就是原始公社末期的家长制度的农业公社的关系，即由互助合作的关系走向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在家长制度里有前后两种生产关系的因素，最初家长制度的组织还是家族的组织，生产资料还是公有制，所以还是互助合作的性质，另一方面，有了这种因素后首先家长的权力很大，在分配时家长就有可能多分配一些，另外在家长制度里已经开始有奴隶的使用了，这种就是家庭奴隶制度，这种奴隶就是作为农业公社里劳动的帮手，甚至家长也要劳动，所以奴

隶就不成为主要的生产劳动的担当者，两种都有，这就是过渡性。中国有的地方几千年来这种制度都没有彻底消灭。有的地方虽然基本上是封建的，但是家长制度的影响还有很大的遗留成分，譬如买东西是一个大家族来买，但是家里每一个人都要分配，或者家里有人出去作官，回来时就要把箱子打开，每个人分配一点。这是原始公社的残余，这种过渡在中国社会里时间还是很长的。

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首先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这是比较低级的生产合作社，就是半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生产合作社由什么决定？就是看他是否按劳分配。半社会主义生产合作社都是土地先要分红，然后再按劳动力分配。有些生产合作社是完全按劳分配，不管你是否加入了土地和工具，你参加合作社以后，就要按照你的劳动分配，做多少工作拿多少产品。这种生产合作社北京周围也有了，但现在还不能普遍发展。

国家资本主义算不算过渡的形式？过去曾提到国家资本主义是过渡的。能否普遍这样说？还要慎重一些。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合作的形式。是否叫过渡形式？这问题在科学上理论上还没有做结论，所以我也不能在这里做肯定的答复。如果不是写科学文章，我们大体上也可以这样讲。这种制度就是逐渐排挤资本主义因素、增加社会主义因素，是有一点过渡性的。这两种因素并不是机械地并存，而是一步步地统一在一起走向社会主义，公私合营不是两种经济机械地合作，而是可以看出两种体系逐渐带有过渡性。现在资本家对我们宪法的四种所有制不满，说是应该加上国家资本主义，所以如果我们太强调这一点，就容易被资本家所利用。

我们解释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时，有完全社会主义的，有半社会主义的。严格地说，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只能是社会主义的，

我们不能说还有一种劳动者的半集体所有制。过渡的生产关系不是一种独立的集体所有制,而是一种所有制过渡到另一种所有制。为了不在实际生活中发生误解，我们在讲劳动者集体所有制时加上半集体所有制，对国家资本主义就不能那样说了，只能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合作的关系。所以在范畴上讲，我们说是四种所有制，这里面可以有过渡的东西，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的合作以及全民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的合作。国家资本主义说是过渡的所有制，可以这样讲，但不需要讲得太多，因为这问题在科学上理论上还没有做结论。

（曾收入《艾思奇讲稿选》上卷）

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活

（1954.11）

10月12日中国青年报登载了一篇令人惊心动魄的通讯——“马小彦为什么会腐化堕落的?”一个原来聪明活泼、很有希望成为国家有用人才的孩子,因为受到资产阶级的腐化思想的侵害,忘记了自己的光荣神圣的任务——学习和劳动，把全部生活葬埋在“吃喝玩乐”的泥坑里，并且愈陷愈深，竟变成了可耻的窃盗和破坏革命秩序的罪犯。

在各方面都已获得了空前伟大的成就的新中国，在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二个年头的新中国，在全国绝大多数青年和广大人民都在欢欣鼓舞地为创造自己的光明前途而积极努力和不断向前迈进的新中国，居然还存在着这样一个黑暗的角落，还会有青年被引诱到堕落犯罪的道路上去，这就是值得我们十分警惕和注意的。

如果有人还不相信，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必然要有很尖锐的阶级斗争；如果他是如此麻痹，以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完全风平浪静，不会有什么困难波折，那么，只要仔细体会一下这一事件的意义，就应该有所省悟。马小彦这一段生活发展的事实，正是一种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反映。这个斗争是在青年的思想阵地上展开的。中心问题是:“青年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活?”这里就有互相敌对的两种回答。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思想要求青年们正确地注意到应该把学习和劳动作为生活的主要内

容。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人生观却向着青年诱惑地说：生活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享乐，人生最惬意的就是不动脑筋，成天玩。资产阶级思想在马小彦的身上得到了胜利，它把他坑害了。这样就使一个本来可以对国家有用的力量变成了社会的害虫。

因此，不能把马小彦的事件看做只有个别的意义。单只就事件的本身来说，也许是个别的，但这事件的意义及其所表现的思想斗争的内容，却是具有相当普遍的性质的。这就是说，在全国青年中间，类似的问题，类似的斗争，是或多或少地到处可以遇见的。学习和劳动第一呢？生活享受第一呢？这不是每一个青年都已正确解决了的问题。自然，几年来我国青年们的觉悟是日益提高了，他们中间多数都能以前一种回答作为对待自己生活的指导原则，也就是能把学习和劳动放在自己生活的第一位，正就因为这样，我国各方面的工作部门中才不断地获得大批新生力量，使我们的非常复杂艰难事业能够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迅速地发展起来。我们的工业中间不断涌现出许多青年的先进工作者，农业中产生着不少的劳动模范，军队中也有无数的战斗英雄，其他运输交通、文教卫生、机关事务等等工作部门中，都有数量巨大的埋头苦干的青年的模范人物，他们都是完全懂得如何正确地对待自己的生活的。新中国之所以能在短时期里获得空前伟大的成就，一部分功劳应该归诸于广大青年们的这种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劳动积极性的增长。但是，另一方面，也还有一些青年在如何对待自己生活的问题上是受到后一种错误观点的影响的。他们没有看见社会主义事业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没有看见青年的远大前途是要从自己的积极学习和劳动中去争取。他们甚至颠倒了是非的标准，以光荣的劳动事业为耻，而以腐化的生活享受为荣，他们成了鼠目寸光，只图眼前利益的庸人。这种剥削阶级的

腐朽思想侵蚀到的地方，青年们的学习、工作以至于正常的生活都要遭受到破坏。在工厂中发展了某些青年工人的经济主义思想，使劳动纪律松弛，误工旷工增多，他们像资产阶级一样地追求吃喝玩乐，甚至于参加了剥削行为；在农村里使有些青年不安心生产，盲目流入城市，羡慕富农剥削生活，不积极参加互助合作运动；在学校里便有些学生荒废了课业，把吃穿游玩当做了主要生活，而为了满足吃穿游玩的目的甚至于做出可耻的偷窃行为；在机关工作中便有些青年不能切切实实地做好日常事务……。这一切都是说明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对于青年们有着多么大的毒害作用。这些毒素如果任随它到处泛滥，我们不去努力加以消除，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将要遭到严重阻碍和破坏，广大人民多年来流血流汗所争取到的胜利成果将要被断送，而青年们所向往的真正光明幸福的前途终于不能实现。这不是很容易明白的事情吗？

向一切英雄、模范、先进工作者们学习，端正自己生活的态度，批判资产阶级腐朽的享乐主义思想，清除这些坏思想的影响和毒害，这是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过程中，青年们对于自己思想和生活必须要经常注意的重要问题之一。

社会主义并不反对提高人民的生活享受的条件，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经济的任务，正是在于要争取不断地增进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福利。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提到了任何国家的劳动人民所未有过的水平，这就是一个榜样。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是以苏联为模范的，五年来全国人民和广大青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已经逐步有了增进，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福利的提高，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

只能随着社会主义生产的增长而逐步地实现出来，而社会主义的生产的增长又主要地是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为前提的。劳动是创造新社会和一切人民的生活福利的惟一泉源。没有全国人民从事不断的艰苦的劳动，就不可能实现生活幸福和文化高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首先是要付出自己的劳动（在学校内，首先是要好好学习），然后才能够谈得到物质和文化福利的增进，这是每一个新中国青年在考虑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生活问题时必须认识到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

目前在有些青年中间流行着一种对社会主义非常片面的看法，例如说社会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穿得好好的，吃得呱呱的”。如果只是这样，那么，这和资本主义有什么分别呢？难道资本主义社会就没有电灯电话，就是没有穿得好好吃得呱呱的人么？应该说：资本主义也不缺少这些东西，问题是在于：1.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最好的物质福利条件只是归于少数资本家所有，而大多数劳动人民却永远处于贫困黑暗的境地。社会主义社会却决不容许牺牲大多数人民的幸福来使少数人过奢侈糜烂的生活，而是要使一切劳动人民共同享受高度的物质和文化的福利。新中国的青年要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因此就不能只注意追求个人生活的享受而忘记了应该和全国劳动人民共同提高。2.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少数资本家是不劳而食的，他们的奢侈糜烂的生活建立在剥削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社会却消灭了剥削，人民的幸福生活是依靠自己的劳动创造的，每一个公民都是光荣地享受着自己的劳动果实。新中国青年要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就必须重视劳动，必须首先认真地学习和工作，养成爱好劳动的优良品质。3.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少数资本家的奢侈糜烂的生活既是依靠剥削别人的劳动果实，因此他们就会通过

投机、诈骗、盗窃行为等等不正当的方法来取得暴富。他们只追逐眼前的利益，而没有任何远大的目标。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要用自己的艰苦劳动来创造光明幸福的社会生活，因此他们就有着共同努力的最幸福最美妙的远大目标，他们把眼前利益和远大的目标正确地结合起来，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新中国青年负有创造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就不应该把主要的注意力用来打算眼前的生活享受问题，虽然我们的国家在生产发展的每一个步骤上都要适当地提高人民的生活，但任何时候都应该把眼前利益的满足服从于实现远大目标的目的。要知道只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胜利完成了，我们才可能获得真正高度的物质和文化的幸福，如果每个人都去追求眼前的过高的生活享受，妨碍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远大目标的实现，那么，个人即便暂时获得了较高的生活享受条件，终归还是要化为乌有的。

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活？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两种根本相反的态度：剥削阶级腐朽的享乐主义的态度，工人阶级高尚的共产主义的态度。我们的青年在这里应该如何选择呢？选择享乐主义的态度吗？马小彦的生活的结局已经向我们敲起了警钟，这是毫无出路而且极端危险的选择，青年们应该坚决拒绝这种选择，并且应该帮助一切走向这条迷路的青年们及时回头。工人阶级的生活态度，这是觉悟的青年已经选择了的真正具有光明远大的前途的生活态度，这是应该永远坚持，应该争取使一切新中国的青年普遍地都来选取的态度。

（原载《中国青年报》1954 年 11 月 25 日）

哲学问题解答*

(1954.11)

今天我来解答问题。大家学习哲学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有辩证唯物主义的，也有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很多，今天不能把大家提出的所有的问题都加以解答，第一个原因，有些问题不解答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第二，有些问题是不能解答的，没有做结论的；还有些问题教研室朱明同志等都解答了，他们解答的问题，我研究了一下，认为他们的解答是对的，所以我就不重复了。

今天我只是解答一部分问题，一部分比较复杂、比较难的、不容易讲明确的问题，其中有一些是大家讨论过有争论的，我对两方面的意见做一个结论。

现在从辩证唯物主义讲起。

一、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

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应如何了解。

普遍性与特殊性有什么相互关系？

我们讲过，普遍性与特殊性在任何一种矛盾中都是互相联系

---

* 这是艾思奇在1954年11月16日给马列学院三部（师资训练部）政治经济学班所作的问题解答，其中既有唯物辩证法方面的问题，又有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的问题，所以，总称为哲学问题解答。许多问题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我们只作了一些文字加工，未做任何删节。

的，就是说，任何一种矛盾同时具有两方面：即普遍性方面与特殊性的方面。世界上找不出一种矛盾只有一方面，而没有第二方面。任何实际中的矛盾都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矛盾的两种性质的统一、对立的统一就是它的相互关系。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得很清楚，普遍性就是共性，共性的通俗解释就是一切矛盾的共同点，或同类矛盾的共同点。一切矛盾都有共同点，就是都有矛盾。同类的矛盾都有一个共同点，阶级社会矛盾的共同点就是都是对抗性的。

普遍性的范围可以从很大的方面看，也可以从比较小的方面看。最大的方面是一切事物都有矛盾，小一点的方面就是每一类矛盾都有共同点。

这种普遍性就使得同类的矛盾都有共同点的联系，尽管其他方面不同，但是总有某一方面相同。阶级社会里，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都有许多不同，但是却有一点相同，就是它们都是对抗性的矛盾。资本家和地主有许多不同，但是有一点相同，就是他们都要剥削劳动人民。所以矛盾的普遍性就使得一种矛盾与其他矛盾有了共同点，这种相同的地方就有可能使这些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联系起来。地主和资本家对于劳动人民的矛盾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反对劳动人民，所以地主与资本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联合起来压迫劳动人民，甚至可以共同组织一个社会，即组成一种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的社会。

矛盾的普遍性就是使不同的矛盾能够在一定条件下联系起来，矛盾的特殊性就是使一种矛盾和其他矛盾有所区别。尽管资产阶级和地主都要压迫人民，但是他们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方法是互不相同的。

所以，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的相互关系用不着太深地钻研，

没有什么神秘。就是这两方面的特点是经常在一种矛盾中结合着；同时它们的作用又不同，普遍性使各种矛盾有共同点，特殊性使各种矛盾有所区别。它们的相互关系就是这样。

能不能用简单的、机械类比的方法，即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来比特殊与一般呢？

不能这样比。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不能机械地运用到普遍性与特殊性方面，普遍性与特殊性没有这种相互关系。但是只有这样一种关系，就是我们研究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时候常常是从特殊的东西着手。开始时只能找到一些具体的材料，等到特殊东西的材料弄得很丰富了，研究得相当清楚了，然后就可以进一步地从许多特殊的事物中概括它们的共同点，这样就可以找到普遍性。

我们要真正地了解农村，就要先把几个典型农村的许多特殊材料加以详细的研究，各种特殊的材料都研究清楚了，然后把几个典型比较一下，这样就可以找出有哪些东西是所有农村的共同点，有哪些是个别农村特有的东西。这样才能区别普遍与特殊。所以这关系就是先由特殊到一般，找到普遍性后，以之作为指导，再来进一步研究更新的、特殊的东西。

我们的认识过程就是由特殊到普遍、由普遍到特殊。这并不是说，客观事物本身矛盾的发展是先有特殊阶段、再有普遍阶段，再进一步到特殊阶段。不是客观矛盾的发展有这种过程，而是讲人认识矛盾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

物质和精神本身就是这种相互作用，先有物质，再产生精神，精神再作用于物质。所以不能用物质精神的相互关系简单地运用来加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上，这也是矛盾的特殊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就没有物质与精神的这种相互关系，它们的关系就是两方面：同时联系在一起；普遍性使事物有共同点，特殊性

使一种矛盾与一种矛盾有所区别，任何事物都有这种矛盾。又统一又对立，这两点合起来就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也只有这样的相互关系。如果再去钻就钻不出什么来，就是钻牛角尖了。

这样一种相互联系在实践中有什么意义？

所谓实践意义也就是这种原理我们怎样运用的问题。我们懂得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经常联系在一起的原理，我们就要经常拿这个原理作为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指导方针，我们在实践中也就不能违背这种原理。

矛盾的普遍性既然使事物具有共同点，因此我们就可以运用普遍性来从事研究。怎样运用普遍性来从事研究呢？就可以把矛盾的普遍性作为我们研究的指导方针，在分析矛盾时大体上要按照普遍性所指示的那些内容，作为我们研究的总的方向。我们知道，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矛盾总是对抗的，任何一种阶级矛盾都有这个普遍性，因此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普遍性作为我们研究任何一种阶级矛盾的方向。就是说，不管分析那一种阶级社会的矛盾，不管是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只要它是阶级矛盾，那么我们在分析以前就用不着怀疑，而可以肯定这矛盾是有对抗性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阶级矛盾，所以不管它在帝国主义或新民主主义国家，不管它在中国有什么特点，总之这矛盾是对抗的，这样就使我们在研究矛盾时不会在大的方面犯错误。

矛盾的普遍性使我们有可能利用过去科学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普遍真理是不会错误的。事实上一切事物的矛盾都有普遍性，因此经典著作已经揭发的普遍原理就不会错，就可以把它作为研究的指导，毫不怀疑这种指导是正确的。而且我们这样的相信对我们很方便，绝不会使我们吃亏。

马克思主义和一般的经验主义，实验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经验主义总是认为只有眼前所看到的特殊东西是真的，不相信过去的科学发现和过去的科学成绩也是真的。实验主义是一种主观唯心论，认为今天的真理明天就不一定是真理；今天认为是错误的，明天也许就是真理。反正事物时时刻刻在变化，没有一个事物能够掌握比较长期的真理。实验主义认为我们说的真理是一种主观的，不一定有客观性。所以胡适的方法就是“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所谓“大胆地假设”有什么凭借没有？没有的。我认为要这样假设就这样假设。用大胆地假设来指导研究。

马克思主义与实验主义不同，就是我们不是凭空设想的“大胆假设”，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指导原理就是过去长期科学研究的成果。过去的历史实践，革命斗争已经证明了许多普遍真理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指导，我们相信已经决定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真理，因为它是客观实践已经证明了的。

矛盾的普遍性的作用对我们的实践意义就是这样，因为客观矛盾有普遍性，因此我们就有可能把过去科学上所发现的许多普遍原理作为今天我们研究的指导，这就是它的实践意义。

阶级社会里有阶级斗争的原理，马、恩、列、斯已经发现了。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时，用不着怀疑中国可能没有阶级，用不着相信孙中山讲的大贫小贫，或李宗仁讲的“职业不同，没有阶级”，一切怀疑没有阶级的谬论，我们在没有研究以前就可以把它丢开。我们可以肯定中国一定有阶级，而且一定有阶级斗争。用这种思想来指导我们的研究，从事中国社会的分析。

如果我们不相信矛盾有普遍性，那么我们就不敢相信马恩列斯经典著作所传授给我们的普遍真理，那么我们每一件事都要从头研究，对每一件事都不敢首先提出它的指导方向，就不敢指出

总的方针。如果是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就非常吃力，甚至就不可能。任何事情都要从头研究起，这样人类文化就不可能有进步，思想就不可能有进步。过去的东西全部过去，和今天一点联系也没有，样样都要从头做起，这样就是错误的。

所以，对矛盾的研究一定要相信它的普遍性的方面，把这一方面作为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的指导，然后再注意到特殊性这一方面。

要正确地认识矛盾，除了懂得普遍性以外，还要独立地研究它的特点，只注意普遍性，不注意特殊性，那么矛盾的分析就没有完成，因此也就不可能正确地解决问题。

不注意矛盾的特殊方面，这认识就是片面的，而且是抽象的、空的。如果只注意到矛盾是对抗的，是否就已经完全认识了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呢？是不是就能够依照这个认识来解决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呢？当然不可能。因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中国的矛盾除了它是对抗性的以外，还有它的特殊性，这一对抗的阶级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中，同时又是统一战线的关系，这对抗的阶级虽然有冲突，但是冲突不致发展成为敌对的关系，不致发展成为互相敌对、截然分开的两个营垒，所以它和敌对有些区别。对抗是矛盾有冲突性，敌对就是两个截然分开的、旗鼓相当、战场见面的营垒。

斯大林说，社会分裂为敌对阶级的情况下，矛盾的解决不能不采取爆发的形式，如果这社会不是分为敌对的阶级，是对抗而不是敌对，那么就可以避免爆发的形式。

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矛盾虽然是对抗性的，但这矛盾没有因为对抗而发展为敌对冲突。虽然主要的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是这个主要矛盾又有

统一战线的关系，使得主要矛盾没有形成敌对的，没有分裂为敌对的两大营垒。因此中国的矛盾的解决就可能走和平的道路。

和平道路并不等于不对抗，不能把和平道路与非对抗划等号。和平道路就是没有分裂为敌对的，特别是没有军事斗争，没有内战，没有爆发性的冲突。可是对抗是存在的，对抗还是它的本质冲突，还是免不了的。

我们的政策就是尽可能地维持这个统一战线，使冲突尽可能地减少，使矛盾解决的形式尽可能地采取非对抗的形式，并且绝对地避免内战。

所以，要承认矛盾有普遍性，然后才有可能相信科学的立场，理论的立场是对我们有帮助的；又要承认矛盾的特殊性，然后我们才知道：研究当前的矛盾、解决问题不能简单化，不能像教条主义那样，背诵了书上几条普遍真理就想直接解决问题。普遍真理只能间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指导我们进行研究特殊问题，只有在普遍真理指导下，把矛盾的特殊性弄清楚，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

关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及实践的意义就是这样了解。

有同志问：矛盾有几种特殊性？

所谓几种特殊性指的是什么东西，这问题提得不很明确。不过我想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即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的："由此看来，不论研究何种矛盾的特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在这方面再讲一下。

关于这问题我觉得没有很多可以讲的，很难进一步讲。矛盾

只有这几种特殊性，不同的就是范围不同，范围大一些的矛盾互相之间有不同的特殊性，范围小一些的矛盾之间也有不同的特殊性。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我们可以加以分类，最大的分类就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其中分为机械运动的形式、物理运动的形式、化学运动的形式、生物运动的形式和社会运动的形式，再加上人类思维的运动形式。思维运动的形式实际上不是一种独立的运动形式，是社会运动形式的一方面，是人类大脑运动的形式。

世界上一切事物可以分作几大类，就是这五类——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社会运动。当然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物质的，一方面是意识的。但是这不合理，因为物质与精神是一个东西的两方面，精神是包括在最高的物质运动形式里。所以物质运动的分类只能分为五类，这五类是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的关系，机械形式是最低级的，社会运动的形式是最高级的。

毛主席告诉我们，这五种运动形式中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特殊矛盾。比如机械运动形式中的矛盾是作用与反作用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另一种运动形式里是没有的，生物运动的形式就不是作用与反作用的问题，而是遗传性与变异性、有机体与环境的矛盾。社会运动形式的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阶级斗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与机械的作用与反作用的矛盾就大不相同。

机械唯物论的错误就是想以机械运动的形式简单地说明人类社会，而不注意到人类社会有它自己特殊的矛盾。机械唯物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就是一种力量均衡的关系，认为社会各种力量发生均衡状态时，这个社会就比较稳定；如果这种均衡状态破坏了，力量不均衡了，社会就发生了革命。这种说明是非常简单

化的，而且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世界物质有各种各样的运动形式，每一种运动形式都有特殊的矛盾，所以就不能机械地以这种运动形式的矛盾来说明那一种运动形式的矛盾。

各种大的运动形式都有它自己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以它们的特殊性为根据，解决社会矛盾就是要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是要用生产关系要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情况的法则来解决这些矛盾，而不能用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来解决这矛盾。

大的运动形式有它们的矛盾的特殊性，各种大的运动形式的矛盾是不同的。但是虽然不同，还有共同点，就是每一种运动中又有各种过程。比如社会运动形式包含许多过程，有原始公社的过程、阶级社会的过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程；机械运动的形式也有各种过程，有直线的，有圆形的；物理学里有光、声、电、热等运动过程。每一种过程的矛盾又不统一，光有光的矛盾特点，声有声的矛盾特点，电有电的矛盾特点，各有不同，在人类社会中，原始公社的矛盾有原始公社的特点，阶级社会有阶级社会的特点，社会主义也有它自己的特点。这些问题我们就很容易了解。

每一个过程又有它更小的范围，更小的发展阶段。原始公社有几个阶段，最初是简单地采集一些生活资料的阶段，以后进一步进入狩猎阶段，再进一步进到简单的农业，畜牧业的阶段。在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又有几个阶段，奴隶社会阶段、封建社会阶段、资本主义社会阶段。

每一个阶段又有各方面，每个阶段包含许多矛盾，每一矛盾成为一方面，同时每一矛盾又有对立的两方面，每一个方面又有特殊性，都需要研究。

研究这些方面不能带有主观随意性，只能根据矛盾的客观特

点来认识它，把人类社会的矛盾认为是一种均衡势力的状态的看法就是主观随意性。我们一定要很客观地，虚心地按照物质自己的矛盾来研究，不能有任何主观随意的解释。

这就是《矛盾论》这段话的意思。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否会发生转化？

这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是怎样理解的，是否有人会感觉到普遍性与特殊性会转化？照我的理解，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在一定情况下能够转化的。这种情况就是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的："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

毛主席就是在这个地方讲普遍性可以变为特殊性，特殊性可以变为普遍性，大家要了解是否有转化的关系就可以从这一段话来了解。

"资本主义制度所包含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的各国所共有的东西，对于资本主义说来，这是矛盾的普遍性。……"任何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这矛盾，可是这矛盾的普遍性仅仅限于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如果把范围再扩大一些，比如研究所有的阶级社会——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时，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矛盾就成为特殊的矛盾了，比如拿资本主义与封建社会比较，封建社会是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就有不同，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就是阶级社会矛盾的一个特殊性。

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转化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还有没有其他的转化关系？找不出其他情况下的转化。这种转化只有在范围改变的情况下。小的范围内是矛盾的普遍性，在

较大的范围内就变成了矛盾的特殊性；反过来看，在较大的范围内是矛盾的特殊性，但是把矛盾缩小来研究，在这种范围内，这种矛盾又是普遍性的。

不同矛盾的转化有不同的条件，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转化只有在事物范围有所改变的条件下才会实现。

转化与发展不同，转化是发展的一个关键，发展是一般的发展，由量变到质变转化，则是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某一环节上，对立东西的互相转化。没有转化的时候是否有发展？也有发展。所以发展是无条件的，因为发展是讲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而转化只是讲某一环节上的变化，这环节是有条件的。

为什么说矛盾的普遍性是绝对性的，矛盾的特殊性是相对性的？

这问题是名词的问题，不好作很深的解释。什么叫绝对，什么叫相对？所谓绝对，就是无条件的意思，是普遍的；相对是有条件的。矛盾的普遍性是绝对的，意思就是说，矛盾的普遍性是无条件存在的，这就是指一切事物都有矛盾这一点说的，不需要什么条件，任何事情都是有矛盾的，任何事物、任何情况都是有矛盾的。特殊性当然是有特点的，就是说矛盾的具体情况是有条件的，某种条件下矛盾表现为某种情况，条件变了，矛盾也变了。在一种条件下矛盾是对抗的，在另一种情况下矛盾是非对抗的。对抗是有条件的，阶级对抗只有在阶级社会里才有，所以是相对的。阶级对抗的社会消灭了，社会的阶级矛盾就没有对抗性了，可是一切都有矛盾，这是没有条件的，不管是阶级社会或没有阶级的社会，所有的社会都有矛盾。

所谓绝对性，相对性就是这样解释。

但是这样的解释就又会有人钻一下：你说矛盾的普遍性是无

条件的，可是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都是对抗的，这也是矛盾的普遍性，这是否有条件？当然是有条件的，所以问题就不能太机械地了解，就要灵活一些。毛主席讲绝对性就是讲一切都有矛盾。普遍性就是在一定范围内共同的矛盾，这种矛盾也可以说是有条件的。为什么有条件？这种一定范围内的共同矛盾，虽然在一定范围内是普遍的，但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它又是特殊的。所以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都是对抗的，这在阶级社会里是普遍的，但它在更大的范围内是特殊的，所以这一共同的矛盾还是有条件的，只有最大范围内的矛盾的普遍性是绝对的。这就是一切事物都有矛盾，一切事物的发展自始至终都有矛盾，这两条是绝对的，我们讲矛盾的普遍性首先是这两条，这是绝对的、没有条件的。范围较小的还是有条件的。

这问题只能这样了解，更多的就不能解释了。

毛主席曾举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历史根源的问题来说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应如何了解？

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矛盾的普遍性，说明了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的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这个问题大家自己去翻一下列宁主义基础就可以了。

毛主席讲斯大林在那时分析俄国的情况是注意到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两方面的，一方面注意到俄国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国家，帝国主义的矛盾俄国也有，帝国主义有三个主要矛盾，俄国当然也有。另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在俄国有它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是这些矛盾在俄国一个国家内很集中，在它的内部表现了许多帝国主义的矛盾，俄国有些半殖民地的性质，俄国的工业有帝国主义的投资，所以就表现了帝国主义间互相争夺的矛盾，这

就是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所没有的，在俄国内部有英法系统、英美系统与德奥系统的资本家在争权夺利；都想把俄国拿在自己手里，所以世界主要的帝国主义的矛盾就在俄国内部集中起来。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俄国也有；民族矛盾、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矛盾也有。在俄国一个国家内就有民族矛盾，沙皇代表大俄罗斯主义压迫民族。这种特殊性也是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没有的，这情况就使得俄国成了列宁主义的故乡。

帝国主义的环境应该产生列宁主义，帝国主义时代应该产生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恰恰产生在俄国，因为俄国集中了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俄国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这是普遍性，然而帝国主义的特点集中在一个国家，这就是特殊性。这就不能不产生列宁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在俄国各方面的斗争最尖锐，虽然这个国家最落后，但是各种斗争是最尖锐的，因此解决问题的要求也最迫切，因此就必然产生列宁主义思想。

但是这一点还不能完全概括俄国当时矛盾的特殊性，俄国的矛盾除了集中了帝国主义的矛盾外，还有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民主革命的矛盾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矛盾也集中在一起，所以俄国的革命就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理论也是在俄国产生的，也是当时俄国矛盾的特殊性的一种反映。

二、关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

既然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所不在，同一性是无所不在，怎么能够说同一性是相对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提？是不是有这种说法，同一性无所不在？我看这种说法不一定能成立，

如果能成立，这就是一个问题。

同一性只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矛盾的对立方面一定要互相依赖，一方面是矛盾要互相转化。

首先讲互相依赖方面。同时存在是否就是无所不在？我看不见得。譬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当然是必须存在的，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也同时存在，可是过渡时期结束后又怎样？苏联现在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没有资产阶级。是否为了保持同一性，还要叫资产阶级存在才能满足？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时代依赖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依赖资产阶级，可是过渡时期结束了，就不能依赖了。所以不能说同一性是无所不在，不能说同一性就都要有资产阶级。

革命胜利前叫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叫工人阶级。革命胜利前，无产阶级必须依赖资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可是革命胜利后，过渡时期有资产阶级，可是工人阶级就不叫无产阶级了。所以是不是叫无产阶级这件事不一定要依赖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可以叫无产阶级，也可以叫工人阶级，由无产阶级变为工人阶级并不是因为有资产阶级的缘故，只是因为受了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所以叫无产阶级，现在取消了压迫剥削，就叫工人阶级。所以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如果我们讲得灵活一些，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在革命转变的时候，阶级矛盾发展到要破裂的时候，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同一性。工人阶级要起来推翻资产阶级，就表现工人阶级不依赖资产阶级了。当然在进行斗争时两个阶级还在一起斗争，尽管在打仗，但还是同时存在于一个体系内，可是虽然在一定的体系内，这种爆发式的斗争已经表现了工人阶级可以不依赖资产阶级了，在事实上已经没有同一性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斗争性是主要的，从

现象上说，只有斗争性而没有同一性了。这是比较灵活一点的解释，我们可以这样看。

矛盾的转化问题更容易了。转化只有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石头不能转化为鸡，只有鸡蛋才能转化为鸡。鸡蛋转化为鸡也要有条件，你把鸡蛋放在水里煮一下，就不会转化为鸡了。

了解矛盾的转化对我们的实际工作有什么意义?

这个问题我讲课的时候也解释过一下。

实际意义就在这一点，就是我们在工作中要注意到事情会发展到反面去，要警惕事情会发展到反面去，比如胜利可以发展为失败，成功可以发展为失败，当然失败也可以变为胜利。

我们实际工作中往往有这种情况，好事情会变为坏事情，坏事情会变为好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就是因为好事情变为坏事情了。因为矛盾对立有这种转化的规律，因此我们就要注意运用这规律，使它能够帮助我们进步，为我们谋福利，要避免这规律危害我们的工作，要利用这规律使它有利于我们的工作，这就是实践的意义。

怎样能够避免这种规律危害我们的工作？怎样能够利用这种规律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就要抓住相对的这一点，抓住转化是有条件的。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就要经常注意到保持某些条件或者创造某些条件，使好事情不要转为坏事情，或者使坏事情在我们创造一定条件的结果变为好事情。因为好的工作想要作得太多，在这样的条件下，好事情也会变为坏事情，因此就要设法把这条件取消。成功的事情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变为失败，在骄傲的条件下可以变为失败，因此在胜利后就要立刻提出警告，要力戒骄傲。毛主席就是懂得辩证法，就是善于利用辩证法的规律，在 1945 年将要胜利时，七大提出要戒骄戒躁，因为胜利后骄傲就要失败，所

以特别提出，共产党要避免骄傲，避免急躁。骄傲与急躁是分不开的，那时还印了一些书，那时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描写李自成因胜利后骄傲而失败，解放区就把这本书普遍翻印叫干部学习，这种措施就是为了要造成好的条件，取消坏的条件，使我们的胜利不要变为失败。

对立的转化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我们的行动、工作总是曲折发展的。总要有一时期会转到反面去，有时反面是坏的，有时反面是必要的。革命前进到一定时期，有时要走弯路，要退一些，要绕圈子。比如打仗的进攻，进攻到一定时候就一定要整顿队伍，如果一直进攻下去就不一定能保持住胜利，所以进攻到一定程度时一定要适可而止。整顿队伍就是使进攻变为防御、前进变为停顿。这就是一个对立的转化，可是这转化是完全必要的，这里就表现了“否定之否定”的法则。否定之否定的法则不一定要取消，可能还要把它当做是重要的法则之一来学习，事实上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常常是必要的。进攻、休息；休息，又进攻。发展不是走直线，而是走螺旋式的圈子，不是写“一”字，而是写“之”字。

为什么发展一定要这样？因为发展是克服矛盾的过程，因此它就必须是很曲折的。如果我们革命的前面没有敌人，那么我们就可以走“一”字，走直线。但是革命前面总是有敌人，所以我们进攻一段后就必需停顿下来，补充和休整力量。不善于走曲折的道路就很危险，就会失败。急躁骄傲也是不懂得走“之”字路，胜利后还想胜利，不懂得胜利后还要暂时停一下，才能再争取一个胜利，不懂得这一点就会吃亏。

关于辩证法的问题就完了。

现在我们先把历史唯物论的问题解答了，然后再把临时提出

的辩证法方面的问题讲一下。

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

这里面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现在是否可以说生产关系是先进的、而生产力是落后的?

这里有一个争论，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在农村搞互助合作就是用先进的生产关系来推动落后的生产力，理由就是小农经济的生产力与小农经济的生产关系是适合的，所以搞劳动互助就等于生产关系走在生产力前面。当然也有反对的意见，认为我们搞劳动互助并不是生产关系走在生产力前面，而是使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

我想还是后面一种意见是对的。我们不好让生产关系走在生产力前面，生产关系的发展总是落后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的结果，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改变生产关系，使它适合于生产力。我们搞劳动互助，就是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并不是使它走在生产力前面。

生产关系不会走在生产力前面，也不可能走在生产力前面。如果生产关系走在生产力的前面，那么中间隔了一个空间，那么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就不起作用了。如果我们在革命胜利后还是小农经济，还是手工业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立刻组织苏联那样的大规模的集体农场，那就是生产关系走在生产力的前面，中间有一些空隙。这样是不会起好作用的。

生产关系不能走在生产力前面，如果要它勉强地走，那就会落空，就要垮台失败。我们有些同志想在农村建立集体农庄，以前有过这种尝试，都失败了。

生产关系只能适合于生产力，不能走在生产力前面。事实是

如此，走在前面就不起作用，就要落空，同时也没有哪一本经典著作这样讲：生产关系可以走在生产力的前面。只有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的说法，就是生产关系由不适合于生产力的情况变为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情况。

我们搞劳动互助也决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的情况，只能按照生产力发展的情况来搞。革命刚胜利，土改刚完成，刚推翻了地主以后，能不能立刻组织劳动互助？只有在土改完成了，农民过了一个年以后才行。立刻组织生产合作社是困难的，或者说是不可能的。

如果土地改革后不经过一个生产稍为恢复的时期，立刻就组织合作社，这就要失败。所以只能跟着生产力的发展来逐步提高互助合作运动的工作水平。

土地改革刚胜利时，小生产就适合于生产力的情况，因为农民以前根本没有土地，现在得到了土地，这对发展生产力就是一个很大的好处。所以就要暂时保持这种生产关系，然后再进一步组织互助合作运动。

互助合作运动决不能超过小农的生产力很远，集体农庄就是超过得很远。互助合作是小农经济稍微发展一点后就需要的，如果那时你不组织互助合作，那他们就会发展资本主义、发展富裕中农、发展富农，同时也就发展了贫农，就是要分化，或者是资本主义；或者是互助合作运动。所以说个体经济能够适合小农的生产力的情况是很暂时的。

我们现在能够在小农的经济基础上组织互助合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业是社会主义的。小农经济所以一定要组织互助合作运动，不仅是因为小农经济本身恢复的结果，而且是因为社会主义工业对农业提出了问题，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要

求。这个要求比资本主义向它提出的要求更高一些。

社会主义的工业需要农业快一点发展生产力，那么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就比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更好，组织合作社、集体农庄就比发展富农经济更好。富农经济也能够发展生产力，但是它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它的范围是很狭小的。只有组织互助合作运动才能很快地、大规模地发展农业的生产力，这是适合于工业所提出的要求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小农经济问题不能只看到农村，而要与城市联系起来，个体经济不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不适合于农业本身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不适合于整个国家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不适合于城市中社会主义工业的情况。城市里有社会主义的工业，而农村仍保持个体经济，这对国民经济是很不利的，所以不能离开城市孤立地看农村。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要求迅速地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而不是走到前面去。正是由于生产力的需要，迫切地要求组织互助合作运动。

我们看问题往往不知不觉地就有一点形而上学，孤立起来看问题了。

四、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

有人说，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似乎不全面，应该说成生产方式好一些，这种说法对不对？

这种说法就是想要反驳斯大林，不满意斯大林的说法，就是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理由就是说，经济基础应该是物质基础，因此就应该把生产力包括进去。

这个理由是不恰当的。经济基础就是讲经济制度的基础、物

质基础。可以说，生产力就是物质基础，生产力就是社会的最后的物质基础。社会能够生存的物质来源就是生产力。但我们讲的经济基础并不是简单的讲物质基础，经济基础是讲上层社会制度是直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社会上的政治以及思想的上层建筑是反映什么东西的，是由于什么东西直接决定的。这样提出问题就很明显，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绝不是直接反映生产力的，上层建筑的特点是由经济制度规定的，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规定的。美国的生产力尽管很高，有些地方比苏联的还高，但是它的上层建筑还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所以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直接依赖的基础，是上层建筑所要反映的东西。

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这里面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关于这一点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经济基础是和上层建筑相对而言的，有上层建筑才有经济基础。目前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因此就不能说中国现在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只能说它是一种经济成分；另一种意见是反对的，认为应该说有资本主义的基础存在。理由就是资本主义的数量还很大，资本主义占小农经济的百分之七十七，不能说它是一种残余，而是一种基础。

这两种意见我认为还是后一种的意见对。应该说，过渡时期资本主义是有它的基础的，资本主义在旧社会已经产生了它的基础，当然在旧社会这基础也是很薄弱的，特别是旧社会中小农经济是在封建剥削制度下的，不和资本主义联系，不属于资本主义范畴，而属于封建地主经济剥削的范畴。所以在旧社会中资本主义不占统治地位，是很薄弱的，但是它已经产生了。

解放后，我们并不是立刻消灭资本主义，因此资本主义基础就留在过渡时期，而且革命使农民在封建势力中解放出来，土改

后农民不与封建主义联系，而是和资本主义联系。所谓私有经济，就是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因此资本主义在解放后不是缩小了，而且还是暂时扩大了。

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当然在新中国没有完整的东西，没有正式成为上层建筑，它在旧社会里因为没有形成，也没有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在新中国也没有这个上层建筑，但是还有很多资本主义成分，资本主义思想，这种成分并不是势力很小的，思想影响也不是很小的，现在经过《红楼梦》研究的检查，才知道胡适的思想，即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还是很大的，甚至影响到共产党员。它还不是一种残余，而是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的。所差的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一样没有形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因为它的制度是残缺不全的、偷偷摸摸的，是在我们国家制度的空隙中偷偷摸摸存在的。

能不能用这种理由说，要有上层建筑才能有基础呢？能不能说上层建筑没有形成而基础也不存在呢？

这个理由我觉得不能成立。如果说这也算理由，那就是唯心论的理由，就是上层建筑决定基础，有上层建筑才有基础，没有上层建筑就没有基础，上层建筑创造基础。唯物论的原则不同意这理由，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上层建筑以前就可以有基础。如果不这样看，就是否认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原则。所以应该这样说：虽然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没有正式形成，但是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存在的。

有人认为把小农经济算作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是不大恰当的，应当说它是十字路口的经济。

这种说法有经典为根据，当然还是有理由的。农民是十字路口的阶级，这种说法并不错，我从来不否认这一点。问题就是对

这说法的解释。

我们说小农经济是十字路口的经济，这是说它可以向资本主义发展，也可以向社会主义发展。农民作为劳动者是倾向于工人阶级的，作为私有者它又可以和资本主义联系，所以它是十字路口的经济。这是讲小农经济发展的倾向与可能性的问题。

这样讲并没有讲到小农的经济特性是什么，它的这种特性是属于资本主义还是属于社会主义，而是讲它的发展趋势。它的发展趋势当然有两种可能性，而这两种可能性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过渡时期有两种基础。倘若我们国家没有社会主义经济而只有资本主义经济，它是否还在十字路口？在那种情况下，小农经济只有一条资本主义的趋势。正因为过渡时期有社会主义，所以它才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这并没有解决现在小农经济的性质是什么的问题。

如果讲现在小农经济的性质，就不能说小农经济又是社会主义的，又是资本主义的。只能说是半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社和没有组织起来的个体的单干小农经济。这种个体单干的小农经济是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为什么是资本主义范畴的呢？因为它的自发倾向是资本主义，你如果不去领导，不去教育，它就要向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它是私有制，是与资本主义联系的，它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

所以要分清问题的提法，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还有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前，我们解放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是不是也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

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解放区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另一种认为不能这样说，至多只能说是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萌芽或上层建筑的重要因素，而

不能说就是基础。

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我在这一点上不作最后结论。

我现在的看法是这样：我们革命没有胜利以前，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正在创造的过程，是由地方走向全国的过程。我们现在的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过去解放区的也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这里有一点区别，就是新中国没有建成以前，我们正在创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在创造的过程中我们对资本主义不主张消灭，相反地，资本主义也是随着我们的胜利而逐渐地占有更多的地位。那时我们革命的对象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还是民主革命，资本主义还没有成为我们消灭的对象，一般地还是保护资本主义，还没有开始着手改造和消灭资本主义。对农民也就是号召他们组织起来，但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大规模地来组织互助合作。现在就不同了，现在就是要反对资本主义，要消灭资本主义，要大规模地组织互助合作。所以我们过去叫新民主主义，现在也叫新民主主义，但这是革命的不同阶段。

过去新民主主义是正在创造的过程，现在这个过程完成了，所以就要向社会主义过渡。

过去在经济上也应该说是社会主义经济正在创造的过程，社会主义基础正在创造的过程。不能说没有，但也不能说已经建立起来了，因为那时全国的大工业很少，所以不能说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是正在创造这基础；也不能说没有，因为它逐渐在创造。

我们应该说有这个基础，因为过去在解放区我们国家的财政、经济制度的指导原则基本上也是利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财

政方针是发展生产、保证供给，就相当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保证社会物质文化的要求。但那时不能提得那么高，但是本质上是和社会主义经济一致的。

我们国家的财政、经济政策采取的这种方针就说明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存在的，因为如果没有基础就不可能有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就不可能采取这种方针，这种方针就是反映了有这基础，但这基础并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而是在创造的过程中。

全国胜利以后，我们掌握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掌握了大工业，建立了基础。但建立了基础又不等于建成，建立了基础就是掌握了经济命脉，基础基本上稳定了，但还没有建成。就是工业里还有资本主义，还没有普遍的是社会主义，农业里还是小农经济，最多是合作社、半社会主义的劳动互助，要建成社会主义，那就是要工业里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全民所有制统治一切；在农业里要使集体所有制统治一切，这才叫建成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是建立社会主义基础，但是没有建成。在全国胜利前说建立也不合适，只是有这种国家经济，这种国家经济是不稳固的，因为那时主要是搞军事、搞战争，而且是局部的，地方上也没有大工业，没有掌握经济命脉，所以也不巩固。

所以，应该承认：过去有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有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的因素；同样的，在思想上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指导的思想，是起决定作用的思想。我们不仅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胡适的思想、武训传的思想，就是在解放区时，我们也批判了。整风运动就是反对以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变我们的党、改变我们的政策。当时在解放区资产阶级还不是主要的，数量也小，而小生产者是主要的力量，所以当时反对的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全国解放后资产阶级思想就成为主要的东西了，所

以就要反对资产阶级思想。

另外还有些问题：资本主义的经济在共同纲领中的地位和在宪法中的地位有没有不同？

共同纲领中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没有提消灭资本主义，现在宪法里提的是消灭资本主义。那时只提节制资本，没有提消灭资本。

这问题我想应该这样了解：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因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有联盟的关系，同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又要加以限制改造，最终的目的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共同纲领里暂时不提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这并不是否认这目的，就是说，实质上没有使资产阶级的地位和现在有什么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那就是一个发展阶段的区别。在我们宪法没有出来以前，就已经对资产阶级起了改造的作用，问题就是那时还不提消灭的问题，因为那时条件不成熟，不需要在纲领中规定出来，但是在我们党的文件中早已指出来了，党的最高纲领里也指出来了。

现在的宪法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的，同时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共同纲领本身有些东西暂时不能提，宪法中就提到了。这只能说是一个发展的关系，资本主义的地位在宪法里有了新的发展，而不是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提法上当然有些不同，因为时间条件不同了，那时公开提出来不好，因为共同纲领是各党派的革命纲领，有些问题提出来资产阶级不能接受，或者就是表面接受了，心里也不高兴，提出来有很多妨碍，现在已经是时候了，所以就提出来了。

所以应该说：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但问题的提法有时间、条件的不同。

关于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的问题还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社会里的经济基础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构成的；另一种意见认为，除了统治的生产关系以外，其他的因素也应该是基础之一，理由是资本主义社会里地主经济虽然是旧的生产关系的残余，但是它已经有了变化，所以应该算作资本主义经济因素之一。

这问题应该怎样说呢?、我想应该这样说：除了过渡期以外，任何一个社会都应该有统治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应该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和。但怎样解释地主阶级的问题呢?

地主经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倘若已经变化了，这种地主经济就变成一种资本主义的地主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而不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残余。英国的土地所有制就是完全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残余，所以那一种资本主义的地主经济不能说是封建的残余,而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一种形式。那种地主也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地主,因为他收的地租相当于利润，而不是相当于封建地租。

我们已经讲过，一种生产关系往往包含几种所有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包含了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可以包含资本主义对工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对土地的资本主义所有制。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的的确确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没有改变，比如日本，有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又有封建土地的所有制，这种所有制的确是封建的。

这种情况是另外一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说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封建的生产关系共同组识成的基础，因为这两种生产关系虽然是两个时代，但它们都是剥削劳动人民的关系，所

以它们能够共存。虽然封建土地所有制不是残余，但是也能够和资本主义所有制结合，形成一种经济基础，就好像旧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共同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官僚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封建主义的所有制共同成为统治的生产关系，日本就是这样。

所以，一般地讲可以这样说，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构成的。

下面一个问题是：我国过渡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是否都是社会主义基础的一种因素？如果不是，又应该算作什么？

我认为两种都是过渡的，因为当前还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将来是要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

我想这个解答是对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是过渡的，它们是由资本主义基础转变为社会主义基础的过渡的生产关系，它过去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将来就是社会主义的基础，现在是向社会主义基础方向发展的，因此也可以说它们已有了社会主义的成分，它们的社会主义部分已经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因为它们已逐步地对于社会主义有了更多的贡献，最后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基础。

旧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一个基础还是两个基础？

刚才已经附带答复了。就是两种生产关系共同联合成为一个基础，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它不是过渡的，不是由封建过渡到官僚资本主义，也不是由官僚资本主义过渡到封建主义，而是共同形成的。

五、其他一些哲学问题

生产关系除了这三个方面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面？

恐怕没有其他的方面了，找不到其他的方面了。要找其他的方面就不是生产关系了。

生产关系的每一方面的各种因素是指什么？

这里所指的是很具体的，不是概括的。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因素，具体地研究就可以知道了。

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有两种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家的土地所有制、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小商品生产也可以归入这一范畴。这样说就是因素不止一个。这个问题原则地讲就对了。

生产力的两个要素与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有何关系？

生产力的两个要素统一起来成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统一起来成为生产关系。它们的关系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不能割裂开来看两个要素与三个方面发生什么关系，不能这样分。

生产的三个特征的内部联系是什么？

生产的第一个特征是说明生产是不断发展的。生产的第二个特征是说明生产不断发展的原因在哪里，内部的动力在哪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是生产不断发展的原因。生产的第三个特征是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如何推动生产的发展，这种矛盾所推动的生产的发展要经过怎样的过程，就是要经过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这就是它们的联系。

现在讲同志们刚才提出的两个问题。

由量变到质变，由旧质态到新质态的形式问题，如何理解？

形式有两种：爆发与逐渐的过渡。我们过渡时期的质态的转变是不是第二种形式？当然是第二种形式。我们过渡期就是采取逐渐过渡的形式实现量变的。

这里的问题就是有人觉得逐渐过渡怎么又是量变？

我们的解答应该这样说：逐渐过渡不能归结为量变。过渡时期是一个质变的时期，本质上应该这样说。因为量变，质变有原则的区别，量变的时期旧质不会逐渐消灭，新质不会逐渐产生，特别是旧质根本不消灭。

资本主义从产生到消灭整个是量变时期，这时期资本主义制度自始自终没有改变，或根本没有改变。不能说哪一时期资本主义性质有一点消灭，或者说自由竞争时代资本主义多一些、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少一些。

但是过渡时期就不同，旧质一天天地少，新质一天天地多，这一点与量变有根本的区别。从这一区别上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肯定：过渡时期是质变的时期。不能把它归结为量变，但也不能否认过渡时期有量变的因素，有量变的一方面，但这不是本质的方面，不是主要的方面。

我们要注意一点，量变的过程常常也包含着质变的因素，同时质变也一定包含量的因素，不过在量变时质是根本没有改变的，在质变的时候，量的因素也是不显著的，即使是质变也有量变的因素。

水加热到一百度就变成气，这是质的迅速变化，这一转变关头同时包含着量变的因素。一百度的水变为一百度的气虽然温度表没有变化，但是形式的转变就需要消耗热量，水在一百度时如果不增加热量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变成气的，要使它变成气还需要吸收相当的热量。所以这一转变关头是质变，但是这里潜伏着一

种量的因素。水结冰、冰变水也是一样，温度表不变，但形态变化时就要吸收热量。

所以过渡时期也可以这样看，它是质变时期，但是也有量变的因素，但是量变不是主要的、本质的，主要的本质的是质变。

因此，过渡时期完成时是否还要爆发这个问题也没有了，过渡时期的完成就是质变完成了，不需要什么爆发。

我们还要注意一点，斯大林把质变归结为爆发和逐渐过渡的形式，不能因此就误认为世界上的变化只有这两种形式。因为斯大林是处理一个争论的问题："是不是什么东西都要爆发呢?"斯大林否认了这一点，而认为现实生活还有逐渐的过渡。实际上质变除了逐渐过渡与爆发外，还有一种迅速的变化，不是爆发，也不是逐渐地过渡。水变为气不能说是爆发，因为水没有阶级的统治，用不着推翻一个统治阶级。但能不能说是逐渐过渡?也不是。它是由逐渐的过渡来实现这迅速的变化的。

逐渐过渡是爆发以外的迅速变化的一种，爆发以外的突变的一种。这一种的特点就是时间比较长，比一般的飞跃所需要的时间长一些。就是说变化有爆发的与非爆发的，非爆发的有时期比较长的逐渐过渡，有时间很短的，一下子就变了的。这样看才能概括质变的各种形式，否则就会片面。

我们要注意：逐渐的过渡也不是很长时期的变化，逐渐过渡从某一方面看起来还是迅速的变化。从人类历史上说，十几年、二十年间就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很快的变化。由猿猴变人也是逐渐的过渡，但比起生物的历史来，那么由猿到人就仅仅等于一天 24 小时的一秒钟，所以它又是飞跃。

爆发的形式是否决定于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

爆发的形式决定于两个条件：首先一个条件是社会分裂为两

个敌对阶级，互相对抗的阶级分裂成为敌对的营垒，没有任何联合的可能，这是决定爆发的一个最主要的条件；然后才是政权在谁的手里，斯大林的语言学主要是讲的这一点。土地改革是我们革命前一阶段末了的任务的结束，所以应该说是爆发的，同时就是在我们胜利后，政权在我们手里，地主阶级还是和我们敌对的，所以土改是一种爆发形式。

能不能说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或是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对资产阶级在我国的地位应如何理解？

人民民主专政是对反动派的专政，资产阶级如果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反革命，就要对它专政；如果资产阶级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对它就不是采取镇压、专政的办法。这问题不能简单化，不能用剥削阶级的专政简单地类比无产阶级的专政。因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国家，一方面是人民的国家，资产阶级分子只要走向人民方面，就可以给他们人民的地位，就可以不剥夺他的政治权利，而给以合法的权利；但是资产阶级中有坚决的反抗分子那就要镇压。所以人民民主专政要具体化，不能公式化。

斯大林的宪法报告中最后有一段可以研究一下。他说，是不是要剥夺以前那些白党、资产阶级、甚至地主的一切一切？斯大林肯定地告诉我们，宪法不需要剥夺他们的选举权，甚至被选举权也不剥夺。因为从前我们剥夺他们的选举权是因为他们反抗社会主义。

列宁早在 1919 年写文章说道：我们总有一天能够使我们的公民权利能够普遍于人民，哪怕他以前曾经是资产阶级。

我们工人阶级的政权与剥削阶级的政权有严格的不同，剥削阶级对某些人要终生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而我们就不同，只要

不反抗我们，我们还可以给他公民权。所以不能简单化地看这问题，一定要把人民政权与剥削阶级的政权分开，人民政权是要走向国家消灭的道路，是带有过渡性的，它不是要把敌对的阶级永远打在地狱里的。

关于矛盾的同一性究竟是不是绝对的？

这个问题好像有人还不甘心我的讲法，认为资产阶级消灭后，工人阶级固然还是工人阶级，但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不存在了，这又应怎样解释？

这个意思好像是说：资产阶级消灭了，矛盾消灭了，也就无所谓对立的统一了。

资产阶级消灭了，无产阶级还存在，这是说，对立的统一性是有条件的，无产阶级并不永远依赖于资产阶级，没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能存在。事实完全证明了这条真理，你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矛盾不存在了，但是对立的一方面可以独立地存在。矛盾不存在正是说明对立的统一没有了，但是对立的一方面还是可以独立存在的，这就是说，对立的统一性不是绝对的，是有条件的。

工厂中的劳动组织应该怎样看？是属于生产力还是属于生产关系？

劳动组织首先是生产力的组织，同时这种组织又必然带有生产关系的特点，它是二重性的。它首先是生产力的组织，因为劳动组织是体现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是对自然界发生关系进行斗争的，但是任何一个社会的劳动组织都不可免地带有生产关系的特点，这特点完全是由不同的社会来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组织就是带有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社会主义的劳动组织就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同志合作的关系，没有任何强迫。

所以，劳动组织本身的性质是生产力，又因为不同的社会带有不同的生产关系，同样的劳动组织可以有不同的生产关系的特点。工厂的组织在资本主义也是这样，在社会主义也是这样，这就说明劳动组织本身不是生产关系，可以为不同的社会服务，但是它在不同的社会里就被赋予不同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组织是被统治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组织是自觉的互助合作。

工厂的行政机构恐怕不能说是上层建筑，那还是一种生产关系。为什么不是上层建筑？说是上层建筑，就是说它是一种政治力量，工厂的行政不是一种政治的统治，而是一种生产的组织，它是一种保证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这个问题也可能有争论，还可以讨论。

新陈代谢——旧的被新的所代替，这是一种转化，这种转化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

由旧到新是一种转化，这种转化也是对立的主要的方面的转化，这种转化还是有条件的，新的东西不是没有任何条件就可以转化的，新的东西有不可战胜的性质，就是说它有最后胜利的性质，所以新的战胜旧的这是有条件的。但是，旧的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战胜新的，使新的不能生长。不过，旧的战胜新的是暂时的、局部的，但是，尽管是局部的、暂时的，它还能够战胜新的，有时新的已经得到胜利，但是又失败了。

转化是有条件的，条件本身也要具体地看，有些东西条件少一点，有些多一点，这就要具体地分析。

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原理的讲授*

(1954.12、1955.1)

第一次讲课

(1954.12.29)

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讲我们分成三个问题来讲。

一、什么是经济基础;

二、什么是上层建筑;

三、社会主义社会和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

现在就讲第一个问题中的一个小问题——社会性质和面貌是直接由生产关系规定的。

这样一个原则好像跟我们以前讲的有些矛盾,以前斯大林说:生产是决定社会性质的物质生活条件,现在又说直接决定社会面貌的是生产关系。

---

* 这是艾思奇在1954年12月29日、1955年1月5日、8日,给马列学院一部二班的讲课速记稿,共讲三次。他在1954年10月29、30日给马列学院三部和二部十至十四班也讲过"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两个讲稿相比,所讲的原理和观点大致相同,而这个稿子讲得更系统、更展开一些。所以,我们选用了这个稿子。1956年9月,艾思奇又讲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那个讲稿讲得比较简明,所以,也收入本书。

这两个说法是不是有矛盾呢？

当然没有矛盾。我们以前讲的是一般的讲话。一般说什么决定社会性质和面貌，我们就笼统地说是生产。现在更具体地分析一下，究竟在生产当中对社会面貌和性质起更直接的决定作用的是什么呢？

生产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两个方面哪个方面对社会面貌和性质起决定作用呢？

回答就是生产关系。因为这是很清楚的，生产力发展不会立刻就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甚至于可以说生产力发展到相当的程度，往往不会引起社会性质的改变；可是，如果生产关系改变了，社会性质就要改变。比如美国的生产力很高，个别经济部门的生产甚至于比苏联还高。比如钢铁的生产，苏联每年是三千万吨，美国的力量如果充分发动起来，每年可以生产一万万吨。美国生产力虽然高，但是并不是社会主义，苏联生产力低一些，却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以，这样一个具体例子就说明了生产力不能直接决定社会面貌，生产力只有引起生产关系改变之后，然后才能自觉地规定社会性质和面貌。

所以，直接决定社会性质面貌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

这就是第一个小问题的基本思想。

这个原则对我们了解经济基础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讲清楚这个原则。

这个原则说明了许多问题，说明了许多平常好像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从前我们学习历史唯物论时，经常有人问：为什么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还先胜利了？为什么美国、英国这些工业先进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还不能够胜利？如果生产

是决定社会性质面貌的物质生活条件，那么，按照道理生产发展的国家应该早一点革命胜利，但是，事实上为什么不是这样呢？

差不多凡是学习历史唯物论的人都会提出这个问题。不仅我们一般学习这个问题的人要提出来这个问题，而且在政治斗争上也曾经提出来这个问题。在过去，列宁、斯大林提出在帝国主义时代，一个国家的革命能够得到胜利。提出这个原则的时候，有一些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领袖人物就反对这种意见，特别反对列宁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能够胜利的观点。孟什维克、社会民主党都反对列宁这种思想。列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帝国主义时代，是可以在帝国主义薄弱的环节得到胜利的，不一定要生产力很发展的国家，像俄国这样的国家，革命可以胜利。社会民主党反对这种意见的理由，就是说俄国生产力不高，工业少，工人阶级数量少。他们认为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就一定要工业很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要占绝对多数，这样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得到胜利。

这种思想是一种什么思想呢？

这种思想就是主张生产力可以直接决定社会面貌的思想。这种思想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因为俄国革命是胜利了。

实践为什么证明它是错误的呢？实践是理论的检验，实践是真理的试金石。既然在实践上证明了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是错误的，那么也就可以说在理论上他们也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认为生产力发展，可以直接决定社会性质和面貌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因为实际生活证明，生产力发展并不能够直接决定社会面貌，因为俄国的生产力没有英、美那样高，但是俄国革命还是先胜利了。

在我们中国从前也有这种错误思想。这个问题在中国也解决了。在 1930 年前后，托洛茨基派反对我们时，也就提出了这种类似的错误理由。我们主张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是，托

洛茨基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已经没有封建制度了。这种思想得到胡适同意，胡适认为中国早没有封建社会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胡扯呢？这就是同一种错误理由，就是生产力决定社会面貌这样一个理由。他们有这样一种谬论，他们说：轮船代表资本主义，帆船代表封建社会。他们说：我们长江里已经有轮船了，已经不只是帆船了。因为有了轮船，就证明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这种思想不仅是把生产力当做决定社会面貌的条件，甚至于更片面地认为工具就能够直接决定社会面貌，这当然是错误的。旧中国虽然有一些机器轮船，但这些轮船总是统治在帝国主义手里，而且这个轮船还不是生产工具，即便是生产工具，那也不能够决定中国社会的面貌。

中国的社会面貌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过去是由剥削的关系决定的，农村里的地主阶级怎么样剥削农民，这种关系才是决定社会面貌的最直接的条件。中国的广大农村，是地主用封建剥削方式来剥削农民的一种农村，封建剥削在中国广大农村里占绝对优势。那么，有没有资本主义剥削？有一点，在大城市周围有一些接近资本主义剥削的形式。最大范围的农村里是封建剥削。所以，我们根据这一点，根据剥削关系、生产关系的性质，来规定旧中国的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所谓半殖民地就是我们也有一点资本主义经济。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是依赖帝国主义的，完全依赖于帝国主义或者直接就是帝国主义的经济，或者是多多少少主要依赖帝国主义。

所以，历史上的许多事实，一个是俄国革命的问题，一个是中国过去争论的问题，都证明生产力并不是直接规定社会面貌、社会性质的物质条件。对社会性质、社会面貌起直接规定作用的是生产关系。

关于托洛茨基派的争论，我们将来出去做教员的时候最好不要讲，因为这种问题早已经过去了。像这种思想普遍去讲是不值得的。因为我们是马列学院，我们才在这里讲一下，在一般社会上教学生，我们就不要这样讲。

认识了生产关系是直接决定社会性质、面貌的条件这个原则后，我们还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到过去有些错误思想为什么不对。比如，过去有一个“科工救国论”，要发展科学、工业来救国，认为不需要政治斗争，避免政治斗争。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也要这样做，他们叫做振兴实业。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西方没有机会来剥削中国，没有很多力量来压迫中国，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那个时候，有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就认为中国发展工业就有希望，因此，就有一派人主张可以单纯依靠发展工业、发展科学来救中国。

这种思想也有它积极的成果，就是有一批人学习了自然科学。到现在，我们新中国也有一些自然科学专家留到现在，我们国家能够接收一批有用的人材。但是，这只是一个附带的结果，他们主要的目的没有达到。这些人主要希望学习科学来救国的目的没有达到。因为生产关系妨碍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不允许发展工业，所以虽然学习了科学、工业，但也没有用处。所以，几十年以前学习科学、工业的一些自然科学家，在国民党统治下一点用处也没有，像翁文灏这样的人就做官去了，有一些人就作了教员，编一些教科书，没有什么更大的用处。一直到全国解放了，这些人的头发白了，这些人才有用处了。

所以，这种思想的错误就是由于不懂得生产力不能够直接决定社会面貌。当然这些人没有学习社会科学，不像社会民主党那样，用一套伪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根

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得生产关系、生产力的问题，只是盲目地认为科学、工业可以救国，结果就这样做了。

在苏联，斯大林所批判的雅罗申柯的错误也有一点接近这种情况。他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关系不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这种思想也就是接近于把生产力和社会性质、社会面貌直接联系起来的错误。

现在就可以进一步讲经济基础的问题了。

一、什么是经济基础？

马克思早已经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确定了这个问题。大家还可以在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后一段中，看到这个问题。斯大林说：经济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

为什么不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总和，不是生产力的总和，而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呢？

这个道理很清楚，就是因为生产关系才能够直接决定社会面貌。所以，上层建筑的性质——政治法律、文艺、哲学和宗教这些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直接建立在生产关系之上，是直接由生产关系的性质来规定的。所以，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成为社会经济基础。

生产力是一般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就没有一定的社会形态，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生产力本身不直接规定社会性质和面貌，生产力都会影响到使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然后才能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变化。生产力是社会的更广大的物质地盘；但是，一种社会直接建立的基础，直接所依靠的基础是生产关系。这就好像我们的房子是要在地球上建立起来，要在一块很大的土地上建立；可是房子直接建立在某一地基上。土地虽然是

房子的物质基础；但是不能在任意一块土地上盖房子，只有在加以整顿过的土地上，就是能适合造房的地基上，才能把房子盖起来。房子是依靠地基的，不是依靠一般的土地。没有土地就没有房子，但是有了土地不一定就有房子，土地要有基础，然后才能够盖房子。所以社会经济基础只是生产关系的总和。

所谓生产关系的总和是什么意思呢？

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指当前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我们大家听了奥斯特洛维疆诺夫作的报告，他解答这个问题说：该社会里面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属于这个阶段、属于这个时期社会里所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生产关系分为三个方面。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已经规定得很清楚。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关系本身的基础。每一种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面，有一个地方斯大林答复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人问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基础是什么？问这个问题的人同时作了一个答复，他说：所谓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是不是就是经济外的强制的剥削关系？斯大林说不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封建所有制。这个意思也就说明一种生产关系它本身的基础就是这种生产资料的所有制。

生产关系有三个方面，其中最根本的东西，作为基础的东西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这是一个方面。

（二）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各个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叫做“互相交换自己的活动”，就是相互关系的意思。这种关系在阶级社会里很清楚，就是阶级关系，大体上说来就是

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产生的，就是社会集团里面生产中的地位。

（三）就是以前两项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

也就是说产品分配形式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各个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决定的。

每一种生产关系都有这三个方面。

生产关系的总和应该怎么了解呢？

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争论，这个争论点，就是所谓生产关系的总和是不是就是指这三个方面的总和，或者除了这三个方面的总和之外，还有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有的人主张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比如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它的基础，就是封建生产关系和半殖民地的依赖于帝国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这就是说，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那么，另外一个意见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三个方面的总和，不是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个问题是有些争论的。

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因为都有一点理由，说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同一个时期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也有道理。因为中国就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它的基础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不能够说它有两种基础，这个基础是由两种类似的性质的生产关系总和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有理由，就是所谓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三个方面的总和。这个意思就是说旧中国的基础一方面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基础，一方面是半殖民地的基础，有两个基础，每一个基础有三个方面。争论就在这里。

对于过渡时期也有所争论。过渡时期的基础，如果说是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就可以说是五种经济合成一个基础；如果不赞成是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是生产关系三个方面的总和，那么

也可以解释成为过渡时期有几个基础，或者叫做几个正在变化中的基础。

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慢慢地研究，不需要很快地解决，如果想用一两句话来解决，那也是空的。

对于这个问题这样说是可以的。就是说，我们的基础是社会发展当前阶段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当然包括生产关系的三个方面，当然是三个方面的总和。问题就是当前阶段如果有几种生产关系，那么是一种基础还是几种基础呢？

照我的看法，对于这个问题要稍微灵活一点来看。生产关系的总和首先要包含三个方面，因为不管哪个生产关系都有三个方面，首先就是三个方面的总和。至于如果同时有几种生产关系，是不是能构成一个基础，就要看情况。比如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个基础就可以说是一个基础，因为旧中国的那些地主阶级一般也就是官僚资本家，封建的地主剥削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结合成为一个东西。封建的和半殖民地的生产关系，虽然是两个生产关系，但是构成一个基础，构成了统治一切的基础。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也就可以说是两种生产关系结合起来，也是两种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能够说它是两种基础，而是同一个政权，同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里面，包含封建的半殖民地的生产关系，包含地主阶级的剥削，包含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当然也包含帝国主义的剥削。

但是，如果讲过渡时期的问题就不同了。比如今天这个过渡时期，就不能够说是资本主义基础和社会主义基础结合成为一个基础。

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我们是要消灭的，社会主义我们是要建立的。所以，在过渡时期只能够说是资本主义基础在消灭，社

会主义基础在建成的过程中。

所谓过渡时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础正在变化，社会主义基础正在建立，正在逐渐完成。社会主义基础已经有了，但是资本主义基础正在消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够说是两种生产关系总和成为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应该看得灵活一点，要看具体情况来分析。总的原则就是一个：基础就是社会发展当前阶段生产关系的总和，代表当前阶段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至于怎么样总和法，就要具体分析。

所以，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就不要争论，知道一个总的原则就够了。至于具体问题就要进行具体研究。总的原则不能够太具体，只能够这样来看。所以，对这个问题可以不争论。

生产关系这样一种总和，就是社会经济基础，也就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经济制度，或者叫做社会经济结构。

这里面有许多名词问题要研究一下。

生产关系的总和也就是社会经济形态。

社会经济形态这个名词有两种用法：有的时候这是指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指经济基础，因为基础就代表了社会经济形态；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名词是讲整个社会所包含的基础和上层建筑。这种情况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里是常有的。

对必要劳动这个名词，就有两种用法：一种用法是指生产出来一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日，生产一种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日，这是商品生产所必要的劳动；还有一个用法就是劳动者为了把他自己的生活资料生产出来所需要的劳动，就是剩余劳动之外的必要劳动。

社会经济基础，又可以叫做社会经济形态，又可以叫做一定

社会的经济结构或者叫做经济制度。这些名词都可以通用。

关于基础的意思，所谓生产关系总和的意思，大体上就是这样。

每一种社会经济基础，都是代表整个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关系的总和。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一种社会里面除了代表这个阶段的生产关系外，还可以有过去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残余，也还可以有将来社会的新的生产关系的因素。这些旧生产关系的残余以及将来社会的新生产关系的因素，虽然在当前社会里已经存在，但是不能够代表当前这个阶段的社会性质，不能够代表社会发展这个阶段的经济性质，所以，这些生产关系就不算作基础构成的部分。构成每一个社会经济基础的，除开了旧生产关系的残余、新生产关系的萌芽，仅仅限于当前整个阶段有代表性的这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或者也可以说是当前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比如说，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所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生产关系就构成旧中国的经济基础。那么，是不是旧中国除此而外再没有别的生产关系呢？当然不是。旧中国除了封建的生产关系，除了依靠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外，还有其他的生产关系，旧中国也有奴隶制度，也有接近于原始公社的制度——家长制。这种制度在少数民族里面有。旧中国也有民族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尽管是依赖于帝国主义，可是它跟官僚资本主义不同。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在旧中国并不构成为基础。

为什么没有构成基础呢？资产阶级始终没有真正的代表在蒋介石的政权中占有地位。蒋介石的政权有时候要拉一两个人来作

点缀，开一个参议会可以拉一两个投降的民族资产阶级进去；但是，拉进去之后，也没有任何地位。可是在我们新中国资产阶级代表还有一定的地位，给予一定的权力，比如傅作义、章乃器有相当的办事权力。当然大事情的决定不能由他做主，而是工人阶级领导。在旧政权里面，资产阶级代表要做一个部长也是不行的，真正有权力的职位是没有的。蒋介石如果不需要利用资产阶级的时候，就根本没有它。没有它去参加上层建筑，它也不成为基础。所以，这个资本主义基础在旧中国没有地位，也还没有形成。

所以，每一个社会基础，只能够是这个社会里面占统治地位的，或者说得更恰当点，是代表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是代表旧中国的一个生产关系。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代表旧中国的那个阶段，奴隶制度也不能够代表，所以不能够成为基础。

过渡时期的问题比较复杂，下面再专门讲。

现在我们讲经济基础的作用。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里面讲到基础的作用问题。他说：经济基础是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这个提法是很重要的。

斯大林讲基础是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这是一个总的原则，是包括一切社会来讲的，从阶级社会到没有阶级的社会，都有经济基础，它的经济基础都为这个社会服务。

所谓为社会服务，在阶级社会里面跟没有阶级的社会里面，是有不同的意义。应该注意到一点，就是在阶级社会里所谓为社会服务，实际上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不可能是为社会上一切人类服务。这一点我觉得是应该着重了解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可以说经济基础是为全社会一切人类共同服务的。比如原始公社的

经济基础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部落、氏族内部的成员互助的关系，平均主义的分配形式。这种基础就在当时社会里能够为社会一切人员服务。

怎么样为社会一切人员服务呢？

就是这种基础能够保证原始公社那么低的生产力的情况下，维持公社人员的生存，并且使得公社能够发展。原始公社的生产力那么低，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活是很艰难的，要能够维持那样艰难的生活，还要保证能够发展，就是依靠原始公社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依靠这些生产关系，依靠生产资料公有制，成员互助的关系以及平均主义的分配。有这些关系存在，尽管公社的生产力很低，但是公社能够存在，能够发展。倘若没有这种生产关系，我们设想原始公社有了私有制，有了剥削，那么公社就要被破坏，公社的生活就不能维持。如果有了私有制，比如生产所得归劳动者自己所有，仅仅是这样，那么公社里面有的人强一点，他可以得到食物，有的人弱一点就得不到食物。强的人可以生存下去，弱一点的人就生存不下去。只要有了私有制，只要这种分配不是大体上平均主义的，那么公社的生活就很难维持。这是用不着解释就可以想像到的。比如欧洲人到美洲去剥削了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就几乎灭种。

这就是原始公社的经济基础。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是能够保证公社全体人员的生存和发展，是为社会全体服务的。

但是，阶级社会里的情况就不同了。阶级社会里的经济基础，剥削的生产关系就不能够一视同仁地为社会一切成员服务，不可能是这样。阶级社会里的经济基础，一般可以说，都用剥削劳动群众的方法，来保证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种经济基础，不这样为社会服务也不行。比如，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就只能够是以剥

削农民的方法，来为地主阶级服务，为保证地主的地租剥削制度服务。能不能也为农民服务呢？那就不可能。因为这种生产关系的性质就不是为农民服务的。1. 生产资料是地主所有；2. 人的关系是地主占统治地位，农民是被统治的；3. 分配的形式是地主不劳而获，农民劳动出的果实要交给地主。这种生产关系的本身，就是一种剥削劳动者的关系，就是一种保证地主阶级得到剥削的关系。这种作用也就是阶级社会里面的经济基础，经济法则。不过这种说法也可能有些大胆，但是按照现在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经济基本法则的看法来看，就是这样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就是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作用。

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资产阶级最大限度的剥削利益，用剥削最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的办法，用奴役剥削他国人民，以及用旨在保证最大利润的战争，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的利益。这个法则本身就表明了这个生产关系是用这些方法，用剥削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的方法，来为资产阶级谋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这个法则就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作用，表明了这个经济基础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为社会的统治者服务的。

在奥斯特洛维疆诺夫上课的时候，有人问他封建制度的经济法则，他回答说：这个问题还在讨论。现在新写的教科书里不知道有没有，大体上还是按照封建基础的作用来规定的。也就是说，封建经济的基本法则，就是用剥削农民，用经济外强制的办法剥削农民，来保证地主阶级的地租收入。封建的生产关系就有这种作用。

所以，经济基础的基本作用，也就是经济法则。

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像原始公社就不是为哪个阶级服务，而

是为全社会服务，方法就是用劳动者中间互助的办法，用平均主义分配的方法，使得劳动者能够生存、能够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作用，又跟阶级社会不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作用，已经表明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里。社会主义这种经济基础，这种生产关系就能使我们这个社会，用高度的技术装备来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为社会服务的方法。它服务的对象是全体人民，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它的方法是用高度技术装备起来的生产，是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用这种方法来为社会服务。

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作用，跟原始公社不同。原始公社终究是原始共产主义经济，所以它就不能像社会主义那样有高度的技术。原始公社只能够依靠很低的生产力，来维持、来保证公社全体成员在很艰难的生活条件下，还能够维持生存，还能够继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有相当高的生产力的经济，所以它的作用也就不同。

每一种社会的经济基础都有它自己特定的作用。这种作用也就是生产关系的作用。经济基础也就是生产关系，因为它是生产关系的总和。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能够使我们用高度技术来装备我们的生产，也就说明我们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能够推动很高的生产力发展。

我们要认识到各种经济基础，各种生产关系都有自己为社会服务的方法和目的，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目的。认清这一点有很大的政治上的重要性。

有什么重要性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一点反驳那种否认社会需要根本改革，认

为可以经过改良主义的方法就能够改造社会的错误思想。改良主义主张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那么我们根据刚才讲的那些理论原则就可以指出它是根本错误的。

为什么说是根本错误的呢?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只能够为资产阶级服务，它不能够为全社会的人服务。因此，要希望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希望没有斗争，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只能够为资本主义服务。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意思，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以为工人阶级为劳动者服务。改良主义的错误就是不懂得一种生产关系只有一种服务的作用。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只能够为统治阶级服务。这种生产关系如果不改变，就根本不可能在经济上为劳动人民谋真正的利益。

苏联在1928年前后，布哈林主张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消灭富农，认为富农经济可以适应城市社会主义工业的生产；可是实际上怎么样呢？实际上富农经济存在一天，它就要起一天破坏作用，它把粮食藏起来。这就是因为私有财产在富农手里，他就进行投机活动，使得城市工业受到很大的困难，使得物价发生波动。

我们现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倘若我们不实行统购统销的办法，如果允许资本主义市场在主要物资方面能够自由活动，倘若不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斗争，不排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么我们想一想能不能有今天这样很稳定的局面呢？粮食问题稍微紧张一点，投机商人一投机，物价一波动，我们的生活就要乱了。所以，我们懂得资本主义不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个道理，我们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就立刻实行了计划收购、计划供应，把资本主义捏住使它不能动，给它一个严重的打击，然后我们才能顺利

前进。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如果允许资本主义自由活动，它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呢？会不会投机商人听了我们的命令就不投机了呢？如果不采取各种办法，它一定不会听我们的话。

正因为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只能够有一定的服务作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只能够为资产阶级服务，不能够为社会主义为工人阶级服务，因此就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只能够采取根本改变旧制度的方法。

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思想基础，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根本变革，他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我们说，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实际上就是根本不能改良，或者说是不能得到真正的改良。因为在旧制度里无论有什么“好心”，想要使工人、农民生活好一点，无论你要怎么样做得“好”，但是旧社会存在，工人农民的生活就不会好。因为旧制度只为剥削阶级服务，而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方法，就是剥削劳动人民这样一种情况下劳动人民的生活当然不会好。

因此，我们一定要把经济基础是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这个概念弄清楚，而服务的方法、目的在各种社会又是不同的。这种区别在政治上有很大的意义，在实践上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弄清楚了这个原则，就会认清我们过去没有认清的许多问题。我们自己可以想一想，每一个人过去可能还有一些糊涂问题，或者了解不深刻的问题，我们把这个原则弄清楚之后，就可能解决很多问题。

关于经济基础的问题就讲这些。

二、什么是上层建筑？

什么是上层建筑呢？

简单来说，社会上层建筑，就是直接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

基础之上并和这个基础相适应的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不单纯是经济结构，社会上有经济结构，有社会结构，有文化结构。这些结构包括什么东西呢？就包括社会里面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和哲学观点等。在斯大林的著作里面没有讲道德，但是道德也可以包含在内，道德和法律是接近的，可以归并到法律之内。除了这些观点之外，还有与这些观点相适合的制度。几乎每一种观点都有它的制度，比如政治观点有政治制度；我们的革命，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就有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法律有司法制度；宗教观点有各种宗教仪式、宗教组织；艺术也有艺术的制度，像艺术团体、艺术队伍、艺术的创作制度，而这些是整个社会的制度。哲学观点是一个总的东西，是贯串各种观点的一种最根本的观点。这就是上层建筑的内容。

上层建筑是怎么产生的呢？

上层建筑就是跟着基础的产生而产生，也跟着基础的消灭而消灭。有什么基础就有什么上层建筑。那么，一种东西、一种社会现象如果不是跟着基础的产生而产生、消灭而消灭，那么，这种社会现象就不是上层建筑。

语言就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不跟着基础的产生而产生、消灭而消灭，所以语言就不是上层建筑。自然科学也是这样，自然科学就是不会完全适应一个时候的基础。政治法律是可以完全跟着基础的产生而产生、消灭而消灭，但是，自然科学就不是这样。两千年以前的自然科学的知识现在还是可以用。

所以，社会意识、社会思想不一定都是上层建筑，人的思想意识不一定都是上层建筑或者不一定都成为上层建筑。如果不跟着上层建筑的产生而产生、消灭而消灭，这种意识也不一定是上层建筑。

除此之外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上层建筑产生的过程说明，有些东西虽然是上层建筑，但在它的基础没有产生的时候，它也不能够成为上层建筑。比如，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已经有了，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不是上层建筑呢？那当然不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的一种思想意识，是资本主义社会里面，资本主义矛盾所产生的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又比如，跟马克思主义相适应的一些政治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了，如共产党、革命的工会，这些适应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种政治制度，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些制度都不能够成为上层建筑。

那么，它们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将来新社会的上层建筑的准备条件，新上层建筑的准备因素。

上层建筑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在它没有产生以前，它要有许多条件在旧社会里准备起来。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些条件。

所以，上层建筑的性质跟着基础的产生而产生、消灭而消灭。这种性质告诉我们要批判过去的一些混乱的观点，就是认为除了经济基础之外，一切东西都可以叫做上层建筑。

不是一切经济基础之外的社会结构，都叫做上层建筑，特别不是一切思想意识都是上层建筑。其中有两种东西：一种根本不是上层建筑，像语言、自然科学知识，根本不是上层建筑；另一种东西可以成为上层建筑，但是还要等基础形成之后才成为上层建筑。因为它随着基础的产生而产生，有了基础它就可以叫做上层建筑，没有基础就不能成为上层建筑。

所以，对社会现象，对思想意识我们要根据原则作具体分析。

这种具体分析的方针、方向，可以说是有了斯大林的著作之后，我们才明确起来的。斯大林的语言学问题没有出来以前，那就是混乱的，对上层建筑这个概念包含什么东西，以前是混乱不清的。有了这个著作之后，对上层建筑才弄清楚了，我们的研究才能够达到比较高的科学水平。

科学就是要能够具体分析，能够把问题分析清楚，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什么就不是什么，对基础与上层建筑要加以区别，各种社会特点，特殊规律能够具体加以掌握，这是科学研究的任务。

关于上层建筑的产生、发展就是这样了解。

现在就讲上层建筑的作用。

基础有作用，上层建筑也有作用。这种作用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里面也讲到了。他讲经济基础的作用的时候，同时就讲到上层建筑的作用。

上层建筑怎么样发挥它的作用呢？

斯大林说：上层建筑是用它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和哲学观点来为社会服务。基础是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上层建筑是用自己的观点来为社会服务，并且为社会创造出来适应于自己观点的各种政治、法律制度。这就是上层建筑的作用。

对这种作用也是应该作具体分析的，根据不同的社会作不同的分析。阶级社会里上层建筑的作用跟没有阶级的社会里的上层建筑的作用是不同的。没有阶级的社会里的上层建筑是用各种观点、各种制度来为社会服务，为全体成员服务；有阶级的社会里的上层建筑，就要用它自己的观点、制度，来帮助自己阶级的剥削和生产关系的巩固，帮助自己的生产关系形成起来，并且为统治阶级服务。在阶级社会里上层建筑的作用是这样的。

原始公社有它的上层建筑。这种上层建筑包含原始社会的一

些宗教观点、艺术观点，包含原始公社的氏族制度，比如“图腾制”，是血统组织，就是部落、氏族是以共同血统的人组成的。共同血统的人有一种图作为标志，表明出鸟氏族、熊氏族，用一种他们崇拜的动物作为共同血统的标志。这些制度有一种迷信的宗教观点，使得全体成员感到这种氏族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氏族的一些制度，规则是不可侵犯的，这就巩固了原始的成员互助的相互关系，巩固了个人牺牲自己来为全体的精神，使得原始公社的人能够在最艰难的条件下来共同奋斗，共同对自然界来进行斗争。所以，它就能为社会全体成员服务。

在阶级社会里面，任何一个阶级的上层建筑一定都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同时，社会思想意识形态，一定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形态，适合这种思想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制度，一定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所以，这种上层建筑只能够为剥削阶级统治阶级服务，而且剥削阶级也就需要这种制度来为它服务。

一个社会产生一种上层建筑，并不是凭空的、没有什么必要就产生的。基础是需要上层建筑帮助的，所以才产生上层建筑。我们人为什么要认识世界呢？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世界，我们就不能行动。基础为什么产生上层建筑呢？为什么产生一定的观点呢？因为要有一定的观点来影响全体社会成员，然后才能够使全体成员共同来维持这个基础。阶级社会里面，它的经济基础一定要产生一种剥削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要使这种观点在全社会里尽可能普遍起来，使人相信这种观点，然后这个制度才能巩固。

阶级社会是一种敌对的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是敌对的，要想使这种制度巩固起来，就要设法使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不要破裂。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这个制度就不能维持。

所以，这种旧制度首先产生一定的观点，把这种剥削制度合

理化，使得社会上不仅仅是剥削者，甚至于被剥削者也认为这种制度是合理的，也认为这种制度是永远存在的。这样一来才能够巩固这个制度。

除了观点之外，还要加上一些政治法律制度，用政治法律制度这种力量来保证，用暴力来保证制度的巩固。所以，一方面用政治法律制度来巩固基础，一方面在思想意识上来使这个制度合理化。这样做才能使得基础巩固，才能够发展。

所以，上层建筑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因为基础需要它才产生的。

因此，每一种上层建筑都是为基础服务的，都是为基础所代表的统治阶级服务的。上层建筑的作用，就是有巩固基础、帮助基础形成的作用，在阶级社会里，也就是帮助剥削制度的巩固和形成。

这种作用就告诉我们，思想斗争、政治斗争为什么是必要的，为什么各个阶级在思想上、政治上应该划清界限，为什么自由主义是不对的，想要抹煞各个阶级的思想界限是不行的。

有许多机会主义者散布机会主义的一种方法，就是混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各种观点，就是弄清在思想上、政治上划不清界限，从哲学起一直到政治到各种制度，差不多可以说所有的机会主义，都免不了要从哲学开始进行它的混淆工作。在欧洲，在外国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这本书的任务，就是反对当时党内那些要混淆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的那种机会主义的企图。欧洲的社会民主党认为哲学是可以随便的，从考茨基起一直到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者，认为可以用新康德主义来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俄国有经验批判论，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卢那察尔斯基这些人，在世界观上

不仅不能够划清界限，相反的用资产阶级观点来代替无产阶级观点。

我们中国也有这种情况，比如陈独秀在最初就不懂得跟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陈独秀跟胡适最初共同来进行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有这种观点，所谓世界上有两大潮流就是实用主义和辩证法，所以这两大潮流就应该建立统一战线。陈独秀在很早的时候就有这种糊涂观点。在这个问题上，胡适比陈独秀的阶级立场明确些，胡适反对陈独秀这个意见，胡适说，实用主义跟辩证法不能够建立统一战线，两者是根本不相容的。倒是资产阶级比机会主义者的警惕性更高一些。

我们中国一直到现在，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没有作过系统的批判，这是文化界很大的一个缺点。一直到现在，《红楼梦》的批判还没有很有力的哲学上的批判文章，就是孙定国同志写了一篇比较长、比较细致的批判，除此之外，在这些文章里面最弱的就是哲学的文章，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应该补救，应该纠正这个缺点。当然，批判旧思想最难的就是哲学上的批判，因为是最复杂的东西，这方面比较弱，这也是反映了实际情况。

上层建筑对各阶级决不是一视同仁的。如果资产阶级还懂得坚持它的阶级的党派性，像胡适懂得实用主义的党派性，和辩证法划清界限；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还不和它划清界限，这是可耻的事情，也是一种投降主义。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一视同仁，而我们反而要想一视同仁这是错误的。

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也要注意马克思主义各种观点的党派性，我们的思想决不能够对各阶级一视同仁，要跟资产阶级划清界限，绝不能够混淆。

除了哲学之外，各方面都是一样，我们的文学界最大的糊涂

观点，就是认为文学在阶级观点这方面可以更自由一些。我们文学界的人，出身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人很多，因此观点很模糊，在俞平伯的问题上跟着他走。这些都说明不懂得上层建筑的作用，所以发生这个问题。

反对把上层建筑看做是对各阶级一视同仁，也就是反对客观主义。客观主义就是轻视上层建筑的党派性、战斗性，不划清阶级界限。

关于上层建筑的作用就讲这些。

现在再讲一个问题，就是每一种社会的上层建筑是指哪些东西？

每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是指这个社会发展阶段里面跟当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各种观点和制度，或者是跟当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各种观点和制度。所以，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上层建筑就不成为上层建筑。旧社会它的经济基础被消灭之后，它的上层建筑的某些因素可能还遗留到新社会里。那么，这种旧上层建筑残余本身就不能够成为上层建筑，而只是旧上层建筑的残余。

我们现在的社会里还有封建思想的残余，官僚资本主义思想的残余，甚至封建制度、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在全国胜利之后也还有残余；但是，这些思想、制度，就不成为我们这个社会里的上层建筑，根本不能够成为上层建筑，它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了，已经停止了它作为上层建筑的资格。

当然在少数民族里是另外一个问题。在西藏封建基础存在，封建的上层建筑也存在，这是少数民族的特殊问题。在我们新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还保留着封建的基础和上层建筑。除了这个特殊问题外，我们新中国就不存在封建的上层建筑，不存在官僚资本

主义的上层建筑，只存在这些上层建筑的一些残余因素。所以，旧社会的上层建筑残余，在新社会里就不能够成为上层建筑。

另一方面，将来新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些思想观点，在当时社会里也不是上层建筑。比如马克思主义思想、共产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是上层建筑，这些东西只是上层建筑的一些因素。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情况可能就不同了。所以，对历史要作具体的研究。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在封建末期，已经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产生，有时还占很大的势力，影响了政治，而且产生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许多理论思想、理论观点。法国革命以前，在法国已经产生了相当有力量的一种资本主义基础，同时也产生了资本主义的一套新的思想意识，有许多资产阶级制度也产生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新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在旧社会里产生了。因为它已经有了基础，所以已经开始产生上层建筑了，这当然不是完备的。封建社会建立的新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不是完全的，但是已经产生了。

社会主义就不同，社会主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都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思想、共产党是一种新社会上层建筑的因素。

一种新的上层建筑要形成起来，必须要经过一定的过程。经过什么过程呢？就是能够成为上层建筑的一些观点、制度，也就是新社会的思想、新社会的意识，要能够在旧社会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来推翻旧的基础，形成新基础，然后它才能够成为上层建筑。新的观点和制度、新的社会思想在旧社会里并不就成为上层建筑，要成为上层建筑就必须做几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要跟旧思想旧制度进行斗争；第二，在这种斗争中间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来推翻旧制度，来推翻旧基础，来创造新的基础，那么完成

这个事情之后，新的政治观点、政治制度才能够成为上层建筑。新的思想、新的制度是需要做这些工作才能使自己成为上层建筑。

所以，在革命运动中间常常免不了要有文化、思想方面的斗争，作为革命运动的准备。在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前，在共产党成立以前先有“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新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跟封建思想进行斗争，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准备开展革命的运动。准备消灭旧基础，建立新基础的革命运动一定要等到文化斗争变成了政治斗争，再经过政治斗争把政权改变了，然后新的上层建筑才形成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来说，完全是这样。这就是上层建筑形成的具体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也就说明文化斗争、思想斗争不仅仅是对革命以前是重要的，革命胜利之后要继续巩固革命成果，还要不断地进行这种上层建筑方面的斗争。在我们新中国，思想斗争的目的，是要肃清旧的上层建筑的影响，肃清旧的上层建筑的残余。

现在再讲上层建筑和基础的关系问题。

上层建筑总是和基础发生直接的联系，不跟生产发生直接的联系。这也是斯大林所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理。上层建筑的变化首先不能够由生产来直接决定，生产发展了，但是上层建筑不一定变化。美国的生产力很高，但是上层建筑没有变化。所以，生产发展不能够直接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生产的发展只能够是通过生产关系的改变，通过基础的改变然后才使上层建筑发生变化，反过来说，上层建筑要影响生产，也是要通过生产关系，也是依靠生产关系。一种新的上层建筑出现之后，上层建筑就可以影响生产的发展。但是，这种影响如果不通过生产关系也是不行的。资产阶级国家要来影响资本主义生产，只能够通过资产阶级，只能够依靠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府再怎么样了不起，政府的领袖

不能够任意决定生产的问题，他只能够通过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要他怎么样发展生产，他就只能够怎么样发展生产。

罗马尼亚人民议会主席——格罗查，出身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家庭，是罗马尼亚数一数二的大银行家、大工厂主，又是大地主。他在革命以前就是罗马尼亚资产阶级政府里面很重要的部长。他当来当去觉得罗马尼亚总是依靠帝国主义，所有这些国家的生产都被帝国主义拿去了。他对这种情况不满，希望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生产，不要依靠帝国主义。他看不惯罗马尼亚国王向外国讨好的情况；可是他这个思想不能够起作用。结果只好不做部长，就在家里看书，看来看去把马克思主义看懂了。当时有人说他发疯了，但他一直看了两年的书就把自己的土地给了农民，组织了农民党，银行、工厂也都不要了。过了几年就完全参加了革命，到以后做了主席。这时才把自己的力量真正使用出来了。在过去他做部长的时候就不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在过去他的思想也不起上层建筑的作用，不能够成为上层建筑。

在旧中国有很多好心的工程师很想发展中国的生产力，结果生产关系又不允许，还是发展不了。尽管翁文灏可以做行政院长，但是他的科学还是起不了作用。

在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同了，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直接组织生产，可以直接计划生产，五年计划就是直接考虑生产力的问题。

但是也要注意，我们的国家绝不是完全撇开生产关系，只要生产力。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我们国家人民的政权，还是通过生产关系的改变来发展生产的。为什么斯大林反对雅罗申柯呢？就是因为雅罗申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只有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国家只有组织生产的任务，没有注意生产关系改变的任务，国家只要组织生产力就可以了，不

用去管生产关系。斯大林对这种思想给了严厉的批判。

这种糊涂思想在中国会不会有呢?

会有的，很容易有这种错误思想，因为我们国家正在计划生产，国家的五年计划中绝大部分是发展生产的计划；但是，如果认为我们国家只要生产力，只是完全直接在组织生产力。如果这样看就是错误的。我们的计划不仅仅是发展生产的计划，同时也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农业、手工业，发展合作化的计划，发展生产跟改变生产关系的计划是结合的。而且毛主席说：总路线的实质就是改变生产关系，这是很重要的。要记住发展生产跟改变生产关系是分不开的。

不改变生产关系能不能发展生产?不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不改造小农和手工业，能不能顺利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一定不能。

不实行统购统销能不能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呢?不能够。如果不通过生产关系的改变，不实行计划收购，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要受到很大的阻碍。

所以，不要认为因为我们国家在搞五年计划，就说我们国家撇开生产关系只是在直接组织生产。如果忘记了我们国家也是通过生产关系的改变来组织生产，那就会犯错误。

在苏联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了，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还要批判单纯组织生产的观点。在中国还有资本主义，还有小农的情况下，我们就更要注意发展生产，是不能不通过生产关系的改变来实现的。不改变生产关系要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可能的。同时没有社会主义工业化作物质基础，我们就很难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小农，因为没有社会主义工业化，我们就没有力量来代替资本主义工商业，没有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因为组织农民最后需

要拖拉机。

所以，总路线的主体和两翼是密切结合的，是不能分开的。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上层建筑的作用是通过基础来实现的。我们要推动生产的发展，就一定要照顾到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关系的发展。

在这里面还有这样一个规律特别值得注意。因为生产关系总是落后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总是比生产力慢一些。所以，如果不注意对生产关系的改变，那么我们就会在一定的时候，感到生产力的发展要受到很大的障碍。所以经常要注意生产关系是不是落后了，就要注意加以改进，改变了生产关系，生产力就能得到发展。

我们的国家现在就有这样的好处，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常注意到生产关系是不是落后了，一发现生产关系落后的情况，立刻就采取政策、措施，改变生产关系，使它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使得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不至于对立起来。

在我们总路线、五年计划公布之后，实行了五年计划之后，如果不及时实行统购统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会对立，就会市场混乱，资产阶级发财，社会主义工业难以进行。当然我们实行这个政策之后也会有对立，因为要消灭一部分资本主义工商业，但是，这个对立不严重。倘若我们不主动这样做，等到混乱的时候，这时的对立就很大，就会变成很大的冲突。

所以，上层建筑不是跟生产直接联系的这个原则，对我们的实际工作是很重要的。

现在再讲一下上层建筑的特殊问题。

上层建筑包含各个方面，首先包含各种观点和制度这两大部分，而各种观点又包含一些复杂的内容，就是包含宗教、艺术、道

德、政治、法律观点、哲学观点，而每一种观点都有它的特殊性，对这些特殊性都要加以分析研究，不能够一律看待，不能够说每种上层建筑的特点是一样的，说它的发展规律都是一样的，事实上是各有不同的规律，每一种上层建筑都有它自己的规律，都需要研究。

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要把各种上层建筑的特点弄清楚，不然就不能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政治观点，怎么样对待宗教，怎么样对待法律、艺术，对待这些不同的上层建筑应该采取什么政策、什么行动，这就需要我们把各种上层建筑的特殊性、特殊规律弄清楚，然后才有可能正确地决定各种政策。各种政策都要适应各种上层建筑的特殊性。

现在我们就应该把每一种上层建筑具体地研究一下。

首先要讲政治法律观点和政治制度这个上层建筑。

政治法律观点和政治制度，这是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一手创造成的政治上的统治工具。所以，政治法律观点和政治制度这种上层建筑的内容比较简单一点，比较单纯一点。统治阶级完全为了适合自己的政治统治的需要，创造出了这些政治法律观点、政治制度。

所以，政治法律观点和制度有这样一个特点：它差不多百分之百地跟着基础的产生而产生，跟着基础的消灭而消灭，完全跟着一个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的建立而建立起来。这个统治阶级垮台了，那么这一套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都要垮台。“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是这个意思。特别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对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就要百分之百地完全打碎。在阶级社会里，资产阶级得到统治地位之后，还要利用一下封建的政治制度，这是因为剥削阶级有共同点，它可以用一些旧的统治观点

和制度，资产阶级的观点、制度里面，可以利用一些封建的东西。英国资产阶级一直到现在，还保存了一套封建贵族制度。

但是，社会主义建立起来，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就要完全打碎旧的制度。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对旧政权里的东西就完全打碎。在思想改造运动里，感到最困难的，就是对旧的政治法律工作人员的改造，这些人从前辛辛苦苦地背“六法全书”，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点也不要这些东西，而旧的政治法律人员就留恋这些东西，希望保存几条，但是我们就是一点都不要。在旧社会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六法全书”这些装门面的东西。但是，在新中国，我们就可以把它彻头彻尾地取消掉。所以，旧的政治法律工作人员，在思想改造运动里，思想上的反抗相当大。反抗的理由之一，就是共产党没有一套政治法律，旧社会有一套，所以应该暂时利用那一套。一直到最近，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罗隆基还说：国民党有法无天，共产党有天无法。他说：国民党的法律好，但是没有很好地执行，没有青天老爷；共产党有青天老爷，有毛主席，但是没有很好的法律，下面一些人就乱搞。有的人不敢这样说，他就说共产党有法律，但是不完全，应该用上几条“六法全书”里的东西。

这些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旧的统治的东西我们要完全打碎，一点也不能保留，这是政治法律和其他上层建筑不同的特点。

第二次讲课

(1955.1.5)

上一次关于上层建筑这一部分的最后一点讲了一个问题，就

是关于上层建筑的特殊性问题还没讲完，今天继续讲下去。

上层建筑特殊性问题里面所包含的东西，以后讲到思想意识问题的时候还要讲到，所以现在只是简单地讲一下。

上一次讲到政治法律观点和政治制度，我们已经说过这种上层建筑的特点就是直接由统治阶级一手创造出来的一种统治工具。所以，政治法律这种上层建筑可以说是百分之百地跟着基础的产生而产生，消灭而消灭。我们建立新社会之后，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之后，要把旧的政治法律制度彻底打碎，丝毫也不能有所遗留，这是它的特点。

其次我们就要讲到宗教问题。

宗教当然是上层建筑。每一种社会中的宗教，它所包含的观点以及和宗教观点相联系的宗教制度，都是被统治阶级所利用的上层建筑。每一个社会的宗教，都是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

但是，宗教的产生，跟政治法律观点和政治制度不同。宗教不简单是由统治阶级一手创造出来。宗教的产生跟被统治阶级，跟劳动人民的生活情况有密切联系的。统治阶级固然是利用了宗教，但是，另一方面，劳动群众——被统治阶级自己本身的生活情况，也是宗教产生的一个原因，甚至于可以说，是一个不可少的条件，也是带有根本性的一个条件。宗教并不是统治阶级要想把它创造出来，就创造出来的，统治阶级只能够利用劳动群众中间已经产生了的这种宗教迷信思想，来适合于它的统治。

劳动人民生活当中产生的宗教条件是什么呢？

这个条件就是文化落后、生活贫困，对自然界以及周围环境的压迫，感觉没有办法，有了这种绝望的情绪，于是就产生了宗教。宗教产生的原因大体上就是这样。

从原始公社时代起，人类对自然界以及社会环境里面的某些

事情，感觉没有办法，就产生了一种迷信的解释，就把自己的希望、办法、寄托到超乎人的力量——神的力量上去，梦想神的力量，梦想天国。

所以，马克思说：宗教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对周围环境的不满，同时又是人民的一种叹息。没有办法了就叹一口气，没有办法了，就幻想天国，幻想神的力量，幻想超乎人的力量之上的“伟大的神的力量”，希望这种力量能够来拯救自己，挽救自己，能够帮助自己克服困难。我们中国老百姓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叫天，叫观音菩萨。

结果，宗教就起到这样的作用：就是使人感觉到自己无力，感觉自己斗争是绝望的，在这种情况下来用一些神话、迷信的理由，来安慰自己，使自己在精神上得到一种安慰。所以，宗教不能鼓舞人的斗争，而使人在精神上解除斗争的积极性，使人觉得没有办法进行斗争，感到不斗争也就算了，不满意也就算了，反正有神的力量来拯救，反正有来世，反正有神来照顾。这样现实斗争的积极性就会消失掉。

所以，马克思说：宗教又是人民的鸦片。人民自己要吃这个鸦片，因为在文化落后、生活困难，又感觉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人民就用精神上的鸦片来安慰自己，来使自己得到镇静，认为自己今生已经绝望，就只好自己麻醉自己。

所以，宗教是人民生活困难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一种对现实生活感到绝望的反映。

这种思想本来是人民生活中间自己产生的，但是却适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统治阶级就能够利用宗教，来麻痹人民的斗争积极性，在精神上来解除人民斗争的武装。所以在剥削阶级统治的时代，每一个阶级都要抓住一种宗教，利用宗教来统治人民。

每一种社会里的宗教内容，都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统治情况。社会生活内容怎么样，那么精神生活、宗教生活里面的内容，也是怎么样。一个宗教制度的内容，大体上跟社会生活、物质生活各种制度的内容是一样的。

比如，我们中国过去的封建社会，有皇帝的统治，皇帝周围有帮助皇帝进行统治的将军、宰相等一群统治的人物，现实生活是如此；因此，中国宗教里面的内容，宗教里面的天国制度，也是跟地上的制度一样，天国里有玉皇大帝、四大金刚，也是一套天国里面的封建制度，地下有和尚，天上就有如来佛，这是完全适合的。

又比如，在封建时代，欧洲基督教的制度也是封建制度。基督教的内部组织就是按照封建制度来组织的，现在的天主教还是封建制度的残余。天主教跟新的基督教不同，天主教的制度完全是封建的，像罗马教皇是最高的统治者，下面一套制度就完全是封建的。上帝所需要的制度，跟人类社会生活里面的制度一样，这实际上是人创造出来的。统治阶级就利用这一套宗教制度，向人民宣传说：天国就是这样的制度，那么人间也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制度。

所以，不能够否认宗教也是上层建筑。

但是，宗教产生的原因、产生的条件是有它自己的特点的，它跟政治法律不同。所以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要消灭旧的宗教，就不能像对待政治法律制度那样，干脆把它全部打碎。建立新的制度之后，建立了新的经济基础之后，宗教中的某些旧观点可以很快取消，可以废除某些宗教观点，可以把宗教内容、宗教制度加以改变，但是不能够很快地消灭宗教，就是宗教制度的改变也是有限的。

我们现在是新中国，对相信宗教的民族，我们还不能够立刻消灭它的宗教。但是对宗教活动的范围，对宗教的许多认识，就要在进步分子中进行宣传，使他们逐渐改变。对新中国来说，首先要使宗教跟爱国主义结合起来，要反对宗教依附于帝国主义，像这些观点我们可以建立起来，但是不能够很快地把旧的观点完全克服掉，更不能很快地把一套宗教制度完全取消。

这个原因就是宗教并不是统治阶级一手创造出来的。宗教的产生跟人民的生活有很大的联系，人民的生活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以前，他就不感觉到应该消灭宗教。因此这时要想消灭宗教，就会脱离群众。在人民没有感觉宗教应该被消灭以前，我们不能够勉强来消灭它。

我们的政治领导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宗教固然不合理，宗教应该被消灭，但更重要的是不应该脱离群众。有了宗教，人民觉悟的提高就要受妨碍，有了宗教，革命工作是有些困难；但是如果反对宗教反得太急，就会脱离群众，那么革命就更困难。在阶级斗争中，政治团结是第一，所以对宗教问题的解决，应该服从于政治。所以对宗教的处理一定要谨慎。对宗教的改革，对宗教观点的斗争，应该坚持在不妨碍联系群众的原则下，才能进行对宗教的斗争。

所以，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一定要提出信仰宗教自由，允许人民信仰宗教，而不是直接从思想上消灭宗教；相反的，思想方面还要承认信仰宗教的自由。我们对宗教的任务，主要是从宗教根源上、宗教的物质基础上去消灭。一方面承认信仰宗教自由，另一方面要在人民中间做许多工作，首先是提高生活，提高政治觉悟，提高文化。生活问题完全解决了，政治觉悟提高了，文化提高了，宗教就不需要了。人民觉得不需要宗教了，宗教就可

以被消灭了。

这就是宗教的特点，也就是我们依照宗教的特点，来规定出的对待宗教的政策。这个政策就不像对待政治法律那样，很快地、彻底地把旧的政治法律制度都打碎，又从我们手里建立一套新的政治法律制度。

经验批判论者，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宣传要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我们的信仰，要把无产阶级当做神来看。这种宗教观点，有一个时候连高尔基都相信。列宁说我们不相信上帝和神。但高尔基说，无产阶级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列宁说无产阶级不是神，无产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到以后，在这个问题上，高尔基作了检讨。

我们在批判胡适时，发现他也是这样。胡适一方面宣传按照科学的基础来树立自然主义的人生观，这好像是唯物主义的，要否认上帝的存在。可是他说：这是值得我们信仰的一种人生观，我们现在信这种人生观，要跟中世纪的人相信基督教一样。把唯物论当做宗教，结果他就不是唯物论了。因为唯物论是一种客观真理，不是仅仅信仰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信仰，信仰的是真正的客观真理，所以它就不是什么宗教。我们需要的是唯物论，不是什么宗教，我们提倡的是一种科学的真理，使我们的思想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就不能仅仅在主观上相信这种思想。

我们对于宗教，不能像对待政治法律制度那样一下就打碎。消灭宗教不能够仅仅从思想意识方面直接消灭它，不能够就上层建筑消灭上层建筑，而应该首先消灭产生宗教的物质生活条件，消灭人民生活困难、文化落后以及在对自然界和社会斗争中的绝望情绪。

我们对宗教的观点、政策都要按照这个原则，否则我们就会

犯错误，就会使党、使无产阶级孤立起来。尤其是因为我们是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如果不按照这个原则正确地对待宗教，就会使得各民族不团结，使宗教变成为民族主义的工具，那就很不好了。我们不要使宗教的对立，引起了民族的对立，不要使这个对立被剥削阶级所利用，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党在某些地方也犯了这个错误，在新疆、青海犯了这个错误，反宗教反得太急了，结果使得少数民族对我们不满。当然这些错误都及时改正了。

现在就讲哲学的问题。

哲学观点也是一种上层建筑。每一种社会的统治阶级都有它自己的哲学观点来为本阶级服务。

哲学是什么东西呢？

哲学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是某一个阶级对整个世界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就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

每一个阶级都按照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要求，来对世界有一定的看法。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一般来讲，它一定是用唯心论作为世界观，一定要把精神看做第一位，物质看做第二位，精神支配物质，这种观点就符合统治的利益，因为只有根据这种观点，它才能够主张少数有知识的剥削者应该统治没有知识的进行劳动的一切劳动者。这种唯心论的世界观反映了剥削阶级的人，来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情形。所以，任何一个时代的剥削者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它一定用唯心论作为世界观，一定反对唯物论。

有没有哪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是用唯物论作为上层建筑呢？

基本上是没有的。除非是社会正处在动荡的情况下，除非是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裂，有一部分统治者有了进步倾向。这一

部分有进步倾向的统治者才会提出唯物论的思想。

一般地讲，一个剥削阶级比较稳定地占住统治地位的时候，一定要反对唯物论，一定要坚持唯心论。所以，过去的时代虽然也有唯物论，但是它占优势，占支配地位的时间很少。因为每一个时代的统治者总是占优势的剥削阶级，剥削阶级中间掌握政权的、最有势力的总是唯心论。唯物论者总是不得志的一派。主要的剥削阶级总是主张唯心论，这是一个一定的规律，这是哲学的特点。

哲学跟政治法律制度不同，它不是用政治法律制度来为统治者服务。不是依靠政治法律制度来巩固某种基础，也不是依靠宗教迷信，而是利用世界观来为当前的制度辩护，用这种世界观来说明当前的制度是合理的。

唯心论的哲学跟宗教是有关系的，但它不单单是宗教。因为宗教仅仅是一些迷信、神话，是麻醉人民的；但是，哲学还要讲一套理论，讲一套关于世界的一种看法。哲学是理论的东西，是用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论知识来帮助巩固现在的社会秩序，巩固当前的基础，这是哲学的一种特点。

哲学思想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哲学思想的产生首先是有它的阶级基础，一定的阶级要求一定的哲学世界观。

其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产生一种哲学世界观，必须要对当前的人类知识进行概括。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的总的认识，所以要树立一种哲学世界观，就一定要把人类知识当前所达到的水平，当前所达到的各种成就，统统加以概括总结。

每一个时代大一些的哲学家、每一个时代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就可以说是集中知识的最高峰。不管是唯心论或是唯物论，只要是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相当大的哲学家，他总是能够了解当前的

各种学问，至少是能大部分地了解。如果一个讲哲学的人对当前各方面的知识不能有所了解，那他这个哲学就不能站住脚，至少不能够成为代表这个时代最大的哲学家。

辩证唯物论就不同一些，研究辩证唯物论的人，一定要成为各方面的专家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科学，哲学是到了科学发展到高峰的时候才产生的，这个时候科学已经分门别类，每一门科学都是很专门的了，所以这时研究科学的人要样样精通是不行的。比如领导革命的人可以成为哲学家，但要他精通自然科学是不可能的。

过去的人类知识并不是很高的时候，科学不发展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哲学家大体上都集中了当前的全部知识。可以说，一个哲学家就是当时的百科全书。我们中国从孔子一直到清朝中叶的王阳明，都是当时知识最多的人。孔子就是博学多才，但是他还不满足，还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的思想是旧的，但是他努力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永远是乐观的，废寝忘食，甚至连自己老了也不知道了。这种精神在过去来说，是了不起的。孔子的学问在当时是很多的，所谓是集大成者。

黑格尔的著作在当时叫做百科全书。事实上就是把当时所知道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尽可能地概括到哲学著作里了。恩格斯说：黑格尔的哲学是唯心论的，但是如果钻进去之后就会看到有很丰富的知识。能够利用当时人类所有的一切科学知识来建立自己的体系。所以，他整个著作的体系是唯心论的；但是他把科学知识在不少地方相当正确地总结了。

所以，任何一个时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都是当时人类知识最高的总结，是继人类各种成就之大成。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能产生很有力量的哲学。哲学如果不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就不能够

使一个时代的人信服，不能使所有有学问的人佩服。

但是现在就不同了。毛主席的哲学最好，但是到了自然科学上也说他都懂，那就不对了。现在的知识太广，跟过去就不同。过去一个时代的代表者的知识总是最丰富的。有的时候一个文学家，往往也就是哲学家、思想家，在他的文学作品里也是集大成的。司马迁的《史记》，一方面是历史的，另一方面是基本上把大事情都总结了一下。因为他是统治阶级的学者，真正的阶级内容他不能那么完全地反映出来，但是在统治阶级这方面所需要的东西他是总结了。

我们中国过去的学者的知识是很丰富的。顾炎武说：一字不识，儒者之耻。这句话在现在就不能普遍运用，现在的儒者要什么都知道，那就做不到。

这是哲学的特点。这个特点就使我们看出来哲学这个上层建筑，是随着基础的产生而产生、消灭而消灭。这主要是指它的体系、它的基本观点，不一定是指全部具体的内容、材料。所以，推翻旧哲学、批判旧哲学的时候，可以把它的体系、观点完全打倒，但是它所依赖的许多知识往往还是有价值的，在我们以后的哲学还是可以继承的。所以，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之后，把它核心内容还是挽救出来了。黑格尔这个辩证法，不一定是很好的，但它是合理知识的总结，所以它有相当合理的内容。

所以，对哲学的批判就不能像对政治法律那样把它全部粉碎，而是把观点、体系粉碎之后，还要接收一些合理的内容，这样才能使新的哲学超过旧的哲学。比如马赫主义的体系是不对的，它所依靠的知识也没有多少可以接收的。特别是它的哲学本身更没有什么东西，既没有唯物论，也没有辩证法，所以它的哲学是完全要不得的；但是，在物理学上它还有贡献。

如果说黑格尔的哲学还有继承的东西，那么在哲学方面马赫主义一点也没有价值。

我们说胡适是要不得的，但我们并不否认胡适在“五四”运动时有一点好处，对他的某些成绩也不否认。而问题是根本观点是错误的，对这种腐朽的哲学本身要根本打碎。

这是我们对待哲学的态度。

现在讲艺术这个上层建筑。

艺术的特点就是用一种艺术的形象，用生动的典型来为社会服务，来为一定的阶级服务。艺术包括文学、戏剧、雕刻、绘画。每一种艺术都是利用一种艺术形象、一种典型来为社会、为阶级服务。

为什么一种艺术形象、生动的典型能够为社会或是为阶级服务呢？

因为这种形象、这种典型可以生动地表现出一定的阶级观点，就是最简单的绘画、雕刻都可以表现出这一点。比如封建社会的用具上面都画“寿”字，在清朝的时候就画鹿这些东西，而我们现在就比较随便了。所以，它是适合一定的阶级观点。再复杂一些的艺术表现得就更明显了。统治阶级的绘画总是把统治阶级画得像神一样。比如我们中国的旧画里面就画一两个老头子在那里游山玩水，这无非是把地主阶级画得跟神一样，把地主阶级显得更清高一些。

戏剧、小说表现得就更明显了。在旧的戏剧里，总是把统治阶级写成英雄人物。所以改造旧戏就比较麻烦。在旧戏里，皇帝、宰相穿得总要漂亮些，老百姓穿得总是不好。因为孙悟空要闹天宫，就把他弄成为妖魔。过去这个戏叫做“安天会”，现在我们叫做“闹天宫”。我们说孙悟空是英雄，不是什么妖魔。

所以，统治阶级总是利用艺术形象，生动的典型来表现统治阶级的观点，来为一定的阶级、一定的社会服务。这是艺术的特点。

艺术除了它这个特点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现实性特点。

艺术的内容是需要有生动的形象、生动的典型，不能够像哲学那样，用抽象的理论来表现统治阶级的观点；也不能像政治法律一样，就只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来制定一套法规，而是要用艺术形象、生动的典型来表现统治阶级的观点。所以，要创造出很优秀的作品，这个作家就必须要深刻地体验生活，要能够对生活情况了解得很具体，认识得很具体，能够把社会生活中间的各种具体形象、各种典型人物，像活的一样表现到艺术作品里面来。

凡是好的作品总是生动的，典型总是活的，看了之后使人不会忘记，如果看过《红楼梦》，看了之后对里面的人物的印象很深，看了之后，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好像天天感觉这些人在自己周围一样，特别是贾宝玉、林黛玉这些人。

哲学就做不到这点。哲学要讲一个人，只是抽象地讲几句，究竟是一个什么形象就不清楚了。

中国的艺术作品中，像《红楼梦》那样能够把人物写得那么深刻、生动的还是少有，《水浒传》可以跟它比，除了《水浒传》之外，就很难再找到更好的。所以，好作品对人的影响很大，它表现的观点对人的印象特别深刻。作品里面所歌颂的人，我们读了作品之后也要去歌颂他；作者所要痛恨的人，我们看了作品之后也要在心里长久地痛恨他。

曹操这个人就是因为有了《三国演义》，才一直被中国人痛恨。其实这个人在历史上还是很伟大的人物，他的能力比诸葛亮还高

一些；但是，因为有了《三国演义》，诸葛亮成为第一位的人物，而曹操成了倒数第一个人。这就是因为《三国演义》的观点，是旧的正统观点，因为曹操是推翻了汉朝的统治，他是汉朝的一个臣子，可是他把皇帝消灭了，虽然他自己没有做皇帝。刘备继承了汉朝的传统。孔明要想恢复汉朝的传统。当然孔明这种没有私心，为了一个理想，为了自己的目标至死不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牺牲精神是很高的，但思想是错误的、要恢复那种已经末落的传统，这种思想方向还是错误的，因为它是不可能被恢复的，封建统治到一定的时候就要垮台。但他还要努力恢复，这个方向就是反动的；但是个人牺牲的精神，为人算是正派的，这方面是可以承认的。

汉朝的传统要垮了，曹操就促进他垮，这没有什么违背历史规律的地方，他自己也没有做皇帝。他所统治的那一部分在当时说来是最好的，生产也发展了。曹操这个人在各方面都合格，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能照顾。这样一个人因为一篇小说就变成了一个被人痛恨的人，被人痛恨的就像秦桧一样。而曹操跟秦桧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在旧戏里面都是白脸。所以《三国演义》是为旧的正统观念服务的。

所以，艺术作品的好坏，就是依靠它用来表现它的观点所刻画的形象、典型，是不是很生动。讲到艺术的标准，美的标准，就是看形象和典型是不是深刻、生动。如果一个作品的形象很生动，典型描写得很深刻，那么这个作品就有艺术价值。当然这只是讲艺术价值。

艺术作品除了艺术价值之外，还有它的政治价值。艺术作品如果没有政治方向，那么典型写得愈生动，害处也就愈大。当然，政治观点如果太坏，这种作品就不可能掌握生动的典型。《三国演

义》在写曹操时，歪曲了事实，所以他的艺术价值不是那么高，它的政治方向是有缺点的，总的来说是反动的，因此它在艺术刻画方面也很差。这里想要把孔明描写成第一流的人物，但是有时候写成了像个妖道。实际上孔明并不是穿八褂衣拿鹅毛扇的怪人。

所以，政治观点不对，艺术形象方面也会有缺点。它的思想内容和政治价值有一定的联系；但又是两回事情，思想方面不是很正确，但在形象方面可能比较好，但不会非常好。因为，思想方面完全错了，那么作家的观点跟实际生活就会有矛盾，就不可能写出来百分之百的真实的东西，就会有一部分歪曲的东西。

艺术作品除了政治价值外，它的艺术价值基本上是决定于形象是否生动，典型是否写得深刻，这是艺术的特点、艺术的要求。

这种要求就产生了艺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特性，使得艺术往往不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上层建筑。因为作家如果忠实于艺术，他就要很好地去体验生活，去观察典型，因此就要忠实于真实的生活，就要忠实于现实，所以，对艺术最忠实的作家，必定是现实主义的作家，他必然要说真话，必然要写真事。因此他就不能不暴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和剥削阶级生活的腐朽，因为这是事实。他也不能不写人民的痛苦、劳动者反抗的要求和劳动者对剥削阶级的仇视。他不能不看到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罪恶的。

所以，一个忠实于艺术的作家，即使他的观点是统治阶级的，但倘若他是十分忠实于艺术的，结果他写出来的作品会和他的观点有矛盾。他的观点是想为统治者服务，但是因为忠实于艺术，结果揭露了现实生活，他的作品批判了统治阶级。他是为统治阶级辩护，为统治阶级服务，但是恰恰相反，他的作品反对了统治阶级。这种情况是常有的。

这种情况就使得过去有些从统治阶级出身的作家，写出来的

作品并不成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上层建筑，统治阶级不容它纳入自己的上层建筑的范围内，把它排斥出去。这种情况是有的。

可以说过去历史上的伟大的作家，都遭到过这种命运，比如，俄国的伟大作家普希金，就遭到这种命运。沙皇要普希金按照自己的命令写东西，但是，普希金写不出来，普希金却写了十二月党人，写了沙皇的统治。结果沙皇的警察对他的作品采取了压制的态度，最后沙皇利用恋爱的关系挑拨一群人和普希金决斗，把他杀死了。

又比如，俄国的果戈里也是沙皇不喜欢的。而果戈里也是不喜欢沙皇的。在《钦差大臣》这个著作中，果戈里是要讽刺沙皇的官僚的；可是沙皇看了之后却哈哈大笑。沙皇把果戈里找来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笑过，你写的这个作品真好。当时果戈里说：我写作品不是为了叫你笑。果戈里也愿意在沙皇那里做一些工作；但是因为他忠实于艺术，就不能够做到这一点。

马克思说：巴尔扎克喜欢剥削阶级，但是他写的作品就说统治阶级的腐朽，一定要垮台。

我们中国的《水浒传》是人民的东西，当然不是封建的上层建筑。至于《红楼梦》这个作品就很复杂了。作者是贵族出身，不跟农民接近，甚至于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资本主义。曹雪芹没有把这个作品写完，到以后是高鹗写完的，最后说皇帝开恩了，贾家恢复了繁荣。他的思想方向还是要歌颂皇帝。即便曹雪芹不是这样想的，高鹗却是这样做的；但是，他们为了把这些人物写得生动，结果就把这个封建制度各方面写得非常生动，使人感到这种家庭一定要衰亡，统治者中间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必然要使封建社会垮台。这就是写出了现实生活的必然性，结果这个制度对封建制度就是一种很严厉的批判，它说明这种制度是矛盾百

出的，是腐朽的，没有办法能够替这个制度想出一种稳定的方法。那么多的矛盾就不可能平平稳稳地生活下去。

《红楼梦》作者对这种制度的趋势，做了一个哲学的总结。这个总结有一些歪曲，就是用色空的观点来说明一切。如果把这个思想用来概括整个世界是错误的、是夸大的。因为世界并不是空的，我们的现实生活是实在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要实现的；但是如果反封建制度来讲，的确是这样。封建制度的种种都是空的，因为都要垮台。特别是在封建制度里要想追求幸福是空的。贾宝玉、林黛玉要在那种制度里面追求自由、幸福是不可能的，虽然他们有很强烈的要求，而且他们所要求的自由、幸福是相当高尚的，不是一般统治者所要求的花天酒地的幸福，而是在精神生活上能得到真正的自由，但是，这种强烈的要求，因为是在这种封建制度下，就完全被破坏了。在贾宝玉看来，女孩子是最纯洁的，可是一个个地被摧残了，出卖的出卖，逼死的逼死。在这个制度里，一切高尚的希望、一切对自由、幸福的希望，统统破产了，统统瓦解了。这就是说在这种制度里人们所追求的各种希望都是空的。所以，他那个思想并不是纯粹的佛家思想。

现在俞平伯对《红楼梦》的错误看法，就是对色空思想没有阶级的分析，不懂得曹雪芹的色空思想和一般佛家的色空思想不同。曹雪芹有一种批判的意义。当然这种思想是夸大的，在我们看起来也是错误的，但是在当时来说，是带有批判性的。把一切封建制度都当做是空的，封建制度里的一切希望都是空的。一个人在封建制度里生活，找不到别的出路，除了抛掉这个家庭做和尚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做和尚比较“幸福”。如果他和农民、资本主义接触，就会和他们发生联系，但是贾家那个时候接触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只有走当和尚这条路。

这就说明曹雪芹这样的人，原来是封建统治阶级出身，他希望在这种制度里面找到幸福，他希望这种制度能够稳定，可是现实生活跟他的希望不一致，一切希望都落空了。他只是把现实生活写出来，结果他的作品就批判了封建制度，而且批判得很深刻。

在《红楼梦》里面并不是“怨而不怒”，实际上对这种制度是很怒的，在这种制度里面出身的人，结果能够抛掉这种制度去当和尚，你怎么能说是不怒呢？对那种制度里面的许多事情，他是痛骂了的。

所以，像《红楼梦》这种作品就不能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封建统治阶级就没有把它作为上层建筑。封建统治阶级是把《红楼梦》当做“淫”，禁止青年看，这个作品是人民的东西。虽然曹雪芹不代表人民，他的思想不是人民的，他的色空观点不是人民的，但是，他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就对人民有贡献。因为人民就是要批判，要揭露封建制度。人民从外部批判，就不如他从内部批判、揭露得深刻，他毫无顾虑地把它写出来了。贾家那些人都是他的父母兄弟，但他毫不客气地揭露出来了。所以，人民就要承认他这一点功劳，因此，这个作品就有了人民性。它当然就不是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而是人民所需要的宝贵的艺术财产，是人民用来反对地主阶级的一种武器。人民可以根据他所写的东西指出封建制度的不合理。

因此，艺术这种上层建筑就有这样的特点；就是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伟大的艺术作品，差不多都不能够成为当时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而成为上层建筑的东西，多半是一些平庸的作品。比如，美国有名的作家，都被统治者所压迫。美国资产阶级艺术的上层建筑是什么东西呢？资产阶级的艺术就是描写强盗、侦探的荒淫无耻的电影、黄色小说。在美国公开发行的就是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虚伪的，艺术价值很差，没有什么永远的价值。

过去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作品，都带有人民性，都对统治者有所批判。当然，有些伟大的作品，统治者也没有办法否认它的价值。统治者不允许它出版，人民就抄来抄去，也在出版，比如《红楼梦》、《水浒传》都是这样。有的时候统治者也只好让它出版，而且有时候公开出版了。这时，统治者就搞一些批语，来歪曲作品的内容，使作品适合统治者的需要。统治者一方面不允许《红楼梦》出版，同时把它解释成统治者所需要的东西。

过去的艺术作品所以能够存在，有它不能够磨灭的力量，统治者要排斥也没有办法。

所以，凡是卓越的艺术作品都是现实主义的，都带有人民性。过去伟大作品的现实的内容常常跟作者的社会观点有矛盾。所以，过去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对旧制度进行了一些批判，但这不是作者自己有一个什么明确的方向。

我们现在所要求的艺术作品，跟过去不同。我们现在所要求的不是一般的现实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就是一方面继承了过去伟大作品的传统，对旧社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对旧事物毫不客气地进行批判，但同时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有一点新东西，就是作者有明确的进步的观点，作者要有进步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像苏联的一些有名的作品就不仅是对旧制度加以批判，同时也指出了我们斗争的新方向，我们的希望。《红楼梦》把旧社会揭露得很深刻；但是没有一个希望，除了做和尚之外，还没有别的希望。在《水浒传》中也看不出来什么明确的希望。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就是对旧制度的批判跟新的斗争方向，总是明确地结合起来。过去的伟大作品多半是悲剧性的。因为它

揭露了旧社会的罪恶，好人的结果往往是悲惨的，林黛玉、贾宝玉这些人的结果是悲惨的，一些女孩子的结果是悲惨的。当然旧的作品中也有喜剧，但那也是带有封建性的，有些喜剧是虚伪的。比如《西厢记》中的人物在最后团圆了，但那是虚伪的。我们的现实主义就不同。现实主义就是实际生活里面有希望，所以就要真实地反映希望。我们要求的就是这种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最近文联对胡风的思想展开了批判讨论。胡风反对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他反对作家有进步的世界观；不承认作家应该深刻地体验生活，所以是错误的。

伟大的作品所以有永久性，就是它不是当时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它是人民的东西，能够对人民有所贡献。

艺术的民族形式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可以讲的。因为艺术就是依靠各民族的语言，各民族所提供的材料来写成的。语言就是一种民族形式，我们中国人写小说就用中国的语言来写，所以它应该符合中国语言的习惯。绘画、雕刻我们有民族传统，所以我们能够发展民族形式。要有民族形式，才容易为自己的民族所接受，才能够表现民族的特点。所以这应该也是一种艺术的形式。

我们的提纲上没有讲到道德的问题。道德也是一种上层建筑，所以要简单地讲一下。

道德跟政治法律的地位是相等的。政治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道德也是表现统治阶级意志的。但是，道德跟政治法律不同的地方，就是政治法律是用国家的力量，用政治法律的形式，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来规定一个国家里面的人民生活所需要遵守的规则。所以，政治法律是依靠国家强制的力量，来表现统治阶级的意志。道德跟政治法律不同一点，道德不是直接依靠国家暴力，来保证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生活秩序。道德是依靠社会舆论，

来保证统治阶级所要求的生活秩序。所以，道德在形式上好像是全社会的人民共同承认了的、公认了的社会规则，而不是依靠任何强力来保证。

所以，道德跟政治法律有互相帮助的作用，政治法律的力量达不到的地方，道德就给予及时的补充，来帮助统治阶级，加强统治的作用。

我们对旧的政治法律制度可以一下打碎，但是，对旧的道德观点的消灭，就多多少少有些像对待宗教一样。在新社会建立起来之后，要逐步地经过一些思想斗争、思想教育来加以消灭。

道德的改变，比起宗教就不是那么麻烦。宗教一定要在人民生活达到根本改变的时候才能够消灭；但对旧道德的消灭可以经过一些思想教育、思想斗争，来逐步改变。只要新社会的基础建立起来了，新的政治上层建筑建立起来了，再加上思想上的教育，那么旧道德就可以改变。

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共产主义道德，要把旧的道德克服掉，这就要在各种建设工作中不断地进行教育，不断地从各方面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结合各种实际斗争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来反对个人主义，宣传共产主义道德，反对自私自利，只顾自己的思想，反对那种个人主义的劳动态度，资本主义的劳动态度，要提倡共产主义的、自觉的劳动态度。这些都可以经过教育来解决。

现在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不是所有的人都承认的。觉悟的工人、农民可以承认，如果是个体农民，要他承认共产主义道德标准就困难，要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承认也困难，至于知识分子也需要经过许多斗争，才能够接受共产主义道德。在实际生活里面，许多道德观点是个人的，这就需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来克服。

另外就是关于科学的问题。

社会科学是一种阶级科学，所以社会科学是上层建筑。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科学就成为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党性，就表现它是阶级的科学。

社会科学为什么是上层建筑呢？

完整的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社会科学，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掌握，只有无产阶级成为统治者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成为统治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科学是跟着无产阶级的产生而产生。旧的剥削阶级，不管是封建地主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都不能够掌握社会科学。剥削阶级只能够掌握一些片面的社会知识，部分社会规律的知识，不能够把社会知识变成有系统的科学。完整的社会科学只能够是工人阶级的，是跟着工人阶级的产生而产生，它只能够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说，马克思主义科学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建设共产主义的科学。

社会科学能不能为剥削阶级服务呢？

片断的社会科学能够为剥削阶级服务，资产阶级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法则；但是，完整的社会科学资产阶级是没有的，完整的社会科学不能够为资产阶级服务。

为什么不能够呢？

因为完整的社会科学也要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是要被消灭的。所以，剥削阶级不能够承认它，不能够运用这个科学。毛主席说：剥削阶级的偏见使得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只能够是片面的，不能够全面。

所以，社会科学，完整的社会科学知识，只能够为无产阶级服务，不能够为剥削阶级服务。所以，社会科学只能够是无产阶

级的科学，完整的社会科学只能够是无产阶级的。

至于自然科学就不同。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规律的知识。自然科学是反映生产发展的需要。自然科学也就是生产斗争的科学。所以自然科学跟社会科学不同，社会科学是反映生产关系，反映社会斗争，所以这种科学本身有阶级性，有阶级偏见的剥削阶级就不能够完全掌握这个科学。自然科学不反映社会斗争，不是反映生产关系，而是反映生产的需要，反映自然斗争的需要。所以，这种科学就能够为各阶级服务。剥削阶级对自然科学的各种规律，也不会是完全拒绝的，不会排斥的。原子能可以为工人阶级所掌握，资产阶级也可以掌握。

但是，有些自然科学的规律，比如地球绕太阳转的规律，曾经有一个时期封建统治者要排斥它。在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基督教认为那是罪恶的思想，宣传这个学说的人要受火刑。但是，到以后基督教辩不过这个真理，还是承认了。承认这一点对宗教有没有妨碍呢？没有。因为它承认了这一点并不妨碍世界是最后由上帝创造的，不妨碍它最后作这个结论。甚至于近现代的自然科学、天文学也可以在教会里面宣传。

所以，不管哪个阶级，不会根本拒绝自然科学知识，自然科学可以为各阶级服务，所以自然科学就不是上层建筑，而是反映生产发展需要的一种社会思想意识。

虽然自然科学本身不是阶级的，但是拿到一定阶级手里的时候，还是要带有阶级性。一个统治阶级掌握自然科学的时候，还是要使自然科学发生一定的上层建筑的作用。

自然科学怎么样发生上层建筑的作用呢？

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统治阶级用自己的世界观来总结自然科学成就，来解释这些自然科学知识。反动派用唯心论总结自然

科学的成就，来解释自然科学的规律；无产阶级用唯物论的观点来总结自然科学知识。那么，当然用辩证唯物论来总结自然科学是正确的，因为自然科学本身是唯物的，是变化的；但是资产阶级用唯心论来总结它，这是歪曲的，是错误的。尽管是错误的，但资产阶级还是要这样解释，这样的解释对它的统治是有利的。

基督教对原子能就用恐怖的方法来解释。基督教用很多小册子来宣传世界末日的观点，要大家赶快祷告上帝，将来上帝可能发慈悲把原子弹收回去。过去我们搞土地改革的时候，发现很多相信基督教的地主的家里都有宣传原子弹的小册子。小册子的封面上印着“世界末日”。这就是统治阶级利用自然科学去起上层建筑的作用。

另一方面，自然科学运用的范围也受到资产阶级的限制。原子能在开始时在英、美只用来作原子弹，不用来进行生产，当觉得有利可图时，才把原子能用来发电。这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限制了它。但是工人阶级就把它用到生产上。我们也有原子弹，但这不是主要的，相反地坚决主张消灭原子弹。所以，自然科学运用的范围是受阶级要求的限制的。有的时候统治阶级把自然科学的知识直接用来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打仗就是利用自然科学来摧残人民，用电刑镇压劳动人民，用原子弹恐吓劳动人民。

所以，自然科学除了用来进行生产外，还要用来作为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就说明自然科学本身不是阶级的，但是它能够起到阶级的作用，这就是自然科学的两重性（这种提法对不对还可以讨论）。社会科学就是阶级的，就没有两重性。自然科学本身不是阶级的，可是它在阶级的手里就发生阶级的作用，这个阶级的作用，不是和自然科学完全没有关系的。

语言不是上层建筑这个问题我们不用解释了，大家看了斯大

林的著作就可以明白了。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

我们讲社会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包括过渡时期在内，因为它还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所以，还是先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讲清楚，然后再讲过渡时期就好讲了。

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包括三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有不同的成分，首先生产制度所有制，这方面包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就是工业方面的全民所有制和农业上的集体所有制来构成。在这两种所有制的基础上，所发生的人和人的关系，主要是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同志中间的互助合作关系。

社会主义中工人与农民的关系，跟资本主义社会下工人跟农民的关系不同。工人和农民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没有办法建立同志互助的关系。当然在有些斗争中要建立联盟关系，但在经济上没有办法建立同志互助的关系，因为中间被资产阶级隔断了，工人生产出来的东西，被资产阶级用来剥削农民。工人、农民这两个兄弟阶级，只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建立同志间的互助合作关系。这种关系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比如在生产方面，农民供给工人粮食、原料，而工人又给农民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是生产资料）。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有许多人不懂得这一点，所以对总路线不大了解。有些人反对总路线，就是反对由重工业开始建设，他的理由就是建设轻工业可以供给农民很丰富的生活资料，这样就能够巩固工农联盟。

这种理由是不妥当的。因为工人不仅仅供给农民生活品，而主要的是供给生产资料。工人如果不帮助农民发展生产，供给生产资料，那么工农联盟就不会巩固，就不会发展。要发展巩固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要供给农民生产资料，使农民能够发展生产，能够使生产一年比一年提高，生活得更舒适，生产不至于停顿在现有水平上。如果农民只是得到一些便宜的生活必需品，可是他的生产不发展，农民就不会满意。如果生产发展了，对重工业的需要一年一年的就要增多了。

所以，工人首先要供给农民生产资料，其次是生活资料，当然也要发展轻工业。

另外，还有交换的关系。在这里还要注意等价交换。因为农民供给工人的粮食，原料是要通过商业进行交换的，工人供给农民东西时也是这样，所以交换不好也是不行的。我们搞国营贸易的、合作社贸易的要注意使农民不吃亏。我们和资产阶级不同，资产阶级到农村做生意就是要剥削农民;而工人是不剥削农民的，是要进行等价交换的。

当然等价交换这一点是基本的原则，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要机械地等价交换，等价的程度要看情况。比如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我们执行总路线的初期，我们因为要用主要的力量搞重工业，就没有那么多工业品下乡，就出现了剪刀差，农民还是吃一点亏，这个吃亏是需要的，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重工业，把重工业建设好了之后，将来对农民还是有好处的。当然，剪刀差的消灭是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不过这种情况跟农民说清楚之后，农民是能够接受的，农民懂得这是工人农民共同的利益，这不简单是帮助工人，也是为了农民长远的利益。这样在交换方面也就会是互助合作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就使得工人、农民在经济上的联系日益巩固，这也是互助合作关系的表现。

至于分配的形式是决定于生产资料的分配的。有了两种所有制的存在，就使得工人、农民的分配形式不同。工人分配产品的形式是工资，集体农民所得到的一部分是工资，一部分是实物。工人进行生产时因为生产资料是全民所有制的，所以他的分配形式是工资。农民是集体所有制，所以生产所得是集体所有，集体又分配给个人。这就是社会主义产品分配的形式。大家学习了经济学对这个问题就可以了解得更多。

总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有两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工人、农民的互助合作关系，以及社会主义产品分配的形式，这些关系加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是这种生产关系。

这种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跟共产主义不同。共产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全民的，工人和农民之间也不采取交换的方法，而产品分配的形式也可能都采取工资的形式。

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哲学各方面的观点以及跟这些观点相适合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这些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的观点，最根本的观点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是贯穿在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反映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反映了工人和农民的互助合作关系。在这种观点指导的同时，又产生了全体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

为什么会有全体人民在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呢？

因为在社会主义是没有剥削阶级的，所以在思想领域上反映

了没有阶级敌对的上层建筑，也就不会有严重思想冲突。工人和农民的互助合作关系就反映到这样的上层建筑里面。

这种政治上、道义上的一致又包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政治上、道义上一致的集中表现，就是爱国家，对自己的国家有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也有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

另外在文学艺术方面，那就是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是相结合的，也就是说，形式是各民族的，但内容是一致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上的内容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内容。

这些就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内容，跟这些上层建筑相适应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以及跟无产阶级专政有联系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

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是这样。这种上层建筑跟资本主义，跟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不同。另外，跟共产主义也有不同。当然，共产主义也是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也会是全体人民道义上的一致，但是到了世界成为共产主义世界，没有国家的时候就更不同了。

关于社会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大体上就是这样。

现在就讲社会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如何建立起来的问题。

这里就要涉及到过渡时期的问题，要建成社会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必须要有一个过渡时期，必须要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之后，社会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不是在革命胜利之后立刻就能够建成的。

这个情况跟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不同。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在封建社会末期就准备好了的。所以，在资产阶级革命一得到胜利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已经基本建成了，剩下的就是更进一步发展巩固的问题了。但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就不可能这样。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

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只能够产生社会主义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条件。工人阶级没有胜利以前，几乎没有社会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

在中国，工人阶级没有得到胜利以前，就有一个长期的根据地，这就是有一点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不完全，不是很明确的。因为没有重工业，没有掌握全国的经济命脉，只有一些小规模的国营工商业。所以，在旧中国那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已经是正在创立的过程中，但是没有正式建立起来。

至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人阶级胜利以前就完全没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只能够在工人阶级得到政权之后，才开始来建立。

这也不能够说，工人阶级先把政权建立好了，然后才来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工人阶级在革命胜利中间，就同时把基础开始建立起来了，同时也建立起了上层建筑。革命一方面掌握政权，一方面剥夺资产阶级，是这样来取得胜利的。不是先把政权完全搞好了再去剥夺。所以，一般应该说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跟它的基础同时建立起来的，上层建筑是跟着基础的产生的产生的。

斯大林同志说：社会主义的基础是从“空地上”建立的。不能够说是先把政权搞好了，再进一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而是得到政权的同时就有了基础，然后才能进一步地发展，并且进一步地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空地上”建立起来。所以，“空地上”这三个字是要打引号的。

既然是在“空地上”建立社会主义，所以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就需要有一个建立以至于建成社会主义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时期，并不是政权一到手，基础就建成了。政权到手的时候，是基础开始建立的时候，但是没有建成。

我们中国也是这样，我们掌握了政权，掌握了银行、铁路等

等，社会主义的基础就算建立起来了。全国解放以前，在根据地，虽然有些基础，但是并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因为它是不稳定的，因为没有大工业，没有掌握全国的经济命脉，所以不能够说是已经建立，而是正在创立，等到全国胜利之后，有了重工业，全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在手里了，这个时候建立起来了，但是还没有建成。因为农村里面还没有很多的集体农民，工业也还不够，重工业还没有建成。

社会主义基础的建成，首先要有重工业，首先要自己能制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用自己制造的资料来装备自己，要使自己成为独立的工业国。这个条件我们现在还没有，所以不叫做建成。再加上农业还没有社会主义集体化，所以也不能说是建成；但是，革命胜利后，我们掌握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有一些重工业，所以我们的社会主义基础就建立了。

由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基础到建成社会主义基础，就是要有农业集体化、工业化。那么，由建立到建成这个期间是一个过渡时期。由掌握经济命脉，由有了初步的重工业，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这中间是一个过渡时期。要建成社会主义就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过渡时期。所以，过渡时期是建成社会主义基础同时又是建成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时期。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过渡时期的原因。

第三次讲课

(1955.1.8)

我们上一次已经讲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一般内

容。现在就讲社会主义的基础是怎么样建立和建成起来的。

上一次也提过一下，就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是不能够在旧社会里面产生出来的，不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新的生产关系，而要在工人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才开始着手建立。所以，斯大林同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面说：社会主义的基础差不多是从空地上建立起来的。所谓“空地上”，就是说革命胜利以前是“空地”，革命胜利后才开始建立。所谓从“空地上”建立起来，不能够解释成为革命胜利时先把上层建筑建立起来，然后再建设基础。这样机械的解释是不妥当的。从“空地上”建立起来的意思是说革命胜利以前没有基础，没有新的生产关系，要在革命胜利之后才开始改变生产关系，才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我们应该这样来了解。在这里面并没有涉及到上层建筑要在基础以前建立这种意思。经典著作里面也没有这种讲法。那么，前后问题究竟应该怎么样来了解呢？还是应该按照斯大林同志所讲的来了解，就是说上层建筑是随着基础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基础的消灭而消灭。

总之，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在革命胜利时，就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同时，就开始剥夺资产阶级。革命不仅仅是夺取政权（当然基本问题是要解决政权问题），而是在解决政权问题的同时，就要开始剥夺资产阶级。只要一得到政权，同时就要占领银行、铁路、交通等等，占领有关经济命脉的最大的企业，这是在建设政权的同时必须要做到的。

政权不可能凭空建立起来。革命胜利之后，不可能银行也不要，交通机关也不要，大企业也不要，就先把政权搞起来，这样的一种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没有政权，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革命不胜利，不得到政权，那么就不能占领许多经济机关，

就不能剥夺资产阶级。没有政权就不能够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存在，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是依靠无产阶级政权的保证，有了无产阶级政权才有这种经济。如果无产阶级政权垮了，社会主义经济也就没有了，资本主义立刻就会复辟。

但是，没有工人阶级政权就没有社会主义基础，这也不是先后的问题，而是说有了这种政权才能够保证这种基础的存在。革命的目的首先是夺取政权，但同时也要把主要经济机关掌握在手里，不然，政权就不能支持。一个政权没有基础，没有经济机关怎么能够支持呢？完全没有基础的上层建筑可能不可能呢？不可能的。一个政权建立时，它就要能够有财政支持，它这个政权机关要有经济力量来维持。这是政权一建立时立刻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不掌握经济命脉，或者是不掌握一些必要的经济机关，那么政权也不能够建立。所以，社会主义的这种经济基础，是需要由政权在“空地上”建立起来的。这句话不能够解释作是先建立政权然后才有基础。

社会主义的基础，是要在革命胜利之后从“空地上”建立起来的。在革命胜利之后跟着政权建立的同时，才开始来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革命胜利时，基础只是开始建立，而不是已经完全建成了。工人阶级得到政权，社会主义基础也就开始建立了，但是并没有建成。在苏联这个情况就更明显一些，革命胜利以前完全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胜利之后才开始建立。中国在全国胜利以前就有解放区，有了一些社会主义经济的因素，但这并不是完全的，因为没有重工业，没有掌握全国的经济命脉。解放以前，虽然有社会主义经济因素，但这个因素很不完全，只是萌芽状态，全国胜利之后，我们人民的政权才掌握了全国的经济命脉，才把大银行、交通机关、重要企业、全国性的企业掌握起

来，才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础，而不能说是已经建成了。上一次讲过，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工业化，没有农业集体化。尽管国家掌握了重要企业，组织了国营商业，可是没有工业化，没有农业集体化，就不能叫做社会主义基础已经建成了，只可以说是已经建立了。全国人民得到胜利时就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就使我们的政权有了依靠，政权就有了基地。但这个基地还不巩固。

由革命胜利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基础到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基础这中间要经过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是过渡时期。

过渡时期是什么呢？

过渡时期是这样一个时期：一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逐步建成，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基础逐步被消灭，这样的时期就是过渡时期。所谓过渡时期的特点，就是这个时期的经济制度，是又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整个时期的经济制度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完全是社会主义。

如果说过渡时期的经济是哪一种类型，那么应该说过渡时期的经济应该归入社会主义类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社会主义成分占领导地位，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是一定要胜利的，社会主义是向上发展的，而资本主义是要消灭的。所以，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类型，是可以归入社会主义的范畴内的。但是，把这个类型归入社会主义范畴内，并不等于说它已经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它的制度并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但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两种东西都有的制度。这个基础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向上发展的社会主义基础，另一方面是正在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基础。

那么，是不是说这个基础就是两个呢？

这个问题不能机械地来讲。过渡时期的经济是一种基础在产生，一种基础在消灭，是存在着两种基础；但是不要了解为这两

个基础是没有关系的，不要了解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没有联系。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两种生产关系、两种基础是有联系的。一方面是有斗争，社会主义要排斥资本主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没有消灭以前，还要利用资本主义，在一定条件下、一定范围内利用资本主义。两种基础的关系是又有斗争，又有利用的关系。但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向上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是被消灭的。

经济成分并不等于基础。我们过渡时期有五种经济成分。苏联在过渡时期的时候，列宁指出也有五种经济成分。列宁所讲的五种经济成分，比起我们的五种来，少了一种合作社，多了一种家长制经济。所谓家长制经济就是讲那种接近于原始公社末期，接近于农业公社，阶级划分不明显的农村经济、自然经济。我们新中国的五种成分中就没有这一种，没有把这种归并到里面。这种制度我们不是完全没有的，少数民族地区中还是有；但是，如果我们讲主要成分，起主要作用的经济成分，那么就可以撇开家长制经济不谈。在苏联的过渡时期中，家长制经济不仅是少数民族有，可能俄罗斯民族也有，可能是它起的作用是比较大。在中国有五种经济成分，但我们不能说是有五种基础。

五种成分也就是四种所有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就是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或者是半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

我们的经济成分里面有一种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的宪法上没有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所有制。因为它是两种所有制结合起来的，是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跟资本家所有制、私人经济联合的形式。它有两个有所有权的主人，不归一个主人所有。合作社经济就是劳动者自己所有。不管是全社会主义的或者是半社会主义

的，反正只有一个主人所以它是一种所有制。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就有两个主人，是由国家所有和资本家所有联合起来的，所以它就不是一种所有制。

我们有五种经济成分，有四种所有制。不能说一种成分就是一种生产关系，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两种生产关系结合起来的。那么，一种成分更不能够成为一种基础。如果每一种成分都是一种基础，那我们就会有五种基础。如果说以所有制为标准，我们就要有四种基础，这个说法也是不妥当的。

为什么呢？

因为基础不一定是由一种所有制建立起来的。比如社会主义基础就是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跟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过渡时期是由两种所有制构成社会主义基础。其中的集体所有制正在形成，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是这个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也就是社会主义基础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资本家所有制，当然是构成资本主义基础的所有制。

还有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就不是一种独立的基础。个体劳动者这种经济从来也没有成为过一个独立的基础，差不多每个社会经济中都有个体劳动者，社会主义时有小农经济，封建社会的时候也有在封建统治下的小农经济。所以它只是一种附属品，是带有附属性质的生产关系。

斯大林同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里面，讲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时候，他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同时这里已经没有了私人占有生产工作者的情形，这时的生产工作者，即雇佣工人，是资本家既不能屠杀，也不能出卖的……除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

有制外，还存在有免除了农奴制依赖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那么，这种说法就值得我们好好考虑。他这个话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但是除了这种所有制之外，还有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包括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农民、手工业者的私人所有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包含这两个东西。当然，资本主义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最根本的东西。可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仅是有这个基础，除了这个基础外还有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所以说，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包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但这种所有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

这是一个基本理论，就是说个体劳动者所有制是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当然它本身不是资本主义所有制。所以列宁说：小农是最后的资本主义阶级。列宁还说小农经济存在的地方，资本主义就可以找到比社会主义更坚固的基础。个体农民如果自发地发展，总是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如果不是无产阶级领导来改造它，让它自发地发展，它一定发展到资本主义，所以它有自发资本主义的倾向。这就是因为它本身是私有制，所以它是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所有制。

所以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是构成资本主义基础的两种所有制。

在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在旧社会里，没有形成它的基础。在旧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它的基础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所有制。当时资本主义还没有它的基础。还

因为农民是受压迫的，农民没能摆脱封建的奴役并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占有生产资料。

但是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一方面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也得到了发展。因为农民解放了，农民由封建时代的农民变成了个体农民，就可以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所以有人说，在旧社会没有资本主义基础，革命之后反而有了。在旧社会资本主义没有地方发展，那么在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它就会有更广泛的地盘。同样对个体农民、手工业者倘若不进行改造，它就会自然而然地向资本主义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基础构成的部分。所以列宁说过：小农经济是十字路口的经济。它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也可以向资本主义发展。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个体劳动者所有制，既是资本主义的又是社会主义的呢？

我想不能够这样说，因为个体劳动者所有制不就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因为它是劳动者所有制，并不就是资本主义，并不就是剥削者；但是，个体劳动者所有制也不就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它是个体劳动者，根本一点集体的味道都没有，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不能没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它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成分。

我们说它是十字路口的经济，并不是说它现在的性质问题，而是说发展的问题；而且是说在有工人阶级政权，有社会主义经济的条件下，它才是十字路口的经济。因为有了工人阶级要它向社会主义发展，所以它才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前途。可是就在这种时候，也还有资本主义的前途。所以，说十字路口的经济是说这种经济发展的前途问题。实际上，在工人阶级政权的领导下，有这样两个发展前途。

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这种所有制，有两种性质，它既带

私有的性质，又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这种半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它已经被无产阶级所领导，所以它反对资本主义倾向。但是，它的所有制还是有两种性质，还是过渡的。一个单干户就是想要发财，无非是想变富农。所以个体劳动者这种所有制，是资本主义范畴的。

所以，四种所有制构成两种基础：一种社会主义基础；一种资本主义基础。

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各种人和人的关系以及分配形式，联合成为基础。所以，五种成分并不就是五种生产关系，更不是五种基础。五种成分是以四种所有制作基础，而四种所有制又构成两种基础。这两种基础是有密切联系的，不能看做是完全孤立的两种所有制，不能够看做是孤立的两种基础。这两种基础就构成了一种过渡时期的制度。这种过渡时期，就是两种东西都包含的制度。如果说是制度，就是整个的经济制度。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不能够看做是各自孤立的；但是，一个制度里面是有区别的，就是社会主义是上升的，而资本主义是逐渐没落的。所以又可以把它们分做两种基础：一个是上升的基础，一个是正在消灭的基础。斯大林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说：30年来我们一方面在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同时也在消灭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这句话就是说在革命胜利后30年来资本主义的基础是有的，不过我们是在逐渐地消灭它。所以，应该承认资本主义基础在过渡时期是存在的。

在过渡时期包含着两种基础，而社会主义是要胜利的，资本主义是要被消灭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原因就是因为有工人阶级的政权，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权，就没有这种过渡。所以少奇同志讲：没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就没

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工人阶级如果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保证向社会主义过渡。

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是什么意思呢？

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就是说在经济上社会主义成分占领导地位。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要用自己的上层建筑的力量，来保证社会主义成分占领导地位，来保证社会主义成分日益增长，也保证逐步改造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在这种工人阶级政权的领导下，由于国家的帮助，社会主义经济就能够由建立逐渐变为建成，由占领导地位的经济的形式，变成为统治一切的经济的形式，而资本主义经济逐渐被排斥，最后被消灭，这就是过渡时期的情况。

现在再讲过渡时期的上层建筑。

过渡时期的基础，是有资本主义的，又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在消灭，社会主义在建成。上层建筑是适应这种情况的。

过渡时期的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义的，从思想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是最根本的上层建筑，一切道德、宗教、政治法律、文艺、各种意识形态中都贯串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形成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思想的上层建筑应该如何了解？这个问题应该讲一下。应该这样说：思想的上层建筑是以一定的阶级观点作基础的。那么，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基础的，各种意识形态要贯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才起上层建筑的作用。比如，在文艺方面，在解放之后可以有一些作家写一些新的作品，这些作品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个作品虽然是在新社会产生的，但它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上层建筑，一定要贯串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才能够成为上层建筑。

现在，文艺界发生的争论，就有这个问题。胡风主张好的艺术作品不一定要宣传政治，现在的作家要写好的作品，不一定要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家不一定要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也可以写出来很好的作品，这是错误的。

旧社会的作家，只要忠实于现实，就可以写出来对旧社会有批判性的好作品。新社会的作家，要使作品成为上层建筑，在观察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劳动人民的观点。

现在跟胡风争论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他就是否认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重要，他认为现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可以跟旧的现实主义一样。我们说，没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作品，就不能够成为上层建筑，而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问题，写出作品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上层建筑。不管写得好坏，有的时候这个观点贯串得不够，但是作家要用这个观点来观察问题，才能够写出成为我们上层建筑的东西。

有一些旧的作品，我们现在也称赞它，比如《红楼梦》，齐白石的画，还有一些旧戏我们也演。那么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看法呢？我们现在称赞这些作品是不是几百年以前的作家已经能够写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呢？已经替我们准备了上层建筑呢？

如果这样看就错了。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当然不是为社会主义写的上层建筑，他写的这种作品只是批判他所处的社会，他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因此他写出了有价值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他并没有替我们准备上层建筑。他有许多观点是错误的，不能够因为他有一些现实的内容，就说它彻头彻尾都是好的。

不过，现在有些称赞它的人民性的文章，写得有过分了。有人说贾宝玉代表资产阶级，甚至于有人说代表农民暴动。贾宝玉

怎么能会是农民暴动呢？他到了农村看到农民用的东西就样样都觉得奇怪，这样的人怎么能代表农民呢？他也不能代表资本主义，在那个时候就没有资本主义。农民暴动时，曹雪芹说政府就派人去“剿匪”，这还是对农民暴动的曲解。《红楼梦》的哲学观点也是错误的，认为一切都是空的。里面有一段说：美人会变成骷髅。这些思想带有佛家的虚无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作为对封建制度的批判有一些作用。因为封建制度里面的一切幸福、一切要求幸福的希望都要失败，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要受到摧残，一切东西最后都会被毁灭。这就是说，封建制度里是没有希望的；但是如果把它变成一个世界观，那就错了。

我们为什么要称赞这个作品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呢？

这种称赞不是无条件的，是分清了精华和糟粕、积极和消极的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指出它那些积极的东西，就是它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我们就把这部分积极的东西纳入到我们的上层建筑里面来，经过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判，使得积极的东西，可以在我们社会里起上层建筑的作用。

我们现在跟俞平伯这些人进行的斗争，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斗争。俞平伯、胡适这些人极力想要把《红楼梦》的消极观点扩大，宣传消极的观点，想要掩盖它揭露封建制度的积极作用，想把《红楼梦》变成资产阶级的武器，来妨碍社会主义建设。

我们现在批判俞平伯思想的同时，也要对《红楼梦》有所批判，把它消极的方面指出来，同时，把它积极的方面，用我们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它明确下来，使得积极的方面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旧社会的坏处，帮助青年锻炼阶级斗争的思想，来教育青年，教育知识界，这样就可以起上层建筑的作用。

所以，并不是《红楼梦》就可以成为上层建筑，而是我们用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把积极方面的意义指出来，使这一方面的意义成为我们的上层建筑。对一切旧的文化遗产都是这样，并不是旧的遗产就可以成为上层建筑，而是通过我们的观点，经过批判之后，使积极的东西对我们现在的上层建筑起好作用。

对于旧画也是这样。齐白石的画，过去反动派，统治者也称赞，那些统治者没有事情做，就找一些画放在屋里欣赏。这些画也可以被利用，因为齐白石只是画一些花草，这里面不反映阶级斗争，所以它可以被有关阶级所利用。如果革命不胜利，齐白石的画就会变成反动统治者的玩弄品。他有很多做官的朋友，李济琛就是他的老朋友。

现在，我们就不因为它是过去被利用的，就把它完全丢掉，就把它抛弃。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画家，画家本身并不是反动派，他是专门的技术人才，是一个脑力劳动者，他的作品并不直接为反动派辩护，他的技术本身是高明的。他所画的东西，虽然不能够表现阶级斗争，但他画的是一些人民所喜欢的东西，人民日常生活里面很有兴趣的东西。在反动派看来，那些画都是一种普通的画；但我们说他的画有一种特别的风格，他画的是真实的东西，是现实的东西。他把人民生活里面日常接触的事物，表现得很美，把日常生活里的东西，能够突出地表现出来。这些画能使我们很好地生活，对生活能有一种乐观的态度。这一点是人民所需要的，人民不需要悲观思想。所以，我们表扬这些画，这就是它的人民性。因为劳动人民尽管这样苦，还是要生活下去，而且在最苦的时候能够得到一点好的东西，就非常高兴。《白毛女》中的喜儿，他们虽然那样苦，但是买了一点红头绳，就高兴得很。这就是人民的乐观主义，对一草、一木都感到很有兴趣。不像曹雪芹那样把一切事物都看成空的。曹雪芹本身并不是这样，他自

己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好的东西，希望得到幸福，问题是在那个制度里没有办法，他写的贾宝玉最后只有出家。曹雪芹所写的贾宝玉不完全是悲观的思想情绪，还是有积极的方面。他跟那些专门要去修道，什么事情都不管，对人生没有一点兴趣的人，是不同的。

能够使人在生活上感觉兴趣，培养乐观的情绪，这是人民所需要的。有些虽然不完全是人民性的，但是有一点的话，这一点就是可取的，对这一点我们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它指出来，使人民注意这一点，就可以使这一点成为上层建筑。

斯大林同志说：上层建筑是政治、法律、艺术、宗教、哲学的观点。我们要注意观点这两个字，对旧的东西贯串了我们的观点之后，就有一部分可以起上层建筑的作用。

工人阶级得到政权之后，我们一方面建设基础（主要方法就是指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另一方面就要建设上层建筑，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贯串到一切问题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一切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加以批判。那么，同时也就要批判资产阶级观点，在一切问题上要反对资产阶级观点。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是要这样来建设，因为在革命胜利之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不就成为统治一切的，相反的，资产阶级观点还有很大的势力、很大的成分。

过渡时期有没有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呢？

有资本主义的基础这是可以肯定的，但对有没有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问题，是有争论的。所以，现在我不能下结论。我以前的意见是倾向于有的，我认为有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但是很不完全，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完全的，是有系统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首先是没有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

我这个意见是有根据的。斯大林同志说过：我们 30 年来苏维埃政权消灭了资本主义基础，同时也消灭了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这一句话就能够解释说是俄国革命胜利 30 年中才逐渐把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消灭了。那么在我们的过渡时期是会有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的。因为有资本主义基础，有它的观点，那么就会起上层建筑的作用。虽然我们国家的政权不是资产阶级的，整个政治制度不是资产阶级的，在这方面最多有一些资产阶级作风的残余，没有完整的制度；有一些资产阶级党派。但是，就思想观点这方面来说，资产阶级思想的比重相当大，作用还相当大。革命胜利后最初一个时期，资产阶级观点在人民中间的影响，恐怕比马克思主义观点还要大一些。因为马克思主义观点过去是被统治、被压迫的。当然马克思主义观点是领导的观点，是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因为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它就起决定作用。同时领导国家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大。

但是，资本主义是过去长期公开影响群众的，特别是在知识分子里面的影响较大，所以不能够说是残余，而是正式存在着。这种影响不只是影响很多人，而且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部门中都有影响，在政治法律部门中有资产阶级观点。在文艺方面现在在批判研究《红楼梦》中的问题，反对胡适、俞平伯的资产阶级观点，像胡风也有资产阶级观点。其他像宗教就更不用说了，宗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所以，要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首先在思想上要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贯串在一切问题中，在一切问题的领域中，建立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支配地位。同时，要努力跟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要排斥资产阶级思想，要从一切领域里面把资产阶级思想排斥出去。在思想方面就是要这样来建立社会主义的

上层建筑。

现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是起领导作用的，是起决定作用的，但还不是统治一切的。我们要经过10年、20年或更长时间，在各方面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之后，使马克思主义观点成为统治的观点，像苏联现在一样。苏联虽然有资产阶级思想残余，但马克思主义思想是统治一切的。我们现在不是那样，有些知识分子写出来的东西有很多资产阶级观点，像胡风这些自认为是精通马克思主义的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观点。我们自己在批判实用主义的时候，还觉得很费力。这就说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还不是很好地建立起来了，在我们共产党内部还要很好地建立这种观点。对胡适在哲学方面的批判就没有几个人写文章，即便写出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也还是有缺点的。这些都表明还需要我们努力。

另外，要建立起跟上层建筑相适应的，跟马克思主义观点相适应的一切制度，首先国家政权建立起来了，就要有适应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当然这种政权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使它的作用起得更大一些。因为在这个政权里面的工作人员，还有许多错误观点，需要肃清并批判。有一些部门因为用了一些旧人员，就免不了带来一些旧制度的残余，这些东西是需要肃清的。还有我们这个政权本身的人民性、民主性还需要发展。比如，我们现在采取的选举制就不是直接选举，都是间接选举。我们的政府是一层一层选举出来的，不是全国人民直接投票选举的。不像苏联那样，最高苏维埃代表，是以居民为单位直接由下而上投票选举的。我们的人民代表不是直接由选民选出来的。这些都说明民主性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那么，我们现在这样做是不是错了呢？

不是的。我们现在这样做是最恰当、最民主的。因为现在只

能够这样做。现在如果实行直接选举就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不能真正达到我们选举的目的。比如说，我们要搞统一战线，如果是直接选举，就不能按照统一战线的要求来选举，就没办法选出那些起义的人。因为有些人过去的罪恶很多，选民就不愿意选举他。像黄绍竑这样的人，选民就不愿意选他，间接选举要把他们选出来已经很困难了。比如像龙云这样的人，在云南省代表大会上，很多人不愿意选他，投他票的人也是骂他几句之后才投他一票。有的人说，看在共产党的面子上才选的他。这里面一方面是统一战线的问题，但我们要求的还不只是这一点，我们还要求积极的一方面，像有些人我们觉得很好，但人民不一定知道。还有些地区的土地改革没有搞好，这些地区要是进行直接选举也很难。

这些都表明我们的上层建筑还有待于建成。苏联在 1936 年社会主义宪法正式产生之后，斯大林才说：社会主义的基础建成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也跟着建成了。所以，以前的苏维埃政权还是不够充分发展的，到了 1936 年实行了完全民主的选举后，才说上层建筑建成了。

所以，在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是逐步建成的时期。过渡时期的完结就是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建成了，或者是基本上建成了。过渡时期结束的时候，资本主义基础完全消灭了，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基本上被排除了，剩下来的只是残余。

我们中国的过渡时期基本上就是按照这种方向去做的。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基础，另一方面，消灭资本主义基础；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另一方面，要消灭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消灭资本主义的各种观点（如果避免用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这个名词，我们就说消灭资本主义观点的影响，消灭各种资本主义制度的残余）。

在我们中国的过渡时期中，我们的任务基本上来说，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和上层建筑；但是，实际生活比较复杂。在我们过渡时期所消灭的东西，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除了资本主义制度外，还有封建制度的残余，甚至奴隶制度的残余。比如，在少数民族地区，一直到现在封建土地所有制还没完全消灭，有许多地区，特别是西藏，甚至还有奴隶制残余。所以，在过渡时期我们的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在我们努力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时候，我们还要附带完成民主革命未完成的任务。我们不仅消灭资本主义基础，而是还要附带肃清封建的经济成分和一小部分奴隶制度的成分。

所以，过渡时期的根本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消灭资本主义基础；但是附带还要肃清封建制度的残余，这是一定要注意到的。

在我们的宪法里说，我们的过渡时期主要包括四种所有制。为什么说是主要呢？因为这四种所有制，跟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有联系，是过渡时期总路线总政策所要涉及到的所有制，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一些有关的所有制的问题。但是我们只能够说是主要的，因为附带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所有制。这些所有制的问题的解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不是过渡时期本身的问题，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本质问题；但它是在实际生活里面，附带要解决的问题。在实际生活里面除了要解决发展全民所有制，建立集体所有制，改造资本主义以及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这些本质问题外，实际生活还要求我们附带解决一些民主革命中的问题，还要解决一些封建制度的问题。在汉民族地区解放 3 年来已经解决了的那些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还要有长时间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照顾到，过渡时期的问题就不能得到全面的解决。

所以，在过渡时期的根本矛盾，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但这并不是说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因为除了这个矛盾之外，还有地主与农民的矛盾，甚至于还有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但是这不是根本的矛盾，它不是规定这个时期的根本性质的矛盾。

这是在过渡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消灭资本主义基础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到的一些问题。不照顾这些问题，我们的工作就会有偏差，至少工作是不完善的。

我们的总路线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路线。它解决的问题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总路线里面没有提到消灭封建制度的问题。因为总路线只能够是一个根本的路线，不能够因为总路线只制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小手工业和农民的改造，因此就没有其他的任务了。总路线只规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对实际生活里面的附带任务的解决，我们就不能不注意。

在思想方面，上层建筑方面我们当然也是以反对资本主义思想为主，但对封建思想也要反对。比如，有人说俞平伯就有封建士大夫思想。我们不这样说，我们说俞平伯的思想有封建残余。在思想方面，上层建筑方面的斗争也是这样。

这些斗争都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工人阶级人民政权的领导下来进行。这些斗争胜利的保证，首先就是党的领导要加强，其次是人民的政权要加强。因为党才能够最好地贯彻马克思主义思想，来帮助我们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观点，制定党的各种政策，才能够为全体人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如果放松了党的领导，各种任务也就不能很好地完成。

四、若干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解答

下面解答一下问题。

大家提出来的问题很多，头绪也很难理，我只好尽可能地来答复，同时在讲课时已经解释过了的，就不再说了。

（一）生产力的两个要素的重要性问题

在这个问题中，如果我说劳动者最重要这句话，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这句话好像能解决问题，但实际上是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我这样讲了之后，就会有反对的意见。别人就要说：生产工具是决定生产力发展的条件，这不是很重要吗？别人就可以这样反驳；但是，如果说因为生产工具对生产力发展起决定作用，所以生产工具最重要，这也是错误的。不承认它是最重要的是错误，承认它是重要的也是错误。

所以，真理是有一定的相对性的，是有条件的。任何一个命题讲出来的时候，要注意条件。我们说哪一个是重要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时，首先要把重要性的意义弄清楚。如果我们说的重要性是讲在工作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如果是这样来了解重要性，如果把重要性和重要环节看做是一件事，那就不能说哪一方面重要，两方面都可以是重要的，就是有时候这方面重要，有时候那方面重要。在我们没有工具的时候，我们说工具是重要的。中国现在没有工具，所以我们就要搞工业化，我们自己要会搞工具。等到有了工具之后怎么办呢？有了工具之后，人就重要了，因为有了工具没有人就不能够发挥作用，所以人就重要了。

联共党在 1928 到 1934 年前后提出了两个口号：第一是技术决定一切；第二是干部决定一切。这两个口号就反映了社会主义

建设发展过程里面的两个时期的两个不同的中心环节。在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没有工具，没有装备，所以就把工具问题、装备问题提得很重要，就把它当做一个口号提出来，就是技术决定一切。等到以后有了工业，有了相当的技术装备时，就感觉能够掌握技术的人不够了，于是人就重要了，所以就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才号召出了斯达哈诺夫这样的人，能够想新办法掌握技术。

所以，如果讲重要性的问题，是讲工作过程里的重要环节问题，那么工具可以是重要的，人也可以是重要的，这就要看我们工作过程里面要求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不是讲工作过程里面的重要环节问题，而是讲生产力本身的工具和劳动者的地位问题，那我们首先就应该把具体内容说清楚。

生产工具是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条件、客观条件，是生产力发展的尺度，这是生产工具的地位、生产工具的作用，它的实质是起客观条件的作用。

劳动者又起什么作用呢?劳动者的作用就是使用生产工具,是善于掌握生产工具并制造生产工具的主体。没有劳动者，生产工具就变成了死的东西，要有劳动者，生产工具才能活动起来。所以劳动者是生产力中间活动的主体。我们说劳动者重要，就是因为劳动者是这样一种活动的主体,没有劳动者生产工具是死的,没有劳动者生产工具就不能制造出来。所以还是最重要的。有了劳动者就有一切，虽然没有生产工具，但是有了劳动者生产工具总归会有的，生产工具本身也是劳动者创造的，历史也是劳动者创造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劳动者是最重要的。比起生产工具来说，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从劳动

人民的观点来看，当然劳动人民最重要。劳动人民决不会把自己看得比工具还不重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决不应该把自己看得比工具还不重要。只有资本家才会把工具看得比人重要，劳动者就不能这样看。

所以，我们不讲工作过程里面的重要环节，而讲生产力本身两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地位，那么应该说都是重要的，但是劳动人民更重要一些。说劳动者最重要的意思，并不是说工具不重要，而是说工具也重要，但是劳动者更重要一些。

这个问题就要这样讲才能够比较全面些。

我们说生产工具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就不是重要不重要的问题。重要不重要的意思，就是看我们人对这两个东西认为哪个最重要，最被我们看重。那么对我们说来，当然更看重的是人。但是我们也不否认工具是起决定作用的。

这一类的问题都需要作全面的解决。这种同类的问题很多，比如实践和理论的问题。实践当然决定理论，实践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甚至高于理论；但是绝不能说理论就不重要了。因为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它的作用就很大。如果是说谁起决定作用，那当然实践是起决定作用的；但是，什么能够使实践更带有自觉性，使实践更顺利一些呢？那还是要依靠理论。

对于我们所谈的这两个问题不要混淆了，我们只是说这一类的问题应该由两方面来看。

我们说，实践高于理论，就是因为它更现实，使我们的认识能够更切实地得到东西；但是，革命实践一定要有革命理论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

在这样的问题上，如果一定要说实践或者理论更重要，那就

不对了。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实践重要，有时理论重要。如果是讲指导的作用，那还是理论作用更重要，实践本身没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如果是自发的实践，那是盲目性，这种实践是会有很多困难的。如果我们希望实践有自觉性，那么理论就是最重要的。所以要在一定条件下来谈这个问题。

前面，我们讲劳动者重要，是讲什么是主体的问题。在这里讲重要的意义，没有包括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条件，而是讲什么是活动的主体，我们就说劳动者是最重要的。

这个问题讲得多了，大家就会觉得复杂，但是太简单了又不行。希望大家根据我讲的东西考虑一下，基本原则是要注意我们提问题的相对性、条件性。重要性是有一定的范围的，是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讲重要性。

（二）劳动者是不是代表生产力问题

有的时候，我们说剥削者也会代表生产力。那么是不是那个时候劳动者就不代表生产力呢？比如说，奴隶制里面究竟谁代表生产力，是奴隶主，还是奴隶，代表生产力呢？资本主义初期资产阶级代表生产力，这不用讲了，那个时候劳动者是不是代表生产力？

我们应该说劳动者就是生产力本身，就是生产力的要素，他无所谓代表不代表的问题，他本身就是生产力。

代表生产力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生产力，是说这个阶级是不是代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那么按照这个意思来说，代表生产力这个名词就不一定是指劳动者，也可以说是剥削者。比如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资产阶级虽然不是劳动者，但它代表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资产阶级的利益是符

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资产阶级的活动是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当时新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由资产阶级来执行的。所以资产阶级就代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就是代表生产力。所以代表生产力的阶级，不一定只是被剥削阶级。

劳动阶级本身是生产力，但不一定任何时候它对生产力的发展都积极。奴隶对生产力的发展就不积极。他本身当然是生产力。如果说他本身就是生产力，所以他就代表生产力，这样也可以说。如果说代表生产力的意思，是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奴隶在一定时期并不积极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那个时候组织生产力的是奴隶主。到奴隶社会末期，奴隶主、奴隶都不积极了，所以生产力就受到破坏。在初期还是奴隶主积极一些。

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研究，奴隶制的问题还可以考虑。关于这个问题，希望大家不要去讨论它，因为如果不研究当时的历史，那讨论起来也是说空话。当然我讲的也不是结论。

不过资本主义的问题是比较清楚了，资产阶级代表生产力，恩格斯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当时劳动者——工人阶级当然是生产力；但是讲到当时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要求，是谁来积极的执行呢？那还是资产阶级执行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资产阶级代表生产力。

所以，我们要在讲课中注意这个问题。因为讲一个正面是可以的，但是讲反面就不一定对。你说劳动者代表生产力，但是劳动者不一定积极要求发展生产力，这是对的，但是，如果说劳动者不代表生产力，那就错了。因为生产力本身就有劳动者。

代表新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执行者，有的时候也可以是剥削者；工人阶级本身是生产力，同时，也是代表社会主义新生产关系、执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阶级。

（三）垄断时期为扩大再生产而要求最大限度的利润，那么现代资本主义因为要求最大限度利润就要扩大再生产，这是不是能够说，垄断时期资本主义因为要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因此就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大家将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应该更具体地了解。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应该说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能够说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整个资本主义在垄断时期，首先是资本主义不能够尽量发展，工业生产不能够尽量发展，特别是最近十几年资本主义不但没发展，有些地方还缩小了。美国稍微发展了一点，有些国家没有发展，有些国家缩小了。所以，垄断时期的生产关系不能够说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

但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在个别部门的生产是扩大的。垄断资本主义者所需要的那些部门，比如重工业部门，军事工业部门，一般来说生产是有扩大的，特别是在战争的时候，军事工业部门是有扩大的。

所以，整个来说帝国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但是一些个别的部门的生产还是可以扩大，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需要。所以不能说它能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因为整个生产力缩小了。

最大限度的利润是起什么作用呢？

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就是为了要扩大再生产。尽管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是缩小了，但是个别部门还是要扩大再生产；而扩大再生产就需要最大限度的利润，这是互相作用的。资产阶级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就使得它能够在得到最大限度利润的时候，可以扩大再生产。比如在军事部门扩大生产这对人民没有利，但是对资产阶级有利。比如原子弹的制造比把原子能用到生产方面去

更赚钱，因为原子弹有国家订货。

为了最大限度的利润，就要扩大再生产；反过来，要扩大再生产，就要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

这个问题要具体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就可以明白。

（四）生产力发展的源泉问题

《资本论》中说，生产力的提高决定于种种条件，其中有劳动者的熟练程度，甚至于地理条件也在内，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并不是说，这些条件是生产力的要素，或者说，这些条件是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而是说，估计现有生产力的发展情况时，应该估计种种条件，像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如何，工具如何，以至于地理条件如何，有没有原料。要建立一个工厂就要看原料，如果原料产地太远，也会有阻碍。所以生产力发展的情况是决定于种种的复杂条件的，这里并不是说的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源泉。

生产力发展的源泉，对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从哪来的呢？

尽管有很好的地理条件，有很好的工具，但是这个社会没有提出要求，不要求生产力发展，那么，生产力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地理条件尽管好，但它并不能提出发展生产的要求。为什么中国地大物博，从前没有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一直到现在才有这种要求呢？为什么我们今天积极搞工厂，搞地质勘察，这是哪里来的推动力呢？

这个推动力不是地理条件，也不是工具，也不是劳动者自己突然提出的要求。可见，推动力的来源不在生产情况的条件，而是新的生产关系是惟一的源泉，提出来发展生产要求的源泉，就是新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只能使局部的生产部门扩大，不

能提出发展生产的整个要求，不能对整个生产力的发展提出要求；但是，新的生产关系就能够使社会全部生产力发展。

所以，马克思讲的这句话，跟斯大林所讲的新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是没有什么冲突的。

（五）关于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问题，联系到中国的过渡时期，我们应该怎么样看？能不能说中国过渡时期的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或者是不适合？

恐怕这样的讲话还是笼统。过渡时期的制度，还可以看做是整个的制度，但是又要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加以区别。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跟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对立的，所以，就不能一视同仁，就不能笼统地说过渡时期的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完全适合生产力的，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愈来愈不适合，日益变得不适合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开始，就是有适合的方面，又有不适合的方面，到以后就愈来愈不适合。一开始我们就限制资本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时就限制资本主义，问题是开始的时候限制得少一些，到以后就多一些。这就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的时候就有积极性，又有消极性。积极的方面，就是适合于、有利于国计民生，但是，它又有有害于国计民生的一面。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同时，对民族资产阶级里面一些坏的东西我们也要反对，也要限制它。

所以，这是过渡时期的问题，我们就要用过渡的眼光来看，要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是带有过渡性的。

能不能说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不管是资本主义的也好，社会主义的也好，我想不能这样说，不能说是

恢复时期是适合的，恢复时期之后才开始变得不适合了。因为恢复时期我们就和资产阶级斗争，稳定物价就是一个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三反”、“五反”又是跟资本主义的斗争。“三反”、“五反”之后恢复时期才结束。为什么要搞“五反”呢？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已经不适合了，已表现出它不适合的方面。所以，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有两重性，而它的消极性方面愈来愈大，不适合的方面愈来愈大。

当然，恢复时期跟社会主义正式建设时期，可以说是有一点区别。这个区别也不是根本的，资本主义的两面性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不过在恢复时期我们利用资本主义这方面多一点；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就要更注意限制这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就愈来愈需要限制资本主义。所以统购统销就是很大的限制，在恢复时期就还没有这种限制。

（六）关于生产由自发到自觉的问题，联系到社会主义时期应该怎么样看？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是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的社会发展过程是有自觉指导的一种过程，不能说这个过程是自发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始终是自觉的建设。我们有了政权之后，一开始就用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各方面进行自觉的指导。有了工人阶级政权之后，社会活动方面就有了根本的变化。

但是，我们不要把社会的发展跟生产中间的新东西产生的过程，看成完全是一种东西。整个社会的发展是通过自觉的指导，但是在生产过程里面的新东西的出现，就不能说从头到尾都是自觉的。

在生产过程里面，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产生，是一个由

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从生产力方面来讲，苏联的共产主义星期六最初是自发的，是莫斯科几个工人自己来搞的，到以后列宁才把它叫做共产主义星期六。斯达哈诺夫创造新的生产力，使他没想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物品交换自己出现了，但是在最初我们没有进行自觉地指导。当然，进行这些工作的人也不是那么自觉。斯达哈诺夫在听了斯大林的号召之后，只认识到应该响应号召，当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对这件事的全部意义并不了解，不明确这是使生产力飞跃前进的运动，只知道把工作做好，好好地掌握技术，只有这一点自觉，但并不知道全部的意义。因此就不能够说他有自觉性，因为他并没有完全了解发展的规律性。到以后这个典型被国家知道了，把这个意义指出来之后，把它推广成为普遍的运动，然后才能成为自觉的、广泛的运动。

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过程是有自觉的指导的，所以有些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结束得比较快，自发的过程不会拖得很长，不会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冲突、对立，能够很快地走向自觉方面来。

（七）民主党派是什么上层建筑?

过去搞统一战线的时候，讲到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但是现在一般没有这样提，所以现在不能随便地对这个问题下结论。

政治协商会议不能叫做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因为它还是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下的一种政治制度。里面虽然有资产阶级代表，但是，是不是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并不决定于有没有资本家代表。苏维埃有农民代表，并不能说那是农民的上层建筑它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在于这个制度是为什么人服务的。政协当然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有些民主党派它也不能完全为资本主义服务。因

为它也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来改造资本主义，也接受了总路线。

上层建筑所起的作用是要巩固基础、帮助基础的形成，但是，现在的民主党派就不能帮助资本主义的巩固；相反的，它要配合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配合我们的国家，配合党来帮助消灭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

所以，如果说民主党派就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就有些说不过去。除非它不服从我们的领导，反抗我们的领导，那它就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但是民主党派就不是这样。

所以，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在政治制度方面来说，是残缺不全的。在有些机关里有些旧人员，还有民主党派成员，资产阶级里面一些旧的东西，对我们起了一些作用，部分的或暂时的起些作用；但是整个来说就没有什么作用。

现在就不好说民主党派是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这些党派是在整个人民政权下的一些辅助机关，是配合人民政权的一些政治机构。有了这些机构对改造资本主义就会起一些积极作用。所以，从整个的体系来说，民主党派还是应归入到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体系里面。

但是，要对这个问题作一个原则的结论还要考虑一下，不要轻易作抽象的结论。因为马克思主义不允许研究材料不够时轻易下结论。我们现在讨论时就有这个毛病，很喜欢轻易下结论。比如生产关系是不是适合生产力性质的问题，就说如果是恢复时期就适合，这就是没有把具体内容分析一下再做结论。而马克思主义就要求我们把具体材料和原则很好地研究一下，在材料没有弄清楚以前，不要轻易地下结论。

胡适实用主义批判*

(1955.1)

一、实用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

《人民日报》和许多报纸杂志上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所展开的批判，揭露了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思想——三十多年来胡适一派人所散布的实用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学术文艺界和一般的知识界里，还有很大的影响和很大的毒害作用。实用主义就是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错误的主要思想根源。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向我们提出进一步的任务：应该对实用主义思想进行一次系统的彻底的批判。

实用主义是美国资本主义土壤里生长起来的一种最反动最腐朽的唯心主义哲学，这种哲学实际上并不是什么特别新的东西，而只是被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里驳斥得体无完肤的马赫主义的一种流派。它和欧洲的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等，同样

---

* 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是当时党中央所部署的在全国范围内反对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的一项重要任务。艾思奇按照党组织的布置，做了深入的研究，写成了此书。胡适的实用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曾有很大的不良影响，对其唯心主义本质的揭露和批判，是很有必要的。艾思奇着重从哲学上有理有据地批判了胡适的实用主义的错误观点，但是对胡适在历史上有过某些贡献的方面，没有做全面的评价。

地都是属于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流派。胡适这个美国的文化买办，在“五四”运动期间把实用主义贩到中国来，这时也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送给中国人民来的时候。胡适非常深刻地仇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顽固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使他看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根本不相容”（《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631页），他幻想着以实用主义来对抗辩证唯物主义，来压倒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的歧路》，见《胡适文存》卷三，第96页）胡适宣传“实用主义”，是一开始就和他的反动的政治立场联系着的。

胡适的希望是落空了，实用主义并没有压倒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30年来中国广大人民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它的指导下获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而实用主义者胡适在政治上却完全破产了，作为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匪帮的帮凶者的胡适的反动面目，早在全国人民面前被揭露无遗了。虽然实用主义的思想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学术文艺界中曾有很大的影响，但现在也到了被彻底清算的时候了。

帝国主义各国的反动哲学思潮在近几十年内先后输入到中国来，并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影响。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实用主义。这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这反映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日益积极和扩大、日益凌驾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上的趋向；第二，实用主义比其他反动哲学流派更为狡猾地用“科学”的“最新”哲学的伪装把自己的真面目掩盖起来。胡适在“五四”运动前后对一部分旧文化的批评活动和他的一些考据工作加强了这

种伪装作用，使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中相当多的人受到了迷惑；第三，旧中国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中很多的人在阶级出身、文化教育和社会关系等等方面与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客观上存在着一个能使实用主义畅销的市场。实用主义所使用的“科学”的假面具，第一是所谓“实验室的态度”。实用主义者假装自己的方法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第76页），胡适特别把实用主义改称为“实验主义”，并用“实验主义”来作实用主义的译名，使得人们在它的名字上也会引起一种很像科学的错觉。实用主义所使用的第二个“科学”的假面具，是“进化论学说”。实用主义者自称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把自己的某些荒谬的观点硬说是生物进化论学说的应用。实用主义哲学戴着这种新的“科学”的假面具，是使得知识分子和学术文艺界中相当大的一批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的一个原因。有些人尽管在政治上唾弃了胡适的反动行为，却仍然留恋着他的实用主义。尽管在事实上不能不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却不能深信在学术研究上应该努力学习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而坚决抛弃实用主义。

我们一般地都知道胡适是“五四”以来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主要代表者，但直到现在，并没有对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进行过认真的系统的批判，对于实用主义的影响的散布，不但熟视无睹，并且当青年的同志们自发地起来对实用主义思想的一种具体表现如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举行进攻时，反而有人加以阻抑。这不但是思想工作者本身的失职，而且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主义的表现。这是严重的不能容忍的错误，应当坚决予以纠正。

我们的任务是要揭穿实用主义的“科学”的“最新”哲学的假面具，暴露它的反动的和反科学的真面目。实用主义的真面目是：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信仰主义和庸俗进化论。这些反动腐朽的观点与它所标榜的“科学的实验室的方法”和“进化论思想”都是毫不相干的。我们现在就要揭露实用主义的这些腐朽观点和它们的反革命的反科学的性质，并指明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才是一切科学的真正的理论基础，才能提供我们真正完善的科学方法。

二、实用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一派

（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一切有真正科学头脑的人,都要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承认先有物质世界，后有精神现象，承认精神、意识、感觉、思想等等是物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也就是要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这一个哲学上最根本的唯物主义原理。唯物主义原理是一切科学对于世界的理解的惟一正确的基础。如果否认唯物主义的原理，而采取了唯心主义的原理，如果把精神、意识、感觉、思想等等看做第一性的东西，看做是最先存在的东西,而把一切物质现象认为只是这些精神要素的表现，如果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否认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如果采取了这一系列的唯心主义原理,那就必然要得到与一切科学的成果完全相反的荒谬绝伦的结论。

我们说实用主义只是列宁所粉碎过的马赫主义的一种流派，因此我们先就马赫主义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正如列宁所揭露过的，马赫主义，在实际上只是17世纪英国已出现过的巴克莱的主

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再版。这类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共同的特点，就是把人的主观的感觉当做第一性的东西，他们认为我们周围的世界仅仅是由人的感觉要素所构成，而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他们认为人的认识仅仅是感觉与感觉之间的联系，而否认认识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在人的主观里的反映。这类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会引导出怎样荒谬可笑的、与任何科学常识完全相反的结论来呢？这在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一书里就告诉了我们：1. 自然科学证明世界是在人类出现以前早已存在，证明人类和人类的感觉是物质世界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自然科学在这里正是符合于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客观世界在先，主观感觉在后这个唯物主义原则的。然而，主观唯心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却说世界不能离开感觉而存在，那么，当世界上还没有人类或任何具有感觉的动物出现以前，自然界是否存在呢？自然科学告诉我们是存在的，但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却是相反地不能不引出否认这个存在的结论。怎样避免主观唯心主义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这个尖锐的矛盾呢？马赫主义者阿万那留斯对这问题就用了一种强辩的办法，硬说只要我们"设想"自己是人类出现以前的世界的目击者，也就是"设想"那时也有我们的感觉，那时的世界就存在了。但强辩并不能真正解决矛盾，这仍然不外是说，人类以前的世界原本是不存在的，只因为我们设想自己在目击着它，于是就由于我们的"设想"而凭空出现了这个世界！而且由此还可以推出更荒谬的结论：只要我们设想自己是天堂或地狱的目击者，那么天堂和地狱也应该存在的了！2. 主观唯心主义在逻辑上必然要"走向唯我论"的结论，即认为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只是"我"的感觉的表现：除了"我"和我的感觉而外，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其他的东西；就是我周围的朋友，我的父母，也

是我的感觉所产生的!难道这还不够荒谬么?3. 自然科学证明:人的思想是人脑的作用。但是按照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来说,人的思想也不能算是脑的作用,因为脑的本身也无非是一种“感觉的复合”。在这个问题上,阿万那留斯竟把“头脑底思维”叫做“自然科学底拜物教”,公开地向科学宣战了。(以上参看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第一章)

(二)实用主义不承认“实在”是物质的客观实在

实用主义哲学的反科学本质,与列宁所揭露的这一切并没有多少差别。实用主义同样不承认物质的客观实在,而把它归结为感觉和观念的复合。胡适写过一篇《实验主义》的文章,对实用主义做了个全面介绍,这篇文章里说明了实用主义者是如何来看“实在”的。胡适根据詹姆士的话这样说:“我们所谓‘实在’含有三大部分:(A)感觉,(B)感觉与感觉之间及意象(“意象”也可译做“观念”。)与意象之间的种种关系,(C)旧有的真理”(见《胡适文存》卷二,第106页)。这个公式告诉我们:实用主义不承认“实在”是物质的客观实在,相反地却把实在看做仅仅是人的主观领域以内的东西。实用主义者所谓实在,原来是和马赫主义的看法一样,只是感觉,感觉(及意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旧有真理”等主观要素的复合。(实用主义者的所谓真理,也是纯主观的东西,即“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这不是很明白的主观唯心主义吗?

从实用主义观点看来,“实在”既然是感觉和观念的复合,它自然是人造的了。胡适说:“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验主义》,见

《胡适文存》卷二，第 106 页）他举了一些例子，如诗人的感觉和植物学者的感觉如何不同，一百个大钱可以有各种摆法等，企图使人相信他们那一套胡说。其实，无论诗人或植物学者，其感觉都是物质的客观实在影响于其感觉器官而后发生的，人们的感觉虽然不同，物质的客观实在却自有其本来面目，决不因人们如何感觉它而改变。一百个大钱尽管可以有不同的摆法，可是这些摆法，无非反映了一百个大钱这一客观实在所固有的各种数的关系，要多一种摆法或少一种摆法，都不是人所能任意造作的。

实用主义者从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出发，荒谬地认为客观实在的变化发展是人的主观所“制造”出来的。胡适引用他的老师的话：“实验主义以为实在正在制造之中，将来造到什么样子便是什么样子”，并把这种实在论称为“创造的实在论”（《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第 107 页）。我们反对形而上学，反对把“实在”看做一成不变的东西，但也反对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所谓“创造的实在论”。

客观实在的变化发展是客观实在自己的运动，这样的运动是依循着客观实在本身所固有的规律的，决不是像主观唯心主义所说的那样由人的主观所任意“制造”出来的。天体的演化，生物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一切事物的运动，毫无例外地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个原理，而反驳着主观唯心主义。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人的主观对客观实在的能动作用。我们是很重视这种作用的。人通过实践能够认识客观实在，能够发现客观实在本身所固有的运动发展规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是研究和揭发这种客观规律的学问。不但如此，人还能够依靠、利用这种客观规律，来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这正是人区别于物的地方。可是，辩证唯物主义承认人的主观的能动作用，和实用主

义——主观唯心主义说人能够任意地“涂抹”、“装扮”客观实在，任意地“制造”客观实在的变化发展，是根本不同的。首先是前提不同。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承认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人们的精神生活，这是辩证唯物主义承认人的主观的能动作用的前提。而实用主义却相反。人的行为、行动，都是通过主观的，但人的主观，他的所见、所思、所欲，为什么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却只有在人的主观的外面才能找到真实的答案。人的愿望、目的，要服从于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规律，在客观条件所许可的限度内，才能够实现，或大体上实现；否则一定要在实际行动中碰得头破血流，一定要遭到失败。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原理。主观唯心主义却不承认这些原理，要把客观实在任意地“涂抹”、“装扮”和“制造”。

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荒谬，和马赫主义是同样的。不管他们怎样狡猾地躲闪，总是免不了引导出唯我论的和彻底反科学的结论来。但仅仅指出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实用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荒谬可笑的反科学的观点，是反映着一种极端反动腐朽的阶级实质的。帝国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已是处于“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垂死境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注定了他们的必然灭亡的前途，而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就是要依循着社会发展的规律，把它一步一步地送入坟墓。但反动派并不甘心于自己的死亡，他们还要用一切方法极力挣扎，以图苟延残喘。其方法之一，就是在思想上否认物质世界有其自己发展的客观规律，否认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硬说“实在”的变化是可以任人随便“制造”的。用这样的谎言来欺骗人民，其目的是想使人民看不清现实生活，看不清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看不清残暴腐朽的反动统治者的必然灭亡前途，看不清人民自己的斗争力量

就是打倒反动统治者以促进它的灭亡的决定力量，这样来图谋解除人民的思想武装。然后又在另一方面，趁机制造种种花言巧语，来把“实在”加以“涂抹”和“装扮”，把十分丑恶和腐朽的反动派统治这一个“实在”“装扮”成纯洁无罪的漂亮女子，使它能够骗取人们的拥护，以达到苟延残喘的目的。实用主义者胡适，就曾经用了最大的努力想使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发挥这样的反动作用的。他无耻地任意“涂抹”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他否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否认旧中国有封建势力的存在，硬说中国的封建制度在两千年前已经消灭了。妄图以此来欺骗人民，否定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就是实用主义用主观唯心主义来歪曲“实在”的真正的用意！但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究竟是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决不是可以任凭人的主观意志来随便“装扮”的“很服从的女孩子”。只有认识了这些规律，依循着和利用着这些规律，才有可能胜利地进行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活动。只有像原子物理学家那样揭示了原子能的规律，才可以使这种无比伟大的自然力量服从人的役使，使它变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只有像马克思主义者这样认识了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规律，才能领导劳动人民推翻俄国沙皇的统治，击败法西斯反动军队，打垮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在中国的统治，才能建设美妙无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反之，如果违背了自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妄想依着主观的企图来倒行逆施，任意“涂抹”和“制造”客观实在，那么，最多也只能在极短暂的时间之内造成一种自欺欺人的假象，而这假象终归要被客观发展规律淹没得干干净净的。中国古代传说中有“宋人”用“拔苗助长”的方法想人工地使自己田里的庄稼快些长起来，结果一转眼间他的麦苗反而死掉了，这是说自然界的变化

并不是那样“百依百顺”地可以任人随意“装扮”和“制造”的。中国古代的老子曾主张使人类社会恢复原始公社的某些状态，但原始公社终归一去不回。胡适死心塌地地拥护美蒋反动统治，但丝毫不能挽救美蒋的垮台。真麻烦，社会的“实在”竟是那样“顽固”，竟不肯成为胡适所幻想的那种“很服从的女孩子”！胡适并不是不曾苦心地努力来把他那主观上的“女孩子”“涂抹”过和“装扮”过，但是，真麻烦，胡适的纸上的“涂抹”和“装扮”竟丝毫也没有改变客观实在的本质，甚至于也不能改变客观实在的外形，中国人民始终看得出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狰狞的野兽面貌，并且已经用自己的力量把它打倒了。人民并没有因为胡适的“涂抹”“装扮”而把它们误认为漂亮的女子。

（三）用“经验”这字眼来掩盖的主观唯心主义

我们已经根据实用主义者所谓的“实在”这个概念，揭露了它和马赫主义是同样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对于这一个事实，胡适的拥护者丁文江曾公开承认过，他在一篇叫做《玄学与科学》的文章里说：“……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詹姆士、皮尔生、杜威，以及德国马哈① 派的哲学……以觉官感触为我们知道物体惟一的方法，物体的概念为心理上的现象，所以说是唯心。”并把这种唯心主义叫做“存疑的唯心论”（见《科学与人生观》上卷，该文，第12—13页）。意思就是说这是对于外界事物的客观实在性抱有怀疑态度的唯心主义。但是，胡适却不像他的徒党这样老实，他极力想掩盖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面貌。他跟着他的狡猾的美国老师杜威假装说实用主义不谈唯物唯心的问题。他举了杜威关于

① 马赫的异译。

“经验”的“见解”作为例子，想证明杜威对于唯心唯物的问题是采取了“以不了了之”的态度，并且还借此大捧杜威一顿，说杜威能把这样一类的问题撇开不谈，可算得“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大革命家！”可惜，胡适对于哲学的历史未免懂得太少了。实际上杜威并不是第一个这样的“大革命家”。以某种关于“经验”的见解为标榜来掩盖唯物唯心的区别的“大革命家”，在马赫主义者阿万那留斯的信徒中间早已出现过了。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一书里这样写道：“我们只能怜惜那些相信阿万那留斯及其一伙的人，他们以为经过‘经验’这个字眼就可以超越唯物论与唯心论底‘陈旧的’差别。”（《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76 页）杜威也正是企图经过“经验”这个字眼的把戏来使人们相信他真是超越了唯物唯心的区别的。杜威真的超越了这个差别吗？让我们来仔细研究研究罢。据胡适的介绍，杜威关于经验的见解，有以下几条：

“（1）旧派人说经验完全是知识。其实依现在的眼光看来，经验确是一个活人对于自然的环境和社会的环境所起的一切交涉。

“（2）旧说以为经验是心境的，里面全是‘主观性’。其实经验只是一个物观（应译作客观。——艾）的世界，走进人类的行为遭遇里面，受了人类的反动发生种种变迁。

“（3）旧说于现状之外只是承认一个过去，以为经验的元素只是记着经过了的事。其实活的经验是试验的，是要变换现有的物事；他的特性在于一种‘投影’的作用，伸向那不知道的前途；他的主要性质在于联络未来。

“（4）旧式的经验是专向个体的分子的。一切联络的关系都当做从经验外面侵入的，究竟可靠不可靠还不可知。但是我们若把经验当做应付环境和约束环境的事，那么经验里面便含有无数

联络，无数贯串的关系。

“（5）旧派的人把经验和思想看做绝对相反的东西。他们以为一切推理的作用都是跳出经验以外的事。但是我们所谓经验里面含有无数推论。没有一种有意识的经验没有推论的作用。”（《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第111—112页）

胡适还引用了杜威的话，把这几条做了一个简单的概括，说：“经验就是生活”，“经验不光是知识，经验乃我对付物，物对付我的法子。”（同上书，第113—114页）杜威的这些“见解”，乍看起来是很令人迷惑的。在这里，他把人和环境，主观和客观，过去、现在和未来，个体和周围的关系，以及思想等等，这就是说，一切的一切，像煮大杂烩一般地全部搅在他的“经验”概念的锅子里，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掩盖了哲学上唯物论的路线和唯心论的路线”（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5页），就可以使人得到一个“以不了了之”的印象了。其实，杜威怎能掩盖得了？他又何尝是真的“以不了了之”的态度来对待唯物唯心的问题呢？他的这些“见解”里既然涉及到人和环境，主观和客观，我和物之间的关系，既然把经验解释做“我对付物，物对付我”的关系，就不能回避那划分哲学上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的根本问题：在人和环境，主观和客观，“我”和物两者之间，哪一方面是第一性的，哪一方面是第二性的呢？如果杜威把人的主观或“我”看做第一性的东西，而把客观环境和“物”看做是必须依赖人的主观为转移的东西，那么，不管他在表面上的样子是装得多么不偏不倚，而在实际上他仍然只是在唯心的路线上来解释经验，根本没有“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而事实上恰恰就是如此。为要证明这一点，首先我们不要忘记实用主义者对于“实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看法。实用主义者既然把

“实在”看做人的感觉和观念的复合，看做是任人随意“涂抹”“装扮”的“百依百顺”的“女子”，那么，他们对于客观“环境”或“物”（这当然是属于“实在”的范畴之内的）也就不会看做是不依赖人的主观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东西，而只能把它们也看做主观的感觉和观念的复合。所以，尽管杜威在表面上装得好像四平八稳地说经验是人和环境，主观和客观，“我”和“物”的“相互关系”，似乎是把两者平等看待的，然而在实际上他终归是按唯心主义原则把人和主观或“我”放在第一性的地位，而把客观环境或“物”看做主观感觉和观念的表现。为要证明这一点，我们不妨让杜威用他自己的话来供出他是如何了解“环境”这个概念。杜威说：“环境，换句话说，就是与个人的需要、欲望、目的和能力相互作用着以构成现有经验的任何的条件。一个人即使建筑一座空中楼阁，他也是与其在想象中所构成的对象互相作用着。”（见美国拉特纳尔编《杜威的哲学》选集，1939年纽约版）这些话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杜威没有把“环境”看做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而在外界独立存在着的客观条件，而仅只是在与人的（而且是“个人”的）主观需要、欲望、目的和能力等相互作用中才能存在的条件，它的存在是从属于个人的主观的；而经验则是与人的主观幻想中的“空中楼阁”在原则上相同的东西。这还不够明白吗？这不是主张客观环境依赖人的主观为转移吗？这不是把人的主观或“我”当做第一性的东西而把客观环境或物当做第二性的东西，也即是当做感觉和观念的表现吗？这不正是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站到唯心主义方面去了吗？十七世纪的巴克莱主张“存在即被知觉”，阿万那留斯主张“自我和环境”是“不可分离的”“原则的同格”（参看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第一章第三节），杜威的话和这不都是一模一样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说教吗？杜威何

尝真的是“以不了了之”的态度来对待唯物唯心的问题？何尝能超越哲学上的两种根本路线？他对经验的故作玄虚的“见解”，不过只是掩盖着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路线罢了。

什么是经验？对于经验这个概念的了解，哲学史上从来就有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唯物主义者说，经验是人们从外界事物获得的感性知识，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感性认识。辩证唯物主义首先肯定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外界事物的存在，从而指出经验只是这些外界事物通过人的实践过程在人的感性认识上的反映。辩证唯物主义的这种对于经验的了解，是完全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是一切真正具有科学头脑的人和具有革命的社会实践经验的人所必须承认的。与此相反，唯心主义者却说，人的感觉经验仅仅是人的主观范围以内的东西，人们决不能够经过自己的感觉经验来反映或认识任何外界的事物，外界事物的存在根本就是有问题的。“人除了经验以外并没有什么东西”，这是主观唯心主义者费希特的话；“在纯化了的‘完全经验’内没有‘物理的东西’”，这是主观唯心主义者阿万那留斯反对唯物主义的宣言（以上参看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第三章第一节）所以照唯心主义者的看法，经验纯然是人的主观感觉，并不是任何外界事物的反映，从17世纪末英国的巴克莱起，一直到20世纪初的马赫主义者，反复散布着这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论。上面所引的杜威关于经验的见解，虽然狡猾地极力避免明白讲出这种谬论，然而在它的第四条里，它反对“旧式的经验”把“一切联络和关系都当做从经验外面侵入的”，这就终于露出了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马脚。既然认为“一切联络关系”（当然包括人对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我”和物的关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等等）都不是“从经验外面侵入的”，而只是经验本

身内部的事，那么，包括在杜威的这些“联络和关系”中的所谓自然和社会环境，客观的事物，过去、现在和未来等等东西，就都只能是人们主观的内省经验的一部分，而不是客观独立存在的外界事物了，这不又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铁证吗？杜威何尝“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陈旧的’的区别”，他最多只不过玩弄了一些名词上的新花样，而在实际上还是重复了两百年前英国主观唯心主义者巴克莱的陈腐不堪的反对唯物主义的滥调！

三、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认识论

（一）反映论和不可知论的对立

前面说到对于经验的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的看法上的斗争，实际上已涉及到了认识论的问题。唯物主义不但肯定物质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客观存在，而且肯定物质是感觉、观念或意识的来源，而感觉、观念或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肯定物质世界及其发展规律能够为人们所认识，肯定它们的可知性。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根本观点，也叫做反映论的观点。这也是真正的科学所要遵循的认识论观点。凡是真正的科学的研究，不管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总是以这反映论的观点为认识论的基础的。科学的理论知识，就是自然界或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的反映。真正有科学头脑的人，在他们热心地从事研究自然界或社会现象的时候，他们就要深信自然界或社会的发展规律能够经过科学研究而为人所认识所掌握。我们之所以对于科学的研究予以高度的重视，就是因为科学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自然界和社会发展规律，使我们有可能依靠和利用这些规律知识，在自己的实践行动中，在生产建设，阶级斗争等等的行动中获得胜利的成就。中国

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向导，认识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就能够正确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既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正在逐步获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和以上所说的完全相反。它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认识论。

实用主义者把“实在”看做是由感觉和观念所构成，否认了在感觉和观念以外独立存在着的客观实在，认为对于感觉和观念以外的客观实在至少是应该抱“存疑”的态度，这就是说，至少要把它看做是我们的感觉所不能达到的，因此我们对于它的真相是毫无所知的。这样，他们就不承认任何能够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知识。杜威对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观点，是毫不隐蔽地表示了他的敌对立场的。在他到中国来作的“五大演讲”中“思想之派别”一讲里，这样说：“照从前的讲法，把人人的知识看做一面镜子，把‘实在’照下来便是。”这样的“讲法”他认为是不对的，并且提出他的相反的主张，说：“知识并不是镜子，而是有用的东西，各方都用得着”，又说：“感觉理性，都是帮助有机体的生存能力……思想知识……是应用的东西，不是照实在的镜子”。自然，杜威所说的那种“从前的讲法”，是属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这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认识当然有它的缺点。主要的缺点就是，它没有注意到人类的社会实践对于人的认识的重大作用，即没有注意到人们对于外界事物的认识是通过实践获得的。所以人的认识决不是简单地像镜子那样静静地反映外物，而是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反映外物。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观点，这样的观点才是完全正确的，而形而上学的唯物

主义说知识仅仅像一片镜子，则无疑地有缺点。但是，尽管有着这样的缺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镜子”的比喻，仍有它正确的一面，那就是承认客观事物在主观认识领域里的反映，也就是承认了反映论，只就这一点来说，却是和辩证唯物主义相同的。而杜威所反对的，正是这正确的反映论观点。实用主义者不但否认一般的思想知识是“照实在的镜子”，而且即使是科学知识，由实用主义者看起来，也并不是客观事物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反映，而只是一些人们主观地虚构出来的“应用的”工具。胡适说：“（一）科学律例是人造的，（二）是假定的。”大家看看吧！口头上经常挂着“科学”两个字的实用主义者，却这样无耻地来糟踏科学！真正爱护科学的人，怎能忍得住不想狠狠地打这些用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来鱼目混珠的文化奸商的耳光！科学是什么？列宁曾经说：科学的宗旨就是提供宇宙的真正的写真。科学就是研究客观世界一切事物发展规律的学问。自然科学，就是研究自然界一切现象的客观发展规律的学问。“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底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5页）正如前面已说过的，科学的研究，就是建立在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能够为人所认识这一个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之上的。在真正科学的领域里，没有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立足的余地。斯大林说：

“世界及其规律完全可能认识，我们对于自然界规律的那些已由经验和实践考验过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知识，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之物，而只有现在尚未认识，但将来却会由科学和实践力量揭示和认识之物。”（《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

年版，第699页）

所以，科学知识决不是“人造的”和“假定的”，决不是主观的虚构，而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知识”。科学知识之所以成为这种确实的知识，是因为它经过了或者经得起人类社会实践的考验。自然的和社会的科学知识在我们的实践——生产活动、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等——的基础上产生，并且又指导我们的实践获得胜利，这就能证明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性。恩格斯说：“既然我们能够用亲自制造出自然界某一现象、依这现象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的事实，来证明我们对于这一现象理解的正确，那么康德所说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2页）所以，自然科学的知识，由于通过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检验，就证明了它是反映自然界发展规律的具有客观真理性的知识。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之能正确地反映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反映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斗争的规律，反映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获得胜利的规律，这是在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长期实践斗争中已经反复地获得证明，并且以后一定还要不断地获得证明的。

（二）认识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

所以，人类的认识，毫无疑义地是客观现实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里的反映。自然，人类的认识也常常有错误的，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形下都能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事物的真面目。只有经过人类的社会实践和科学实践检验过的科学知识，才是能够全面地和深刻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认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类对于客观现实事物的认识，并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而是在实

践过程中不断地获得的。认识是与人类的社会实践联系着的不断地发展的过程。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类不断地获得更多的自然界的知识；随着生产活动，阶级斗争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类不断地获得更多的关于社会发展、革命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规律的知识。人类对于客观现实事物的认识既然是在实践过程中获得的，因此人们的认识的内容，认识反映客观现实事物的正确性、全面性和深刻性，归根结底都要受到实践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就是生产发展的规模以及阶级立场等等的限制。例如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在生产还处在小规模的农业和手工业阶段，而没有任何大工业的时期里，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就受到很大的限制，自然科学的研究就不能够顺利发展。又例如在阶级社会里，剥削阶级对于社会的认识就不能不受到他们自己的剥削者地位的限制，就不能不从他的阶级利益出发而产生种种偏见，就要错误地把剥削制度看做永久不变的制度，就要把剥削者的统治秩序看做天经地义。实用主义者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使他们不愿意看见资本主义制度已走向灭亡的客观现实和客观规律，使他们进而在哲学上捏造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来企图抹煞客观现实和客观规律。所以，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处的地位，人们的阶级立场，是决定人们能否正确地反映、认识客观现实事物和推进自己的认识的一个最主要最根本的条件。只有在社会实践中经常站在先进的地位，站在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的地位上的人，才能够对于周围的客观现实事物及其发展规律获得正确的和日益全面、日益深刻的认识。

感觉和理性都是人的主观意识反映客观现实的形式，是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两个阶段。毛泽东同志说：

“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

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1—262页）毛泽东同志又说：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2页)

所以,不论感觉和理性,都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虽然反映的正确性、全面性和深刻性有种种情况的不同,但决不像实用主义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人们主观虚构的“应用的东西”。认识是要为实践服务的,但认识要能为实践服务,首先它必须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只有掌握了反映自然界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知识,人们才能够为生产活动、阶级斗争、被剥削被压迫群众的革命运动,社会主义的建设等等实践行动规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计划、方案,才能够指导实践获得成就。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做什么?》,《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6页)这是说,首先要有正确反映社会和革命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才能使无产阶级的斗争成为自觉的革命运动。感觉是人类认识反映外物的第一步,认识必须从感觉和印象的阶段即感性认识的阶段开始,但只有理性认识才能到达于事物的全面的,本质的内部联系,才能反映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性,才能为人

类的社会实践行动指出明确的方向。所以,“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2—263页)由认识的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的过程,是在实践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反复出现,不断地服务于实践,并且受到实践的检验的,而人类的认识就这样永不停息地向前进步,向前发展。这一切,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的一些基本原理。

(三)实用主义曲解实践和认识

当实用主义者说到经验就是“一个活人对于自然的环境和社会的环境所起的一切交涉”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发生一种混淆不清的印象,以为实用主义好像也在宣传实践,并且也和辩证唯物主义一样地主张人类在实践中获得认识,因而模糊了它的主观唯心论的真面目。胡适介绍杜威的“知识论”时还说了这样一套话:“处处是‘行’,处处是‘知’;知即从行来,即在行里;行即从知来,又即是知。”(《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卷2,第136页)像这一类玩弄名词的把戏,对于缺乏科学分析头脑和革命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是有很大迷惑作用的。但这一切在实际上都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毫不相干,相反地,这只是更进一步地证明了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性质。这一套术语和中国四百年前的主观唯心主义者王阳明的说法简直是一模一样的。唯心主义哲学也常常侈谈人类的行动问题和知与行的关系问题,这并不是从实用主义才第一次开始,哲学史上早已大有人在了。但是,正如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里所批判的那样,唯心主义哲学所涉及的人类行动的概念,“只是抽象地发展了的,因为唯心论当然不知道真正现

实的、感性的活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71 页）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条批判原则，也完全适合于实用主义。要注意，实用主义者讲到人和环境的“交涉”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是“一个活人”对环境的交涉，即仅仅看做个人的行为。实用主义者讲到“行”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是“应付的行为”，是“我对付物，物对付我的法子”。这就是说，实用主义者是站在个人主义的立场上来看人们的行为，把人的行为看做一个个孤立的个人“应付环境”的活动。这里，实用主义者从人的行为的概念中抹煞了社会实践的内容，抹煞了关于社会生产，关于阶级斗争的观念。我们知道，人们的生活都是社会的生活，实践是社会的实践，任何个人的行为都是与一定的生产条件和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着的。生产是人类生活的决定条件，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反动的剥削阶级的行为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和反对压迫和剥削的阶级斗争，则是推动历史前进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决定力量。超乎一定的社会生产条件和超乎一定的阶级斗争的范围之外的抽象的个人活动，在现实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实践的正确看法。实用主义者和一切唯心主义者同样地从人的行为里排除了以上这些“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内容，因而就虚构了这样的情景：好像个人的活动并不是被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活动，相反地，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倒像只是一件件个人的“应付的行为”的积累。这样一来，历史就成为一大堆个人的“应付行为”的偶然堆积，在历史里面就找不到任何必然的秩序，任何客观发展规律。其中一件件个人的“应付的行为”都成了纯主观的随意的活动。这些活动——就像胡适所介绍的詹姆士的说法那样——首先是由人的主观的“兴趣和意志定下选择的

目标，有了目标方才从已有的经验里面挑出达到这目标的方法、器具和资料。”（《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卷2，第93页）个人的主观的“兴趣和意志”是第一性的东西。不是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阶级地位决定人的行动方向，而是个人的偶然触发的“兴趣和意志”引起人“的应付的行为”，这就是实用主义者对于人的行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曲解。这样的曲解把一切人的行为都笼统地叫做“应付的行为”，抹煞了人的行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抹煞了反动派的腐朽残酷的垂死挣扎行为和广大人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革命的正义斗争之间的原则的区别，抹煞了不同阶级的人的行为之间的是非善恶的客观标准，这不是很明显地反科学的和反革命的思想么？

实用主义既曲解了“行”的意义，抹杀了它的社会的实践的内容，同时也就曲解了“知”的意义，否定了人的认识的客观内容。辩证唯物主义者说，人们在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中首先对于外界事物获得感性认识，由感性认识再进一步又获得反映外界事物的客观规律性的理性认识。实用主义者却说，人们只是作为个人在“应付环境”，而“环境”又仅仅是在与人的主观“需要、欲望、目的和能力”等相互作用中才能存在的一些条件。在每一次“应付的行为”中，人们只是“挑选”了一些用来使主观的“兴趣意志定下的目标”获得满足的一些应用的“方法、器具和资料”，而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实用主义也讲到“知识”和“思想”，甚至于也强调“知识”和“思想”的重要。但是，什么是实用主义者的所谓“知识”和“思想”呢？实用主义者说，“知识”和“思想”也只是一件件人造出来的“应付环境的工具”，并不是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认识。所以，当胡适说到“知即从行来，即在行里，行即从知来，

又即是知”的时候，他是把“知”和“行”混淆起来，把“知”简单归结为“行”，归结为“行”的“工具”，而取消了人的认识。实际上实用主义者是在宣传蒙昧主义，是在向人类的真正的知识和思想进攻。实用主义者向人类的知识和思想进攻的手法是这样的：他们首先以经验主义的面貌出现，假装做重视经验，重视“具体的事实”的样子来向理性进攻，来向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性的理论知识进攻。詹姆士把一切“通则哪，定理哪，范畴哪”，一概叫做“抽象的东西”，把这些比做“妖魔鬼怪的名字”，声称要把注意之点移到“最后的物事”，移到“事实”和“效果”上面。杜威把“经验和思想看做一件事”，反对把一切推理作用看做“跳出经验以外的事”，主张“经验里面含有无数推论”，“思想乃应付环境的工具”。胡适把他的美国老师的这些反理性的思想贩运到中国来，标榜只应该注重一个个“具体的问题”，“具体的事体”，“具体的主张”，而“不承认根本的解决”。他反对“多谈”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理”和“主义”，反对人们学习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科学理论知识，并依靠这些知识来谋求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也就是反对科学理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阻碍人民走上自觉的革命斗争的道路。实用主义者既在重视“经验”和“事实”的名义之下来把理性认识和科学理论知识一笔抹煞之后，又反过来对于“经验”和“事实”也给与主观唯心主义的曲解，把“经验”解释成主观的偶然的应付的活动，把事实硬说成可以任人随便摆弄，随便“涂抹”和“装扮”的东西，因而从经验里也找不到任何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仍然只剩下一些“人造的”和“供人用的”应付的“法子”。归根结底，一切的认识，不论感性认识或理性认识，一切真正的知识，不论经验的知识或理论的知识，一概加以否定，一概曲解作人们依据主观的“兴趣和意志”所选择

出来的“应付环境”的工具！实用主义者就是这样来向人类一切真正的知识和思想进攻的。这种进攻的目的非常明显，它不外是要想使人的认识混乱，分不清什么是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真正的知识和思想，什么是资产阶级及各种反动势力为着自私的目的“挑选”作欺骗人民和“应付环境”的“工具”的种种虚构和谎言，使人们容易把虚构和谎言误认为真正的“知识”和“思想”，因而便利他们在“科学”的假招牌之下把一切思想的毒品拿到市场上任意销行。

四、抹煞真伪标准的真理观

（一）实用主义主张主观真理，否认客观真理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指明认识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里的反映，认识的正确与否，决定于它的内容通过实践的检验之后是否能证明它是如实地反映了客观存在的现实事物，是否符合于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性。我们说：我们的革命干部的工作经验是正确的，这是说这些干部的经验如实地反映了一定部门和一定环境的客观事实情况和工作的情况，我们说实用主义所侈谈的“具体事实”是错误的，是因为他们所谓的事实（例如，说旧中国之所以贫弱是由于自己的“祖宗造孽”的结果，而不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不是如实地反映了客观存在的事实，而是依照他们的主观愿望和目的（帮助帝国主义者来“应付环境”，掩盖它的侵略的罪恶），随便拉扯，随便摆弄出来的一些仅仅是写在纸上的“事实”。我们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正确的，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如实地反映了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被压迫被剥削群众斗争的规律，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

律等等。我们说实用主义者胡适认为中国社会两千年来都没有封建制度的存在是完全胡说，这是因为他这种胡说完全违背了中国历史的客观事实及其发展规律。所以，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反映论的正确观点来看，是与非之间，真理与谬误之间，是有着明确的、严格的客观标准的。人的主观认识能够符合于客观事物及其发展的内部规律性，这就是具有真理性的认识，否则就是谬误。凡是具有真理意义的知识，它所包含的内容必定是具有客观性的。只有客观的真理，没有主观的真理。这些原则，是一切具有真正科学头脑的人都承认的。

实用主义者的“真理”观，恰恰和上述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看法完全相反，他们把“真理”看做纯主观的东西。实用主义者否认了任何能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知识，把人的认识——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看做仅仅是人们主观地虚构出来的“应付环境的工具”，因此，在他们的眼中，一种知识是否具有“真理”的意义，就不是决定于它是否能够如实地反映客观现实。他们根本就不承认，至少是怀疑客观现实的存在，所以也就完全谈不到反映客观现实的问题。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一种知识、思想能否帮助他们达到按照他们的主观要求来“应付环境”的目的。能够对于他们“应付环境”的主观目的收到“效果”的，他们就叫做真理，否则他们就认为是错误。这就是说，他们不承认是与非之间，真理与谬误之间有任何客观的标准。他们把真理与谬误的标准完全看做主观的。胡适说：“真理不过（!）是对付环境的一种工具。”（《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第81页）又说：“我们现在且莫问那绝对究竟的真理，只须问我们在这个时候，遇着这个境地，应该怎样对付他：这种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便是‘这个真理’。……这个真理是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所以他若不能对

付，便不是真理；他能对付，便是真理”（同上书，第 82 页）。在这样一种反动腐朽的观点之下，科学真理的客观性也被抹杀了。科学的真理，在实用主义者看起来，也并没有反映了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只是人们在主观的应用上认为最方便的一时公认的假设。“科学律例不过是一些最适用的假设，不过是现在公认为解释自然现象最方便的假设”，“(一)科学律例是人造的，(二)是假定的，——这全靠他解释事物能不能满意，方才可定他是不是适用的。……实验主义……只承认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他能不能发生他所应该发生的效果。”（同上书，第 77、79—80 页）所以，在实用主义者看来，一种思想是否科学真理，是决定于它是否被人们“现在公认”为“最方便的假设”这一个主观的标准。按照实用主义的这些荒谬观点说来，科学知识和神话迷信以至于谣言诽语之间，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并且甚至可以互相等同起来了。神话迷信如果一旦被人们“现在公认”为“最方便的假设”，被人看做“应付环境”的“有效”工具，实用主义者就一定要把它当做“真理”看待。反之，即使是正确反映了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如果对于实用主义者的种种卑鄙无耻的行为、企图有所不便时，他们就要厚着脸皮来否认它的真理性。如果按照实用主义者的这一套谬论来看，那么，“指鹿为马”对于赵高有“应付环境”的功效，实用主义就要说把鹿当做马看待就是真理；詹姆士认为上帝存在的观念可以帮助反动资产阶级达到他们“应付”劳动人民的目的，于是上帝存在的观念也就被认为是真理；胡适说旧中国之不好，是由于自己凭空“闹鬼”，——即他所谓的“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等“五鬼”（《我们走那条路》，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 441—442 页），说这些鬼都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带来的，这些“假设”有效

地取得了反动势力的垂青，所以也可以算是“真理”了。反过来说，一切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真实情况的知识，如果对于实用主义者的“选择的目标”的实现有所不便时，那么，不论是经过千百遍实践证明的科学的真理也好，不论是小孩子也能懂得的明明白白的健全常识也好，实用主义者一概可以闭着眼睛不承认它的真理性。上面所举胡适对于中国政治的种种谬误看法以及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仇视态度，都可以作为证明，用不着我再重复，读者可以自己体会了。

由此可见，实用主义者捏造这种抹煞客观真伪标准的“真理”观，原来也正是为着要使它成为反动派用来抹煞革命真理，任意“涂抹”现实，任意捏造谎言这样一种“应付环境的工具”罢了。

（二）抹煞了科学真理和主观虚构的界线

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里曾十分狡猾地谈到了“真理就是同‘实在’相符合的意象”这样一个说法。这一个说法是颇有混淆和迷惑作用的，因为，如果仅仅把这一句话孤立起来看，而不进一步研究实用主义者对这句话的内容如何曲解，那就会觉得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好像也是合理的，并且好像和唯物主义的真理论很难区别。问题在于怎样叫做“实在”，怎样叫做“符合”。如果把“实在”解释为“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如果把“符合”解释为正确地“反映”或“模写”，那么，这一句话就是表述了唯物主义的真理论了。但是，实用主义的解释却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已经说过，实用主义者的所谓“实在”，并不是指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而是主观的感觉和观念的复合。至于“符合”又怎样解释呢？胡适说实用主义者反对“真的意象就是实在的摹本”的说法，也就是反对把“符合”解释为正确地模写或反映，而认为“符

合”“不是临摹实在，乃是应付实在，乃是适应实在”，所以，当实用主义者说到“真理就是同‘实在’相符合的意象”的时候，他们仍然是把真理曲解做“应付环境”的工具，不但没有任何反映论的意味，而且是与反映论完全相反的。

为着更深刻地揭发实用主义的“真理”观的主观唯心主义面目，我们还应该把它所谓的“应付实在”或“适应实在”的内容作进一步的分析。关于这一点，胡适曾介绍了詹姆士的一种解释：詹姆士说真理有一种所谓“摆渡作用”，又叫做什么“媒婆作用”。什么叫做“摆渡作用”呢？詹姆士说：“如果一个观念能把我们一部分的经验引渡到别一部分的经验，连贯的满意，办理的妥帖，把复杂的变简单了，把烦难的变容易了，——如果这个观念能做到这步田地，他便‘真’到这步田地，便含有那么多的道理。”（《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第 99 页）所谓“媒婆作用”又是怎样的呢？这就是说：“一个新的观念就是一个媒婆，他的用处就在能把本来已有的旧思想和新发见的事实拉拢来做夫妻，使他们不要吵闹，使他们和睦过日子。”（同上书，第 100 页）这个“摆渡作用”和“媒婆作用”的说法向我们证明以下几件事：1. 实用主义者认为真理不过是经验与经验、观念与观念之间的联系。按照实用主义的看法，经验也不过就是观念和感觉一类的东西，所以真理也无非是主观的感觉和观念之间的联系，这里当然没有任何客观事物的反映的意思。前面第二章我们曾指出，杜威也讲到经验里面便含有无数连络，无数贯串的关系，并且说这些关系不是来自经验以外。这和詹姆士的说法正是一脉相通的。2. 实用主义者并不是说任何一种感觉和观念之间的联系都是真理，而是说某种稍微特殊一点的联系才可以叫做真理：即能够“把复杂的变简单，把烦难的变容易”。这里我们看到了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

一书里所批判过的“思维经济原理”或“费力最小的原理”的再版。马赫主义者把“思维经济原理”作为“认识论的基础”，他们宣称哲学应该是“按费力最小原理的世界思维”。他们把感觉当做惟一的“实在”，抹煞了客观事物的存在，抹煞了感觉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这样的看法他们认为就是符合着“思维经济原理”，符合着“费力最小的原理”的。这也就是说，真理的标准是在于能否使我们少费一些脑力，少用些思索工夫，而不在于它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具有真理性的思想就是尽可能少用脑子的思想——这就是马赫主义“思维经济原理”的古怪意义。实用主义者的把“复杂的变简单”、“烦难的变容易”的说法，和“思维经济原理”不是“如出一辙”吗？但是，难道科学真理的任务真的只在于使我们的思维“费力最小”，只在于把“复杂的变简单”，“烦难的变容易”吗？当然不是这样！我们看，列宁只简单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暴露了“思维经济原理”是如何站不住脚：“‘设想’原子是不可分割的‘经济些’呢，还是‘设想’原子是由阳电子与阴电子所组成的‘经济些’呢？”（《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98 页）我们也可以向实用主义者胡适提出同样的问题：设想中国自己本身凭空闹五鬼“简单些”和“容易些”呢，还是设想这些鬼都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密切联系“简单”和“容易”些呢？很显然，只设想原子是不可分割的，自然比设想原子是由阳电子和阴电子所组成的更“经济”些，更少费脑筋些，但这更经济些的想法，并不就是真理。设想中国自己凭空闹“五鬼”，自然比设想五鬼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造成更“简单”和“容易”些，但这更“简单”更“容易”的想法却并没有“连贯”成真理。所以，这一些问题的回答，就完全可以证明什么“摆渡”和“媒婆”的怪论都和真理的本质是全不相干的。

3.“媒婆”的奇谈把真理的发现看做是新旧观念的调和，而不是新旧观念的斗争，这也证明实用主义的真正目的其实是要想把黑白扰乱，使人是非莫辨，真伪难明，并不想认真指明什么是科学真理。旧思想既是“本来已有”的，那么，在“新发见的事实”出现之后，就应该加以抛弃，为什么还要把两者“拉拢来做夫妻”呢？这在逻辑上是完全不通的。这种新旧调和论又具有着庸俗进化论的特点，在后面我们还要加以阐明。

实用主义的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观，抹煞了真伪的客观标准，把科学的真理和主观的虚构混淆不分，并由否认科学真理的客观性，进而把科学真理曲解成为主观的信仰，由此建立起走向宗教迷信的桥梁。胡适说：“科学的律例不过是一些最适用的假设，不过是现在公认为解释自然现象最方便的假设。”“律例不过是人造的假设用来解释事物现象的，解释的满意，就是真的。”在这里，实用主义者把已经被证明为客观真理的科学定律和尚待证明的科学假设混淆起来，又把科学的假设和非科学的主观虚构混淆起来。科学的定律，待证的假设和非科学的虚构之间，在实用主义者的眼中，并没有什么性质上的区别，仅只有程度的不同。在他们看来，科学律例之为科学律例，并不是因为它已被实践或实验证明为客观真理，而只“不过是”因为它被“现在公认”为解释自然“最方便”的假设。这样的看法，的确是应用了主观唯心论的“思维经济原理”或“复杂的变简单”、“烦难的变容易”的原理了。但是，这样一来，如果实用主义者听见过去的中国人说：我们“现在公认”“天圆地方”是“解释自然最方便的假设”，或者听见欧洲中古时代的人说：我们“现在公认”“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为“解释自然最方便的假设”，他们就必须要承认，这些非科学的虚构也应该被看做科学规律了！胡适自己举了类似的例子来

说明他的这个见解，他提到古来的三种解释地球和日月的关系的“假设”，第一种是主张日挂在天上，跟着天旋转。第二种主张地球是中心，日月绕地球旋转。第三种是哥白尼的地球绕日的学说。他抹煞了前两种与第三种的本质区别，即非科学的虚构观念和多少正确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假设之间的区别，把三者都看做同样是“人造的假设”，而第三种之所以能成为科学规律，只不过是“把行星的运行说的最圆满，没有别种假设比得上他”罢了。

（三）把信仰主义“装扮”为科学

这里我们找到了一个似乎非常矛盾而难于解决的问题的秘密。为什么主观唯心主义者也竟然会表示赞成科学？为什么作为主观唯心主义者——实用主义者的胡适，竟以科学的拥护者自居，甚至还敢于引述中国六朝时代杰出的唯物主义者范缜的言论，公开谈到无神论，反对灵魂不灭的思想，否认上帝存在的观念？在《科学与人生观序》里，胡适还提出一套什么“自然主义的人生观”（《胡适文存》卷二，第27页），说到“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同上书，第26页）。这一类仿佛是科学的和唯物主义的言论，在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中间是能起很大的迷惑作用的，如果把这些言论的表面词句孤立起来看，而不注意到它从实用主义者胡适的口中说出来时所表现的真正实质，那人们也许会把胡适误认为唯物主义者和真正的科学的拥护者了。但如果我们真的这样想，那就大大地受骗了！原来胡适在谈到“无神论”，反对灵魂不灭和上帝存在的观念等等的思想时，他并没有把这种思想和有神论、灵魂不灭等等思想从根本上划清界线，并没有把前者看做具有客观性的科学真理，而把后者看做宗教迷信的主观虚构，相

反地，他把两者同样都看做仅仅是人的信仰，而后者仅仅是由于“现在”“证据”较多，更值得信仰，这就是说，这些“信仰”究竟是不是真理，还不能绝对加以肯定，如果一旦前者也找到了更多的证据，那也可以放弃后者转而相信前者的。胡适说：“我们如果深信现有的科学证据只能叫我们否认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不灭，那么，我们正不妨老实自居为‘无神论者’。……等到有神论的证据充足时，我们再改信有神论，也还不迟。”（同上书，第15页）所以，实用主义者胡适谈到“无神论”等等名词时，并不表示他已坚决否定了有神论，正如他并没有真正肯定“无神论”是客观真理一样。

所以，当胡适在夸夸其谈地谈到无神论，谈到要反对灵魂不灭和上帝存在的观念时，他并不是要拥护科学和拥护唯物主义，并不是要反对信仰主义和反对宗教。恰恰相反，他只是要借此取得一套科学的假面具，来“装扮”信仰主义，或者说，他是要把科学曲解成信仰主义，借此来偷偷地贩卖一种变相的、精巧“装扮”了的宗教。在《科学与人生观序》里，他甚至于在字面上也毫不隐讳地说他所宣传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我们在后面还要指出，在胡适的这个“宗教”思想里，尽管表面词句上说到要反对灵魂不灭和上帝存在的观念，但实际上却隐蔽地宣传着另一套变相的、精巧“装扮”的灵魂不灭说和上帝存在的观念。关于这一点，现在暂时不谈，现在只想提请读者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当胡适宣传他的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的时候，他十分羡慕中世纪宗教宣传的功效，妄想用他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这种“最高的宗教”来统一人们的人生观。他说：“宗教的功效已曾使有神论和灵魂不灭论统一欧洲（其实何止欧洲？）的人生观至千余年之久。假使我们信仰的‘科

学的人生观’将来靠教育与宣传的功效，也能有‘有神论’和‘灵魂不灭论’在中世欧洲那样的风行，那样的普遍，那也可算是我所谓‘大同小异的一致’了。”（同上书，第24页）请看，标榜拥护“科学”的实用主义者，要把中世纪的“有神论和灵魂不灭论”的传播方式当做自己追随学习的模范。这就很够暴露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腐朽性、反动性了！

主观唯心主义的“真理”观的反动面目就是这样：否认客观真理，把“真理”看做纯主观的，说“真理”只是应用的假设，于是进而把“真理”变成了宗教信仰！——这是实用主义从它的反科学的出发点必然要达到的反科学的结局，这难道还不够明白吗？有科学头脑的人必须坚持正确的唯物论的真理观：真理的认识是客观的反映，只有客观的真理，没有主观的真理。

（四）妄图取消绝对真理

还有，实用主义的所谓“真理”既然是纯主观的东西，因此也就同时是纯粹相对的东西。实用主义者认为，环境变了，新的事实被发现了，“真理”也要随时改变，但他们的出发点，在于把“真理”看做只是人们一时公认的“应付环境”最方便的假设。他们不承认“真理”的任何绝对的性质，而认为它是可以随着实用主义者——个人主义者的主观“公认”与否而随意改变的。胡适说：“没有绝对的真理，……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乃是这个时间，这个境地，这个我（注意——艾）的这个真理。”（《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第81页）这就是说，实用主义者所谓的“真理”，是依赖着实用主义者的主观——“我”为转移的，“我”认为方便的才是真理，我认为不方便的，哪怕是科学上证明了的千真万确的客观法则，“我”仍可以抹煞它的真理性。“我”可以

依着我认为方便与否这一主观标准来随意混淆黑白，颠倒是非，这就是实用主义者的“真理”观所必然要得到的逻辑上的结论，从这里可以看到相对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怎样分不开的。

人类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有着相对性，这决不等于说认识内容的真伪可以随着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愿望为转移。真理的相对性首先是由于人们的认识所反映的客观事物本身有相对性。客观事物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又那么复杂、多样化，彼此之间互相联系着、互相制约着，它们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都是相对的。而且，真理的相对性还由于人的认识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在客观上是受历史条件限制，在主观上是受肉体的和精神的组织限制。因此，“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2页）但是，第一，一定具体过程的认识的真理性虽然是相对的，却仍是客观的真理。它之所以是客观的真理，是由于它正确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而并不是由于它是“我”认为方便的假设。真理与谬误决不是依“我”的主观为转移，而要看它是否反映了客观现实。是非真伪的标准永远是在客观方面，这一点却是绝对的，任何时候也不能动摇的，任何时候也不是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实用主义者所能随便颠倒的。第二，真理的相对性既然首先是由于它所反映的事物发展的具体过程的相对性，因此，这里的相对性的意义，只是说我们的认识应该跟着事物的发展而发展，不应该停顿在固定的一点上，如果满足于现有的知识成就，不知道跟着新鲜事物的出现而努力求取新的知识，或者把对于旧事物的认识当做死公式来硬套到新事物方面，我们的认识就不免一定要发生错误。斯大林曾举出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能否胜利这个问题的例子，来说明真理的过程变化发

展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一切或大多数国家同时举行进击的条件下才能获得胜利。这个在十九世纪中期资本主义还在自由竞争时代的认识，在那时说来是正确反映了客观情况的真理。但是到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列宁根据他对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就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而得出了结论，说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说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单独一个国家里获得胜利。”（《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73页）如果在列宁的时期人们还要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在单独一个国家里胜利的旧公式，那么，虽然这个公式本来是反映一定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客观情况的真理，在这时也要变为人们的认识上的错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之所以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就是因为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一定历史过程中的具体革命实践互相结合起来，只知背诵书本上的现成原理，而不能认识具体过程中的特殊规律；就是因为经验主义者把只适合于一定环境条件的工作经验硬搬到不同的另外环境中去，不懂得随着新的过程和新环境条件的出现去努力寻求能够反映这些新的客观现实的新的原理原则和新的经验。所以，真理的相对性，决不能解释成为我们可以在自己主观上认为不方便的时候就随便抹煞一种科学知识的真理性。一种科学知识只要是正确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某一具体过程，它之符合于这一过程发展规律的客观真理性是任何时候也不容抹煞的。就这一点来说，它的真理性就具有绝对的性质。我们只能说当具体过程已发生变化时，这种科学知识对于新的过程就不能适用了，或者说应该把它补充、发展。就这一点来说，它的真理性才是相对的。因此，承认真理的相对性，决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因为它在已经改变

了的条件之下不适用，就能否认它之作为正确反映一定具体过程的客观真理，就能把已被实践证明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知识，又叫做谬误的东西。“真理变成谬误”，（参看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道德及法、永恒的真理》章）这话的意思，只是说当我们错误地对待这些知识的时候，当我们把它当做死的公式乱套到不相适应的过程上的时候，就会在我们主观上造成自己的认识的错误。这里也不容许实用主义者来颠倒是非。第三，真理的相对性既然还由于人的认识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受到一定的限制，那么，我们应当不相信什么奇迹，不相信某个天才的思想家能够预先为他的子孙万代想好了一切现成的答案。但人的认识能力是在发展着，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我们能够在自己的条件下创造性地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继续前进。例如，古希腊的思想家曾提出了物质构造的原子说，但那不过是种臆测，近代科学知道了物质可以分为极微小的粒子——所谓分子，而每一分子是由若干种化学元素结合而成的。在五六十年前，人们还只是把各种化学元素的原子看成不能再行分裂的物质构造的基本单位，而一种元素是不能转变为另一种元素的，但自从放射性元素发现以后，到现在人们已能用人工引起原子核的分裂，能使一种元素转变为另一种元素，并利用核分裂时所放出的能了。当然，原子核本身还是一个无穷的谜，等待人们一步一步地去更深入揭破。但绝不能说过去在物质构造问题上科学家的贡献都是谬误，而只能说人们现在已把过去发现的真理修正得更精确了。对于将来，也只有如此推论，才是合乎科学史的事实和趋势。又如胡适在《实验主义》文中所举的“两派新几何学”等例，决不是像实用主义者所说的，把原有的科学真理，如欧几里德几何等，变成了“一些人造的最方便的假设”，而只能说这些原有的真理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有限的一

面，也就是人们过去仅能认识到的一面。原有的科学真理中，反映客观事物不真实或不精确的部分被淘汰了，但正确的仍然保存下来，这是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实用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却别有用心地歪曲这类事实。第四，一定阶段上事物发展的具体过程虽然是相对的，但作为无数具体过程的总和的整个宇宙，却是绝对的存在。人类认识的发展也反映了这种客观情况，反映了一定的具体过程的认识虽然只有相对的真理性，但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反映总的宇宙的绝对真理。所以，与实用主义者的相对主义的谬论相反，世界上并不是只有相对真理，绝对真理也是存在的。相对真理中就具有着绝对的性质。反映一定具体过程的每一种相对真理，作为客观真理来说，它已经就是绝对的。并且它本身又是总的绝对真理的一个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也具有绝对真理的性质。

辩证唯物主义不承认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永远是具体的，“一切都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43 页）。但胡适所谓“这个时间，这个境地，这个我（注意——艾）的这个真理”，却只是主观唯心主义而已。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里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①，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见《胡适文存》卷二，第 148—149 页）这段话以及整篇的文章，目的是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用的手法是把真理的具体性和真理的普遍性对

① 这里是暗指马克思主义。

立起来。不但如此，他还把真理的普遍性歪曲为抽象的真理——他说："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同上书，第149—150页）

在真理面前，实用主义者胡适真是出尽了丑！

五、实用主义的庸俗进化论

（一）生物进化论不能解释人类社会生活

胡适声称实用主义是科学的进化论出现以后的产物，是进化论的成果在哲学上的应用，这是他用来迷惑人们的假面具之一。实用主义把反科学的主观唯心主义装扮成好像是符合于进化论学说的科学观点，标榜着用进化论的原理来解释人类社会和人类的思想和生活。所以，在我们批判实用主义，指出它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荒谬本质的时候，同时还必须揭破它假借生物进化学说的名义所制成的假面具。

我们知道，人类虽然也是一种生物，人类的出现虽然也是动物进化的结果，但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发展过程，决不能简单地用生物进化的规律来解释。人类从一开始就与一般生物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人类能制造工具，进行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人和人之间形成一定的与生产力发展情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即生产方式，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体系中决定社会面貌和社会性质的主要力量。随着生产力的向前发展，生产关系就会跟着发生变更。随着生产关系的变更，全部的社会关系，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都相应地发生变化。这一切发展变化的规律，都是动物以及任何其他生物的生活中所没有的，而仅仅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所以，人类虽然是由动物进

化而来，但已在本质上不同于动物或其他任何的生物。人类社会生活有自己特殊的本质和特殊的规律，决不能简单地归结到生物的进化规律之内。实用主义者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他们根本否认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抹煞了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规律性，但又骗人说可以用生物进化的学说来解释人类的思想和生活。实际上实用主义者这样做的时候，是既曲解了人类社会生活，也曲解了生物进化学说。他们挂着“生物进化论”的羊头，实际上是在偷卖“庸俗进化论”的狗肉。这种“庸俗进化论”的主要内容是：把人的生活曲解为盲目的“应付行为”，把事物的发展曲解为“一点一滴的进化”和一大堆偶然事件的凑合，把社会简单地看做个人生活的连续和堆积，并从这些谬论中引导出一种变相的宗教迷信观点。

实用主义者把人的生活、经验叫做“应付的行为”，把知识、思想和真理等等看做仅仅是“应付环境的工具”，硬说这就是应用了生物界适应环境的科学原理。我们很容易看出实用主义者在这里是如何蛮横地曲解了人类的知识和人类的生活。我们知道，人类的认识是客观实在的反映，科学知识反映着客观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性，人类掌握了正确的理论知识，掌握了科学的真理，就能预见周围事变发展的前途，就能使自己的实践行动成为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的行动，就能使自己的实践斗争——生产活动，革命斗争等等——战无不胜。人类这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行动，和动物的生活是有根本的区别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用蜜蜂筑巢和建筑师建筑房屋的不同作为例子，来说明动物生活和人类行动的这种本质的区别。他指出蜜蜂的巢无论筑得如何精巧，“但使最劣的建筑师都比最巧妙的蜜蜂更优越的，是建筑师以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他脑筋中把它构成了”（《资本论》第一卷，人

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92 页)。当然，人的这种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应以承认物质世界及其运动规律的客观存在为前提。人们要认识到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然后才能够利用这些规律知识来做出正确的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活动。如果人的行动违背了这样的原则，不去认识自然界或社会的客观规律，只凭主观的兴趣、愿望或各种虚构的想法随意行动，那就要犯错误，就要碰钉子，那就叫做主观主义和行动的盲目性。胡适一流的实用主义者——主观唯心主义者否认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存在，否认人的认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的反映，把人的知识看做“应付环境的工具”,这就是要把人引导到依靠主观妄想从事的盲目行动的错误道路上去。实用主义者把这种荒谬的看法硬说是生物适应环境的学说的应用，也是不通的。这种荒谬说法仅只是反映了实用主义者自己本身的思想和生活的腐朽性和反动性，只能作为对他们自己以及他们所拥护的反动派的思想和行为的一种讽刺！历史发展规律注定了一切反动派要走向灭亡，他们不敢正面认识，因此也就不敢承认周围事变的客观规律，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盲目的垂死的挣扎。因此他们需要寻求任何可以帮助他们苟延残喘的“应付环境的工具”，而实用主义者就替他们谋算起来，说可以把“经验”、“知识”等等当成这样的工具，于是他们就在这样的目的之下捏造了一套否认客观规律知识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论。但如果把他们的这一套思想行为拿来和动物比拟，那也许连动物也要受了委屈。动物适应环境的生存运动，是要改变自己的有机体的性质来适应自然界的一定的客观条件的变化，也就是自发地依循着一定的客观发展规律的。生物的适应环境的活动，决不会包含着实用主义者的那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妄想，决不会有那种想要把“实在”当做可以任意“涂抹”和“装扮”的“很服从的女孩子”的企

图。但实用主义者谈到"应付环境"的时候,却是抱着极端狂妄的主观唯心主义幻想的。实用主义者把生物进化论里"适应环境"的概念偷来作为自己的招牌,想借此把自己的各种冒险活动和捏造的谎言"装扮"成"科学"的东西,实际上生物适应环境的进化规律和实用主义者"应付环境"的主观幻想,是根本不相干的。

(二)社会发展不能片面地归结为"一点一滴的进化"

在阶级敌对的社会里,由于反动阶级利用政治统治的力量以及各种上层建筑的力量来巩固旧的生产关系,来阻碍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因此,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过程,旧的生产关系的消灭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过程,必须经过阶级斗争,必须经过革命阶级由下而上地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爆发的运动。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完全是符合辩证法的规律的。由生产力的发展进到生产关系的变革,由一种社会制度内部的逐渐变化进到社会制度的根本的改变,由日常的进化运动走向革命的爆发,而这一切变化发展过程,是通过矛盾运动,通过新旧事物的斗争和阶级斗争来实现的。中国革命胜利的过程,雄辩地证明了这一条真理。

实用主义者把人类的生活曲解为一件件个人"应付环境"的随意行为的堆积,于是就抹煞了上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抹煞社会制度由逐渐变化进入根本的质变,由进化运动走向革命爆发的辩证过程,抹煞阶级斗争和新旧事物斗争的矛盾运动。就在这样一种反科学的思想基础上,胡适散布了他所谓的"一点一滴的进化"、"一点一滴的改造"和"不承认根本的解决"的改良主义谬论(见《胡适文存》中《新思潮的意义》等文),并且硬把这些谬论也假装作科学进化论思想,以此做为招牌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当然,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在任何情形之下都反对改良,在

革命原则之下的一定的改良措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也是容许的。但胡适的“一点一滴的改造”的改良主义，却是完全反动的。人们知道，胡适的这种臭名昭著的谬论，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中国人民开始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封建统治的运动高涨起来的时候散布出来的。而他所散布的这些谬论，在政治上始终是把反对的锋芒针对着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在1919年他所写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第147—153页)，就是直接依据这种庸俗进化论观点来在政治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当时的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历史早已证明，在旧中国那种极端残暴腐朽的反动派统治下面，不进行革命斗争，就不可能使历史前进；在那样的情形下面，口头上讲一点一滴的进化，反对根本的解决，就是在实际上不要任何真正的解决，就是实际上根本不要进步。胡适自己的全部行动，都足以证明这种庸俗进化论思想的反动性和虚伪性。胡适在这些庸俗进化论的观点上所提出的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无非是叫人民不要进行阶级斗争，不要去触动反动统治，而只能向反动统治者去乞求“一点一滴”的改良，结局就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反动统治者去宰割，就是要取消和反对人民的革命斗争。

旧中国的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在事实上并没有依照胡适的公式前进，而是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前进的，所以，实际运动的主要形式不是“一点一滴的改造”，而是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并且随即又发展成为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在人民的革命声势面前，胡适害怕单只用“一点一滴的改造”这些口号容易遭到破产，所以有时也在一些文章中假装使用一下“革命”的字眼。在他的《白话文学史》的“引子”里和1930年写的

《我们走那条路》里，居然也谈到解决问题可以有革命的和“演进的”两条道路，并且甚至于假装自己也是赞成“革命”道路的。然而，什么是胡适的所谓的“革命”呢？胡适在标榜自己也赞成“革命”之前，先在“革命”这个字眼上玩弄了一套诡辩的手法，把革命和“演进”之间的本质的区别抹煞了。胡适说：“革命和演进只有一个程度上的差异”，“革命和演进本是相对的”，“革命往往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历史演进往往多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变化”（《我们走那条路》，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446、447页）。这样一来，“演进”和革命的客观上的本质的区别，即前者是逐渐的变化，而后者是根本的变革，前者是属于量变的范畴，而后者是属于质变的范畴这样一个本质的区别，就被实用主义者一笔抹煞了。在胡适的笔下，两者的不同就被看成仅仅是主观的东西：“革命”不过是“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已。这样的“革命”，在实质上仍然只是“一点一滴的进化”，这样来谈“革命”，有什么可怕呢？不过是“多含一点自觉的努力”而已，这里面并没有包含着“根本的解决”的意思！胡适就是玩弄了这样一套诡辩手法，把“革命”这个名词解释成对于实用主义者和反动派不再有任何危险的字眼，于是就有了胆量来把自己称为“自觉的革命”的提倡者，并在“自觉的革命”的名义下来反对“暴力革命”，即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的真正的革命。

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过程决不能片面地归结为不包含“根本的解决”的“一点一滴的进化”、“一点一滴的改造”的过程。说“一点一滴的进化”和“一点一滴的改造”就是科学进化论学说的应用，并且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应用，这更是荒谬可笑。人类社会的历史包含着阶级斗争的运动，生物界的进化过程里则不存在这个运动形式，所以要用生物进化的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变

化，首先就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同时，生物界的进化也并不仅仅是一点一滴的，生物的种类变化在实质上仍是一种质的飞跃，仍然是一种根本的变化，虽然生物界的这种飞跃主要是采取逐步过渡的形式，采取旧质逐渐消灭和新质逐渐积累的形式，但究竟也经历着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以，实用主义者的“一点一滴的进化”观是既曲解了社会生活，也曲解了生物进化规律，它并不是真正科学的进化论观点，而只是庸俗进化论的谬论。

（三）对于偶然性作用的极端夸大

胡适所散布的这种庸俗进化论观点，与真正科学的进化论学说还有一个根本不同的特点。这就是科学的进化论证明了生物界的运动发展有着一定的必然的客观规律，而实用主义者的“一点一滴的进化”观，则把发展看成一大堆没有任何秩序的事件的偶然凑合。

实用主义的这种偶然论的观点的荒谬性，在胡适论到个人的作用的时候，表现得特别明显。胡适曾把个人的偶然行为的作用加以极端的夸大，想借此来取消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说：一个人“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他也许‘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善亦不朽，恶也不朽；功盖万世固然不朽，种一担谷子也可以不朽，喝一杯酒，吐一口痰也可以不朽。”（《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第636页）从胡适的这一段话里，就很清楚地可以看到，实用主义者的“一点一滴的进化”的观点，不但抹煞了发展过程中由量变到质变，由逐渐的进化到根本的变革的规律，并且否认了任何贯串在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规律，而把偶然性看做支配一切的东西。

“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不承认根本解决”的反动政治观点，是和这种偶然性崇拜论的胡说密切联系着的。既然我们生活中找不到任何贯串客观事物发展过程的必然规律，而只有一个偶然事件凑集起来的茫茫大海，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任何有关周围事变的客观发展规律的科学知识，也就不可能设想要对周围事变发展的趋势做出任何的预见，也就是不可能依靠任何事物发展规律知识来给我们的行动规定明确的方针。这样一来，我们除了就“一点一滴”的眼前事件来作盲目的投机冒险活动之外，又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如果情形真是这样，那么，社会问题的根本的解决当然就谈不上了。而一切主张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义”、“学说”，都只能成为没有内容的抽象名词了。实用主义者就是这样依靠着庸俗进化论捏造出反对人民革命的理由。

很容易明白，这种偶然性崇拜的反科学的观点，也是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唯心主义否认了物质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就不能不把一切事物及其变化过程都看做偶然的东西。同时，把世界一切事物及其变化过程全看做偶然性的堆积时，就反过来又可以为不可知论——主观唯心主义作辩护。既然一切事物现象都是偶然的，那么人们对于客观事物规律的科学研究的任何希望都要落空了。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东西了！人们就仅仅只有依靠纯主观的意志和愿望来投机冒险，来盲目的“应付环境”这一条道路了！这样，实用主义者又依靠着庸俗进化论想把人引诱到反科学的道路上去。

这种唯心主义的狂妄胡说是经不起认真的驳斥的。不论科学的研究或革命的实践都可以充分证明，在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虽然存在着无数的偶然因素，并且对发展过程不断地给与种种的影响，但偶然因素的影响，对于过程的发展方向并不能起决定作用，

支配发展过程的东西究竟是必然的规律，偶然性在发展过程中只是作为必然性的补充，作为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它或者对必然规律给与若干阻碍，或者给与若干推动，但必然性总是通过了无数的偶然性而开辟着自己的道路。例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有一定的必然规律，人民一定要胜利和反动派一定要失败，就是目前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之一。在这样的历史的必然规律面前，就实用主义者和反动派的情形来说，不要说他们吐一口痰喝一杯酒不会有任何“不朽”的作用，就是像胡适那样以个人毕生的力量来帮助反动派欺骗人民反对革命的活动，因为违反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规律，结果还是要被革命人民所粉碎，就是现在还遗留的一些思想上的有毒影响，也终归要被人民清除得一干二净的。实用主义的这种偶然性崇拜论又不过是反映着接近灭亡的反动派希图依赖什么偶然奇迹来侥幸得救的那种盲目挣扎的绝望心理罢了。

（四）“社会的不朽论”——个人主义的宗教，变相的灵魂不灭思想

在这里，还需要对于胡适的这种偶然性崇拜论的反动性作一些进一步的分析。胡适用什么理由来夸大个人的偶然作用呢？这种夸大并不是建立在什么科学的进化论学说上面，而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曲解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曲解的主要点就在于，否认社会的基础是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把社会看做仅仅是个人的扩大，看做仅仅是“我”的扩大。个人被胡适叫做“小我”，而全人类社会则被胡适称做“大我”。“大我”就是无数“小我”的活动的简单的连续和堆积。“种种过去的‘小我’，和种种现在的‘小我’，和种种将来无穷的‘小

我’，一代传一代，一点加一滴，一线相传，连绵不断；一水奔流，滔滔不绝：——这便是一个‘大我’”。（《不朽》，见《胡适文存》卷四，第113页）为什么胡适要说个人的任何偶然行为都是“不朽”的呢？就因为他把社会看做个人生活的简单的连续和堆积的缘故。胡适说：“‘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远不死，永远不朽的。‘小我’虽然会死，但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过，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大小，无论是非，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胡适把这一套胡说叫做“社会的不朽论”。

这种所谓“社会的不朽论”，包括着以下的意义：

第一，说社会、“大我”是个人、“小我”的简单的连续和堆积，这就是把个人、“小我”当做人类社会的基础，把个人的行动当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就是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主观公式来曲解社会生活。这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社会历史学说所共同的早已陈旧了的观点。胡适——实用主义者正是妄想在“社会的不朽”观念的招牌下面来散布这种陈旧的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据这样的一种陈旧观点为基础的“社会的不朽论”，它的实际意义就是在于把社会看做永远按照个人主义的原则所组成，就是在于把个人主义看做天经地义，就是要想使人相信：一切人都是同样的“我”，既然同样是“我”，工人阶级就用不着和资产阶级划分界线，劳动人民就用不着和剥削阶段划分界线，就用不着阶级斗争和反映阶级斗争的新旧思想斗争了。不管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或任何反动派统治的社会都只是一个“大我”，都是永垂“不朽”的，社会的根本变革或资本主义制度的消灭，都是不能设想的。所以“社会的不朽论”，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阶级剥削制度的不朽观念。马克思主义老早

已彻底驳倒了这种资产阶级的历史观，指出人类社会不是简单的个人的集合。社会的物质基础，决定社会的性质和面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生产、生产方式。没有“不朽”或永久不变的东西，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变化，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社会制度由较低的阶段向较高的阶段发展，这是必然的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胜利，这也是必然的规律。一切阻碍发展，阻碍前进的陈旧的制度和思想，是一定要朽败，一定要在阶级斗争和反映阶级斗争的新旧思想斗争中被消灭的。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决定力量，推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产生和使整个社会制度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飞跃的决定力量，是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反对社会腐朽势力的阶级斗争，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力量，就是克服一切剥削阶级的反抗，保证社会主义建设获得胜利的决定力量。只有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参加在进步革命运动中的人们的活动，才能在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留下或大或小的不可磨灭的功绩，与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历史的前进运动没有联系的个人的偶然的行动，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会发生任何重要作用的。反对人民和反对历史进步运动的任何个人的反动行为，也必然要被人民的力量所粉碎。马克思主义者不否认个人的一定的作用，每一个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对于社会的进步都有一定的重要意义，而杰出人物在历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重大作用。但是，每一个劳动人民个人行动之所以有重要意义，是因为它和群众的集体斗争密切联系和完全一致的缘故。杰出人物的作用，是决定于他们的行动和思想对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否符合一致，对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制度的改变是否有所推进，对于劳动人民的解放是否能有所贡献，杰出人物的作用的大小，是以这些条件的圆满程

度来衡量的。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完全与历史的前进运动背道而驰的人，决不会成为历史上的真正杰出人物，而只能成为可耻的小丑，这样的人也许在反动派的统治下面由于因缘时会偶尔也会声名煊赫起来，但很快就会跟着社会腐朽势力的失败而一同归于破灭。实用主义者胡适自己就是这类小丑的一个例子。所以，胡适的“社会的不朽”和个人的偶然行为“不朽”的“观念”，是与人类社会历史的客观事实完全不相干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虚构，是为着宣传反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捏造出来的谎言。

第二，胡适的“社会的不朽论”，不仅仅是反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谎言，而且是用狡猾的方法为宗教迷信开辟道路的谎言。我们说它是最狡猾的，是因为虽然胡适在实际上宣传着信仰主义和宗教思想，甚至于公开地宣告“社会不朽”观念是“我的宗教”，然而在表面上却又装出一套好像在反对迷信，反对“灵魂不灭”的观念，甚至于反对上帝存在的观念和主张“无神论”的姿态。胡适自称早年曾受过中国六朝时代杰出的无神论者范缜的思想的深刻影响，因此否定了旧的宗教迷信里的灵魂不灭的观念。胡适的这一类狡猾的言论，迷惑了很多天真的知识分子，以为他真正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和科学世界观的拥护者，甚至于把他误认为唯物主义者。然而，事情的表面现象，不一定就直接等于它的实质，如果我们把胡适的“社会的不朽论”拿来作一番仔细的分析，就能够看出胡适只是在表面上利用了唯物主义者范缜的名义，在口头上装做反对“灵魂不灭”和上帝存在的观念的样子，而在暗中却偷偷地制造了一种变相的灵魂不灭观念和上帝存在的观念。它与“旧”的灵魂不灭观念和上帝存在观念的不同，只不过是抛弃了封建时代的旧形式，穿上了资本主义的新服装罢了。什么叫做“社会的不朽”?“社会的不朽”就是“大我”的不朽。而

所谓“大我”的不朽的意义，在前节我们已经分析过，那就是说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制度的不朽，阶级剥削制度的不朽。我们知道，一切宗教里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观念，关于神仙不死或天堂净土的观念，都不是别的东西，而只是现存社会制度的神化和理想化的表现。在封建社会时代，天堂的制度，就是以现实的封建制度作为模型设想出来的，封建时代的上帝、神仙之流的形象，都是按照封建社会的统治者的面貌塑造出来的。封建时代的上帝存在、神仙不死、天堂净土的观念，就是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神化和理想化的表现，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社会的不朽”观念。胡适在口头上否认了上帝、神仙和天国，但当他进行关于“大我”的“不朽”和“社会的不朽”的说教的时候，却是在事实上把个人主义者，把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偷偷地加以神圣化，偷偷地把这一切“装扮”成一种变相的上帝，神仙和天国。胡适在口头上反对灵魂不灭的观念，主张“小我是有死的”。但当他说到小我的一切细小的偶然行为——吐一口痰，喝一口酒——都“不朽”的时候，当他说“小我”的一切作为……无论是非，无论善恶，一一都永远留存在那个“大我”之中的时候，他又偷偷地在散布了一种变相的灵魂不灭的观念。这并不是什么新的手法，从来的唯心主义都制造过这一类变相的灵魂不灭的虚构：人的肉体是虚幻的，所以才会死的，但个人的肉体虽然死了，他的精神却会和普遍的理性、“绝对的精神”（即唯心主义的变相的上帝）等合一起来，胡适说任何一个“小我”死了都会把自己的一切言行永远留在“大我”中，正是这一种唯心主义虚构的改头换面的再现。唯心主义用这种变相的灵魂论要想来抹煞一个客观事实：即与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以及一切社会进步运动没有联系的个人的行为对于历史发展决不会发生任何

重要作用，一切反对进步运动的人们的反动行为都要被人民和历史的洪流彻底湮没。不仅如此，旧式宗教迷信有这样一种“因果报应”的观念，某个祖宗偶然做了一件错事，就要后代子孙代受惩罚。基督教的所谓“原罪”，也就是这一类的思想，由于人类的始祖偶然偷吃了“乐园”里的一个苹果，就使全人类子孙世世遭受上帝的惩罚。这种“祖宗造孽”的迷信思想，在胡适的“社会的不朽”观念的基础上也改头换面地再现出来。对于旧中国所受的各种灾难，胡适就是用这种变相的“因果报应”的观点来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见《独立评论一周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强占了我们的东北，胡适在一周年后所写的《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一文中，不是认真地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把谴责的锋芒对着自己的祖宗：“我们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祸延到我们今日。”胡适在政治上无耻地否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一口咬定中国人自己不争气，这种洋奴买办的民族自卑思想，原来是在他的“社会的不朽”的变相迷信观念里有着思想根据的。

自然，胡适在口头上是反对宗教迷信的“因果报应”观念——反对所谓“宿命论”或“定命论”的。在他的自传性质的《我的信仰》一文中，他宣称自己是“以偶然论来对定命论”。在这里，胡适公开承认了他的反科学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偶然性崇拜的观点。但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一下，以“偶然论来对定命论”，是不是就真的和宗教迷信观念对立起来了呢？首先应该答复说：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偶然论”和“定命论”这两种观念看起来好像是两个极端，实际上都建立在同一个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这就是，否认事物发展过程和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性，否认人类能够认识和利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知识来改

造世界和为社会谋福利这一种创造的能力。“定命论”要人们相信世界是由上帝和神灵所统治（不要忘记，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上帝和神灵就是按照统治者的面目塑造出来的神圣化的形象），人在上帝和神灵的面前是完全无知和无能的，因此就应该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们去宰割，而实际上就是要屈从于剥削者统治者的意志。“偶然论”要人们相信世界是偶然性的茫茫大海，在这里面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没有任何必然的规律，人在这茫茫大海中对于任何事物和任何行为都找不到一个确定的方向，因此就只好自叹无知无能，而无可奈何地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神秘的偶然力量去支配，而实际上也就是要听凭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等反动统治者去支配。不论“定命论”或“偶然论”，都是对人类的知识能力的进攻，都是对人民的战斗意志和创造信心的进攻，都是导向宗教迷信、自甘屈辱的反动思想。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只有承认事物的发展具有着客观的必然规律，承认人们能认识和利用这些规律的辩证唯物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的世界观，才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进行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斗争中的无比锐利的精神武器，才是真正能粉碎一切宗教迷信并指导劳动人民以满怀信心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哲学思想武器。

六、反科学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论

（一）科学方法不能简单归结为“实验室的方法”

实用主义曾经迷惑了许多知识分子和学术文艺界人士，它的迷惑作用特别在于方法方面。实用主义者，从美国的皮耳士、詹姆士直到杜威，都以“实验室的态度”为标榜，使自己的“方

法”伪装成好像真是科学的东西。胡适把“实用主义”改译作“实验主义”，目的就是为着在人们的眼中加强这种“科学的”假象。许多受迷惑的人把这种表面的伪装和假象误认为就是它的实质。他们看见胡适应用这种“方法”而作的写作活动涉及了相当广泛的领域——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等方面，就以为这真是普遍适用的“科学”方法。有这样一种人，他们虽然也知道实用主义是一种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但却要把实用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和它的方法割裂开来，说：“杜威的‘实在论’、‘真理论’等一般的哲学观点虽然没有任何价值，但它的方法却是科学的、正确的”。自然，这种离开了实用主义的哲学根本观点来看它的方法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实用主义的方法和它的主观唯心主义决不能分割开来，两者其实是一件事的两面。实用主义的方法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决不是真正科学的方法，因为真正科学的方法是建立在承认物质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和可认识性这个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之上的。实用主义则不承认物质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和可认识性。以这种世界观为基础的实用主义的方法并不是要求揭发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性的真正科学方法，而只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虚构事实的方法，是帮助反动派“应付环境”进行垂死挣扎的方法。

首先应该指出：实用主义者用“实验室的态度”或“实验室的方法”来作为标榜，这一件事情本身就足以暴露它的所谓“科学”方法的虚伪性。第一，“实验室的方法”仅只是自然科学的一种特殊方法，或者说，只是科学方法在对自然研究方面所采取的一种特殊形式。科学方法决不能仅仅归结为实验室的方法。把“实验室的方法”作为科学研究的普遍方法的标帜，这是根本不通的。人类社会生活的研究，就不能拿到实验室里来观察。马克思

说，“在经济形态的分析上，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页)。人类社会生活的研究，只能在实践的斗争过程中，就典型的事物来“详细占有材料”(如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时以英国作为典型)，加以分析研究，不需要也不可能用“实验室的方法”。实用主义者在人类社会、人类历史、政治文艺等等方面的研究中也要夸夸其谈地讲什么“科学实验室的方法”，这正说明他们并不是要讲求真正的科学方法，而是相反地曲解了科学的方法。第二，对于上面我们所说的一切，实用主义者也许要出来辩解说：我们并没有说人类社会历史等等的研究真的要拿到实验室里去试验，我们只是说在研究中要采取“实验室的态度”。那么，现在就来看一看实用主义者所谓的“实验室的态度”究竟是否包括多少科学的气味？应该说，实用主义者所谓的“实验室的态度”，是完全歪曲了真正的科学实验方法而毫无一点科学气味的。实用主义者硬说科学家的“实验室的态度”仅仅在于求得某种主观要求的“效果”，而抹煞了真正的科学实验方法的目的是在于通过实验来证明人的主观认识是否与所研究的自然界对象的客观规律相符合。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里引用皮耳士的话说：“你对一个科学实验家无论讲什么，他总以为你的意思是说某种实验法若实行时定有某种效果，若不如此，你所说的话他就不懂了。”“一个观念的意义完全在于那观念在人生行为上所发生的效果……除掉这效果之外，更无别种意义。这就是我所主张的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第85—86页)实用主义者所谓的“实验室的态度”，原来就是这样一回事！真正的自然科学家是否都会像实用主义者这样来看科学实验的方法呢？绝对不会这样！自然科学家从事实验研究，当然也注意它的效果的，但科学家注重实验的效果，并不是

把效果本身就当做目的，而是要通过效果，来检验自己对于这一自然现象的观察研究所获得的理解（这种未经实验最后证明的理解也就是科学的“假设”）是否符合于所研究的对象本身的客观规律性。实用主义者把“实验室的态度”解释为“为效果而效果”的态度，这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曲解。这种曲解并不是新的，马赫主义已经照样做过，并且遭受了列宁的致命的批判。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一书里这样说道：“对于唯物论者，人的实践底‘效果’证明着我们的表象与我们所感知的物底客观本性之符合。对于唯我论者，‘效果’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167 页）这里列宁所说的“唯我论者”，就是指的马赫主义者。实用主义对于“实验室的方法”的上述曲解，证明它是利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的名义来作为伪装，暗中偷运了马赫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私货；证明它不是真正科学的方法，而只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应付环境”的方法：对于一种思想只问它是否能实现主观所要求的“应付环境”的“效果”，而不问它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凡是能够帮助实用主义者及其所拥护的反动派“应付环境”获得“效果”的，哪怕是迷信的鬼话，捏造的谎言，也要使之硬戴上“真理”的花冠；凡是对于实用主义者及其所拥护的反动派“应付环境”有所不便的，哪怕是千百次实践所证明的人人皆知的科学真理，也要横蛮地加以一笔抹煞。实用主义者所标榜的“实验室的态度”的真正意义，就不过如此而已！

（二）实用主义的方法是主观唯心主义者“应付环境”的手法，不是科学方法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来对实用主义的“方法”进行具体的分析。

据胡适在“实验主义”一文里的介绍，杜威曾把这个“方法”分为五个步骤，又叫做论思想的“五步说”。这五个步骤就是：“（一）疑难的境地；（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三）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把每种假定所涵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那一个假设能够解决这个困难；（五）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第120页）胡适经常反复不断地加以宣传并且自己也实行了的方法，就是以杜威的这个“五步说”为基础的。胡适常常把这“五步”简略地概括为三步。例如说：“（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惟一试金石。”（《杜威先生与中国》，见《胡适文存》卷二，第201页）或者说：“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我的歧路》，见《胡适文存》卷三，第99页）有时他还说得更简单一点，索性就只剩下了两步，说：“科学的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

我们可以看到，实用主义的这些方法，是采取了一种相当精巧的伪装形式，来和真正的科学方法相混淆的。人们如果只从形式上来看问题，就难免要受到它的迷惑，许多知识分子和学术文艺界的人士就是因此上了当的。其实，实用主义的方法并不是真正科学的方法，它只是实用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反科学观点在方法上的集中表现。要揭露实用主义的方法的反科学性，必须把它的形式和它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内容联系起来进行批判，才能达到目的。

现在让我们先就实用主义上述方法的总的特点来看一看它和真正科学方法的根本区别，然后就它的五步或三步的顺序，一步

步地进行具体的批判。如果我们注意到，实用主义者把知识思想都看做“应付环境”的工具而否认了它们的客观内容，并且根据这一点来看上述杜威论思想的“五步说”，那我们就会很明显地看出，实用主义的方法所包含的这一系列的步骤，恰恰表明它是，并且仅仅是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应付环境”的手法，而并不是真正的科学方法。科学方法是要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来获得反映周围事变发展规律的理论知识，并应用这些客观规律知识来指导实践，再在实践中来检验，修正或发展这些客观规律知识。实用主义的方法仅仅是要在所谓“疑难的境地”里找到一种对付“疑难”的法子，并依据“效果”来证实这法子是否值得“信用”，即是否能满足主观的需要，而并不关心它是否符合于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只求一个一个的“应付”“疑难的境地”的“法子”，不需要也不承认任何反映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的理论知识。这就是实用主义的方法——不论是杜威的“五步说”也好，或者由胡适概括为三步，两步也好——所包含着的一个总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特点。注意到这个总的特点，然后对于它的每一步加以分析，就容易揭露它的反科学性质了。

为着论述的方便，我们不妨把杜威的“五步说”合并在胡适的三步里来一起批判。杜威的第一步和第二步，就相当于胡适的第一步，杜威的第三和第四步，就相当于胡适的第二步，杜威的第五步，就相当于胡适的第三步。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把批判也分作三步。

（三）不能泛泛地空谈“尊重事实”，而要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出发

现在就要开始进行第一步的研究，这里包含着胡适所谓的

"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或"细心搜求事实"这个步骤，也就是杜威的"疑难的境地"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这两个步骤。从"具体的事实"下手，或从"疑难的境地"开始，这有什么违反科学的地方呢？乍一看去，好像很难作肯定的回答。胡适——实用主义者之流经常宣传科学方法就只不过是要"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而许多知识分子和学术文艺界人士误认实用主义的方法是科学方法，也就是由于它的"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这一类词句所起的欺骗作用的结果。为什么我们要说它是反科学的呢？我们的论断的根据又是什么呢？根据就在于实用主义者的那种宣传是一种虚伪的宣传。仅仅泛泛地说要"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这并不就等于科学方法，因为，事实和证据（必须是没有经过实用主义者曲解的），只能作为科学方法的起点，科学方法的更重要的环节，是要到事实——而且必须是作为"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这样的事实——里去分析研究，找出其中的客观规律性。如果仅仅侈谈"事实"和"证据"，把"事实"和"证据"的意义加以夸大和绝对化，结果就可以走向这样一个极端：只承认一个个偶然的和表面的事实，只承认浮面地观察到的一堆杂乱的事实，否认事物的客观的内部联系，否认事物的本质和贯串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性的存在，终于也就否认了科学规律的客观性而达到主观唯心主义的结论。这是19世纪中叶以来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经验论者，特别是所谓"实证论者"经常使用的伪装科学的手法，实用主义正是一种新的"实证论"，它就是在"拿证据来"和"拿事实来"这个虚伪口号下面来偷运主观唯心主义的私货的。

（甲）实用主义者的所谓"事实"，是片面的表面的事实

现在让我们先分析一下实用主义者所谓的"事实"，然后再研

究什么是他们所谓的“疑难的境地”，用以揭露它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本质。实用主义者标榜要细心搜求“事实”的时候，他们并不是按照真正科学研究的要求来对待事实的。科学的研究，在处理“事实”材料时，首先需要有正确的科学的观点、方法作为向导，不容许没头没脑地向“事实”里乱钻。我们说一定需要有正确的科学的观点、方法作为向导，是因为如果不努力用正确的观点、方法来作向导，那就不自觉地要被错误的观点、方法所引导。人的思考总是和某种观点、方法联系着的。这里所说的正确的科学的观点、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个科学的观点、方法的指导下，科学的研究首先要求我们“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要求在开始研究以前要“详细地占有材料”；这就是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严格地遵守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要着眼在“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和“详细地占有材料”（《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7页）。上面，不能有丝毫主观随意性掺杂在中间。这与实用主义者泛泛地讲到的所谓“具体事实”与“细心搜求事实”有原则的不同。因为，孤立片面的事实也可以叫做“事实”，表面的现象也可以叫做“事实”，甚至于捏造的谎言和“最荒诞的梦”（参看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65页），也可以被实用主义者——主观唯心主义者硬派作“事实”；如果仅仅泛泛地空谈“事实”，而不特别强调要就“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来“详细地占有材料”，那就不能保证所搜集的“事实”的全面性和真实性。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决不是一个一个孤立的，而是互相有机地联系着的。实际事物中间有主要次要之别，有根本的东西与非根本的东西的区别。事物中间充满着种种矛盾，充满着正面和反面，新的东西与旧的东西之间的对立的统一和斗争。科学

的研究就必须依据着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一方面要详细占有丰富的材料，另一方面又一定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一些根本事实上，放在这些根本事实的矛盾诸方面的斗争性和统一性上，以此作为分析和贯串一切事实材料的核心。例如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根本的实际事物是生产和阶级斗争，因此在着手研究人类社会的问题时，就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生产和阶级斗争这些根本事实方面，必须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阶级矛盾的分析研究作为研究的中心环节。例如研究历史，就必须以历史上的生产发展情况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作为研究的中心环节，而不应该把地理、人口以及思想文化条件作为中心环节（虽然这些也是必须研究的）；研究古典文学（例如《红楼梦》），必须把重点放在作品的阶级背景和阶级内容的分析上，而不应该像胡适那样放在作者、本子等次要的事实上（虽然这些事实的研究也是必要的）。只有这样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的指导之下来正确地对待事实，只有这样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来着手研究，而不是泛泛地在“细心搜求事实”的名义下，把一些主观的、片面的、孤立化了的表面事实，或夸大歪曲了的事实，甚至于捏造的事实，作为出发点来着手研究，才可以希望完成科学的研究所要求的任务；只有把出发点布置得正确了，然后向前面走去，才不至于走错道路。

说到实用主义者所谓的“事实”时，我们不要忘记实用主义者是在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上来看待“事实”的。这就是说他们是把“实在”看做人的感觉，感觉（及观念）之间的关系等主观要素的复合，看做“百依百顺”任人“涂抹”“装扮”的“很服从的女孩子”，看做一大堆没有秩序的偶然事件的凑合。这些唯心主义观点在科学面前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但实用主义者的研究方法

的思想基础，却正是这些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误观点。当实用主义者说到“细心搜求事实”的时候，他们不是严格按照“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来“详细地占有材料”，而是凭着表面的“感觉资料”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的。他们的原则是：“现在的感觉资料便是引起兴趣意志的刺激物，过去的感觉资料（经验）便是供我们选择方法工具的材料。”（《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第93页）他们拒绝依照“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本身的秩序，把研究的注意力放在某些根本事实上，相反地他们是要凭着自己的主观的“兴趣和意志定下选择的目的”（同上书），为着服从于这样的主观“目标”，就不惜把一些次要的、片面和表面的“事实”作为研究的重点。所以，胡适把古典文学的作者、本子等的考据作为研究的主要任务，而根本不去注意作品的社会背景和阶级内容的分析。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也凭着主观的偶然兴趣在怡红院的姑娘们排座次等类枝节的问题上花费了极大的力量。用这样的方法来从事研究，结果最多只能在材料校勘性质的工作上——例如一个字的意义或一本书的作者的考证工作上做出一点成绩，而对于事物的本身理解，则越闹越糊涂，永远不能够认清它的本质和规律。俞平伯研究《红楼梦》30年，结果却承认越研究越糊涂，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不过，如果事情仅仅限于使人糊涂，那还不算是最坏的。问题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这种对待“事实”的方法，归根结底是为资产阶级以至于反动派的“目标”服务的。胡适把中国社会混乱的原因归之于自己闹“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而抹煞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存在这些根本原因。这个例子很清楚地暴露了：实用主义者所谓的“细心搜求事实”的方法，原来只是依据着支持反动派这个主观的目的来任意罗织事实的方法，这就更足以证明它和“从客观存在着

的实际事物出发”这个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方法是“根本不相容”的！

（乙）要依据客观事物的矛盾提出问题，而不能从主观的偶然的“疑难”下手

现在再研究一下实用主义者所谓的“疑难的境地”和“指定疑难之点在什么地方”这两个步骤，和真正科学方法所采取的步骤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当我们“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来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的任务是在于要解决实际事物里所存在着的一定的问题。所以，发现问题，确定问题的所在，正确地提出问题，这是我们着手科学研究时必须采取的步骤。不能发现问题，或者不能正确地提出问题，科学的研究就无从进行。如何发现问题，如何正确提出问题，这也是必须要严格地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来做的，这就是说，不能仅凭主观的“兴趣和意志”来任意提出问题，不能仅仅依据偶然触及的感觉材料或片面的“事实”去确定问题，而必须在“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中去发现问题。不能把问题看做仅仅是主观的“疑难”，而要看做是客观的存在。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那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那里就有问题。”（《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6页）要想能够善于发现问题，正确提出问题，使我们的研究得以顺利地和正确地进行下去，那就要从详细占有的事实材料当中，首先从许多根本的事实当中，去找出它的矛盾的所在。发现了事物的矛盾所在，就发现了问题，就能够正确地提问题。所以，在提出问题之前就需要对于有关事物的矛盾作一番初步的分析研究，否则就不可能确定是什么问题。毛泽东同志说：“提出问

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同上书）同时，人们是在社会实践中认识事物，也就是在实践中接触事物的矛盾的。在生产斗争中人们接触到自然界的矛盾，在生产斗争和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中人们接触到社会的矛盾。因此，正确的问题的提出就不能离开社会的实践，不能离开一定的实践斗争的立场。自然科学研究所应该提出的问题，归根结底（或者直接地，或者间接地），就是在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实践过程中所发现和必须解决的自然界事物的矛盾；社会科学研究上所要提出的问题，就是生产活动以及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在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实践中所需要解决的矛盾。总之，必须通过实践去发现“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中所需要解决的矛盾，而不要离开社会实践去任意“选择”什么主观的偶然触及的“疑难”，这就是在真正的科学方法里提出问题的正确途径。

实用主义者说到“疑难的境地”和“指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受迷惑，以为他们所谈到的好像就是科学研究中提出问题的过程。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一回事！前面说过，科学的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反映着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中尚未解决的矛盾，问题的提出就要求我们采取严肃的唯物主义的态度，必须依据事物本身的矛盾运动规律，实事求是地提出问题，而不凭着主观的“兴趣和意志”，凭着偶然的感触随意提出问题。但实用主义者所谓的“疑难”，却正是一种主观随意的、偶然触发的东西。胡适曾这样描写所谓的“疑难的境地”，说：“人生的环境，常有更换，常有不测的变迁。到了新奇的局面，遇着不

曾经惯的物事，从前那种习惯的生活方法都不中用了。譬如看中国白话小说的人，看到正高兴的时候，忽然碰着一段极难懂的话，自然发生一种疑难。”（《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第120页）这样的“疑难”，就是实用主义所谓的“思想的起点”，就是所谓研究“下手”的“境地”！从这样一种“境地”来“下手”研究的实用主义方法，和真正科学的方法是距离得多么远呢？这样的方法，无非就是说，人们只能听凭什么“不测的变迁”和“新奇的局面”来支配自己的研究，只能就临时碰到的任何一句话，一个字等等的“疑难”来规定研究的主题，只能凭一时的触发和感想来提出问题。这就是说，人是处在前途茫茫的偶然性的大海中来进行研究和思考问题的，周围的事变找不到任何客观的秩序和规律；因此，也就不能指望从客观事物本身的矛盾运动中有规律地去发现问题，不能指望研究和思想工作有一个客观地确切的方向。实用主义叫人不要把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的矛盾问题作为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主要问题，而要从随时碰到或随时感到兴趣的任何个别“疑难”中去找研究的主要问题。如果偶然对于一个字的意义或一个塔的时代发生了“疑难”，那么这一个“疑难”的研究就具有像天文学家发现一个新星球那样重大的意义。如果偶然感到《红楼梦》怡红院姐妹们排座次的问题有了“疑难”，那么就应该用很大的力量去从这里着手研究。思想是“应付环境的工具”，思想方法就是“应付”一切临时碰到和偶然感到的事件的方法。不要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不要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随时等待着奇迹的出现好了，那时我们就会凭着上帝的启示领受到一个重大的“疑难”，一个重大的使命，使我们的研究“一鸣惊人”！这就是实用主义所告诉我们的思想方法的第一个步骤！如果我们跟着它的指引走上了这一步，结果会怎样呢？

那我们的研究就会开始脱离事物本身的矛盾运动，脱离历史发展的现实，脱离实践；我们的研究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而开始为枝枝节节的偶然事件所纠缠不清，我们将分不清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研究和什么是烦琐的学究的穿凿，我们将会把胡适之流的种种捏造的谎言误认为科学思想，因而被他们以及他们所拥护的反动派所玩弄所迷惑！

问题还不只如此。正像在对待事实时，胡适有他的反动的"目标"，在他"指定疑难之点"时，实际上常常是取决于他的反动"意志"的。他的文章，从来没有把怎样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怎样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为"疑难之点"来规定过，而怎样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爱国民主运动，则成了他的"疑难之点"。由此更可见他的所谓"指定疑难之点"是服务于反动目的的。

（四）科学的假设要以"谨严"为原则，而不是以大胆为原则

现在再谈胡适所谓的实用主义方法的第二步，即杜威论思想的第三和第四步，也就是关于假设的问题。

毫无疑义，科学的研究常常要经过假设的阶段。当我们对事实材料已经作了某种程度的分析研究，从这里归结出理论的初步结论来，但还没有能够最后确定它是否完全符合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时，我们就把这些原理原则看做待证的假设。要等到再进一步经过实践——生产活动，革命的阶级斗争以及自然科学实验等等——的检验，证明它确是正确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时，才能把它肯定作具有完全的客观真理性的科学规律。科学的假设，可能是不完全的，甚至于也可能是错误的；因此，科学的假设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后，常常要被修改或补充，甚至也有

被根本改变过的。化学上对于燃烧的现象曾采用过“燃素说”的假设，以后化学实验的进步，证明燃烧是由于可燃物质与氧结合的作用，而不是由于特殊的燃素的作用，这就是经过实践的检验把假设根本改变的例子。俄国门德列也夫的化学元素的周期律的假设，经过多年来的化学和物理学的实践发展过程的检验，不但被完全证明，而且获得了许多补充和发展，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周期律的内容,远比门德列也夫自己所知道的丰富和深刻得多。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得政权”(《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21页)，这个原理通过1871年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就获得了进一步的补充，“特别是公社已证明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上书，第2页)。这些就是科学的假设经过实践的检验而得到修改或补充的例子。但是科学的假设虽然可能有不完全的或甚至于错误的地方，虽然它还不就是最后确定的和完全的客观真理，但它是人们通过科学研究来认识客观真理的一个步骤。所以，从事科学专门研究的人或愿意使自己对于事物的观察和研究具有科学的正确性的人，就必须力求使自己的观察分析所做出来的假设尽可能地与客观真理趋于一致，力求避免使它的内容掺杂主观的虚构成分，力求尽可能地使它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因此，为着要在研究中正确地做出具有科学性的假设，必须遵守以下的原则：

第一，必须以丰富的事实材料做基础，特别是要能够掌握最主要最根本的事实。没有丰富的事实材料或没有抓着根本的事实，只依靠一些枝节的表面的事实，就不能按照尽可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规律性这个目标来做出假设。没有生产活动及阶级斗争的事

实材料，就不可能在社会的历史研究方面做出尽可能与客观真理相一致的假设。胡适常标榜“历史的方法”；但他所谓的“历史的方法”，就是在研究一种学说或主义的产生时，要把它归结为四种平行的原因，这就是：当日的时势，论主（指学说或主义的创造者）的才性，古代学说的影响，同时思潮的影响（参看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第190—198页）。在这许多原因中，恰恰就不提最主要的最根本的经济的和阶级的原因。用这样的方法所做出来的理论上的论断，毫无疑义地要成为主观的虚构。胡适的历史研究以及古典文学研究之所以失败，虽然首先应归源于他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然而与这立场相联系的选择事实材料的主观唯心主义方法，也是一个根本原因。

第二，在作假设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实事求是，极力避免主观主义的因素。必须在科学的观点、方法的指导之下，细心地分析事实材料中所显示着的事物各方面的具体矛盾运动，如在社会历史的研究上必须细心地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阶级的矛盾运动等等。假设的任务，就在于要提出一些与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相一致的解决矛盾或解决问题的理论的原理原则。要能解决问题，需要比提出问题时更加用力和更加细致的分析研究。前面说过，提出问题，就需要作初步的研究。但“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6页）。“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8页）。所以，

要从研究中做出正确的假设，就必须采取十分认真严肃的态度。这就是说，科学假设的制定，要求我们以“谨严”为原则，而不能像实用主义者那样以“大胆”为原则。当然，要从事物的研究中做出新的假设，也需要一定的勇气，尤其是在需要和陈旧的传统和保守主义的偏见做斗争时；但科学假设的任务，既然是为着要达到使主观的思想符合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这样艰巨的任务，决不是仅仅靠勇气就能完成，而主要须依靠认真坚持的研究功夫，这是很容易明白的。

实用主义者把“假设”列为一个研究步骤，想借此把自己的“方法”“装扮”成科学的样子。其实，实用主义者对待假设的态度，是和科学的要求“背道而驰”的。首先不能忘记，实用主义者是把“知识”、“思想”、“真理”和“科学律例”等等，一律看做“应付环境的工具”的。在实用主义者看来，“假设”的任务，也不外就是依着主观的“兴趣和意志定下”的“选择的目标，来找出一套“应付环境的工具”，而不是把假设看做通过科学研究以达到认识客观真理的一个步骤。在这样的一个谬误观点的基础上，他们就提出了“大胆的假设”的口号，把“大胆”作为假设的根本原则。自然，实用主义方法的指导原则既是主观唯心主义，这方法的目的既不是为着要做到使主观的认识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发展的内部规律性，而只是为着实用主义者或他们所拥护的反动派找到满足主观要求的什么“工具”，那又有什么“谨严”的必要呢？那又何必一定要周密审慎地去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呢？只要“大胆”，只要有勇气，就够了！“大胆”就是决定一切的力量。为什么呢？因为为着要满足主观唯心主义者“应付环境”的目的，就不免常常要违背“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规律性，而做出种种武断、虚构、造谣、说谎、强词夺理等等的横蛮行为，就不免

常常要像赵高一样无耻地“指鹿为马”。而要做到这一切，首先就需要“大胆”，需要有一种特别的勇气，甚至是一种不要脸的勇气！胡适自己的许多言论行为就是这一类“勇气”的最突出的模范。为着帮助反动派满足“应付”人民的革命运动的目的。胡适不惜武断说帝国主义者也希望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并没有侵略中国。这种武断是如此的露骨，以至于连当时拥护他的主张的梁漱溟也替他难乎为情，并写信给他表示恐怕这些胡说连“三尺童子”也骗不了，劝他要仔细谨慎一点（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中《我们走那条路》附录一），然而胡适还是厚着脸皮表示满不在乎的样子。

实用主义方法的“大胆的假设”，有着以下的反科学的特点：

第一，在“大胆的假设”的口号之下，对待事实材料就采取了极不严肃的反科学的态度。口口声声以“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为标榜；但是，实用主义者用来作为“假设”的根据的“事实”，总是片面的和表面的，而不是像真正科学方法所要求的那样，依据“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本身情况“详细占有材料”，并特别着眼在带根本性质的事实材料方面。仅仅依据片面的、表面的事实来做出“大胆的假设”，这就是实用主义方法的特点之一。这样的方法能得出什么结果呢？结果是：(1) 用这样的“假设”来回答多少带根本性、原则性、理论性的问题时，一定是错误的。胡适的著作中如对历史的发展过程问题，思想学说的产生和意义的问题，文艺作品的艺术性和政治性的评价问题，以及在国际国内政治问题方面的论断，总的来说都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性质，有时是由于事实材料根据不足而造成的错误结论，而主要的则是由于胡适本来就抱着资产阶级的反动的主观偏见来观察历史、文艺、政治等等的问题，而那些片面的事实材料不过是胡适凭着自己主

观的“兴趣和意志”选择出来作为自己的成见的注释而已。这在胡适关于政治方面的言论上特别表现得明显。(2) 如果仅仅是关于一件件事实材料的考证问题，而不是关于带根本性、原则性、理论性的问题，那么，实用主义有时也可以提供一些真实的结果，如考证《红楼梦》的作者之为曹雪芹，某一个字的意义是什么等等。实用主义者胡适就是依靠这些“成绩”作为幌子来向人招摇，而许多天真的知识分子也就受到蒙混，以为实用主义者真是在作“科学”的研究了。然而，这就算是“科学”研究么？这样的“研究”，最多也并没有超出材料的搜集、整理和校勘的范围，并且常常只是照抄现成的材料。有了一本“脂砚斋批”的《红楼梦》，又有了一本《四松堂集》；上面对《红楼梦》的作者已作了现成的回答，用不着多费脑筋；只要善于誊抄，就成为胡适的考证“成绩”了！这算什么“科学”研究呢？实用主义者曲解科学，硬说科学方法不外就只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科学方法降低到仅仅是材料的搜集、整理和校勘的地位，把科学研究和材料考证简单地画一等号，然后大肆宣传这种捏造的观点，借以麻痹知识青年的头脑，并引诱他们把自己宝贵的聪明的智慧埋葬在主观地“选择”出来的片面的和表面的事实材料的游戏当中，使他们“玩物丧志”，离开政治，离开革命运动和阶级斗争，同时也离开真正的科学研究。真正的科学研究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之下，从丰富的而不是片面的，根本的而不是表面的事实材料的研究中，找出贯串这些事实材料的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知识，就是要由材料的知识上升为理论的原则，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在这里，材料的搜集、整理和校勘工作仅仅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初步准备工作，而不是科学研究的全部工作，甚至于不是最主要的工作。所

以，即使实用主义者在事实材料的考证方面得出一些符合事实的“成绩”，也不能证明实用主义者的方法就是科学的。因为这些事实材料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也只不过是用来作为“应付环境的工具”，用来作为伪装“科学”的幌子，而不是要由此进一步去揭发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何况，在“大胆的假设”的谬误原则的指导下面，由于材料的片面，由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偏见的“选择”作用，就是事实材料的考证，也常常是错误的。这只要举胡适自以为得意的著作《说儒》（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作为例子就够了。在那里，他仅凭《论语》、《孟子》等古书上的几句表面的未经考证清楚的词句，就硬说儒者所谓的“三年之丧”的制度一定是殷朝原有的制度，而不顾丰富的殷朝的甲骨文字里的所包含着的足以作为反证的材料。这种虚伪的考证方法，在郭沫若先生的《驳说儒》（见《青铜时代》）一文里，早已受到致命的打击了。

第二，胡适的“大胆的假设”的反科学的性质，还表现在他把“假设”的产生过程描绘成一种神秘主义的直觉活动，好像是宗教里的神灵启示似的东西。在《实验主义》一文里，他把假设的产生竟描写得这样地奇特：“应该知道这一步在临时思想的时候是不可强求的；是自然涌上来，如潮水一样，压制不住的；他若不来时，随你怎样搔头抓耳，挖尽心思，都不中用。”（见《胡适文存》卷二，第127页）在《五十年来的世界哲学》里，他更露骨地表述了这种反理性、反逻辑的观点，说：“大之，科学上的大发明，小之，日用的推理，都不是法式的论理或机械的分析① 能单独办

① 胡适这里所说法式的论理，其实就是普通的逻辑，而所谓机械的分析，则是他对正常的分析方法的曲解和诬蔑。——原注。

到的。根据于经验的暗示，从活的经验里涌出的直觉，是创造的智慧的主要成分。”（见《胡适文存》卷二，第276页）难道科学的“假设”，竟是凭着这样一时的“灵感”做出来的么？如果这样，那么科学的发展就只能依靠命运来决定了，科学发达的国家必是由于神灵的恩赐了！这当然是非常荒谬的。科学的假设是为着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性；所以，正确的科学的假设，只能就客观事物所提供的丰富材料进行了周密详尽的分析研究之后才能揭发出来，而决不是凭着实际上“莫须有”的什么神秘力量——唯心主义的所谓“直觉”、“灵感”、“暗示”以及“神的启示”之类——偶然地“涌”现出来。实用主义者把他们的所谓的“假设”渲染成这样神秘东西，恰恰足以证明他们的所谓“假设”的反科学性。他们的“假设”的任务既然只是为着找到满足“应付环境”的主观目的的“工具”，而不是为着揭发符合于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性的科学真理，因此就不需要从丰富的事实材料中去进行周密详尽的分析研究，而只需要，或主要的只需要主观的虚构能力就行了。唯心主义所谓“直觉”、“灵感”、“暗示”或“神的启示”之类，都是为着迷惑老实人而凭空制造出来的用以掩盖主观虚构的神圣化的名词。所谓“经验的暗示”无非就是指实用主义者反科学的“经验”，资产阶级和反动派反人民的“经验”罢了。

（五）要在实践中检验认识的真理性，而不是要求片面的“事实”和“证据”

现在再来谈到实用主义方法的最后一步，即所谓“细心求证实”，所谓“试验”或“实验”的步骤。

认清楚了实用主义方法以前各步的真面目，特别是认清了实用主义者所谓的“假设”的真面目，那么，他们所谓的“求证”是

怎么一回事，是否真的就是科学上的求证方法，也就不难了解了。科学的研究对客观事物做出假设，做出初步的理论性的结论时，即使由于研究的谨严，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客观真理性，但还必须要再拿到实践中——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中去检验。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这些假设，这些理论性的结论，才能最后被确定为完全符合于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性的客观真理，才能正式确定为定律。这确实是科学研究必经的步骤。“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9页）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本身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经验的总结，是全部人类历史和科学发展史的总结；因此，当它开始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时候，已经具有了客观的真理性。列宁在论及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情形时，这样说过：“社会学中这个唯物主义思想，本来就是英明的思想。当然这暂时还曾是一个假设，但这个假设是第一次使人有可能用严格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7页）所以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的科学真理，在它最初创立的时候，也还要暂时被看做假设，而在创立以后还要经过千百次的实践检验，才日益完善，日益发展，日益被广大的劳动人民公认为指导革命实践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假设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做出科学假设的时候，不

管怎样谨严，由于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常有不足或不纯的地方，因此所做出的假设的真理性也常常有不足或不纯之处，甚至也有错误的，必须依靠进一步地由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的检验和证实，才能够补充不足或修正不纯之处，才能够改正错误。“从事变革现实的人们，常常受着许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学条件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的限制（客观过程的方面及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在这种情形之下，由于实践中发现前所未料的情况，因而部分地改变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说，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于实际，部分错了或全部错了的事，都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纠正错误的认识，才能到达于和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0—271页）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段话，说明人的主观思想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完全符合于客观的规律性，这里所讲的原理，对于一切科学假设来说，都是完全适用的。

所以假设必须要再经过证实，经过实践的检验，这是科学方法的最后一个步骤，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在于：实用主义者说到对“假设”必须“细心求证实”的时候他们所指的意思，是否和科学的真正方法的内容是一样的呢？当然，实用主义者所使用的这些词句，是为了使人相信他们的方法的确是科学的，而有些人也的确就受了迷惑。但是，我们却不受实用主义者的欺骗，一定要指出它所谓“求证”的反科学性质。问题在于，实用主义者所谓的“假设”就是非科学的，因此他们用来“证实”这种“假设”的方法也与科学的方法是相反的。实用主义方法所做出来的

"假设"，除了某些个别的事实材料"考据"，即还谈不上科学的假设的那一类之外，常常是一些主观的虚构或主观的武断。这样的假设，当然是经不起实践——首先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的检验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实用主义者口口声声的所谓"细心求证实"，当然并不是表示敢于依照科学的要求，把自己的言论拿到实践的面前来求证明，而只是说要"细心"地按照自己的主观需要，拉扯一些表面现象，来掩饰自己的谎言。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谎言，如果需要掩饰，多少都可以找到一些足以用来掩饰的表面事实的。胡适可以拉一篇帝国主义者的表面上冠冕堂皇的宣言，来"证实"帝国主义者也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可以把美国在中国办的利用来作欺骗和侵略工具的教会、学校、医院等，作为帝国主义者不要侵略中国的"证据"。在这里，实用主义者的主观唯心主义就起了这样一种方法的作用：这种反动哲学观点要我们相信"实在"就是感觉，相信一个一个的表面现象就是一切，要我们只看见某些表面假象而忘记了或不要看见最根本的事实或事情的本质，然后他们就可以随意挑选他们所需要的"事实"，来为他们所做出的任何"大胆的假设"即主观的虚构求得证实。由此可见，实用主义者的所谓"细心求证实"，原来就包含着这样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本质：(1) 按照实用主义者主观的"兴趣和意志定下"的"目标"，来挑选自己所需要的"事实"和"证据"，而不是通过实践，依据"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来求得证验。(2) 在挑选"事实"和"证据"时依据"实在"是被人任意"涂抹"、"装扮"、"制造"的"很服从的女孩子"的原则，随便把一些表面现象来掩盖事情的本质，甚至窜改、捏造事实和证据！显然，这是离开科学不止十万八千里的。

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实用主义者用来"证实"他们的"假

设”的“事实”和“证据”，主要地是指“效果”来说的。这就是说：实用主义者评判一种言论、思想的意义的时候，主要看它是否对于自己主观希望的目的能够产生一定的效果，而不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它是否具有符合于事物发展规律的客观真理性。这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原则，在胡适《实验主义》一文里说到的詹姆士关于“观念的意义”的看法里，表述得最为明显：“我们如要规定一个观念的意义，只须使这观念在我们经验以内发生作用。……一个观念（意思）就像一张支票，上面写明可支若干效果；如果这个自然银行见了这张支票即刻如数兑现，那支票便是真的，——那观念便是真的。”（见《胡适文存》卷二，第97页）这一段话里，非常突出地暴露出一个典型的用做买卖的眼光来评判一切事物的资产阶级的观点。观念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否能像资本家的“经验以内”的事情那样获得效果，像支票那样地按照做买卖的人的主观要求如数兑现。用这样的方法来评判观念的意义，那么，迷信的鬼话，捏造的谎话，都可以被实用主义者“证实”为他们所谓的“真理”。因为如果所需要的仅只是任何主观要求的效果，而不是社会实践的检验，那么，任何鬼话和谎言，在一定的情形下，都可以收到某种“效果”的。上帝存在的迷信可以收到欺骗落后群众的“效果”，帝国主义不侵略中国的谎言在一部分受反动派思想影响的人们中间也可以收到一定的“效果”，所以实用主义者詹姆士和胡适就把这些迷信和谎言叫做“真”的观念。另一方面，正确的思想，用实用主义的这种只看“效果”的伎俩一经处理之后，原来的真理性也就会受到歪曲。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实用主义者也就可以利用一些貌似科学的和唯物主义的言论来混淆视听和“装扮”自己。例如范缜的《神灭论》，主张精神只是肉体的作用，它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消灭，而决不能离开肉体独立存

在，这本来是反映客观世界的真面目的唯物主义真理（当然是不完全的），胡适在《不朽》一文里却把它曲解为仅仅是一种“信仰”，而这种“信仰”之可信，是因为它的“效果”并不坏，因为“信神灭论的也未必会是坏人”（以反动派的好坏标准来衡量的所谓“坏人”，自然就是指抱有革命立场的人）。所以，实用主义者所谓的“细心求证实”，原来又可以解释为这样的意义：即凭着“效果就是一切”这个原则，妄想把一切思想、观念都变成主观唯心主义的俘虏，甚至连科学的客观真理也要被曲解成实用主义者的主观的工具！

但是，真理的标准究竟是在客观方面，而不是在主观方面。实用主义者的“大胆的假设”和“主观的虚构”，即使可以“装扮”成“真理”的样子，但这种“装扮”迟早总要被人把那反科学反革命的真面目揭露出来的。实用主义的谎言固然可以收到一时的迷惑人的“效果”，但靠欺骗的效果来撑持虚伪的“真理”架子，也是不长久的。因为与资产阶级及一切自私自利的反动派所需要的欺骗的“效果”相对立的，还有为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人民所经常注意着的另一种“效果”，社会的实践——生产斗争、革命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效果。社会实践的效果是革命人民和科学工作者辨别什么是客观真理和什么是主观虚构的最灵验的试金石。我们看见，一切反人民反科学的腐朽势力所布置的种种谎言的网罗，在广大人民的革命的社会实践面前已经不断地被冲决，现在还正在被冲决，并且将来一定要被冲决得干干净净的。胡适用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帮助中国的反动派散布了三十多年的谎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面前终于被粉碎了。仇视祖国和仇视人民的胡适甘愿充当美帝国主义者和蒋匪帮的一个“过河卒子”，现在又帮着他的主子在散布挑拨战争的

谎言。毫无疑义，这一切谎言也要在中国的和世界的人民革命斗争面前完全地彻底地被粉碎的！

（人民出版社于1955年、1956年先后出过单行本，1977年11月又以《胡适梁漱溟哲学思想批判》书名，合为一册、再版重印。）

胡适实用主义哲学的反革命性和反科学性

(1955.1)

实用主义是美国资本主义土壤里生长起来的一种最反动最腐朽的唯心论哲学。这种哲学实际上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新东西，而只是被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里驳斥得体无完肤的马赫主义的一种流派。胡适这个美国的文化买办，在“五四”运动前后把实用主义拿到中国来贩卖。当着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人民开始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胡适立刻就用实用主义来帮着反动派坚决反对这科学的革命的思想。

帝国主义各国的反动哲学思潮在“五四”运动以后先后都输入到中国来，并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中间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影响，但其中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实用主义。这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这反映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日愈积极，日愈凌驾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上的趋向；第二，实用主义比其他的反动哲学流派更为狡猾地用“科学”的“最新”哲学的伪装把自己的真面目掩盖起来，胡适在“五四”运动前后对一部分旧文化的批评活动和一些考据工作加强了这种伪装作用，使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中相当多的人受到了它的迷惑。实用主义所使用的科学的假面具是：“实验室的态度”，“生物进化学说”。实用主义的反科学反革命的真面目是：主观唯心论、不可知论、庸俗进化论。我们现在来批判实用主义，就必须认清它的真面目，揭破它的假面具。

一、实用主义就是主观唯心论

一切有真正科学头脑的人，都要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承认先有物质世界，后有精神现象，承认精神、意识、感觉、思维等等是物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也就是要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这一个哲学上最根本问题的唯物论的原理。实用主义的世界观，恰恰和科学所要求的这一个唯物论观点完全相反，它和欧洲的马赫主义一样，否认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而把周围世界看做仅只是人的感觉或感觉的综合。实用主义者詹姆士说：“我们所谓‘实在’含有三大部分：(A) 感觉，(B) 感觉与感觉之间及意象（也可译作“观念”——艾）与意象之间的种种关系，(C) 旧有的真理。”(《实验主义》) 这个公式告诉我们，实用主义者不承认“实在”是物质的客观实在，相反地却把实在看做仅仅是人们的主观领域以内的东西：感觉，感觉（或意象）之间的关系，“旧有的道理”等等主观的要素的复合（实用主义者认为“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实验主义》)，所以“旧有的真理”也是一种主观的要素），就成为实用主义者所谓的“实在”！这不是很明白的主观唯心论吗？

胡适曾跟着他的老师杜威假装说实用主义不谈唯物唯心的问题。他曾把杜威关于“经验”的“见解”作为例子，想来证明杜威对于唯物唯心的问题是采取“以不了了之”的态度，并且还因此把杜威大捧一顿，说他“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大革命家”。可惜得很，这样的“大革命家”在马赫主义者阿万那留斯的信徒中间早已出现过了。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里这样写着：“我们只能怜惜那些相信阿万那留斯及其一伙的人，他们以为经过‘经

验’这个字眼就可以超越唯物论与唯心论底‘陈旧的’差别”（《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6页）。杜威也能“超越”这个差别吗？我们且举两条来研究一下。杜威说：“经验确是一个活人对于自然的环境和社会环境所起的一切交涉”。又说：“经验只是一个物观（应译作“客观”——艾）的世界，走进人类的行为遭遇里面，受了人类的反动发生种种变迁”。“经验乃我对付物，物对付我的法子”（《实验主义》）。在这里，杜威把人和自然与社会的环境，人类的主观行为和客观世界，“我”和“物”等对立的两方面包括在他的“经验”概念之内，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掩盖了哲学上的唯物论的路线和唯心论的路线”（同上书，第175页）。然而，实际上怎么能掩盖得了呢？既然涉及到了主观和客观、我和物、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回避那划分哲学上唯物论路线和唯心论路线的根本问题：“两者之间哪一方面是第一性的？哪一方面是第二性的？”如果杜威在他的“经验”的概念里面，把人的主观，我，看做第一性的，而客观环境和物都要依赖着我的主观为转移，那么，他仍然只是在唯心论的路线上来解释经验，而并没有超越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区别。而事实上恰恰就是这样。为要证明这一点，不妨让我们先来看看杜威如何了解“环境”这个概念？杜威说：“环境，换句话说，就是与个人的需要、欲望、目的和能力相互作用着以构成现有经验的任何的条件。一个人即使建筑一座空中楼阁，他也是与其在想象中所构成的对象相互作用着。”（《杜威的哲学》，拉特纳尔编，1939年纽约版）这些话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杜威没有把“环境”看做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而在外界独立存在的客观条件，而仅只是在与人们主观的需要、欲望、目的和能力等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存在的条件，并且它的存在是与我们主观想象中所构成的“空中楼阁”没有什么原则区别

的。这还不够明显吗？这不是主张客观环境依赖人的主观为转移吗？这不是把我和主观当做第一性的东西而把客观的物、环境当做第二性的东西吗？这不正是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站到了唯心论方面来了吗？杜威何尝真的能够"以不了了之"的态度来对待唯物唯心的问题？何尝能超越哲学的这两条根本路线？杜威对"经验"的故作玄虚的"见解"，不过是想掩盖他的主观唯心论路线罢了。

承认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承认了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也就要承认这样的事实：物质世界的变化发展，是遵循着它自己本身的规律，而不是依赖着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可以认识这些规律，并且利用这些规律来为社会谋福利，但决不能违背这些规律，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意志任意改变、创造或消灭物质的变化发展规律。实用主义的观点却与这唯物论的原则完全相反，它既然否认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而把"实在"看做感觉等主观要素的复合，它就不能不由此做出荒谬绝伦的结论，认为"实在"是完全依赖着人的意志而变化的。胡适说："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验主义》）杜威也引用詹姆士的话说："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样。"在这里，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论的面目已十分露骨地表现出来，它的荒谬可笑，也是非常明白了。诚然，实用主义者胡适之流在他们的言论文字里是经常做着无耻的涂抹现实，颠倒是非的勾当的，但实际生活到处都在粉碎这种胡说。首先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于胡适就没有"百依百顺"，胡适的一切替反动派"涂抹"脂粉的卑劣行为始终没有能够阻止住中国革命的胜利。胡适的一切反动言论和行为违背了中国社会

和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因此它就被历史前进的车轮压得粉碎。

二、主观唯心论的——不可知论的认识论

如上所说，物质世界及其变化发展的规律是能够为人们所认识的，是可知的，人的主观认识就是客观的物质世界的反映。这是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根本观点，也叫做反映论的观点。这也是真正的科学所要遵循的认识论观点。科学的理论知识，就是自然界或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映，我们所以对科学予以高度的重视，就是因为科学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自然界和社会发展规律，使我们有可能指导自己的实践行动——生产建设，阶级斗争，等等——获得胜利的成就。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向导，认识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就能够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斗争，既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正在逐步获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实用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和以上所说的完全相反。它是一种不可知论的，主观唯心论的认识论。实用主义者既否认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也就否认了任何能够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的知识。杜威反对“把人人的知识看做一面镜的样子、把‘实在’照下来便是”的反映论观点，而主张“知识并不是镜子、是用的东西、各方都用得着。感觉理性、都是帮助有机体的生存能力”（《杜威五大演讲》下册，第70页）。实用主义者认为人的认识不能反映感觉以外的任何客观事物及其内部规律性（因为后者的存在是他们所不承认的，至少是他们认为值得“存疑”的）。即使是科学规律的知识，也被实用主义者看做主观的虚构，而不是客观事

物发展规律的反映。胡适说："（一）科学律例是人造的，（二）是假定的"（《实验主义》）。口头上经常挂着科学两个字的实用主义者，却这样无耻地来诬蔑科学。真正爱护科学的人，要打这些用主观唯心论——不可知论来"鱼目混珠"的文化奸商的耳光！科学是什么？列宁说："科学的宗旨就是提供宇宙底真正的……写真"。科学就是研究客观世界一切事物发展规律的学问。自然科学，就是研究自然界一切现象的客观发展规律的学问，"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底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与被剥削群众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55 页）科学的研究，就是建立在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能够为人所认识这一个唯物论的认识论基础之上的。在真正科学的领域里，没有主观唯心论——不可知论立足的余地。斯大林说：

> "世界及其规律完全可能认识，我们对于自然界规律的那些已由经验和实践考验过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知识，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之物，而只有现在尚未认识，但将来却会由科学和实践力量揭示和认识之物。"（《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莫斯科中文版，第 714 页）

所以，科学知识决不是"人造的"和"假定的"，决不是主观的虚构，而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知识"。科学知识之所以成为这种确实的知识，是因为它经过了或者经得起人类社会实践的考验。自然的和社会的科学知识在我们的实践——生产活动、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等——的基础上产生，并且又指导我们的实践获得胜利，这就能证明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性。恩格斯说："既然我们能够用亲自制造出自然界某一现象、依这现象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的事实，来证

明我们对于这一现象理解的正确，那么康德所说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54年版，第22页）所以，自然科学的知识，由于通过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检验，就证明了它是反映自然界发展规律的具有客观真理性的知识。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之能正确地反映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被压迫与被剥削群众的革命斗争的规律，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获得胜利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规律，这是在世界各国——特别是苏联、中国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长期实践斗争中已经反复被证明过了的。

三、抹煞真伪标准的“真理”观

唯物论的认识论指明认识是客观事物在人类主观意识里的反映，认识的正确与否，决定于它的内容是否如实地反映了客观的现实事物，是否符合于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所以，是与非之间，真理与谬误之间，是有着严格的客观标准的。人的认识能够符合于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这就是具有真理性的认识，否则就是谬误。这也是一切真正有科学头脑的人所要承认的原则。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恰恰又和这一个唯物论的原则完全相反，把真理看做纯粹主观的东西，实用主义者否认了任何能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的知识、把人的认识——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看做仅仅是人们主观地虚构出来的“应付环境的工具”，因此，在他们的眼中，一种知识是否具有“真理”意义，就不是决定于它是否能够如实地反映客观现实。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客观现实的存在，所以也就完全谈不到反映客观现实的问题。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一种知识、思想能否帮助他们达到按照他们的主观要求来“应付环境”的目的。这就是说，他们不承认是与非之间，真理与误

谬之间有任何客观的标准。他们把真理与谬误的标准完全看做主观的，胡适说："真理是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所以他若不能对付，便不是真理；他能对付，便是真理"（《实验主义》）。科学的真理，在实用主义者看起来，也并没有反映了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只是人们在主观的应用上认为最方便的一时公认的假设。"科学律例不过是一些最适用的假设，不过是现在公认为解释自然现象最方便的假设"（《实验主义》），所以，在实用主义者看来，一种思想是否科学真理，是决定于它是否被人们"现在公认"为"最方便的假设"这一个主观的标准。按照实用主义的这些荒谬观点说来，那么，科学知识和神话迷信以至于谣言诽语之间，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并且甚至可以互相等同起来了。神话迷信如果一旦被人们"现在公认"为"最方便的假设"，实用主义者就一定要把它当做"真理"看待。反之，即使是正确反映了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如果对于实用主义者的种种卑鄙无耻的反动行为有所不便时，他们就要厚着脸皮来否认它的真理性。所以，实用主义者詹姆士可以把上帝的信仰叫做"真理"，胡适可以强词夺理地否认帝国主义侵略和否认旧中国封建势力的存在，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却采取了疯狂的反对态度。实用主义者捏造这种抹煞客观真伪标准的"真理"观，原来也正是为着要使它成为反动派用来抹煞革命真理，任意"涂抹"现实，任意捏造谎言这样一种"应付环境的工具"！

这样，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论的"真理"观，同时也是完全相对主义的。实用主义者既然把他们的"真理"看做只是人们一时公认的"应付环境"最方便的假设，因此就不承认"真理"的任何绝对的性质，而认为它是可以随着实用主义者以及实用主义者所拥护的反动派的主观的"公认"与否而随意改变的。胡适说："没有绝对的

真理,……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乃是这个时间,这个境地,这个我的这个真理"(《实验主义》),这就是说,实用主义者所谓的"真理",是依赖着实用主义者的主观——"我"为转移的,"我"认为方便的才是真理,我认为不方便的,哪怕是科学上证明了的千真万确的客观法则,"我"仍可以抹煞它的真理性。"我"可以依着我认为方便与否这一个主观标准来随意混淆黑白,颠倒是非,这就是实用主义者的相对主义"真理"观所必然要得到的逻辑上的结论。

人类对于真理的认识有着相对性,这决不等于说认识内容的真伪可以随着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愿望为转移。真理的相对性是由于人们的认识所反映的客观事物本身的相对性,是由于客观事物是依着条件地点时间为转移的不断变化发展的事物。客观事物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具体过程都是相对的,因此,"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但是,第一,一定具体过程的认识的真理性虽然是相对的,但它之所以具有真理性,首先是由于它正确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过程,而并不是由于它是"我"认为方便的假设。真理与谬误决不是依"我"的主观为转移,而要看它是否反映了客观现实。是非真伪的标准永远是在客观方面,这一点却是绝对的,任何时候也不能动摇的,任何时候也不是主观唯心论——不可知论的实用主义者所能随便颠倒的。第二,真理的相对性既然是来源于它所反映的事物发展的具体过程的相对性,因此,这里的相对性的意义,只是说我们的认识应该跟着事物的发展而发展,不应该停顿在固定的一点上,如果满足于现有的知识成就,不知道跟着新鲜事物的出现而努力求取新的知识,或者把对于旧事物的认识当做死公式来硬套到新事物方面,我们的认识就不免一定要发生错误。真理的相对性,决不能解释成为我

们可以在自己主观上认为不方便的时候就随便抹煞一种科学知识的真理性。一种科学知识只要是正确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某一具体过程，它之符合于这一过程发展规律的客观真理性是任何时候也不容抹煞的。就这一点来说，它的真理性就具有绝对的性质。我们只能说当具体过程已发生变化时，这种科学知识对于新的过程就不能适用了，或者说应该把它补充、发展，就这一点来说，它的真理性才是相对的。因此，承认真理的相对性，决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因为它在已经改变了的条件之下不适用，就能否认它之作为正确反映一定具体过程的客观真理，就能把已被实践证明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知识，又叫做谬误的东西。"真理变成谬误"（《反杜林论》，转引自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1953年版，第162页）这话的意思，只是说当我们错误地对待这些知识的时候，当我们把它当做死的公式乱套到不相适应的过程上的时候，就会在我们主观上造成自己的认识的错误，这里也不容许实用主义者来颠倒是非。第三，一定阶段上事物发展的具体过程虽然是相对的，但作为无数具体过程的总和的整个宇宙，却是绝对存在。人的认识发展也反映了这种客观情况：反映了一定具体过程的认识虽然只有相对的真理性，但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反映总的宇宙的绝对真理。所以，与实用主义者的纯粹相对主义的谬论相反，世界上并不是只有相对真理，绝对真理也是存在的。相对真理中就具有着绝对的性质。反映一定具体过程的每一种相对真理，作为客观真理来说，它已经就是绝对的。并且它本身又是总的绝对真理的一个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也具有绝对真理的性质。

四、不是科学的进化论，是庸俗的进化论

实用主义者用生物进化学说的名义作为自己的反科学思想的

假面具。它把主观唯心论装扮成好像是符合于进化论学说的科学观点。它标榜着用进化论的原理来解释人类的生活。谁都知道人类社会生活有自己的特殊的发展规律，决不能简单地归结到生物界的进化规律之内，实用主义者这样做，是既曲解了人类生活，也曲解了生物进化学说。

实用主义者把人的经验、知识、真理等等看做仅仅是“应付环境的工具”，硬说这就是应用了生物界适应环境的科学原理。这是对于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的一个极大的诬蔑！前面已经说过，人类的认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科学知识反映着客观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性，人类掌握了正确的理论知识，掌握了科学真理，就能预见周围事变发展的前途，就能使自己的实践行动成为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的行动，就能使自己的斗争——生产斗争，革命运动等等——战无不胜。决不能说人类的行动都是动物式的没有理性头脑的清醒指导的“应付环境”的活动，决不能说人类的认识、科学真理等只是这种盲目地“应付环境的工具”。实用主义者把人类的认识看做“应付环境的工具”，这仅只是反映了实用主义者自己本身的思想和生活的腐朽性和反动性。如果就胡适一流的实用主义者及其所拥护的反动派的思想和生活来看，那倒可以说是有某些方面和动物类似的。历史发展规律注定了一切反动派要走向灭亡，他们不敢正面认识，因此也就不敢承认周围事变的客观规律，他们所能做的事情就是盲目的垂死的挣扎。因此他们需要寻求任何可以帮助他们苟延残喘的“应付环境的工具”而实用主义者就替他们谋算起来，说可以把“经验”、“知识”等等也当成这样的工具，于是他们就在这样的目的之下捏造了一套不可知论的——主观唯心论的谬论。就其“应付”的盲目性这一点来说，反动派的生活情形和实用主义者的说教，确实具有着动物式的特点，但

这与广大进步人类的生活和思想是完全不相干的。并且，动物适应环境的生存运动，是要改变自己的有机体的性质来适应自然界的一定的客观条件的变化。也就是自发地依循着一定的客观发展规律的。生物的适应环境的行为，并没有包含着实用主义者的那种主观唯心论的妄想，并没有丝毫想要把“实在”当做可以任意“涂抹”和“装扮”的“很服从的女孩子”的企图。但实用主义者谈到“应付环境”的时候，却是抱着极端狂妄的主观唯心论幻想的。杜威说：“生活的进行全在能管理环境。生活的活动必须把周围的变迁一一变换过；必须使有害的势力变成无害的势力；必须使无害的势力变成帮助我们的势力”(《实验主义》)，反动派已经日愈走向垮台，但它还要用一切卑鄙无耻的手段、办法和“工具”，来进行盲目的疯狂挣扎，妄想按照自己的主观目的来任意把“周围的变迁一一变换过”，以图苟延它的“管理环境”的统治地位，这就是实用主义者所谓“应付环境”的真正意义！实用主义者把生物进化论里“适应环境”的概念偷来作为自己的招牌，实际上生物适应环境的进化规律和实用主义者“应付环境”的主观幻想，是根本不相干的。

胡适散布“一点一滴的进化”，“一点一滴的改造”的谬论，否认“根本的解决”(《新思潮的意义》)，并把这也假装作科学的进化论的思想，人们知道，胡适的这种臭名昭著的谬论，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中国的先进人物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封建统治的运动高涨起来的时候散布出来的。历史早已证明，在旧中国那种极端残暴腐朽的反动派统治下面，不进行革命斗争，就不可能使历史前进，在那样的情形下面，口头上讲一点一滴的进化，反对根本的解决，就是在实际上一点一滴也不要解决，就是实际上根本不要进步。胡适自己

的全部行动，都足以证明这种庸俗进化论思想的反动性和虚伪性。

人类社会历史包含着阶级斗争和革命变革的运动，生物界的进化过程里则不存在这些运动形式，所以决不能把生物进化的规律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运动。并且，生物的种类变化也是一种飞跃性质的根本变化，虽然这种飞跃是采取逐渐过渡的形式，但究竟不能仅仅归结为“一点一滴的进化”。所以实用主义者在这里也曲解了生物进化规律，它所宣传的并不是真正科学的进化论思想，而只是一种庸俗进化论的谬误观点。

胡适所散布的庸俗进化论思想和真正的科学的进化论还有一个根本不同的特点，就是科学的进化论证明了生物界的运动发展有着一定的必然的客观规律，而胡适的庸俗进化论则把发展看成一大堆没有任何秩序的事件的偶然凑合。胡适曾把个人的偶然行为的作用加以极度的夸大，想借此来淹没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说，一个人“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他也许‘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善亦不朽，恶亦不朽；功盖万世固然不朽，种一担谷子也可以不朽，喝一杯酒，吐一口痰也可以不朽”（《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很容易明白，这种偶然性崇拜的反科学观点，也是主观唯心论——不可知论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观唯心论否认了物质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就不能不把一切事物及其变化过程都看做偶然的东西。这种唯心论的狂妄胡说是经不起一点认真的驳斥的。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虽然不断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但支配发展过程的东西究竟是必然的规律，偶然因素所引起的任何偏差终归要被必然的大潮流所淹没。不要说吐一口痰和喝一杯酒不会有任何“不朽”的作用，就是像胡适那样以个人毕生的力量来帮助反动派欺骗人民反对革命的活动，因为违反了中国社会

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规律，结果还是要被革命人民所粉碎，就是现在还遗留的一些思想上的有毒影响，也终归要被人民清除得一干二净的。实用主义者的这种崇拜偶然性的荒谬观点在事实前面根本站不住脚。实用主义者散布这种胡说的作用，无非是妄想借此来否认自然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规律的存在，否认阶级矛盾、新旧事物矛盾及其诸方面的斗争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内容和源泉，也就是妄想借此来反对科学规律知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和广大人民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这又不过是反映着接近灭亡的反动派希图依赖什么偶然奇迹来侥幸得救的这种盲目挣扎的绝望心理罢了。

五、不是科学方法，是主观唯心论者“应付环境”的方法

实用主义对于许多知识分子和学术界人士的迷惑作用特别在于方法方面。实用主义者以“实验室的态度”作为标榜，而把自己的方法伪装得最像科学的。许多受迷惑的人把这种伪装误认为就是它的实质。其实，实用主义的方法根本不是能够帮助我们发现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真正科学的方法，它实际上是主观唯心论的虚构事实的方法，是帮助反动派“应付环境”进行垂死挣扎的方法。

实用主义的方法仅仅在形式方面好像是科学的。胡适把这个形式概括为三个部分或三个步骤：“（一）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惟一试金石”（《杜威先生与中国》），有时他把这形式写得更简单一点，那就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

(《我的歧路》)这样的形式很容易和真正科学的方法相混同,如果我们单只注意到它的形式，就难免要受到迷惑。要揭露实用主义的方法的反科学性，必须把它的形式和它的主观唯心论的内容联系起来进行批判，才能达到目的。

先说实用主义方法的所谓第一步，即“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或“细心搜求事实”。这里的反科学性在什么地方呢？这就在于实用主义者所标榜要搜集的“事实”,并不是真正科学研究开始时所要求的事实。科学的研究首先需要有正确的科学的思想方法作为向导，不容许没头没脑地向“事实”里乱钻。这里所说的思想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在这个科学的思想方法的指导下，科学的研究首先要求我们“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要求在开始研究以前要“详细地占有材料”(《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9—800页)。这就是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应该严格地遵守着唯物论的原则，要着眼在“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和“详细地占有材料”上面，不能有丝毫主观随意性掺杂在中间，这与实用主义者泛泛地讲到的所谓“从具体事实与境地下手”与“细心搜求事实”有原则的不同。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决不是一个一个孤立的，而是互相有机地联系着的，实际事物中间有主要与次要之别，有根本的东西与非根本的东西的区别，科学的研究就必须依据着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一方面要详细占有丰富的材料，另一方面又一定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一些根本事实方面，以此作为分析和贯串一切事实材料的核心。例如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根本的实际事物是生产和阶级斗争，因此在着手研究人类社会的问题时，就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生产和阶级斗争这些根本事实上面，必须把阶级矛盾的分析研究作为研究的中心环节。例如研究

历史，就必须以历史上的生产发展情况和阶级斗争的情况作为研究的中心环节，而不应该把地理、人口以及思想文化条件作为中心环节（虽然这些也是应该研究的），研究古典文学（例如《红楼梦》），必须把重点放在作品的阶级背景和阶级内容的分析上，而不应该像胡适那样放在作者、本子上等次要的事实上（虽然这些事实的研究也是必需的），只有这样来着手研究，才可以希望完成科学的研究所要求的任务。只有把出发点布置得正确了，然后向前面去才不至于走错路。

说到实用主义者所谓的“事实”和“境地”时，我们不要忘记实用主义者把“实在”看做人的感觉，感觉之间的关系等主观要素的复合，看做“百依百顺”任人“涂抹”“装扮”的“很服从的女孩子”，看做一大堆没有秩序的偶然事件的凑合。这些唯心论观点在科学前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但实用主义者的研究方法的思想基础，却正是这些主观唯心论的谬误观点。当实用主义者说到“细心搜求事实”的时候，他们不是严格按照“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来“详细地占有材料”，而是依照主观的“兴趣和意志定下选择的目标”，依照偶然的“疑难的境地”（《实验主义》），来提出问题和着手研究的。他们决不肯依照“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本身的秩序，把研究的注意力放在某些根本事实上，相反地却凭着自己的主观的“兴趣和意志”把一些次要的事实和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所以，胡适把古典文学的作者、本事的考据作为研究的主要目标，而把作品的社会背景和阶级内容根本撇开不谈。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也凭着主观的偶然兴趣在怡红院的姑娘们排座次等类枝节的问题上花费了极大的力量。这样的研究结果最多只能在材料校勘性质的工作上——例如一个字的意义或一本书的作者上做出一点成绩，而对于事物的本身则越闹越糊涂，

不能够认清它的本质和规律。至于胡适把中国社会混乱的原因归之于自己闹“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我们走哪条路》及《附录一》),而抹煞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存在这些根本原因,这更足以暴露实用主义者“搜求事实”的方法并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而只是依据着支持反动派这个主观的目的来任意罗织事实罢了。

现在再说第二步——假设的问题。科学的研究常常要经过假设的阶段;当我们对事实材料已经作了某种程度的分析研究,从这里初步归结出一些理论原理原则来,但还没有能够最后确定它是否完全符合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时,我们就把这些原理原则看做待证的假设。要等到再进一步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它确是正确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时,才把它肯定作具有完全的客观真理性的科学规律。科学的假设经过实践的检验而被修改或补充,甚至于根本改造过来,这种情形也是常有的。但是,科学的假设虽然还不是最后确定的客观真理,但它是人们通过科学的研究来认识客观真理的一个步骤,所以,科学家就必须力求使自己的研究所做出的假设尽可能地与客观真理相一致,力求尽可能地使它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因此在制定假设的时候,第一,就必须以丰富的事实材料作基础,特别是要能够掌握最主要最根本的事实。没有丰富的事实材料或没有抓着根本的事实,而只依靠一些枝节的事实,就不能按照尽可能正确反映客观事物规律性这个目标来做出假设。没有阶级斗争的事实材料,就不可能在社会历史的研究方面做出尽可能与客观真理相一致的假设。第二,在作假设的时候,必须小心谨慎,实事求是,极力避免主观主义的因素。必须在科学的思想方法的指导之下,细心地分析事实材料中所显示着的事物各方面的具体矛盾运动,如在社会历史的研究

上必须细心地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阶级的矛盾运动等等。所以，制定科学的假设，必须以谨严为原则，而不应该以“大胆”为原则。实用主义者胡适标榜“大胆的假设”，这不是科学的方法，而只是主观唯心论的方法。主观唯心论者——实用主义者在研究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目的是在于要依着主观的“兴趣和意志定下”的“选择的目标”，来找到某种“应付环境的工具”，他们本来不敢面对客观真理，所以就不得不做出种种“大胆的假设”，也不怕这些“大胆的假设”终归要成为骗人的“大胆”的虚构或“大胆”的武断。胡适为了帮助反动派满足“应付”人民革命运动的目的，不惜武断说帝国主义者也希望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并没有侵略中国。他武断到如此不要脸的程度，以至于连当时拥护他的主张的梁漱溟也替他担心，并写信给他表示恐怕这些胡说连“三尺童子”也骗不了(《我们走哪条路》及《附录一》)。在这里，“大胆的假设”与科学研究的方法根本没有关系，它只是帮助反动派虚构了一些无耻的谎言。

认清楚了实用主义者的“大胆的假设”是怎么一回事，也就可以明白他们是怎样“求证”的了。科学的假设必须经得起实践——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等——的检验。胡适的实用主义方法所做出来的“假设”除了某些个别的事实材料考据之外，常常是一些主观的虚构或主观的武断，这样的假设，当然是经不起实践——首先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的检验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实用主义者口口声声所谓的“细心求证实”，当然并不是表示敢于依照科学的要求，把自己的言论拿到实践的前面来求证明，而只是说要“细心”地按照自己的主观需要，拉扯一些表面现象，来掩饰自己的谎言。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谎言，如果需要掩饰，多少都可以找到一些足以用来掩饰的表面事实的。胡适可以拉一篇帝国主

义者的表面上冠冕堂皇的宣言，来“证实”帝国主义者也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可以把美国在中国办的利用来作欺骗和侵略工具的教会、学校、医院等等，作为帝国主义不要侵略中国的“证据”。这里，实用主义者的主观唯心论又起了方法的作用：这种反动哲学观点要我们相信“实在”就是感觉，相信一个一个的表面现象就是一切，要我们只看见表面现象而忘记了或不要看见最根本的事实或事情的本质。实用主义者所谓的“细心求证实”，原来又可以解释为用表面现象来掩盖事情的本质的意思！很显然，真正科学方法对于认识的客观真理性所要求的实践的检验，决不是这种骗人的东西！

（原载《人民日报》1955年1月22日，曾收入《艾思奇文集》第二卷）

《胡适实用主义批判》一文的修改说明

(1955.3)

《学习》今年第一期曾登载了作者的《胡适实用主义批判》一文，这篇文章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所共同组织的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上曾经讨论过；讨论会上对这篇文章提出了许多修改的和补充的意见。作者曾根据这些意见，写了一篇节要改写的文章，登载在1月22日《人民日报》上。同时作者正在对全文从头作全面的增补修改，不久即将与读者见面。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节要改写的文章上，编者的按语提到作者对这篇文章的某些论点曾作了“原则性的修正”，有些读者来信问及所说的“原则性的修正”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希望作者答复。现在就答复如下：

所谓“原则性的修正”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学习》今年第一期登载的《胡适实用主义批判》一文中，论到实用主义者所说的“经验”的时候，没有指出历来哲学上对于“经验”这个概念的了解，有着唯物论和唯心论两种对立路线的斗争，而实用主义者则是完全用唯心论的观点来解释“经验”的。该文的第二节有这样一段话：“一般经验派哲学对于经验的看法，……就是专指感觉经验，就是感性认识”。这就是没有区别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一种笼统的说法。十七八世纪在英国出现的经验派哲学，就有唯物论和唯心论两派，最先出现的培根和

霍布士的经验派哲学，是属于唯物论派的，他们相信经验是人的认识的来源，是人们通过感觉器官对于外界客观事物的感性认识，他们相信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的存在，并且相信人的经验，人的感官所获得的认识，是外界事物的反映，他们的这些观点是唯物论的，是正确的。他们的错误，是在于不知道感性认识还要上升为理性认识，而理性认识是比感性认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感性认识只能反映事物的片面的表面的现象，而理性认识则能反映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内部规律性。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说："如果以为认识可以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这便是重复了历史上的'经验论'的错误"，这里讲到的"经验论"，就是指唯物论的经验派哲学而言的。所以，唯物论的经验派哲学，并不是完全错误的。至于后来出现的唯心论的经验派哲学，如英国的巴克莱、休谟等人，他们对于经验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是十分荒谬的。他们不承认客观的物质世界的存在，不承认经验是外界客观世界通过我们的感觉器官在主观认识上的反映，他们把经验看做与任何外界事物毫无联系的凭空出现在人的主观意识领域里的"内省经验"，看做仅仅是人的主观的感觉和观念要素的复合。毛泽东同志在批评上述"经验论"的错误的时候，是把它和"说经验只是所谓内省经验的那种唯心的经验论"区别开来的。这个区别是完全必要的，因而我们批判实用主义，是应该把它归结到十分荒谬的巴克莱和休谟一流的唯心论的经验派哲学之内，而决不能把它当做唯物论的经验派哲学来看待的。在《胡适实用主义批判》一文里，在说到实用主义是"爬行经验主义"的时候，就给人这样一种混淆的印象，好像实用主义只是一般地不重视理性认识但却还承认感性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的那种"经验主义"思

想。其实实用主义者不仅仅否认理性认识，否认反映客观事物规律性的理论知识，而且也否认了感性认识，因为按照他们的解释，感觉、经验都是纯粹主观的内省作用，根本说不上什么认识的。实用主义者虽然作了很多的关于“经验”的说教，以重视经验为标榜，其实他们的思想是连一般所谓“爬行经验主义”也还说不上，它只是百分之百的蒙昧主义。

第二，在“认识论和真理论”一节里，谈到胡适所谓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时，把它叫做是“近似机械唯物论性质”的观点，同时引了其中这样的几段话：“空间的无穷之大”，“时间的无穷之长”，“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一切心理现象都是有因的”，“道德礼教都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对于这几段话又作了这样的论断：“这几段话是带有真正唯物论的和真正科学的气味的”。这些论断都是欠考虑的。因为，机械唯物论是指那种用简单的机械力学的原理来企图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现象，18世纪以前的欧洲曾有着这种唯物论，但胡适所谓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则并不是这样的观点。同时上面引的几段话中，除了“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一段以外，都不一定就是唯物论的观点。因为，唯心论也可以承认“空间的无穷之大”，“时间的无穷之长”，但却把空间和时间解释成与任何物质不相干的纯粹存在于人的主观思想领域内的一种抽象的“范畴”。只有承认空间和时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的观点，才是唯物论的。唯心论也可以承认“道德礼教都是变迁的”，但却把变迁的原因仅仅归结到与物质生活条件无关的思想变化方面。只有承认道德礼教变迁的决定的原因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生产的发展的观点才是唯物论的。可

见“宇宙及其中万物的变迁皆是自然的……”这一段话，不应该孤立起来去看。因为胡适在实用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上来说这样的话，结局仍是受到了主观唯心论的曲解，即把这样的说法看做仅仅是主观的信仰，而不是客观的真理。

第三，在批判“庸俗进化论”的一节里，说到胡适的《我们走哪条路》这篇文章里有一些话似乎“承认了革命变革的优越性”，这也是错的。因为，胡适在这篇文章里的有些话虽然好像是在赞成“革命”，其实他所谓的“革命”，并不是真正的革命，即并不是指社会的根本的变革，而只是他所谓的“一点一滴的改造”的一种形式，即多加了一点“自觉的努力”的形式。所以他说“革命和演进本是相对的”，“革命和演进只有一个程度上的差异，并不是绝对不同的两件事”。胡适只承认“一点一滴的进化”，“不承认根本的解决”，他所谓的“革命”，也不是“根本的解决”，因此当他在文字上提到“自觉的革命都优于不自觉的演进”的时候，决不是真的“承认了革命变革的优越性”。

以上三点，就是《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就《胡适实用主义批判》一文做了原则性修改的一些地方。由于该文是在匆忙中赶写出来的，所以除了这些作了原则性修改的论点之外，还有许多的缺点，如逻辑结构欠缺严密，文字条理不够清楚，论断措词不够确切等等，这里不可能，也不必要一一细述。作者正在做全面的修改，以后修改本出版，读者自己就可以看出来的。

（原载《学习》杂志 1955 年第 3 期，1955 年 3 月 2 日）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历史形式*

(1955.2)

尼古拉耶夫专家出去旅行还没有回来，所以要我来代课。本来想请吉谢辽夫专家来代替，因为事情发生得很仓促，马上请专家来讲也不好，而且他的工作已经很多了，所以，还是我来勉强代一下，如果下星期专家还没有回来，那么还是我来讲。

尼古拉也夫留下了提纲，我就照着他的提纲讲，讲完之后还发给大家。

现在开始讲唯物论。今天总的讲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是对客观现实的惟一的科学解释。有三个分题：(一）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历史形式，在讲唯物论前把哲学史，把唯物论发展的历史说明一下。(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的最高形式。(三）简短的结论。

我就照着他的几个题目来讲。尼古拉也夫的讲义可能还不是苏联最新的提纲，最新的提纲最近才确定。苏联新的提纲有两种，

---

* 马列学院一部三、四班新闻班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按原定教学计划，应是苏联专家尼古拉耶夫讲课，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是对客观现实的惟一科学的解释"。因专家外出旅行，由艾思奇临时代课，他于1955年2月9日，只讲了该题中的第一节："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历史形式"，讲了一上午，其他两节没有讲，我们整理时就以所讲的节题为标题，内容按速记稿，只做了文字加工，没有任何删节。

一种是高等学校用的，内容和顺序差不多和旧的一样，就是讲辩证唯物论的七个特征，从辩证法到唯物论所讲的体系和斯大林讲的体系是一样的；另外，还有一种高等学校用的提纲，我手边没有。听专家讲在一般高等教育所用的提纲是这样分的：先讲一般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然后讲辩证法，唯物论、唯心论的根本问题讲过之后讲辩证法的一些范畴，最后讲认识论。

现在在苏联不管用哪一个提纲，方针都是一样的，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不是分开的。以前是分开讲的，先讲辩证法总的帽子和唯物论总的发展，然后讲辩证法的四个特征和唯物论的三个特征。尼古拉也夫的讲义大体是这样：辩证法的绪论、辩证法的四个特征，唯物论的三个特征，在这以前是讲总的东西。总的精神是辩证法和唯物论是打成一片的。

这并不是说尼古拉也夫的讲义不能用了，是可以用的，但是我们应当注意苏联科学的新情况。也就是说，要注意不要把辩证法与唯物论当做两件事情，不要把它分开。学唯物论是学辩证唯物论，而不仅仅学唯物论，大家要有这个概念，那么，看尼古拉也夫的讲义就没有什么缺点了。

现在我就开始照尼古拉也夫同志的讲义作一些解释。在没有讲这个问题以前我把苏联高等学校所用的提纲，关于辩证唯物论总的绪论的要点讲一下。总的题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对象。在总的绪论中有三个题目：第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对象，第二、三个题目就是尼古拉耶夫这两个题目。

为了使大家对苏联新的方向有所了解我想把第一个题目讲一讲。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对象

哲学是什么？哲学是关于世界总的观点和观念的体系，同时，

也是关于世界存在和意识总的规律看法的一个体系。从前我们对哲学定义的说法是比较简单的：哲学就是关于世界最普遍规律的一种科学。这种说法并不错，但新的定义更完整了。

两种关于哲学的根本方向，这两种方向就是唯物论与唯心论。全部哲学的历史里面都包含着两种根本不同的方向，不管派别多少，方向总是两个，或是唯物论，或者是唯心论。

唯心论的哲学是什么东西呢？唯心论的哲学就是僧侣主义精巧形式，照中国话的讲法就是：唯心论就是宗教思想的精巧形式。

哲学的党派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

辩证唯物论是惟一科学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最普遍发展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般哲学的定义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它的特点。辩证法的方法和唯物论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面是统一的。在这个提纲中是一个总的绪论没有分开。辩证唯物论哲学与共产党的政策有着内在的不可分的联系。我们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与共产党的政策密切联系起来进行学习的。所谓党的政策与哲学的联系就是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辩证法、唯物论有它很重要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很重要的特点，它具有现实革命改造的作用，这种哲学要改造世界，是与党的政策有联系的，这种哲学不是凭空的哲学，是与党的政策、作风有联系的。大家在学习《矛盾论》、《实践论》时都学过了。

掌握辩证唯物论哲学，是我们干部在思想上准备的领导任务；这是新的提纲的很大的一个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就是这样。

现在接着讲尼古拉也夫同志的讲义的第一个题目：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历史形式。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在他们创造辩证唯物论以前，他们把整个的哲学史进行了研究，对哲学史作过很深刻的、科学的分析，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哲学史是唯物论发展、成熟的历史。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唯物论的思想都有一定的表现。唯物论的发展反映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和变化。每一种新的唯物论形态的产生都表示人类的思想前进了一步，新的唯物论总归是比旧的唯物论更高的形态。了解唯物论发展的历史，我们就需要研究一下，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唯物论采取过一些什么样的形态。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唯物论的哲学思想大体出现过三种形态。这三种形态表示人类历史发展的三种不同阶段，同时也反映了自然科学发展、进步的不同阶段。过去历史上唯物论所采取的三种形态是哪一些形态呢？首先是古代的朴素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形态；其次是十七八世纪欧洲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形态，主要是机械唯物论；以后还有一种是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形态，就是革命民主主义的唯物论形态，主要表现在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一些人，这种思想不仅在俄国有，其他国家也有，但俄国是最典型的。整个哲学史就是唯物论这三种形态发展的历史。

二、古代唯物论形态

现在先讲古代唯物论的形态。

古代唯物论是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论思想。这种思想在世界各国都有，中国、印度、欧洲的希腊都产生过这种思想。在中国，唯物论是在周朝产生的，时期大约是纪元前 500 年到前 400 年，大约是春秋战国时代。印度产生的时期与中国差不多，在希腊产生的时期也差不多。最早的希腊哲学是纪元前 500—前 400 年，而中

国可能还早一些。

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在西方希腊是奴隶制度。希腊的唯物论哲学是代表奴隶主当中的进步集团。唯物论总的是在社会进步集团中产生的。在过去的唯物论不一定是从劳动人民中产生的，因为，劳动人民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面没有可能发展自己的哲学思想；只有统治阶级才能够从事科学、艺术的研究；劳动人民不可能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唯物论在过去不是从劳动人民中产生的；但是唯物论一定在剥削阶级进步集团中产生。古代的希腊是在奴隶主中与手工业、商业有联系的集团中产生；另外还有的奴隶主是与土地、贵族相联系的，这一集团是保守的、反动的，这个集团就产生了宗教。而希腊与手工业、商业联系的集团就反对贵族集团、反对宗教，并根据科学的知识，对自然知识、数学知识、天文知识总结得出唯物论的结论，来反对宗教，反对迷信。东方的情况不十分清楚。

在我国唯物论最初产生是在周朝时代。根据现在我们的研究大多数人认为周朝是封建制度正在形成的时期。郭沫若认为从周朝开始即转到封建社会，范文澜同志认为从周朝开始就是封建社会。不管怎样，照大多数人的意见，周朝开始了封建时代，产生了唯物论的哲学。

如果根据西方和东方的历史，如果中国大多数人的见解是对的，我们可以说，唯物论产生在奴隶时代或是从奴隶时代向封建社会转化的时期。苏联一般的看法认为古代唯物论是在奴隶制度时产生的。尼古拉也夫同志的讲义就是这样写的。

印度古代唯物论可能也是在奴隶制度时代产生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研究。

古代唯物论哲学总的是在奴隶制度或接近封建制度产生的，

这一个时期在进步集团中对自然的研究有了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有了发展。在中国和农业的发展也有关系，统治者为了能够正确地判断农业耕作时期，所以要研究天文学（我们中国的天文学发展得很早，据现在的看法中国是研究天文学最早的国家）。由于对自然方面的研究使得他们有可能根据唯物论的观点来总结自然知识。以进步的立场来反对反动集团、反对各种旧的传统、反对奴隶制度，因此就反对宗教迷信，这种思想就是唯物论的思想。

古代朴素唯物论思想的特点就是初步认为物质是第一性，是最先存在的东西，认为世界上一切现象都是一种原始物质变化、发展的表现。承认物质是最初的东西，而且物质本身是变化的，由于它的变化能够表现出世界的各种各样的现象。

希腊在纪元前500年左右开始有这样的哲学家，他们主张世界的原始物质是水，认为：万物始于水又回于水。为什么承认水是原始的物质呢？道理不清楚，可能是因为作生意要航海看见到处都是水，因而产生这样思想。后来有一位哲学家认为空气是原始物质。后来有人认为空气也不好，他认为原始物质是一种不定形的物质。这种思想有些类似中国的一句话，在中国曾有这样一种世界观："乾坤初开，混沌未定"。这就是一种混沌的东西，到后来就分出天和地来了。这种思想有的说是春秋开始的，有的说是汉朝的，这种思想和古代希腊思想是一样的。

主张水是原始物质的是希腊哲学家塔利斯；主张世界是混沌的是安纳西曼德，中国有淮南子和邹衍等。

在希腊除了主张原始物质是水、空气和无定形物质外，还有一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主张原始物质是火。赫拉克利特是希腊古代最高的哲学家，他认为：世界"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和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在希腊大体有这四种。

在印度认为原始物质有四种，就是地、水、火、风，地就是土，风就是空气。后来有一个科学家主张再加上一个，一直到纪元前三四世纪亚里斯多德也有这样的主张。

中国古代唯物论者有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思想。

这就是古代唯物论的一些主要思想。这种唯物论同时是辩证的，因为它主张物质会自己变化，他们认为，这种原始物质不是永久不变的。这种朴素的唯物论，我们现在来看就很幼稚。现在我们知道，原始物质是没有的，他们对辩证法的内容是不清楚的。古代唯物论根据对世界表面印象的一种估计和猜想，没有精密的科学研究作它的基础，世界物质变化的面貌究竟是怎样的，不清楚；尽管具体想法是错的，但是基本思想是对的。他们认为物质是第一性，承认物质是会变化的这种思想是正确的。所以，在当时是进步的，进步的表现就是批判了宗教，反对了旧的制度，反对了反动阶级，因此，它起了进步的作用。它承认世界是物质的东西，给科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因为科学研究是建筑在唯物论的基础上的。我们只有相信世界是物质的，才能研究科学，反对旧思想、旧制度，从而又为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所以，它是进步的。

希腊古代最大的哲学家是德谟克里特，希腊第一个原子论者。以前认为原始物质是水、火等等，德谟克里特认为世界元素物质不是水、火或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某一种物质，他认为：世界物质根本的东西是一种原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彼此没有多大区别的、性质相同的原子形成的。原子是永远向下落的，发生旋转冲撞结成许多物质。他用原子来解释自然界的现象，而且解释得很合理。比如放在炉子上烧的开水壶为什么会把壶盖冲开？是因为水是原子组成的，加热的结果就膨胀了所以壶盖就冲开了，这

就是水沸腾的现象。

以后到16世纪许多希腊的科学家在解释许多自然现象的时候都运用了德漠克里特的学说，都用原子论的理论来解释自然科学。德漠克里特的思想在欧洲科学家的影响有一千年之久。统治阶级对原子论是反对的；但是研究科学的人始终研究他的学说，但是，他的学说受到统治阶级的压迫，很多都失传了，但还有很多仍然被保存下来了。

在中国比金、木、水、火、土以及混沌哲学思想更早一点的也有，比如老子、墨子的哲学思想比较最朴素。老子认为世界的变化是自然而然的变化，而不是人为的。他反对人用主观的意志来干涉自然。当然，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人是可以改造自然的，但是第一个思想是对的，就是世界是变化的。老子思想的唯物论基础以及汉朝的王冲就是这样的思想。

以上就是古代唯物论思想。唯物论思想并不是孤立产生的。唯物论思想的发展是与唯心论思想斗争中产生的。在苏联新的提纲中讲唯物论历史形态时首先有一个总的概括：哲学史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中发展的历史。所以，在古代有了唯物论，同时也就产生了唯心论。唯物论必须和唯心论作斗争，唯物论最初是与宗教迷信作斗争，宗教迷信工具被打倒之后不能用了，它就发展了唯心论的思想来与唯物论作斗争。

唯心论的阶级基础是剥削阶级当中的反动派（在马克思主义以前这样说）。唯心论也有它认识论的基础，唯心论之所以迷惑人是因为有点片面的根据，片面当然就不是正确的了。

列宁曾经说过：人的认识就像一串圆圈一样，人的认识的发展是曲折的，螺旋式的。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谈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感性认识，在许多方面连续不断地认识才能成

为一个总的认识。最初的认识总是片面的，然后逐渐才能全面。

比如，我们在这里学习，大家在开始学理论时都准备要读多少书，实际上，这个认识是片面的。来了之后，了解学习要联系实际，这样，在思想上就要曲折一下。我们一强调联系实际，有人就偏了，要求教员讲时事、讲红楼梦等一些实际问题，或检查自己，因此，理论原则也不管了，这又错了。我们讲理论联系实际，首先理论原则要搞清楚，然后联系实际才是正确的。从这里可以了解，认识总是偏来偏去，最后得出正确的认识。

在哲学史上就有这两个偏向，一个时期认为只有经验，感觉是可靠的，理性认识是不可靠的。又有一派认为理性是可靠的，这派叫做理性派。实际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联系的。要掌握材料，但是要用脑子、要思索，认识就是这样一种循环，因为认识本身就是这样的。

唯心论就是抓住一个片面，抓住它加以夸大。唯心论产生的最普遍的方法就是抓住认识的一部分，绝对化起来，与别的部分脱离开，比如说，实用主义唯心论经验派，认为感觉就是认识的来源。我们不能通过感觉去认识物质，感觉的来源是物质，唯物论认为物质到感觉以及感觉到认识是有联系的。唯心论只夸大感觉到认识，而把物质到感觉这一阶段给切断了，并把它绝对化了，这就是唯心论。

唯心论产生以后，反动派经常用这种方法来制造唯心论。柏拉图是欧洲古代最大的唯心论哲学家，他认为认识惟一可靠的方法是靠理性、靠思索。他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有一种理性认识的能力，可以不通过考察就直接去认识真理。

这种唯心论的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呢？理性认识本身有这种特点，它能够抓住事物比较带有本质的东西，有的凭感觉也感觉不

到，但是在思索的时候可以思索得到。比如共产主义社会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现在研究、解释是从理性推论共产主义是一定要实现的，人的理性有这样一个特点。比如，原子是无论如何也看不见的，但是可以用我们的理性去设想一种不可分的东西就是原子。电子无论怎样也是看不见的，在电子显微镜下也只能看到它在发光，有声音，但究竟多大看不见，速度很快，光速一秒钟 30 万万公里，但是可以在理性上设想，电子是小到几乎不可分的一种东西。

唯心论抓住了这一点，认为只有理性是可靠的，感觉是不可靠的，因此，我们感觉到的一切东西都是一些幻影；世界真正的东西是理性的东西，一些概念的东西，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世界的基础就是理性，真正的世界是理性的世界，而没有物质世界。

古代柏拉图就是利用这一套逻辑来反对唯物论；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感觉来认识物质，通过感觉得到物质材料，根据这种材料抓住本质的东西用我们的思想来理解这些关系，认识物质本身的规律。唯物论的认识论是一种正确的观点。而柏拉图的认识观点把感觉到理性这个阶段给切断了，只抓住理性而丢掉了感性。

古代有了唯物论以及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产生之后，接着出现了柏拉图的唯心论，柏拉图对唯物论是仇视的，他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他公开拥护贵族奴隶主的制度。

我们中国也有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比如，孔子是唯心论者，老子是唯物论者，墨子是唯物论者，但也有人主张他是唯心论者，是代表反动的奴隶主的，问题还没有定论，所以不好讲。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老子在后来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上来看，关于唯物论系统从老子方面接受得多，而唯心论方面从孔子和孟子方面接受得多一点。也有人认为孔子是唯物论者，也可能有一部分唯物论的因素，比如孔子是很重视学习的，这可能是唯物论的

因素。

古代朴素的唯物论之后，到了长期的封建的统治时代，这个时期在欧洲是一千年，在中国有两千年。封建时代主要的，处于支配思想的是唯心论思想。在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是这样。欧洲中古时代的哲学是经院哲学、烦琐哲学，有些钻牛角尖，这种哲学是为神学服务的，为了说明圣经和为了证明教义是正确的哲学。比如研究和证明天使能不能在针尖上站住等这样一些烦琐到极点的、钻牛角尖的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叫它为经院哲学。

中国从秦汉以后，到宋、明儒家的哲学占主要的地位，总的招牌是孔子，他和经院哲学是一样的。在欧洲是要证明教义是正确的，在中国一两千年的封建时代的哲学直接或间接地是为了证明孔子的哲学是正确的，虽然证明的方法不一样，证明的内容也很复杂，但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孔子的哲学是不错的，但说法不一样。在欧洲也是一样，首先要承认基督教是不错的，但说法是不同的。

在封建时代唯物论也不是完全被消灭了，唯物论是受压迫的，它不能公开进行宣传，但是唯物论的发展并没有停止。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很缓慢，但总是发展的。对自然界的研究受到了宗教的阻碍，比如，孔子是不喜欢自然界的，所以，研究自然界的人，一些学者一般是不能够成为儒者，是不能进孔门的，而道家有时候反而研究自然界。虽然如此，自然界的研究多少还是有所发展的。中国许多的发明是在封建时代，比如造纸、火药、指南针以及医学在封建时代都很发展。

中国的医学苏联很重视，有些西医治不了的病，而中医能治，但是我们没有科学的证明，只凭经验。明朝李时珍曾总结出一些东西写成《本草纲目》。

因此，唯物论并没有停止。汉朝唯物论者王充发展了老子的学说，他主张世界是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他反对宗教迷信。六朝时候的唯物论者范缜，他主要的著作有《神灭论》，他主张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就像刀和刃的关系，物质消灭了精神也就消灭了，刀消灭了，刃也就消灭了，所以精神完全是第二位的，而物质是第一性的。这是相当彻底的唯物论。他提出之后，梁武帝立刻组织了六七十人来反驳他，但是也没有办法反驳倒，后来就禁止出版他的著作，但是还是间接地被人介绍出来，因为要反对他所以还要介绍出来。方才所讲的是比较完整地流传到现在的一些东西。在封建社会时期，中国的哲学唯物论者就是以上两个人。唯心论加唯物论者也有一些人。

现在我们讲一讲在专家讲义中曾提到明朝的李贽（即李卓吾）。在苏联曾作了结论说明他是唯物论者，这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他是唯心主义者。在讲义中曾说，他证明天生的知识、天生的观念是不存在的。恰恰相反，他认为，人认识真理是天生的不受外界的扰乱，是凭理性来认识真理的。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结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要与专家谈一下。李贽对封建的统治来说是一个叛徒，对礼教和封建制度来说是有反抗思想的。他对明末当时的统治者是反抗，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反封建的思想，但是，世界观是主观的唯心论的。

苏联有些作研究工作的同志可能是太强调他反封建这一面，而没有注意到他的哲学思想是主观唯心论的。北京大学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结果找不到多少材料。曾有一个人研究说，李贽的哲学思想不但是唯心论的，而且又是唯物论的。关于这个问题只提一提，大家注意一下。

欧洲中世纪唯名论与实在论是对立的。实在论在中世纪是唯

心论，而唯名论是唯物论的。因为中世纪的实在论主张抽象的概念是真正存在的，而具体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所以，它是唯心论的。为什么这样主张呢？是想要证明上帝的存在，普遍的东西才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与柏拉图思想是一样的，认为总的东西的感觉是幻影，由此就得出：上帝是最有实在性的。

唯名论者则相反，他认为世界只有个别的、具体的事物存在，而普遍的东西只是概念，而概念仅仅是一个名字。比如说，一个个人是真实存在的，至于“人”这个概念无非把它概括起来罢了。他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而概念、思维是第二性的东西。而唯名论者把概念完全看成名字，他不懂得概念也是反映物质内部的规律，比如“人”这个概念是许多人的总的名称，但是，在人的概念里概括了人的本质。用马克思的观点来看，人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动物是不同的，动物是自然的有机体，人也是自然有机体，人所以是人，是由于他是阶级的人，是在生产地位上的人；人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只认识张三、王五、赵二这个人的名字，究竟人的本质是怎样的不认识。唯名论的缺点是不了解理性。

最近，在《解放日报》上王若水有一篇文章，说实用主义是与唯名论有联系的。实际上，这是错误的，他把唯名论片面化了。实用主义只承认一点点东西，认为事物没有一个概括的总的规律的看法。实用主义者认为世界是主观的感觉，并没有客观的物质存在，认为世界的发展是一点一点感觉的发展。

三、近代唯物论形态

现在我们进一步来讲一讲近代唯物论形态。

封建时代的唯物论基本不超出古代的原始的辩证唯物论的水

平，虽然有些地方有些发展，基本上还是朴素的原始的唯物论。

近代的唯物论采取了一种新的形态，比古代的唯物论是更高的形态。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近代唯物论形态是在17至18世纪。在苏联新的提纲中所写的是16至18世纪。这样提还是对的。因为16至18世纪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以，这个时期的唯物论就叫做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唯物论，这是完全合乎事实的。因为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是17至18世纪，而是从16世纪就开始了。17至18世纪主要是英国的革命，在17世纪以前曾有过德国的农民战争、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等，这都应当包括在资产阶级革命当中的。

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时期，即16至18世纪中，发展了资产阶级唯物论的思想。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时候是有唯物论的思想的，在革命结束之后资产阶级在哲学上就转入了唯心论。19世纪就是这样。

资产阶级唯物论是在16至18世纪产生的。在16世纪时已经有些自然科学家开始发展一种唯物论思想，主要是天文学。如天文学家哥白尼、布鲁诺。布鲁诺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他从天文学的研究中做出了哲学的结论，主张天体的运动是自己的运动，不是神的推动。他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但否认天体运动是上帝的推动。布鲁诺认为人类的生活不仅是地球上有，而在其他星球上也可能有人类。

16世纪已经有资产阶级唯物论的思想；17世纪正式出现了有系统的、近代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思想。英国的培根第一次提出了科学的方法。承认世界上有物质存在，物质经过归纳法的研究才能得到真理，认为演绎法是得不到真理的。要证明真理一定要研究材料，经过归纳找出新的真理；反对一切成见（偶像），应完

全反映科学发展的要求来研究新的规律。

霍布斯进一步发展了培根的思想,使唯物论的思想更彻底,培根主张唯物论,但是,不否认上帝的存在,他进步的地方就是将新的知识归纳、研究找出新的规律;只是霍布斯把培根的思想推论到无神论,他的理论就是说,我们的知识是现实的感觉,我们的感觉反映了客观物质的形式。所以,一切真正知识的来源是感觉、是经验,我们由一种理性对经验进行一些概念的认识,这样一些概念只是一种名字,理性认识只能给物质加上一个名字。他的思想是从唯名论来的,而唯名论是从英国发展出来的。把许多感觉归纳起来给它一些概念——名字。所以,概念正确不正确就要靠名字代表的内容怎样。

霍布斯比唯名论进步的东西是,名字也有一些意义,但有时候也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把名字给予一些经验和内容,这样"名字"就有了实际的意义,就不是空的,与实际经验不适合就是空的,是没有意思的。根据这样一套理论,有这样一些名词,而没有形体的实体,这样一个名字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讲实体,一定要承认有形体,一定要有具体的内容,一定是实实在在有形体的东西。没有形体的实体是不能设想的,即使能够设想,也没有什么意义。这一条就冒犯了上帝。因为上帝的概念就是一种没有形体的精神,因此,上帝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这一结果即走到无神论方面去了,把唯物论彻底化了。在英国来说在当时是空前绝后的,在英国资产阶级当中能够把唯物论发展到无神论,霍布斯是惟一的一个。

18 世纪唯物论是在法国,它与当时法国革命配合起来了。法国唯物论在法国革命以前人很多,它的领袖人物是狄德罗。法国唯物论的特点就是坚决与宗教斗争,正式提出无神论这一名词,比

英国要坚决得多了。

十七八世纪的唯物论都有缺点，它是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的唯物论。他们认为物质就是一种物体，物质的性质是不会变化的，物质的运动只有位置的移动，他不了解发展，不了解除了机械运动还有变化和物质的另一种形态。十七八世纪的唯物论不了解一切的物质都有一个性质。有一定的重量和运动、空间，这都是物质自己的性质，都是机械的性质。现在我们认识物质性质的内容就多了。比如电子有电磁性……这些性质当时机械唯物论者是不能了解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唯物论的缺点之一就是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

其次，这个唯物论对历史来说是不彻底的。在历史观点上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唯物论者来说就不能彻底，这种唯物论者的历史观点仍然是唯心论的。他们对历史发展的看法认为“意志支配世界”，认为有很高理性的人就能够转变世界的历史。

这一些就是 16 至 18 世纪唯物论思想的一些缺点，这些缺点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条件的限制，也反映了科学发展的限制。当时自然科学中力学是最发达的科学，而关于有机界的科学只不过刚刚萌芽。比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只是把一些东西搜集起来加以分类，每一类有什么性质，把每一类当做不变的，把分类看做绝对的。当时的科学一般是在搜集材料，而系统的科学只有力学。所以，不能不用机械的观点来看世界。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质，和机械论的世界观有不可分割的联系。18 世纪唯物论者拉美特利曾著了一本书叫做《人即机器》，用机器来解释一切，用唯心论的观点来解释历史，这就是资产阶级唯物论，它受科学发展的限制和资产阶级的限制。

资产阶级不能不这样设想：历史是永远不变的。资产阶级认

为资本主义是永久合理的。由于资产阶级的立场，自然而然就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要人按照资产阶级的模型想出一个社会制度来，那么就会实现，就会变成一个永久的制度。这就是英国和法国唯物论、机械论的特点。

在资产阶级唯物论当中，法国的唯物论发展到顶点，到德国之后，资产阶级的哲学就开始转入唯心论，表现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上，他们害怕劳动人民的力量，而对封建制度妥协。德国的封建社会比较强大，大资产阶级很少，德国实际上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国家，对封建制度采取投降主义的政策。德国古代哲学就是这样：也愿意进步，但是愿意从思想方面进行改良，不要采取向封建制度进攻的方式。这就表现了唯心论思想。从康德到黑格尔他们都认为历史的变化就是思想的变化，而不能反映革命、社会变化的客观情况。哲学如果不能总结和概括科学、历史，就不能成为代表一个时代的哲学。

德国古典的哲学是当时最高的哲学。因为事实上它是按科学的成就和历史的经验总结出来的。科学的成就，特别是当时的经验不能不做出哲学的结论。因为当时的变化很大，如果不承认世界的变化，辩证法就不能说明问题了。所以，在德国古典的哲学就发展了辩证法。承认世界是不断运动、变化的，但是，唯心论者认为是思想、理性的变化，否认物质的变化。承认辩证法是真理，这在哲学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辩证法在黑格尔哲学和古代哲学里受到限制，结果这种辩证法成了死的公式。用否定之否定的法则来概括一切，认为一切事物的发展经过三段，即三段论，把合理的辩证法变成死的东西，这就是说，辩证法与唯心论是有矛盾的，辩证法是与唯心论体系矛盾的。这个矛盾在马列主义哲学出现之后才解决。

既然，承认世界一切是变化发展的，就不能用任何一个公式来概括一切，就要承认方法是服从于客观事实。物质是怎样变化的，我们的方法就应当怎样，应当承认辩证法有多种多样的表现，而不能成为一个简单的公式。首先，应当承认客观事物，我们的方法是从各种各样的物质当中概括出来的，不是死的。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不变的，但是它的具体形式是没有止境的。新的事物产生辩证法新的表现，有它自己的规律，但是，不能用简单的公式来概括，这样才能解决方法与体系的矛盾。唯心论它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唯心论它一定要制造一个主观的公式，它认为思想是最根本的东西，所以，它一定妨碍辩证法合理的内容，因此，没有辩证唯物论出现，矛盾是不能解决的。

我们现在简单讲一下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唯物论在中国是没有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从清朝到“五四”）是没有彻底的唯物论的。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可以说有一点唯物论的因素，而孙中山比康有为的因素多一些。孙中山是不相信神的，但是他曾经是基督教徒，孙中山的思想接近资产阶级唯物论的哲学思想，但是他的思想又很混乱，他有时曾说精神是物质的作用，没有物质，精神就无从寄托。又说，如果没有物质就表现不出精神。孙中山不是专门研究哲学的，所以，他的思想就有些混乱，不成为一个系统，没有严格的逻辑，孙中山思想有很浓的二元论的因素。一般来说，世界观唯物论因素多一些，他承认科学、相信科学，承认物质是客观存在的，知识是材料积累得来的，物质的发展，知识也要发展。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也可能与此有些关系。但是比较欧洲的唯物论哲学家来，是差得很远的，孙中山的妥协性还是很大的。

苏联认为孙中山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因素，这个判断是有根

据的。

革命民主主义者主要是指俄国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这些人的思想，按照他们革命行动的性质来讲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质，但是，不是靠资产阶级，而是想依靠农民来推翻封建，他们的号召是："到农民中间去"。民粹派的前期就是这种思想。这种思想的要求是农民自己解放自己，他们的唯物论是农民的思想体系，这种唯物论不仅承认物质的客观存在，而且承认物质是发展、变化的，所以，这种唯物论是接近辩证唯物论的。

法国唯物论机械地认为：最低级的物质是存在的，高级的精神和低级的物质并没有什么质的区别。法国唯物论者不理解，好像鸡蛋与人的精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只是程度不同。

革命民主主义者看出思想、精神是自然界高级阶段，他肯定了辩证法的作用，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论，肯定了辩证法是对的。赫尔岑说：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具体的革命行动可以根据辩证法的分析来制造。

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特点大体是这样。但是，历史观是唯心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论思想在理论上超过了法国的唯物论，但是历史观点却仍没有超出法国唯物论，仍然是唯心论。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历史的发展是科学、知识、思想的发展，认为科学、知识是第一位的东西，历史本身、物质则是第二位的东西。

列宁曾这样判断：他们的思想已经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但是走到历史的面前就停止了。孙中山是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呢？列宁曾经讲过：孙中山的思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孙中山的思想是自由资产阶级而带有小资产阶级的因素。对孙中山的判断有一个来源，大概是看了孙中山所写的一些纲领，比如土地纲领

中写到“耕者有其田”，这反映孙中山看到农民的力量和要求，因此，他的思想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孙中山当时可能受到欧洲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后来又受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些影响，提出了民主主义，他用了社会主义的一些话加在里面，实际上，他也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但在他的著作中曾提到马克思的名字。“耕者有其田”的思想与民粹派是有共同点的，他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农民的要求，这表明他有些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因素，但是孙中山决不是完全的民主主义者。

在专家的讲义里认为孙中山的唯物论是革命民主主义的，这些判断还可以研究。说孙中山的思想有革命民主主义的因素是可以的，但是，他还不像革命民主主义者那样相信农民、相信群众，他有“先知先觉”的看法，认为老百姓是阿斗，领袖人物是诸葛亮，认为老百姓有权，没有能力。所以，他的思想比俄国民主主义者差得很远。

俄国的民主主义是非常典型的，在其他国家也同样有这样的因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从前唯物论的最高峰，它已经接近于辩证唯物论。这方面主要表现在俄国民主主义者的身上，而并不表现在孙中山身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有些唯物论的因素，但也有唯心论的一方面，有时候他把知难绝对化了。在孙中山的思想中有很浓的二元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也表现在哲学方面，他不像民粹派那样彻底。

在中国的思想家中间也许鲁迅的思想（在他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前）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相当，他后来走向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偶然的。鲁迅是农村出身的，他对农民的感情是很深的。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社戏》，写他与小时候的朋友润土见面时的情形，从这里看出他的农民情感是很深的。在《阿Q正传》中鲁迅对阿

Q有所批评，但是同情更多一些。对农民有所希望，很希望农民觉悟起来。在鲁迅的文章中有很多是写农村妇女的如《祥林嫂》、《祝福》等，他对农民是很同情的，但是，他对农民力量的相信没有俄国民主主义那么大。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相信农民，他们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鲁迅对农民有热情、有希望，但是，又觉得农民像阿Q没有什么办法，因而，有消极的情绪，这是鲁迅不够的地方，但是，他的根本思想是同情农民的。这是“五四”前后，鲁迅还没有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思想。在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时，他的世界观是唯物论的，但是，他的历史观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一样是唯心论的。鲁迅用“进化论”来解释历史，就是用生存竞争的理论来解释历史，认为生存竞争要靠生命力。鲁迅特别强调生命力，他认为中国从来是落后的就是因为生命力没有发展。这种思想是受日本唯心论哲学家的影响。日本唯心论哲学家厨川白村认为日本生命力不强，就是太阳光也是淡的。他的文章写得很好，著有《苦闷的象征》等书。他是宣传人的生命力的。

鲁迅有一个时期很喜欢青年表现有很强的生命力，比如曾有一个人自己办一个刊物，自己写文章，自己出版，他认为这个人生命力很强，他很热情地帮助他，结果到后来这个人反过来骂鲁迅，这是主观唯心论的思想。

胡风的思想他蔑视客观事实，而用主观战斗精神来隐蔽客观事实，他认为主观战斗精神应该是一个伟大作家的思想。表面看来仿佛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思想的本质是主观唯心论。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胡风的思想不会是从虚无主义来的，因为按照胡风的说法，他没有接触过虚无主义，但是，他的思想和虚无主义是有共同之点的。也可能是鲁迅介绍日本的哲学中讲生命力

的影响，因此，用在人类最主要的是生命力，那么生命力就表现为主观战斗精神，只要能够战斗，至于为谁战斗可以不管，那么他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现在我们批判胡风思想主要在这方面。胡风过去曾受鲁迅的影响很大，但这还不是结论，大家以后可以在这方面多注意。

什么是我们的远大前途*

(1955.2)

一、问题是这样的

《中国青年》从1954年第三期开始了“什么是我们的远大前途?”的讨论，上面首先发表了史连才给《中国青年》编辑部的一封信，编辑部在“编者的话”中这样写道：

“全国人民现在都在学习我们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通过这个学习，青年们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思想觉悟，增强了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信心。很多青年工作和劳动的热情更加高涨了，但也还有一小部分青年，看到国家的前途光芒万丈，而自己还在做平凡具体的工作，工作和学习的条件又不好，感到个人前途很渺茫。像史连才这样，弄得脱离革命队伍的情况，虽然是个别的，但是他来信中反映的思想问题，在有一部分青年的思想中是或多或少存在的。因此，我们认为展开这个讨论，对于进一步提高并巩固我们学习总路线的收获，动员我们自己的全部精力，把我们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会有帮助的。”

那么，史连才在给《中国青年》编辑部的信中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他在信中写道：

---

* 这是艾思奇应《中国青年》编辑部之约，为“什么是我们的远大前途”的讨论所作的总结。后曾出版单行本。

“我是广东人，今年 21 岁，1951 年 7 月初中毕业后参加革命工作。最初，组织上派我去学习会计，半年后结业，我就被分配到一个县合作总社会计股工作。这中间我曾参加过土地改革、‘三反’、整党等一系列的学习，政治觉悟是有所提高的。但我对于作会计工作始终是没有兴趣的。我觉得人生在世上，应该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像我这样，成天像过去做生意人家的账房先生一样，记记账，打打算盘，当一辈子普通的会计员，无声无息地生活下去，实在太没意思了。我必须摆脱这个环境，发展我的才能，不要使将来的专家被埋没了。何况，祖国已在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建设是需要专门人才的，如果我不掌握一门建设的技术，又怎能在建设祖国的事业中有所贡献呢？我希望进专科学校或大学里去学习一项专门技术。但这个理想一直不能实现，使我很失望。我反复考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前途是决定于他的事业上的成就，而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就要有知识和技能。要有知识和技能又必须去上学，或者有一个好的工作岗位，可以有机会成为一个专家。但我现在的工作是那样平庸，环境又很差，这样庸庸碌碌地干下去，很快地就会渡过了青春时代，有什么前途呢？在苦闷的时候，我甚至想到一切都是空的，干一天说一天吧！工作也提不起劲来，一坐下来就烦腻，无精打采的，常常记错账。……就在这时，因为工作需要，我被调到海南岛去工作了。

“到海南岛去的时候，心里本不甚愿意，但心里想：服从祖国需要吗，去就去吧！又想：橡胶对国家建设很重要，海南岛风景又很美丽，将来海南岛变成了美丽的橡胶园，工作之暇，可以在橡胶树下吃椰子、西瓜。有这样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不是也很好吗？

“到海南岛后，我被派到一个垦殖分场里作会计。这里是在深

山丛林里，住的是茅房，一切设备都很简陋，从大陆去的干部只我一个人，言语也不大相通，感情不投，没有学习制度，领导水平也不高。这里的工作，比一个县里的区的工作要简单得多。我想：这样下去连会计业务将来也要丢光了，更说不上其他方面的提高了；要不是调到这里来，现在不是在县合作总社热热闹闹地工作吗？或者我已经申请入团了；或者也许会把我送到学校里读书呢！悔不该服从组织分配，如今来到这倒霉的地方，干这倒霉的工作，等到将来，国家建设好了，那时思想上比不上别人了，也没有一点技术；又想到过去的同学，有的高中快毕业了，就要进大学了，将来都成为专家了，而我自己呢？再在这里呆下去，如果将来和他们碰在一起，人家是专家，我是一个小会计员，论地位比待遇，我都不如人家，有何面目见他们呢？越想我越觉得：还是坚决离开这里好，组织上能送我去读书更好，不送我去读书，就自己想办法，只要离开这里，不论到什么地方总比这里好。但是，我又怕脱离组织会犯错误。不过又想：如果能到学校里去读书，到政治空气浓厚的地方，就是犯错误也值得。于是，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人事股，要求调工作，并要求赶快派人来接工作，否则我就不负任何责任。后来组织上和我谈了几次话，进行说服，我还是要求辞职，最后组织上没法，便批准了。……这样，我于去年12月初回到了广州。”

史连才回到广州后，“陷入了十分痛苦的境地，走投无路，苦恼万分”，他感到，“国家前途光芒万丈，而我自己的前途呢，却真是暗淡无光了。”因此，他在信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我希望你们能给我指出一条出路，使我能痛改前非。”

问题的讨论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个讨论，引起了青年们极其广泛的反应，仅仅两月中间，编

辑部收到的文稿就有八九千件之多，写稿的人包括在各种各样岗位上，从事各种各样职业和工作的青年。其中有会计员、统计员、收发员、营业员、护士、文书、打字员、技术员、科员、做总务工作的、做秘书工作的、学校学生、农村工作干部，也有做编辑工作的……。可见这个问题是目前广大青年群众中间普遍关心的问题，同时也是应该解决和可以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问题是应该解决的呢？因为目前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非常复杂艰巨的事业，需要全国人民从各个方面一致努力，才有完成的可能；也需要广大的青年同志们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中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青年们所担负的每一个具体工作都做到尽可能的好，使青年们的知识和身体不断增长，能够成为国家建设事业中间的优秀的干部。但是，如果青年们对于自己的前途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如果青年们不能够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总的前途正确地结合起来，相反地却把两者对立起来，甚至于误认为国家的前途虽然光明远大，而个人却找不到出路，那么，要想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中发挥高度的积极性、主动性，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个问题是每个青年所必须解决的。

这个问题能不能正确解决呢？我们认为是可以正确解决的。参加这次讨论的很多稿件的内容，告诉我们：虽然有不少的青年同志们，都曾经或多或少地有过类似史连才那样的错误思想；虽然史连才的思想问题的确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相当普遍的问题；但在另一方面，有很多同志都来信检讨了这种错误思想和这种错误思想使自己在工作上和思想上所吃到的苦头，说明了在吃到这些苦头之后个人所获得的觉悟，并对史连才的这类错误思想发表了批评的意见。各个人的意见虽然都只是接触到了问题的某一个

方面，但一般都是比较正确的。这就说明几年来青年们所受到的政治教育，特别是最近时期总路线的教育，已经使得他们有可能凭着自己的体验和理解，来正确地解决这一个切身的重要问题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问题讨论所接触到的主要论点，作一个较有系统的阐述，把它明确地贯穿起来，使许多青年们几年来已经获得了的某些正确的理解更加深入一步，以便更好地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二、前提和原因

为什么关于前途的问题的讨论竟会获得青年们这样广泛的反应呢？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之所以被广大青年们如此普遍地关心，原因之一自然是像加里宁所说的，青年们“抱有做理想事业的宏大志愿”这一个特点，因此对于前途的问题就容易感到兴趣。然而这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依我们看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民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了解放，中国青年也得到了解放。

如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包括广大的青年，都欢欣鼓舞地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事业的道路。社会主义的事业是广大人民的共同事业，而决不是少数人的事业，任何一种工作岗位上的人，哪怕是做最“平凡”、最“琐碎”的事务的人，都被看做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少的一分子，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会受到社会的适当的照顾，他们的发展进步都为社会所关心。就譬如说厨房的炊事员或扫地提水的公务员吧，要是在旧社会里，谁也不会把他们的工作看重的，不但不被看重，而且是要受歧视和压迫的。但在新中国，由于他们的职务是保证一切工作人员的物

质生活条件所必不可少的，他们的工作就受到人民的重视，他们也会获得适当的学习进修的机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试想一想，倘若中国现在还没有解放，倘若青年们现在还处在反动派所统治的旧社会环境里，每天只愁着眼前的生活问题，连找一个吃饭糊口的职业也非常困难，或者即使有了职业，也还要经常担心不知哪一天又要遭到失业饿饭的危险，哪里还能够有现在这样从容不迫的心情来讨论什么远大前途的问题呢？对于这一点，许多青年是有着深切的体会的，中央地质部竹正同志写道：

“我觉得个人前途是和国家前途不可分的。没有国家的前途，就谈不到个人的前途。解放前我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不但许多人不能好好学习，而且日夜为着毕业后的工作问题而苦恼。‘毕业即失业’，根本谈不到青年有什么前途。只是在解放以后，我才在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教育培养下，学得了一些东西，并且参加了工作——统计工作。”

所以，现在青年们所以能够普遍地在主观上考虑到自己的远大前途的问题，正是由于在客观上新中国已为青年们开辟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美妙前途的缘故。这是在解决大家所讨论的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必须认识到的一个前提。

但是，既然新中国已为青年们开辟了社会主义的远大前途，为什么还需要讨论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还会有人觉得这个问题似乎很难解决，甚至于还有像史连才这样的人，要发出“国家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暗淡无光”这样悲观失望的论调来呢？应该说，这是一种认识上的错误，是过渡时期的某些困难条件和过渡时期的社会矛盾在青年们思想中的反映：

第一，社会主义的前途是远大光明的，然而道路又是十分艰巨的。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

克服很多的困难，需要进行艰苦的斗争。

这首先是因为还要为肃清被打倒了的反动势力的残余而进行斗争，要向帝国主义者——主要是美帝国主义的包围进行斗争。我们知道，已经被打倒了的反动势力的残余，还要想死灰复燃；美帝国主义正在东南亚加速建立军事基地，组织军事联盟，并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庇护蒋介石卖国集团，不断向我国大陆进行军事挑衅，派遣特务间谍阴谋破坏。我们不与它进行斗争，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同时，资产阶级对我国过渡时期及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是不会没有反抗的，不能设想一个阶级会完全自愿地逐渐走向灭亡。因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在过渡时期还必须要与国内将被消灭的阶级的各种反抗行为进行斗争。有些方面的斗争，特别是思想方面的斗争，也往往要牵涉到青年内部；因为许多事实证明，青年们也常常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而要克服这种影响，也就需要进行斗争。

其次，旧中国遗留给我们的各方面落后的情况，也是我们必须克服的困难。我们必须明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克服各种落后条件使我国各方面走上先进的地位的过程。因此，在我们工作中，不能不遇到各种落后条件所造成的困难，特别是到新开辟工作的地区工作。例如说在边远的农村工作，如像史连才那样到海南岛那样的地方工作——要注意：国家的建设常常需要我们到这种岗位上工作——就不能不住茅屋，不能不将就利用极简陋的设备，不能不忍受生活上的种种不便；不能不做些“平凡”“琐碎”但对我们的建设却很有益的事务工作；就不得不克服在工作中学习的各种困难……

总之，困难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一种具体工作中间都会遇到的，特别是在目前过渡时期才开始不久的时候，更是如此。青

年们都有着向往光明的高度的热情，但由于他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不够，生活阅历和社会经验比较少，缺乏阶级斗争的知识，把建设社会主义想得很简单，而对于走向光明的前途中所要遇到和必须要努力加以克服的困难，却常常缺少精神上的准备。因此一旦在具体工作中遇到了自己所没有预想到的困难，就会觉得好像受到了突然的打击，就不知道怎样才能前进，就会对于前途发生疑虑。这就是问题之所以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就青年们的思想来说，常常就有着这样的矛盾：一方面，青年们都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然胜利的远景，并热烈地希望为此贡献出最大的力量，以不辜负自己的青春。但另一方面，青年们头脑中还有许多其他个人的想法，特别是如果受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影响，就会把个人的名誉、地位和物质享受的问题看得很重，就会把个人的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之上，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之上，这就会使他们不能够把个人的事业与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看做一个整体，而是把个人的事业与人民的事业分离开来，甚至于对立起来。像这样的例子在我们讨论的稿件中是看到不少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蒋良政就曾经因为这种原因脱离过革命队伍，他在他的自我检讨的稿件中这样写道：

"1949 年我在湖北人民革命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湖北鹤峰，建立人民银行。这正是我对革命贡献力量的好机会。但自己却觉得搞银行工作太单调，不安心在农村工作，不愿意爬山，也不愿意吃苦，一心想调工作，并威胁组织说不调工作就请长假回家。心里想：回到城市哪怕找不到工作。领导上虽然一再对我进行说服，我始终坚持就是不干，结果脱离了革命队伍。"

很显然，像他们这样所想的和所做的事情就不可能适合于国家和人民需要，就会在事实上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利益发生矛

盾。这种矛盾就必然要使他们碰钉子，吃苦头，就会到处觉得似乎找不到出路，正如史连才所遇到的情况那样。这就是许多青年们所以会觉得前途还有问题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三、什么是我们真正的远大前途？

我们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目前许多青年同志们之所以感到自己的前途似乎还有问题，并不是由于在事实上真的找不到前途，而主要是由于他们对前途的认识不符合实际。因此，要正确解决这个问题，主要地还是要把一些思想观点的问题弄清楚。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什么是我们的真正的前途？从不同的观点上，对于前途可以有不同的认识。从个人主义的观点来看，那么，所谓前途，主要的就是个人利益的满足。前途是否远大，就是要看个人是否获得更多利益。什么是个人利益呢？这不外就是名誉、地位、生活享受。因此，他们对于前途就产生各种错误的看法，并且错误地去追求这种个人主义的所谓“前途”。

有的人认为前途就是要得到名誉，就是要“轰轰烈烈”、“名扬天下”。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他就认为一生是白过了。史连才不就是这样的吗？他觉得做个普通的会计员，不能“轰轰烈烈”，“实在太没意思”。因此像他这样认识自己前途的人，总是要看自己所做的那种工作是否便于表现自己，便于名扬天下，如果他看起来便于达到这个目的，他在工作中便会兴高采烈，就可以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积极性，如果他觉得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他便心灰意懒，不肯好好工作。

有的人认为前途就是要获得地位，就是要做“人上人”。有的青年一心想当个科长、处长，有的并说：“将来能当一个领导，成为司长、局长或部长，这样才是有前途。”当然，像这样的人他在

工作中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能否更快地升级，如果他以为能达到这个目的，他在工作中的情绪就会好一些，否则，如果他以为他的工作不能达到升级的目的，或者觉得别人升得比自己快了，他的工作情绪就会坏下去，就不能好好工作。

有的人以为前途就是生活的享受，因此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他们首先关心的问题就是：什么地方物质条件最好？上海海运局有一位署名为“彦”的读者在他参加讨论的文稿中写到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机关里有几位同志，去年一月里从无线电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轮船上实习。

“当他们在毕业典礼上，听到宣布自己是分派到海轮上工作时，个个都兴高采烈。心里想：航海的机会是难得的。海洋的风光是多么美丽呵：蓝色的天，绿色的海洋，微微的海风，随着银色的波浪，多么富有诗意！我早就有航海的宏愿，今天实现了，非轰轰烈烈干他一番不可，以便将来成为航海家。因此在会上都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好好的干。

“在火车上，他们高兴得不知疲倦，互相谈论着美好的远景，说：海上的生活如何如何有趣，到处码头跑跑，将来还有机会到苏联去，到新民主主义国家去，又听人家说航行外洋的轮船都是几万吨的，船上设备很好，有电影院、篮球场、游泳池，有澡堂、饭厅……生活条件又好，真是梦里也难找到的机会。

“具体工作分配了，使他们大失所望，上的都是较小的轮船，既没有电影院，更没有篮球场和游泳池，一看到这情形，大家心里就冷了大半截。但心里还想：船虽小，见识见识海洋，欣赏欣赏各地风光也还不错。

“第一次航行回来了，互相碰面大都唉声叹气的说：哪里是自

己所想像的：蓝色的天，绿色的海洋……。天还不是一样的天，海水并不是绿的，看去像黄落的树叶，一点没有欣赏价值。海风吹来刺骨头，浪来头就发晕、呕吐、连饭都吃不下，难受的不得了，‘这碗饭简直难吃下去！’

“好，几个月之后，都悲观起来了。工作没有信心，认为船上学不到技术，生活又枯燥，礼拜天也没有。看看自己的同学分配在陆地电台实习的，都比自己好，生活又‘如意’，技术提高又快，因此不想干了，闹着情绪，几次三番向领导提意见，要求调到陆地电台去，甚至有的想转业。就这样，实习了一年多，技术上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工作也没有干好，对国家造成了损失，于自己也不能很快进步。”

这是一个多么滑稽多么可笑的故事啊！

的确，像类似这样的人，如果被分配到物质生活条件较困难的地方，例如农村和边地，他们就要认为没有出路，就一心要转到中心城市，如果在中心城市工作时，发觉中心城市生活程度较高，也不容易达到享受的目的，他们又会日夜想望着调到别的地方的工作岗位去。

以上这些，就是从个人主义观点上来认识前途的人们的一些主要特点。这样认识前途，是不会真正找到前途的，因为新中国为我们所开辟的光明远大的前途，不是属于这种性质的。

新中国没有任何特别便于人们“名扬天下”的工作岗位，英雄模范的荣誉，是从英勇的战斗，辛勤的劳动，不屈不挠的创造性的劳动中涌现出来的。

在这里我们是可以举出许多许多生动的事例来加以说明的。

就拿全国最著名的工业劳动模范张明山和王崇伦来说吧，如果他们没有最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那么虽然他们是在鞍

钢工作，也不可能创造出在工业生产上具有重大作用的反围盘和万能工具胎，也不会成为今天人们所尊重和爱戴的特等劳动模范。

许多事实都证明了，如果有了高度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那么，不论是我们的哪一位青年，不论他所担负的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哪一行哪一门具体的“平凡”而“琐碎”的工作，也可以产生出像黄润萍那样的管理仓库的先进工作者，像贺家蕙那样一个普通的保育员也可以获得很大的荣誉。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梁仪同志的认识和体会很对，他说：

“贺家蕙是一个普通的保育员，她干的工作一般人看来是给孩子端屎、擦鼻涕的事，可是贺家蕙不但安心自己的工作，而且热爱自己的工作，她把培养新中国第二代的责任，看做是自己对祖国的贡献，因此她在工作中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成为青年团员的光辉榜样。我从贺家蕙身上体会到新中国优秀青年应有的品质，认识到不管在哪一门、哪一行工作，只要你热爱自己的工作，下苦心钻研，勤劳地工作，不断地提高工作效率，改进工作方法，那就是对祖国有了贡献，也就是轰轰烈烈地做了一番事业，就是有了出息。”

在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教育下，在实际生活中，很多青年们已经有了这样深切的体会，从而他们也就认识到自己所担负的具体工作的重大意义，而发出无限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涿县的一位读者玉碎写道：

“世界上有不平凡不琐碎的事吗？没有。我认为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具体的。让我说说自己的体会。当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是多么狂热啊，心想这下子可是干革命了，革命想必是轰轰烈烈，像敲锣打鼓一样，或者像旧小说上说的：‘一声令下，地动山摇’。谁知一接触实际，却与想象相反，成天干的是收发报纸，替首长

保管与抄写文件。1951 年组织上调我去做土地改革工作，心里又盘算着，机关工作是琐碎的，土地改革那一定是轰轰烈烈，惊天动地，一点也不会‘平凡’了吧！实际上又相反，成天要‘串门子’，夫妻俩吵架也要找上你。根据我自己的工作体会，我得出了这样一条经验，便是：革命工作总是具体的！我们为什么要使出全部精力做这些‘平凡’的‘小’事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平凡’‘琐碎’的背后隐藏着惊天动地的伟大意义。”

从上面许多事实看来，不首先全心全意地为祖国为革命努力工作，而把主要的心力放在如何便于“名扬天下”这个问题上的人，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所谓的前途，是根本不可能的。

关于地位和生活享受的问题也完全是一样，因为在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一个特别便于升级和特别容易获得物质享受条件的工作岗位，虽然对于努力工作的人，在这些方面总会得到人民的必要的照顾的。

所以，要正确地解决前途的问题，首先应该克服在这个问题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观点，而用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给以正确的认识。

从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立场上来看，一个人的真正的前途，主要地就在于要能够在人民的共同事业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就在于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在被分配给自己的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做出一定的成就。例如吴运铎同志，正因为他全心全意地献身于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地完成党所交给他的每项艰巨任务，因而他能够对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自己也就从一个普通的煤矿工人成长为一个兵工专家，成为今天广大青年所尊敬和学习的榜样。从一个普通的士兵、工人，在工作中踏踏

实实地刻苦钻研，而成为今天发明用石棉板滤空气制造青霉素的科学工作者的齐谋甲同志，也同样是如此。这都明白地告诉了我们，一个人越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工作，他在工作中对革命的贡献越大越多，他的前途就越远大。所以每个青年首先就要全心全意地积极地工作，对工作不但要努力做好，而且要力求改进力求提高工作效率。

再说，从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观点上来认识前途的人，绝不把个人利益的所得作为是否有前途的标准，绝不把名誉、地位和生活享受作为工作的目的，虽然由于他的工作的贡献，自然也会从人民方面获得真正的荣誉，适当的地位和一定的物质生活上的照顾。

从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一个人即使没有“名扬天下”，但只要能尽自己的力量给人民做出一定的贡献，也就不白白地过了一生，也就是真正的“光芒万丈”。武昌的读者刘守华认识得很好，他在《我对前途的看法》中写道：

“我读过小说《三千里江山》，书中有一个普通的工人车长杰，他为了抢修清川江上的桥梁，被美国鬼子的飞机炸伤了，并且牺牲了。作者在书中这样写着：‘活着的时候，他悄悄的活着；死的时候，他悄悄死了。报纸上不见他的姓，传记上不见他的名，但在他悄悄的一生中，他献给人民是多么伟大的功绩啊！’这样的人没有‘扬名天下’，难道我们能说他的一生是白过的吗？

“在我们国家的无数次的革命斗争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战争中，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在建设事业中，固然‘扬名天下’的英雄也不少，但和参加这个斗争的整个队伍比较起来，到底还只是极少数，‘无名英雄’究竟是多数。这些‘无名英雄’们用他们的鲜血浇出了今天幸福的鲜花，

用他们的血汗推动了历史的车轮前进，难道我们说他们的生命过得不光彩吗？难道他们没有做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吗？”

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只有当他随时想到人民，为了人民的时候，他才能做出轰轰烈烈的事来，获得荣誉，获得光辉的前途。专门追求个人前途，沽名钓誉，追求‘扬名天下’的个人主义者，他绝对不会有光明的前途，也不会真的‘扬名天下’的。”

事实证明，如果人人都要“扬名天下”，没有人愿意做“无名英雄”，那么革命就不可能胜利，社会主义社会的光明远景就不能成为现实，而个人的远大前途也就成了空话了。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岗位上，都有无数的青年在从事着平凡的但是伟大的劳动。如果没有我们青年同志这种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要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是很难想象的事。北京海关总署李浩然同志说得对，他这样写道：

“就拿‘鞍钢’来说，也是多少万人的‘平庸无奇’、‘无声无息’的劳动的有机结合。譬如有成天爬在高空架上，焊钢架的焊工，有水泥工、木工、车工、钻工、汽车司机……当然也有天天记账、打算盘的会计员。今天全国闻名的鞍钢特等劳动模范王崇伦，不也是从这‘无声无息’的劳动中成长起来的吗？可见要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关键不在于‘岗位’，而在于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工作。”

同样地，武昌的一位青年邓学初也叙述了一个很平凡然而却很动人的故事：

“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文章，记载了一个全心全意做好自己工作的年青的女列车员同志的模范事例。

“她叫袁志勤，是一个19岁的青年团员，原来是初中三年级

的学生，去年5月起，她开始担任了列车员的工作，她的具体任务就是负责车厢内的清洁卫生。这种工作，如果按照史连才的看法，是琐碎的、平庸无奇的工作，但袁志勤同志并没有这样想，也没有想到干这些工作怕别人看不起，她认识自己的工作是人民铁路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她把自己的热情和精力全部投入了这一‘平凡’而又‘琐碎’的工作。她每次从接班起，一直到交班止，一直紧张地工作着，不停地扫地、擦地板、揩桌椅和门窗，洗痰盂，把车厢内打扫得干干净净，使旅客们坐在车上感到舒适、愉快。每当列车快要到站时，她就拿起广播筒向旅客们报告下一站的站名，车停留的时间，还介绍当地的土产，使旅客们不错过购买的机会。天热时，如果列车停留的时间长，她就动员旅客们下车去玩，乘这个机会她就把车窗全部打开，换一换空气。她不但做好自己的工作，还主动地帮助售货员同志卖水，及时解决旅客们天热口渴的困难。她就这样一站又一站，一天又一天，为千百万个自己不知道姓名的旅客们工作着。

“她的这种忘我地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品质，博得了旅客们的一致赞扬。像苏联专家朱也夫就曾写信对她‘一路经常保持车内清洁及殷勤服务的精神致以谢意’。这是多么荣誉的事啊！”

这样看来，我们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知道，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正确思想的人，完全是要把真正工作上的贡献作为惟一的荣誉，而绝不是去单纯地为了荣誉而追求荣誉的。

至于地位，从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的观点上来看只是人民给你的责任。地位的高低表示你对于人民所负责任的大小，有了较高的职位，并不是如像在旧社会那样地可以成为“人上人”，可以有压迫人、剥削人的特权，相反地，有了较高的职位，就是要更多地为人民服务。因此，有较高的职位固然是光荣的，其所以光

荣，正是由于他能够为人民担负更重的担子，而不是任何别的。

再说到生活的享受，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正是要使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提高，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得到满足。但是，要提高生活水平，就需要我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劳动，好好工作；有时甚至还要忍受一点牺牲，受到一些限制，以便争取更美好的生活。不这样，国家建设不好，全体人民的生活不能提高，个人生活的提高也就无从谈起。东北的一位青年赵全林同志所写的一段话是可以代表广大青年的思想感情和热烈愿望的，他说：

“我们的国家正在飞快地向社会主义迈进。在现在，我们有机会把自己的精力贡献给社会主义的壮丽事业，在将来，我们将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中一员高尚的公民，我们将用劳动创造着自己和全人类的幸福，用战斗保卫着人类的和平。随着社会的前进我们都将成为有高度文化教养的人，如果说起物质生活来，不是少数人，而我们大家都将过着富裕的生活。这难道不就是我们最理想的、最壮丽的、同时又是最平凡与最实际的、每一个人都能有的远大前途吗？”

确实是这样的。青年们的这种心愿是正确的，这种热情是可贵的。我们应当承认，共产主义思想绝不是禁欲主义思想，决不反对为提高人民生活而斗争。那么我们所反对的是什么呢？我们所要反对的，是那种不顾当前生产发展的条件，不顾一般人民生活的情况，一心只为个人追求更高的物质享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享乐思想。

把以上所讲的总括起来说，就是，新中国的青年们，决不应该单纯地以名誉、地位和生活享受作为自己的“前途”。我们重复地说：青年们的真正远大前途，就是要在人民的共同事业中努力

贡献自己的力量，就是要在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就自己的工作岗位做出一定的成就。在共产主义事业中贡献越大的人，他的前途，也越远大。

四、个人的前途和社会的前途有矛盾吗？

认识了什么是青年们真正的前途之后，就要进一步弄清楚社会的前途和个人的前途的正确关系。

新中国有远大的前途，这一件事情是没有任何人怀疑的了，谁也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定会得到胜利的。在新中国的这个远大的前途下面，个人的前途是怎样的呢？个人前途与新中国的前途是一致的呢，还是不一致呢？应该说个人的前途与新中国的前途是一致的，但要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必须反对两种错误的偏向：一种是把个人的前途和整个社会的前途分离开来，甚至于对立起来，因而否认了两者的一致性；另一种是把个人的前途与社会的前途之间简单地划上一个等号，以为只要有社会的前途就等于有了个人的前途。

现在在这一章里把第一种偏向谈一下：

从个人主义的观点上来看前途问题，是必然要把个人的前途与社会的前途分离开来，甚至于对立起来的。因为个人主义的观点，是把个人利益摆在人民利益之上的观点，是把个人利益的追求，当做主要的或惟一的目的；是没有决心为人民服务，却反而要求人民给与荣誉、地位和生活的享受。在这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沈阳团市委韩洞达同志所写的一个故事：

“最近，我在一个机械制造工厂遇到这样一个青年见习技术员。他是由一个机械专门学校毕业，分配在工厂施工科工作。他觉得领导上对他‘很不重视’，要求调到热处理部门去。他认为：

热处理是个‘冷门’，自己在这方面只要努力一下，是比较有‘出路’的。因为学习热处理的人很少，实际工作的技术人员也少。然而，他到热处理工作不久，又要求调动工作，并提出四个‘方案’。第一是离开该厂，到别的工厂（这个工厂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41项的重点扩建工厂，真不知道他还想去什么样的工厂）；第二是离开施工科；第三是下到机械加工车间；第四是去当教师去，‘这样可以比较清静’。第二次要求调动工作，和调动方案的提出，是因为他在热处理工作中碰到了问题。他说：第一热处理的理论是很深的，过去在学校没学过，也没使用过金相显微镜，当然在金相显微镜中看出的东西，根本不知其所以然了。到现场是‘睁眼瞎’，什么炉子啦，淬火啦，一问三不知，要掌握确实困难；第二是威信问题。他认为威信是要在有高度的工作能力基础上建立的，对机械加工的了解实在是比对热处理的了解多得多，何况，还是对机床感到兴趣呢！第三是走为上策，可以轻易地离开恼人的热处理……而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去。这就是这位见习技术员的思想真相。”

同样地，在浙江一位青年读者祁荣祖的讨论文稿中，还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他说：

“我们公司里过去有一个叫徐国俊的同志。他是一个青年团员，先在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部队工作，后来从军队转业至建筑机关工作。由于他的个人主义没有得到好好的改造，老是考虑个人的得失，因此，他认为叫他来做这种工作是倒霉，是走下坡路。

“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他的思想一天比一天落后，工作一天不如一天，和他一道参加工作的其他同志，正当他不安心工作的这两三年的岁月里，却在埋头工作，刻苦学习。过去文化理

论水平及政治觉悟程度不如他的同志，已获得迅速的提高，有的则大大地超过他。政治上，过去是群众的，现在已经是团员，过去是团员的，有的已经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行政职务上有的担负了比较重要的责任。这时候他又说：'和我一起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不少已经当上了连级干部，而我还在做一个25级的办事员。论才干我比他们强，论资历并不比他们差，只因我运气不好，被分配到这个建筑公司来，一点出息也没有，怎能叫我安心工作呢？'平时和同志们一啦呱，光夸他'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从不提他'败走麦城'的原因。每当他谈起个人问题来，都是非常气愤的样子，怨领导对他太苛刻，埋没他的前途。于是从消极怠工，发展到和领导与组织对立，成天讲怪话发牢骚，不遵守劳动纪律，完全丧失了革命的进取心，最后受到了团内及行政上最严重的处分——开除。"

从这两件事实，我们完全可以清楚地看出，像这样的一种对个人前途的想法，本质上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事实上也是行不通的。

我们说新中国为每一个人，为每一个青年开辟了一条光明的前途，这是说一个人如果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自己应尽的义务，那么，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个人也就会有一定的成就，并且也就自然分享到全体人民共同胜利所获得的利益。这样的光明前途，对于每一个忠实地为人民工作的人，都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这决不是说，一个人可以不管人民的利益，不依据人民的需要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只要偶然碰上或者选上了一个方便的工作岗位，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自己主观上所希望的名誉、地位和生活享受等等东西。这样的前途在新中国是对于任何人也不存在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像史连才那样不注意人民的利益，不考虑到应该努力参加垦殖工作，使海南岛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逐步高涨起来，却只想到个人要在海南岛欣赏美丽的风景，要在树下面吃椰子和西瓜，他的这种个人主义的关于前途的看法是现实生活所不容许的，因此他就不能不感到个人所希望的前途不但与社会的前途不一致，而且和社会的前途尖锐地对立着，他就不能不绝望地喊出“国家前途光芒万丈，而我自己的前途呢，却真是暗淡无光”了。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像第一汽车制造厂蒋良政那样，由于固执于个人主义对前途的错误看法而脱离了革命，后来因为认识到并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而重新找到了光明的前途。蒋良政对自己脱离了革命工作（银行工作）后又重新参加了革命工作这样写道：

“回到家里后，做小工也不能做，考中小学教员、考武汉大学职工，都没有被录用，街道学习委员会成立时，有人想让我作学习委员，但区里不批准，落后分子到处碰壁，个人主义的道路，一无出路，更无前途可言。实际生活的教育使我开始认识自己个人主义的严重错误，我痛恨自己为什么不忠实于革命？同时也认识到灰心失望是无用的，一方面深刻检查认识以往的错误，一方面主动积极协助街道政府搞好群众工作，自己也在政治和业务上进行必要的自修，经过10个月在群众当中的考验，自己有了进步，表现好一些，终于在人民政府的亲切爱护下重新踏上了建设岗位。

“现在我在第一汽车制造厂做统计工作。我对能够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感到非常兴奋和无比的幸福，我又看到自己光明的前途了。其实过去在银行里和今天在第一汽车制造厂，我都要和数目字打交道，但是我对于自己前途的看法，却

完全不同了。”

由此看来，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十分明确的结论：只有改正了错误的个人主义的看法，也就可以解决国家前途和个人前途的对立和矛盾。

另外，还有一种把个人的前途和社会的前途分离开来的看法。这种看法不一定是从个人主义的观点出发，但仍然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这种看法也承认青年们的真正前途是在于要努力为社会主义的事业做出一定的贡献，但却以为只有在某些工作岗位上工作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的贡献，而在另外的工作岗位上则是不可能的。例如说只有鞍钢的工作才对国家的建设有重大意义，而农村的工作则是没有什么重要的；只有中心城市的工作才有意义，而偏僻地方的工作则是可有可无的；只有复杂的领导工作才有意义，而较简单的事务工作则是没有意义的。根据这样的一种机械的划分，于是就做出结论，说：个人的前途与社会的前途虽然一致，但只是在某些工作岗位上工作时才能这样说，在另外的一些工作岗位上工作，情形就相反了，这里个人的前途与社会的前途是不一致的，在这里是社会有前途，个人无前途，至少是，社会有远大前途，个人无远大前途。

对于前途的这种二元的看法，是依据什么理由呢？理由不外是两个：第一是认为有些工作本身的性质就不重要，对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很大关系，即使加倍工作，也不能对祖国做出什么重大的贡献。第二是认为有些工作条件不好，限制着人的才能的发展，或者因为地方偏僻，或者因为领导不强，或者因为工作简单以及其他等等。在这些条件之下，人们即使努力想要有些什么新的创造，也不可能有什么重要的成就，因此即使有了才能也无法做出大的贡献。这两个理由，其实都是似是而非的。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任何一种工作，哪怕是最“平凡”、“琐碎”的工作，如像炊事员、公务员、保育员、收发、会计、打字员、文书等等的事务工作，都是整个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工作。既然是不可缺少的，那也就不能说不是重要的。不错，我们国家把重工业的建设作为全部国家建设事业中的主要环节，并集中主要的力量来从事这一方面的建设工作，但是，说重工业是建设的主要环节，并不等于就要否认其他方面工作的重要性。有些青年认为既然是搞社会主义工业化，就只有去搞工业建设才能够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个人才大有出息，因而不安心于搞其他的工作；也有些青年虽然是在工业部门工作，但因为是做的画图表、管仓库、办伙食之类的工作，认为将来一切都自动化电气化了，而自己一化也不化，没有什么出息，还不如改行……显然，这种看法是很幼稚的，也是很错误的。要知道，国家建设的各方面的工作是相互密切联系的，没有重工业的建设，就不能加速国家工业化的事业，就不能使农业早日获得农业机械和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过来说，不通过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让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占领农村——例如说让农村里随便进行粮食投机而不实行国家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那就不容易保证工业建设中的粮食和原料的需要，也就不能保证重工业的建设。不仅工业和农业有这样密切的联系，其他的工作也同样是互相依据着的。

例如统计工作就是一种所谓“平凡”、“琐碎”的事务工作，但中央地质部的竹正同志在这个工作中看出了伟大的意义。他说：

“这个工作……每一个数目字，在我的眼中和心中并不是枯燥无味的，而是活生生的，因为它代表着祖国伟大建设的成就。我在这些数目字中深深地感到祖国在向社会主义突飞猛进，祖国的

明天将是多么光明灿烂，我又在这些数目字中感到自己工作的伟大意义，它是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的明天又是多么光辉灿烂呀！”

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既然统计工作是祖国建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么，努力做好统计工作，就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重要的贡献，而这样的工作也就是有前途的，并且个人的前途在这里也是与国家的前途一致的。

为了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这个道理，我们还可以来看一看北京一位读者张化人所写的一段话，这段话说到了小说中一个生动的故事，他说：

“我们看《我们这里已是早晨》这本书里，省党委会书记卢桑诺夫是如何把‘平凡’的工作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的。书中的主人翁杜洛宁在苏联卫国战争结束后，本来想进军事学院读书，但组织上需要他到南部库页岛经营渔场。开始他对这工作的意义不了解。他说：‘为什么说到鱼呢？为什么不派我到主要工作一方面去？为什么是鱼而不是煤或油？’即为什么不分配到工业建设方面去呢？卢桑诺夫怎样回答呢？他说：‘你对于共产主义怎样想象的……我们知道，共产主义意味着富足。精神和物质文化的，以及食品的富足。倘若你只机械地捕鱼，而不意识到你自己在整个国家共同努力中的作用和地位……你曾否想到过鱼在一个人每天食粮中所占的地位？你可以供应苏联人民大批富于高度营养价值的鱼。我们库页岛这些人不但能把足够的鱼供给远东，并且也能够供给全莫斯科的食品店……而这就不仅是业务的问题了。这是政治，极大的政治问题！一个苏维埃的业务经理，必须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个政治家。’”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如果认为某些工作才具有重大意义，

才能对国家做出贡献，才有远大的前途，而另一些工作则没有重要意义，不能对国家做出什么贡献，不能成为有远大前途的工作，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是彻头彻尾错误的。

另外，我们能不能说某些工作因为工作条件不好，限制了人们才能的发展，因此就是没有前途的呢？不错，工作条件悬殊的情形是在种种工作之间存在着的，有些工作对于个人的发展可能会多少有些限制，因而在这些岗位工作的人所能达到的成就也会有一定的限制；不能希望每种工作都具有良好的便利个人发展的条件。但是难道说个人才能的发展是完全决定于客观条件，而自己的努力一点也没有意义吗？难道一个人只要处在很顺利的环境条件的前面，自己一点也不努力工作，努力学习，他的才能就会凭空地发展起来吗？当然不会的。青年读者庄永兴、罗建勋、中工等在来稿中曾经提到这样一件事：

"曾经有一同志闹过这样的情绪：'这儿的工作学习条件这样差，叫人怎样有劲工作呢？若把我调到那一个部门去工作，才能把我的劲使出来，那儿的工作和学习的条件好得多。……'他找领导上去谈，领导上问他：'比方你需要一座好楼房，在你面前有一座是经过别人的劳动盖成了的，有一座还没有盖起，需要你亲自动手去盖，你是要哪一座呢？'这一问，那个同志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闹情绪，不是因为别的，而是自己想叫别人把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自己去'享受'，却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自己的工作环境和条件还不够好，因此才需要自己从各方面来努力，使它逐渐好起来，这样不正是'英雄有用武之地'吗？怎么会说使不上劲呢？"

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希望各种工作岗位的工作和学习的条件都给我们安排得好好的，工作和学习的条件不够好，就

正需要我们加倍努力地去改进和创造好的条件。一个人的才能也只有在克服困难的斗争中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所以在事实上，如果一个人能够真正地努力工作，努力学习，那么，像在新中国这样各方面都不断进步的条件下，没有什么工作条件竟恶劣到能够对我们成为一种绝对的限制，使我们的工作根本不能发展。如果是在旧社会，也许还可以这样说，但在新中国，则显然是不会的。即使在工作条件不很好的情形下，只要不断努力工作学习，个人的进步发展仍是可以得到一定的保证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一下什么叫做才能？我们认为才能就是在一定的具体工作中所表现的工作能力，就是正确地完成任务和推进工作的能力。发展才能，就是要增长理论政策知识，钻研业务，提高工作效率，改进工作方法，把工作不断推向前进。如果工作中遇到困难条件，那么，克服困难，正是发展才能的一种表现。所以，工作条件不好，不但不一定就是发展才能的限制，在某种意义上，反而可以成为锻炼才能的条件。

我们应当承认，偏僻地区的工作条件是不好的，特别是学习条件有许多不便，但在偏僻地区就有更多的开辟种种新的工作的机会，能够努力实现开辟新工作的任务，就是发展了个人的才能。

同样地，我们也应当承认，在领导较薄弱的地方，掌握工作的正确方向是有一定的困难的，但正是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就能锻炼人们独立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青年读者庄永兴、罗建励、中工等在来稿中写道：

“苏联文艺小说《阿里泰到山里去》一书中有个主人公叫罗斯，他是在十月革命后不久被党由内地派到荒僻寒冷的北极地带去的。同时被派去的并不多，只有两个同志。北极环境虽没有‘深山丛林’，但却有巨大的冰山、漫长的黑夜和辽阔的苔藓地带。那

里也根本没有什么‘茅房’，也没有简陋的设备，只有皮帐与雪橇。罗斯与当地民族的语言不是‘大不相通’，而是完全不通。那里也不是‘领导水平也不高’，而是根本没有经常的具体的领导。那里人民的生活习惯、风俗、人情与内地不同。人民缺乏文化，生活贫苦，而且，都崇尚迷信。另外，还有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代表红鼻子查理及他们所豢养的走狗阿里泰。那里更不是个‘政治空气浓厚的地方’。但是，罗斯并没有要求离开那里。他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新的困难的环境，不是企图逃避，而是面对现实，和美帝国主义侵略分子、当地剥削者以及各种迷信势力斗争，克服了种种困难，把当地人民组织起来，并且按照他们的风俗习惯，帮助他们建立了新的生活，新的文化，帮助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文字等，因而使当地民族的人民得到了翻身。像他这样的工作，能说不是轰轰烈烈吗？为什么罗斯在那样艰苦的北极地带都能做出一种轰轰烈烈的事业来，而史连才就不能在中国的还没有那么艰苦的环境中做出轰轰烈烈的事情来呢？”

的确，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的工作中，要想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重大的贡献，获得光辉的成就，都必须经过向困难做艰苦的斗争。如果是想贪便宜，逃避困难，不肯做刻苦的努力，不发挥创造性，要想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来，那完全是一种十分幼稚可笑的幻想。

再说，做简单的工作，工作本身似乎不能使人学到复杂的知识，这对于人的知识的增长有一定的限制，但任何简单的工作和其他别的各种工作都有着十分复杂的联系，经常留意这种联系，就可以发现简单的工作也有不简单的地方。同时如果要尽量做好一个简单的工作，要把它的工作效率提高，也需要表现创造的才能，电话接线的工作是极简单了，但在这工作中也出现了郭秀云那样

的先进工作者，由于加快了接线的速度而使国家获得了很大的利益。这些简单工作的改进，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智慧，都是才能发展的表现。

自然，一个做比较简单的工作的青年同志，他考虑到自己的前途问题时，他希望不要是永久地只做同一个简单的工作，而愿意在将来做更复杂的工作，并因此为人民贡献更多的力量，这样的想法自然不能说有什么不对；同时这样的前途，在我们今天的条件下对于一个有决心努力学习的人来说，也具有一定保证。但是，决不应该因为想望着将来的那个工作的前途，就以为现在这个工作没有前途，因而失去对于现在工作的积极性。只有在现在的工作中努力学习，积极完成任务和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才有可能使自己的能力日益增长，而在将来能担任更多的工作，将来工作的前途，就要在现在的工作中准备起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董化信同志说得很对，他写道：

“我是一个部队文化教员，我自己体会到，在工作中一样是可以学习提高的。但是这学习必须与自己的工作业务结合。如果脱离本职工作想另来一套，那是行不通的。就说我们的许多老同志吧，他们现在担负着主要工作，但是他们中有不少人是没有上过中学或大学的，主要是靠自己在工作中持久的学习。我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写教案，阅读参考材料，使写作与阅读能力有了些提高；通过与学员们在一起生活，使觉悟程度有了些提高；通过组织学习与宣传鼓动使工作能力有了些提高。我深深感到，因为要工作，就常常遇到困难与问题，就不得不学习、不提高，不然，就完不成工作。所以，只要自己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全心全意地把工作做好，也就能在工作中学习提高。而学习好了，也就帮助了工作的提高。

“我认为应当十分重视在职学习。如果每一个工作的同志都想不干工作而去专门学习，那么整个革命工作不是就无法进行了吗？”

这种认识是切合实际的，这样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不论现在所做的工作是如何简单，但只要能够老老实实地在自己的工作中刻苦钻研，努力学习，不断提高，就完全有可能成为自己工作的专家，也完全有可能在将来去担当更多更复杂更艰巨的工作。

根据以上所谈的一切，就可以知道，把个人的前途和社会的前途分离开来或者对立起来的看法，无论从哪一方面的理由来说，都是错误的，都是不能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五、把我们的一切献给最伟大的事业

现在在这里谈一下与上面相反的另外一种偏向，就是在个人前途与社会前途之间简单地划一个等号。他们安于现状，不求上进，并说：“我个人有什么前途，社会主义就是我的前途，到社会主义，人家每餐六个菜，我也不会是五个。”他们是想不劳而获地坐享全体人民努力的成就。这种思想的错误，是完全抹煞了个人努力的作用，不知道，美好的社会主义前途是要通过每一个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

当然，这里所谓个人的努力，也不是个人孤立地奋斗，像某些青年一样，想脱离集体事业和集体来创造个人的成就，而是应该首先服从集体的需要，在集体中彼此帮助，彼此支持，彼此学习，共同努力。个人的前途和社会的前途之所以一致，是因为社会主义这个美妙前途的实现，是千千万万的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个个人在一定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做出一定的贡献，而且尽可能使这个贡献大一些，这是个人的前途。千

千万万不同工作岗位上的个人的成就的综合，形成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总的成就，这就是社会的前途。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不是从天上凭空落下来，而是相反地要通过千万人的艰苦工作和英勇斗争才能实现，而这艰苦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又必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坚持、贯彻，以至于获得胜利。

新中国的远大前途之所以不容怀疑，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必定要胜利，是因为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民已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三十多年的工作和斗争，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工作下去和斗争下去的缘故。如果停止了各个个人的工作和斗争，那么不但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不能实现，就是现在已经获得的成就也会要归于瓦解。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企图不劳而获地坐享社会成就的想法，实际上就是要破坏全国人民斗争已获得的成就，就是要断送我们社会和个人的远大前途，这是非常荒谬非常有害的。

在这里，还必须明确一点：我们说社会前途和个人前途一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是相结合的，但并不是说两者在任何时候都毫无矛盾。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有时候也有矛盾的。但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前途，为了集体的利益，在必要时就应该牺牲个人一些眼前的暂时的利益，就如史连才想上学读书，但因工作需要仍应该工作一样。这样看来好像自己牺牲了一些什么东西，但却换来了集体的或者自己的长远利益。南京的一位青年董克信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了深刻的体会，他这样写道：

“当我参加革命工作时，组织上分配我到区委搞居民群众工作，我也曾想不通，认为成天搞这些工作这究竟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呢？这不是大材小用吗？因此自认为参加了革命工作是牺

牲了自己。'牺牲了个人利益不要紧，也牺牲了国家利益，要不然，再过几年，我读完大学，就成为一个专家或工程师，这样不是可以更好地为国家建设服务吗？' 猛一听这些话，似乎满有道理。但是仔细分析一下，这里面就有问题了。当然国家在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是需要大量工程、技术人员的，但是如果大家都去做工程师、专家而没有人去做其他工作，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呢？当然不能。

"革命工作有着精细的分工，就像一只钟表，谁能说钟表的长针比短针重要，钟摆比齿轮重要呢？不能。都是缺一不可的。我当时之所以会产生不安于岗位的思想，主要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几年来，党、团一直对我进行着革命教育，使我懂得了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是一致的。回想我参加革命时，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青年，但三年以来，自己在党的教育下，不管是思想觉悟、工作能力都大大提高了一步。工作是最好的学习，每经过一次运动，每进行一项工作，群众都给了我许多深刻的教育。

"三年来，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青年学生成为一个党的工作干部。我'牺牲'了什么呢？如果硬要说'牺牲'的话，我失去的是小资产阶级所带来的患得患失，妄自尊大等缺点。"

这就明白地告诉了我们，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

要知道，过去有多少的先烈为了我们的幸福，流血牺牲，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难道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就不能为了明天的幸福，为了下一代的幸福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吗？中央地质部竹正同志说的对，他写道：

"我表示自己的决心：愿为祖国的统计工作而献出我的青春和一切。这样，当祖国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我会感到极大的骄傲和

满足，因为我在这个英勇豪迈的革命事业中做了一些工作，虽然是平凡的工作，但却是伟大的集体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是青年们可贵的也是应有的一种高尚的品质和英勇的气魄。

新中国的青年同志们要为自己创造远大前途，就必须首先想通个人前途与社会前途不可分的道理，努力克服那种把追求个人利益作为主要目的的个人主义的想法，克服各种错误地把个人前途和社会前途分离开来的想法，积极地争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中国广大人民一起，共同为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并且要决心不论在什么地区和做什么工作，都要以高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好地完成任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妙前途，也才能为自己创造远大的前途。

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

(1955.4)

学习划清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界限，掌握辩证唯物论，这对于各方面参加革命工作的人们——不论是经济建设工作，不论是政权和军事工作以及学术文艺工作等等——在思想上都有头等的重要意义。掌握辩证唯物论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武器，我们才能够在一切工作中正确地观察问题，找出适合于客观情况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保证我们的各项革命工作、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获得胜利。

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反对唯心论是分不开的。过去剥削阶级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他们把唯心论世界观作为迷惑人民和维持统治的思想工具，用一切方法扩大它的影响。“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资产阶级的“学者”如胡适之流从帝国主义国家把最腐朽最反动的唯心论哲学贩运到中国来，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反对人民革命运动，这在一部分学术文艺界和知识分子中曾发生了很大的有害的影响。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常常出现各种形式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急躁冒进和保守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就是实际工作中的不自觉的唯心论倾向。自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到中国来以后，中国的先

---

* 当时党中央发出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判唯心论，学习辩证唯物论的活动。艾思奇应《学习》杂志社所约，写了这篇宣传文章。

进人士和中国共产党一直不断地和种种唯心论思想倾向进行了斗争，目前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采取了种种的方法来进行抵抗，其中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就是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来腐蚀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队伍和工作干部，以图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目前对于胡适实用主义和胡风的文艺思想的批判，就是对于今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大意义的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进攻，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不仅仅学术文艺界值得从这斗争中学习，一切工作岗位上的干部也不应该坐视，也应该从这斗争中学习如何划清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界限，学习正确地掌握辩证唯物论，学习善于和资产阶级唯心论进行战斗，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

一、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和唯物论唯心论的两军对战

要学会划清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界限，首先应该知道什么是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哲学是人们对于世界总的理论观点和看法，哲学观点所涉及的问题是世界各方面的最普遍的问题，而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则是物质和精神（或客观和主观、存在和意识）的关系的问题。一切哲学的派别，在形式上无论如何复杂多样，归根结底，都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所提出的回答，就是判别一切哲学派别的最根本的标准，就是划清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界限的最灵验的试金石。要学会揭露某一种哲学思想是属于唯物论或唯心论，主要的和惟一的方法，就是要首先看它如何回答这一个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

物质和精神（或客观和主观、存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包含着两个方面：首先是这两者之间何者为第一性的东西，何者为

第二性的东西的问题。凡是把物质看做第一性的东西，把精神看做第二性的东西，也就是，肯定物质先于精神而存在，肯定物质是依自己本身的规律而发展变化，而不依赖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肯定精神只是物质的一种作用等等，凡是这样来回答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的，都是属于唯物论派的哲学思想。凡是把精神看做第一性的东西，把物质看做第二性的东西，认为精神先于自然界而存在，物质只是精神的幻影，归根结底把自然界看做是某种变相的上帝（如世界精神等）所创造的东西，这样的观点都是属于唯心论派的哲学思想。

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的思想是否能够认识物质世界及其规律性？凡是承认我们思想能够认识外界事物及其规律性，承认人们主观的认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的，都是属于唯物论的思想。凡是否认人的思想能够认识物质世界及其规律性，因而对于物质世界的存在就不能不抱怀疑或否认的态度；换一句话说，凡是否认人的思想内容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并断定认识的内容仅仅是人们自己主观的感觉和观念，或仅仅是所谓世界精神的“自我意识”——也就是变相的上帝的“启示”的，都是属于唯心论哲学的观点。对于上述哲学的最根本问题，只能有两种基本的回答，或者是唯物论的回答，或者是唯心论的回答。也就是：或者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或者把精神看做第一性的东西，或者承认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的可认识性，或者否认人的认识具有任何客观的物质的内容。除了这两种回答之外，能否还有第三种回答呢？真正超越唯物论和唯心论之上的第三种回答是不可能存在的。哲学历史上有二元论的思想，二元论的思想仅仅是动摇于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的思想，它在某一方面承认唯物论的原则，而在另一方面又走上唯心论的路线。例如康德的哲学一

方面承认物质的客观存在，而另一方面却否认人的认识能反映物质本身（康德叫做“物自体”）的性质，把认识的内容看做纯主观的东西。所以，二元论决不是真正超越唯物论和唯心论之外的第三种哲学派别。而只是在两个不能相容的对立派别之间动摇不定的倾向。并且像康德那样的二元论，由于否认物质的可知性，归根结底是不能不走上唯心论路线的。

由于对哲学上的最根本问题只能有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两种回答，所以，全部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军对战的历史。一切形形色色不同的哲学派别在这两军对战的历史中，都可以归结到两个营垒里面。任何一种哲学，都只能在两个营垒中选择自己的地位，或者是属于唯物论阵营，或者是属于唯心论阵营，或者是动摇于两个阵营之间，而最后还是要归结到一个阵营。哲学上两个阵营的斗争，反映着历史上进步阶级与反动阶级之间的斗争，而唯物论则是属于进步阶级的世界观。自然，这并不是说，哲学史上一切哲学派别都会公开地表明自己所属的哲学阵营。事实上是常常相反，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哲学，是完全公开地明确地宣布了自己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派性，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则并不都是这样。唯物论作为进步势力的世界观，在过去历史上是常常处于被压迫被摧残的地位，因此它往往必须采取较隐蔽的形式来坚持它的思想。唯心论则要经常以各种伪装把自己装扮成似乎很合理的，甚至于合乎“科学”的思想，以掩盖它的反动的和不合理的本质。特别是现代资产阶级的最腐朽最反动的主观唯心论哲学，如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等，不但极力要把自己化装成“科学的”，而且要假装作超越于唯物论路线和唯心论路线之外的哲学。因此，当我们对于各派哲学进行研究的时候，就要注意不要被它的表面形式所迷惑，而必须紧紧地抓着

哲学的最根本问题这一个中心环节，仔细地加以分析，以辨别它们是属于唯物论的阵营，还是属于唯心论的阵营。特别对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哲学，必须揭破它的一切“科学的”假面具，使它的反动腐朽的反科学的本质完全暴露出来。

哲学的问题是最普遍的问题，是人们的一切思想和行动的世界观基础的问题。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不是仅仅存在于哲学的专门领域里，也不是仅仅存在于一般学术文艺界里，而且也存在于人们的实际行动或实际工作中。人们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际工作中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候，不管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都在回答着物质和精神（或客观和主观、存在和意识）的关系这一个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因为，当我们在工作中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实际上使自己的主观思想不断地和周围的客观物质世界发生着关系。我们从周围的客观环境获得种种认识，同时又依据我们的主观的目的、要求、思想等等来影响周围世界和改变周围世界。这就在实际上（不管我们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存在着我们的主观、思想和周围的客观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我们对工作所采取的方法和作风，就是对这问题的实际上的回答。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是在于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出发，力求使人的主观思想、理论、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案等等正确地反映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及其发展规律。这就是在实际上按照唯物论的观点来回答了哲学上的最根本问题，即在实际工作中把客观的物质存在看做第一性的东西，而把主观的精神、思想，看做客观的物质存在的反映。错误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是在于进行工作和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不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出发，不顾周围的实际情况如何，单凭人的主观意志（主观的愿望、兴趣、偶然的感想、

局部的经验、死记的书本词句等）任意地决定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案等等。这就是在实际工作中按照唯心论的原则来回答了哲学上的最根本的问题，把人的主观、精神、思想看做第一性的东西，否认人的认识必须反映客观物质存在，使主观思想脱离客观存在，这就是主观主义。我们反对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坚持从实际出发又回到实际的正确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这在实际上也具有着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两军对战的性质。这就是说，在实际工作中也有着唯物论路线和唯心论路线的斗争，而只有唯物论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才是正确的，才能保证工作的胜利。

二、关于唯物论

唯物论的思想在人类历史的古代时期即已发生，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以及希腊的古代，都曾产生过一种原始的，萌芽状态的辩证唯物论思想。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又出现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唯物论哲学。中国辛亥革命前后所产生的代表资产阶级进步趋向哲学思想，如谭嗣同和孙中山的思想，都包含着许多唯物论成分。19 世纪俄国的代表农民的反抗要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哲学思想，已接近了辩证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哲学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是广大人民反对一切压迫和剥削的哲学思想武器，是工人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哲学思想武器，是指导一切科学研究的惟一正确的工具。

一切唯物论哲学，对于唯心论哲学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界限，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根本观点，那就是前面说过的，对于物质和精神（存在和思维、客观和主观）的关系问题都做出了与唯心论正相反对的回答：唯物论哲学是各时代社会的进步势力的世界观，各时代的进步势力都有着发展生产和改变社会制度的一定的要求，并

且为着实现这些要求而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和利用自然界或社会的客观规律，因此代表他们的要求的思想家就能以当时科学发展的成就作为基础而揭示出某种形式的唯物论世界观，并把这世界观作为进步阶级的思想武器。所以，唯物论又是一定时代科学研究成果的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它从哲学的根本的观点上论证了科学知识的客观真理性，并对科学的发展给予思想上的推动。

这些就是一切唯物论的共同点。但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是各时代唯物论发展的最高形式，它和以前的唯物论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必须把它和形而上学唯物论加以区别，才能正确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哲学。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是近代科学发展成果的最正确最全面的概括，是工人阶级以及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的历史斗争经验的哲学上的正确的总结。它和形而上学唯物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仅是一般地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而且指出物质世界是依着辩证法的规律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世界首先是一切事物现象普遍地联系着和交互地作用着的统一体。在这统一的世界中，任何事物都经历着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都经历着新的事物产生和旧的事物衰亡的过程，在这一切过程中间，事物的运动不是简单的循环，不是在同一个圈子内旋转，不是永远停留在同一点上，而是由量变进到质变，由简单进到复杂，由低级进到高级的上升的运动。事物之所以不断运动，不断向上发展的原因，是由于在相互联系和运动的过程中，事物不断地产生着内在的矛盾，即在自己内部不断地分裂为对立的方面。矛盾的暴露以及通过矛盾的对立方面的斗争而达到的矛盾的解决，就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的内容和泉源。所以，事物的运

动，乃是事物自己的运动，也就是由事物自己本身的原因，自己内部的矛盾所引起的运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事物自己的内部，而不必到事物的外部去寻找。事物的外部联系，一事物对于他事物的交互作用，对于事物的运动发展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外部的联系和影响，不是事物发展的第一性的、最根本的原因，而只是第二性的原因，外部的原因必须通过内部的矛盾才能起作用。辩证唯物论指示我们要从事物的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外部联系的考查这两方面来研究和认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规律，但又必须首先把注意的着眼点放在事物内部矛盾的分析上。辩证唯物论是最彻底最完备的唯物论哲学，它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论的重大的弱点。形而上学唯物论只承认事物的量的变化和位置的移动，否认由量变到质变、由低级到高级的上升运动，也就是把事物本身看做没有发展过程的，在本质上一成不变的东西，看做没有内在矛盾因而归根结底是不能由自己内部找到运动原因的东西。这样，形而上学唯物论就不能不把事物运动（而且仅仅是量的和位置的运动）的根本原因归结到事物外部的推动作用，这就给唯心论哲学留下一个空隙，即一旦涉及到要追究世界一切运动的最后和最根本的原因时，就难免要把这原因归结为物质以外的力量的推动，也就是要把一切事物运动的最后的或最根本的原因归结为神、主观精神或世界精神之类。辩证唯物论哲学指出一切事物的运动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客观存在着的事物自己本身的矛盾，因此就把唯心论能够藏身的任何角落都清除干净了。只要善于分析事物的矛盾，就能从任何事物本身找到运动发展的根本原因，而用不着神、主观精神或世界精神之类的神秘力量。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形而上学唯物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唯物论哲学）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点。就是马克思

主义辩证唯物论把唯物论的根本原则——物质的第一性和精神的第二性的原则——贯彻到人类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研究方面，而创立了历史唯物论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唯物论都只能在自然界的解释方面坚持唯物论的原则，一遇到社会历史的领域，就坠入了唯心论的窝臼，把精神的因素当做第一性的东西，把人的意识、理性、道德原则，伟大人物的个人思想行动等等当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克服了旧唯物论的这一个不彻底性，把物质的第一性和精神的第二性这个原则推广到人类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研究方面，指出了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社会的精神生活的原理，并指出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就是决定社会的性质和面貌的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指出生产是不断发展的过程，而生产的发展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生产本身的矛盾规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规律，以及在一定生产发展阶段上所出现的阶级矛盾规律，是生产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内在的源泉。历史唯物论的这些根本观点把人类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研究真正成为一种科学的研究，使我们看到历史的发展决不是仅仅由它的外部原因——如地理条件之类——所决定的偶然的过程，而主要是由社会历史自己本身的物质生活条件及其内部矛盾所决定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者——劳动群众的历史，劳动群众的活动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因此，只要我们首先从社会历史生活中去研究它的生产情况和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情况，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以及在一定生产条件下所出现的阶级矛盾运动，我们就能够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就能够利用这些规律知识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来为我们的生产活动、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指出正确的行动路线、工作方针以及正确的办法、计

划等等，就能够使我们的实践斗争获得胜利。中国革命能够获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应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科学观点来观察中国革命问题和指导实际革命工作的结果。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常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互相结合的结果。

辩证唯物论指出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和物质的自己运动原理，并不是就否认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或人的变革世界的实践活动的意义。辩证唯物论肯定人类能够改变世界，也就是能够通过生产活动来改变自然界，又通过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实践来改变社会。但是，人类改变世界的这种主观能动作用，决不是可以完全脱离客观事物自己运动的规律性，而单凭人的主观意志要怎样便怎样的随意行为。人们首先必须认识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然后依据这些规律知识来确定自己主观的活动的目的、任务、计划、方法等等，这样才有可能胜利地进行改造世界的活动，以为社会谋福利。这就是说，必须使主观的认识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形，必须力求主观和客观的一致，才能发挥主观的能动性，使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获得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人们不顾客观实际任意决定自己主观的目的、任务、计划、方法等等，如果让主观和客观分裂，那就不能够在实践活动中获得胜利，那就一定要失败。在这里，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仍然是第一性的东西，而依着一定的目的、任务、计划、方法等等来改造世界的主观的能动的活动，仍是第二性的东西，主观的能动性是建立在主观的认识和客观的规律性一致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主观和客观的分裂上。

辩证唯物论和一切唯物论在认识问题上都有着反映论这一个共同的观点，认为正确的认识必须是自然界的本来面目的反映，而

不能有任何纯主观地随意附加的东西。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形而上学唯物论有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形而上学唯物论不知道人的认识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形而上学唯物论把认识看做是像镜子一样地静静地和消极地反映外物，而不知道认识是随着人的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指出人的认识是和实践分不开的。指出人的主观思想是在社会实践（生产活动、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等）过程中，并且也只能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来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内部规律性。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首先对于客观事物获得许多感性认识，获得许多片面的、表面现象的认识，然后又进一步把实践中所积累的感性认识加以概括、总结，使之成为有条理的、带有综合性的知识，即理性认识，也就是反映事物的全面、本质及其内部规律性的理论知识。人们有了正确的理性认识或反映事物规律性的理论知识，才有可能对周围事变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预见，才能对自己的实践行动提出明确的任务、方针、办法、计划等等，来给与自觉的指导，同时，在实践过程中，人们又可以检验自己的主观的认识，使之获得修正、补充和发展。形而上学唯物论不懂得人的认识由感性到理性这种辩证法的联系，不知道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认识发展过程中的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对于这两者的可靠性问题就发生了不同的片面性的看法。一种片面性的看法是：只承认感性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把理性认识、概念、抽象思维等一概看做是纯主观的不可靠的东西。坚持这种片面看法的哲学派别，叫做“经验派”的形而上学唯物论。另一种与此相反的片面的看法是：只承认理性认识能反映事物的真正本质，而把感性认识看做是不可靠的东西。坚持这种片面看法的哲学派别叫做“理性派”的形而上学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

辩证唯物论既反对“经验派”的片面观点，也反对“理性派”的片面观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指出认识必须从感觉经验开始，“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一个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的人，是无所谓认识的。”（《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52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79 页）但是，认识虽然必须由感性开始，又不能停止于感性认识，还必须进一步上升到理性认识，因为只有理性认识，才有可能反映事物的全面、本质和内部规律性，只要这理性认识是以丰富的感性认识为基础，并且是由后者正确地概括和总结出来的思想，而不是隔绝了感觉经验的人们脑子里主观自生地凭空做出来的抽象概念和抽象思维。毛泽东同志说：“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同上书，第 280 页）

不论“经验派”或“理性派”，即使在基本上是唯物论的，但它们的片面观点在认识问题上就给唯心论留下了漏洞。过分夸大经验的意义而否认理性认识的可靠性，就会在实际上否定了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就会否认科学理论和科学真理，因而走向与唯物论原则相反的方向。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里指出有一种“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的“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他们是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主义者。他们由于不注意科学理论知识的重要性而在思想上常常离开了唯物论的原则，走向主观主义，也就是在实际

工作中不自觉地走向唯心论的方向。“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的“理性派”，使理性认识脱离了感性认识的基础，而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空洞的抽象思维。这在认识论上就是唯心论的路线。实际工作中的教条主义者，就是轻视感性认识、感觉经验而只凭着一些书本上摭拾来的词句进行纯主观的抽象思维的主观主义，也是实际工作中的一种唯心论倾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哲学不但要在一般哲学的认识论问题上反对“经验派”和“理性派”的片面观点，而且要在实际工作中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不但要在学术理论方面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而且要在实际工作中反对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指出学术上的唯心论，正是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唯心论倾向系统化、集中化、理论化的结果。因此，如果对于学术上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不进行坚决的斗争，如果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反抗和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进攻不加以彻底的粉碎，它迟早就会在实际工作中发生它的坏影响，就会腐蚀我们的干部的头脑，使我们的干部容易走向主观盲目的错误道路上去，因而给工作带来严重的危害。所以，任何一个工作干部都必须认真注意像目前对胡适及胡风思想的这种批判运动，从这些批判斗争中来学习提高自己的认识，保证工作的进步。

三、关于唯心论

唯心论是哲学史上始终和唯物论哲学居于敌对地位的社会反动势力的反科学的哲学思想。唯心论产生在阶级社会里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以及和这相联系的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对立的基础上。唯心论的哲学的根本观点是把精神、主观、意识看做第一性的东西，看做世界的创造主，而把物质、客观、存

在看做第二性的东西，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这种观点在实际上就是剥削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各种思想、制度和行为的理论基础，就是把剥削者、即与劳动人民对立的所谓“劳心者”看做世界的主人和创造者，而否认了只有劳动人民才是真正创造历史的主人这一个历史唯物论原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就是中国古代剥削阶级的代言人提出来的把剥削制度理想化和永久化的唯心论的公式。唯心论否认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的可知性，否认人的认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而把真理的认识看做是人的头脑里主观自生的东西，或者是世界精神之类的神秘的创造主所启示的东西。这些观点取消了广大人民的实践斗争在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意义，把真理的认识看做仅仅是少数居于特殊地位的或受到天赋使命的“先知先觉”者的特殊事业，而广大人民则是“浑浑噩噩”的“群氓”，他们只能按照“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原则永远受少数特殊的天才人物的随意摆布。唯心论哲学的反动的和反科学的本质就在这里。

就思想的根源来说，唯心论哲学是由于唯心论哲学家用形而上学的手法把人类的认识过程割裂了的结果。认识是在人的社会实践过程中由物质到感觉，由感觉经验到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并在实践中再从物质世界获得更进一步的感性认识。这是一系列的辩证的运动过程，这样的过程不断地反复前进，人们对于自己的周围世界就获得日愈更加全面日愈更加深刻的认识。这里认识过程的许多环节是相互联系着的，不论割断了任何一些环节之间的联系，把其中一部分孤立化、绝对化，都可以使思想引导到唯心论的方向。各种不同的唯心论派别，就是从认识过程中的不同的环节上加以割断的结果。

唯心论的派别形式是各种各样的，但大体上都可以归结为两

类，即主观唯心论和客观唯心论。

属于主观唯心论的最主要的一些派别，有18世纪初英国的贝克莱主教和休谟的哲学，有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的马赫主义哲学和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这些哲学派别在形式上虽有若干的区别，并且在表面上常常假装做是承认科学甚至于是采取了最新的科学成就的哲学，但在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的最反动最腐朽的并且和科学完全对立的主观唯心论。这些主观唯心论哲学的共同点，就是以经验主义的面貌出现，首先把自己伪装成好像是很重视经验重视事实的哲学，也就是伪装成好像很拥护科学方法的样子，以此作为迷惑人们的手段，然后就用形而上学的手法把经验绝对化、孤立化，而引到主观唯心论的结论。这些主观唯心论者首先是割断了感觉经验和物质的联系。否认感觉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把感觉、经验看做完全主观的“纯粹感觉”或“纯粹经验”。主观唯心论者说：我只是通过我的感觉或我的经验来认识一切。但我的感觉或经验仅只是我的主观的东西，我没有权利断定说我的主观的感觉和经验与感觉经验之外的客观事物有任何相同的地方，因此也就不能说感觉和经验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的反映。即便有这种客观存在的外界事物，也只是我不能认识的“自在之物”，我对于它的是否存在以及它的性质如何，至少是应该采取怀疑的态度。（主观唯心论的这种不可知论的看法自然是错误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指出实践就是用以检验人的认识的客观真理性的标准，经过实验考验的正确认识之能够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是不容怀疑的。）照主观唯心论者看来，我们平常认为是“物质”或“实在”的东西，那只是我们的一堆“感觉材料”所构成的一种主观的观念，并不是真正客观地存在着这样的“物质”或“实在”。这样，从主观唯心论的观点看

来，不是物质的客观存在引起了人们的感觉，相反地，倒是感觉要素的“复合”在人的头脑里构成了“物质”和“实在”的观念。由此就做出这样荒谬的结论：“物质”、“实在”以及世界的一切都仅仅是人的感觉的复合，世界上除了我的感觉和经验之外，什么也不存在了！另一方面，主观唯心论又割断了感觉（经验）和理性（概念、思维等）的联系，否认人的认识能够由感觉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并以理性认识来反映客观事物的内部规律性这一个辩证的认识运动过程，而以为：人的认识活动仅仅应该限制在一大堆感觉材料（而且是纯主观的）的范围之内，超出感觉材料范围之外的概念、理论等等，都是完全抽象的没有意义的东西。于是主观唯心论者就在经验主义的面貌下面，在重视“经验”、重视“事实”的假科学招牌下面，来否认科学理论知识的客观真理性，来否认关于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性的知识，特别是要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胜利这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知识，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偷偷地用信仰主义的观念来迷惑人民，以为自己的前途只有让盲目的命运去决定，而不知道自己应该和可能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知识，来指导自己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及一切剥削制度的实践斗争，来为自己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如果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竟受到了这种唯心论观点的迷惑，他们的革命斗争的信心，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来解放自己的信心就要大大地减弱，这样就便利资产阶级用一切投机冒险的手段来进行垂死的挣扎，以求延长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主观唯心论的反科学和反革命本质就在这里。

客观唯心论的近代的最主要的代表是19世纪初期黑格尔的唯心论哲学。黑格尔否认世界的物质性，而把他所谓的“世界理

性”或“绝对精神”看做一切事物的本质。黑格尔的客观唯心论哲学是人类的理性认识绝对化和神秘化了的结果，在黑格尔看来，理性不是物质世界的规律性在人的主观思想中的反映，相反地，理性首先是在人的头脑之外客观地存在于全部宇宙中的创造一切的一种神秘的源泉，是变相的上帝和造物主。客观唯心论认为世界一切事物在本质上都不是物质的，而只是世界理性的各种表现形式，人的认识并不是反映了物质世界及其规律，而只是对于世界理性的“自我意识”。人的理性之所以能认识世界，只是因为世界本来就是理性的。客观唯心论把世界看做是被某种理性公式所支配的，因此，只要有人一旦能够像受到神的启示一样地完全意识到这些理性公式，就可以达到知识的顶点，而科学研究的继续前进也就成为不必要了。同时，只要世界上出现一种社会制度，能够表现理性发展的全部公式，那么社会的发展也就到此为止了。黑格尔的哲学虽然有着一些辩证法的合理核心，但他的哲学体系是这样一套唯心论的谬论，所以他就违背着辩证法的合理核心，硬把他自己的哲学说成为人类知识的最高峰，硬把他们所拥护的普鲁士君主国家制度叫做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的最合理的制度。这些就是黑格尔的客观唯心论哲学所做出来的反科学的和反动的结论。

中国在封建时代也曾出现各种唯心论的思想，例如，主张“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明朝王阳明的哲学，就是主观唯心论的。宋朝的朱熹把“理”作为客观存在的创造一切的第一源泉，这就具有客观唯心论的性质。中国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后时期就有着许多唯心论的表现。中国资产阶级的唯心论思想在哲学上反映着它的软弱性和它的反动方面。“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如孙中山先生虽然继续向前寻找革命的

道路，并且终于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革命的道路；但另一部分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则站到了坚决反对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的革命运动的方向，他们的思想代表者就从帝国主义国家搬来了种种最反动最腐朽的主观唯心论思想，以此来反对人民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之下，由中国的先进人士所接受过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五四”运动以后，主观唯心论的哲学思潮就在中国资产阶级“学者”中间大大地流行起来。德国、奥国的马赫主义，英国的罗素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等等，先后都被介绍到中国来，其中以胡适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的影响为最大。这些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思想在学术文艺界和知识界直到今天还有着很大的作用，它阻碍着学术文艺工作的发展，阻碍着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进步，也就是阻碍着学术文艺界以及一部分知识界的潜力的发挥，使它不能很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因此，必须坚决和实用主义以及一切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进行斗争，彻底肃清它的影响，才有可能顺利地实现在我国逐步消灭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

四、学习辩证唯物论哲学，为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和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斗争

在目前，要学习划清唯物论和唯心论界限，掌握辩证唯物论，首先就要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因为，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如像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和胡风的文艺思想等的斗争，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思想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对于社会主义改造所进行的思想

上的反抗和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所进行的回击。不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这些思想反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就不可能得到保证；另一方面，对于实际工作中的唯心论倾向，也要注意加以克服。主观主义是由于我们的干部不能在工作中自觉地掌握辩证唯物论原则而产生的错误。这种错误有着和一般唯心论基本相同的认识论上的根源，在这里我们不妨作一些更具体的说明：

第一，在革命斗争中有相当经验的干部，在他们所熟悉的工作范围和工作条件之内，他们的经验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的。但如果他们不学习辩证唯物论，不知道用唯物论的原则来看待自己的经验，也就是不注意自己的经验只是反映了局部的实际事物的知识，而把这局部的经验误认为普遍的真理；如果他们沾沾自喜于这种“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不努力学习理论，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也就是不去学习认识更深刻更全面地反映客观实际事物的各种科学规律知识，简单地采用“经验搬家”的办法来把他们的经验任意应用到各种工作环境里去，那他就要犯经验主义的错误。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完全正确地反映了自然界、社会发展、革命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性的科学真理。如果不注意辩证唯物论哲学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不知道用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以工人阶级的实践经验作为基础的，结果就只能简单地记住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在实际工作中不知道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革命工作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或者只是死板地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原理原则，不知道这些个别原理原则只是适用于一定的客观条件，而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去应用它。这就是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具体实践割裂开来，这就犯了教条主义的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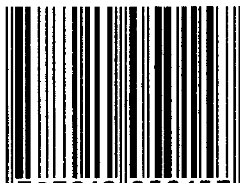
心论错误。第三，一切工作必须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这是正确的。但如果对这个观点作错误的解释，不是用辩证唯物论的原则去观察实际情况，不注意到客观实际是矛盾的，并且要通过矛盾基础上的对立面的斗争而前进发展的，而是把眼前的某些现象看做是死的、不发展、不变化的，害怕斗争，害怕进步，这就要陷入保守主义这一种在实际上脱离了真正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急躁冒进也是一种主观主义的错误。在形式上它和保守主义是相反的，但在实际上同样是脱离了客观实际情况的实际工作中的唯心论倾向。

根据以上这些对主观主义的形式的分析，就可以知道，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其思想上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不能自觉地一贯地用辩证唯物论的原则来对待工作，就不知不觉地走上了唯心论的方向。因此，要克服主观主义，必须努力学习辩证唯物论，学习善于在一切工作中划清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界限，也就是要学会在我们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自觉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来作为我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工具。

如何学习辩证唯物论哲学，学习善于划清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界限，这是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所关心的问题。本文不是要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但对于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环节所在，可以顺便提出一些意见。许多人在学习辩证唯物论哲学时，多半只注意到如何从书本上学习，如何选择经典作品和参考书，以及如何排列阅读的顺序等等。选择读物，自然是必要的。但是，许多人往往太注意这一方面，而忘记了一个更重要的方法，就是要在实际斗争中来学习。他们没有注意到，和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进行斗争，如像批判胡适及胡风的思想的这种斗争，正是学习划清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界限和学习辩证唯物论的最好的方法之一。离开了这样

的斗争，只注意书本的阅读，那我们将只能记住一些死词句。只有注意这样的斗争，从斗争中来学习，我们才有可能亲切地领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所指示的原理原则的活的内容，才能真正提高我们对于辩证唯物论哲学的认识与认清唯心论的面目和它的危害性。我们强调目前学术界和文艺界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不仅仅是学术界文艺界的事情，而是各方面工作干部都应该重视的事情，这也可以算是一个原因。希望我们大家都从这些斗争中来学习辩证唯物论，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以便使我们的思想和工作能力提高，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原载《学习》杂志1955年第4期，1955年4月2日）



ISBN 7-01-005015-5
定价：600.00 元(共八卷)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艾思奇全书　第5卷　1952-1955
作者=艾思奇著
页数=861
SS号=11796300
DX号=
出版日期=2006.10
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目录
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科学方法（1952.4
）
从《矛盾论》看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1952.6）
　一、学习《矛盾论》的意义
　二、辩证法的核心是关于对立的统一的学说
　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一些基本原则
　四、正确掌握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解决矛盾的主要关键
　五、结论
关于《矛盾论》几个问题的解答（1952.9）
逻辑学（1952.9）
　一、逻辑学研究什么？
　二、思维是认识的高级阶段
　三、关于概念与定义
　四、判断
　五、逻辑的基本规律
　六、推理
　七、若干问题的解答
“机关青年应怎样对待工作和学习来适应国家建设日益增长的需要”的讨论总结（1953.9）
辩证法讲课提纲（1953）
　一、引言
　二、辩证法的第一个基本特征：事物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依赖
　三、辩证法的第二个基本特征：从运动、变化和发展中看事物
　四、辩证法的第三个基本特征：发展是由量变进到根本

的质变
五、辩证法的第四个基本特征：发展是事物内部对立面的斗争
西洋哲学史（1953.9）
第一次讲课
一、怎样学习西洋哲学史
二、古代哲学
第二次讲课
三、中世纪哲学
四、十七八世纪的经验派和理性派哲学
第三次讲课
五、18世纪法国唯物论哲学
六、德国古典哲学
辩证法引言（1953.10）
一、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者用来研究自然界和社会生活、历史的方法
二、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想的最普遍规律的科学
三、辩证法是怎样产生的
四、马、恩、列、斯如何规定辩证法的特点
五、学习辩证法应该采用什么方法
普遍联系的辩证法（1953.10）
一、辩证法特征的定义
二、自然界的普遍联系
三、人类社会的相互联系
四、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观点的批判
五、学习辩证法普遍联系原则的方法
运动发展的辩证法（1953.10）
一、世界是运动发展的
二、运动发展特征在自然科学上的表现

三、运动发展特征在社会历史上的应用
四、学习经典作家对运动发展原则的运用
五、学习方法应注意的要点
量变质变的辩证法（1953.10）
一、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的关系
二、量变质变特征是人类认识自然社会的结论
三、量变质变规律在社会科学上的应用
四、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
五、学习方法要注意的问题
对立统一的辩证法（1953.10）
一、事物发展的源泉
二、自然科学中对立统一法则的表现和运用
三、马克思主义如何把辩证法运用到社会中
四、对形而上学的批判
五、学习方法上的要点
关于辩证法学习小结的几个问题（1953.11）
一、学习方针的问题
二、学习方法的问题
三、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1953.11）
第一次讲课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意义及其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意义及其特点
二、关于阶级的定义
三、阶级是如何产生的？
四、阶级与阶级斗争是怎样发展的？
第二次讲课　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一、无产阶级的特点
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形式
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组织
四、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后目标

马克思列宁学院哲学教研室1953年下学期工作总结（1953底）
第一部分　二部七、八、九班教学总结
第二部分　二部六班的教学工作总结
第三部分　哲学专业第一、二两班的学习和助教工作概况与关于向苏联专家学习及如何做好助教工作的专题总结
一、两个专业班的学习和助教工作概况
二、如何向苏联专家学习及如何做好助教工作？
马克思列宁学院二部对党内中级干部进行哲学教学的经验（1953底）
一、参加学习的学员的基本情况
二、哲学教学的任务、方针、方法和步骤
三、哲学教学的收获和缺点
四、教学经验的几点主要的体会
学习斯大林的学说，为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纪念斯大林逝世一周年（1954.3）
不能忽视政治（1954.4）
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引言报告（1954.9）
一、辩证法唯物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又是马克思主义者用以认识世界和革命地改造世界的方法论
二、学习辩证法唯物论哲学就是要克服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性，力求用辩证法唯物论的方法和观点研究理论、领会政策和处理工作
三、贯彻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的教学方针，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惟一正确的方法和目的
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职能是组织社会主义经济（1954.10）
学习历史唯物论，反对历史唯心论（1954.10）
一、历史唯物论的最根本的原理
二、反对历史唯心论

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四、正确理解什么是社会存在
五、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活（1954.11）
哲学问题解答（1954.11）
一、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
二、关于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
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
四、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
五、其他一些哲学问题
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原理的讲授（1954.12、1955.1）
第一次讲课（1954.12.29）
一、什么是经济基础？
二、什么是上层建筑？
第二次讲课（1955.1.5）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
第三次讲课（1955.1.8）
四、若干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解答
胡适实用主义批判（1955.1）
一、实用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
二、实用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一派
三、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的认识论
四、抹煞真伪标准的真理观
五、实用主义的庸俗进化论
六、反科学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论
胡适实用主义哲学的反革命性和反科学性（1955.1）
一、实用主义就是主观唯心论
二、主观唯心论的——不可知论的认识论
三、抹煞真伪标准的“真理”观
四、不是科学的进化论，是庸俗的进化论

五、不是科学方法，是主观唯心论者“ 应付环境 ”的方法
《胡适实用主义批判》一文的修改说明（1955.3）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历史形式（1955.2）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对象
二、古代唯物论形态
三、近代唯物论形态
什么是我们的远大前途（1955.2）
一、问题是这样的
二、前提和原因
三、什么是我们真正的远大前途？
四、个人的前途和社会的前途有矛盾吗？
五、把我们的一切献给最伟大的事业
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1955.4）
一、哲学的最根本的问题和唯物论唯心论的两军对战
二、关于唯物论
三、关于唯心论
四、学习辩证唯物论哲学，为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和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斗争
封底